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的艺术世界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1893年12月26日，在中国大地上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诞生了一个杰出而特殊的生命。

他以自身的行动表明，他是家庭中不安分的人，他是学校中的动乱因素，他终于成为旧时代的叛逆者。正是他，后来却成了当代的伟人，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1921年，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十三个代表之一。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党内和军队的领导地位，一直到他去世，长达四十余年，而且他的思想还将继续指导着这个党。1949年，是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象征着几千年的旧秩序在他及其战友们的手中崩溃。使庞大、古老的龙的国度地覆天翻“换了人间”。1966年，他以自己的思考和威望，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

无论从什么角度，也不管他的功过如何，谁也不能否认他是时代的骄子、世界的伟人，他的名字连同他的影响，将会流传几代、十几代，甚至更久远。

他，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成功地把马列主义引进中国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他没有恪守教条；“宜将剩勇追穷寇”，他断然拒绝了斯大林的告诫。他就是他，他的思想源于马列，但又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他有他自己的思维艺术。

他富有生气的语言，熔铸了古今中外语言之精华，谱写出史诗般的宏篇巨著、华美诗章。他深沉、含蓄、幽默、风趣的谈话，令中外朋友折服；他给家人亲友的书信，又是那么平易、亲切、热情；他的演讲能使人开怀大笑，也能令人颌首称道、遍思无限。他不愧是语言艺术的大师。

他从一个书生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战略家。他创造了独有的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他以自己的军事艺术谱写了多少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篇章，留下了多少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千古绝唱。

上下几千年，帝王写诗填词的大有人在，但没有哪一位能象他的诗词那样想象丰富、气魄宏大、寓意深刻、意境高远，更不用说那种昂扬奋进、高瞻远瞩的胆识和精神。他是领袖又是诗人，受之有余，当之无愧。

他的书法别具一格。他初练魏碑，酷爱“二王”，他的书法汪洋恣肆、任意挥洒、布局谐调、自成妙趣，众口皆碑。

《毛泽东的艺术世界》这套丛书，正是从艺术的角度来审视和探究毛泽东的一个侧面，使人们能从领袖之外看到一个艺术化的毛泽东，这也是研究、宣传毛泽东及他的思想所作的尝试。我们衷心希望这种尝试，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对毛泽东的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编 者

1991年6月

毛泽东的艺术世界

毛泽东的语言艺术

“你有资格当共产党。”

诺罗敦·西哈努克，是毛泽东的老朋友，自1956年至1970年他先后七次访问中国，而每次访问，几乎都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每次接见的的时间都比较长，这给西哈努克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6年诺罗敦·西哈努克第一次访华，毛泽东前后几次会见了，每次谈话从未少过一个小时。初次的印象就使他觉得：在面前的是人类中的一个伟人，慈祥而富表情的面孔闪烁着智慧、沉着和坚毅。他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多次长时间地接见他，是因为彼此间友谊建立在爱国主义和敢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这一共同点上，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西哈努克对中国比对那些社会背景和形式上思想一致的国家感到更亲近，初次见到毛泽东时，就很快对他有了好感。久而久之，西哈努克与毛泽东彼此之间部有了比较深厚的感情。

1958年8月，西哈努克到达北京不久，毛泽东就接见了，第二天又在中海游泳池旁边的帐篷下继续会谈。后又到避暑胜地再次继续会谈。

1970年3月19日，诺罗敦·西哈努克开始到北京进行他的第七次访问，这一次访华比以前任何一次时间都长。

中国对柬埔寨的问题，对柬埔寨与邻国的关系、柬埔寨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意图的估计以及许多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问题都很感兴趣。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他向西哈努克阐述了中国政策的概貌，主张独立国家切实不要被别国控制，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并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欢迎柬埔寨和中国做朋友，同意柬埔寨采取中立的方针，并认为中立是最好的方针。

在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心目中，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从来不咄咄逼人，从来不对他进行说教、训斥、警告或给予什么“友好的忠告”等等之类的东西，而且中国人在给经济援助时总是很谦虚，总是说：“要是质量更好一点就好了，但是我们自己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要是数量更多一点就好了，但是我们自己的生产还很有限。我们希望，随着我们工业的发展，我们能给我们的朋友更有效的帮助。”

西哈努克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中国给柬埔寨的一贯援助支持，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长期友谊，于是一些人就别有用心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西哈努克洗脑筋。对此，西哈努克表示可以理解。当西哈努克提到偿还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不是军火商”，“对于某些方面的帮助，你可以把它叫做贷款，也可以记帐。可是军火除外。”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会见西哈努克时，西哈努克说：“主席先生，中国负担很重，还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从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毛泽东则说：“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二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有一次，毛泽东在接见西哈努克时对他说：“西哈努克亲王，我喜欢同你谈话。你讲话很坦率，而且敢于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你不怕把你所想的都讲出来。”并说：“你有资格当共产党。”

西哈努克说：“主席先生，说真的，我不行啊。”

毛泽东大笑说：“你很聪明，你又很用功。你可以学习嘛！”

西哈努克说：“我懒得去啃马克思、列宁和其他一些人著作。”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有这些著作的简写本，有选集。为了掌握他们的思想实质，你完全用不着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著作都读完嘛。”

西哈努克说：“主席先生，我宁愿读毛泽东的著作。”

西哈努克认为，毛泽东的著作比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容易懂，毛泽东把马克思理论中最合乎逻辑的部分同亚洲文明与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关于人性方面的思想的哲学味道比政治味道更浓，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非常有意思。就象希诺芬的其他希腊经典战略家所写的东西至今还站得住一样，毛泽东的著作也同样会站得住，因为他的著作反映了经典的普遍真理。毛泽东能够把明确性、逻辑性和普通常识结合在一起。

在西哈努克心目中，国家领导人能够平等对待他的，只有戴高乐和毛泽东。西哈努克叹服的是毛泽东同戴高乐一样，有着非凡的记忆力。毛泽东同他会见时，可以随时准备引用历次会见中西哈努克说的原话，尤其令西哈努克惊叹不已的是，毛泽东对从与他第一次见面以来柬埔寨的事态发展了如指掌。

一次西哈努克十分惊奇地听毛泽东说：“你因为在金边开设了一家国营赌场而受到了谴责。”接着说，“据我看来，开个赌场总比接受美国的援助强。我知道你开赌场并不是为了你个人发财。你的财政预算有困难，所以你开了一家国营赌场，用它的利润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反正你们国家的人都喜欢赌博。那么难道让它的利润去中饱赌场老板们的私囊却不让国家受益？从你在财政方面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起，我就看到了你必须在接受美国援助和寻找其他财源二者之间选择一样。”

还说：“他们因为你开了一家赌场为国家筹款而谴责你，看着朗诺从尼克松那里拿了成亿的美元，他又在那里干些什么？他手里美元可多啦，可是你们国家的人民却真正在受苦。开赌场说什么也比接受美国援助强。”

毛泽东对这件事了解得这样清楚，又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核心——那是为了把赌博和腐化的部分不义之财交给国库。这使西哈努克感到十分惊讶。

这次接见后不到三个星期，毛泽东于5月20日发表了一个少有的、历史性的公开声明：

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是代表两个阶级、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元首。一个是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一个是地小人少的弱小国家。两人长期交往，多次会见，彼此之间能建立如此深厚的友谊，一方初次见面就有好感，并相信他的著作能站得住；一方竟相信对方有资格当共产党。这些除了世界格局的彼此的国家利益起决定作用之外，与毛泽东谈话的语言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不以大国领袖自居，而把对方视为平等的同志关系，双方的会见是平等的思想交流、感情交流，从不盛气凌人、以权压人，而是以诚相待，

以理服人。这样不仅可以解除对方的防御、恐惧、紧张、对立等心理状态，而且能够点燃对方内心的自尊的火焰，产生“解剖自己”、“反省自我”的动力，使谈话产生预期的效果。

“ 总而言之，
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身上！ ”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三分错误是指什么呢？“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身上！”正是毛泽东对斯大林生前对中国一些不友好表现的一种不满。

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曾派米高扬到南京去同蒋介石会谈，让他去了解蒋介石需要什么，以便向他提供援助。对毛泽东不攻打上海，斯大林持批评态度。在斯大林看来，当时蒋介石已经守不住那个城市了，可是毛泽东却不让军队前进，拒不拿下上海。对此斯大林曾怀疑毛泽东是狭隘的农民立场，忽视和害怕工人阶级。所以后来斯大林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就向毛泽东提出：“你当时为什么不拿下上海？”“我们为什么要拿下它呢？”毛泽东说，“拿下上海我们就得负责养活六百万居民。……”听到毛泽东坦率的回答，斯大林才解除了对毛泽东的误会。

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对毛泽东始终吃不透，对毛泽东的许多做法不十分理解。

但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却是感触很深的。先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中苏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开发新疆的天然资源。后来又提出让中国划出一块合适的地方来给苏联建立一个橡胶园。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电报内容发了回电。电文是：“我们同意在越南海岸对面的海南岛上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园。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明确他说，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我们将给你们运去橡胶作为你们这种帮助的报酬。”

还有一次，斯大林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毛泽东一两天后就发回了电报，回电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

难怪斯大林说：“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

毛泽东第一次去苏联是1949年12月。他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祝寿，并就两党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斯大林的生日是12月21日，毛泽东是12月16日12时到达莫斯科的。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约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富会面。

一见面，斯大林双手紧握毛泽东的手，注视端详了一阵，说：“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康嘛！”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泽东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你健康！”

会谈中，斯大林问：“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想法或愿望？”毛泽东说：“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东西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当时担任翻译的师哲考虑，如果直接译出，苏联同志肯定不会明白，所以在翻译时作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说内容有味，实实在在。”然而苏联同志仍然不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斯大林为了摸清毛泽东的想法和愿望，会谈后，在休息过程

中，又两次打电话给毛泽东，仍是问他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要求，毛泽东总是不说。后来斯大林又通过师哲试探，毛泽东的回答是：“我没有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会谈吗？！”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于 1950 年 2 月 11 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斯大林原打算在签约的同时，签订贸易协定。但由于苏方工作人员的粗心，出了差错，耽误了时间，所以没有将贸易协定按时拿出来。斯大林问及此事，他的下属竟说“中方没有准备好。”斯大林让师哲把这话译给毛泽东。毛泽东说：“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身上！”斯大林感觉到了，再三追问师哲毛泽东说了什么，师哲说：“是我们私下的话。”

“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身上！”是毛泽东对苏联，对斯大林态度的直接流露，是对斯大林傲慢态度的一种讽刺，是毛泽东维护中国尊严、蔑视特权的表现，也是毛泽东大智大勇的爱国思想的反映。

“我们共同的老朋友
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

尼克松在中美隔绝二十多年后，勇敢地跨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步，他决定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离开美国秘密飞往北京。国务卿罗杰斯在飞机起飞前，关切地对尼克松说，我们切不可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毛泽东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2月21日尼克松到达北京后仅四小时即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毛泽东的寓所，女秘书扶他站起来。尼克松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原来毛泽东患支气管炎已有一个多月了。

周恩来挥手示意让在场的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退出去以后，毛泽东握住尼克松的手约一分钟之久。

两人先寒暄了一会儿，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讨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谦虚他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

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却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毛泽东虽然说话有些困难，但思维象闪电一样敏捷。他挥动了一下手，同时说，“我们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的手势可能指这次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接着说：“他（指蒋）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尼克松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叫他什么？”毛泽东笑了。周恩来接过来说：“一般他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当毛泽东谈到基辛格巧妙地严守第一次北京之行秘密的事时向尼克松说：“他不象一个特工人员，”“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去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除了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泽东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尼克松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罗？”毛泽东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尼克松回答说，“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恩来说。毛泽东与尼克松一起哈哈大笑。毛泽东谈到美国总统选举时，告诉尼克松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这个我们懂得。”尼克松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

尼克松回答：“你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泽东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尼克松补充了一句。毛泽东又说：“戴高乐另当别论。”

接着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尼克松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在谈到这次会谈的历史背景时，毛泽东告诉尼克松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毛泽东很活跃，他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他显得很疲劳了。周恩来屡次看手表在提醒尼克松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恩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毛泽东听译员译出他诗词中的话，露出了笑容。

尼克松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泽东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象放空炮！”周恩来哈哈大笑。

毛泽东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着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們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告辞的时候，毛泽东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笑着摇摇头，对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泽东陪着尼克松走到门口，拖着脚步慢慢地走动。并告诉尼克松，自己的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尼克松回答。

毛泽东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我们的新闻单位在有关毛泽东会见外宾情况的报道中，较客观地报道了这次会见。报道说：“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住所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但报道中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之类的词。

毛泽东还为尼克松写了一个含义隐晦的条幅，并送给这位美国总统以作

为他访问的纪念：

老头坐凳
嫦娥奔月
走马观花

坐在凳子上的“老头”是帝国主义。“嫦娥奔月”是卫星的迷人形象。”走马观花”则是指尼克松本人草草地观看了一下中国。

毛泽东称赞了尼克松至少还来到中国看了看，不象那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头子只是自鸣得意地坐着。

毛泽东后来在武汉对一群军队干部说：“尼克松没弄懂我的意思。”可能是这样，但也无妨。那条幅虽然对尼克松并非不友好，但却如此具有讥讽意味，美国总统即使领会了其意，也会怀疑自己和毛泽东所见的世界是否颜色相同。

毛泽东与尼克松、基辛格的会谈，是两位大国的最高领袖之间，又是初次见面，秘密会谈，这些特定情况与背景，再加上两方都有诚意这种心理因素，所以谈话就有一种特有的风味。毛泽东使用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多了解对方，再把所获得的种种细微信息分析探究，由小到大，由微见著，作为交谈的基础。如尼克松想到自己过去曾说过和做过许多使中国和对中国的领导人不满意的事情，说“象我这种人”、“还有匪帮”时，毛泽东微笑着，并且探着身子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当尼克松说“不过你气色很好”时，毛泽东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这是一种含义复杂的双关语。

另外，会见中，毛泽东还善于运用与对方有共性的语言。如：“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等等。

“ 我是为来访者
准备的一件陈列品。 ”

现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1974年9月来到中国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1975年10月21日，他陪同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五个星期后，福特总统来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他又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这两次会见，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后来他都写进了他的自传。

当时，毛泽东已八十二岁高龄，他决定1975年10月21日晚6时半在书房接见基辛格和布什。在布什看来，走到近处看看毛泽东的身体比远远看去要强一些。毛泽东个子很高，脸上透着红光，看上去很强壮，握起手来很有力。

基辛格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怎样。毛泽东指着自已的头说：“这部分工作很正常，我能吃能睡。”他又拍拍大腿说：“这部分不太好使，走路时有些站不住。肺也有点毛病。”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又笑着补充说：“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

毛泽东泰然自若他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

布什在他的自传中说，听到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真令人震惊。

对于毛泽东的话，基辛格笑着答道：“不要急于接受。”

毛泽东听了基辛格的话，由于不能连贯说话，便在一张纸上费力地写了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接受 Doctor 的命令。”这是一个双关语，既指医生，又指基辛格，因为中国人习惯称他为基辛格博士。

亨利·基辛格点了点头，然后换了话题。毛泽东说：“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举起一个拳头，又竖起另一只手的小拇指，指着拳头说：“你们是这个”，又竖起小拇指说：“我们是这个。”他还说：“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其实中国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已掌握了原子弹，这里毛泽东是说美国的军事力量比中国更强大。

基辛格说：“中国方面说军事力量不能决定一切，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对手。”

毛泽东在一张纸上用英文写着：“对。”

随着会见的继续和谈话的深入，毛泽东似乎越来越有劲，越来越机警了。谈话使他兴奋起来，他的头转来转去，不停地打着手势。他说：“上帝保佑你们，不保佑我们，因为我们是好战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他不喜欢我，他喜欢你们三个人。”他指点着基辛格、洛德和布什。

会见快结束时，毛泽东同温斯顿·洛德和布什谈了起来，他指着布什说：“这位联络处主任上任之后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看看？”

布什回答说：“能见到您不胜荣幸，我只是怕您太忙。”

毛泽东说：“不，我一点都不忙，国内的事我不管，我只是看看国际新闻。你早就应该来。”

毛泽东这次会见基辛格、温斯顿·洛德和布什，以手势助说话是显著特点。他指着头，拍拍大腿，举起拳头，竖起小拇指。指着拳头，转来转去，打着手势……这些手势都有力地帮助他表达了要讲的意思，使人容易理解。

特别是在他行动不便，说话费劲的情况下尤其不可缺少。

此外，毛泽东的语言还有言简意赅、言约意丰的特点，如“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包含极其丰富的内涵，年纪大了，不易行动；中国的最高领导，独一无二；来访者都要求能见到他，而且引以为荣；能否见到他这是关系到对来访者和来訪者的国家持什么态度，给予什么级别的礼遇的大问题等等。此外如“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你们是这个”，“我们是这个”等等，都是含义极丰富的语言。

“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

戴维·艾森豪威尔和朱莉·尼克松是夫妻，他们分别是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的儿、女。1976年1月1日访华，出乎他们的意料，毛泽东要见他们。说实在的，不少外国元首来中国都难得见上一面毛泽东，而他们虽是卸任总统的儿女，但毕竟是一般美国人，能得到这份荣耀，确是喜出望外。

当时的毛泽东已是耄耋之年，连抚平乱发、端碗喝药的力气都没有了。一次他让护士走了，自己拿起盛药的杯子，抓住——剧烈晃动——稳住——晃动——再稳住，脸也白了，嘴紧抿着，眼睛眯虚起来，挣扎了半天，才把那一小杯中药喝下，结果胸前还湿了一片。

当戴维和朱莉进入他的客厅，他的头向后仰着靠在沙发上，头发有些乱，嘴张着，仿佛艰难地吞食着空气。这情景不由得使戴维先是一股心酸，继而凝视不语。显然是戴维的凝视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开了口：“你在看什么？”“我在看您的脸。”戴维说，“您的上半部很……很出色。”

听完译员的翻译，他说：

“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

这是何等内涵丰富的语言！

从这副脸孔上，可以发现他作为一个时代巨人的全部聪明才智。前额宽阔而平坦，夸张他说，不仅能跑马，还能跑汽车呢。耳朵很大，紧贴在头上，耳垂薄薄的，这种形状本身对那些想朝里灌谎话的人就是莫大威胁。眼睛里有火。确切他说，是有过火。今天火将尽了，但痕迹犹存。不用说，当这火年轻时，很少有人看见了能不震颤的。

正是这副脸孔，阅尽人间春色。曾使多少对手望而生畏，使多少人为之倾倒。乱云飞渡时，它坚毅沉稳；春光明媚时，它神采奕奕，……总之它是“大中华”亿万脸孔的杰出代表。

他对戴维说：“中国人的脸孔，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鼻子扁。外国人就不成了，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

正是这副脸孔，飞动着活跃的思维，迸发出人类灵感的火花。出入意料，令人震惊。

当戴维沉吟说：“现在，在美国，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

毛泽东却出人意外他说：“好，”“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马上。”

他又转向朱莉：“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

当戴维说“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时，毛泽东却说：“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他的语调突然咄咄逼人。“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接着意犹未尽地补充道：“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戴维说：“按我的理解，您说的敌人是右派，是这样吗？”他却向戴维一瞥，神秘地笑笑说：“不，错了。恰恰相反，我喜欢右派。你岳父算右派吧？在上次美国大选期间，我投了你岳父的票。戴高乐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喜欢他们。将来我还要投他们的票。”

谁能想到，一个只能把头仰靠在沙发背上，张着嘴艰难地吞食着空气的垂垂老人，能有这样敏捷的思维，能有这样精辟的见解，能冷眼向洋作出这

样鞭辟人理的的见！恐怕只有这副大中华脸孔才能做到。

“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是毛泽东精确的自我概括，其中丰富的内涵不论从什么角度，从何种意义上，都会令人探索多少年，推敲多少代。

“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是一句含义错综的比喻，这是毛泽东外交语言的一种特色。

“当你们的支持也变得无济于事时，
这一天就将到来。”

1941年的毛泽东曾对美国怀有好感并寄予希望。

帕特里克·赫尔利于1941年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后来他们制定了国共联合的计划。对此毛泽东很满意，他们都在上面签了字。当时毛泽东怀疑蒋介石是否会同意这一“五点方案”。可赫尔利说蒋介石会同意的，因为在他来延安之前蒋介石已经知道方案的要点。

但没过几天，赫尔利就改变了对“五点方案”的态度。整个第二年，他一直使美国的政策倾向于蒋介石。并且他还私自扣压了毛泽东要求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件。后来赫尔利当上了美国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他还先后把那些认为毛泽东将掌握中国未来的美国官员——赶了下去。所以，后来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文章，揭露了赫尔利与蒋介石串通以及他挑动国共内战的阴谋。

毛泽东前后几次想与美国合作，但由于蒋介石和他的妻子活动好了几位关键的共和党人，结果美国百分之百的支持国民党。这使毛泽东非常气愤。他曾怒斥美国：“如果你们这些美国人吃饱睡足了没事干，想指责人民，支持蒋介石的话，那是你们的事，我不想干涉。”他还说：“如果你们愿意，那就永远地支持他吧。但是请记住，中国是谁的中国？它肯定不是蒋介石的，它属于中国人民。当你们的支持也变得无济于事时，这一天就将到来。”

日本投降了，但和平并未到来。国共两党相互竞争接受日本的投降，因为谁从日本人手里接过了枪谁就几乎等于掌握了对未来的控制。

为了不使内战长期下去，1945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身入虎穴到了蒋介石的基地重庆，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到延安去接毛泽东的仍然是赫尔利。二十多年未见过面的毛泽东和蒋介石，用了四十五天的时间签订了一纸协定。但协定没有解决任何根本性的问题。两位对手为庆祝签字碰杯时，连参加宴会的其他人也觉得这种场面靠不住。

其实毛泽东对去重庆谈判并不抱什么幻想，他去重庆的目的是不愿意被人看成是破坏和平的人，也在于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他，对毛泽东来说，这比谈判的内容和结果都更加重要。它及时地向中国和世界暗示，蒋介石还有一个对手存在，而且这个对手已统治了一亿人口，并有一百万的军队听从他的指挥。

1946年早期，马歇尔再次来到延安，为缩小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裂痕作最后一次努力。毛泽东对此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蒋介石已丧失了他的灵魂”，“只是一具朽尸，没有人还会相信他”。所以，和一年前相比，毛泽东显得更超然，他象一位演员一样已演完了在谈判中的角色。

在他向马歇尔祝酒时，他还是礼节性他说：“让我们为中美两国，为国共两党持久的合作，干杯！”

马歇尔在即将离开延安机场时，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再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说：“一旦蒋邀请我，我随时都会去。”在毛泽东看来，不需要什么谈判，而且任何谈判都不会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

此后，美国一连换了四位总统，毛泽东也没有会见一位美国官员。一切调解都破产了。1946年秋季，毛泽东与蒋介石开始了最后一轮厮杀。这时毛

泽东的军队只有蒋介石的三分之一，枪支弹药也只有蒋介石的五分之一。

在蒋介石的强大攻势下，毛泽东放弃了延安，蒋介石得意地飞到延安，而毛泽东这时却改用了——李德胜，意思是“离开了以后可以得到胜利”。同时他带领他的军队唱歌：“保了人，丢了地，失地可以再获得，保了地，丢了人，人地皆失。”

国民党的将军胡宗南曾扬言不占领毛泽东的总部不结婚，毛泽东离开延安不久，胡宗南就带领着二十三万大军进驻延安，并在那里结了婚，而这时毛泽东只有不足二万军队。毛泽东不在意地盘的丢失，而是把大部分时间用来与胡宗南捉迷藏。他说：“胡宗南伸过来的是一只拳头，我们要让他把手张开，现在，可以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剁掉了。”

1917年，大城市掀起了反蒋浪潮，毛泽东很重视这个“第二战场”。

1918年毛泽东的力量强大了，战争已不在他的领地进行，而是在蒋介石的管辖区内展开，11月人民解放军的人数已超过了蒋介石的军队，战争的天平更加倾斜。

辽沈战役，毛泽东取得了东北，但毛泽东没有直接进攻北京，一是便于军队有休息时间，二是利于包围住蒋介石的五十万军队把它们一点一点地吃掉。与此同时，毛泽东向国民党的指挥官发出呼吁：“认真地三思吧”，“如你认为我说的对，那就照我说的做，如果想再战一场，我随时奉陪，但无论如何你将被消灭。”

蒋介石退到江南以后，在是否打过长江去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如同当年撤出延安斯大林不同意一样，这次过江他又反对，在共产党内也有些人象斯大林一样担心会引起美国的干涉。

毛泽东嘲笑了这种论调。他相信《伊索寓言》中所讲的“善有恶报”。他决心“宜将剩勇追穷寇”，一举攻下南京这个国民党政府的象征。直到这时，就连苏联的大使还随同蒋介石一起迁至广州。毛泽东邀请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莱顿·司徒雷登会谈，但美国政府对此却表现出三心二意。1945年美国认为毛泽东势力太弱，不愿和他打交道，四年后的今天，又觉得毛泽东力量太强，和他交往不会有什么好处。

所以毛泽东写了《别了，司徒雷登》，最明确不过地表明了对美国的态度。

1948年4月，毛泽东攻占了延安。1948年中期，毛泽东已拥有二百五十万军队，三百多万党员。年底，美国的大卫·巴里特上校和约翰·墨尔比去北京共进午餐时，人民解放军隆隆的炮声震掉了桌子上的筷子，不久国民党的将军傅作义就交出北京城和二十万军队。

当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的时候，这一切都应验了：

1921年在上海，毛泽东和肖子升一起行船时，他曾对肖预言说共产党会在三十到五十年内取得政权。1947年初，即将撤离延安时，美联社驻延安记者罗德里克来见毛泽东：“毛主席，在目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前途看来的确黑暗，将来会怎样？”毛泽东微笑着，沉思缓慢他说：“两年后，我邀请你到北京来探我。”1948年底，他宣布“再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1949年夏天毛泽东预计要经过“一年半的战斗”。当毛泽东一再遭到美国的拒绝时，他曾发誓：“如果你们愿意，那就永远地支持他吧。但请记住，中国是谁的

中国？它肯定不是蒋介石的，它属于中国人民。当你们的支持也变得无济于事时，这一天就将到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话是何等的准确而深长！

“‘友谊’，还是侵略？”

运用反语和揭穿谎言进行讽刺，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这集中表现在《评战犯求和》、《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等篇目中。

明明是侵略，却偏偏说成是“友谊”，明明是战争，却硬说是“和平”，明明是掠夺，却美化为“慈善”。这显然是反语讽刺。在《评战犯求和》一文中，通过批露蒋介石的声明，对蒋介石的谎言予以讽刺。文中写道：“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蒋介石由气势汹汹地进攻、围剿，结果连连失败，转而变为防御，又不得已转入退却、收缩，而现在连这种局面也维持不下去了，才求和，但蒋介石却打肿了脸充胖子，硬是吹嘘自己军事、政治、经济如何如何强，力量如何如何大，又如何超过共产党多少倍。但问题却出在既然这么强大，“为什么求和呢？”结果只好以“为民请命”为遮羞布来遮挡一番，这一番拙劣的把戏，实在令人可笑。

蒋介石在求和声明中还说，只要“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毛泽东则揭露说：“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中国劳动人民则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而要这样，当然就要维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目前这样饥寒交迫的‘自由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惟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就罪该万死，‘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把剥削阶级的“自由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建筑在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的痛苦之上，反过来人民还要称“可爱的蒋总统”，还要“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如果把蒋介石自我吹嘘视为可笑的话，那末，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伎俩简直可以说是可恶了。

毛泽东称艾奇逊是“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并在揭露他的白皮书时说：“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这些地方都是以反语达到讽刺的目的。此外，如说艾奇逊“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晦他说出了全篇的真理”，“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等都属这种情况。

毛泽东称司徒雷登是“滚蛋大使”，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时，毛泽东说：“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

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子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通过对司徒雷登的形象的描述和对他心理的剖析，嘲讽了司徒雷登那种穷途末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可怜相，实则是对美国侵华政策的鞭笞和暴露。

在《“友谊”，还是侵略？》中，毛泽东针对艾奇逊的一派谎言给予了揭露讽刺。

文中说：“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里‘友谊’、‘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用的是艾奇逊的原话，反映的却是相反的意思。接着毛泽东又用嘲弄的口吻，摆出事实予以揭露。他说：“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这里用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封锁的事实，揭穿了艾奇逊“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的表白不过是谎言罢了。艾奇逊说的是“门户开放”，搞的是“门户封锁”，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领土，还算叨了艾奇逊第二个神圣原则的光，‘依然维持’住了它们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运，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象样子了。”“叨光”即沾光，可沾光的只“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其余地方都沾不上光，而沾光的恰是美国及其扶持的蒋介石占领区，其余地方则是共产党的解放区，所以，其行政和领土的“完整”则不保证“依然维持”。这就是“美国老爷的逻辑”，而且“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毛泽东还通过美国侵略者在中国的种种的罪行来嘲讽艾奇逊的谎言。他说：“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等在北平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美国却将皮尔逊送回美国无罪释放。毛泽东用这一铁的事实来揭露美国艾奇逊们所标榜的中美“友谊”。

艾奇逊还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是“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对此，毛泽东批驳说：“看呵，多么美丽的名称——‘进取性’，中国人学了这种‘进取性’，不是进取到英国或美国去，只是在中国境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即是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没有一次成功，都给‘进取性’的发明人即帝国主义者打败了。于是掉转头去学别的东西，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去学别的东西，指学苏联，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用“外来者带来了”的“进取性”却得不到进取，而是屡屡失败，而这种失败又恰恰是失败在“进取性”的发明人即帝国主义者手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总之，毛泽东以卓有成效的语言讽刺艺术，入木三分地剖析和嘲讽了美国艾奇逊们的无耻伎俩，使其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把它们标榜的“友谊”的遮羞布扯得精光。

“ 没有我，
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

1961年9月。英军元帅蒙哥马利前来访华，以李达上将为首组成一个陪同小组，熊向晖是成员之一，浦寿昌担任毛泽东的翻译。

毛泽东决定9月23日会见蒙哥马利元帅。周恩来通知熊向晖、浦寿昌于9月22日立即乘专机去武昌，先向毛泽东汇报主要情况和主要问题。当天下午，他们飞抵武昌，并马上赶到东湖毛泽东的住处。

熊向晖在汇报中，提到蒙哥马利对毛泽东很钦佩，对中国很友好，但也对中国进行战略观察。然后又讲了周恩来讲过的情况和迹象。

毛泽东听后说，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象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

接着，毛泽东对熊向晖说，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

毛泽东接着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查”，英国元帅搞了，一搞，发现了问题。中国一些群众也没有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9月23日，蒙哥马利元帅到达武汉，晚上6时半，毛泽东在东湖会见他，并共进晚餐。

会见中，蒙哥马利提出许多问题。如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现在考虑的又是哪些新问题，对解放以后的中国怎么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是否还适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何区别，对他提出的三原则有何意见，等等。两人彼此问过年龄（当时毛泽东六十八岁，

蒙哥马利七十四岁)，但蒙哥马利并未问及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

这次会见，从6时半到9时半，共谈了三个小时。

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的是24日下午2时半毛泽东又同蒙哥马利会见了一次。寒暄几句后毛泽东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一百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蒙哥马利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

毛泽东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请，自己去。蒙哥马利借这个机会提出：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象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蒙哥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你。你现在不能离开这条船放下不管。

毛泽东说：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随时准备死亡。接着他讲了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压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

1962年，蒙哥马利把他1961年访华时的见闻和观感写成一本书，起名《三大洲》，其中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同他谈话的内容，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涉及的问题之一是年龄。我说，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几年中，他排除了混乱，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他必须健康地活下去，保持精力，以便使这个国家坚定地沿着他所安排的道路前进。他的答复是有趣的。他说，有一个古老的中国传说，把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作为人的一生中的困难年代，谁要是连续闯过这两关，就能活到一百岁。他本人不想活到七十三岁以上，那就是还有四年。以后他想去陪伴卡尔·马克思，这是他的英雄——几乎是他的上帝。我强烈地抗议说，中国人民需要他，他必须至少活到八十四岁这一关。他说，不，他有很多事要同马克思讨论，而在这里，再有四年就足够了！我说，如果我知道马克思在什么地方，我要就这一问题同他谈几句，这把他逗得大笑！我接着就问到他的继承人。我的经验是，国家领袖们非常讨厌提出他们的继承人，我举出几个例子——印度的尼赫鲁，葡萄牙的萨拉查，联邦德国的阿登纳，英国的麦克米伦，法国的戴高乐。谁将继承他呢？他说在中国，继承是清楚的，并且已经确定了——那将是刘少奇。我问，刘以后是谁呢？他说他不知道，也不过问；他本人将同卡尔·马克思在一起，他们在中国能够为自己解决这件事。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会见中，长时间的谈话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潜台词的使用。即在说话时，要说而又不直接说或不全部说出的话，留有言外之意、未尽之言。这些话虽然没有直接说出，但它的意义已体现得十分明显，听者只要稍加注意，就完全可以理解。特别是在特定场合，一些话不便于直接说出，或没有必要全部说出，就可以用潜台词把要说的话的某一部分潜伏起来。

如“何需战略观察！这里没有铁幕，没有……一捅就破”，“被敌人开

枪打死；坐飞机……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含有言外之意，未尽之言。

“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也是一句潜台词。即是说没有我——失去权力不再执政或者如前所说只当名誉主席，或者会见马克思。中国照样前进——中国的政权是巩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会改变，地球照样转——人类社会终究要向共产主义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也不会逆转，如同地球按照它的规律转动一样……

“我给你们当名誉校长。”

尼克松曾经这样描写毛泽东：他经常从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独自做长时间的内心自省。有时，他会花几个钟头去征询政策问题专家的意见，然后又信步踱进花园，就一问题向卫兵求教。

毛泽东经常同警卫人员交谈。为了便于了解全国形势，他要求警卫中队战士不但要来自不同省、市、自治区，而且要一个专区一名，不要重复。这些士兵从五湖四海聚集到毛泽东身边，既为毛泽东服务，也受到毛泽东的关心照顾和教诲。他们分工不同，大目标一致，朝夕相处，逐渐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和友谊。

一次，毛泽东沉思着说：“仗打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我们的士兵要学会建设社会主义才行。”他望着警卫战士，慢慢他说：“参观了工厂；你们有什么感想啊？能听懂生产道理吗？”

有一个战士说：“有的懂有的不懂。”

毛泽东说：“搞建设没有文化没有科学知识不行。你们搞警卫工作将来也要参加建设。我现在给你们加一个学习任务。我想给你们办个学校，我给你们当名誉校长。”

不久，毛泽东把叶子龙、李银桥叫去，提议办起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毛泽东以他的名义请来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以及教时事的老师。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一中队战士以及毛泽东身边一组的卫士都参加了。毛泽东叫李银桥从他的工资和稿费中拿出钱，为大家买了书包、课本、作业本、字典和笔墨一应学习用具。

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要学一点。你们正年轻，不要把年轻的时间荒废掉。

毛泽东还常用张宝金的学习事迹来教育和鼓励警卫战士积极学习。他说：“你们要有志气，要学习张宝金。张宝金以前给人家放牛当雇工，没有读过书。他后来跟着我，他就有眼光，肯学习。他到人民大学去读书，还考第一名。你们要以他为榜样。”

一中队警卫战士，在学习文化上，几乎个个都受过毛泽东的直接关心和教诲。他亲自给战士讲课，就是休息散步的机会，他也有意识地跟战士谈天说地，开拓他们的知识面，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毛泽东经常是不放过任何一种机会。

一次，毛泽东在广州二沙头观潮，内卫张木奇在身边，毛泽东从陶醉中醒来发现了张木奇，脸上浮起一层浅笑，说：“张木奇，你说大海为什么会涨潮退潮？”

张木奇说：“这是月亮吸引作用形成的。”

毛泽东点头：“嗯，又进步了。你那个‘吸引’再加上个‘力’就好了，月球引力，这是力学知识。再问你地理知识。什么是暖流？什么是寒流？”

张木奇说：“暖流我不清楚，寒流么是西伯利亚来的喽。一到冬春它就常来。”

毛泽东开心大笑说：“你讲的那是寒潮，是说的冷空气大规模南侵。我问的是洋流，懂吗？”

张木奇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就耐心地给他作了讲解。说：“世界大洋中有两条重要的暖流。一条是墨西哥湾暖流，一条是台湾暖流。”警卫战士

觉得，和毛泽东闲聊，不但可以加深感情，而且往往比读书更能学到知识。

天长日久，警卫战士都了解了毛泽东的习惯。他夜里办公时常出来散步。每次出来一定要问问气温，所以，毛泽东一出门，值班的警卫战士就开灯看温度计，看后报告温度，然后借机和毛泽东搭话聊天。1958年除四害运动刚开始，一天夜里张木奇值班，毛泽东走出门，象每次那样先粗重有声地呼吸一阵儿，问：“今天多少度？”张木奇报告了温度，便凑到他身边关照：“主席，今夜天凉，您散步要走动快些。”

毛泽东“晤”一声，一边散步一边活动手臂，还扭过头来说：“天凉，你们值班也要多注意，不要感冒。”

毛泽东踱了一圈，忽然问：“现在除四害，你知道四害是哪四害？”当张木奇说出麻雀时，毛泽东便脱口说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接着便讲起了认识论。讲起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讲到调查研究，分析综合。

张木奇又说到老鼠，毛泽东便问老鼠有哪些害处？张木奇说：“传染疾病，毁坏衣物。”

“老鼠为什么毁坏衣物？”毛泽东问。

“想害人么。”张木奇答。

毛泽东笑了，说：“老鼠还没进化成反动派那样想着害人。老鼠是为了活命。它的牙很特殊，不停地长，就要不停地磨短。它想活得好，人民就活不好，所以要消灭它。”

毛泽东在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相处时，他的语言是那么平易、亲切，没有官腔，没有套语，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生活语言的一大特色。

“尝尝我们湖南的苦瓜吧！”

毛泽东对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一直很关心。在溥仪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毛泽东就动员他的七叔载涛和三妹金蕊秀去看望他，并为他七叔、三妹购置服装，安排好沿途的食宿参观事宜。

1961年溥仪释放后，毛泽东在丰泽园特意用家乡菜设家宴招待他。坐陪的有毛泽东的家乡故旧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

毛泽东拎着溥仪的手步入饭厅，并让他坐在自己身边。毛泽东对溥仪开玩笑他说：“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哟，我作过你下面的老百姓呢！”又夹过一口苦瓜放在溥仪盘内：“尝尝我们湖南的苦瓜吧！”毛泽东看看溥仪吃进这口菜，问道：“味道怎么样？还不错吧！”溥仪连声说：“好吃！好吃！”

毛泽东还问到溥仪的婚姻问题，并说：“还可以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

毛泽东和“五老”的照片就是这次家宴后照的。溥仪生前一直珍藏着。

作为溥仪，由皇帝而成为战犯，确实象吞下一颗苦果（苦瓜）；又由战犯变成公民，也确实尝出了其中的“味道”。吃下了，还觉得“好吃”，这又何尝不是溥仪又获新生的表现呢。“尝尝我们湖南的苦瓜吧！”言约而意丰，诙谐而风趣，它既指由毛泽东这个湖南人制订的对战犯的改造政策及其有效性、可行性，又反映了毛泽东对溥仪的态度和看到他重获新生的高兴、得意，暗示了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和执行政策的信心和决心。

毛泽东对溥仪是以诚相待、实心实意。对他的日常生活不断地给予过问和关怀。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对宣统要好好地团结，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面的老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接着，他又向在场的章士钊先生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这对思想已经改变了的溥仪来说，岂不又是一种甜瓜吗？所以溥仪知道毛泽东要赠稿费的事后，对夫人李淑贤说：“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好吗？靠劳动吃饭，这就是幸福！”又说：“主席的钱我们不能收，盛情我们领了。”

“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

邵力和傅作义应邀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进屋后，邵力子发现书桌上的文房四宝还没收拾，写好的纸幅上的墨迹也还未干透。于是问道：“主席正在写字？”毛泽东神秘地笑笑然后说：“是啊。我刚才做了个谜，想请你这位清朝举人给解一下。”说着站起来，拿起宣纸递给他。只见上边写着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治淮”。毛泽东说：“邵先生，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正在邵力子端详琢磨的时候，毛泽东朗声大笑起来：“邵先生，我这续字谜只有两个字。”邵力子左思右想，恍然大悟地笑了起来，说道：“方案！”毛泽东高兴他说：“对啊，我今天请二位来，就是为治理淮河的方案，听听你们的意见。”

知人才能善任。毛泽东为什么单找邵力和傅作义呢？因为毛泽东了解邵力子在解放前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的时候，很重视黄河水利，先后修建了泾惠和洛惠两大渠，还有龙门闸、风陵渡的浩大工程。所以毛泽东风趣地对邵力子说：“先生当年做过西京王。记得我们红军一到陕北就听到老百姓美传先生当年大禹治水。……陕西的老百姓至今仍在流传先生当年治水的故事。”又说：“先生那时的作为，今天看来也确实难能可贵啊！今天请先生来，一是想听听先生的意见，二是如先生能离京去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这就是我那续字谜底。”

对傅作义，毛泽东知道他博学水利工程，所以建国后就委任他做第一任水利部长。这次邀他来正是研究兴修水利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对傅作义说：“将军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虽将军带兵打仗几十年，但将军博学水利工程，对我国的水利情况是了解的。请将军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方案。要想改变我国的贫困面貌，看来首先要大兴水利建设。能把几千年来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啊！”

“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用语巧妙，一举两得，既是一种乐趣，又是一种征询。寓政事于娱乐之中。

年近七旬的邵力子老人，真的带着秘书离京一个月沿淮河两岸做了实地考察，返京后写了一份报告。

治淮方案就是这样定下来的，向水患宣战也是从治淮开始的。

“绝不会有半点亏待你的。”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正在天坛公园游园。刘伯承、陈毅、粟裕等也跟在毛泽东的左右。当游到祈年殿时，毛泽东特地从人群中召唤陈明仁出来：“子良将军，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

陈明仁，字子良，是原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虎将。1949年8月4日与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将军在湖南长沙通电起义。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亲自草拟电文，邀请他们来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9月19日是毛泽东特意邀请程潜和陈明仁同游天坛公园。

听到毛泽东请他单独合影，陈明仁一时感到手足无措，踌躇不前。陈毅见势伸手把陈明仁拉过来推到毛泽东跟前，陈明仁恭恭敬敬地站在毛泽东右手边，和毛泽东照了个双人半身照。照完了相后毛泽东说：“子良将军呀，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还说杜聿明、王耀武被我们五马分尸干掉了，我想请你这次开会之后，去山东济南看看他们，把情况向外介绍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友故旧，促进他们及早觉醒，及早归来。”

陈明仁爽快地答道：“是，我一定照办。”

“你还可以把这张照片分送给你们黄埔同学，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毛泽东还告诉他：“后天二十一号，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唯独还缺少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都全了。”

9月21日，陈明仁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他说：“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我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

会议期间，毛泽东亲切地问他：“你今后打算干什么？是从政？还是从军？从政，就打算给你拨一笔特别费，由你全权开支。”陈明仁回答：“报告主席，我是个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量。不过，我那个部队还是国民党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吧！”

毛泽东说：“那好，你还是去带兵吧。我们拟把你的一兵团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你有什么条件吗？”

当陈明仁说一点条件也没有时，毛泽东风趣他说：“哎呀，人家有条件的，我倒好办，你这个没有条件的，我倒不好办呀！这样吧，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一视同仁，绝不会有半点亏待你的。”

这话把共产党、中央政府和毛泽东本人对陈明仁这位原国民党的起义将领的态度，最明确不过地表达出来了。干什么任你选择，愿意从军保持原职务，与解放军一视同仁对待，……

毛泽东果不食言，陈明仁多次要求打仗立功，后来果然让陈明仁的第二十一兵团参加了广西剿匪战斗，并且取得了巨大胜利。

开国大典又让他登上天安门观礼台。1955年，毛泽东又提议授予陈明仁上将军衔，行政五级。他和他的一家都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照顾。

“共产党 并不是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

章含之，是章士钊（字行严）的女儿。章士钊，就是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提到的那个教育总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参与者。但他与毛泽东的个人关系却十分密切。

因为章士钊是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早年在湖南长沙时的至交，经杨怀中介绍，章士钊在1919年就认识了毛泽东。

毛泽东七十岁寿辰时，除自己的亲属外，还邀请了章士钊、程潜、叶恭绰和王季范。因为毛泽东事前曾关照每位来客可带一名子女，所以，程潜带去了大女儿，王季范带去了孙女王海容，章士钊就带去了女儿章含之。当章士钊对毛泽东说自己的女儿章含之在外国语学院任英语教师时，毛泽东高兴地问了章含之的年龄，然后打趣他说：“年纪不大，便是个老师哩！”接着问：“你来教我读英文，行不行？”章含之有点紧张，便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教主席。”毛泽东呵呵笑着说：“怕什么嘛，我的水平很低。”

章含之原以为是毛泽东一时高兴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毛泽东真的叫秘书林克打电话，要章含之星期日下午开始去他那里。这样章含之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于是常常谈到章士钊的一些事情。

一次，毛泽东问章含之：“你对你那位老人家怎么看啊？”章含之不假思索他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对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毛泽东问：“你什么时候加入党的？”章含之回答：“1957年1月。”毛泽东风趣他说：“啊呀！我党的老党员喽！”章含之忙说：“新党员还不够条件呢！”毛泽东严肃他说：“你既是个党员，就要懂得怎样对待行严（章士钊字行严）。你加入了共产党，我高兴，挖了你父亲的墙脚，不过这是指思想，他的后代也跟共产党走了。其实行老也高兴，他知道你跟共产党走有出息。但是你要了解行老才能团结他。你是他们家里的唯一的共产党员，还是党代表哩！你如果不正确对待行老，他会对共产党有意见，认为是我们把他的女儿拉走了。”

接着毛泽东问章含之：“你说行老是剥削阶级，你有什么根据？”章含之列举了鲁迅文章中对章士钊的指责。又说他当过教育总长，还代表国民党同共产党谈判……。毛泽东听后对章含之说：“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革命的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毛泽东见章含之一时答不上来，便严肃他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是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

毛泽东向章含之讲了“还债十年”的趣事。

“我还欠了你父亲一笔债没有还呢。”原来，1920年为筹备党的成立，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和组织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毛泽东找章士钊帮忙，章士钊随即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结果共筹集了两万银元。毛泽东笑着对章含之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来造反闹革命了！”毛泽东对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二千元，十年还完二万元。”章含之回家一说，章士钊哈

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几天后，毛泽东真的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二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二千元。章士钊十分不安，让女儿转告毛泽东，当时的银元是募捐来的，现在不能收此厚赠。毛泽东听后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撒钱去帮助那许多人。”

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但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问章言之给她父亲的钱送去没有。章言之告诉毛泽东去年已是最后一笔。毛泽东笑了，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并对章言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后开始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钱一直要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并不是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和他所做的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的话充分反映了他对人对事，都是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来对待，分清是非，弄清功过。同时也说明了共产党虽然主张划清界限、大义灭亲，但决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六亲不认。这正是毛泽东政策观念和原则性的典型见证，也是毛泽东对青年一代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体现。

“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这是毛泽东在《致徐特立》一信中所说的话。徐特立是1913年至1919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毛泽东的老师。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给他写这封信时，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长。毛泽东在信中对徐特立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充满了对老师的敬重和赞美之情，语言是很感人的。

毛泽东根据徐特立几十年的表现，以“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肯定了师生关系；又以“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表明了对徐特立的评价，说明徐特立仍然值得自己学习和尊敬，徐特立仍然不失师长的资格与尊严；更以“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这表明了毛泽东对自己二十年前的老师的无比信任，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徐特立的过去和现在的现实表现，是何等的满意和赞赏。从时间上来说，证明徐特立几十年如一日，对革命忠心耿耿，而毛泽东对自己的老师也是始终如一。为了说明自己对老师的看法是正确的，毛泽东多方面、多角度地列举了徐特立的一贯表现。

毛泽东以“你……而在有些人”的句式，运用对比的手法，既赞扬了徐特立，又批评了有些人，以“有些人”的表现，更加反衬出徐特立的高风亮节和可贵品质。一口气用了七句组成的排比，从七个不同方面对徐特立作了肯定的评价。首先谈到徐特立的入党。徐特立是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的。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而徐特立“却”在这时候入了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情况的叙述，感情的表达，细腻委婉，准确恰当，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三个“还要”说明徐特立在革命中的态度和行动都是积极的，这种积极不是和同龄人比，而是和青年壮年比，不是和党外人士比，而是和党员比。“不怕困难”反映了革命意志坚强，“虚心学习新的东西”，反映了他勇于进取，不因循守旧，而这些正是革命中最可宝贵的品质。三个“什么”，实则讽刺批评了那些本来年纪不大，却偏以老作借口，小病大养，无病呻吟，惧怕困难，意志薄弱的人，同时就更有力量说明了年过半百的徐特立确是值得学习的榜样。

“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一个是“很多”而“以为不足”，一个是“半桶”却“淌得很”。一经对比，徐特立谦虚谨慎、好学上进的精神品质跃然纸上。

“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臢臢的东西。”这说明徐特立心口一致、言行一致、襟怀坦白、心底无私、光明磊落。自己想的、说的、做的，没有任何不可告人、见不得人的东西。用语朴实恰当、准确自然。

“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不是脱离群众，更不是以脱离群众为快乐，而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任何时候”包含着极丰富的意思：同吃、同住、同行军；同甘共苦；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没有干部架子，不搞任何特殊。语言朴素、含蓄，言约而意丰。

“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一方面“时时”同群众在一块，一方面又“处处”服从纪律，这里以“处处”回应前面的“任何时候”（时时），既加强了表达上的前后联系，又从时间（纵向）和空间（横向）多方位地反映出徐特立的全人。

“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同是三个“第一”，却是计锋相对、南辕北辙，两种思想，两种境界、孰优孰劣，一目了然。真是言简意赅、力透纸背。

“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总是”从正面写徐特立，“从来也不”又从反面写徐特立，然后又以“有些人”的行为反衬徐特立，这就立体地反映了徐特立所作所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佩服”，即钦佩、叹服的意思，说明对徐特立一贯表现的态度、感情、评价，也是回应开头所说的“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继续地学习你”，既说明现在以你为先生，向你学习，还意味着将来还以你为先生，向你学习。“所有这些方面”，又是对上述所说的一切徐特立的表现的总括。这一句，既是对上文的小结，有承上的作用，又是为下文作铺垫，有启下的作用。

“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既点明了写信的目的，又表达了自己对老师的深厚情怀。

深厚的感情，准确、恰当、朴实、含蓄的语言，正是这封信的突出特点。

“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为抗日救国之大业，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给蔡元培写了封信，希望他能以自己的声望痛斥蒋介石，令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全信情真意切、语调铿锵、用语慷慨、笔锋刚劲，颇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之气势和雄风，振聋发聩、感人肺腑之力量。

书信以怀旧起笔。回想起在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时，聆听蔡元培先生的讲演所受之教益，以“不期忽忽二十年矣”结束回忆。笔锋一转，谈到今日、眼下，正值“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不管年龄上你是“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也不论经济上的“贫富”、职业上的“工农商学”、思想上的“信仰尊尚”，都面临着“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的危险之中，“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中华民族正处在“旷古旷世无与伦比”的“亡国灭种”之境。

“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共产党有救国救民之良策，那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然而“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这明明是“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

“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其实，统一战线也决非自共产党始，孙中山先生不是早就提出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政策吗？而且从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期间，行之有效。相反，自从毁弃了孙中山先生这一政策，“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1936年8月25日，共产党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申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

“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这一部分，以“先生将何以处此耶”作为反复，讲明时局，阐明利害，指明出路，以敦促蔡元培先生和共产党一道呼吁国民党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抗日救国。此处运用反复手法，使语意表达层层递进，步步加深，给人一种不得不择善而从之的推动力。

毛泽东之所以要致信蔡元培呼吁国民党抗日救国，是因为蔡元培早年是光复会发起人之一，曾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五四运动期间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还因为从他发表的《新文字意见书》中的言论看，是“簇新议论”，“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的议论。对于这种“簇新议论”，“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还因为他“同情抗日救国事业”经朋友和同志称述，“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

这里又以“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作了反复，把蔡元培从言论到行动的抗日爱国思想，从“我一人”到“共产党”到“全民族之诚实儿女”到“无数量人”对蔡元培的崇敬，表述得清晰深刻，令人感叹。

书信最后敦请蔡元培先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紧接着以一连串的述宾句，

表明了对蔡元培的具体要求。“痛责南京当局”：“停止内战”，“放弃……错误政策”，“撤废……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代表大会”，“召集……国会”，“建立……国防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当然，要求不少，难度也不小，但“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的地位和身份，虽说不能左右国民党，但肯定会起较大的推动作用，何况，这些也正是蔡元培一贯夙愿，又是“照耀万世，留芳千代”的大业，而且若能成功，必将产生“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的巨大反响。这些话，既表达了对蔡元培的赞誉，也说明了全民族对他寄予的厚望。这就会有力地激起蔡元培义不容辞、义无反顾的强烈民族责任感。

总之，成功地运用反复手法，是这封信在语言表达上的突出特点。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章士钊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960年迁入宽敞明亮的新居后，生活优裕，心情舒畅，便埋头研究柳宗元的文章，并开始撰写一本《柳文指要》。

毛泽东得知后，提出先睹为快的要求，所以1965年章士钊便把《柳文指要》上下两集近百万字的初稿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还亲自作了修改，并提出了自己的分析评价。

正当《柳文指要》要出版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结果刚刚送到中华书局的书稿便不得不搁浅了。

1970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章士钊根据“文革”中两次给毛泽东写信都有结果的经验，又给毛泽东写信重提《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毛泽东批转康生研究处理。

1971年，这位九十岁的老人一生中篇幅最大，最完整的巨著。终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版了。欣喜之下，章士钊自费购书百册，分赠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友好。最后还经周恩来建议赠给随尼克松访华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弗里曼先生一本。

在整个出版过程中，毛泽东曾先后给章士钊和通过康生转交的信件，谈了自己对《柳文指要》的意见和评价。

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晒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

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在收到章士钊《柳文指要》初稿后写的一封信。毛泽东把《柳文指要》上下两部通读一遍，并亲自修改了若干处，还谈了自己的看法：“义正词严，敬服之至。”7月中旬，毛泽东又给章士钊写了第二封信。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信中“指要”、“柳文”，均指《柳文指要》。“友人”，指康生。康生当时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曾向毛泽东借阅《柳

文指要》，所以 1965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信中，专门谈了对《柳文指要》的看法。主要看法如下：

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

从章士钊 1960 年开始埋头研究柳宗元的文章，撰写《柳文指要》，到 1971 年正式出版，都与毛泽东的过问、参与、鼓励、支持分不开。毛泽东的态度和评价是至关重要的。这主要反映在毛泽东给章士钊的信中。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艺术而形象地表示了毛泽东对章士钊写《柳文指要》感情上的赞赏和支持。并从行动上，在未成稿前，提出先睹为快的要求。特别是正值“文化大革命”处在“斗、批、改”的阶段，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柳文指要》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当然，毛泽东不是无缘无故地支持，而是因为正如他自己对《柳文指要》的评价所指出的：“义正词严，敬服之至”，“颇有新义”。毛泽东本来酷爱中国古代散文，对柳宗元的文章尤其推崇，所以，对章士钊撰写《柳文指要》颇为赞赏，初读之后，又“敬服之至”，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历时十年一贯支持的原因。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引用《诗经·国风》上的诗，动情地表达了赞赏、支持的态度；“敬服之至”，肯切地表达了鼓励之意；“义正词严”、“颇有新义”，中肯地表明了毛泽东的评价。这些正反映了毛泽东书信的中心，也正体现了他语言上的特点。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章伯钧、左舜生、诸辅成、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飞赴延安访问。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非常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主席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炎培盛赞毛泽东的好记性。他回到重庆，每次讲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这个有趣的细节，并十分自得他说：想不到在一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第二天下午，他们一行六人，应邀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的正方形会客室，光线充足，四壁挂着几幅画。而当中有一幅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边几只杯子。画上有黄炎培的题诗：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一种怀旧之感油然而生。这幅画原来是1943年在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在请黄题词时，黄忽然想起谣传，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题写了这首七绝以讥喻之。万没想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了！

顿时，一股知遇之情的暖流流遍了周身。

7月4日下午，黄炎培到毛泽东家里作客，感慨万分，他坦率地向毛泽东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后高兴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访问延安后，他到处作报告，讲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还在很短的时间中，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该书初版2万册，几天内就一抢而光，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1949年2月，黄炎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

1920年时的毛泽东，只不过是欢迎杜威博士人群中的一个，而黄炎培不认识毛泽东，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而毛泽东能记住黄炎培，也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善于抓住这个时机，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使对方感到惊奇意外，然后又说到当时的时间、地点、对方谈话的内容等，这对黄炎培来说，有些东西甚至连自己也不一定记清楚了，可毛泽东却记得如此清楚，自然就产生一种受到尊重的快感，从而和毛泽东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这就给今后的交往打下了感情的基础，使双方有一种一见如故、推心置腹的好感。这正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是我九哥。”

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又是毛泽东 1914 年入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的老师。

毛泽东与王季范之间决不仅仅是一般的表兄弟和师生关系，因为王季范对毛泽东，不仅在经济上帮助，学业上认真教诲，而且对他的革命活动也是尽力支持。1915 年由于毛泽东发起驱赶校长张干的运动，校长大怒，要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十七名“闹事”学生，就是多亏王季范从中活动才解围的。王季范联络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先生出面，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同时对张干施加压力，才迫使张收回成命。这之后，毛泽东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多次被反动军警追捕，都是多亏王季范救援掩护才得以度过难关。

王季范不仅在几十年的清苦教育工作中，以各种形式同情和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多方赞助进步学生和进步教师的革命活动，而且让自己唯一的儿子王德恒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回湖南桃源搞地下工作，不幸被特务杀害。儿子牺牲了，又让孙儿、孙女参加革命工作。长沙和平解放后，王季范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对他领导的革命胜利表示祝贺，还提出“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的治国方针，供毛泽东参考。

所以，1951 年春节，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所，握着一位老人的手。向家人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这种亲切的称呼，深情的语气，质朴的语言，使在场的家人和工作人员都深感惊讶。

直到 1972 年 7 月，王季范先生在北京去世，毛泽东还在花圈的飘带上写道：“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你是张表老？你好！”

1945年8月，毛泽东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乘飞机身入虎穴去参加重庆谈判。

一下飞机，他就从众多的欢迎人群中看到一个人，并大步迈过去握住对方的手亲切他说道：“你是张表老？你好！”

这人就是银髯飘拂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先生。在这之前毛泽东与张澜素未谋面，毛泽东这一见如故的寒暄，使张澜先生感到很亲切，但不奇怪，为什么呢？原来他们虽然相互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但他们却“神交已久”，相互之间慕名敬重。

听到毛泽东热情的称呼，张澜便握紧毛泽东的手说：“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

毛泽东说：“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在百忙中决定到重庆的第四天去拜访张澜先生。听周恩来这么一说，张澜先生喜出望外，但又一想：“润之先生操心国事，极尽辛劳，应在他方便之时，我们去拜访他才是。”

周恩来说：“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了，主席的意思是要亲自来。”

张澜所处特园紧挨着戴笠公馆。为安全起见，决定在张澜的内室相见。张澜先生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顾得上一点信义！”

毛泽东坚定自若他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演假戏，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这场戏就有价值了。”和谈出现阴影，张澜竭力从中斡旋，并质问张群：“阎锡山为啥子不给蒋先生一点面子？重庆在谈，山西在打，这不贻笑于天下吗？”

张群吃了一惊，但故作镇静地解释道：“上党战役，纯粹是阎锡山的个人行动。”

张澜一看和谈无望，便推心置腹地对毛泽东说：“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的土！”又说：“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如果你们有不便，我可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开，好让全国人民监督。”

毛泽东深表感谢地点头赞许，并说：“谢谢张表老！”

10月11日上午，张澜又赶到机场送行话别，并高兴他说：“日后，中国实现民主了，我到延安去看望你哟！”

毛泽东连说：“欢迎，欢迎！我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你。”

一句出乎意料的寒暄，换来推心置腑的情谊；神交已久的慕名，成了肝胆相照的至交。

“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毛泽东不仅在农业上而且也想在工商业上探索社会主义改造的路子。1956年的一个晚上，他会见了八十位上海工商界的头目——民族资本家，想听听这些私营企业者板的意见，为了不使这些资本家紧张，毛泽东语调缓慢，态度随便而亲切。他说：“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会上这些民族资本家竞相要求转为国营。

会见后，毛泽东改造私营工商业的策略形成了。他召见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首先说：“那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

毛泽东认为这是莫斯科式的解决办法，于是摆摆手说：“决不能使用暴力，……每件事都应是自觉自愿的。”

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周恩来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首先让猫饿三天，然后，我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地全吞下去。”

毛泽东认为不妥。

那么，毛泽东的策略是什么呢？他说：“这很容易，你可以把辣椒擦在猫的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而感到兴奋不已。”

毛泽东关于怎样使猫吃辣椒的讲话，正确地反映了他既不赞成强迫，也不喜欢欺骗。他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力量，因为他认为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们的参与热情，而只有唤起人们的热情，才能既可以达到他的目标，又不会降低他的威信。

所以，“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确是对毛泽东思想意识和执行政策的生动形象的描述和写照。

“好的坏的都要让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土地改革工作还没完成，特别是南方各省的土地改革工作还没有进行。

土地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孙中山先生虽有“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他自己，都没有做过，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着手做这件事。无论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看，还是从人民的实际愿望看，土地改革都是一件利国利民利生的好事。对此，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热情都很高。再者，许多民主人士在政府任职，如黄炎培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张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陈叔通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他们一是对土地改革抱有很高的热情，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大事，二是他们也从不同方面听到一些反映，甚至还接到地主的告状信，所以他们不少人积极要求到各地去察看土地改革情况。为此，毛泽东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专门布置了安排民主人士下去参观土地改革的事。

听说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要下去视察土地改革，地方上有些同志有顾虑。但毛泽东不这样看，在他看来，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乐。我们有些什么缺点错误，也可以让他们提提，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没有什么值得怕人家看的。

毛泽东先后安排了黄炎培、司徒美堂（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吴景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光潜（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陈叔通等人到各地去视察土地改革。年龄最大的陈叔通已七十五岁。

为了能让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观察中看到真实情况，受到实际教育，取得有益效果，毛泽东曾通过讲话、书信三令五申地强调：好的坏的都要让看。

1951年1月10日，毛泽东特意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十二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一月四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1951年3月18日，为司徒美堂先生去广东省鹤山县（今高鹤县）农村视察，又给饶漱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发去指示说：

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吴景超回到北京后，写了一篇《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登在1951年3

月 28 日《光明日报》上。

毛泽东看到后，评价说“写得很好”。并指示“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

去广东农村视察的司徒美堂先生 4 月 14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讲到还要在广东农村参观一段时期。

4 月 27 日毛泽东复信司徒美堂，非常谦虚他说：“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六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

张澜时年八十岁高龄。去看土改，已力不从心，毛泽东就尽量把有关材料派人送给张澜先生阅。1951 年 1 月 22 日，毛泽东把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工作报告送给张澜先生，还手书一信，信中特别关照：“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件。送上请查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

当七十五岁的陈叔通写信，不仅要求去农村看土改，还提出亲自去搞土改时，毛泽东立即复信。信中关切他说：“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惟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请加考虑，春季去似乎好些，那时还有土改。又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并且看可以多走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

人们常用真、善、美形容人的心灵，其实它同样是语言的最高艺术境界。你看，“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该是多么真实！张澜年迈不能去农村视察，就派人送文件给他看，并且特意提醒：“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还要问及“先生身体好吗？”这种语言传达了多么善良的意愿！对七十五岁高龄的陈叔通，既同意他“看土改”，又劝他不要去“做土改”，原因是“看可以多走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还提醒他“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春季去似乎好些”，这又是多么美好动人、感人肺腑的语言啊！

“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
……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富于辩证，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特色中较为突出的一点。这在他的《矛盾论》中表现得最明显。“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是毛泽东审阅《不怕鬼的故事》的选编序言时，对何其芳讲的话，也是毛泽东对序言修改时加的一句话，这句话正反映了他对《不怕鬼的故事》编选内容的一种见解，也是他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具体反映。

1959年春季，中央书记处交给文学研究所一个任务，就是从中国过去的笔记中，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以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要何其芳为这本书起草序文，并要他写完后送交自己审阅。

1961年1月4日上午10点40分，毛泽东办公室通知何其芳立即到中南海去，说毛泽东对序文有指示。

何其芳到时，已有两位同志在座。谈到《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时，毛泽东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请他审阅稿子）。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木》，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何其芳从毛泽东的话中省悟到自己写的序有片面性，只从“不伯”二字上做文章，只讲战略上藐视，而没有把战略上藐视与战术上重视统一起来讲。之后，毛泽东虽然不再谈《不怕鬼的故事》的有关问题了，但他的整个讲话仍贯串着很强的辩证性。

毛泽东说：“《易经》上有这样的话：‘无平不破，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现在就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

当一位同志插话说：“欧几米德的几何学虽然也是演绎法，却还是对于实际用处很大。可以从已知推未知，如从地球圆周推地球直径。”

毛泽东说：“这个未知还是包含在已知之内。”

1月23日下午2点半，何其芳又接到电话，通知他到毛泽东那里去。

坐下后，毛泽东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他象征征求意见似地念给大家听，又传给大家看。等传到何其芳的手中时，何其芳发现修改了好几处。其中有两处最引人注目。

一处是加了这样一个长句：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另一处是加了这样一句：

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这两处文字是使文章生动活泼起来的神来之笔，是含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思想的警句。

后来，毛泽东又让何其芳在序中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文字。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1月24日上午，何其芳要通讯员把誉清打印好的稿子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当天就看了，接着又退回来了。并亲笔批示：“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又说：“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

在退回来的稿子中，毛泽东又对上次改稿时增加的一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作了些改动，改成了这样：“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哈哈！德邻先生，你上当了！”

1965年7月26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接见回归祖国的李宗仁夫妇。

李宗仁连同他的夫人和机要秘书程思远沿着游泳池边向休息室走去，毛泽东从休息室迎上前来，先同李宗仁夫妇热烈地握手，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然后，他又紧紧抓住程思远的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毛泽东对程思远的赞美，使程思远惊愕得答不出话来。

坐定以后，毛泽东忽然说：“哈哈！德邻先生，你上当了！”李宗仁不禁为之一怔。“蒋介石骂我们做‘匪’，你这次回来岂不误上贼船了吗？！”毛泽东的幽默使李宗仁先生一时语塞。程思远赶紧说：“我们搭上慈航渡登彼岸了，尊敬的毛主席。”

李宗仁接着谈到他看到的建国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还说海外侨胞都以祖国的强盛而感到自豪。毛泽东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李宗仁向毛泽东说他这次回来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内心非常激动。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我们都以礼相待。”

接见中，程思远说到美国总统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他是要部下研究中国。近来一个国民党人也说，他也用毛泽东思想办事，他把毛泽东思想概括成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毛泽东听着笑了。

毛泽东忽然问程思远：“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问得程思远茫然不知所答，只好坦白他说：“不知道。”接着，毛泽东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停了停，又说：“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在丰泽园与李宗仁等共进午餐。叙谈中，毛泽东忽然问程思远：“你的名字为什么叫做程思远？”

“思远就是想得远，正因为想得远，我才回来跟毛主席和共产党嘛。”

毛泽东笑了。又问：“你有别字吗？”

“没有。”程思远说。

“那好，”毛泽东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我国古代有个大文豪韩愈，他的别号叫退之。现在我给你取的别号是：‘近之’。”

整个接见，毛泽东的语言极富特色。特别是他出人意料的话，如：“哈哈！德邻先生，你上当了！”“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极富有幽默感。其特点是先提出一个故意使人容易产生误会的结论，然后再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分析 and 解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卖关子”。

“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

1964年3月底，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23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各国代表团团长。24日下午，毛泽东召见周培源和于光远。

下午1时，周培源、于光远到达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刚起床，还穿着睡衣，就又开始接见。一开头，毛泽东就告诉他们两人要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

坂田是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的日本代表团团长，他在大会发言时，谈到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极大兴趣。

毛泽东谈话时，或躺，或坐，或来回踱步，谈笑风生，引人入胜，完全是商量、探讨、研究的口气，这种宽松的气氛使人无拘无束，所以谈得很成功，大家都感到乐此不疲。

从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谈起，对许多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毛泽东首先说：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银河系外又是千千万万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分割下去。现在我们对许多事情都还认识不清楚，我们对太阳搞不十分清楚，从太阳到地球中间这一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关于冰川问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许多事情认识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认识的基本前提。

于光远问：“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地球卫星等等概括成‘认识工具’这个概念？”毛泽东回答说：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在“认识工具”这个概念当中还要包括锄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锄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锄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毛泽东还现身说法地谈到自己的认识就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发展的。他说：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我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在农民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不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毛泽东十分强调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的发现，把辩证法贯彻于认识过程。毛泽东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发展了。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

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毛泽东还说：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人必有死。张三是人，张三必死。我们见不到两千年前的孔夫子，因为他一走要死。人类也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象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在这里，毛泽东讲的是彻底的辩证法，一种科学的理论不会害怕自己作出的结论；如果一种理论对自身是不适用的，那决不是科学。最后，毛泽东还讲到：“《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大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

日本坂川山辉夫在他写的《说话艺术》一书中，曾谈到说话要了解对方，知道对方的性格、学识、经验、理解能力如何等。“选用什么样的语言进行会谈，因人而异。经常留心选用洗炼过的语言，想着要进行有理性的会话”，并说“具有理性的谈话能倍增你的魅力”。

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的谈话，既选准了对象，又创造了宽松的气氛，整个谈话既有中心，又内容丰富，最后还提出问题留待思考和解决，这些都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成功之处。

“ 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

古人运用语言，讲究常字见新，平字见奇。毛泽东的语言是常句见新，平句见奇。即一句普通的话或常用的语句，经毛泽东一运用，便能赋予它以新意，便能产生与众不同的内涵。譬如“对牛弹琴”，人们常用来讽刺听者的水平低下，而毛泽东却用来嘲讽弹琴者不看对象乱弹琴。诸如此类的情况，在毛泽东的著作、谈话中屡见不鲜，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语百艺术的又一特色。

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到了上海，周谷城连同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如陈望道，周信芳、金仲华、沈克非、沈体兰等，在绵江饭店楼下晋见了毛泽东。这天晚上11点钟左右，周谷城已经睡下，忽然接到报馆记者的电话，要他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以欢迎毛泽东。周谷城知道“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一再谢绝，但因推辞不了，只好勉强写了一首《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忠心》，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鬻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海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泽东看到了这首词后，便打电话叫周谷城5月3日下午3时到他的住处去。周谷城按时到达后，毛泽东正在客厅里看报，见到周谷城第一句话就说：“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

“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实是第一首。”周谷城解释说。

毛泽东说：“恐怕不止一首。”意思是说周谷城也象个常常写这些东西的人。周谷城随即转述对记者说过的那句话：“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毛泽东笑着说：“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意思是也不那么内行，完全是谦虚之意。

周谷城接着又说：“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毛泽东说：“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周谷城说：“附庸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毛泽东说：“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周谷城接着借题发挥说：“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

毛泽东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

周谷城接着进一步谈自己的看法，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罗唆。牢罗同声，骚唆也是同声。念罗唆，可能就是发牢骚。”

毛泽东微笑着没有说什么。

周谷城笑着说：“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

毛泽东说：“是呀！老是干巴巴，有什么味。”

毛泽东与周谷城的谈话，整个看是谈的文学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写旧体诗词的看法。周谷城认为自己偶尔写点旧诗词，充其量不过“附庸风雅”。“附庸风雅”，本指旧时官僚、地主、商人等为了装点门面而结名士，从事有关文化的活动。这在解放后，带有明显的贬意。但在毛泽东看来，却不以

为然。他认为“附庸风雅”没有什么不好，即便是牢骚，也是发出来比不发出来好，这就一扫人们通常的俗见。

“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

傅作义先生是率领五十万官兵走到人民阵营来的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他的这一义举使北京和平解放，千年文化古都和二百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免遭兵燹之害，应该说傅作义先生为中国人民立下了大功。但他总认为自己对人民负有罪责，应受到惩处，同时对如何安排处理自己的原有人员仍有顾虑。1949年2月21日晚上，毛泽东在西柏坡村接见了傅作义先生和邓宝珊先生，一见面，毛泽东便亲切地双手握住傅作义先生的手，愉快而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毛泽东的话一下子道破了傅作义先生的心思，使他起义后一个月来积聚在心头的疑虑顿时冰消雪化。

毛泽东认真地阐述了共产党对傅作义原所部人员的政策。他说：我俘虏你部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傅作义对毛泽东的这种豁达大度深表钦佩，但又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俘虏送到尚未解放的绥远去。毛泽东向他解释说：蒋介石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其人格，可以帮助在绥人员提高认识。毛泽东还告诉傅作义，让这些人到绥远去参加起义，以后能一律享受起义人员待遇。

毛泽东对傅作义原所属军政人员都实行既往不咎，并作了妥善安置，使他们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给予他们对人民做贡献的机会。除按和平解放北平问题十四条条文的规定执行外，又破例地规定了：所有受编干部均按部门先住进招待所，第一继续工作，第二参观学习，第三回乡生产，自由选报志愿。凡志愿回乡人员发给路条、路费及所带财物的证明，此外还发给“参加北平和平解放有功，回家后给予土地房屋使能参加生产”的证明。凡志愿工作或参加学习的人，也都按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给予极大的信任，分别作了妥善安置。许多军政人员及干部都作为人民解放军干部和革命干部，其家属即为革命军人或革命干部家属。

1949年3月，傅作义在接见被释放回来的原被俘将级军官时，感慨地说：过去我把你们领到错误路上去了，由我负责，今天总算是走到正道上来了。并勉励大家今后要听共产党的安排，好好工作。

1949年8月，绥远的和平起义遇到严重困难，毛泽东动员傅作义和邓宝珊先生到绥远去解决此事。毛泽东对傅作义先生说：绥远起义后，用不着军管方式，起义后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宜生先生（即傅作义先生）任主席。傅作义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经过一个月艰苦紧张的工作和激烈斗争，终于在9月19日使绥远获得和平解放。当傅作义在9月22日赶回北京在已经开幕的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发表爱国激情的讲话时，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讲话之后，毛泽东一面向他热烈鼓掌，一面与他亲切拥抱。

全国解放后，傅作义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即现在的国务院）水利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军区司令员等职务。

傅作义先生当了二十三年的水利部长，他竭尽心力为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作出了贡献。他通过薄一波转告毛泽东说：我别的什么党派也不再加入了，我将全心全意地追随毛主席和共产党，努力工作学习。如果我能有进步，工作做得好，我愿意争取加入共产党，这是我后半生的心愿。

毛泽东、傅作义是对立的两党，傅作义又是在解放军大兵压境，反复工作的情况下使北京获得和平解放的。傅作义心中存有疑虑是很自然的，负疚、负罪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身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恰在这种情况下，亲自找上门来与傅作义认亲，并热语暖人：“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这出乎傅作义的意料，也出乎一般常情。所以，一句贴心话使傅作义如释重负，缩小了两人的距离，密切了两人的情谊，使得傅作义心悦诚服地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并焕发出为国家建设竭尽全力的热情和积极性，在水利事业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它是李达在延安时期写的。李达何许人也，他是毛泽东的挚友、世交和同乡，又同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中共一大代表。解放后，还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作了《解说》，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起了很大的作用，受到毛泽东的好评。

1958年，湖北省委领导写了篇《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文章，请教李达。李达看后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恩格斯也没有说过‘超’嘛！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学习（包括读书和运用），发展是学习的必然结果。针对目前我们党的情况，一是普及不够，一是头脑发热，还是应当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在大跃进的年代，能保持这样冷静、科学的头脑，确是难能可贵的。

一次，为了鄂城县委门口的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他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达问毛泽东：“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李达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泽东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达气冲冲他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当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的人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梅白（当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毛泽东出巡湖北期间，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见李达越讲越激动，便碰了一下李达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讲了。恰好被毛泽东发觉了，生气地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难，你承认不承认？”

在回去的途中，李达对梅白说：“毛主席的‘两论’多好，却想不到现在主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的根本东西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首先得弄清楚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毛主席吧！”

梅白送走李达回来后，毛泽东对他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又说：“我现在在认识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当梅白转达了李达在路上说的那些话后，毛泽东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李达的字）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

“文革”一开始，李达就受到严重冲击，七十六岁一身重病的李达经常

受到声讨、示众、批斗、审讯、辱骂、罚跪等种种迫害。但他嘱咐家属说：“我如死去，请转告陶德麟等同志，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册编出来，把上册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所以，毛泽东对李达给予很高的评价：“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一样！”“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从李达在大跃进中众人皆热唯我独冷的卓见，到与毛泽东争论而使之信服；从由一条标语而洞察出时代的通病，到能从理论上作出正确的解释；从很早就写出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到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写完写好，理论上的建树，执著的教学态度，顽强的斗争精神，都说明毛泽东对李达的评价是恰当的。

运用类比实现评价是毛泽东语言的艺术特点之一。毛泽东把李达与鲁迅类比，但李达毕竟不是鲁迅，所以毛泽东限定“在理论界”这一范围内，而不是在各方面都能与鲁迅类比。因为李达是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所以只能在理论上作类比。而在理论上李达的水平是毛泽东所钦佩的，所以这一类比是很恰当的。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

1957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为即将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整风运动作准备。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主持上海《新民晚报》的赵超构，针对他提出的“软些”的办报方针提出了批评，毛泽东说：软些，软些，软到哪里去呢？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架子，这是对的，但是软中有硬。

当时，赵超构没有很好地领会毛泽东的意思，写了一些杂文，毛泽东看后并不满意。同年6月30日，毛泽东又召见了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赵超构同志。赵超构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后，想到自己过去的错误，担心今后不能继续做新闻工作了，心情十分紧张。所以，他一见到毛泽东便马上提出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辑职务的要求。但是，毛泽东象往常一样，面带笑容他说：“最好还是回去当总编辑吧！”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并且还关切地问：“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毛泽东的话使赵超构出乎意外，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又不是共产党员，还犯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这样关心自己，于是他非常激动地说：“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毛泽东很有风趣地对赵超构说：“恐怕还有点‘形格势禁，（意思是客观上有障碍）吧！”毛泽东看到赵超构感动得流出了热泪，便亲切而严肃地向赵超构指出：办报要分清两个阶级的办报路线。并具体地剖析了赵超构写的那些杂文的错误，勉励他今后改正。毛泽东还安慰他说：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写杂文，可惜我没有这个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呀！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又一次接见了赵超构。一见面，毛泽东就诙谐地对在座的人介绍说：“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宋高宗名赵构）。”毛泽东的幽默使整个气氛显得轻松活泼，赵超构的拘谨也自然解除了，毛泽东问他：你写了两篇检查，我看过了，写检查的心理怎样啊？赵超构坦率地说：很紧张，两个星期没睡好觉。毛泽东笑着说：紧张一下好，睡不好觉是好事。然后他又对赵超构说：没有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于自我批评的人，总觉得自我批评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之后，赵超构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到群众中去，回到家乡温州，经过实际参观访问，从群众中吸收了许多新鲜空气，也看到了许多具体生动的情况，并写出了《吾自故乡来》，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反响较大。

幽默、诙谐、风趣，说白了就是说笑话。这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中屡见不鲜。这种笑话在一般情况下，最容易活跃气氛，打破沉闷。这种笑话如果出自一位领导人之口，那作用就更大了。因为一般讲，下级见到上级，群众见到领导，特别是见到领袖，最容易拘谨、紧张，因而气氛就不容易活跃，心情也不能舒畅。当然也就不能畅所欲言了。一句得体的笑话，往往能使这一切化为乌有，使领袖和群众的距离一下子就缩小了，对交谈和工作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这句话就很得体。一个是“高宗”（赵构），一个是“超高宗”（赵超构），你看，不是哥哥是什么？如果一见面，毛泽东不说这个笑话，那么领袖与群众这一层障碍暂且不说，就拿赵超构个人的情况来看，他是接见前给毛泽东写过两篇检查的人，今天受接见，是吉是凶还

不知道，心情的紧张不安是可想而知的，即使不挨批评，也是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一句笑话解除了他的心理紧张，而且使整个接见轻松舒畅。

“ 不许搞喷气式！ ”

毛泽东把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叫到自己的休息室里。坐下后他问：“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傅崇碧回答：“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毛泽东说：“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当毛泽东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便随便问了一声：“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傅崇碧说：“是刚出来的漫画，今天下午我才看到的，陈老总让我交给您。”

当毛泽东展开一看是一幅人头密集、相貌丑陋的漫画时，便慢慢皱起眉头说：“这上面画的都是谁呀？”傅崇碧犹豫了一下，伏下身子用手指着画面说：“这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坐在一顶轿子上，下面抬轿子的都是老一辈革命家，这是陶铸，这是彭真，这是杨尚昆、陆定一，谭震林同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同志口里叼着一把刀子，这个是……”

毛泽东愤怒地打断了傅崇碧的话，说：“哪一个是我呀？”

傅崇碧笑着摇摇头：“这，上面没有您。”

毛泽东侧过身去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一共才有一百六十三名中共委员，这上面就画了一百多名，我这个中央主席总该和大多数站在一起吧。这张画是谁搞的？”

傅崇碧说：“蒯大富。”

毛泽东愤怒地说：“这个人我听说过，是个学生司令，狂妄得很，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你告诉他，这是丑化共产党，是反革命。他可以送给蒋介石，送给美帝、苏修去讨功么。”说罢，将图纸揉搓成一团狠狠地扔进水池中。

毛泽东问：“红卫兵还斗干部吗？”傅崇碧回答：“斗得很厉害。陈老总也很恼火，他说蒯大富这个人很坏，不仅搞了一张百丑图，还发明了一种喷气式，他把老干部们搞得很苦。”

毛泽东问：“什么是喷气式？”傅崇碧做了个比较标准的“喷气式”。并说：“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铁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姓名，还打上了一个叉叉。”

毛泽东说：“这不是蒯大富的发明，是康生的创造，当年搞土改，斗地主就用这种搞法，不讲人道呵！”毛泽东随即站起身来，愤愤地说：“他们把我的话说成是最高指示，是伟大教导，可我讲过许多次，对老干部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游街，不要搞体罚，他们为什么就是不听呢？你去告诉钓鱼台的人，就说毛泽东讲的最高指示：‘不许搞喷气式！’”

“不许搞喷气式！”不仅表达了毛泽东要制止武斗的决心，对蒯大富之流的揭露、抨击，还表达了毛泽东对康生“不讲人道”行为的批判，对林彪、江青一伙拉大旗作虎皮，阳奉阴违两面派的憎恶，更主要的是说明了毛泽东对老干部的深切关心。

“不许搞喷气式！”用的是动词性谓语句，有意不要主语，变特指为泛指。强烈地表达出不管什么人，不论什么情况，都不许搞喷气式。这是毛泽东加强语气，强调感情常使用的一种语言形式。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对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中指示：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四人帮”忧心忡忡，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重病在身，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日子不会很长了。问题在邓小平，这个昔日被打倒的第二号走资派居然又重新崛起，而且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处于接班人的有利地位，对于“四人帮”，真是前途莫测啊！

更加之“十大”以后，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多于表扬：批“十一次路线斗争”，批“三箭齐发”，批“四人帮”，批“反经验主义”，尤其是这个“四人帮”把他们压得有些抬不起头来。邓小平这个钢铁公司更是立马横刀，步步紧逼。5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四人帮”。6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叶剑英又揭了“四人帮”“反经验主义”，闹帮派，不请示报告，不守纪律等问题。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自我批评。这两次由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表明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们几个人似乎沿着一个向下倾斜的路线滑坡，而邓小平等人正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

不久，毛泽东找邓小平谈了一次。对5月27日和6月3日两次会议，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

“没有多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毛泽东向邓小平明确表示。

“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邓小平说。

毛泽东笑着说：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毛泽东这句话巧用借喻来形容邓小平的处境是再恰当得体不过了。邓小平曾是二号走资派，引人注目。现在一跃而成为中央和国务院主持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而这个位置多少人曾梦寐以求，迫不及待想得到它，作为他的对手则更想“彼可取而代之”，否则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注】

十一次路线斗争：1973年11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犯了右倾错误。江青趁机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按当时的说法，党的历史上有过十次路线斗争，代表人物分别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送走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后，分三批与周恩来、王洪文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毛泽东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又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江青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毛泽东说的“他”指周恩来，“她”指江青）

三箭齐发，指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毛泽东在批评江青时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

“四人帮”：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大家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泽东第一次给王、张、江、姚使用了“上海帮”这个概念。“四人帮”即

由此而来。

“谁封我四个官啊？”

1965年底，由于林彪一伙发难，搞突然袭击，罗瑞卿被搞下了台。经中央军委决定，由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一再提议由叶剑英兼任，最后还是不得不走马上任了。因为杨成武同许多人一样，真心实意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认为“文革”是“反修防修”，“使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政治运动”。他认为，既然主席、中央让我当代总长，我就要尽力干好。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杨成武逐渐发现，林彪、江青一伙同各位老师的矛盾日益公开化，作为总长，他经常处在“夹缝”中，无所适从，又百思不得其解。

1967年，毛泽东要在7、8、9三个月外出巡视，周恩来和政治局的许多同志出于安全的考虑，都劝毛泽东不要去武汉。但毛泽东胸有成竹，一旦下了决心，任何人都难以使他改变主意。同时毛泽东还决定要杨成武陪同去，他说：“没有关系的。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成武，你跟我去，就这样定了。”周恩来还特意关照杨成武：“你的任务是当好联络员和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

经过沿途巡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已心中有数。一天，他把杨成武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内，同他谈了对“文革”的一些意见，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杨成武一路上跟随毛泽东，毛泽东的一些精辟见解，使他愈发感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一天，毛泽东翻看报纸，突然他的手停住，问在场的人：

“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手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的话本来很幽默风趣，但在场的人却没有笑的——人们都不敢笑。因为这涉及到党的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

毛泽东非常烦躁。他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接着，他转过身，目光炯炯，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毛泽东的态度，令人吃惊。屋里静得可怕，因为这是在场的人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他的“亲密战友”表示不满。

难怪，杨成武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回北京筹备庆祝“八一”建军节，回到北京，叶群见到杨成武就带着讥讽的口气说，“杨代总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又说：“主席最近讲到林总什么事了没有？”

杨成武听了叶群的话，马上想起“谁封我四个官啊？……”也想起“什么永远健康……”所以只好摇摇头，对叶群说：“没有讲什么。”谁知因此而得罪了林彪夫妇，以致后来屡次向毛泽东进谗言，以“排挤别人，抬高自己，想把那个‘代’字去掉，他想当总长”，“杨成武到处散布，说萧力（李讷）要夺他的权”等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杨成武，最终以黄永胜取而代之。这都是后话了。毛泽东几次谈到要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打算1968年春天或稍迟些开党的“九大”。并指示周恩来负责筹备工作。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杨成武火速赶赴上海向毛泽东汇报了“王、关、戚”的种种劣行。

毛泽东听完，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

两天后，杨成武被毛泽东的秘书请了去。毛泽东见他进来，放下手中的线装书，说：

“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周总理，‘玉、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接着他又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周恩来认为事不宜迟，马上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这对林彪一伙来说，如同发生了强烈地震，因为关锋同林彪的关系极为密切，林彪已经拟定他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由此可见，林彪看中的人，正是毛泽东要清除的人。其实，林彪是很善于搞两面手法的，有一次，秘书向他汇报，在一份上送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的文件中，称林彪为“副统帅”，林彪立即表态，“划掉！”当秘书说到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三忠于”的“光辉榜样”时，林彪断然命令：“一律划掉！”叶群在一旁说“这一条不能勾”，并说明“理由”，林彪不耐烦他说：“好了，好了，不划掉这个提法就是了！”还有一次，他对秘书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秘书说：“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有两条：一条是，首长对毛主席跟得紧；另一条，是首长讲话少而精。”林彪听后颇为得意地说：“你谈的这两条特点，这第一条非常重要。要紧跟毛主席。其实我没有什麼本事，我的本事都是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你们给我当秘书，记住这一条很重要。”

真是这样吗？请听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的话吧。她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由此可见，“谁封我四个官啊？”表达了毛泽东复杂的感情。初听幽默，实则是讥讽，因为毛泽东是最高领导，谁还能封他呢？细想起来，此话又对林彪题写“四个伟大”的举动颇含疑忌。这也正是毛泽东后来逐渐发现林彪图谋不轨的基础。

这是毛泽东1967年说的话。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的讲话和1970年12月18日在接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的讲话，可以说是对这句话“谁封我四个官啊？”最好的说明。

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

毛泽东对斯诺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当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实意。”毛泽东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毫不隐晦地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如果把毛泽东对林彪讲的这些话连起来推敲一下，就更能显示“谁封我

四个官啊？”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

“谁封我四个官啊？”用的是明知故问，即把自己和对方都明确的问题故意提出来，以取得无可辩驳的说理效果的一种说理方法。这也是毛泽东常用以说理的方法之一。

【注】

主、关、戚的种种劣行：指 1967 年 8 月，王力、关锋、戚本禹掀起了一股冲击外交部的狂风。8 月 7 日，王力在外交学院讲话，挑动学生冲外交部，揪陈毅。8 月 16 日封了外交部的大印。8 月 17 日，押着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游街。8 月 22 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我有两条罪状。”

“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冲昏头脑喽！”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都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

“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也是不行的。”

以上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前后讲话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在党内形成了一个惯例：无论任何人，不管地位多高，绝对不敢指责毛泽东犯过什么错误。此乃党内第一大忌。正如彭德怀所说的毛主席“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彭德怀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那还了得！难怪毛泽东气愤地说：“你骂了二十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你要怎么样？”

加上彭德怀7月14日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数万言的书信（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标题），使问题的严重性更加深了。

面对这种情况，1957年7月23日上午9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用辟裂的嘶哑声音说：“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一塌糊涂。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他接着说：“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去，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也会跟我去！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

“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盾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

讲到这里，毛泽东哽咽了。全场一片肃静。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给我分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在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空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谭老板，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得快。说到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着欧洲革命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后来被杀了。马克思是否也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也会象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象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

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有所，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如讲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有）是否比我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几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27日和彭德怀争吵了一通。这给毛泽东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但后来毛泽东冷静地思索了他与彭德怀的那场争吵，内心充满了愧疚。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请彭德怀到中南海住地。一见面就说：“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为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原来毛泽东要彭德怀去西南地区，担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所以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带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毛泽东还特别向周围的中央领导同志说：“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庐山会议的情况复杂，斗争激烈，毛泽东的处境也相当困难，心里千头万绪起伏跌宕。然而不论是对历史的回顾，对问题的分析，还是自我批评，都让人感到入情入理，易于接受。就是数年后对彭德怀的安排和谈话，也给人一种坦诚相见、推心置腹的感觉。真可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

1958年的大跃进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北戴河会议提出年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铁的高指标，几千万人上山搞小高炉，用砖瓦石灰窑炼铁，报纸也是天天放卫星，结果不仅白白浪费原料燃料，也打破了平衡，使产业结构失调。比如电力，轻工业的生产受到影响，能源缺口，市场紧张，财政亏空，钢铁元帅升帐，也使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农业上提出亩产万斤粮。就连有名的科学家都公开写文章，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高产。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热到什么程度！

这种气候、这种温度势必就造成了弄虚作假。水稻要亩产万斤，只好把几块地里的稻子堆到一块地里。

毛泽东自己也说：“提倡敢想敢于，‘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钢铁要翻番，不料搞了个‘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忘记了，本末倒置。”

国家的形势，经济的状况，群众的生活……都使毛泽东感到忧虑。所以

1959年7月，在庐山，毛泽东请来了四位“高参”来商讨国家大事。这几位都是毛泽东认为最投合而又有见地的人物。

其一，周小舟，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最赏识的秘书，连“小舟”这个名字还是毛泽东赐的呢。

其二，李锐，是毛泽东的同乡，颇有些独到见解。曾任水电部副部长，后又做过毛泽东的兼职秘书。1956年至1957年，有人主张长江三峡大坝上马，只有他反对，最后毛泽东还是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三峡工程缓建。周恩来也很赏识他的反潮流精神。

其三，田家英，号称巴蜀才子，从1948年开始就给毛泽东当秘书，从不随声附和，有时还敢同毛泽东顶撞几句，是一个鲠骨之士。

其四，周惠，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大跃进中没有乱来。他管粮食，把关把得紧，农村公共食堂从不搞放开肚皮吃饭，所以特意要他也来庐山参加会议。

1959年7月一天晚上，在美庐，毛泽东召见了他们。他们四人从左右两边把毛泽东围定，毛泽东坐在中间沙发上。

当毛泽东听到田家英学着劳动模范罗世发的腔调说：“水稻要亩产万斤，哪个鬼儿子哄你，只好把谷子往田里堆！”便哈哈大笑起来。笑罢，又摇摇头，用力在烟缸里按灭烟蒂。他说：

“一九五八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于，‘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

毛泽东今晚兴致颇高，他让服务员捧来自瓷瓶的茅台酒给众人一一斟满，以助谈兴。毛泽东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抿抿嘴，说道：

“一九五八年的毛病，主要出在综合平衡上。现在看来，陈云那个‘先市场、后基建’的意思是对的。六亿五千万人的衣食住行没有安排好，出了一点乱子。我是始作俑者喽！怪不得下面工作的同志。”

室外下着小雨，室内却是阵阵笑声，毛泽东更是笑声震耳。他忽而正色道：

“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

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随即吐出一口烟，专心思索片刻，叹道：“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

就当时的具体情况看，“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形势的忧虑，也表达了他迫切扭转局势的决心和愿望，当然也说明了毛泽东对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寄予的信任和厚望。一种思古图变的情怀尽含其中。这也是毛泽东巧用对偶使语言产生良好效果的一个范例。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鹦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这是毛泽东听到罗荣桓去世的消息，异常悲痛，夜不能寐的情况下写成的《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罗荣桓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毛泽东正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召集会议听取聂荣臻等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开会前，毛泽东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默哀毕，毛泽东当众说：“罗荣桓同志是一九二二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说一个人盖棺可以论定的话，那么这就是毛泽东对罗荣桓一生的人格和事业的评价。但这决不是官场话，而是出于内心的肺腑之言，因为毛泽东与罗荣桓的友谊，早在井冈山时期已经形成了。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罗荣桓一直坚持毛泽东关于官兵一致、连队建党等一系列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是红军中最著名的政治工作者。辽沈战役中他坚持贯彻毛泽东先打锦州之敌，造成关门打狗之势的作战方针，抵制了林彪先打长春，赶鸭子式的作战计划。为此毛泽东在诗中说：“战锦方为大问题。”

解放后，毛泽东先后提名罗荣桓任公安部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干部管理部部长。鉴于罗荣桓的健康每况愈下，毛泽东又郑重地作了批示：

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以持久。请考虑。

毛泽东对罗荣桓是一往情深，而罗荣桓以他几十年的作为和人格，也确实当之无愧。直到他临终前还一再嘱咐家人：“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又看看孩子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昏迷中，他还在不断地重复着说：“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了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所以毛泽东说他“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又在诗中说：“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去世如同失去左膀右臂的沉痛感情。

说真话、讲实话，是感人的前提，是语言成功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抚慰和评价，之所以感人至深，正是具备了这一特点。

“我当你的保皇派。”

两把菜刀起义的贺龙元帅，驰骋疆场几十年，曾使敌人闻风丧胆，却没想到竟死于“文革”之中。

1966年8月林彪一伙炮制了所谓“八·二五”反革命事件，他们以追后台的名义，把矛头指向了贺龙。并且恶人先告状，让吴法宪向毛泽东写了诬告信，说什么“在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诬蔑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

有一天，毛泽东把贺龙找去，把吴法宪写的诬告信交给他，要他看看。并说：不要急，慢慢地看。等贺龙看完了，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张，我对你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并风趣他说：“我当你的保皇派。”9月19日，毛泽东又对贺龙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12月28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亲切地招呼贺龙到前面坐。贺龙很坦然地坐到了毛泽东的身旁。

“我当你的保皇派。”体现了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也表达了他对贺龙的支持和保护，同时也说明毛泽东对贺龙的作用和价值的认识。毛泽东始终认为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是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要保护你呢。”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又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1974年又对邓小平说：要给贺龙平反。1974年9月底，给贺龙恢复了名誉。1975年在贺龙逝世6周年的时候，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我当你的保皇派”，是活用旧词。“保皇派”是古代喻指忠君的词，毛泽东活用旧词，以表情怀。

环顾左右而言他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访华抵达北京。这是二十多年来中美之间第一次出现的一种解冻征兆。这对中美双方甚或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

基辛格在北京只能停留四十八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从下午4时持续到晚上10时。第一轮会谈一结束，周恩来便带领中方人员到了钓鱼台另一座楼，并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给毛泽东，问什么时间去向他汇报。毛泽东说马上去，还让熊向晖也去。

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1962年他曾任我驻英国使节（当时中英尚未建交）。1967年、月和其他驻外使节一起奉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由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保护，才幸免于劫难。1970年11月，出乎他的意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他在去中南海的路上想，毛泽东找他去，一定是要了解国际形势，所以，一路上他在脑中迅速地筛选着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

周恩来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室兼书房。毛泽东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周恩来握了握毛泽东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毛泽东说：“我不困。”熊向晖握着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毛泽东笑容满面他说：“马马虎虎。”

周恩来告诉他基辛格到了，并准备汇报会谈情况。

不想毛泽东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一根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为他点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们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毛泽东说：“老熊是个‘烟鬼’。”

毛泽东轻松他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听熊向晖说他已经五十二岁了，就说：“还不老嘛。”然后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了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

结果毛泽东又问：“你在总参某部当副部长？”他回答：“是。”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回答：“黄永胜。”但心里却琢磨：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毛泽东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熊向晖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毛泽东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熊向晖答：“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指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讲具体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泽东说：“我指的是你那一篇。你读过些马列的书。”

熊向晖满以为毛泽东谈到这里，该听周恩来汇报了吧。不料老人家，抽着小雪茄，继续同他“漫谈”。

毛泽东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为了及早让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便想一下子把知道的情况都谈出来，于是他向毛泽东说：小结是王新亭副部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工作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听到这里，毛泽东“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当毛泽东沉默了一会，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时，熊向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泽东问他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回答：“没有。”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因为熊向晖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对这些事毫不知情，只好回答：“没有。”

毛泽东转过身来，问周恩来：“那五个人（指黄、吴、叶、李、邱）的检讨，发给总参没有？”

当他听周恩来说一共发了六十多份时，又说：“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毫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用右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这声音活象原子弹的爆炸声。“他们的后台”是谁？

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恩来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予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泽东的情绪松弛下来，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他又说：“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

作风。”

熊向晖心想：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时，毛泽东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基辛格第一轮会谈的汇报。这时已是10日凌晨1点零5分了。等周恩来离开毛泽东的住所时，已经两点多了。

基辛格秘密访华，在一般人看来是一桩大事，不仅关系到中美双方，也关系到世界风云。而毛泽东却偏偏撇开这个主题，用很长的时间，很艺术的方式，先了解林彪的“五个大将”的问题，并作出他们还有后台的结论。这在当时来说，确是“题外话”，而对主题，反而说“那个不忙”。这确是毛泽东的独特和伟大之处。也正是他的胆略、魄力和决断的最好写照。

毛泽东运用诱人法，先不接触正题，而是由远及近，逐渐向正题转移，这是毛泽东谈话的一种艺术方式。

【注】

庐山的事情：指1970年8、9月间，在庐山举行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会上陈伯达伙同叶群以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四处煽风点火，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毛泽东气愤他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一点意见》的及时发表，制止了林彪一伙的夺权丑剧。会后，中央开始在党内批判陈伯达，并责成黄、吴、叶、李、邱作出检讨。

“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

1935年6月26日党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明确指出红军主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依托懋功地区向川康边境发展的战略方针。会上对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展开了斗争，张国焘理屈词穷，不得不表示接受中央的战略方针。但是，会后张国焘却背着中央私自召开会议，抗拒中央方针。8月4日，中央又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会后，一、四方面军混合重编，组成了左路军和右路军。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组成，由张国焘率领，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同左路军行动；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随同行动。

8月下旬，右路军通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到达川北的巴西。可是张国焘的左路军拒绝北上，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负责同志。

9月3日，张国焘发来电报，借口白河涨水无法渡河，命令部队停止行动，建议放弃北上和东进，而重提他原来向西向南推进的主张。毛泽东召开中央委员会（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同意他的观点），发报给张，要求他继续北上，并提出派人支援张，帮他渡河。

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他的心腹助手、右路军指挥部的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码电报。电文本应由陈昌浩本人亲自译出。但他正在一个会议上发言。结果，电报由一名译电员译出，并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想把电报交给陈昌浩，陈说：“等一会，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电报似乎很急，所以叶剑英就看了一眼，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借口上厕所，走开了。其实，他转身来到一二百米开外的毛泽东办公室，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抄了一份，告诉叶别让人知道他已了解电报的内容，并对叶剑英说：“你干得漂亮。”

叶剑英回到指挥部。陈昌浩正在台上讲话，会议仍在进行。叶剑英机灵地把电报交给陈昌浩的秘书。

9月9日下午，大约应陈昌浩的要求，毛泽东和他见面了。陈昌浩向毛泽东转告了张国焘的命令。毛泽东竭力争取陈昌浩赞同他的主张。但陈昌浩“对张唯命是从，毛根本劝不动他”（杨尚昆语）。

毛泽东召开常委会紧急会议决定不改变方向，并又给张国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他坚决执行中央原定计划，前来和他们会合。于此同时，毛泽东必须做好必要准备。为了给即将进行的活动打掩护，派叶剑英去通知陈昌浩，如果部队要回头再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已动员整个部队在10日天一亮就去地里割青稞。“陈昌浩一点也不担心，”杨尚昆说，“他未感到需要特别警惕，毛只有那么点人，不敢自行离去。”

最危险的任务落到了叶剑英和杨尚昆身上，他们必须离开指挥部，但又不能引起怀疑，还要带上由一方面军的人组成的二局（即带上情报局的地图和人员）一起走。

凌晨二时，叶剑英和杨尚昆悄悄地溜出了指挥部营房，并让警卫员带着驮有行装的骡子先走一步，二局和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在半夜1时30分离开了。

陈昌浩发现毛泽东的人逃走了。他看了看徐向前司令，说：“出了一件怪事，一方面军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徐向前回答说：“你见过红军打红军的吗？”

陈昌浩没有派部队，而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到巴西去。

毛泽东决定对四方面军派来的代表团和四方面军留下的人讲话。这时年轻的红大学员们举着写有“反对毛泽东逃跑”的字样的标语示威。

毛泽东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他对干部们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

10日上午8点，大局已定，不想北上的人回班佑去了。想继续前进的人向北进发。

这是历史上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的时刻，是关系到长征成败、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叶剑英秘密地传送密码电报，使毛泽东和党中央争取了时间、争取了主动，及时采取了措施和行动，从而避免了我党、我军的一次大劫难。他以他的胆大心细，大智大勇，周密运筹，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毛泽东。以致几十年后，毛泽东还记忆犹新，并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诗句，对叶剑英同志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解放后，毛泽东亲自提名叶剑英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解放军训练总监、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等要职。直到他生命弥留之际的刹那间，还特别示意让人把叶剑英找到身边，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大概直到这时，他依然坚信叶剑英象诸葛一样谨慎，象吕端一样清醒。想把最重要的遗嘱告诉叶剑英。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既是引用，又是诗句。在毛泽东的语言中，这两种表达形式的语言是枚不胜举的。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内什在他写的《邓小平》一书中，曾这样描述邓小平1973年4月12日复出后，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宴请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招待会时的情景：

他独自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头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

难怪江青说，邓小平这个人，表面上话不多，但硬得很，在她面前很少让步。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这话正是说邓小平硬得很的意思。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说：“我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又转身对旁边的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毛泽东与邓小平风风雨雨相处几十年，对邓小平的个性非常熟悉，“柔中有刚，绵里藏针”这一评价，可以说是一个绝妙的概括，形象的写照。

邓小平“文革”中被打倒了，当了七年的“中国二号走资派”。一家人在江西南昌过了三年半的监护生活。1973年回到北京，3月7日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刚刚主持中央工作不久，用“四人帮”的话来说，邓小平的钢铁公司便立马横刀，步步紧逼。1975年5月27日和6月3日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迫使王洪文作了自我批评，江青作了检讨。

会后不久，在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时，邓小平说：“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泽东满意他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

毛泽东又说：“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说：“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还说：“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

邓小平一生的作为姑且不讲，仅上述情况已不难看出他表面上话不多，但硬得很的个性。这不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吗？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这是毛泽东哲学语言的艺术化，内容是哲学的，语言是艺术的，这是毛泽东在表达较为复杂的意思时常用的一种语言表

达艺术。

“人贵有自知之明。”

四届人大前夕，江青等人以决战的姿态，加紧活动和部署。江青一方面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九大以后基本是闲人”，希望毛泽东给她工作，即给她发号施令的实权；一方面以自己仅有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加紧筹划和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她写信向毛泽东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原青岛市纺织女工）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她抓住“风庆轮”问题（说进口船只是崇洋媚外）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并逼迫邓小平表态，搅得政治局会议无法进行。

她向王海容、唐闻生散布邓小平为“风庆轮”问题和她争吵，然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稿串连；周总理在医院并不全是养病，常和小平、叶帅在一起，总理是后台……并让王、唐二人向毛泽东汇报。

江青要王洪文尽快乘专机赶赴长沙向毛泽东报告情况，争取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汇报，只是静静地听着，默不作声。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的汇报作了如下指示：

因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对江青的来信作了如下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八天后，毛泽东又给江青写了一封短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委员会上说：“江青同志党内的一大半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翟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很难。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象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也不会象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对江青到处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盗用毛泽东的名义下指示，乱发号令非常不满，他曾多次指出：“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

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以个人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从毛泽东历年来对江青的批评，以及江青最后的下场，都说明毛泽东以“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老话来规劝和告诫江青是非常准确、贴切、生动的。

【注】

李固给黄琼书：李固、黄琼，东汉人。李固素来仰慕黄琼，曾勉励其出任。顺帝永建二年，黄琼被招聘入朝，途中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催促，才继续向京城出发。在黄琼到达洛阳近郊的时候，李固写了一封信给他，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启发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名声而其实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规劝告诫。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九大以后基本是个闲人”，希望毛泽东给她工作，即给她可以发号施令的实权。毛泽东的信实际上否定了她的这种要求。

“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

这是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外地休养了十个月，刚刚回到北京，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时讲的话。他本来是针对张春桥、姚文元文章中只批经验主义，而只字不提批教条主义说的。实际上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修正主义，而教条主义的危害历史上已有多次教训，且危害是多方面的。毛泽东对政治局委员们说：“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偌大的一个政治局委员会，自然是要研究重大问题，从毛主席在会上的整个谈话来看，反教条主义是其要强调的重大问题之一。毛泽东没有从正面郑重其事地提出问题，却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提出来，举重若轻。

而实际上当时的政治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原来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同丹麦首相哈特林、周恩来和王洪文谈话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谈，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泽东本来是从林彪事件的教训中，感到解决这类问题的必要性的。他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写马列主义的书。”

可是，张春桥、姚文远却借题发挥，想利用这个“理论问题”，组织一次对周恩来的新的进攻。当时，周恩来已病重住院，但他们仍不让他得到一点点安宁。他们借机提出“反经验主义”，煞有介事他说：“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新华社《关于报告学习无产阶级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姚文元审阅修改后，报送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

毛泽东阅后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所以毛泽东外出休养十个月，刚刚回到北京就召开了这次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而且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把开会的主题端出来：“好久不见了，

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写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写了。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讲的张春桥的文章就是4月1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定，所以毛泽东现在批评张春桥又说对不起张春桥。新华社的文件就是指那份《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

会上，毛泽东讲了党的历史，指出：“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反复重申“三要三不要”，接着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下去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要自我批评。”

还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这次政治局委员会，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讲，但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很明显了。

“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一语既说明了毛泽东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举重若轻的气魄和胸襟，嘲讽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又体现了他一贯的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

“你办事，我放心。”

1976年1月，毛泽东已卧床不起，言语含混不清。但当他从毛远新的汇报中得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毅然作出了提名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重大决断。不久，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后，华国锋向他汇报了国内的混乱局面，这时，毛泽东含混地吐出了几个字：慢慢来，不要急。他还想说什么，可是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只好拿起铅笔在一张白纸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从而确定了华国锋接班人的地位。

这时的毛泽东虽已生命垂危，力不从心，但他的思路清晰，他的语言发音虽含混，可语义是明晰的，且很有分量，很有分寸，很有根据的。

原来华国锋出生在1921年，是“党的同龄人”。十七岁就离家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十九岁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五岁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人们常称他为“华政委”。1949年8月华国锋被任命为湘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年。1952年被调任湘潭县委书记，之后不久被提升为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行署专员。1954年担任湘潭地委书记。

1955年7月，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连续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文章在毛泽东读来，倍感一种故乡泥土芳香的亲切感，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华国锋。而且以后毛泽东每次去湖南，华国锋总是陪伴在左右。

同年10月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还让他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自此，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次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你是我的父母官哪！”华国锋显得很拘谨，而且不好意思。毛泽东见此情景说：“你是个老实人！”

华国锋回湖南不久就被提升为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1959年6月，毛泽东途径长沙时接见了华国锋。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稳固的地位。1969年华国锋进入中共“九大”主席团，并成为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向斯诺提及了华国锋，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先后他担任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林彪叛逃身亡后，华国锋被调到北京。1972年公安部长谢富治病逝后，他担任公安部长。1973年8月中共“十大”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少言而平和，他进北京后安分守己，既不与“四人帮”有什么瓜葛，也不与周恩来、邓小平等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垂危之际，难言之中，写下“你办事，我放心”是切中下怀的，这句话确切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华国锋的看法：“你是个老实人！”

并确信他对自己的忠诚。

“你办事，我放心。”这是近乎古代君王临终前写的“遗嘱”，这种语言的特点是：准确、精练、不容置疑。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是毛泽东的下级，又是他的战友，在毛泽东眼里，彭德怀是一位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毛泽东对他从来是用而不疑的。

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使人民军队的声威大震，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但由于战役后期指挥上出现一些失误，八路军伤亡较大，作为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彭德怀很难过。在党的“七大”时，他对毛泽东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毛泽东肯定他说：“华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彭德怀又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艰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毛泽东则说：锻炼了军队。

1947年3月，胡宗南以二十三万兵力进攻陕北解放区，此时，身为军委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主动提出：在军区司令员贺龙来回延安前，由他指挥西北野战军二万余人的部队作战。毛泽东欣然同意。在激烈的战斗中，彭德怀与敌周旋，大胆指挥，有时根据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情况，对毛泽东的指示略作变动。毛泽东相信彭德怀的指挥能力，支持他临机处置的决断。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扭转了西北战局。沙家店战役一举歼灭蒋介石的王牌“铁军”整编三十六师两个旅，使形势大为改观。

对彭德怀驰骋沙场、英勇善战的英姿雄风，毛泽东深为赞赏，所以他为彭德怀写下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

正是基于对彭德怀的这种高度信任和赞扬，1950年6月朝鲜战争一爆发，毛泽东就委任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赴朝指挥作战。这是我国第一次派遣部队到邻国作战，面对的又是以美国为首装备精良的十几国组成的侵略军，而我们经历了几十年战争后刚刚建国，能否打败侵略者，没有绝对把握。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彭德怀发了大量作战电报，但总是在电文末尾注明“按情况酌定”、“酌办”这样的语句，给彭德怀以极大的自主处置权。彭德怀一走马上任，就充分行使了自己的职权，在志愿军出国前，当他了解了敌方兵力情况后，立即要求改变方案，将原来先出动二个军、二个炮兵师的方案，改为把已经集中的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三个高炮团全部出动。部队抵达朝鲜境内后，根据敌情新的变化，又电请增派二个军入朝。这样，由于六个军全部渡过鸭绿江，对战争初期制止敌人的高速进攻起了重要作用。彭德怀采取适合当时情况的作战方针，指挥志愿军沉重地打击敌人，当战线推到三八线以后，他考虑到后勤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断然下令停止追击，实行毛泽东制定的持久的阵地防御战，迫使敌人坐到谈判桌上来，彭德怀的这些精心计划，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最后，终于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一诗句，给我们描绘出一位威震敌胆、虎虎生风的大将形象。“横刀立马”能使我们联想到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云长，喝断桥梁的张翼德……诗句简洁精练，立体感强，把彭德怀的形态、气质、胆魄简笔投影，形态毕现。“唯我彭大将军”又说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高度评价，说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军事才能、指挥艺术及赫赫战功的由衷肯定。这正如毛泽东对彭德怀当面说的：“你是一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领，在革命的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是帮助了革命。”

运用诗句造型、评价也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一大特点。如对叶剑英用的

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而对周小舟、田家英等四人用的则是“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等等。

“有了鸡何愁没蛋呢？”

毛泽东历来十分关心和爱护干部，对他们的生活和健康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

在长征中，周恩来身患重病时，毛泽东命令彭德怀想办法将周恩来抬出草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在重庆做统战工作，毛泽东又打电报，要重病新愈的周恩来多休息，注意节劳。

抗战初期，徐海东因病在延安休养治疗。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亲自派人给徐海东送了几块钱，嘱咐他买些好吃的。当徐海东重返前线后，又旧病复发，毛泽东又给徐海东打去电报，一再叮嘱要“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此外，抗战时期，罗荣桓因严重的肾病急需治疗，毛泽东从安全角度出发，要求尽量不要去上海治病。当徐向前在华北前线生病时，毛泽东甚至对于什么时候适于接徐向前到后方治疗也作了具体安排。当1937年徐向前作战失利，一些人埋怨他把几万人马都搞光了，一个光杆司令还回来干什么时，毛泽东接见了徐，并爽朗地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了鸡何愁没蛋呢？”并鼓励他说，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将来决不只是率领二万人马，而是要率领二十万、上百万人。只要有革命骨干，部队还会发展起来的。徐向前被毛泽东的充分信任、关怀、爱护的话语感动得热泪盈眶。

建国以后，毛泽东又为病重的粟裕是在青岛还是在北京休养较合适而操心，并为带病工作的罗荣桓设计了“少开会、甚至不开会”的工作方式。对于积劳过度、因病休养的任弼时，毛泽东曾专门送红鱼供他观赏。而对于只顾打仗、对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彭大将军，在抗美援朝初期，毛泽东曾几次打电报，要他注意构筑坚固的防空洞，并且要“立即修建，万勿陡忽”。

1941年，毛泽东写信给谢觉哉，劝他和林伯渠工作和生活要有所调节，“务不过劳”。为了照顾这些老同志的身体健康，毛泽东曾亲自去边区政府，或用车把他们接到自己的住处来。1947年3月，徐特立撤离延安，当毛泽东听说徐特立没有热水瓶时，立即转身从自己仅有的两只热水瓶中拿出一只送给了徐老。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基本思想就是：“有了鸡何愁没蛋呢？”他这句寓意深刻的话，曾一下子卸掉了徐向前的包袱，使他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关怀爱护变成了动力。半年之后从抗日前线传来喜讯——刘伯承、邓小平、涂向前从前线发来电报：太行山地区部队由几千人壮大到几万人。毛泽东“有了鸡何愁没蛋”的预言实现了。

“有了鸡何愁没蛋呢？”这是一句比喻，它却形象地说明了在一切因素中，人是决定的因素，说明了干部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毛泽东对广大指战员及广大革命干部的重视、关怀和爱护。所以喻巧而理至”也是毛泽东语言的艺术特色之一。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着属事。”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子明皇，可见彼此惬意。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象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着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着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看了这封信，我们已知大概。原来，1958年年初，一次刘少奇在与毛泽东闲谈中，谈到了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刘少奇以这首诗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证明，毛泽东对此持有异议。之后，毛泽东翻阅了《全唐诗话》、《旧唐书》等书，特别详细地查对了贺知章的生平，发现均无不带家属的记载。

1958年2月10日上午，毛泽东便写了这封信给刘少奇，讲了自己考证的经过和所得出的与刘少奇截然不同的结论。随信，还给刘少奇送去了那本载有贺知章传的《旧唐书》。

从这封信中，我们不难看出，除了毛泽东治学态度的严谨外，其考证的文字是十分缜密的，这种缜密的语言，恰恰是科研中不可缺少的宝贵的东西。

这封信以精确、缜密的语言，从五个方面作了考查论证。

首先，从贺知章“老大回”——老年辞官返归故里的年龄（查证时年已八十六岁）为大前提，以他儿子的官职（会稽司马）为佐证，推断了“儿童”不可能是贺知章自己的儿女。那末，“儿童”指谁呢？一种可能性是他的孙辈或第四代，另一种可能是邻人家的孩子。这种推理是很有说服力的。古代的回乡诗中也有类似的诗句——“邻人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其次，从贺知章在长安为官数十年，又“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推出“不会没有眷属”。

再次，设想意外的可能性：一是中年丧妻，二是贺知章信道教，“也有可能屏弃眷属”。这两种想法虽系设想，都是有道理的。

又再次，用排除法，从反面作出两种推论：一是高龄人生活不能自理，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二是贺知章性情洒脱，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也不可能长期独处。

最后，以历史文献为据，并无官吏禁带眷属的记载。信尾附言，随信又送去备查的《旧唐书》，其中有《贺知章传》。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一封短信却论证了一件文学疑案，有史料可据，有科学推理，既从这些推论中得到正面的可信的论据，又从这些推论中找出什么漏洞，本可以最后作出判断，但毛泽东还是说：“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

由此可见，论证严密、语言分寸感强——缜密，是这封信的突出特点。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中国今天之所以能成为核大国，成为世界各国敬畏的朋友，这与毛泽东卓越的战略思想分不开。早在1955年，他就把战略眼光集中到新兴的尖端科学上来。1月15日他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

地质部长李四光汇报了我国铀矿勘察情况，钱三强汇报了我国核物理研究发展情况……

当钱三强讲述核原理时，毛泽东慢慢地吸着卷烟，和蔼地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

钱三强回答：“是这样。”

毛泽东又问：“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呢？”

钱三强无言以答。

因为这个问题，还从未有人提出过。稍微停了下，钱三强说：“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毛泽东微笑着从容他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毛泽东充满自信地微笑着，“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

当彭真向毛泽东介绍“三强的父亲，是钱玄同”时，毛泽东说：“知道。但是没见过面。”又说：“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序言就是你父亲写的。钱教授在这篇文章里，反驳了他的老师章太炎。他这种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毛泽东在大会总结性发言中说：“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大力发展原子能研究工作。”然后他把目光落在钱三强身上，“苏联政府已经来信，愿意给我们积极的协助。这很好。我们要尽快把反应堆、加速器建立起来。我们有了人，有了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苏联能够帮助，这很好。不帮助，我们也一定于得好。”

最后，毛泽东举杯向大家说：“预祝我国原子能事业顺利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反映了毛泽东对“一分为二”这一哲学观点的坚信不疑，对科学的深刻见解和执著追求。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无数事实和我们跻身于核大国行列的事实，都证明了毛泽东预言的科学性。

“吵架对你们有好处。”

1973年毛泽东相继接见了二十多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曾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在毛泽东的眼里，田中是个小弟弟。当周恩来把田中从休息室带到毛泽东的扶手椅边时，毛泽东向他们两人示以欢迎的微笑。“你们的争吵该结束了吧？”不等回答，他又说，“吵架对你们有好处。”

“我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田中壮着胆子说，而对一场中日战争究竟是使中国遭受了“灾难”（中方的用词），还是仅仅带来了“麻烦”（日方的提议）的争论避而不谈。

毛泽东一挥手让两位总理就坐，一面高瞻远瞩地说：“不打不成交嘛！”

毛泽东请田中角荣喝点茅台酒。田中回答道，“听说茅台有六十五度，不过我很喜欢喝。”

“不是六十五度，而是七十度。”毛泽东纠正道，“谁给你传播了这个错误的信息？”

接着，毛泽东又说：“顺便说一句，中国古代的东西太多了，让旧事物束缚了你并不好。”

当田中谈到日本竞选的艰苦时，毛泽东不解地摇摇头，喃喃道：“如果你必须走上街头作竞选演讲，事情远非简单。”毛泽东把手放在这位年轻政治家的肩头，“在街头讲话可是一件费力的工作。”因为毛泽东五十年前在长沙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时也曾做过许多街头演讲的工作。所以他很有体会地说：“保重身体。”

整个会见涉及许多问题。毛泽东还问到日本的议会制运行情况等，田中都一一作了回答。很显然毛泽东的谈话，有意识地回避了历史，跨越了中日战争，本着向前看的精神处理中日关系。

处理中日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如战争性质问题、钓鱼岛的领土问题等。中日总理会谈是非常重大的外交活动，可是毛泽东接见时的谈话，初听起来近乎说笑话。本来是谈判，却说成是“争吵”、“吵架”，针对田中误把七十度当作六十五度，毛泽东又借题发挥一语双关他说“谁给你传播了这个错误的信息？”说错了酒的度数是无关系要的小事一桩，毛泽东却故作正经地说成是错误信息，令人感到好笑。中日会谈尽管争论很激烈，并且也不是看法完全一致，但毕竟取得了成果，这可以说是值得肯定的政治外交进展，是很严肃的，何况中日之间相隔数十年没有外交来往，更是不容儿戏的事，可毛泽东偏偏说：“不打不成交嘛！”用了一句开玩笑性质的中国俗语。当然仔细掂量一下，这些话“貌似戏谑却深沉”。它出自一位处于决策地位的大国领导人之心，不仅反映了诙谐、坦诚、平易的风度情趣，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一位大国领导人心胸之宽广、气魄之雄伟、眼光之远大。

“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

毛泽东喜爱古籍，他不但从传统文化遗产中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而且批判地继承了其中大量的积累的民挨智慧和治国经验。他还向古人学习语言，融古代语言于白话文中，以表达其深刻严谨的思想。

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业绩，曾使青年毛泽东向往，增强了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孕育了振兴中华的壮志，而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直至李自成等人的传略，使他得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结论。

在他的藏书中，有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共八百五十册。这部史书他生前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许多册的封面和边角都磨破了，从头到尾满布批注、圈点和勾划。他在读《新唐书》中的《姚崇传》时，看到姚崇向皇帝阐述关于怎样治国的一段话，非常赞赏。认为它简单明了，是古今少见的十条政治纲领。其中一些内容，对我们今天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书中不少地方，还写下关于战略战术问题的许多批语。

中国的史书和古典文学，使毛泽东成为一代杰出的诗人和语言大师。在读《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等篇目时，对文中的“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等话语，他熟记在胸，并向其他中央领导推荐，曾为不少同志引为箴规之言。在他的谈话中、著作里，还常常信手拈来一些故事、典故，阐明政治、军事、哲学等方面的道理，通俗生动，警策凝练，引人入胜。他曾用《红楼梦》中王熙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俏话来鼓励立志改革的人，他用林黛玉“东风压倒西风”的话来说明社会主义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他还用“愚公移山”的典故，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的标题，并生动地说明了团结发动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道理。

毛泽东还善于古为今用。他从古籍中发掘出诸如“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许多言简意赅的警句，并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使之有的成为表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概括语言，有些成为党内生活的原则，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如《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中，历数自由主义和党八股的罪状的语言，大都是从古籍中借用的成语、典故等。

他还用《三国演义》中周瑜二十九岁当都督取得抗曹胜利的故事，说明选拔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重要性，并结合许多其他事例，以“后来者居上”、“青年人打倒老年人”为中心，作了系统论述。他甚至用《西游记》中的人物来讲解“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别提到那匹白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值得我们效法。并以此创造出他 1961 年 11 月 17 日写出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中的一些警句：“僧是愚氓犹可训”、“金猴奋起千钧棒”、“今日欢呼孙大圣”。

毛泽东融汇贯通古代语言，如寓言、典故、成语、警句等，幽默诙谐地用于他的著作、讲演、书信、谈话中，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风格：或通俗，或典雅，或幽默，或辛辣，或轻松活泼，或庄重严肃，写出大量说理透辟、气势磅礴，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来。

在他中南海的书房中，满框满架都是线装书，连他睡觉的那张特大的木板床，也被古籍占去了一半。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熟悉，在党的领导人中居首位，即使是在近代革命家中，也是不多见的。但是他决不是信而好古，钻进故纸堆出不来的学究。他能高瞻远瞩，立足于现在回溯过去，并透过过去看清未来。毛泽东深深懂得，人们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不能也不应该割断历史。他深切地认识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有许多珍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给以总结，批判地继承。所以，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在批评那些“语言无味，象个瘪三”的党八股文章时，同时提倡人们应向古人学习语言，而且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才行。指出：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当然他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并且批评了对于“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的错误倾向。

“ 马克思加秦始皇。 ”

毛泽东曾说自己要做“ 马克思加秦始皇 ”，当然是毛泽东的自哦画像，但这一勾勒粗描却是很奇特而形象的。话中自然含有诙谐、解嘲甚至反诘的内涵。

他有马克思的革命精神、斗争意志、治学态度，他也有马克思的智慧才能、胆识气魄，但同时他似乎认为，为了完成他的历史使命，有时必须要强硬到几乎残忍的地步，甚至说他远远超出秦始皇，当温和妨碍他的原则和目标实现时，他只有把它放在一边，对人的价值的关心隐藏在目标价值的背后。因为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鲜血和死亡，他的对手们从未对他发过慈悲，他也决不宽恕不肯放下武器的敌人。他有顽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困难和挫折的挑战对他来说，简直象强烈的兴奋剂，能激起他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去拼搏。他感到“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从他一生的足迹看，他那桀骜不驯的个性和不讲情面的行动，几乎使他的上级没有一个喜欢他的，但对他领导下的人来说，却是取得最后胜利的象征和希望的化身。

同马克思和所有的领袖人物一样，毛泽东也善于鼓舞和感染别人。而这种力量来源于他自己首先被崇高的理想所鼓舞和激励。他使人们意识到：为了整体的利益和远大的目标，部分的暂时的牺牲是必须的，有价值的；并使人感到，除了象他那样观察问题并跟随他以外，不可能有别的道路。

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存在决定意识、实践第一的观点坚信不疑，而他自己身体力行，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并写出一部部煌煌巨著。

他同马克思和其他领袖一样，不是从不失败，而是善于从失败中学习，他不仅从胜利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而且从挫折中学会领导革命。有人曾经问过毛泽东：你指挥打仗这么好，你是从哪里学了军事的？毛泽东笑着说：我在师范上学，当教员出身，从来没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山上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才产生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他的许多军事名著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建国后，他还多次说过：如果有人问，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直到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很多苦头，才懂得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最终还是在实践中逐步掌握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把革命引向胜利的。

和马克思一样，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通晓多种知识的伟大学者，他一生酷爱读书，但绝不是漫无目标的浏览，而是根据斗争的需要和可能，象安排打仗一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他同马克思一样，具备了领袖人物所必需的宽厚的知识基础。长征途中，因病躺在担架上行军时还在读《反杜林论》，直至他逝世时，在他身边还放着战争年代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他同马克思一样，具有坚定的意志和强烈的自信，这也是任何一个领袖

人物所必备的。毛泽东自幼年就显现出独立自主、敢想、敢做、敢为的品质和强烈的自尊自信。他曾豪迈地宣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并在文章中说：“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他信仰马列主义，但对那些满口马列词句而不懂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却绝不盲从，因为他认为真理不在他们手里。他终于写出许多名篇巨著，从理论高度确立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独立自主”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一，也是毛泽东个性烙印的体现。

毛泽东同马克思一样，他集沉稳忍耐与果敢决断于一身。他讲话、走路、办事从容不迫，大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之风度。越是在危急的情况下，他越镇定自若，稳如泰山。我军主动撤离延安时，重磅炸弹震破窗纸，泥土落满了桌子，他拂去泥土，继续伏案办公。在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战陕北时，经常要与敌人近距离行动。许多人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却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上那个山头，我上这个山头，怕什么？”

他的沉稳忍耐与果敢决断，还表现在他深深懂得一个成功的领袖必须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强硬，什么时候需要妥协，什么时候必须畅所欲言，什么时候需要缄默不语。他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说：“‘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当时对是否去重庆，特别是毛泽东是否应该去，议论纷纷，迟疑不决，毛泽东毅然果断地决定：去！

在延安时，有人问毛泽东：“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能否早一些时候进行，使根据地和红军少受些损失？”他想了想说：怕不能。因为事物有一发展过程，错误有一暴露过程。如果早一、二年，譬如说，五次反“围剿”初期，虽然我看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他们还能迷惑不少干部和群众。如果那时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那末党内会发生分裂，在大举进攻我们的敌人面前，将对革命很不利。我们首先必须照顾革命的大局，教条主义者虽然很错误，但终究是内部矛盾。只有经过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严重损失的反面教育，绝大部分干部的觉悟才得以提高，认识才一致，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才得以纠正，才会有遵义会议成功的转折。

以上这些，正是毛泽东所说的要做马克思的一面。

毛泽东要做秦始皇的一面，在建国后特别是在他生命的后期表现得更明显。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来他曾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算什么，他才坑了几百个儒，和我们相比差得远。晚年的“文化大革命”，固然情况复杂，但基本事实是许多和他同时并肩战斗过来的老战友都遭到了不应有的折磨，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

不过他毕竟是一位伟人，直到晚年，他还多次表示：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曾对身边的同志谈到：想写一部书，把自己的一生写进去，把自己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他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

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所以，毛泽东说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实则是一句诙谐幽默的自我画像，它以艺术的语言说明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话，有时是针对那些攻击他的人说的，有时是有意自我解嘲的。他的这种犀利的幽默的语言是来自他深刻的辩证法，并成为他语言的重要特色。这既能在顷刻之间推倒隔开领袖与普通人的无形高墙，也能使论敌无处遁形。进行论战时，他很少正面攻击对方，而是这里打一拳，那里踢一脚，从侧翼包围。最后再来一句俏皮话，对方就倒了。如他在批林彪时说：说我讲的活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六万句，可他们就是不听，连一句也不顶……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伪、不锈钢的。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呀！

“ 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 ”

1953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武汉视察，时间虽然只有几天，却对湖北、武汉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在湖北人民中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但最使人难以忘怀的，还是他那发自肺腑的爱憎分明、褒贬恰当的话：“ 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 ”

2月17日晚8时10分，毛泽东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少数同志和他一起吃饭。饭后作了重要谈话。

他说，有人说“ 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还有人主张“ 四大自由 ”，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象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

还谈到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剥削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上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还说，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最后谈到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并说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

面对建国后这些实际情况和落后状态，毛泽东曾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所以他反对所谓“ 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 四大自由 ”。他认为不能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而要过渡，就得实行改造。

所以2月19日上午10时，毛泽东又叫中南局的几位领导同志来到他的住所谈话。他以非常鲜明的语言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文盲要扫除。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毛泽东从提倡进步、反对保守的角度，明确他说：你们在东湖盖的两座房子（指甲所、乙所）象个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毛厕，要有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这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子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在谈到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时，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上边，你们要敢顶、敢抗，对于上边来的错误的东西，要筑坝、要消毒。对于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要分别轻重缓急来执行。

毛泽东在视察中，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肯定了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的作法和经验，提出了征服长江的规划。当谈到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时。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汇报说，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二百年才能淤死。毛泽东沉思后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两百年太少了！又对治

理黄河提出除害、兴利两大任务。为了把中国改造建设成进步的中国，毛泽东有许多宏图伟愿，对治理黄河他曾踌躇满志他说：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1964年，毛泽东在年逾七十岁高龄时，还打算徒步、策马从黄河入海口上溯黄河源，对黄河进行实地考察，并指示身边人员练骑马，查资料，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这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言，也是他“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动力源泉。语言爱憎分明，褒贬得当。这正是毛泽东的语言总是分场合、看对象、讲分寸的特点的体现。

“不用急，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司令部，和部下忙于组织地方苏维埃，宣传共产主义，招兵买马，扩大根据地。

当时的毛泽东，头发又长又乱，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更象个莫霍克族人。他常和人们拉家常，和农民处得很好。他常会走到一个男人面前问：“你叫什么名字，大哥？”或者对一位妇女说：“大嫂，怎么称呼你？”这样，人们的恐惧感很快就消失了，相处也自然了。

解放后，毛泽东仍然是这样。1953年6月28日，他到了北京市郊区鱼池村，他走访的第一家，就是解放前给有钱人看坟的张振的家。并留下墙上挂着的那张六寸大小的合照：毛泽东站在草地上，上身穿着白衬衣，下身穿着灰色裤，脚上穿着一双圆口布鞋，捏着香烟的手微微抬起，面对群众微笑着，好象正在和大家亲切聊天。张振一家人好象正被毛泽东风趣的谈话吸引，一齐仰头看着毛泽东笑，连那个席地坐在毛泽东脚跟前的六七岁的光屁股娃娃小海子，也仰起头望着毛泽东笑，……

当时张振的妻子那淑贞，一听说毛泽东来她家作客，哪顾得收拾，一手抱个娃娃奔出院子，抬头一看，毛泽东刚好正迎面走来，见到她，风趣地说：“嗨，你真行，一边一个，中间还一个。”这诙谐的语言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

毛泽东一走进院里就问寒问暖，他摸着院子里晾的一床露棉花的破被套问，冬天盖这样的被子薄不薄？又走进屋里问，冬天烧炕不烧炕？还问家里几口人？都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小孩子上学没有？庄稼长得好不好？当问到粮食够吃不够吃时，张振如实回答：“过去吃野菜，现在有吃的啦，不过还不大好，荒月还要吃些白菜团子。”

毛泽东点点头，安慰他说：“不用急，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十年后，毛泽东又访问了鱼池村，又到了张振家。

领袖，在人们心目中，那是只能在屏幕上见到的，即使他真的走到人们中间来，人们也往往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或者敬而远之，或者虽在一起，也总觉得局促不安，但毛泽东深知群众的心理，因为他就是农民的儿子，一声“大哥”，一声“大嫂”，一句地方语，一句知心话，就能使人感到平易、亲切、温暖，气氛立即就活跃起来。

“还是各守本分的好。”

三年生产救灾期间的一个星期六，卫士尹荆山利用送茶的机会提醒毛泽东：“主席，李讷回家了。两三个星期没见，一起吃饭吧？”

毛泽东停下批阅文件的笔，望着尹荆山，嘴角微微一翘，流露出笑：“嗯，那好，那好。”

李讷在毛泽东的卧室里同父亲谈话。她委婉他说：我的定量老不够吃。菜又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的呢，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咕噜叫。毛泽东轻声细语说：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形势一定会好转，要相信共产党……他开玩笑：大师傅掌勺连我也管不了。

听说饭好了，毛泽东拎着李讷的手来到饭桌旁。

李讷抓起筷子，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啊，真香啊。她望着父母粲然一笑，那么天真可爱。

江青看看女儿，又看看毛泽东，想说什么，又看到尹荆山后忍住了，勉强笑了笑，夹一筷子菜放进了女儿碗里。

毛泽东看到这种情景，望着女儿：吃吧，快吃吧。

话音刚落，李讷已经向嘴里扒饭。饭太烫，她滋滋地吹着气，吹几下便咽下去，都烫出了眼泪。

毛泽东嘴唇有些哆嗦，不自然地轻声笑着说：“吃慢点，着什么急。”

李讷见尹荆山在一旁，有点不好意思，腼腆地说：“在学校吃饭都很快，习惯了。”

毛泽东声音很低地苦笑着说：“现在是在家里么。”

“吃菜，多吃菜。”江青不停地往女儿碗里夹菜。她脸色有些苍白，虽然嘴唇依然保持着笑的样子，但已是僵僵的。

尹荆山在一旁看李讷吃饭狼吞虎咽的样子，不禁愣住了，她几乎嚼不嚼地就一口口把饭菜吞下去。在她朝嘴里扒饭的时候，偶尔掀一下眼皮，目光沿着上眼皮匆匆扫过桌面，看看饭菜还剩多少。尹荆山作为卫士，他怎么相信毛泽东的女儿，能饿成这个样子！然而这明明又是面前的事实。

再看看毛泽东，他默默地夹一筷子菜或饭往嘴里送，与其说是在吃饭，还不如说是在陪女儿吃饭，开始还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点什么，渐渐地，他不说话了，停下了筷子，停下了咀嚼，怔怔地望着女儿出神。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李讷好不容易把嘴离开饭碗，诧异地问。

“哦，”毛泽东身体一抖，漫不着边际地笑了笑，说：“老了，吃不多。我很羡慕你们年轻人。”他说着，不看女儿，也不看江青，拿起报纸，侧过身去，头轻轻晃动几下，仿佛念念有词。

江青象是在赌气，她胸脯微微起伏，瞥一眼毛泽东似怨似嗔，忽然端起碗，把剩的半碗饭拨到李讷碗里。她又瞟了毛泽东一眼，很快转过身，低着头离开了，眼眶里溢满了泪水。她从毛泽东身边走过时，拼命抿紧了嘴唇，把头微微侧仰，再不多看一眼。

江青离开后，毛泽东便抬头望住了女儿，慢条斯理地讲：我年轻的时候在湖南农村搞社会调查，有一次饿了一天，才弄到一块糍粑……

可李讷的心思只在饭上。她吃得正香，说：“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她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仍然没有离开的意思，两眼可怜巴巴朝桌子上转，

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仔细地夹起来，往嘴里送。一边说：“爸，我可能还要发育呢，饭量特大。这么大的窝头我能一下子吃三个。”她比划了碗口那么大。

“今天的饭真香哪，可惜……”李讷瞟了一眼父亲，目光又在桌子上扫。

她带着孩子气的狡黠望住尹荆山：“尹叔叔，还有汤吗？把这盘子涮涮。别浪费。”

尹荆山猛地扭开脸，泪水夺眶而出，直朝厨房跑去。

他到厨房找出两个白面掺玉米面蒸的馒头，不等炊事员放到火上烤，忙拿回饭桌旁，递给李讷。

李讷摇晃着身子，不好意思地看看父亲又看看卫士尹荆山。掰一块馒头擦擦盘子便往嘴里塞。尹荆山拿来热水倒进菜盘，帮她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地涮。

毛泽东见此情景，喉咙里“咕噜”响了两声，站起身什么也没说便走开了。他先往院子走，到门口又折回卧室，没进卧室又走向院子，在院子里缓缓踱了几步，便住了脚，抬起头，凝视那七株古老的柏树，久久不动一动。晚上，江青进了他的卧室。半小时后她出来了，眼睛红红的，明显哭过。

卫士尹荆山原以为江青一定向毛泽东大闹一番，结果没有吵闹便走了。于是就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去倒茶。并对毛泽东说：“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

毛泽东皱皱眉头：“全国人民比较来说，她还算好一些。”

其实，毛泽东饮食很俭朴，有时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菜，有时一顿饭就只烤几个芋头，有时喝点麦片粥，……

当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原来住在菊香书屋，抗美援朝时，他把书屋每个外门各安一盏灯的规矩打破，而在院子里拉了一条线，只在院子中间点一盏灯。他说：“一盏灯就够了，不要浪费。”

当行政处长拿来一份图纸，要给毛泽东翻修房屋时，毛泽东沉下脸，严厉批评：“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前线，你为什么就不想想前线只想到我的房子？我这里多点一盏灯都舍不得，你就敢花那么多？你脑子里到底都想些什么！房子不要修，你去吧。”

所以，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虽然看到女儿李讷吃饭时的情景非常难过，而且江青不满，卫士尹荆山也一再提议，但仍然坚持：“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毛泽东深深叹了两口气，不无忧伤地说：“还是各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还是各守本分的好”，这是在情况错综复杂，感情交织委婉时常用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里，有压抑的感情，有不可动摇的原则；有感情的抑扬起伏，也有理智的冷静思索，它是低沉的、舒缓的，又是适度的，坚定的。它体现了一种阔大的胸怀，展现出一种高尚的情操，它是伟人意志的流露，也是领袖以天下为己任远大志向的注脚。

“真正错划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

适合需要是语言艺术的重要特色，即要求运用语言要看对象，看场合，看目的。作为处于领袖地位，特别是决策地位的毛泽东的语言尤其需要这样，而毛泽东的语言恰恰正是这样的。

1962年末，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的崔英，向毛泽东报告大批错划右派的申诉情况时，毛泽东的许多谈话就反映了这种特点。

毛泽东平时异常繁忙，只有每周周末晚会算是他比较空闲的时候，所以，崔英在一个周末晚会上，见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休息，便立即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我是新调来的，在秘书室工作。毛泽东示意要崔英坐到他身边的沙发上。亲切地问崔英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当崔英告诉他叫崔英时，毛泽东风趣地说：“那么你的爱人可能是姓张了？”当崔英不知所措时，毛泽东又笑着问：“你读过《西厢记》吗？”两人都会意地笑了。崔英回答毛泽东的问话，说自己的爱人原在中宣部工作，1960年下放到安徽基层锻炼期间，因医疗事故而去世的经过时，毛泽东立即非常关切地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有几个小孩？几岁了？”崔英说三十二岁，两个男孩，一个十岁，一个七岁。之后，毛泽东又说：“你还很年轻，孩子还小，有人帮助你照料小孩吗？”崔英回答说有婆母帮助照顾孩子。毛泽东又问：“你一个人拿工资家中生活有困难吗？”崔英说国家发给一个孩子的生活费，对婆母生活也有长期补助。毛泽东点点头，放心地说：“那就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吧，要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这些话，对一个普通干部、普通党员，确实感人至深，以致崔英流着眼泪说：“大感谢主席了，我一定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

两周后，又一次周末晚会上，崔英又见到了毛泽东，她利用教毛泽东跳舞的机会，向毛泽东谈起了右派申诉信之多的情况。为了阐述得透彻，还列举了三个典型案例来说明反右派运动中，某些地方党委不执行政策，甚至趁机打击陷害同志，把一些好同志打成右派。他们不服，就不断给您来信申诉，希望您和党中央为他们平反。

毛泽东听着听着，停下了舞步，问她：“划成右派的定案材料寄来了吗？”崔英回答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定案材料，才更加清楚地证明很多好同志被错打成了右派。并问毛泽东：“这么多的右派申诉，主席知道不知道？下边有扩大化的错误，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说，详情不太知道。当崔英告诉他对右派的申诉信件，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说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听到这里，毛泽东有点气愤地提高了声音问道：“谁说的？真正错划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并当即要崔英转告秘书室的领导，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报送给他。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前面向崔英询问她家庭情况时的谈话，面对的是一个普通党的干部，谈的是关于个人和家庭问题，整个谈话平易亲切，语重心长，感人至深。后面谈的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而且是涉及全国性的重大问题，是非曲直显而易见，所以毛泽东的谈话态度明朗，斩钉截铁，毫不含糊。这正是适合需要这一语言艺术特色的重要标志。

“江青我只能管半个。”

高智是1953年初被通知到毛泽东身边做机要秘书的。在他之前，毛泽东已有一位机要秘书，叫罗光禄，是四川参加红军的老同志。

第一天，罗秘书就向高智介绍了情况，并要他在办公室看文件材料、熟悉情况。

下午，罗秘书带他去见毛泽东，高智很紧张。进屋后，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

高智是陕北人，对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听起来较吃力。所以他全神贯注地听毛泽东讲话，当他听懂毛泽东的问话后，恭恭敬敬地回答：“高智。”

“高——智。”毛泽东认真点点头，“这个名字厉害。家是陕北哪里？”

“葭县。”

“我去过的么，在黄河边上。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父亲和兄弟。我母亲生我弟弟的时候死了。”

“噢。你在哪里读书？”

“绥德师范学校，没读完就到了延安。”

“绥德师范学校我是知道的。这么说，在这里工作的同志还是属你的文化程度最高了。”毛泽东淡淡一笑，高智的紧张也随之消失了。他继续问：“结婚了吗？”

“结了，刚结不久。”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霍碧英”

毛泽东没有听懂高智的陕北话，特别是那个“霍”字他说不清，使用指头写着说：“霍，霍，霍去病的霍。”

毛泽东看着高智的表情笑了，笑得很开心。学着他的腔调说：“霍，霍去病的霍。我明白了。好吧，欢迎你以后在我身边工作。”

从此，高智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高智与罗光禄为毛泽东做工作方面的服务，偶尔也管管生活上的事。生活方面的服务主要是由卫士李银桥及四名贴身卫士负责。至于中共中央任命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江青、田家英，他们主要是研究国际国内大事，起草文件，不管日常工作。日常工作，比如毛泽东会客、接见外宾、召开政治局会议，筛选文电等活动，都是由高智和罗光禄负责。

毛泽东精力超人，工作起来不分昼夜。高智和罗光禄分班陪他，仍然熬不过他。

一天夜里，高智值班，打了会瞌睡醒来，天已亮了。心里很觉不安，便赶紧凑到办公桌旁说：“我，我打了瞌睡，您咋不叫我？”

“你们太辛苦了，休息休息好。我睡觉也不愿意被人打扰。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我们是两个人轮流值班，比主席休息得多，休息得好。”

“我是主动的，你们是被动的，辛苦的其实是你们。我心里有数。”

听到毛泽东这样讲，高智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毛泽东设身处地理解人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高智。

毛泽东批阅了一个通宵的文件，准备休息。但他睡觉前有散步聊天的习惯，这样可以轻松一下脑筋，容易入睡。

“高智。”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叫了一声。高智明白他这是要聊天了。

“咋了？”高智走到毛泽东身边。

“我只管二个半人。”

“你管人多么，全国都得管。”

“我管不了。我只管你一个，罗一个。”

“那咋还有半个呢？”

“江青我只能管半个。”

“全管了么，她是你老婆。”

“我管不了。我管半个，那半个随她去。”

高智笑了，毛泽东讲的是实话。江青个性强，脾气不好，毛泽东对她是有看法而没有办法，有时还断不了吵一架。

“听说支部改选了，有哪几个支部委员？”高智汇报说到他自己是组织兼宣传委员。

“宣传委员好么，我管不了的你能管。”

毛泽东的话启发了高智。他事后想了想，前不久江青为了打扑克的事，跟卫士吵架，一直吵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不得不分出一些精力来解决这种“家庭纠纷”。高智心想，不能再让这些琐事来干扰毛泽东的工作。可是江青喜欢打扑克，又喜欢责怪别人出错牌，搞得卫士们都不愿意跟她玩。于是，高智就找田云玉、封耀松、张仙朋等卫士谈话，给他们讲道理，叫他们陪江青打好扑克，别给毛泽东找麻烦。

相处日久，高智渐渐了解了毛泽东，善于体察他的心思了。毛泽东什么时间考虑什么问题？要什么文件？做什么事？高智心里多少有点数。高智喜欢穿兜子多的制服，每个兜里都揣着些材料。毛泽东要什么材料，高智往往可以立刻从不同的衣兜里掏出来，马上交到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终于发现了这一点。他笑着说：“高智呀，你是知道我心事的人。”

身为全国人民的最高领袖，在人们的心目中感到伟大、崇敬、爱戴，同时也感到神秘，但他对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讲真话、讲实话、亮家私，这种充满信任的话语，常常既得到别人的好感、体谅，又能深深地打动人心。这是一般语言所达不到的领袖语言的特殊效果。

“骂娘也告诉我。”

一个普通的农民，竟闯过七八道岗哨，通过新华门进入中南海见到毛泽东。似乎真有点传奇色彩。

原来他仅凭着一封信过关的。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晓秋贤弟如见：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久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

原来这是 1949 年开国大典后不久毛泽东给贺晓秋写的封信，贺晓秋和毛泽东是表兄弟，少年时代同在湖南韶山长大。这个农民就是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父亲临终前曾留下遗嘱：要把这几年下面发生的一切告诉毛主席，要让毛主席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这次他是老远进京向毛泽东反映情况的。

毛泽东见面就对贺凤生说：“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没有他们这些人舍身相救，毛泽东早就不在世了”。毛泽东热泪盈眶，同时责怪贺凤生说：“应该给我拍个电报嘛，起码我可以发个唁电或送个花圈。”他一面说着，一面站起身来，“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万万个贺晓秋这样的好同志。巩固革命成果则要靠你贺凤生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共同努力。”

当贺凤生回答毛泽东说，两次寄去治病的钱收到了，并问“是您私人的还是公家的”时，毛泽东说：“当然是我自己的啦！”“我不需要更多钱，有工资有稿费，又不需要存钱，更何况你们有困难应该帮助，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

贺凤生看见毛泽东看手表，知道他有更重要的工作，但憋了一肚子话总想一下子吐出来，于是忍不住冲毛泽东说：“主席，您晓得乡里现在的情况吧？晓得下面刮五风吗？晓得现在有些干部作风坏吧？您想不想听听这方面的情况？”毛泽东稍稍怔了一下，随即兴奋他说：“好哇，我正需要听这方面的情况。你先回去好好回忆一下，下次专门找个时间听你谈一次，越具体越好，要真实情况，不要掺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骂娘也告诉我，只有贺晓秋的儿子才有这么好的礼物给我。”

毛泽东第二次约见贺凤生，一开头就说：“今天只我们两人谈，你不是说要向我反映下面的情况吗，给你一小时，不！两小时可以吧。”

贺凤生从大跃进、公社化后哭爹叫娘的情况，谈到于群关系。贺凤生讲到：“为了迎接上级检查，把好几亩日里的稻谷栽到一块田里，硬说是亩产达到几千斤，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做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的喝好的还是那些人，干部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贺凤生声泪俱下，再也讲不下去了。不知不觉，三个小时过去了。

毛泽东鼓励贺凤生说：“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少奇、恩来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接着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是一个生产队长，大小也是一个带长字号的人物。生产队长也要管几百人穿衣吃饭、生老病死，不容易呢，担子不轻啦。革命队伍中，二十多岁当军师长的人不少。不管是部长、师长，还是生产队长，都要首先想到为人民服务。当长不是为了图舒适，图享受。要动脑子、担担子。……”

最后毛泽东对贺凤生说：“那我给你两个权利：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真的，社会上象你贺凤生这样敢讲真话人太少了。”“中央领导下去，下面尽讲好听的，带着你看好的，很难得到真实情况。他们怕说拐了场丢了乌纱帽。农村有句俗语，叫‘三十吃年饭，尽赶好的搬’，不象你贺凤生无所求也就无所虑，要提倡各级干部都讲真话。”然后毛泽东难过他说：“要让农民吃上饱饭，不能风一阵、雨一阵，任何一级干部都不准搞假家伙。……你们华容县那个钱粮湖围垦，也有可能是个好工程，但下雪吃冰，落雨淋雨，使农民兄弟受苦就不大好了。对不起农民兄弟，请你代表我向他们道个歉。”

五年后，贺凤生再次进京向毛泽东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仍然一见如故地接见了。并说：“你贺凤生还是那样可爱。”毛泽东告诉贺凤生：“文化大革命，是中央会议通过的，原来只是想冲一下少数干部的官气，想不到影响这么大，中央是要采取措施的。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可能在工作中犯错误，中央也一样，也可能犯错误，党犯错误也应该改正，你们那里动不动戴高帽子肯定是不妥的。”并针对贺凤生反映的情况感慨地说：“这些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我和总理下去，不碰上你贺凤生，怕也没人敢提供这么真实的情况了。”

一个普通农民，对毛泽东来说，又是素不相识的第二代人，仅凭一封信，只靠父亲和毛泽东几十年前的交往，竟受到毛泽东如此的接待。前后两次，几个小时的谈话，字字真情，句句实话，语动情怀言由衷，就象对情同手足的老战友一样推心置腹、感念不已，一个活生生的、感情饱满的人，而不单是领袖，活灵活现地站在我们的面前。

毛泽东与贺凤生的交谈很成功，以致贺凤生气愤而来，满意而归。究其原因，主要是毛泽东以深厚的同志爱，即信任、尊重、真诚、同情，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而取得良好效果的。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毛泽东酷爱历史文学，因此在他的著作、讲演以及书信、谈话里，经常用典，而且用得巧妙、恰当。如他在1928年秋写的《西江月·井冈山》中，有“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其中“众志成城”，就是个典故。

语见《国语·周语下》。公元前522年，周景王不听臣子劝告，劳民伤财，铸造大钟（乐器），第二年，钟铸成后，有乐官向周景王报告说声音谐和，而另一乐官州鸠不同意，对周景王说：

上作器，民备乐之，则为和。今财亡民罢（同“疲”），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鲜（xi n显）其不济也；其所曹恶（wù务）鲜其不废也。

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烁（shuò朔）金。

（曹：群，众。鲜：少。烁：熔化）

意思是：天子铸造乐器，要是人们都高兴，则可称为和谐。而如今铸成大钟，财伤民困，百姓无不怨恨；臣我怎敢认为这是和谐呢！人们都喜好的事，很少有不成功的；大家都厌恶的事，很少有不失败的。所以谚语说：“众心成城，众口烁金。”

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中的“众志成城”，是从“众心成城”演化而来的，意思是万众一心，就能象坚固的城堡一样不可摧毁。这就生动地反映了井冈山的人民与红军鱼水情深、万众一心，结成了一道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尽管“敌军围困万千重”而“我自岿然不动”。点出了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的原因，也暗示了红色政权存在、革命力量不断发展的条件。

再如《清平乐·蒋桂战争》，写于1929年秋，写的是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在其帝国主义后台的支持下，为争夺湘、鄂地盘而发生的战争。其中有：“收拾金匱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该句中的“金匱”就是一个典故。

语见《南史·朱异传》。南朝梁武帝时，北魏侯景想带其辖地来降，武帝想接纳，又怀疑其诚意，犹疑不定，自言自语道：

我国家犹若金匱（u 欧），无一伤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讵（jù巨）是事宜？脱至纷纭，悔无所及。

（承：相承。讵：岂。事宜：机宜。脱：倘或。纷纭：杂乱）

意思是：我的国家就象金匱那样完整坚固，没有一点伤缺，一代一代平安到如此程度。现在接受侯景的降地，是否合乎时宜呢？倘或国家因此骚乱，后悔也来不及了。梁武帝后接受朱异的意见，接纳了侯景。次年，侯景叛变，攻破都城，梁武帝愤恨而死。

“金匱”原指盛酒的金属器皿，后用来比喻完整、巩固的国土。

毛泽东诗词《清平乐·蒋桂战争》中的“金匱”用典新颖，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它形象地概括了整个中国和闽西的关系，表明由于军阀割据，整个中国被弄得支离破碎，好比好端端的一个“金匱”被敲成碎片。中国工农红军把一片一片的“金匱”从军阀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一片又一片的

红色区域。从收拾金瓯一片开始，到最终收拾整个“金瓯”；在收拾整个金瓯的远大目标下，着手于“收拾金瓯一片”，这正是毛泽东英明伟大的战略战术思想的光辉体现。毛泽东的诗词、著述、书信用典，已是司空见惯的了，就连给自己的孩子起名都引经据典却是鲜为人知的。

毛泽东共有四男二女六个儿女，但他最疼爱、最着意培养、寄予厚望的有两人：一是长子毛岸英，一是次女李讷。

李讷是 1940 年与江青所生，又是他们刚结婚两年。毛泽东对女儿的取名，颇费了一番心思。决定让女儿姓李而不姓毛，他们两人都很满意。因为毛泽东曾化名李德胜，江青原名李云鹤。而取名“讷”却是用典的。《论语·里仁》中有一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毛泽东特别欣赏这句话，它与《实践论》中所提出的“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理论恰好一致。

李讷天性聪颖，学习又用功，有理想，有志气，生活上又能严格地要求自己。毛泽东对她的影响极大，不仅表现在人格、气质的塑造方面，而且表现在专业上的选择方面，毛泽东本人酷爱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他从小就培养李讷这方面的兴趣，逐渐地，李讷也喜爱历史学科了。1959 年秋天李讷考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历史系。

李讷为人清高，落落寡欢，不多讲话，没有辜负毛泽东给她命名的那个“讷”字。

长女李敏的名字，也是毛泽东反复斟酌后才引经据典定下的。

1936 年冬，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陕北保安县的一孔破窑洞里，添了一个女儿，当时中央领导的夫人邓颖超、康克清、刘英、钟月林等闻讯都到窑洞祝贺，邓颖超见这女孩又瘦又小，怀着怜爱的感情风趣他说：“真是个小娇娇呀！”邓颖超本是说者无心，可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却听者有意，他想起《西京杂记》中有“文君娇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因而便取其意，为爱女取小名毛娇娇。

战争年代，辗转流离，直到 1949 年春，才托贺子珍的胞妹贺怡从沈阳贺子珍处，把娇娇带到北平。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就住在香山。

娇娇看到站在面前的这个人画报上的毛主席一模一样，知道这就是自己日夜想念的亲生父亲，激动得扑上前去，甜甜地叫了声“爸爸！”就依偎在毛泽东的怀里了。

由于娇娇从 1940 年至 1948 年随贺子珍在苏联，天真活泼，聪明好学，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因而十分逗人喜爱。

喜悦之余，毛泽东连忙约请几位中央领导人来家欢聚，并乐滋滋地向他们介绍说：“我给你们带了个洋宝贝。”

娇娇已经到了上中学的年龄了，毛泽东想给她起个学名。娇娇高兴地点点头。

毛泽东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论语》。翻到《里仁》篇，指着其中的一句话念道，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他对娇娇解释道：敏，则解释很多。讲到这里，他又打开《辞源》，指着“敏”字解释说：“敏”字有好几种解释，如敏捷、聪敏。《论语·公冶长》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敏捷而通达事理。敏，还可作“灵敏迅速”、“敏捷多智”等解释。杜甫《不见》诗：“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你的名字叫敏，但不一定叫毛敏，可以叫李敏。”毛泽东对娇娇说。

“为什么？大哥叫毛岸英，二哥叫毛岸青，他们都跟爸爸姓毛，我为什

么不姓毛？”娇娇睁大眼睛，十分不解地问。

“娇娇，”毛泽东用手拍着女儿的头说，“爸爸姓毛，这是不错的。但是为了革命工作需要，爸爸曾经用过毛润之、子任、李德胜等名字。爸爸特别喜欢李德胜这个名字。”

当然，毛泽东为娇娇起名李敏，是与李讷对应的。虽然李讷小李敏大，但在起名上，倒是先有李讷，后有李敏的。

从上中学开始，娇娇便叫李敏了。

另外在聚会、接见中，毛泽东也常常用典，给人一种幽默感。

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曾一本正经他说：“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一百八十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

说到这里，毛泽东转向在场的章士钊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自然，这是毛泽东出于善意的一种幽默，但当溥仪得知毛泽东在春节团拜会上对自己生活的关心，十分感动。

毛泽东在讲话中引用的“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一句，就是一个典故。据说，战国时齐国人冯谖投靠到孟尝君田文门下当食客，被列为下等。当时，下等只能吃粗饭，中等的才能吃上鱼。于是冯谖弹剑高唱：“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后来田文听后，就把他列为中等了（语出《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

毛泽东引用这个典故，大概是说不要等人家有了情绪，开口提出来再去给人家以优惠。时值春节，又是在团拜会上，说的是溥仪这样一位特殊人物。所以这个典故引得很雅，表达的观点也很独到。

总之，善于用典，确实是毛泽东语言的突出的艺术特色。这与毛泽东酷爱中国古典文学，深谙中国历史是分不开的。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解放战争第二年，国民党的力量已大大削弱，被迫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但蒋介石仍希望把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以实现他的战略企图。

毛泽东以他军事家敏锐的战略眼光，及时抓住关于整个战争全局的重要关节，不让敌人喘息，全面转入战略反攻，所以果断地作出了“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用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战略方针。

根据双方主客观条件，毛泽东战略进攻的目标定在中原地区的大别山。中原地区东临津浦路，西依汉水，南濒长江，北枕陇海线，物产丰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上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谁得中原谁得天下之说。大别山位于国民党首府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又最薄弱的地区，另外，大别山曾经是红军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人民群众，多年来一直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坚持斗争，我军拥有到那里去立足生根的条件。

如果我军一举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震南京，西挟武汉，南控长江，北瞰中原，从而象一把利剑插入敌人心脏。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共产党决不允许国民党占据此战略要地，国民党也决不会拱手让与共产党！

为挺进大别山，夺取中原，毛泽东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决策部署。

三军配合，即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跃进大别山；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等率领的太岳兵团为右后军，挺进豫西。三支大军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同时实施两翼牵制。即由陕北我军出击榆林，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山东我军则在胶东发动攻势，继续把山东敌军顾祝同部往东引向海滨，以利三军的行动。

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必然调动其进攻陕北、山东解放区的部队回援，争夺中原地区。

毛泽东分析了部队挺进大别山有三种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告诫部队要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我三路大军胜利地摧毁了敌人在中原的防御体系，迫使蒋介石从“全面防御”改为“分区防御”。我三路大军共歼敌十九万余人，解放县城一百余座，建立了中原解放区，把国民党的战略后方，变成了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前进基地，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估计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语出宋岳珂《程史·徐铉入聘》，原文是：“上谕之曰：‘不须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虽是古语，但用在这里，却恰如其分地活写出大别山乃咽

喉要地，国共两党对此誓将拼搏，一决雌雄！

巧用古语，以少胜多，是毛泽东深厚的文学造诣的反映，也是他语言艺术的一个特色。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
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这句名言恰好是毛泽东语言有理有据的明证。

1927年，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了危急关头的时候，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张只有“保存武力”，才有办法对付事变，并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但在选择落脚点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当时有两个地方可供选择：一是井冈山，一是湘南。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井冈山呢？

首先，毛泽东向江西安福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作了调查。原来，王新亚原是北伐军的一个营长，北伐军离开江西永新时他被留在当地协助政府组织工农武装。大革命失败后，王新亚与贺子珍等人在1927年7月搞了一次永新暴动，失败后，王新亚带领安福农民自卫军到湖南浏阳一带活动，而贺子珍和其他一些人则上了井冈山避难。在井冈山上，当时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袁文才是穷人家出身，他从年轻时起，就受到革命影响。后来他参加了当地的马刀队农民武装。1926年初，他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他把三百六十人的马刀队改为宁冈农民自卫军，接受党的领导。大革命失败后，他把这支队伍拉上井冈山，为党保存了一支武装力量。同时他还为附近几县的共产党员上山避难提供方便。王佐是个穷裁缝，也是由于不满封建压迫拉起三百人上了井冈山。在山上，袁、王二人结拜为兄弟。此外，王新亚还介绍了井冈山地区的地理情况以及附近地区党组织的状况。这些情况表明，井冈山地区除有利的地理条件之外，在群众基础和党的力量方面都是革命军落脚的理想地方。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了。失败后，毛泽东决定上罗霄山脉。9月20日起义军向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进军了。9月29日，部队到达了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一方面对部队进行整编；另一方面派人和袁文才、王佐取得联系，以争取他们的支持，经过几次会谈，袁文才和王佐同意毛泽东的部队上山，共商大计。

10月上旬，部队到达井冈山北麓的茅坪。毛泽东利用在茅坪养脚伤的时间，又对井冈山的地理环境和人员情况作了调查，并同袁、王多次会面谈话，同时还与上山避难的永新的党员贺子珍等谈话，了解永新党组织的情况。此外，他还由袁、王陪同，考察了井冈山北段的地势、地形。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对在井冈山落脚的决心增强了。

于是，毛泽东率领部队离开水口，几经周折，于10月下旬从井冈山西南面经过荆竹山、双马石上山，并受到王佐部队的接应。

上山后，毛泽东再次对整个罗霄山脉进行了调查。他利用战斗的间隙从南到北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他了解到井冈山地区包括一山六县，即井冈山和江西的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在这里，有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有利条件。

首先，井冈山有利的地理条件。井冈山地区方圆五百多华里，地势险要，高山连绵，通往山上的道路只有黄洋界、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八面山五大关隘，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加上山里的树密林深，气候多变，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

其次，井冈山县有一定的经济条件。边界六县盛产稻米、油茶和林木，仅宁冈一县所产粮食即可供全县两年食用。这可给部队提供足够的经济给养。

再次，井冈山地区有较好的政治条件，共产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都有较好的基础，大革命时期，边界各县就建立了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和农民协会虽遭到很大破坏，但革命影响仍然存在，许多党员和群众转入深山，继续坚持斗争。

最后，在井冈山进行武装割据，已有袁文才、王佐等人的实践。

在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对罗霄山脉各段进行了分析比较。他认为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又太接近大城市，南段地势比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在政治上对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只有井冈山的罗霄山脉中段最利于进行武装割据。这样，毛泽东才最终确认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从这个事实不难看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这一结论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的——为什么要上山？上哪个山？为什么要上井冈山？又为什么最好在罗霄山脉中段？这些都从地理、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作了详细的介绍、分析，所以结论的得出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即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而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又是毛泽东语言带普遍性的特点。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毛泽东语言伪突出特点之一。它往往使对手的阴谋暴露无遗，置对手于狼狈不堪的境地。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前后的言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结束。全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之后，迫切希望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团结、富强的新中国，休养生息。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企图抢占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于是在美国的支持下，策划以军事进攻和政治欺骗交替使用的两手策略，加紧准备发动内战。但蒋介石慑于全国各界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也为了争取时间把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调到内战前线，于是打出了“和谈”的幌子，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伎俩。1945年8月14日至23日，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直接谈判。

毛泽东早已洞察出蒋介石的阴谋，但若不去重庆谈判，蒋介石就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而且会给全国人民盼望和平的愿望泼冷水。但若去，一是不会有什么结果，即使谈成，也不过是口是心非、一纸空文；二是人身安全毫无保证。针对这些情况，在由谁去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最后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陪同亲赴重庆和蒋介石直接谈判。

毛泽东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阻止和推迟内战的爆发，揭穿美国和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把戏，以教育和团结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因为，今天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对内战，我们不去，就正中蒋介石的诡计。其实，蒋介石表面上邀请我们去谈判，而心里根本不希望我们去，害怕我们去，甚或以为我们不可能去，这样他就可以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还可以为他发动内战推卸责任。

赴渝后，毛泽东坚持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坚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争取和平民主。

而蒋介石本来就没有和谈诚意，也没有毛泽东能来重庆的准备，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准备内战，并栽赃中共制造内战，对谈判毫无准备，一个方案也提不出来。因此，整个谈判期间始终处于一种边谈边打、打打停停的状态。

为了尽力争取和平，揭穿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提出国共双方军队整编的比例由五比一改改为八比一，并决定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个省区的人民军队撤往苏北、皖北等地。这一举动，粉碎了国民党的造谣诬蔑，揭穿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赞同和支持。

经过反复谈判和艰苦斗争，蒋介石被迫同意在《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上签字，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如果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而我们也可以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曾讲过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话：“‘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会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

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毛泽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语言特点。蒋介石假邀请，我就真赴会；你要假和平，我就真谈判；你要拖，我就促。你想

打，咱就战场上见；你要谈，咱就谈判桌上会……总之，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活用古语是毛泽东语言的一大特点。“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即是一例。

1947年3月，胡宗南率领二十三万国民党军队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

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进攻，解放区广大军民毫不示弱，纷纷要求坚决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

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毛泽东却见解独特，与众不同。他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丰富经验，分析了蒋介石进攻延安的战略企图，并将敌我双方兵力作了全面比较，还把保卫延安的斗争与其他解放区的斗争、与解放全中国的关系作了系统的分析。

最后，他决定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让敌人占地盘背包袱，而我们则可以轻装上阵，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

他生动地比方说：譬如有一人，武艺较高，他背了一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面尽是金银财宝，碰见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财宝。这个背包袱的人怎么办？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就很不灵便，跟强盗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丢了。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打，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他接着说：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而敌人背的包袱背得越来越走不动，到那时，我们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

毛泽东还形象地比喻说：敌人进攻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

敌人占了地盘，兵力就要分散，握着的拳头就变成了伸开的手指，强敌变成了较强和较弱之敌。我们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打了个比方说：好比你面前有三个对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我们这次打仗，要采用“蘑菇战术”，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

正是按照毛泽东的决策办，西北战场上我军连连告捷。敌人被我军牵着鼻子一个劲地转悠，转得晕头转向，不时被我军狠狠地揍一下。羊马河战役歼敌四千七百余，蟠龙战役歼敌六千七百余，沙家店战役，蒋介石的铁军整编三十六师两个旅六千人被歼灭……1948年2月，我西北野战军取得了宜川、瓦子街大捷，歼敌五个旅。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4月21日，被敌人侵占了一年又一个月零三天的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延安的主动放弃与胜利收复，是毛泽东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最好的注脚。

毛泽东借用古语生动形象地说明延安失而复得的情况，充满着辩证法，具有很强的概括性。

“小舟变成了大舟了。”

毛泽东非常重视干部的培养，而对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的进步和成长总是给以鼓励，并感到由衷的高兴。

周小舟的成长就是一个例子。周小舟 1935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时期就任中共北平临委宣传部长。二十四岁，他和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振羽作为年轻的中共代表到南京去和国民党谈判。

1936 年秋，周小舟去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汇报南京谈判的始末，毛泽东发现他是个人才，便将他留下。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毛泽东的秘书，而且是毛泽东所赏识的秘书，“小舟”这个名字就是那时毛泽东所赐。

抗战时期，为了打通去苏联的通道，毛泽东派周小舟作为八路军代表，去新疆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为了争取阎锡山的联合抗日，毛泽东又派他作为自己的个人代表，去山西宣传我党的一贯主张。

毛泽东对干部的培养，很重视文化基础知识的教育、专门知识的学习和科学世界观的形成，但他更注重实际工作的锻炼。他认为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是最无知识的，他要求青年知识分子必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而不能成为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家。他认为只有经过实际斗争生活的艰苦磨练，才能培养出革命事业的栋梁之材。对于周小舟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青年干部，毛泽东让他到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周小舟到冀中区工作期间，毛泽东曾两次写信鼓励他：“切实努力，必有进步。”

周小舟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坚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充实自己。建国初，他担任了湖南省委书记，成为一名比较成熟的负责干部。毛泽东五十年代再次见到周小舟，高兴他说：“小舟变成了大舟了！”

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正确评价过去的革命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又特意把周小舟和田家英、李锐和周惠请到庐山的别墅中去，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深有感触他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可见，直到这时毛泽东仍把周小舟视为“良将”。

毛泽东很善于运用修辞。“小舟变成了大舟了！”这是一种借义双关。“小舟！”是名字，而“大舟”则是成器、成材的意思。这是毛泽东对周小舟进步、成长的肯定，也是对周小舟工作成绩的一种赞扬，当然也充满着看到青年干部不断成长、成熟后的一种喜悦心情的流露。“小舟变成了大舟了！”又是一种仿词。由“小舟”引出“大舟”。这如同由“促进”而仿造出“促退”由“外交家”仿造出“内交家”，由“公理”而仿造出“母理”等一样。

所以，巧用双关、仿词也是毛泽东语言的艺术特色之一。

“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

报纸对于毛泽东说来，如同空气、水和食物一样重要，因为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了解国内外的大事和形势，只能通过敌人的报纸。

毛泽东很善于从敌人报纸上那些夸大的掺了水分的或假象的报道中，准确地分析出敌人的动向和意图、所面临的形势和发展趋势，并由此决定红军的战略和策略。因此，他把得到报纸后的心情形容为“快乐真不可名状”。

在赣南闽西时，他天天搞到来自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在湘赣边界时两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后来就到吉安、长沙去买报。到了瑞金，就看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

每当部队打进一个县城或集镇，毛泽东时常派人去或亲自带着警卫员先去敌人的县（镇）政府，找敌人的档案文件，再去当地邮局买报纸杂志。

一次，毛泽东由于看不到报纸，他索性专门派了三十一团的一个营，去打大军阀谭延闿的家乡高陇，搜罗了一批报纸上山。

有时只能从谋利的小商贩手中得到些作包装纸用的、揉得皱皱巴巴的零碎报纸。

1929年1月，毛泽东与朱德出师失利，想从瑞金得到一些报纸，从中了解敌人的动向，于是在得知瑞金城内空虚时，便派出了一个班的战士突袭瑞金抢报纸。突袭成功后，战士直奔邮局，局内空无一人，堆满了全国各地的报纸。他们为了搜罗得尽量齐全些，以致耽搁时间过长，敌人发现他们只是一班人，便又反扑回来。战士们刚突围出城，就遇上了刘士毅的侦察部队。战士们先发制人，夺路脱险，结果红军主力的行踪却暴露给敌人了。

抢报纸引来了一场战斗，也引来了一个大胜利。

为什么为了抢报纸而不惜引起战斗呢？毛泽东回答得好，他认为没有报纸，就如同“两眼漆黑”，而得到报纸又“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天下大事尽收眼底”。正因为毛泽东这样重视报纸，所以在他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同时，给中央写的信中说道：“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他还给李立三写信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

所以，毛泽东对得来不易的报纸视若珍宝，使用很经济。首先他仔细翻阅，对有参考价值的，他都划上记号，等山上的同志传阅完了，他就让贺子珍把作记号的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以备查用。其次，对剪取以外的用作写字纸。最后剩下的废报，还要作为卷烟纸卷烟抽。

毛泽东把得到报纸，从而了解敌情，比作“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这一比喻非常形象，生动。不拨开云雾就难以见到青天，得不到报纸就难以了解敌人情况；见不到青天就感到昏暗，不了解敌人就难以取胜。巧用比喻确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一大特点、他常常用比喻讲道理，说笑话，使道理深入浅出，使听者便于接受，使气氛宽松活泼。

“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

因地设喻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特点之一，它可以以说话人所处地点的景、物当场设喻，借以说明道理，从而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1948年5月初的一天早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正在吃早饭，忽然听到有飞机的轰鸣声。军人的本能，使聂荣臻意识到敌机要来轰炸。果然，一架敌机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又飞来两架B—25轰炸机。

聂荣臻飞快地向毛泽东的房间跑去——毛泽东是4月中旬来到城南庄的。当聂荣臻赶到毛泽东的房间时，毛泽东正身穿蓝条毛巾睡衣睡觉，因他昨晚通宵办公，才睡下不久。聂荣臻一跨进屋，便用急促的声音轻轻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

毛泽东若无其事地从床上坐起来，十分镇静而又风趣他说：“不要紧，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这时外边有人喊：“快！快！飞机下来了！”

聂荣臻见毛泽东没有离开的意思，便焦急地连连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你必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警卫员抬来担架，不等毛泽东答应，就把他扶上担架，抬起来往防空洞里跑。

敌机投下了五枚炸弹。两枚落到离驻地较远的地方，一枚正落在毛泽东住的小院里，别的房子完好无损，恰恰毛泽东住的那两间遭到了损坏。

大家看后都有些后怕，可毛泽东见到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时却说：“你们害怕，我倒觉得好玩。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飞机在我头上丢炸弹呢。有的炸弹落到地上爆炸了，有的没有响。我看了看住房，屋里炸得很厉害。如果我一个在屋里睡觉，没有人管我，最好的结果是现在住在医院里，也可能真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

聂荣臻决定让毛泽东离开城南庄去花山村住，因为这里山高沟深，较隐蔽，好防空。

可临走前，毛泽东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要到他原来的住所去看一看。因墙外边还有一颗炸弹没爆炸，大家担心是定时炸弹，所以劝阻毛泽东。毛泽东却不仅要去，还要到屋里去看看，他边看边说：“敌人不愿意叫我们在这里住，我们只好再搬个家吧。可惜，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失败了。”

从上述毛泽东这段经历以及他一系列的说话，他把敌人扔炸弹说成是“投下一点钢铁”，又联系到城南庄是农村，可以用敌人投下的钢铁“打几把锄头开荒”，因地设喻。这既展示出毛泽东临危而镇定的气度，又表现出他对敌人的蔑视，使毛泽东的音容神态活灵活现，又使当时的场面呈现眼前。

“不能说毛泽东主义。”

在我国，毛泽东思想已是家喻户晓的概念了，而不提毛泽东主义。这是因为毛泽东本人坚持“不能说毛泽东主义”。这两种提法曾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1941年3月，中共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个提法。他说：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典型的结晶体”，我们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1942年2月18日、19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刊登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中提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驳斥所谓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农民主义”的污蔑时，使用了“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为纪念建党二十二周年，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其中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刊登的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术语。文章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此后，“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便被不断重复使用。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党中央为他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举行的欢迎会上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1943年12月4日和25日，周恩来两次提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整风就是把全党从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在中国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思想下”。

1944年7月，罗荣桓为纪念建党二十三周年，写了一篇《学习毛泽东的思想》的文章，其中同时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两种提法。

1945年3月31日，刘少奇在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准备提交“七大”的党章草案时说：“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

1945年6月“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便确定下来。

后来，有人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把这个意见报告了毛泽东。其实，早在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在给何凯丰的复信中就特别指出：“我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宣传时候，要宣传只宜以某些片断去宣传（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宣传，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毛泽东在1948年8月15日给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的亲笔信中又郑重他说：

未元电悉。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毛泽东坚持“不能说毛泽东主义”，因为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两种语言表达是不同的。在毛泽东看来，成熟的、成体系的才能称“主义”，而自己的思想还不能称“主义”。再者，虽然“毛泽东思想”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的思想”，但鉴于时代语言的习惯，只有讲马列主义时才使用“主义”。如把“毛泽东思想”称作“毛泽东主义”，就有与马列主义并列的倾向。

可见，毛泽东在用语上是非常准确、精当而有分寸感的。这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突出特点之一。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运用类比借古喻今是毛泽东议论语言的重要特色。

早在 1944 年毛泽东就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文件，要全党引以为鉴。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 1944 年 3 月 19 日至 22 日的《新华日报》上，二十天后，即 1944 年 4 月 12 日，毛泽东就把它列为延安整风文件。8 月下旬接到郭沫若的感谢信后，于 11 月 21 日就给郭沫若写了复信。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在考虑进北京问题时，毛泽东估计：“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有一次，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进北平，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有一次散步时，毛泽东问警卫员：“进北平以后干什么，你想过没有？你们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

因此，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胜利面前，要防止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

为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议：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不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到李自成。有一次，他说：“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做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加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

1949 年 3 月 23 日，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北京的日子。这天凌晨三四点毛泽东才睡觉。将近 10 点他醒来后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正是怀着这样的决心和信念，离开西柏坡，踏上去北平的道路的。

在这里，毛泽东以历史上的李自从来类比将要进城的共产党领导干部，用李自成进京后失败的教训来类比共产党的干部，若不吸取历史教训，也将重蹈历史覆辙，遭到失败的命运。用类比法借古喻今，在比较中找出事物的相似之处，能收到“警钟”作用，要比一般说教说服力强。

“青年运动的方向。”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从把五月四日定为青年节讲起，讲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败，又讲到革命的对象、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体、根本力量、骨干，又讲到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又回过来讲青年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辨别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标准，以及延安青年的模范作用等等。在这篇讲演中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

这篇演讲设问迭出，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是语言上成功地使用设问的典型范例。其设问的形式丰富多彩，主要有以下几种。

承接问。毛泽东说：今年（指1939年）五月四日在全国定为青年节，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讲演接着问：“那末，现在已经转变了没有呢？没有。这一个转变，现在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还没有胜利。”

毛泽东还讲到：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接着问：“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并且进一步说明自己这样看的理由：“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

衔接问。毛泽东在讲到延安的青年运动时，他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在这里，“为什么？”既有承上的作用，又有启下的作用，它象一座桥梁将上下文衔接起来。

以上这两种设问，都有力地加强了文章的内在联系，加强了讲演的逻辑性。

反复问，或叫重叠问。如：“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以上这些都属于反复问，即两个设问句问的是同一个问题，所以回答只有一个答案。那末去掉一问不行吗？可以，但力量却减弱了。所以这种反复问，意在加强问的力量，突出问题的重点。

迭问。这种设问的特点是连锁发问，又边问边答。如：“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些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

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这些连锁设问象连珠炮似的，不由得听众不信，因而它具有夺人的气势，折服人的力量，使文章产生一种一发而不可收的锐利气势。

正反问。这种设问的特点是用肯定与否定的连用形式发问，又用否定与肯定相连的方式作答。如“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

先答后问或叫颠倒问。其特点是回答在前，设问在后，初看很象反问。如“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这一句中，“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了，就是对辛亥革命是不是胜利或胜利在哪里这一设问的回答。

双向问。这种设问的特点是设问前有回答，设问后又有回答，设问被夹在两层回答的中间。如“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的模范吗？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设问句前面回答了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的一方面理由，在设问句后接着又回答了另一方面的理由。

总之，《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讲演的最大特点是设问的成功运用，几乎在每个段落，每讲一个问题，都用设问，以吸引听众，有时用一组设问构成一个表现力很强的句群，使整个讲演设问迭出，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大大加强了讲演的逻辑性、鼓动性和说服力。

“ 我的老师也很好。 ”

1915年，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因校长张干向省政府建议，规定每月学生需交纳十元学杂费，这一规定遭到学生们的强烈反对，校园内立即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一天，毛泽东拿着一张《驱张宣言》对同学们说：这个宣言讲的都是张干的私德如何不好，不切要旨。我们是反对他做校长，不是反对他做家长。既要赶走校长，就要批评他办校如何办得不好。我们应重新写一个宣言。当毛泽东把写好的《驱张宣言》贴在校内并广为散发后，轰动了全校，传遍了省城。

湖南省教育厅当即委派一位督学到学校召开大会，要求学生复课，但学生不仅不听，还提出“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督学不得已，只好答应说：“你们还是上课吧，下学期张干不来了。”张干一听气火了，当得知带头闹事并拟定《驱张宣言》的人是谁时，决定开除毛泽东等人，后因广大师生反对，最后仍给毛泽东记大过一次。

解放后，张干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因被划成“地主”，生活窘困，有时甚至无以为炊。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邀请原第一师范的师生王季范、徐特立、周士钊、谢觉哉等吃饭。席间，周士钊谈到了张干的处境。

不久，张干前后两次收到了一千二百斤粮食和很多钱。后又接到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对张干的生活困难“极为系念”。这时他才恍然大悟。感激异常，夜不能寐。一家人将毛泽东的书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张干此刻竟忘乎所以，自己的病似乎好了一半，他本来对给毛泽东记大过的事是讳莫如深的，现在却向家人絮絮叨叨地摆谈起来，宛如一个真的孩童。

一方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一名很有才华的学生记大过；一方却是不念旧恶，以诚相待，还亲笔惠书表示“极为系念”，确实感人至深。难怪张干握笔含泪给毛泽东写信，感念不已。信中说：“润之吾弟主席惠鉴：敬启者，……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弟）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易可言喻？”

后来，毛泽东又邀请张干到北京，并向子女介绍自己的老师和校友，诙谐他说：“你们平时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张干饭间对自己的过去作检查，可毛泽东却摆摆手说：“我那年轻时，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我的老师也很好”，委婉含蓄。其中既含有对张干过去的宽恕、谅解，又带有对张干现时的同情、鼓励；既含有自己对年轻时的反思，又有对子女的教育；既反映了毛泽东时过景迁的宽宏大度，又表明了毛泽东尊老重师的美德。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完好地融汇在一句婉言之中。

“冲里那两棵太极树，还在不？”

毛泽东北戴河住室的客厅里，坐着来自湖南的三个年轻人，他们都是县供销合作社的干部，一个叫毛继生，二十多岁，身材单瘦，粗眉大眼，另外两人叫邹祖培、庞菊中。

毛泽东亲切地向客人们打听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互助组……的情况，可是局面很尴尬：毛继生坐在一张藤椅上，两腿并得铁紧，两手紧紧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邹祖培和庞菊中，虽然都是韶山的老地下党员，这时也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坐在他们三人的对面，问一句，答一句，气氛很不活跃。

本来他们是来北京参加全国供销社工作会议的。到了北京，见了世面，还想见见毛主席，于是三人合计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想不到会议一散，一辆小轿车，就把他们拉到这里来。此时此刻，三个人也在不约而同地埋怨自己：“冒得用，讲见毛主席，劲头那样大，如今真的见到了，有话讲不出。”

毛泽东探测着大家的神情，然后把目光注视着年轻人毛继生，用十分纯熟的韶山话亲热地朝他问道：“冲里那两棵大枞树，还在不？”

毛继生知道，毛主席说的枞树，就是那两棵长在韶山毛主席旧居下面的大枞树。

“一棵早两年死了，一棵还在，如今长到咯样大了。”毛继生回答说，同时两手做了个全抱的姿势。

他自己也纳闷，手还没放下，情绪却顿时好多了，于是反问：“主席，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记得这两棵大枞树？”

毛泽东神秘地笑笑，风趣他说：“讲起那两棵树呀，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哪，哪有不记得的？”

接着毛泽东给他们讲了小时候的一段故事。说一个爱树如命的女主人邹四阿婆，屋旁种着不少批把树、梅子树、桃子树，管理很严，孩子虽然眼馋，但不敢“轻举妄动”，一天，毛泽东和几个伙伴下课后去偷果子，被邹四阿婆发现了，她挥动着一根长长的、软青皮竹竿，把他们从树上轰下来紧追不舍。她一面追，一面喊着：“好呀，石三伢子（毛泽东的乳名，因毛泽东排行第三，又因小时外婆为了让他长命，令他拜石头为干娘，因而得名），你充头领，我就先逮住你！”毛泽东先是纵身跳进一条土沟里，后又翻出沟外，爬到高高的枞树上，笑着、喘着冲邹四阿婆作鬼脸儿，弄得邹四阿婆无可奈何，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

听着毛泽东用一口家乡话，讲述小时候的故事，客厅内的气氛一下子就轻松活跃起来，欢声笑语亲如一家。

午饭时，毛泽东又把孩子们叫出来认识客人，还让孩子叫毛继生为“叔公”。毛继生涨红着脸，一面摆手，一面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说：“敬老尊贤还是要的，受了，受了。”

亲切的乡俗，真切的民风，纯正的家乡话，使拘谨的气氛、尴尬的局面一扫而光。

临行时，三个人激动地同毛泽东一一握手，说：“主席已经有二十六、七年没有回去了，现在家乡人民生活好了，都念着您，欢迎您回去看看呢！”毛泽东动情他说：“难为家乡人的好意啊！我现在大不大，细不细，是个主席，回去一路不容易呀！”

话语里，饱含着对家乡的深情，对故园的神往。

“要想开‘牛皮公司’，就得学会不脸红！”

朱仲丽是王稼祥的夫人，又是毛泽东的世交。因为仲丽的父亲朱剑凡与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一同在日本留学。1920年毛泽东任一师附小主事时，应朱剑凡的邀请，寄宿于朱剑凡所办的周南女校，于是他们成了忘年交。

抗战初，朱仲丽刚从医学院毕业就到延安投奔毛泽东去了。在她心目中，正如她父亲所说的：“毛润之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到延安后不久，她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这之前，她曾想象，领导中国革命的领袖，是个什么样子呢？为此，她曾兴奋得夜不能寐。在警卫的导引下，她见到毛泽东。他穿一件灰色棉军装，脚穿棉布鞋。从背影看，头发又黑又浓，腰板很直，身材高大。

听警卫员报告朱医生来了，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毛笔，转过身来，笑着说：“请坐！”

毛泽东的一声“请坐！”把她从呆看中惊醒过来，连忙把右手放在帽沿上，两腿不熟练地并在一起，喊了一声：“敬礼！”毛泽东见她那个狼狈样子，觉得可笑，于是幽默地笑着说：“我在长沙看见你的时候，你刚学会讲几句话，走几步路，今天倒学会向我敬礼了！”

当听说朱仲丽在医学院学了五年，又实习两年之后，毛泽东说：“噢，一共七年，是硕士、博士罗，牌子响当当的！”又忽然问朱仲丽：“你是想当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医生，还是想当一个‘蒙古大夫’呢？嗯？”

对毛泽东说的这两个名词——卖狗皮膏药和“蒙古大夫”，过去虽然听说过，但不大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只好回答：“我不当卖狗皮膏药的医生，因为狗皮膏药百病都治，又百病治不好；也不当‘蒙古大夫’，他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看病人，敷衍了事。”

毛泽东听后开怀大笑起来，说：“噢，倒看不出，你很会讲话嘛，我也受到了你这个医生的启发啦。”

朱仲丽有些紧张地连忙说：“哪里，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说：“你说的那种医生，是专为老爷太太们服务的。你来边区后，要准备当一个人民的好医生，要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心，还要以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缺乏这个基础，就容易成为自私自利的医生了。”

1938年10月，朱仲丽是六届六中全会的值班医生。也是她第一次见到王稼祥。毛泽东走进会议大厅时，她正站在大厅门口。听到毛泽东说了一句关于“牛皮公司”的双关语，她未听懂，但因紧张而满脸通红。毛泽东说：“要想开‘牛皮公司’，就得学会不脸红。”

正当朱仲丽脸红得说不出话来时，毛泽东张开右手掌，用左手食指点着右手的指头继续说：“第二，当‘牛皮公司’经理要会夸夸其谈，阿谀奉承。第三，必须培养一帮人手，替他出力。第四，还要会画广告，会编小册子宣传。”又说：“我们党内还存在着那种自己犯了错误，又不承认，还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爱吹牛皮的，不实事求是的人。”

听到这里，朱仲丽才明白了这是指王明。

毛泽东在进入六届六中全会会场时，对朱仲丽说出这句双关语，显然一是指不要当那种“卖狗皮膏药的医生”和“蒙古大夫”，二是指那些文过饰非、自吹自擂、不实事求是的人。这暗示着对王明路线的批判和否定。

“你们只要经济，不要政治，
政治就偏要来管你们。”

1921年春，湖南学联准备联合总工会组织“五一”劳动节游行示威，但总工会负责人黄爱、庞人铨，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不愿合作。

毛泽东当时是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为了说服黄爱、庞人铨，他带着一个营业员，以推销报的名义，并邀同总工会组织者之一的任树德——他是毛泽东最近结交的朋友，在总工会里威信较高。他们一同来到湖南第一纱厂。由于纱厂老板克扣工人工资，黄爱和庞人铨正在领着工人闹罢工。庞人铨与毛泽东很要好。他把毛泽东、任树德让进屋里。毛泽东知道黄爱、庞人铨等平时标榜姓“安”（即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不姓“马”（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所以他们喝茶漫谈，不急于谈“五一”节游行的事。

为了缩小和黄爱等人的距离，启发他们的觉悟，毛泽东采取了迂回战术，把话题扯宽。他首先讲起1918年冬天，带领新民学会会员赴京又到天津塘沽的事，接着谈起了李大钊和他写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时黄爱说他也知道李大钊，并说他的朋友周恩来很敬重李大钊。

毛泽东一听，觉得谈话趋于融洽，距离正在缩小，就把问题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他说李大钊是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还说周恩来、蔡和森、陈毅、邓小平等人组织了“工学互助团”，正在积极研究俄式革命，他们拥护马克思……。

毛泽东巧妙地把话题转到马克思主义胜过无政府主义，经济斗争必须同政治斗争相结合上来。性急的任树德说：“正品先生（正品是黄爱的字）、润之先生，时间不早了，我们是不是把‘五一’节游行的事商量一下？”

庞人铨正在犹豫，黄爱坚决地拒绝了。他说：“总工会是搞经济斗争的，参加游行就带了政治色彩。如今为了第一纱厂的复工问题，正在和赵恒惕政府谈判，如果搞了政治斗争，就可能使复工的希望完全破灭。”庞人铨一听也同意他的意见。

毛泽东悄悄地拉了任树德一下，示意不能性急，并对黄爱、庞人铨说：“正品兄，龙庵（龙庵是庞人铨的字）兄，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你们再研究一下，不管是不是参加游行，我们总是在一条火线上，以后，借重你们的地方还很多呢。”

两天后，黄爱被赵恒惕政府逮捕了。毛泽东一听，连忙派人把郭亮叫来，要他在学联布置一下，立即行动，援救黄爱。他和任树德急速地赶到了第一纱厂。

一见面就对庞人铨说：“龙庵兄，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你们只要经济，不要政治，政治就偏要来管你们，你说是不是？”

任树德忙说：“怎样救出正品先生呢？快商量个办法吧！”

“我看这么办，”毛泽东沉着他说，“一方面，总工会和学联马上派代表和省公署谈判，也吁请地方绅士和社会名流帮我们讲话，要求释放正品兄，另一方面，要采取强硬态度。我主张‘五一’节举行大示威，在社会上造成舆论，让民众都懂得，‘世界是我们的，做事靠大家来’，人多心齐，力量就大了，给赵恒惕政府一点压力，迫使他们放人。你们二位看看，这样行不行？”

任树德一听，毫不迟疑，在桌子上猛击一拳，大声说：“要得！我赞成。”
庞人铨眼睛红红的，沉痛他说：“好吧！事到如今，也只好走这一步棋了。”

“五一”节出动了一万多人的游行队伍，整个长沙城都沸腾起来了。结果，赵恒惕政府被迫在5月8日释放了黄爱。

毛泽东马上到第一纱厂去看望黄爱。他抚着黄爱的肩头，深情他说：“正品兄，这件事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工人阶级要得到彻底解放，就要走俄国人的路，一定要夺取政权。没有自己的政权，就逃不脱资产者的压迫和剥削。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黄爱默然地听着。过了好一阵子，才说：“是呀！我是要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半年之后，黄爱、庞人铨完全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毛泽东、郭亮、柳直荀一起，积极从事劳工运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巧用比喻说明深刻的道理是毛泽东语言的重要艺术特点之一。

早在建党初期，他给工人夜校和矿工子弟学校上课的时候，连采用的教学方法都常用比喻。一次他教“工”字时，先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然后解释说，上边的一横线是“天”，下边的一条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在地上，是顶天立地，他们的世界是整个宇宙。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把军队比作“鱼”，而把老百姓比作“水”，军队与群众是鱼水关系，军队扎根于群众如鱼得水。这就是毛泽东群众观点的基础。

他还说：“根据地之于红军就象屁股对人一样重要。”如果没有机会坐下来休息，一个人肯定会因疲劳而倒下。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依据，也是对游击主义的一种驳斥。1928年的红军正是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茅坪路线仍然悬在空中，毛泽东无法完全付诸实施。

毛泽东对烦琐哲学和教条主义十分厌恶，他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毛泽东继续说，“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马列主义。”接着他又说，“马列主义不是十全十美的，也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只是非常有用的。”

他对教条主义者气愤他说：“你的教条狗粪不如”，还说，“狗粪可以肥田，人的大便可以养狗。但是教条呢？它们既不能用来肥田，也不能用来养狗。它有什么用处？”

对那些以为能背诵苏共教条就是一种成绩的人，毛泽东予以直截了当的批评。他把这些错误的狂热者比作竹子，“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在1930年1月写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把革命形势的发展比喻为星星之火终将形成燎原之势，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归定时日。但我所说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

这些比喻对当时“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论者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而这之后的革命事实也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这些生动的比喻具有何等惊人的预见性。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以情动人 是毛泽东语言的重要艺术特色。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就是他在一位从未见过他的战士临死前说的充满感情的话。

事情是这样的：延安时期，红军野战医院来了一名重伤员，子弹打在胸部，伤势很重，在极端困难的医疗条件下，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仍然很难挽救这位伤员的生命，这个伤员时常处于昏迷状态，但不时微弱地呼唤着：毛主席、毛主席。当伤员偶尔清醒时，医生才弄清楚，他参加革命几年，从未见过毛主席，他渴望能见到毛主席，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医院担心毛主席工作忙，住地远，没时间来，最后还是决定，打个电话，让毛主席知道好。清晨，毛泽东刚刚起床，得知此情，立即赶往医院，路上还说，伤员很危险，不知能不能赶上看他。毛泽东平时不骑马，为了赶时间，这次一出门就跨上小黄马，放马奔跑，赶到医院，顾不上休息，连忙走进病房，轻轻地走近伤员，伤员激动得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脸上浮出幸福的笑容，缓慢地合上双眼，停止了呼吸。在场的同志，看到此景此情，无不深受感动，毛泽东充满感情他说：你是我党的好同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随后，他参加了烈士追悼会和埋葬烈士的工作，然后又回到医院，不顾疲劳，走遍了医院的每个病房，和伤病员一一握手，亲切慰问，从清晨到黄昏，毛泽东连一点东西都没有顾得吃。归途中。他让警卫员买几个烧饼，当警卫员把烧饼递给他时，他忽然说：不是买给我吃的，我不饿，你们累了一天，你们吃吧。

当延安遭受敌人进攻，中央机关要临时撤离时，有人担心，群众若和中央机关一块转移，容易暴露中央机关的行踪，提议让老乡朝别的方向走。但毛主席不同意，他指示：一定要让老乡跟我们的部队一起撤退，这样可以减少损失，现在我们军民已凝成一体，就应该对群众负责到底。

在长征途中，进入草地的第七天，几天来已粒米未沾，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毛泽东也只剩下几小块青棵饼，还是平日吃野菜省下来的。这时，毛泽东发现两个战士，无声地倒在路边，毛泽东弯下腰，温和而又亲切地拍拍他们，轻声说：“同志，不能倒下。”两个战士说，我们已两天没吃东西了，实在走不动。毛泽东掏出那仅有的几块饼，不顾警卫员们的阻止，把饼送到两个战士手中，然后，一字一顿他说：再走一天，就可以出草地了，无论如何要走出去。最后，又让人牵来马，让其中一个最弱的战士骑上去，另一个让人搀着向前走。

陕北胜利会师后，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不幸患了病，病势越来越重，毛泽东几次催他去看病治疗，吴吉清以为是不服陕北的水土，满不在乎，等到第五天，就病得爬不起来了，毛泽东疼爱地责备他，随即派医生给他打针吃药，但仍无好转，毛泽东立即派人用自己的担架把吴吉清送到红军野战医院，经诊断为重伤寒。毛泽东不顾传染的危险，屡次到医院去安慰和鼓励吴吉清同疾病作斗争，入院七八天后，吴吉清病势加重，被医生误诊为死亡，送往太平间，这一情况被前往探视的同志发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生气，严肃地告诉医生：凡经过长征的同志，不管是马夫，还是伙夫，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并要求医生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吴吉清，说：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抢救过来。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备用药品拿出来送到医院，使吴吉清终于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侯登科是毛泽东的马夫。他从长征时就为毛泽东喂马。

到延安后，毛泽东有了汽车，已不需要再骑马了。但毛泽东却对老侯说：“老侯，你喂的邓匹马，在长征中为我们帮了大忙，这功劳要给你记上。”

毛泽东要乘汽车前往西柏坡，临行前，又特意去看侯登科，见面就说：“老侯，谢谢你啦。咱们在陕北转战一年多，全靠你喂马。今天，我们要坐汽车了，你不能和我们一起走，你要和机关一起行军。你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就骑上这匹老青马走吧，机关可能老弱病号多，你也是老人，又有病，你就骑老青马吧。你同你的领导说，就说是我的建议。”

后来，听说毛泽东特批让老侯骑他心爱的老青马，老侯感动得流出了热泪。他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主席，你放心吧，我能走，有困难了，走不动了，我一定按主席说的去办。”

1948年冬天，由于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年近六旬的老侯在西柏坡病故了。

当时正是三大战役最紧张的时期，毛泽东日夜筹划指挥各个战场。为了不干扰毛泽东的工作，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等毛泽东工作不太忙时再向他报告老侯去世的消息。

后来毛泽东得知老侯已病故多时了，他生气地问：“老侯在我身边工作多年，他病故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呢？”

“因为你当时太忙，怕干扰你的工作，领导上说等你不忙了，再向你报告。”卫士长赶紧解释说。

“再忙也应该告诉我嘛！”毛泽东不无遗憾他说，“老侯可是个好同志呀！他是河南人，他从参加革命以后，就没有回过家。家中有老有小，为了革命，他把一切都献出来了。告诉他的家中没有？要通知地方政府给以优待，他家中有困难，要给予帮助。”

毛泽东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了。走了一段路以后，他又对卫士长说：“老侯干了一辈子革命，就当了一辈子马夫。他从来就没有不安心过，从来也没有看不起自己当马夫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要号召大家向老侯同志学习，干一行，爱一行，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

仅此，一个不知名的战士，一些普普通通的老乡，一个平常的警卫员，一名老年马夫，他们的冷暖疾苦都牵动着毛泽东的心，毛泽东对他们视若亲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同志，不能倒下。”“再忙也应该告诉我嘛！”这些动情的语言，温暖了多少人的心，激励着多少人奋勇前进！

“客随主便。”

1948年3月底至4月初，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告别陕北，指挥决战，并向北京靠拢，这一天到达了蔡家崖。一天，贺龙司令员对毛泽东说：“你们到这里两天就开了两天会，在转战陕北的时候又是那么紧张，来到这里也应该稍微轻松一些吧。今天晚上不开会了吧，我请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看戏。这是晋绥平剧团演的，这个剧团虽说比不上延安平剧院的水平，但水平很可以罗。”

周恩来说：“你不是派这个剧团到杨家沟给我们演过戏吗？剧团里还有梅兰芳先生的徒弟嘛。”

毛泽东说：“好哇！客随主便，听贺老总你安排。”

看戏前，贺老总又到警卫班郑重地嘱咐说，“今晚是军区干部和地方干部在一起看戏，他们都想见见毛主席，到时候，你们要注意首长的安全。晚上天气凉，要让主席穿上大衣。”

剧场设在北坡村的一个广场上，广场里已经坐满了人。

穿过剧场的时候，贺龙走在前面。

这时，掌声震撼着山谷，一只只手伸到了首长们的面前。毛泽东、周恩来等首长，热情地和大家握手。

当毛泽东、周恩来等走到前排的时候，掌声仍是不停，剧团的同志和已经化了妆的演员，也从幕后跑到台前，对首长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第一出戏，是《打渔杀家》。

第二出戏。是《三打祝家庄》的三打，贺龙知道毛泽东很赞赏这出戏。1937年，毛泽东给延安抗大讲授辩证法时就说过：《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从调查入手，就打了胜仗。延安平剧院编演了这个故事，毛泽东曾写信进行鼓励。

这次。毛泽东看《三打祝家庄》的第三打，仍然十分高兴，他对演出的成功也表示了赞扬，并与其他中央首长，再三向参加演出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退场时，人们又围拢上来，汽车不能往前开。司机老周开动了汽车，车灯一亮一灭，示意让人们让路。

毛泽东嘱咐老周说：“慢点，不要撞着人。”

回到住处，毛泽东正在洗脸，贺龙就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贺龙说：“没料到会场秩序这么乱，给主席添了麻烦。看个戏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

毛泽东说：“很好嘛。你不让他们看，反而会引起非看不可。我们脸上没有多长一块，也没有少长一块，看一看没有什么关系嘛。”

第二天，晚饭前，贺龙又找到周恩来说：“今天晚上，请山西梆子剧团到这里来演出。这个剧团的演唱都很好，在这个地方很有名气。今天晚上中央不安排会议了，要动员主席一定去看戏。周副主席也一定要去。剧团的同志们要求见见你们。你们看他们的演出，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呀。”

周恩来说：“今天中央不安排会议，主席大概也不会有临时要开的特殊会议。咱们两个人都去向主席讲，保证他晚上去看戏。”

贺龙与周恩来一块到了毛泽东的住处。贺龙说：“主席已经来了好几天了，我们平剧团演过一次戏，我们这个剧团的戏，去年12月在杨家沟演的时

候，你看过了。今天晚上，我们从兴县请来了山西梆子剧团。这一带的老百姓，把这个剧团抬举到可以与梅兰芳剧团媲美呀。其中有一个名旦角外号叫‘二梅兰’，就是山西梆子剧团的‘梅兰芳’。这个剧团，无论在各县城的戏院演出，还是到乡下演出，演多长的时间都是满座。”

毛泽东笑着说：“来到你这里，已经看过戏了。照你这样讲，今天晚上是一定要去呀。这么好的地方戏如果不去看，那就太遗憾了。”然后毛泽东又问周恩来：“怎么样，去看戏吧？”

周恩来说：“去吧，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演戏的地方还是在那个野外广场上。由于上次看完戏后秩序较乱，这回贺龙老总早就让有关部门把剧场划分好了，要各单位保证剧场秩序。演完戏后，让我们先走。”

第一出戏是《打金枝》。这是一个喜剧，也是山西梆子剧团的拿手戏。

扮演升平公主的演员唱腔好，她的做戏和表情变化都引人入胜，把“金枝玉叶”的喜怒哀乐表现得非常突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不断称赞这个演员演得出色，他们跟看戏的观众一样，也不时地随着剧情的变化在发笑，在鼓掌。

周恩来说：“这样的剧团，组织到各地进行巡回演出，也会受到欢迎的。”

然后，周恩来到了舞台上，高兴地大声说：我代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向你们全体同志致谢。你们演出很成功，观众一直在给你们鼓掌。毛主席也一再说你们演得好。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将来有机会，可以到各个解放区演出更多的好戏……。

毛泽东在平时与家人、工作人员和战友相处时，大都使用生活语言，如两次看戏的前前后后的话，都很随便、平易，富有生活气息，这是毛泽东语言的一个侧面。

散沙和湖泥

善于运用通俗的群众语言去阐明道理、感染别人，使人听了好象拨亮了心中一盏灯。这是毛泽东高超的语言艺术的突出表现。

毛泽东在讲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重要性时，他摊开手掌，做了个手势，启发大家，你们说是这样打出去有劲？还是……他又把手掌紧紧地握成拳头……这样打出去有劲？得到大家肯定的答复后，毛泽东又形象地用散沙和湖泥作比喻，进一步向干部强调团结之重要。他说：群众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团结起来，好比一堆散沙，缺乏力量，我们要用湖泥把这堆散沙胶在一起，捏成一团，这就团结得很紧，不会散了。

在讲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时，他说：敌人没有孙悟空的本事，而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有弱有强，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集中兵力专打敌人的弱点，打胜了立即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的手心里玩。一番话把大家说得心花怒放，信心倍增，掌声雷动。

在说明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而无贵贱之分时，他打比方说，有些人瞧不起挑大粪的工人，把他们看得一钱不值，这是很不公平的。拿上海来说，高楼大厦，很繁华，很香气，但是这个城市要是没有挑大粪的工人会怎么样，上海不就成了臭海了！

在讲革命必须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时，他说：中国有个神话故事，说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朝圣，这个人不是凡人，是仙家，所以，他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走曹走曹，遇到仙人吕洞宾，问张果老去何处？张果老说去蓬莱。吕洞宾诧异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能到？”张果老生气了，认为自己有理，反驳道：“我的脸是朝东方蓬莱的！”毛泽东讲完故事，接着说道：“想要革命的人，如果路线方向不对，革命还是不能胜利的，张果老虽面朝蓬莱，但路走错了，永远也到不了。”

在讲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作战形式时，他说：《红楼梦》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子是系在脖子上的那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子是它的军队，只有消灭敌军，缴了他们的枪，抓到俘虏，才能吃掉他的命根子。在讲作战形式时讲到游击战术，他说：讲走路，连三岁的小孩也会，但讲到打仗行军，就是一门好大的学问。毛泽东接着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几句简短、通俗而又深刻的话，就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讲明白了。

在讲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时，他举了鸡蛋因得到适宜的温度而变为小鸡，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小鸡的生动例子。

在讲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时，他举了要想变革梨子，就得知道梨子的滋味，亲口吃一吃的例子。

总之，毛泽东运用通俗的群众语言，把不朽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讲得活龙活现，一听就懂，使没有文化的工农兵心领神会，付诸实践，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在运用这些语言时，有时幽默风趣，有时亢奋激昂，有时象涓涓细流，滋润心田，有时又象黄河巨浪气势磅礴，振奋人心，激人奋起，其感染力和鼓动性非常之强。

“用八抬大轿来接我。”

毛泽东常常以诙谐风趣的言谈，讲出严肃重要的道理，使气氛轻松愉快，使人接受起来自然。

毛泽东给延安抗大讲两门课，一门是哲学课，另一门是思想修养课。

1938年，毛泽东在上思想修养课时，针对学员中存在的实际思想问题，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谓“爬山主义”。原来抗大的早操，有一个科目是爬山。有些学生身体弱，爬山经常掉队，觉得不光彩；想请假，又怕别人笑话自己落后，于是便发牢骚：“我们来延安，为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懂得怎样闹革命，你们为什么老搞爬山主义呢？可不可以把马列主义增加点，把爬山主义减少一点？”

毛泽东说：爬山是作战的需要。我军在华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侵占华北的日军穿着大皮鞋，爬山相当快，就是平时练出来的。动作慢了就要吃亏。练习爬山，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他左手叉在腰间，挥动一下右手，继续说：红军长征时，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许多胜仗，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敌人，胜利到达陕北。身体弱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时掉队，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追上去，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能说成是什么主义。

第二个问题是有的学生发牢骚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更加名副其实。”

对此，毛泽东说：抗大不断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地增加，学校要办，又缺少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办法，叫做“艰苦奋斗”。不得已而为之呀！他说：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烧的、用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呢？可不可以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的劳动？如果那样做，是增加抗战的力量呢？还是减少抗战的力量？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咱们能办不能办？毛泽东的话，实话实说，入情入理，抗大学员思想上的疙瘩很快就解开了。

1939年的初秋，毛泽东去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

院党总支部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让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处长韩世福去杨家岭接毛泽东。

马列学院距杨家岭十来里路，两地之间的中点有一座延河桥。当四人走到桥头时愣住了：毛泽东正从对面走来。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邓力群说。

毛泽东听后笑笑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象话。”

毛泽东扬起手摆了摆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

“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毛泽东认真他说，“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自己也笑了。

毛泽东摇摇手：“那才不象活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

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的嘛！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毛泽东在讲“爬山主义”和“劳动大学”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事实作辩证的分析，用中肯的语言表达出来，不拐弯抹角，不吞吞吐吐，不文过饰非，不哗众取宠，而是磊落耿直，尖锐明快，中肯实在，所以入情入理，深得人心。

而关于“抬轿子”的话，却是幽默、诙谐，寓庄于谐，使对方在笑声中明白了深刻的道理，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教育，受到了启迪。

“不能看眼色行事。”

毛泽东一向重视调查研究，他认为先要明了情况，才能有正确的方法，才会下最大的决心；情况不明，方向不对，下决心是胡闹。

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开过一个调查座谈会，中心议题是对农业合作化的经验进行总结。

当时安排座谈会的同志，除安排会议上记录的同志与毛泽东坐在正面对外，其他人都是面向主席台。地委书记第一排，省委同志坐在第二排。毛泽东进来一看，便以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这不是搞‘三堂会审’吗？还是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按毛泽东的要求安排后，座谈会才开始。毛泽东亲切地问：“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接着说：“现在不按提纲发言，各人畅所欲言，一不划右派，二不扣帽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我就会上当，就会浪费时间。”

但座谈会开始后，过了十五分钟无人发言，后来发言的人也大多是一个调子，多唱赞歌。毛泽东感到不对头，便提议休会，明天再开。

会后，毛泽东对一位省委同志说：“真是可惜，时间浪费了。”又说：“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开一大时就有争论，二大、三大、四大、五大等都是如此。党魁这么讲，下面就跟着讲，人们不用自己的语言讲，而用领袖的语言讲话。所以，第一，我还是不能死掉，我还得搞一段，第二，怎么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延安整风以后，我快活了一阵子，指导思想统一，领导机构改善了，‘七大’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今天开的是重复发言的小会，耽误时间的小会。你把我的意思转王任重同志，明天开会，中心议题是否能搞生产规划，要畅所欲言。”

果然，第二天的座谈会开得很成功。毛泽东高兴他说：“好，同志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天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要看我的脸色办事。我的脸色是千变万化的，蒋介石是以不变应万变，我是以万变应蒋介石的不变的。”

“不能看眼色行事”这句话生动地概括出了调查研究的规律。调查研究应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从哪个领导人的个人意愿出发。搞好调查研究有它自身的规律，那就是要有满腔的热忱，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要有求知的渴望，要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否则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毛泽东在武汉开的两次调查座谈会，以其不同形式、不同的做法，收到不同的效果，就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明证。

“不能看眼色行事”，是流行在人民群众口头上的一句口语，但巧用口语，既通俗，又生动他说明道理，这在毛泽东的用语中是屡见不鲜的。

“ 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 ”

毛泽东根据自己的革命实践而发表的著作和讲话，总结出许多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真理，而这些著作和讲话的语言都是朴素的。

在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时，毛泽东列举了“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说：前两次因为没有做好正确的调查研究，情况不实，方法不对，所以打了败仗。后来，派人深入到祝家庄内做了正确的调查，获得了第一手真实情况，熟悉了盘陀路地形，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庆的联盟，并且部署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运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的木马计类似的方法，终于第三次打了胜仗，攻下了祝家庄。

在介绍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前做农村调查的情况时说：“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个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象他们所说‘过火’，而是必然的，必要的。因为农民太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

而在说明调查必须深入时，他曾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马蹄河畔召开过一次宣传会。会上，他开头第一句话就问大家。“同志们，你们来寻乌做调查没有？”大家回答说：“调查了！”他又问：“那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的中间，哪一类最多？”有人根据寻乌城人最爱吃豆腐、水酒（糯米甜酒）的习惯，回答说：“大概是做豆腐、水酒的多。”毛泽东笑笑说：“就算说对了，那么再说说，寻乌哪几家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水酒做得不好？”这下子可把那位同志难住了。于是，毛泽东把自己调查的结果告诉了大家，并说：大家到一个地方做调查研究是好的，但调查要深入细致，走马观花，到处只问一下，是了解不到问题的深处的。

以上事例说明要做调查研究，因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都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有了这些确实的、正确的、深入的情况，才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否则就只能是盲人骑瞎马，闭塞眼睛捉麻雀。毛泽东在说明这些真理时用的语言是朴素的。如“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哪几家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等等，用的是群众的口语，说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些许小事，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咬文嚼字。正是这些朴素的语言，却给真理插上了翅膀，很快地传遍了广大群众之中，指导了实践，推动了革命。

“只有科学是真学问。”

“只有科学是真学问”这样的话，在毛泽东的文稿中是空前绝后的，因为毛泽东历来爱看历史小说、笔记小说、哲学等书，但这句话确是毛泽东在信中对儿子说的。仅就父亲对儿子这种关系讲，自然决不是违心的话。

为了把握毛泽东这句话的艺术特色，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他给儿子的这封信。这是1941年1月31日写给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的。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清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捡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况如何？甚以为念。

实际上，毛泽东在几个子女中，已经把毛岸英视为成人，有时和他评论其他孩子的进步和优点，有时以他为中介，加强与子女们的感情交流。

从毛泽东对毛岸英的安排看，也是在毛岸英身上寄予厚望。他让岸英留苏学习，还让岸英参加土改，到工厂从事党的工作和工业生产技术工作，又去朝鲜战场经受战火的考验，等等。而毛岸英对父亲感情笃深，对父亲的话，常常当座右铭。他对父亲给自己的安排是非常认真对待的。这从他牺牲前三个月给朋友蔡博的信中可看出。他在信中说：“如果党不调动我的话，我准备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随着它的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搞出一套完整的工厂中党的工作经验来……。”在业务技术方面，他也“下决心并开始学习技术——从工具机、动力机、技工理化、工艺数字、机械制图学起。”他给自己订下了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学习计划，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攻读数理化及工程技术书籍，桌子上的书堆得象小山一样。

毛泽东为毛岸英的安排，正是建设时期所需要的经历丰富、才能全面的治国人材成长的正路。

“只有科学是真学问”，是一位领袖对自己的爱子说的肺腑之言。又是在其他场合绝无仅有的语言。在这里，毛泽东运用的是语言心理学中的“善导”，即在感情和信任的基础上，诱导对方吸取自己的意见，在肯定和支持对方的同时，启发对方的智慧和思路，以便进一步加深感情。

“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
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1926年前后，在共产党内存在着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向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

对此，毛泽东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1926年1月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发表了他的新思想：“迄今为止，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

这时，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民众问题，革命应该为了谁？什么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烈火，使之有足够的热度能够融化旧的同时又能创造出新的？

1926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开始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接着，毛泽东对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了深入而逼真的分析。

毛泽东对中产阶级作了这样的分析：“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产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毛泽东还引用北京《晨报》上的话为中产阶级画像：“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中产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跃然纸上。

他把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多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以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革命“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他们每逢年终结账

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他们“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一部分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毛泽东对这三部分人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了这样的勾勒：“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

在这篇分析性的文章里，毛泽东不是单纯地摆事实、讲道理，而是采用了类型化手法，加以刻画描绘，使之成为生动的形象，不仅可以深化、丰富所讲的道理，而且以栩栩如生的形象感，激起读者的强烈爱憎，使读者留下具体深刻的记忆。“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小资产阶级强烈的发财欲望形象毕现。“咳，又亏了！”每况愈下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状况绘形绘声。

所以，在论文中“取类型，讲道理”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一大特点。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
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重点是揭露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所以题为《实践论》。

这篇哲学著作，除以它精湛的思想、严密的论证给人以深刻教益外，还因其大量的警句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恰当的引用。如在讲概念、判断、推理的问题时，引用了《三国演义》上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然后解释说：“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

在讲到理论的重要性时，引用列宁《做什么？》中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讲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又引用了斯大林的话：“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以上警句的引用。由于引用的是经典和革命领袖的话，又引用恰当，所以论述显得少而精，既有力地阐明了道理，又加强了论述的权威性。

第二种是巧用熟语，如在讲成功与失败的关系时，文章讲：“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在讲到理论来自实践时，毛泽东批评了那些轻视实践的偏见。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在正面阐述了理论来自实践后，接着从反面指出：“‘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这里借“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说明了“秀才”与“事”，直接理论与间接理论的关系，最终肯定到头来理论还是来自实践的道理。此外毛泽东还嘲笑了那些所谓“知识里手”。他说：“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这里用了“道听途说”、“一知半解”，把脱离实践的教条主义者的两种表现反映出来。“道听途说”是说这些人既不亲自实践，又不作深入的调查，只是走马观花、偏听偏信；“一知半解”，是说他们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所以说这些人“不自量”。

文中还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明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以上这些熟语（包括成语、惯用语等）的巧用，简明生动地阐明了深奥的道理。

第三种是毛泽东独创的警句。在讲到真理标准时，用了三个警句：“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在讲到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时，用了两个警句：“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

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在谈到对待知识的正确态度时，文中写道：“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并用“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一种比喻性警句，说明了“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和“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等知识、理论和方法与实践、革命的必然联系，使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明白。

在阐述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跃进的过程时，用了人们已朗朗上口经常使用的警句：“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里仅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十六个字，就把人们的认识过程高度概括出来，造成人们争相引用、屡见不鲜的现象。

在谈到认识的能动作用时，文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接着又指出：“如果有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在谈到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时，写道：“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而在解释认识论的含义时，又写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这些精到的论述，都以简练而涵义深刻动人的句子，把人们从纷坛复杂的各种现象中引到抽象概括的理性殿堂，从而变为工作实践的准绳。

总之，《实践论》大量警句的使用，不仅帮助人们懂得了许多深奥的道理，而且大大促进了人们的普遍记忆和使用，成为人们实践活动的有力指南。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群众观点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基本观点之一。因为群众是革命的力量源泉，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胜利之本。为了真正地发动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把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写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文章在语言上的最大特色是大量采用了设问句。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他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这里一连用了五个设问句，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启发人们思考。

“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日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这是一种问而不答的设问，它有发人深省的作用。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这里采用了连问合答的设问形式，从问到答都有层层递进的意思，使论证深入，说理透彻。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这是在一段开头用的设问。

“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这是在一段结尾处用的设问。

在开头或结尾处使用设问，常常能起到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这种设问放在一段的末尾，设问后面没有回答，实则设问前面的话就是回答，最后以问的形式进一步加强了肯定的语气。

总之，这篇讲话是1931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由于运用了设问句，扣住了听众的心弦，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在设问句的运用方面，如《论持久战》，一开头便一连串地使用了设问句：“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

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

接着，在批评对抗战有急性病的意见时，又是接连使用了设问句。“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于是敌人是否进攻武汉，成为疑问了。许多人以为：‘不一定’；许多人以为：‘断不会’。这样的疑问可以牵涉到一切重大的问题。例如说：抗日力量是否够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力量已使敌人不能再进攻，还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说：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为统一战线的现时状态已够打退敌人，还要什么巩固和扩大呢？例如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工作是否还应该加紧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说：改革军队制度，改革政治制度，发展民众运动，厉行国防教育，镇压汉奸托派，发展军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是否应该认真去做呢？例如说：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和猛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

这两段的设问又不同。前者是连问总答，而总答又是正面的、非具体的回答，只是从侧面予以回答意向。后者是边问边答，只是肯定或否定，没有具体内容，但这些具体内容，却已含在前面的设问里。

总之，广泛而多类型地使用设问句，确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一大特点。

“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

“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是毛泽东在他的名著《论持久战》中引自孙子兵法上的话，并肯定这“ 仍是科学的真理 ”。这句话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它是唯物的、辩证的。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是因为唯物地把敌（彼）我（己）双方作了全面的对比，并作出辩证的分析，从而确立了它的科学地位和军事价值，同时也体现了它在语言上的特色。

首先对中日双方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矛盾着的基本点作了对比分析。

一、日本“ 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 ”

而中国“ 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 ”

二、“ 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 ”

而“ 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都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 ”

三、“ 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了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 ” 而“ 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 ”

四、“ 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

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

而“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

这样看来，“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走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其次，又对我优劣势、劣势变化趋势作了对比分析。

“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而“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这个方面，又给予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计到敌人的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在这点上，又产生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的根据，同时也将被一些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

再次，对战争形态诸如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作了辩证分析。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中，我方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但相对他说，“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而各个游击区，则“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从战争的发展看，“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

所谓有后方和无后方，是说主力军，“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游击队则“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

毛泽东在分析包围和反包围时，分为三种形式：一是“从整个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

二是“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

三是如把世界分为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这又形成了第三种包围和反包围。

此外，毛泽东在谈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时，非常辩证而生动地指出：“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了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

从以上已清楚地看出《论持久战》以其鲜明的对比，辩证的分析，体现了毛泽东语言的艺术特点。从这些语言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那些以偏概全反而认为抓住了全貌的人的嘲弄和对左翼极端分子的愤恨。他并且预言：“人类的战争时代将经过我们的努力而告结束，因此毫无疑问，我们所从事的战争是最后的战争的一部分。”

“语言无味，象个瘪三。”

毛泽东说：如果“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那末，“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喜欢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所以，毛泽东常常把这种语言形容为“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象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象一个健康的人”。而他自己的文章或演说却给我们树立了典范。如《反对党八股》的语言，就具有生动多变，新鲜活泼，简洁准确，尖锐泼辣，妙用比喻、比拟俗语、成语等特点。

文章一开始，就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比作人，说：“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而“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短短几句话，就采用了俗语、成语，还运用了比拟、借用，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关系说得非常生动形象。

接着又用层递和排比说明反对党八股的必要性：“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客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三个“如果”形成排比，但同时又是双重层递：一层是由“自己”到“第二个人”又到“许多的人”；一层是从“还不要紧”到“害人不浅”又到“问题可就大了”。三个“或”也形成排比，同时也含有层递的意思：“付油印”——“登报纸”——“印成书”。于是便得出结论：“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用了一个双重否定句，斩钉截铁，毫不含糊。

文中还运用了讽刺：“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我们为什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在谈到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时，又作了讽刺：“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象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

新鲜活泼、尖锐泼辣，也是《反对党八股》的一大语言特色。如：“说理的首先一个办法，就是重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在这里，把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比作看病，而治疗的方法却是绘形绘声，活灵活现，这种说理的方法确实新鲜活泼。再如批评某些提倡大众化的人的表现时，说：“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大天

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在这里，有如同前面用的，向病患者大喝一声“你有病呀！”这样的假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把本来未发生的事，说得仿佛真的一样。这里，还用了仿拟。如由“彻头彻尾”而仿拟出“彻里彻外”，由“大众化”仿拟出“小众化”。另外还活用词语。如“将军”本是一个述宾词组，前面曾拆为“将一军”，这里又拆为“将起军”。“化”本是一个“词缀”，这里却活用为动词。如“化一下给我看”，“仍然‘化，不了的’”。此外还用了文盲句式：……者，……之谓也。

在揭露党八股的罪状时，用语尖锐。如对党八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罪状则说：“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在讨伐第二条罪状时，则说：“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在痛斥党八股第六条罪状时，又说：“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象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象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你看，把党八股比作“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指出了党八股是什么货色，“简直是无赖”，又揭露了写党八股的人的恶劣态度，“到处害人”，则把其卑劣作法和严重后果一语道破。

活用俗语、成语也是该文的一个语言特点。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说明打倒了党八股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狼狈处境。用“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来说明文章的长短要依据内容的需要而定，不能仅仅以其长短定优劣。用“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说明党八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罪状，灵活运用俗语比直接讲道理，要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人容易明白，记忆深刻。

对于成语，在使用时，也能赋予其新义。如“对牛弹琴”，毛泽东在运用的时候就反其义而用之。他说：“‘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着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么？”另如《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使用也很新鲜、贴切。他说：有的放矢，“‘的’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区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些对成语的解释，既从概念上符合其内涵，又能密切联系眼前的现实情况，这样，既能帮助理解成语的意思，又能借以指导革命实践。

总之，正是由于毛泽东非常注意语言的艺术，所以这篇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不时引起听众的共鸣，发出阵阵笑声，使讲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毛泽东的诗词艺术

潇洒莫如毛泽东

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也是一位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中国历史悠久，各种人才崭露头角，有的长文治，有的建武功，有的擅词赋。那横槊赋诗的曹操，那“斗酒诗百篇的”李白，那高唱“大江东去”的苏轼，他们风流倜傥，曾使多少后人为之倾倒！然而他们有哪一位能象毛泽东那样兼数能于一身，既有领袖人物的博大胸怀，又有哲学家的深邃，军事家的睿智，更兼有诗人的激情和才气？

毛泽东是一位革命的实践家，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他同时又是一位豪放的浪漫诗人，在他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以诗为伴。在他一生的各个重要阶段，都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诗篇。可以说，作诗是毛泽东的一大雅兴。从学生时代开始，他每有感触，必发而为诗。当他在长沙第一师范临近毕业时，他的母亲突然病逝。巨大的亡母之痛孕就了一篇祭母文，文中那深挚的母子情足以催人泪下；1918年，送罗章龙东去日本，写一首七古，高唱“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借以抒发男儿唯有救国志的情怀；1923年，辞别爱妻杨开慧，赠一阕《贺新郎》，那“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佳句，堪称儿女情服从救国志的绝唱；1925年写成的《沁园春·长沙》，倾倒了多少中外读者。那“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忆旧，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青年时代潇洒倜傥的精神风貌。多么浪漫而有意义的学生生活，他们一群“风华正茂”的爱国学生，毕业之后住在岳麓书院。他们“身无半分钱，却忧天下事”。他们在爱晚亭、岳麓宫、禹王碑、橘子洲，议论着祖国前途，争论着救国方案。或江中游泳，或盘沙对话。凉风习习，水波助语。真是天之骄子，一代风流。他们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情态，那“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神气，历历如在眼前。

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在革命的初期艰苦岁月里，要建立革命政权，要行军打仗，要承受敌人的军事围剿和党内“左”倾路线的种种压力。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抑制不住作诗的豪情。就在艰苦的行军途中，在马背上，他也哼成了不少动人的诗篇。

1929年10月，红四军内意见不一，毛泽东暂时离开了领导岗位。当时他身体有病，便带病深入基层到地方搞土地革命斗争。在乘担架赴上杭的途中，时值仲秋，面对闽西绚丽夺目的秋色，毛泽东顿发诗兴，而作《采桑子·重阳》一词。词中唱道：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词中的秋色比春光还要美好，战地上的野菊简直令人陶醉，强劲的秋风使人无比爽快。这乐观的情绪，这积极的人生态度和高超的审美情趣，加上浓烈的诗的韵味，使这首词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

1930年1月，红四军由古田向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进发。时值隆冬，寒风刺骨，部队穿行在深山密林之中。山路崎岖，苔滑难行，行军十分困难。然

而临近武夷山区，但见山前山后，红旗招展，行进的队伍随山势蜿蜒，与峰峦起伏的武夷山交织成一幅雄伟壮阔的画面。毛泽东受此感染，即刻发而为词。他写道：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在这里，路途的险阻，行军的阵容，大自然的风光被巧妙地组成一幅富有动感而又充满了诗情的壮阔画面。这轻松的笔调，铿锵的节奏，乐观的情绪，充分显示出毛泽东在困难面前那种轻松洒脱的不凡气概。

1934年夏，中央苏区处于极其严峻的历史关头。蒋介石以百万大军围困了中央苏区，“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使红军失去了内线歼敌的可能。毛泽东被排斥在军事领导之外，心急如焚，但又无可奈何，便到部队前线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他从瑞金来到赣南的小城会昌。一天，他在破晓时分登上会昌城外的山岭之上，纵览根据地的锦绣江山和这片洒过烈士鲜血的土地，怀着深深的感情写成了《清平乐·会昌》一词：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这首词语言浅近，寓意深沉，笔调自然，风格潇洒，洋溢着极其乐观的情绪。词中一面给越战越勇、斗志永不衰竭的红军战士塑像，一面又对“风景这边独好”的红色根据地大唱赞歌。那“战士指看南粤”的特写镜头，传神而富于朝气；“更加郁郁葱葱”的远景，又是那么开阔壮观。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在身处逆境屡遭排斥的情况之下，能写出这样情绪热烈、充满了希望和乐观主义的词章，充分显示了伟大人物“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政治家的胸襟和风度。

在艰苦的长征路上，诗人的创作达到一个高峰。他的诗情宛如潮涌，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底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一气写成十篇之多，人称这是“来自长征路上和秦晋高原的绝唱”。

长征途中，万水千山，艰难险阻，难以尽数。红军战士仅凭两条腿，跋山涉水，需要付出多少代价！然而作为红军统帅的毛泽东反而喜欢大山，歌唱大山，借以抒发自己的壮志豪情。《十六字令三首》简直就是歌唱大山的组诗。词中他歌唱山的高大，山的磅礴和山的坚毅。在另一首词《念奴娇·昆仑》中，他又赞叹山的苍莽，山的雄浑和山的伟力。而在这些山的巨大形象面前，你同时看到的是站在高山之巅的“离天三尺三”的无畏战士，你听到的是“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的巨人般的声音，这一切都是毛泽东这位伟大人物巨大精神力量的具体显示和外化。

长征胜利结束，毛泽东回顾了红军一年来的长征历程，写成了一首《七律·长征》。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行程之远，牺牲之大，经历之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七律》取材于长征，但绝不是长征过程的实录。诗人对于长征路上的一切艰难和牺牲，在此统统都不提了，这里只表胜利的喜悦和对困难牺牲的蔑视。诗的内容几乎尽人皆知：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全诗轻松欢快，开头定下调子“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所以什么高山、大河，什么五岭、乌蒙，什么雪山、草地，全部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人迹罕至难于翻越的大雪山，在英雄的红军看来那才更有一番情趣，更令人开颜欢笑呢。这是多么伟大的气派，多么惊人的革命英雄主义，多么潇洒的浪漫风格！

1936年写成的《沁园春·雪》，是一篇足以代表毛泽东诗词风格的传世之作。在这首词中，他讴歌祖国大自然的壮美，评论二千年的封建历史，赞美当代的革命英雄。他那雄视大江南北的广阔视野，那纵论古今人物的宏大气魄，被人誉为千古绝唱。据说1945年《沁园春·雪》在重庆报纸上刊出以后，立即形成了一股与之唱和的风潮，步原韵填《沁园春》一时成为时髦，使得国共两党尖锐的政治斗争在文化领域里风雅化。可见诗人在词中所显示的胸襟、气魄、才思、文采多么令人震惊和敬佩！

革命成功了，无数先烈为这一伟大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毛泽东一家就有六位亲人是烈士，他的爱妻杨开慧早在三十年代就壮烈牺牲。为此1957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来悼念自己的亡妻和牺牲的战友。在这首词中，诗人不表现伤痛，只表示怀念；不表示哀悼，只现示崇敬。在他笔下，烈士无论在人间天上，处处受到尊敬；他们生前死后，永远忠于革命。这崇高的革命感情，开阔的思想境界，优美神奇的艺术想象，使这首词成了浪漫主义的代表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也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1961年，国际国内的诸多因素使中国的经济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困难局面。就在此时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答友人》，他用轻松浪漫的笔调来歌颂他的家乡湖南，进而憧憬整个中国的美好前景。这首诗写得美丽而富有感染力：“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是说沸腾的现实生活，连上古时代的两位女神都被吸引翩然来到人间。从她们的眼中来看现实世界，那是一幅高歌猛进、如火如荼、令人振奋的生动画面。由此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中国大地将是鲜花遍地，一片光辉灿烂的世界。透过这幅美丽动人的画面。我们仿佛看到毛泽东在困难面前的无比沉稳和冷静，以及永远着眼未来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

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也表现了一个诗人的特有气质。据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从1954年开始拜师学英语。1959年11月，地处南国的杭州正是三秋桂子、十里荷香的美丽时节，毛泽东来到这里，心情极佳。一日他登上北高峰，立即吟诗一首：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
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

吟罢，他打开英语课本说：“现在不冷也不热，只有学习喽。”多么高

雅的情趣，多么潇洒的人生！

又一天，他攀上莫干山，归途中他余兴未尽，便口占一绝：

翻身跃入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注：“七人房”指汽车)

吟罢，他又拿起英语课本，带着几分湖南乡音开始了外文朗读。此时此刻，领袖的情怀与这大好江山溶为一体，形成了一幅“江山伟人”的特写画面。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毛泽东为国家建设奔波操劳，足迹遍及大河上下，长江南北。他不顾旅途劳顿，仍然以学外文为乐。在从徐州飞往南京的途中，毛泽东触景生情，在一本书的边页上写下元人萨都刺的《彭城怀古》：“楚歌八千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回首荒城斜日，倚阑目送飞鸿。”写完，请老师教 English。待返回途中飞临镇江上空时，毛泽东即兴写下辛弃疾的词：“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豪情抒尽，再铿锵有声，学读英语。

1975年春天，一个明媚的日子，来了一位给毛泽东诊治眼疾的大夫。毛泽东与之握手寒暄，问对方姓名。对方回答：“唐由之。”不料一个名字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从“由之”联想到鲁迅先生一首悼念杨铨的诗，接着便吟诵起来：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那时毛泽东已双目失明，发声也不清晰，但却吟得抑扬顿挫、极富有感情。他一字不漏地背下这首诗，使在场的专家们惊叹不已。足见他诗词功底之深。

这年八月，医疗组为毛泽东做眼的白内障摘除手术。就要上手术台了，他叫服务人员放一曲岳飞的《满江红》。这是一首尽人皆知的名曲：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那强烈的爱国激情，豪放的风格，高亢激越的音调，谁听了之后都会受到强烈感染。毛泽东一向喜欢这支曲子，此时他伴随着这雄壮昂扬、令人热血沸腾的歌曲，迈着蹒跚的步子走进了手术室。他神情从容而镇定，但别人无从猜测，听着这样一支曲子，他在想什么呢？是借这支名曲抒发自己壮志凌云的豪情，还是表达对一切满怀信心的态度？是要表现一向对疾病的超然态度，还是要体现“关公疗毒”式的无畏精神？是为了驱逐一下紧张的气氛，还是有意增加一些壮烈色彩？当然别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大家共同感觉到的，那就是象他这样一个内心世界极为丰富而又具强烈诗人气质的人，处处都显示出高雅的艺术情趣和脱俗的精神境界。

直到1976年5、6月间毛泽东去世前夕，他还在用微弱的声音一字一顿

地吟诵南北朝著名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好象仍在抒发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伟大情怀。

一代伟人离我们而去了，今天我们循着他的人生足迹，领略他留下的一首首动人的诗篇，一种不受任何桎梏的约束，能够迎战任何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和一种不同流俗的艺术魅力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位读者。我们不禁发出这样的赞叹：千古绝唱第一人，潇洒莫如毛泽东。

千古绝唱第一人

毛泽东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更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和艺术家。凡是读过他的诗词的人，无不为他那丰富的想象、宏大的气魄、昂扬的激情而叹服！他那支如椽的大笔又颇具雄风，笔力所及，可以包举宇宙、震荡山河，读后使人心潮激荡，感奋不已。其艺术魅力，简直冠绝今古。

《沁园春·雪》一开头便气度不凡：“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毛主席从大处落墨，仅十二字就涉及了半个中国。“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在诗人的视野内，华北大地，笼罩在一派茫茫纷飞的大雪之中，雄伟的长城，隐去了它那不凡的身影，奔腾咆哮的黄河，一下失去了滚滚的浪涛。大地是千里冰封，空中是万里雪飘。诗人的目光从南望到北，从东望到西，北国风光尽收眼底，万里江山！一览无余。这是何等的眼光，何等的气魄，何等的笔力啊！“山舞银蛇，原驰腊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大雪覆盖下的蜿蜒群山，犹如飞舞的银蛇，高低起伏的秦晋高原，宛若一群奔腾的腊象。远远望去，群山高原与天相接，要同天公比比高低。这些本是毫无生气的静物，诗人却赋予它们以顽强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竞争意识。雪景中的山川，是如此的生动，如此的壮阔。然而诗人意犹未尽，他又发挥了自己独特的想象，以充满浪漫主义的笔调写道：“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意思是，等到雪霁天晴，你再看这大地，红艳艳的阳光照在白皑皑的雪地上，好象一个红装素裹的少女，那才格外娇美动人呢。诗人笔下的中华大地，是片多么雄奇壮美的江山！在这样的国土上，孕育繁衍的当是不凡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岂能任人宰割与欺侮！很明显，毛泽东在词中大笔绘景，目的在于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抒发极其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在时值日寇陷我东北，占我华北，妄图鲸吞整个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的1936年，毛泽东代整个民族发出这样的最强音，确实起到振奋人心、激发民族意识的巨大作用。作为一名中国人，读到这样的词章，能不为之起舞、热血沸腾，誓与敌寇血战到底么？

古人咏雪的诗句也不少见，如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算来也是一首为人称道的好诗。诗人写道：“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诗句通俗，形象鲜明，呈现在读者眼前的雪景是素雅而美丽的。那挂满枝头的雪串，宛如一片片雪白的梨花，煞是赏心悦目。不过读后细细品味，并无其它深的意蕴。“瀚海阑杆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诗人笔下那天色气候是阴沉压抑的，惨淡愁苦的，不仅未能给人以豪爽雄浑之感，反而使人感到边塞军旅生活的苦涩。宋人卢梅坡的两首《雪梅》诗也有佳句，如“有梅无诗不精神，有雪无梅俗了人”，“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虽然构思新颖，玲珑雅致，但在诗词艺术的画廊中，只能算作小摆设，实在算不得上品，而在构思立意，气魄力度上就更无法与毛泽东的咏雪词相媲美了。

再如《念奴娇·昆仑》一词，诗人描写的对象是昆仑山。昆仑山是我国最大的山脉之一。它横跨西北三省，东西长达五千华里，海拔七千多公尺。对于这样一个超然大物，诗人避开俗笔，舍弃一般的形貌描写，只赋予其人格，突出其神韵。开篇写道：“横空出世”，虽只四字，却是神来之笔，它十分传神地写出昆仑山横亘天际，昂首世外，超脱人寰的不凡气概。接着写：“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一个“莽”字，不仅勾勒出昆仑山的高大躯体，

而且赋予它粗莽的性格。下面再历数它的粗莽行为：“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作者笔下的昆仑山，犹如一个喜欢恶作剧的莽汉，经常生出祸端。然而对于它的功过，千百年来，竟从未有人评说过。

接下去，毛泽东以气吞六合的气概，声震寰宇的威势对昆仑山发话：“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至此，我们如同听到一位屹立苍穹的巨人以凌驾一切的态度对昆仑山发话，昆仑山也被当作有知觉有灵感的東西。诗人就是这样通过一种新奇的想象来展示一个革命者的崇高理想：把高寒积雪的昆仑山裁为三截，分置世界各洲，使环球凉热均等。这里有诗人的奇伟想象和形象化了的夸张，然而读后却丝毫没有虚幻、荒诞之感。相反，它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革命家在言志抒怀。这首词写于1935年10月，这时正值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身处长征路上的毛泽东，能够借描写昆仑山的磅礴形象，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奇伟联想，抒发自己彻底改造中国与世界、埋葬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和理想，真正显示了领袖人物预知未来的胆识和不凡气概。

毛泽东诗词气魄之大是人所共知共赏的。打开《毛主席诗词》，处处是力拔山河的警句和佳篇。《满江红·和郭沫若》开头写道：“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地球相对于人类本来很大，但放在银河系中，简直成了沧海一粟。地球尚且微不足道，那么地球上的几只碰壁苍蝇就更不值一提了。作者以此表示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厌恶与藐视。《七律二首·送瘟神》，诗人又发挥了奇妙的想象，把地球写得很大很大，大得“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诗人描写大山，有时把山写得十分高大险峻，高得“离天三尺三”，险峻得如同“倒海翻江掀巨澜”；有时又把大山写得微不足道。比如连绵起伏的五岭，诗人认为只不过象轻轻翻腾的微波细浪；气势磅礴的乌蒙山，犹如小小的泥丸在移动。写法虽然不同，而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突出与反衬红军战士摧坚历险，藐视困难的大无畏精神。所以这种艺术化了的夸大或缩小，绝不单纯是个技巧问题，它是诗人那巨人般的眼光、伟大的襟怀、英雄的胆略和气魄的自然表露。美国作家特里尔认为，毛泽东是一位“狂放的浪漫主义诗人”，此话说得一点也不夸张。

提到狂放，人们会立刻想到词坛上的“豪放派”，想到苏东坡和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确实，一句“大江东去”，音节高亢，景象开阔，给人以大气磅礴之感。难怪宋人俞文豹说：“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然而这样好的开头，紧接下来的后半句却是“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流露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感。“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词人不愧为大手笔，他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大江壮流图。你看，岸石错乱，直插云端，波涛如惊，狂奔咆哮，雪团似的浪花，上下翻滚。那场面，那气氛，仿佛就是赤壁大战在进行，众多的英雄人物在运兵。然而，词人在进行了一番“故国神游”之后，最后发出的却是“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沉重感慨。那意思是：江山依旧，人事无情，自己虽有周瑜那样的风流才华，却没有那样的机会以展雄图。词人的坎坷一生，词中无不处处打上深深的印记。尽管历代评家对这首词甚为欣赏，把它当作豪放派词的代表作，说它意境高远，气势磅礴，格调雄浑。然而读后在产生美感的同时，总有一种英雄失路的悲

凉和愁苦梗在心间，不管词中的景物写得何等壮阔，读者的情绪却并不能真正豪放起来。

另一位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他写的大部分是以爱国抗金为内容的“壮词”。一首《破阵子》，那气势确实不凡：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词人以酣畅淋漓的笔触，极力铺写阅兵练武的场面，展示了抗金部队的军容军威，也抒发了词人抗敌御侮的豪迈情怀，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壮词。然而到了最后一句，却出人意料地陡然转笔：“可怜白发生”——朝廷昏庸，词人报国无路；岁月流逝，抗金杀敌终成虚话。仅此五字，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失望沉痛至极。前面的内容给人带来的抗金胜利指日可待、马到成功的喜悦和鼓舞，至此消失殆尽。而辛弃疾的词内容大致都有这样的特点。所以辛词虽是“壮词”，但只能称得上悲壮，给人的感觉也是豪放不起来的。

正因此，柳亚子先生在和毛泽东的《沁园春》一词中曾这样高度评价与赞扬毛泽东的诗词：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大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他认为毛泽东才华横溢，是古代任何词家所无法与之相比的。苏东坡的词虽然气魄豪迈，但还是不如毛泽东。宋代另一位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只会词中发发牢骚。至于满族词人纳兰容若，他仅会雕饰一下词句而已，就更不值一提了。只有毛泽东才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词人。应该说，评价还是很有见地的。当然，苏轼也好，辛弃疾也好，他们的遭遇是一个时代悲剧。他们个人无力与一个朝廷政府相抗衡。他们报国无门，心中委屈，在词中舒舒自己的胸中郁气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险恶的环境可以窒息吞噬一个人，也可以锻炼造就一个人。中国革命造就了非凡的领袖人物，也造就了毛泽东这样的伟大诗人。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曾出现两次高峰，一次是长征前后，一次是六十年代，无一不是党的危险和艰难时期。他本人的人生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多次经历过困难与危险，压抑和苦闷，但是他始终以乐观主义精神面对人间坎坷，坚信光明终会代替黑暗。他写出的诗词都是激荡人心的，催人奋进的，给人以力量和鼓舞的，这正是毛泽东与常人的不同之处，也是他诗词的勉力之所在。

毛泽东的诗词，气势博大恢宏，有一泻千里之势，给人以壮美的感受，这是人们对毛主席诗词的共同评价。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能在诗词中显示如此巨大的豪气和魄力？对此姚雪垠曾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见解。他说：“毛泽东同志一身兼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诗人。他身上的这几个特点是统一的。如果没有前几个伟大作为条件，他不可能写出光辉夺目的革命诗篇。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由他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成的革命乐观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

人格，以及蓄积于胸中的革命激情，喷发而为诗，加上他对诗词艺术有深厚修养兼有天赋的过人才华，所以能写出光辉夺目的诗词。”确实，毛泽东的诗词不同于任何文人笔下的作品，也不隶属于文坛上那一个流派。它是一个领袖人物在革命过程中的抒情言志，是在一种新的思想基础上把豪放派的词加以发扬光大的结晶。应该说，毛泽东是中国大地上产生的伟大的诗词大家，可算是千古绝唱第一人。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古代文化，在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方面，毛泽东有着非常精辟的见解和论述。对古代文化遗产，他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发展和创造我们民族的新文化。在如何“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的问题上，他又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東西了。”在这方面，毛泽东身体力行，为我们作出了光辉榜样。他本人在古典文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又精通韵律，长于歌赋，他写的诗和词一律采用旧形式，而反映的却是崭新的革命内容。他写出的那一首首充满革命豪情的壮丽诗篇，已是誉满海内外，家传而户诵，成了人人称颂的艺术珍品。

旧体诗讲究太多，形式要求严格，并不怎么好写。然而毛泽东写起来却是那么得心应手，每每成为佳作名篇。细心研读他的诗作就会发现，诗人在利用旧形式表达新内容方面，有着十分精到之处。本文仅就诗人灵活用典及旧章句方面谈一点粗浅认识。

一、活用典故，推陈出新。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是一首篇幅短小内容精湛的好词：

颜斄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仅仅四十二字，便包举了中国社会从古到今的各种矛盾斗争，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解决，终于开辟了新纪元的丰富历史内容。词的首句“颜斄齐王各命前”是引用的一个历史典故。据《战国策》记载：齐宣王召见处士颜斄，颜斄进来后不肯主动靠近齐宣王。宣王命令说：“颜斄，到我眼前来！”颜斄站住依然不动，并很强硬地对齐宣王说：“还是大王你到我这边来吧。”齐宣王听后大出意外，十分尴尬。颜斄就发议论说：“如果我主动向您靠近，那说明我是仰慕大王的权势，会有趋炎附势之嫌；如果大王屈尊主动向我迎来，那就意味着大王礼贤下士，主动接近士人。两相比较，还是大王主动靠近我对您更有利些。”这则故事塑造了一个在权势面前有一副凛然傲骨的处士形象。毛泽东同志用这个典故大有深意：柳亚子先生是一位民主革命斗士，一生曾为革命奔走呼号，很有点革命者的硬骨头精神。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委员，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分歧很大。1941年11月，因谴责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此处用典，诗人意在赞誉柳亚子正义耿介、不屈从邪恶势力的高贵品格。毛泽东运用旧诗词旧掌故，抒发的却是最新时代的感受：他一方面歌颂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一方面肯定了民主人士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真乃是鼓舞人心，抚慰人心，堪称一首时代的颂歌，古为今用的典范。

《水调歌头·游泳》是一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颂歌。开头一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是作者化用了民谣和典故点明自己的行踪。对于“长沙水”和“武昌鱼”，诗人自注说：“长沙水，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长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

沙井’。武昌鱼：三国时孙皓一度从建业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及其他富裕阶级不悦，反对迁都，选作口号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现在变了，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毛泽东把这两句改造成“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在这里“长沙水”‘武昌鱼’代指长沙和武汉。旧的典故一经毛主席翻新活用，不仅表明了作者自己的行踪，而且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意思，读来亲切自然，意趣横生。一方面饱含了毛泽东对这两个城市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各地视察、奔波劳顿、席不暇暖的辛苦情景，为全词歌颂新中国的快节奏的巨大发展变化奠定了基调。

二、化用旧句，古为今用。

《贺新郎·读史》是一首以历史为题材的词章。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历史观，就是阶级斗争的观点。他曾明确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贺新郎·读史》可以说就是这番理论的形象化写照。词的上阕从人类的起源写到原始社会，再写到阶级社会，再写到伴随着阶级的出现，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写到这里作者化用了杜牧的诗句，他写道：“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野血。”意思是由于不断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那种杀人盈野、流血漂杵、堆尸如山的大规模的战争在历史上时有发生，而和平宁静的社会生活和和谐的人间关系从此不复存在，故而说“人世难逢开口笑”。杜牧的原句是“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他抒发的是个人在世态炎凉中失意寡欢的感受，而毛泽东将“尘世”改为“人世”，仅作一字之变，便包括进了整个社会，他在此感慨的便成了整个人类的历史悲剧。从一字一句的运用中可看出毛泽东同志的艺术眼光和表现功力，也可看出他在诗词创作中旧意翻新、古为今用的高明之处。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仅这一首诗中就有多处活用或反用古人诗句或成语的地方。“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其中的“穷寇”是指无路可走的敌人。我国古代的《孙子·军争》中说：“穷寇勿迫”，意在免其“物极必反”。毛泽东是一代军事家、战略家，他以军事统帅的眼光，针对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具体形势，毫不犹豫地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就是说对处于穷途末路的敌人，绝不姑息，不手软，要乘胜追击，彻底消灭，不图虚名，不留后患，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彻底革命的立场和气魄，作为诗词用句，在此却是反用军事家的名言论断，显示了毛泽东的独特见解和军事睿智。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第一句是借用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句子。原句是，“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意思是魏明帝强迁汉铸金铜仙人，当从长安东去时，只有路旁衰败的兰花为它送行。此情此景连苍天也要为之伤感而衰老。诗中借金铜仙人迁离长安的历史故事，抒发作者离开京都长安的悲思，表现的是作者个人政治上的失意情绪。此处毛泽东旧句援引，而赋予的却是崭新的革命内容。诗人把蒋介石的血腥统治带来的天怒人怨，通过这样一句古诗旧句极为形象准确地表达了出来，很自然地得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正确结论，堪称旧瓶装新酒的妙用。

后句“人间正道是沧桑”，其中“沧桑”一词，是成语“沧海桑田”的简化缩用。《神仙传》中有“东海三为桑田”的传说，意谓人间变化之巨令人莫测，故而“沧桑”一词也就带有伤感的味道，即所谓“不胜沧桑之感”。但到了毛泽东笔下，“沧桑”一词立刻来了个“沧桑”之变，一下获得了新

的生命，由一个带有没落伤感意味的成语一下变为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正常变革的代名词，成了表现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艺术形象。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开头几句是“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其中“枯木朽株”语出西汉司马相如的《谏猎疏》：“枯木朽株尽为害矣。”（《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这里反其意而用之。遵郭沫若解，“白云山头云欲立”，“枯木朽株齐努力”，皆为拟人手法，是诗人移情于景，主观感情的外化。意谓在我军包围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时候，敌人奔逃，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青山白云，枯木朽株，都具有了能动性，发挥了帮助我军反对敌军的作用。这就将苏区军民万众一心、同仇敌汽、众志成城的民心所向极其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这里化腐朽为神奇，堪称古为今用的典范。

三、运用神话，服务现实。

中国的神话传说是多姿多采的，在毛泽东的诗词中运用神话，点石为金，服务现实的地方，也比比皆是。比如牛郎、嫦娥、吴刚、娥皇、女英、共工等等，在他的诗词中多有出现，使他的诗词优美动人，美不胜收。而最突出的要算是对《西游记》神话情节的妙用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是诗人于1961年11月写成的运用神话故事明确针对现实的政治诗篇。郭沫若的原诗是：

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的和作：

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郭沫若的原诗也好，毛泽东的和诗也好，他们都是借《西游记》的戏剧情节、神话故事，而针对当时国际上的大气候（国际共产主义面临修正主义的新挑战）而进行创作的，只不过两人在政治眼光和艺术洞察力方面有着高下之分罢了。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他和众多的观众一样，对愚僧唐三藏那种人妖不分，事非莫辨，屡次受骗，屡次上当，对悟空惩戒过分的作法极为愤慨，认为这种人“对敌慈悲对友刁”，不千刀万剐不足以解心头之恨。而毛泽东则不然，他棋高一着，认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意思是唐僧虽然是个愚钝糊涂之人，但总属可教育的中间派，而妖怪白骨精才是应当全力对付重点打击的对象。在这首诗中，毛泽东以一个清醒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所特有的眼光，对近百年来的国际共运史及其发展前景进行了极为精当的艺术概括，并号召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与现代修正主义这股妖雾作坚决的斗争。全诗将神话故事与现实的反修个争巧

妙地结合起来，使戏剧情节与政治风云丝丝入扣，喻比贴切，醒人耳目，给人以启发、导引以及艺术上的品味和享受，足称为点石为金、推陈出新的高手。

在诗词中喜欢大量用典，当推南宋的辛弃疾。他的语言大量熔铸成语，经史子集，驱使笔端，使他的作品显得典雅古奥，意蕴无限。但从另一面，若用典不当或用得过滥就会因典害意，使得诗句生涩疙瘩，令读者艰于理解，望诗兴叹。象柳亚子的《感事呈毛主席》就给人这样的感觉。而毛泽东运用典故、援引成句总显得那么自然贴切，焕发新意，读来如行云流水，读后余味无穷。

古典诗词经过了盛唐的鼎盛和宋代的辉煌，随着历史的发展演进也已到了尾声阶段。如今能够发挥雅兴、挥笔赋一首旧诗词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为数不多了。而毛泽东却能立足于文坛之外，挥洒他那如椽大笔，写出了一百首旧形式新内容的光辉诗篇，恰到好处地歌颂时代内容，填补了当代文坛的一项空白，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确实令人惊叹于他那超凡脱俗的艺术才华。

都是昔日文人艺，功在灵巧变化中

无论什么艺术品，都存在内容和形式的结合问题。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是：“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毛泽东本人极好地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诗词作品，不但有极强的政治思想内容，而且极力追求艺术形式上尽可能的完美。这里不想对他的诗词的表现形式作全面系统的探讨，只想通过几个实例，来说明他利用前人运用过的艺术方法，使自己的作品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达到极完美的程度，取得极大的成就，堪为我们的榜样。这对在艺术领域里制造“假冒产品”的所谓艺术家，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毛泽东极讲究结构顺序。顺序而叙，自然成章。因为凡事都有个始末，有个来龙去脉。他的作品都是思路清晰、层次分明的。所以，读他的文章、诗词，都觉得条理分明，易于理解和把握。

如《七律·长征》，依照红军长征的路线，先后顺序极为清楚。首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表现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总括一句，点明题旨，统领全诗。这是著文作诗常用的方法。其余颔联、颈联、尾联便是依照红军长征的实际顺序而叙。红军从江西的瑞金出发，经过了绵延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之间的五岭山脉，胜利地冲出了敌人层层包围圈。又经过了横亘贵州、云南之间的乌蒙山脉，然后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最后翻越长年积雪的岷山。就这样翻千山，过万水，历尽艰险，冲破敌人堵截，摆脱了敌人围追，跋涉二万五千里，完成了中外历史上闻所未闻的长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壮举，奠基陕北。这样结构全诗，即使初具现代历史知识的小学生，也不难理解。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源于生活的，只要作者忠于生活，依生活的原型作基础，再予以艺术的加工，便不难创作出条理分明、层次清楚的艺术品。长征所经历的山，绝不止“五岭”、“乌蒙”；水，也绝不止“金沙”、“大渡”，选取典型而已。但是，这先后的顺序，却是现实的真实，不好艺术改造的。

诗以情为灵魂，如果说叙事是画龙的话，那抒情便是点睛。而《长征》全诗，依据生活的真实顺序叙述，又基本上是白描手法，诗人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呢？

毛泽东的处理，是很富艺术才能的。他先用开首一联，统领全诗，“不怕”、“只等闲”已显示出红军的无畏的英雄气概，而后把“腾（细浪）”、“走（泥丸）”、“（云崖）暖”、“（铁索）寒”、“喜”、“开颜”这些极富感情色彩的词嵌在各句里，极充分地表现出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千古杰作，就是这样来源于生活，经过诗人的艺术再创造，而高于生活的。

记叙、议论、描写、抒情、说明，是诗文表情达意最基本、最普通、利用率最高的几种表现方法。创作各种文体的作品，都要用这些表现方法，只是因文体不同而各有所侧重罢了。如果一篇文章里，同时用这几种方法，必须做到恰当，并依据文体的不同，摆正它们的位置。如记叙文要以事感人，

所以应以记叙描写为主，杂以抒情议论等；议论文要以理服人，所以应以议论说明为主，杂以记叙抒情等；说明文要以知识教人，所以应以解说为主，有时也可有记叙和描写；唯诗最难，要以情感人，当然要以抒情为主，配以记叙，而在诗中议论、说明可就更不易了，因为议论说明都用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便是逻辑思维，而诗是要形象思维的。

毛泽东运用这几种表现手法于诗词创作中，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才能。如《七律·到韶山》便恰当而巧妙地运用了记叙、抒情、议论、说明等五种手法。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从眼前落笔，交代时间和地点，是记叙。

既交代写这首诗的时间，也说明诗人离开故园的时间之长，又是说明。

“红旗卷起农奴就，黑手高悬霸主鞭。”

宕远一笔，倒叙既往，忆往昔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无疑是记叙。自然也是描写。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这就是明显的议论了。这联议论大概含有三层意思：一是说革命先烈们为人民的利益献身，就比泰山还重；为革命捐躯，就是死得其所；二是说先烈的战友们，同样为了人民的利益，从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终于埋葬了旧中国，建设起新中国；三是说革命的代代接班人，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完成他们的未竟之业，为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使革命不断前进，日月常新。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从内容上看，紧承上联，是抒情，方法上是描写。毛泽东热烈地赞扬昔日的农奴和他们的后辈们，绘出韶山的丰收景象，他们的事业也是英雄的事业。他们身处农业战线，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英雄。毛泽东亲眼看到事业兴旺，后继有人，怎能不无限欣喜啊！内容上有严密的逻辑性，形式上，作为尾联，以描写现实景象作结，正好与首联呼应，结构完整而严密。

情景交融，虚实结合，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也是表情达意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文生于情，情生于文，情景相生。作为诗歌，景不传情，无情味；情不含景，无诗味。毛主席的诗词，就能使二者自然地水乳交融起来。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他的诗词，总是要表达政治抱负，抒发革命情怀，但这抱负和情怀，却不是象在散文里那样直说，而是把这壮志豪情溶在生动的形象里，溶在诗里行间，象泉水汨汨而出，涓涓流淌，有形，有色，有声，有情，形色俱备，声情并茂。如《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

这里写景。故友重逢，重游岳麓山，极目远眺，碧水荡漾，重峦叠嶂，近水远山，空蒙飘逸。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欣喜之情，也从字里行间自然溢出。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继续写景。不过是由小而大，由眼前而联想到全国。把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景（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平原到山区都蓬勃发展）尽收眼底，并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情怀和气魄，溶进了这壮丽的山水之中。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

再宕开一笔。毛泽东把眼前、中国的情景，与世界的革命风云连接起来，高瞻远瞩，恢宏旷达。这哪里是站在岳麓山上，这简直是站在地球之巅。虽是想象，但全是形象，毫不枯燥。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字面上是感叹（韶华易逝），是抒情，但这情中又含景。1955年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信时，已离别将近三十年，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三十年后，又回到农民问题上来。前者毛泽东曾预言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是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起而革命的画图。现在毛泽东又展现出一幅崭新的图画：五亿农民展开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而且更加波澜壮阔，激动人心。前者是推翻三座大山，砸烂旧世界，求解放；后者是建设新世界，从事前人从没干过的事业，创造新生活，因而意义更加伟大。

写景壮阔秀丽，抒情则酣畅淋漓。诗情画意，锤字练句，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整首诗，从首联到尾联，如行云流水，情源于心，而溢于字里行间，有虚有实，虚实结合，艺术上显示出极深的造诣。

即使在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里常用的一种方法——对比，毛泽东也顺手拈来，为我所用，而且是灵活变化，高人一筹。

《七律二首·送瘟神》，第一首写旧社会，山河枉自多娇，鬼魅唱歌，人民哀号。而第二首写新社会，则是春风杨柳，六亿神州，遍地舜尧。人民群众在旧社会，受压榨，遭蹂躏，人变成鬼；在新社会，翻身当主人，在一穷二白的纸上描绘最新最美的画图。多么鲜明的对比！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尽在不言之中。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这首词，上半阕写旧社会的黑暗，人民不得团圆；下半阕写新中国的诞生，无限光明，人民五亿，团结如大家庭，也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则又不同，它是上半阕写两个形象的鲜明对比：一个是鲲鹏展翅，扶摇九万里，俯视人间，不动声色，内存伟力；另一个是蓬间雀，被“炮火连天”吓破了胆，惊呼哀号。由这种鲜明形象的对比，突出了我们与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看待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人民群众的作用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

毛泽东善于创造，绝不受旧传统的束缚，表现在写作方法上也如此。

《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的结构，就很特别。农民由不堪受压迫，而同仇敌忾，而暴动，而进军，建立根据地，是生活真实的顺序。毛泽东没按这个顺序，既不是顺叙，可也不是倒叙：先写暴动，然后由受压迫，而起义，而进军，而建立根据地。而是从“工农革命”落笔，接着写这支革命军队的进军，下半阕才从受压迫写起。

这样写的好处在于，从内容方面看，这样写突出了“八七”会议确定的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突出了“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的思想，还突出了毛泽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从表达方式上看，首先突出这支队伍的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旗号”，色彩鲜艳，格外耀眼，有无尽的象征意义，内涵极为丰富。毛泽东向来实事求是，一切讲求实效，不拘泥于形式，此即一例。

这首词的表现方法，既不是顺叙，又不是倒叙，可称之为逆挽。《采桑

子·重阳》的结构与《西江月·秋收起义》的结构类似，较特别。而《忆秦娥·娄山关》一词的结构也是这样的。

毛泽东作诗填词，所用的表现方法，虽然古人都用过，只是这些方法到了他手里，用得更灵活多样。这可以举出许多例证，而且也极具特色。如《卜算子·咏梅》所用的就是“婉转法”。通首词全是具体形象，但借事托情，委曲婉转，表达的却是庄严重大的主题。

久有凌云志，豪情冠古今

“诗言志”是为诗歌下的最早的走义。“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大序》）把“志”解释成“抱负”、“胸怀”。其实，“志”有更广泛的含意。《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郑注《尚书》把“志”解释为“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意，即“意识也”（《礼记》）。这样“志”既是“抱负”、“胸怀”，又是情感等。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而“心之官则思”，所以，“志”，不仅包括“抱负”、“胸怀”、“感情”，而且还包括着人的一切心灵世界的东西，诸如喜、怒、哀、乐、忧、思、恐等七情六欲。至于“志”、“声”、“律”之间的关系，郭沫若同志解释为：“诗之朗诵乃吟咏（即咏）心声，声调仍依吟咏而抑扬顿挫，韵律使得声调和谐统一。”这便是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并且说明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情动于中而形于百；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较为恰当地说明诗歌的创作过程，较好地说明了诗歌与音乐、舞蹈的关系。

孔子主张“诗教”，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鲁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即诗可以“观风俗之盛衰”，可以使人们“群居相切磋”，可以“刺上政”。这就较全面地概括了诗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效果。当然，他们的阶级、时代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争时期，他戎马倥偬，出入于枪林弹雨；建设时期，他日理万机，走遍大江南北。万般辛苦之中，他也进行诗歌创作，而且取得极为出色的成就，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热爱与赞美。革命家加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他作为革命诗人，其诗词写景、咏物、抒情；而作为革命家、人民领袖，其作品仍以“言志”为主，写景、咏物、抒情，都是为“言志”，即艺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揭露丑恶现象服务。他以革命家的壮怀和诗人的热情，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幅幅波澜壮阔、绚丽多姿、光彩照人的画卷。从这包举千古、万代不朽的画卷里看到革命家的壮志，也感受到诗人的豪情，受到教育，获得力量，受到鼓舞。

极高的理论修养和艺术造诣，使他“言志”的形式也是灵活多样的。

表壮志

即表理想，而且这抱负，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越来越远大，越来越高。由“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到要主祖国命运的沉浮，到“霹雳一声暴动”到“分田分地真忙”，到“何时缚住苍龙？”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主席正是以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激励自己，又鼓舞同志们不断革命、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

显气质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是战胜中外敌人的百万雄师的伟大统帅。“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颂彭德怀是能“运筹帷幄”的战略家，是“挽狂澜于既倒”的战术家，是“与士兵同滋味而共甘苦”的良将，从其诗词中，更鲜明地看到一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雄才大略、指挥若定、危艰时表现出轻松、豁达、潇洒自如、充满必胜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诗人领袖的形象，看到一位既善统兵，又善用将的统帅形象。“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横扫千军如卷席”，“百万雄师过大江”，表现他是千军万马的统帅和战无不胜的军事家。“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更显出他在“沧海横流”的国际阶级斗争中的“英雄本色”！他既领导了新中国的创建，又领导了新中国的建设。

他懂政治，懂军事，懂经济，懂历史，懂艺术，懂书法，等等，而且都达到极高的造诣，这便是毛泽东的领袖气质。

现精神

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

人无精神，便如槁木；文无精神，便如死灰；诗无精神，便如呻吟。诗缺少神气，就象画日月而无光彩。毛主席的诗词读来似平易，但平易中却英气勃勃，精神焕发。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梅花作为一个报春者，无非在告诉大家一个自然的规律，“悬崖百丈冰”的严冬过后，必定是“山花烂漫”的春天，并且以此为满足。这多么清楚而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先行者与公仆的精神，艰险危难中坚定不移，奋不顾身，转危为安的斗争精神；在危难中看到光明，提高勇气，为理想而百折不挠的乐观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永照千秋！

抒豪情

有情，是诗的灵魂；无情，就不是诗。而这情，既有儿女私情，也有英雄的豪情。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革命人民的导师，又是做人的楷模，所以，他诗词的豪情，真可充宇宙，溢四海，感天地而泣鬼神。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是要消灭一切反动派，并战而必胜的豪情；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继往开来，事业长在的豪情；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是无私无畏，英勇奋斗，分秒必争的豪情；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是不断革命，不畏艰难，勇攀共产主义高峰的豪情！

正是这壮志豪情，才感天动地，给人以极大的感召力量，催人奋进！

展胸怀

毛泽东的胸怀，旷，能容寰宇；达，可贯古今。心胸开阔，能纳百川。

“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舍却贤妻爱子，是何等宽广的胸怀！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联想毛泽东投身革命，先后献出六位亲人的生命，而到暮年，所想的还是“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心里装的，只有革命，只有人民，只有共产主义事业，唯独没有他自己，又是何等无私的胸怀！

毛泽东的胸怀，象海一样宽广，象日月一样光明。他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衷心的爱戴！

阔眼界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战略家；他为今天而操劳，又为未来而献身，所以，他的眼界开阔而远大。

“长夜难明赤县天”，“一唱雄鸡天下白”，看到的是祖国的今昔；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关注的是变幻的世界风云；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高瞻远瞩的是宇宙；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是回忆苦难的过去；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漏瀑流水，高路人云端”，是写“旧貌变新颜”的今天；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是憧憬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

其眼界之开阔，真可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试想，古今中外，有哪一位领袖人物，眼界如此宽广而高远？又有哪一位诗人的思想如此活跃而光彩照人？

表情操

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培养高尚的情操，是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端正党风民风，净化人的思想境界的极为重要的措施。毛泽东主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做好事；“拒腐蚀，永不沾”，防修防变，只求奉献，不求名利，永葆革命青春；“要学习”，戒骄戒躁，思想常新；要自立更生，艰苦奋斗，“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无私无畏，反帝反霸；要有坚强的纪律，统一的意志；要又红又专，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发扬主人翁精神；要“能分析”，多点辩证法；要团结，顾大局；要志坚如松，不屈不挠；要心如霜雪，清正廉洁，等等。并为我们树立了许多堪称万代楷模的光辉榜样：刘胡兰、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王铁人、焦裕禄、“好八连”等等。尤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是，这些英雄模范人物所具备的崇高品质，在毛泽东个人身上都有着完美的表现，得到极和谐的统一，堪称名符其实的“万世师表”！试想，他的一生，有哪一言，哪一行，哪一思，哪一想，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奉献呢？他正是作为导师，培养、造就、教育、影响了一代和几代人，使我们无敌于天下，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的诗词平易朴实，又雄伟瑰丽，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真

实写照，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理论家、革命家、军事家、艺术家自身的真实写照，还是他在各个历史阶段思想抱负的不朽丰碑！

毛泽东发之于情，形之于诗，驰骋于古今中外，风格独具，当代诗坛，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他不愧是一位独领风骚的诗人！

对于毛泽东诗词的成就，郭沫若曾作过详尽的评价。郭沫若是开一代诗风的著名诗人，是“五四”以来的诗坛泰斗，他说：“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伟大的作家、诗人。他的理论文章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一样，其中包含着很多文学的成分。但是，毛泽东同志并不仅仅写作理论性的文章，他近年来正式发表了十九首诗词，更使中国的文学宝库增加了无比的财富。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而且是有点目空一切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所发表的了的诗词却使我五体投地。”

妙手着神笔，诗词如画卷

诗词必须用形象思维，通过形象表情达意，反映社会生活。所谓形象，即依据现实生活的各种现象（自然的和社会的），加以艺术的概括，所创造出来的具有一定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的具体生动的图画。

这一幅幅的图画一定要逼真。所谓逼真，是指所描绘的图画，首先要形似，象真的一样、活的一样。这样，读者看了，才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才觉得亲切、可信，才受感染。但是这图画，是经过艺术家的观察、体验、概括、创造而成的，所以，不但活象，而且有了作者的主观感情。看了这图画，便自然引起读者的喜、怒、哀、乐诸种感情的共鸣，于是去爱、去憎、去战斗、去建设。

这就要求作家诗人笔下的图画，除了真实地反映生活，做到“活象”之外，必须有气韵，即神似。这艺术的图画，惟其有了神韵，才能自然；惟其自然，才能活脱；惟其活脱，才能逼真；惟其逼真，才能感人。

这图画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既会有现实生活的多姿多态，又会有艺术的更高境界的美。这图画反映生活，又启发人们去丰富、创造更新更美的生活。它是生活的忠实的反映，也是创造新生活的力量的源泉。

既成画，又含情，成为衡量诗词或其他艺术品好坏的两个标准，也有人把二者兼备看成一种水平极高的艺术风格。如唐代诗人王维，既能诗，又善画，而且二者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后人称赞他的艺术风格，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毛泽东有着很深的艺术造诣，有着丰富的文艺理论知识和创作实践经验，诗词的功底很深，又是驾驭语言的能手。所以，在他的诗词中，有许多形象、生动的图画，象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仅举几例，与大家共赏。

江南秋景图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沁园春·长沙》）

一派秋景，宏伟、辽阔、壮丽、生机勃勃，这完全是一幅上天下地、有山有水、绚丽多彩、立体的江南秋景图。只有这无限壮阔绚丽的图画，才与下半阙抒发主宰祖国命运的豪情壮志相称。

北国雪图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沁园春·雪》）

好一派北国风光！气象雄伟、河山壮丽，大气包举，艺术境界极高。论气魄，论文采，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堪称咏雪的千古绝唱。

旧时苦难图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七律二首·送瘟神》)

千百年来，中国人民身受重重压迫，灾难深重，漫漫长夜，不见天日。形形色色的吸血鬼，却翩跹起舞，肆意嚎歌。旧社会，大好河山遭蹂躏，多少人民遭涂炭。旧社会，游手好闲的吸血鬼穷奢极欲，创造财富、创造历史的人们却被压榨，被杀戮！

武装起义图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西江月·秋收起义》)

起义的气势、季节、声威、旗号、进军等等，构成一幅雄壮的起义图。有了党的领导，革命的路线正确，农民便结束了任人宰割的命运。拿起武器，消灭敌人，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创造幸福的生活。

行军图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忆秦娥·娄山关》) 风声、雁声、马蹄声、喇叭声，霜晨，破晓，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有景有情，美丽而带几分悲壮，敏捷而势不可挡。既精炼，又形象，艺术手法非常高明。万山丛中，拥动着一股铁流。

激烈战斗图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这是一个震天动地泣鬼神的战斗场面。

战场景象，天兵士气，战斗激烈，痛快淋漓，战果辉煌。大手笔驱山断水，泼墨酣畅，景情并茂，鼓舞人心。

社会主义建设图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水调歌头·游泳》）

这时，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开始，并且轰轰烈烈，规模空前。社会主义改造业已完成，全国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祖国的前景，更加辉煌壮丽，鼓舞人心。日新月异，天翻地覆，使神女都倍感惊异。

山区新貌图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莺歌燕舞，山欢水笑，楼台亭阁，车飞如跃，高上云端。山区建设，热气腾腾，一片欢快、欣欣向荣的景象。令人欢欣鼓舞，催人奋发。

毛主席“绘画”，大都是大手笔的泼墨挥洒，酣畅淋漓，气势恢宏。即画一山、一水，也不用工笔。如画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七律·登庐山》）山势雄伟，如天外飞来；腾云驾雾，盘旋而上，诗情雄豪，神采飞扬，诗坛少有。又如画水，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浪淘沙·北戴河》）

浩瀚的大海，壮丽浩渺，海天相连，令人心旷神怡，又叫人感到神秘而迷惘，产生无限的感触和遐想。在诸多佳作之中，它是一首短词，却是一首可以传之千古而不朽的诗篇。它象露珠一样微小，却象太阳一样蕴含着无穷的光和热，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它是海的精魂，它是微型史诗式的诗篇。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菩萨蛮·大柏地》）

你看，就是画这样的山水图，也是大笔一挥，七彩具备，光怪陆离，彩虹当空飞舞，绝妙之至，神奇之至。

另外，毛泽东诗词中的图画，有的是一首词一幅画，如《菩萨蛮黄鹤楼》上阕：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看，万里长江，激浪滔滔，日夜奔流；

看，巍巍黄鹤楼，顶天立地，辉映日月！

一幅敦实浑厚，秀丽多姿的山河图。

有的一首诗词却是一组画，无论内容，无论气势，无论艺术，都是一首

诗同一幅画所无法比拟的。如《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它是由几幅画构成的一组历史画卷：有山势逶迤的五岭图；有群峰叠嶂的乌蒙图；有水拍云崖的金沙图；有桥横铁索的大渡图；有于千里雪盖的岷山中的行军图；还有红军跋涉二万里，战斗千万次的英姿图。难道这不是一幅包容天地、气象万千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中外古今，谁有如此手笔？姚雪垠说：“诗人以如此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写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且艺术上达到如此高的成功，不仅历史上未曾有过，而且今后也很难再有，此诗可谓千古绝唱。”这是完全正确的评价。因为只有那样伟大的历史，才能造就毛泽东那样伟大的诗人；只有那样伟大的诗人，才能孕育这永垂青史的诗篇。

毛泽东诗词中的图画，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反古人以冬秋为题材，变落寞消极的传统。他“画冬”，绝不含肃杀之气，如《七律·冬云》；他“画秋”，绝不有悲秋之情，如《采桑子·重阳》。在他的诗同里，总有一股催人上进、鼓舞人战斗的力量，使人奋发，使你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毛泽东的诗中有画；

毛泽东的诗中画传情！

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诗言志，诗贵情，情贵真。没有感情的诗篇，就等于没有诗魂，也就失去了激动人心的力量。毛泽东的诗词之所以那样令人难忘，除去其他原因，主要就在于他的诗词情真意切，朴实感人。在他的诗词中流露的感情是多方面多角度的：有的是革命豪情，有的是儿女柔情，有的是战友深情，有的是旧友故情。但无论哪种感情的表露，无不纯真质朴，情发于衷，读后使人心暖肠热，久久难忘。这里不作全面涉述，仅就诗人与亲朋战友和同志之间的赠和酬唱所表露的纯真感情谈一点自己的粗浅体会。

毛泽东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在他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后，一直与当年的同窗好友周世钊保持着长久的友谊。两人书信往还，酬唱奉和，情谊笃深。1955年毛泽东去长沙，同周世钊一起登上了岳麓山。周世钊事后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上几首诗。毛泽东于同年10月写了一首《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与之唱和。诗是这样写的：

春风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诗中前四句写两人登上岳麓山看到的自然风光和湖南农村的一派丰收景象。后四句是写诗人在离开湖南近三十年之后，又回到长沙与老友相聚，“尊前谈笑”的情景。这一段朋友之间的唱和亲切委婉，情意无限。老朋友长别三十年后的叙旧，毛泽东没有流露出衣锦还乡、君临天下的傲岸，也没有韶华易逝的人生感慨。有的是朋友之间的离情别意，见面时的兴奋愉悦和对国内外形势的高谈宏论。他们之间那爽朗的谈笑，轻松的回忆，欢快的气氛，无不跃然；纸上。成了一国领袖的毛泽东，能在普通身份的朋友面前，不居高，不自傲，完全以对等的人格畅谈友情，读后使人倍感亲切，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人格的平凡与伟大。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是两首表达对革命战友无限情谊的感人诗篇。

彭德怀是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战术家，也是位叱咤风云、所向无敌的猛将军。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为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堪称毛泽东的得力臂膀，不可多得优秀将领。就在红军长征战胜了千难万险，胜利到达吴起镇后，毛泽东特意写了一首六言诗赠给骁勇善战的彭德怀。诗是这样写的：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对彭德怀同志那英武神韵、超人胆略、不朽战功的形象化赞颂。读着这首诗，你会想象出毛泽东当时的神态表情，他一定是眼中流露着喜悦，胸中充满自豪，不惜用“谁敢”“唯我”这样排除一切的词汇，大加称赞自己的将领。一种同志式的深情和领袖对部将的厚爱充分显露于笔端，谁看了

之后都会对彭大将军的英武神威和毛泽东爱将亲如手足的深挚感情，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尽管彭德怀接到这首诗后表示不敢承受，把“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但“彭大将军”这一美称却从此传遍了全军、全国，足见诗句多么打动人心。

1963年12月6日，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杰出的领导人罗荣桓同志不幸逝世。得此噩耗，毛泽东极为悲痛，随即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 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第一、二句缅怀追忆罗荣桓同志青年时期的勃勃英姿，重温他们之间的亲切友谊。三、四、五、六句分别回顾战争年代罗荣桓创建的丰功伟绩和他崇高的品格。诗的尾联“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形象地显示了毛泽东失去战友后悲痛欲绝的神态表情。他痛彻心脾地投笔问天：如今我失去了罗荣桓这样的股肱栋梁，一旦国家再遇到什么疑难大事，又有谁能代他帮我排解疑难呢？那沉痛的语气，犹言在耳，催人泪下。仅此一句就将毛泽东失去战友之后的巨大痛苦、深切的思念和对罗荣桓至高无上的评价，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这首诗直抒胸臆，朴实无华，但那种内在的感人力量却是无与伦比的。这种力量，不靠什么构思技巧和文字功夫，完全凭作者的一片纯真感情。这样的悼亡诗，既可告慰逝者英灵，又能感动世人，真正显示了毛泽东诗词的内在力量。

毛泽东给一般同志写的诗词也是十分感人的。1936年，他给女作家丁玲写的一首词《临江仙》就是一例。

丁玲曾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囚禁于南京，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于1936年9月辗转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中宣部特地在一座窑洞里开会欢迎她。会后她表示愿意当一名女红军。对于她的选择，毛泽东极为赞赏。不久她去了陇东前线，随即写了一篇战地散文，报导红军山城大捷的情况。毛泽东特地以电报的形式给丁玲发来了欢迎词，也就是《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词中写道：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真是一篇别开生面的迎新词。词中把丁玲称作“保安新人物”，又描绘了中宣部开会迎接这位新人物时那简朴而又隆重的场面，进而又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器重和估价，说她的一枝纤笔足能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结尾一句“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种稍带夸张而又十分得体的夸赞，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一个普通女知识青年的重视和鼓励。这对刚从敌人狱中出来初获自由的丁玲来说，该是一种怎样的荣幸和快慰啊。

古往今来迎送词、赠答词浩如烟海，可有哪一首能比得了《临江仙》这

样辞情纯真质朴，格调高雅自然的词章呢？

最为感人的还是毛泽东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有人说这是他诗词中足以传世的佼佼者。诗中所蕴含的真挚深厚的情谊，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人世的处世哲学，加上诗歌的艺术技巧，使这首诗达到了真善美高度结合的完美境界。

柳亚子先生是著名的爱国诗人，一生为民主革命奔走呼号，同情和赞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但他毕竟是个旧知识分子，思想领域的弱点加上诗人特具的气质，使他的情绪很容易冲动和波动。他又自视甚高，把自己看作是古代管仲、现代马克思、孙中山一类的人物。声言倘能重用他，他便象古代管仲使齐国建成霸业那样，能使中国很快富强起来。带着这样高的期望值，一旦个人幻想不能实现，便很容易产生消极情绪。由于当时的中央工作千头万绪，诸事待理，一时未能对他妥善安置，就在毛泽东刚入北京的第四天，他便写了《感事呈毛主席》，以示心头的不快。诗曰：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侠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诗中所感何事，从用典看出，那就是自视才高，自恃功高，以为党和国家给他的政治地位、物质待遇与自己很不相称，所以他准备激流勇退，归隐家乡了。面对着这位诗友、挚友、党外民主人士所暴露的思想问题，毛泽东以一位伟大政治家的襟怀，爱人以德，重人才能，本着爱护的原则，从实效出发，采用了和诗的形式，对他进行了婉言规劝和善意批评。和诗是这样写的：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先以老友的身份同对方叙旧谈心，以极其亲切的口吻追怀往事，以唤起对方美好的回忆，激发起当年的革命激情。继而从反正两面给予批评和开导，十分风趣地劝戒他考虑问题要从革命大局出发，不要囿于个人得失的小天地。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从个人得失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利于处世治国。最后再诚恳地挽留他，不要返乡隐居，还是留在北京参加到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那才能真正获得人生的乐趣呢。

毛泽东在诗中表露的感情是十分诚挚的。对这位年事已高、历尽革命风云的老友，有友情，有帮助，有启发，有鼓励，更有诚心诚意的挽留，充分显示出他对朋友的体贴入微，一片真情。读后使人如品淳醴，如饮甘露，使对方产生一种安全感、成就感和受尊重感。

这首诗深深感动和教育了柳亚子，他终于打消了归隐的念头，表示：“昆明池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并在以后的岁月中，以极大的热情参加

政府工作，用诗歌赞颂共产党，赞颂新中国，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一切足以说明毛泽东的诗词具有无穷的感召力量。

毛泽东“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而对人呢，则更充满了深深的情谊。

理趣横生，哲理闪光

在浩如烟海的诗词中，有一种与众不同本质的诗歌，它不仅具有鲜明的形象，强烈的感染力量，而且还闪烁着一种智慧和真理的莹莹之光，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价值，这种诗被称为理趣诗。所谓理趣，就是在一首诗中通过一定的艺术形象，表达某种哲理，使读者从中受到启示和教益，这样的诗就包含了理趣。

宋朝是个讲求理学的朝代，因而哲人诗的情况较为普遍。然而理趣诗并不好写，因为这种诗一方面必须有具体的艺术形象，一方面又要表达抽象的哲理，诗人必须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熔铸在一种很美的艺术境界之中，所以成功之作凤毛麟角，不可多得。比较有名的代表作是宋朝诗词大家苏轼写的《题西林壁》，其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名句，人们往往不只会从形象的角度去欣赏理解，而更多的是将它用在认识问题的角度来启发自己的思路。此外欧阳修的《画眉鸟》、朱熹的《观书有感》、叶绍翁的《游园不值》，都是较有名的理趣诗。另外唐诗中“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等，也是很有名的理趣诗句。这些诗或明快爽朗，令人耳目一新；或深婉含蓄，奏出弦外之响。其中蕴含的哲理，给人以真理的启示，甚至被历代人们当作名句格言广为流传。

那么是否只有古人专擅此类诗作呢？倒也不尽然。当代伟人毛泽东便可算作写哲理诗的一位高手。打开《毛主席诗词》，在三十几篇诗词中，就很有几首属于哲理诗的范畴。什么“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什么“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等等，我们往往把它当作名人格言来理解运用。

《沁园春·长沙》的上阕“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段写景之后的一句理性概括“万类霜天竞自由”，就闪烁着璀璨的哲理光辉：你看，岳麓丹枫如锦，湘江流水似碧。在这山川红遍与碧透的映衬之下，还有雄鹰在长空奋击双翅，鱼儿在江中活泼地翔游，就连原属静物的“万山”也因枫叶层层染红而显示出自然界的生气来。再加上滔滔流去的江水，往来竞驶的百舸，真是火红绚烂，春意盎然。这种霜秋的严酷肃杀与“万类”的活跃自由，充分显示了大自然的一种辩证对立的关系：那就是客观环境越险恶，主观竞争意识越强烈。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在人类社会，大至阶级，小至个人，无不以斗争求生存，以竞争求发展。于是才有了人类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才有了由谁来主宰人类命运的问题，才有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极有分量的发问。这里诗人描绘的是一幅宏伟壮丽充满了无限生机的湘江秋色图，提出的是由谁来主宰祖国命运的深刻命题。在这里诗人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将自己要表达的题旨要发表的议论通过一组生动的形象和饱含着激情的语言表达了出来，因而诗情和哲理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形成了理想的艺术效果。

《采桑子·重阳》是一首抒发无产阶级人生观和战争观的壮丽诗篇。作者写道：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

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词一开头，诗人便以通俗的哲学语言揭示出了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客观规律。面对着短促的人生，雄极一时的曹操发出的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大诗人李白唱出的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及时行乐的诗句，大文学家苏轼曾借他人之口道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苦闷，初唐诗人陈子昂竟“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而在这首词中，毛泽东说“人生易老天难老”，却丝毫没有慨叹人生短暂的意味，刚好相反，他通过词中优美的艺术境界，形象地告诉人们：新陈代谢是大自然不可抗拒的法则，每个革命者应该正确对待生命的价值，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革命事业中去。不是么，循着大自然的规律，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又到了。在今年，我们的红军战士在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火光闪闪的阵地上度过了一个极有意义的重阳佳节。经过浴血奋战保卫下来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株草木都那么令人喜爱，给人带来丰美的感受，就连路旁的那一簇簇金灿灿的野菊花也显得格外秀丽，特别清香。这一年一度的强劲秋风，虽然不象春风那样和煦宜人，那样催发百花争艳，但它却能摧枯拉朽，荡涤腐恶，澄清宇宙，除旧布新。它带来的是江天寥廓、寒霜万里、玉宇澄清的崭新世界，所以它“不似春光”，却“胜似春光”。这优美的诗句，铿锵的节奏，深邃的哲理，艺术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战争观和美学观。在毛泽东的笔下，战争并非无情物，秋令更比春日强。虽然《采桑子》不是一首一般的写景之作，但那诗情、那韵味、那非同一般的审美情趣，却使人百读不厌，余味无穷。一般地说，抒情诗旨在抒情，理趣诗意在达理。这首词是既抒情又达理，引人入胜的景色、耐人寻味的诗意与发人深醒的哲理融为一体，使它成了一枝极为难得的艺术奇葩。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是一首伟大的革命诗篇，是一曲气壮山河的胜利凯歌，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思想的艺术结晶。前四句是对解放南京，推翻蒋家王朝的历史记录和热情歌颂，描绘了天翻地覆的革命胜利的伟大场面。后四句从解放南京这一具体事件中生发议论，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光辉思想。诗人先从当时形势说宜“追穷寇”，将革命进行到底；其次从历史教训方面说，不可重蹈楚霸王的“覆辙”，使革命半途而废；最后再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角度，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来说明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最后的两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句中饱和着感情蕴含着哲理。意思是，面对蒋家王朝的罪恶统治，连无情的上苍都会气老，何况于有情有感遭受摧残屠杀的亿万人民！正因此，追歼穷寇，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政权，正是上合天心下符民愿。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正常的社会代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谁也阻挡不了，谁也不该阻挡。这首诗，写场面，龙腾虎跃，有声有色、气象非凡；讲道理，由近及远，层层深入，十分透彻：揭示哲理，因事而发，自然贴切，毫无抽象说教的痕迹。正因此，这首诗深刻隽永，其味无穷，极富感人力量。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是一首充满了斗争精神而又寓意深远的题照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诗人先从照片展示的画面写起，说在天色昏暗迷茫的黄昏，看那挺立于云海之上的青松是多么坚强道劲。尽管乱云翻飞，它却依然泰然自若，从容镇定。那个地处峰巅的仙人洞，真是天然生成，风光无限。要想领略它的美处，就必须不畏艰险，勇于登攀，才能真正浏览到最美的景观。

这首诗名为题照，实际是见景抒情，借景抒怀，托物言志。联系到此诗的写作背景，当时正值我国处于由国内外诸因素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作为我党领袖，一个当代的政治家，诗人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但在这首诗中，毛泽东通过诗笔表达的却是一种极其乐观和自信的情怀，以此来坚定自己和全党全民的信念和信心。特别是后两句，一方面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崇高而今人神往的境界，另一方面又给人以哲理的启示和巨大的鼓舞力量。诗人告诉我们，对每个人来说，无论干事业还是做学问，为了一个伟大目标，就应该不懈地追求和奋斗。特别是在人生的旅途上，当受挫折处逆境时，更应该具有这种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信心和勇气。这首七言绝句，寓理于情，情理交融，不但形象生动，气魄恢宏，字里行间蕴含的哲理更使它具有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因而大大扩展了诗的意境。

《七律·冬云》是一首气贯长虹的反修诗篇，这首诗写得有声有色，声情并茂。你看：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诗的前半部分是借雪压冬云、寒潮滚滚、大雪纷飞的严寒景象来喻指当时国际上反华势力猖狂嚣张、不可一世的严峻形势，后半部分是写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怕形势险恶，不屈从外界压力，犹如傲雪斗霜的梅花一般，气候越恶劣，开得越精神。而那些猥琐俗鄙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就象蝇蛆一般，经不起任何考验，就被历史的洪流荡涤已尽，冲刷得无影无踪。

这首诗旨在歌颂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敢于斗争，不怕艰险，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辛辣地讽刺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虚弱本质和丑恶嘴脸。其中“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两句，耐人寻味而又富于哲理。这两句本是联对，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两两相对的。它造成的形象是：高空寒流滚滚，冷彻天宇；大地阳气微吹，春意初发。这一冷一暖，一强一弱，对立存在，斗争转化，这既是寒尽春来自然法则的真实写照，又是反动势力必然灭亡，新生力量必然强大，终将取而代之的客观规律的揭示。

总的来说，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在他的诗词中，这数重因素熔为一炉，同起作用，使他的诗词形成了为一般作家无法具备的特殊风采、气度和艺术风格，使他的诗词在文苑中馨香四溢，流光溢彩，成为流传千载的艺术珍品。

意境壮阔，美不胜收

毛泽东同志具有浓厚的浪漫气质，长于形象思维，又富于革命激情，写出的作品，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如诗如画，韵味无穷，造成一处处令人难忘的艺术佳境，也就是常说的诗的意境。

谈到意境，它包括了“意”和“境”两个方面。“意”是指诗中所表现的思想 and 抒发的感情；“境”是指诗中所描绘的生活图画和艺术形象。这“意”和“境”两方面融合一体，和谐一致，产生艺术吸引力和感染力，就形成了所谓的意境。好的意境应当有健康的思想感情和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而且还要新颖，具有独创性，不能重复沿袭他人的思路。

毛泽东写诗词，就极善于把强烈深沉的感情蕴藏熔铸在生动的画面之中，加之他那高超的艺术构思能力，刻意求新的艺术眼光，因而就形成了一处处艺术“创造之境”。这种全新的艺术境界，情浓缩而含蓄，景生动而传神，具有余韵无限，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

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可谓词中上品，词中形成的意境就十分耐人寻味，词的上阕写道：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这里描写的是云贵高原山区早春的晨景。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天空挂着一钩残月，一队大雁嘎嘎叫着从空中掠过。路面铺满一层白霜，西风猛烈地吹着。这时一队红军头顶残月，脚踏冰霜，迎着寒风，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娄山关进发。战士们急促行军，顾不上相互交谈。只听到细碎急促的马蹄声和时断时续、低咽涩滞的军号声。在这幅画面里，没有明亮的色彩，没有鲜艳的红旗，没有响亮的音响，没有高亢洪亮的军号。这个境界给人的感觉是，天气很冷，环境很艰苦，任务很急迫，气氛很紧张，心情不轻松。读过之后，就好象置身于那样的境界，目睹了那行军的战斗行列，感受到那西风的寒冷和战斗气氛的紧张。特别是天上的那一钩残月和晨风中传播着的如同低咽的军号声，给人留下永难忘怀的印象。

而《清平乐·六盘山》一词的意境却另是一番景象。词中描绘的是高高的蓝天，淡淡的白云，巍峨高耸的山峰，迎风招展的红旗。毛泽东站在山顶，瞩望四壁河山，回顾长征以来的战斗历程，展望未来斗争的光明前景，壮志情怀激荡于胸中。画面是鲜艳的，情绪是自豪的、欢快的。这首词与《忆秦娥·娄山关》同是反映红军长征路上翻越大山的情况的，然而两词的情调气氛竟有如此的差异。这是因为《忆秦娥》写于“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的开始阶段，作为一军统师的毛泽东，肩上的担子、心理的负荷都极为沉重。而写《清平乐·六盘山》时，红军已经战胜了重重困难，长征即将胜利结束，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充满自豪的，所以两首词的意境迥异，给人的感受也就大不相同了。

《浪淘沙·北戴河》是一首吟咏海洋的壮阔诗篇。据说毛泽东鉴于南唐后主李煜写的《浪淘沙》都属缠绵婉约那类词，便以这个词牌反其道而行之，有意写成一首风格豪迈奔放的，算作对古代诗坛靡弱之风的抨击。

毛泽东的《浪淘沙》确实是一首风格奔放意境壮阔的绝妙词章：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是夏日的一天，大雨滂沱，幽燕茫茫，渤海滔滔，浪涌万叠。在这风狂雨骤波滚浪翻的日子里，那秦皇岛外的点点渔船依然出没在茫茫的海天之中。作者的视线一直在追踪着它们，深情地凝望着，凝望着，终于情不自禁地问道：“那些打鱼船究竟驶向何处去了呢？”

这是一幅大海风雨壮阔图。面对着这幽燕故地，广阔大海，滂沱大雨，滔天巨浪，片片银帆，诗人心潮逐浪，兴奋不已，不由对眼前壮美的大海和勤劳勇敢的人民发出深情的赞美。这眼前的景象又使他浮想联翩，思接千载，一下想起了在此留下遗迹的魏武帝曹操。想当年曹操曾驰骋中原，雄视八方，真有不可一世之概，然而他又给历史留下了什么呢？历史跨越了一千多年，一年一度的秋风又吹临大地，如今的中国大地却真正换了人间。

这雄浑壮阔的大海，这大海上伟大的诗人，这诗人的伟大情怀，给读者带来多少想象，多少美感，多少艺术享受啊。

《七律·到韶山》是一首赞颂家乡湖南人民英勇的革命斗争精神和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七言律诗，诗的尾联是：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这是一幅绝妙的田园风光图。读着这瑰丽的诗篇，眼前立刻会呈现这样一幅画面：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夕阳洒下一片殷红的霞光，金黄的稻菽随风掀动着一重重波浪。村头炊烟袅袅，收工回来的人们，踏着晚霞，带着喜悦，谈笑风生地走向村中走去……那淡淡的暮霭，火红的晚霞，田间的碧浪，遍地的人群，他们的欢声笑语似乎就在眼前。这很自然地使人联想起陶渊明的田园诗，什么“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什么“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些诗句形象也很美，只不过陶渊明笔下是一种纯自然的农村生活画面，画中充溢着恬淡、闲适、古朴的民风。而毛泽东的诗句则不然，他将自己对家乡人民的热爱，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好形势的喜悦之情，巧妙地熔铸在所描绘的画幅中，读后不仅使人如临其境，而且会受到强烈的感染，让你情不自禁地同作者一起去享受那份丰收的喜悦。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是毛泽东为一张女民兵的照片题写的一首绝句：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诗中那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姑娘们，一个个神采奕奕，英姿勃勃，正在那里苦练杀敌本领。一轮红日刚刚升起，灿烂的朝霞映照着一片练兵场地。一队手持钢枪、正在艰苦操练的女民兵正沐浴在晨曦之中。她们一个个精神焕发，英俊威武。画面是如此传神，如此光彩照人，我们好象看到她们在匍匐卧倒、持枪瞄准的身影，看到她们那认真严肃的面部表情，听到那清脆悦耳的口令声。

女民兵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事物，是毛泽东“全民皆兵”战略思想的

具体体现。毛泽东以满腔的热情为之大唱颂歌，并赋予她以美好的形象和诗的意境，给人留下了永远难忘的美好印象。

《卜算子·咏梅》是一首咏梅的绝唱：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在这首词中，毛泽东一反陆游的消极颓丧、孤芳自赏的情调，满怀深情地赋予梅花以崭新的风姿和战斗的风貌。他笔下的梅花，傲风霜，战严寒，报春讯，醒百卉，在艰苦条件下精神百倍，在胜利的时刻则谦虚自处。

词的上阕，突出梅花在恶劣环境中傲然盛开的形象。

天气严寒，大雪纷飞，朔风怒号，冰凌垂挂，万花凋谢，一片肃杀。就在这种情况下，一枝红梅，坚枝挺拔，迎寒怒放。她开得那么无畏，那么精神，那么俏色夺人。她使弱者钦羨，仇者妒恨，但谁都无法与她比美。

词的下阕，进一步展示梅花崇高的精神境界。

梅花虽俏，却无意与百花争春。她的超前开放，只是为了做一个报春的使者。待到山花烂漫、遍野飘香之际，她却隐身于百花丛中，为春天的真正到来而露出由衷的微笑。这形象是如此之美，品格是如此高尚，我们就好象看到了她那隐身群芳之中谦虚幸福的笑靥，受到她那崇高精神力量的巨大感染。读了这样的诗句，不仅能得到高雅的艺术享受，而且对作者借梅花而全力歌颂的中国共产党人那种不畏艰险，不屈从压力，敢为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品质，产生由衷的敬意，并从中得到一种深刻的做人的启示。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类似这样传神的镜头，感人的意境几乎随处可见：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意境壮阔而苍凉；

“万类霜天竞自由”，气氛热烈而富有生命气息；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使人看到战争年代，建政权、分田地，百姓们兴奋紧张的表情神态；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既使人联想到冬春之际大自然季节的更替过渡，又使人联想起那六十年代初国际国内的政治风云。

真正杰出的诗人，能通过优美、朴素的语言，把人们引入到他所描绘的那片天地中去，和他同欢乐、共忧思，并使人的思想境界得到充实和升华，得到一种心灵上的愉悦和鼓舞。

毛泽东正是这样，他总是以他那博大的胸怀，豪放的气质，深邃的目光，给他所描绘的景象以理性和艺术的升华，把它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感，使读者陶醉在他所描绘的那片艺术天地之中，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和感染，获得教益和提高，并叹服他所描绘的一幅幅美妙的生活画图。

熔旧翻新，境界迥然

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通过“推陈出新”，达到“古为今用”，这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其中关键是“推陈出新”，不能“推陈出新”，就谈不到“古为今用”。毛泽东的诗词，之所以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给人以全新的感觉，令人耳目一新、振奋不已，成为诗词艺术中的一朵奇葩，正反映出他在熔铸旧文化，推陈出新方面的高深造诣。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整引用前人诗句。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即引自唐朝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是说汉武帝时所造手托承露盘承接露水的金铜仙人在汉宫多年，现在被魏明帝迁出汉宫，金人辞别旧居，潸然泪下。一种凄凉感慨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在诗中虽然全句引用“天若有情天亦老”，却意在用自然界变化发展规律与人类社会变化发展规律对比，说明世间万物都在发展变化，不变化不发展是不可能的。引用的目的是用“天若有情天亦老”来说明“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一社会发展规律的。“沧桑”这一典故源于东晋葛洪的《神仙传·王远》，是“沧海桑田”的缩写，指大海变为桑田，桑田变成大海的意思，比喻世事变化很大。这样一来，李贺诗句中的凄清伤感的情绪没有了，而增强了积极的、唯物辩证的哲理性了。

二、改动前人诗句的个别字词。如《菩萨蛮·大柏地》“雨后复斜阳”一句，就是把温庭筠《菩萨蛮》词中的“雨后却斜阳”的“却”改成“复”而来的。单就“雨后却斜阳”与“雨后复斜阳”词句本身看，意思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温词“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所表达的是一种无聊的闲情逸趣，而且还有些许凄清冷落的伤感。“堆轻絮”、“愁闻”、“零落”，把本来是大好的春光写成了近乎悲秋，再加上“清明雨”与扫墓、哀悼常联系在一块，使仅存的一点“逸趣”又顿减了许多。而毛泽东的这首《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写的是大自然的明丽美好的风光，表达的情调积极乐观。首句，五彩缤纷；次句，轻盈飒爽；第三句，对比鲜明；末句，凝重苍劲。或重写色彩，或重写动态，或重在对比。真是一步一景，绘形绘色。与温词相比，情调大异；虽一字之差，境界迥然。

又如《七律·答友人》“我欲因之梦寥廓”一句，是由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我欲因之梦吴越”改易而来的。但“寥廓”与“吴越”，境界大小已自不同，再联系下句看，“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与“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所梦境界更其悬殊。“寥廓”较“吴越”广阔得多，“芙蓉国”比“镜湖”更是相去甚远。如果再从全诗的意境看，更是大相径庭。一是写个人的超脱，一是写革命光辉灿烂的远景，虽然都是写梦境，但所梦内容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美感却是大不相同的。

再如《念奴娇·昆仑》“飞起玉龙三百万”一句，是从张元《雪》诗“战罢玉龙三百万”改易而来的。张元的“战罢玉龙三百万”写的是飞雪，以动写动；而毛泽东的“飞起玉龙三百万”写的是雪山，以动写静。如果再联系下句看，“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玉龙战罢，结果是鳞甲纷飞，而且是“败鳞”、“残甲”，形象不美，心境也不妙，颇煞风景。而

毛泽东的“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则描绘出了一幅群山飞舞，漫天皆白的奇丽景象，其寒威之猛烈，气魄之雄浑，岂是“败鳞残甲”能相提并论的。

三、颠倒前人诗句的语序。如《浪淘沙·北戴河》“萧瑟秋风今又是”一句中的“萧瑟秋风”，就是曹操的“秋风萧瑟”颠倒语序而形成的。用“今又是”说明季节是相同的，用“东临碣石”点出地点也是北戴河，但一个“换了人间”却使词句词意突兀奇崛，境界全新。“魏武挥鞭”时的“碣石”，由于“越千年”，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又如《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唱雄鸡天下白”一句，便是李贺《致酒行》中“雄鸡一声天下白”化用而来。其中“一唱雄鸡”和“雄鸡一声”在语序上作了颠倒，个别字也作了更动，但从词句的内在含义却大不相同了。李贺诗“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幻想个人一旦飞黄腾达，便从幽寒苦闷的境遇中大放光明。毛泽东化用此句，却反映了中国人民从“长夜难明赤县天”的岁月中获得翻身解放，从黑暗的旧社会转向光明，一反李贺个人得失沉浮的感情思虑，而转为对祖国和人民胜利的赞颂。

四、将前人诗句加以压缩或变化。如《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就是把李白的“云雨巫山在断肠”，杜甫的“云雨荒台岂梦思”，李商隐的“神女生涯原是梦”等前人诗句压缩变化摘取而来的。巧用神话中巫山、神女、云雨的传说，借巫山云雨表达长江上游的雨水，把巫山神女作为兴云作雨、掌握长江上游水势的神仙，使巫山神女的故事与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长江水利建设相联系，从而一洗几千年来轻薄文人给这一神话故事涂抹的低级下流的黄色色调，而利用其联想丰富的优点，赋予了全词以清新可喜、优美动人的姿容和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生活气息。

又如《菩萨蛮·黄鹤楼》“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两句，是从崔颢《黄鹤楼》诗中“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两句变化而来。但崔颢诗兴起的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乡愁，而毛泽东在词中表达的却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面对烟波江上的滔滔流水，暗自立下了决心继续革命的盟誓。

再如《水调歌头·游泳》词的开头两句“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是化用三国时的民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但民谣反映的是一种“安土重迁”的封建乡土观念和保守思想，而毛泽东稍加改动，既反映了他以四海为家的阔大胸怀和风尘仆仆巡视各地的兴奋而又轻松愉快的心情，又表现了我们祖国处处都有美好的风物的状况。

再如《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一句，是从唐朝张泌的“别梦依依到谢家”一句改造成的。从字句看，都是写的梦，但张泌抒发的是没落伤感的情调。其实，何止张泌，古人诗词里写“梦”往往表现消极的情调，如“人间如梦”，“世事一番春梦”，“浮生若梦”等一大半都是个人哀伤。而毛泽东在“别梦依稀”后面加上“咒逝川”三字，却表达了对已经一去不复返的黑暗岁月及其制造者是多么痛恨，而对“故园”和“故园”的人民，又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咒逝川”三个字，使毛泽东在写“梦”上与古人所表达的情调截然相反了。

哲理化作情韵出

文学作品是通过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的，尤其是诗词。但这不等于说作诗填词不可以发议论，以诗发议论，自古以来是不乏其例的。如杜甫的《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前四句是描写，后四句就是议论，而且具有很高的概括性。从三顾茅庐到隆中决策，到辅佐阿斗和六出祁山，直到五丈原头积劳病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诸葛亮的一生，作出极高的评价，歌颂了这个政治家茅庐决策的远见卓识，对国家的忠诚勤奋。并为诸葛亮没有完成自己的宿愿，而感到深切的遗憾。

又如朱熹的《观书有感》：

昨夜江边春水生，艤艫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便是谈读书体会的议论诗。是说读书的两种境界：开始很费力；工夫到了，就不费力气了。

更饶有风趣、别出心裁的是清代的王国维。他是道他的保皇派，保守顽固，几次要投“御河”以身殉清。但他知识渊博，治学勤苦，著述极多，极享盛名。他借诗发议论，已传为佳话。

有人慕名登门请教“治学之道”，问做学问的途径和方法。王国维略思片刻答道：“古今之成大事、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那位听了王国维这一番话，欣欣然深有所悟，千恩万谢而去。

看，这诗借得多巧、多妙！而所发议论又多深刻，多富逻辑性。是典型的诗论，却又绝不多见的别致。

王国维说明三种境界的引诗，全出自宋词。第一种境界，出自晏殊的《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第二种境界，出自柳永的《蝶恋花》：

仁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

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种境界，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宵》：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所引三种境界，原都不是发议论。第一种境界，原说佳人耐不得离恨苦，怀着无限思念独自登上高楼，遥望天涯，不知情人何处。第二种境界，也是说思念情人之切，触景伤情，甚至欲以酒浇愁，即使使身体消瘦，神情憔悴，也在所不顾。第三种境界仍是说思念情侣，彻夜不成眠，辜负了良宵美景，直至神情恍惚时，却于灯火阑珊处，无限欣喜，看到了昼思夜想的情侣。巧妙之处在于，虽都不是议论，但王国维或借其意境，或借其抒情，或借其想象，然后赋予新意，来形象地阐明治学的道理。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说古今中外，凡在事业或治学上有所成就的人，都必然胸怀大志，高瞻远瞩，又敢于独辟蹊径，勇于登攀；胸无大志，目光短浅，畏首畏尾，拈轻怕重，是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说为了实现远大理想，一定要刻苦学习，不断钻研，呕心沥血地探索，艰苦卓绝地奋斗终生，即使身体消瘦，面容憔悴，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贪图享受，怕苦怕累，怯于牺牲，半途而废，纵有天大志向，也是枉然。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说只要百折不挠，勇于攀登，探寻千百度，似乎寻他不着，但只要坚持，终有一日，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会取得惊人成就的。到那时，象是唾手而得，其实是“衣带渐宽”的结果。

立志、艰苦奋斗、成功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阐述得多么透辟啊！更为绝妙的是，全是通过形象思维，既无抽象的推理，也无泛泛的散文式的直说。是论，又是诗，要说诗论，这便是范例。

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诗人，但他首先还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所以他的诗词和他的许多光辉论著一样，都是反映、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所以即使是诗词，也是饱含着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的。因而在他的诗词中，发议论的例子也不少。有的是一首诗词中的几句在发议论，有的是整首诗词在发议论。较之前人，这些议论更独到，更精辟，因而更有说服力，而且形式更灵活多变。

直议

《杂言诗·八连颂》是一首议论诗，具有完整的议论结构。上海南京路上的某部八连，是“南京路上好八连”，是中心论点。“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是总论。以下“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以及“八不怕”、“五好”，为分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

下谁能敌。”是结论。整个议论，逻辑缜密，脉络清晰。不着色相，语言形象，形式似“三字经”，为群众喜闻乐见。所以，观点鲜明，通俗易懂。毛泽东既满怀激情歌颂了这个雷锋式连队的先进事迹，又揭示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首要信条——“拒腐蚀，永不沾”。确有很强的宣传、教育、号召作用。

这首欢快、庄严的颂歌，既是属于历史名篇，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昭示未来的具有永恒生命力的诗篇。它是毛泽东赠给中华儿女的宝贵遗产，又是交给我们的识别、批判形形色色假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

阐释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是一首针对性很强的政治诗。毛泽东的和诗，并非一般的应酬唱和，而是借题发挥，即借助于应酬唱和，纠正郭沫若原诗的错误认识，表达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斗争新局势的看法，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消灭一切妖魔鬼怪，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

六十年代初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新的挑战。现代修正主义以“三和两全”的纲领，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制造了混乱。这一切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肆无忌惮的分化、瓦解、颠覆。郭沫若同志看过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赋诗《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以抒怀。诗中谴责唐僧“对敌慈悲对友刁”，并极为气愤，要“千刀当剐唐僧肉”。毛泽东则不然，认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以为唐三藏是可以教育好的中间派，而制造灾难的妖魔白骨精，才是打击的主要对象。这就阐释清楚了一条根本原理：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团结大多数，与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无情揭露，寸步不让。而对随声附和者，则宽宏、忍让、耐心说服。两种矛盾，泾渭分明；两种态度，毫不含糊。这对指导正确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斗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有很强的理论性，也有很强的策略性。

毛泽东高瞻远瞩，对一百多年来世界风云的变幻，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及其发展前景，成功地进行了艺术的概括，并对马列主义的斗争策略，作了极为准确的阐释。

附一：郭沫若原诗

七律

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附二：毛泽东原诗

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雪，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驳议

《念奴娇·鸟儿问答》这首词写得既庄重、雄浑，又诙谐、幽默，也很辛辣。庄与谐达到高度统一，大与小构成鲜明对比。这首词似寓言，又富有戏剧性。但在内容上却含有重大的主题，而且极为严肃。这首词写于1965年，表明毛泽东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以尖税泼辣的笔触，严厉地批驳了现代修正主义所散布的谬论。

1965年，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持核垄断的优势，迫切希望达成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协议。而现代修正主义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新“理论”是：“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我们将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正因为被核武器吓破了胆，所以便迫不急待地与美英签订了“三家条约”。

“不须放屁”毛泽东予以迎头棒喝，并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彻底的批驳：“试看天地翻覆。”即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的力量，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所以常规战争也罢，核战争也罢，都没有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吹嘘的那样可怕。

当时，现代修正主义者还不住地鼓吹：美苏联合，主宰世界。这也是放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革的伟大时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而这个时代的主宰者，是人民！

“鲲鹏”与“蓬间雀”，一个博大，一个渺小；一个高瞻远瞩、英勇无畏，一个鼠目寸光、怯懦自私。反衬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哲理启示和快慰的审美享受。并以正确的战争与和平观，批驳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

辩证

《采桑子·重阳》是渗透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美学观的一枝奇葩，并且充满了辩证法。

古代歌咏人生的诗词，尤其借秋抒写人生的诗词，许多都有感伤的色彩。“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便是一例。即使政治、军事、文学上都有建树的曹操也有这样的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但在毛泽东看来，则截然不同了。“人生易老天难老。”“人生易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但由于“天难老”，自然界是无限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这人也就可以一代一代无限地繁衍下去。这事物的客观性，所含的辩证法便成了有限与无限的联结，所以连老子都鼓击而歌庆祝辩证法的胜利，毛泽东更不会有什么感慨了。

这首词的核心句是“战地黄花分外香”，也充满了辩证思想。一提战争，

人们便自然会想到牺牲和灾难，就会想参加革命战争的人，会付出血的代价，甚至牺牲最宝贵的生命和常人所说的幸福。但这只是事物的一面。正因为战争，自然是革命战争，才能摧枯拉朽，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带来持久的和平，和更多人的幸福，也使个人更崇高，更有价值。这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也体现了革命者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没有无产阶级的战争观、生死观、幸福观，是不会由衷地赞美革命战争为“胜似春光”、“故地黄花分外香”的。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也是这种辩证思想的体现。毛主席一方面看到斗争形势处于极度艰苦的阶段。另一方面更看到人民的力量，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便是革命的辩证法。正因如此，毛泽东才创作出极富革命乐观主义的诗篇。

评史

《贺新郎·读史》是一首典型的评论历史的诗歌。他以极其概括的语言，囊括、咏叹了以中国历史为主体的整个人类的历史。从人类的诞生到归宿，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长达几百万年。真正大笔如椽，势能扛鼎。

读史、评史，不仅是为了了解历史、了解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更好地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这条历史规律就是：“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说得更通俗明白些，便是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所说的：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这条规律，是历史的结论。人们掌握了这条规律，用以观察历史、现实中的各种现象，观察人世间各种问题，才不至于做那蒙欺受骗的“无涯过客”，才能分清敌友，才能明辨是非，明辨真、善、美，才能自觉地跟党走国家富强、人们共同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

不过以诗评史，和一般的史论，是有着显著区别的。诗是文学，文学的特点，是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即所谓“言近指远”。不象史论那样，可以作全面论述。言近，讲的是切近的事；指远，反映出一般的较为深远的意义。如《贺新郎·读史》中，以“只几个石头磨过”，反映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代；以“铜铁炉中翻火焰”反映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反映几千年来阶级社会中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这种斗争的残酷性，等等。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又是“用形象思维”写成的诗。

示教

赞美英雄，颂扬他们的业绩，激励后人继承前人的遗志，发扬先烈的革命精神，开辟更光辉灿烂的未来，自然也属议论。

《七律·到韶山》一诗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两句便是。这气势豪迈，惊世绝俗的警句，既颂扬了革命先烈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又颂扬了他们用鲜血染红五星红旗、哺育革命后代、映红神州大地的英雄业绩。

这两句雄浑磅礴的诗句，还有其更深厚的内容。它说明，无数革命前辈，正是在先烈的鼓舞下，继续奋斗，才取得革命的成功。这两句诗还激励一代一代的后人知道，革命先烈是为幸福的今天，是为更幸福的明天而牺牲的，绝不能忘记他们，忘记就意味着背叛。要使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直至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朋友有了缺点错误，要爱人以德，相见以诚，毛泽东是净友的典范。他的诗的形式，对“诗友”进行劝勉，有时达到极为耐心、循循善诱的程度。如《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便含有精辟的议论，无限的真情，善意的规劝。请看：“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真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理精情深，感人至深。“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这既是从抽象的哲理予以开导，又是对柳亚子先生去留的表态。

毛泽东曾说：“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的态度或敷衍的态度，也是不对的。”又说：“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有公有私，公私分明。既有极严肃的原则性，又极富人情味。这便是他倡导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首诗便绝好地体现了这种高度的原则性，又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灵活性。

在这里毛泽东表明了党、人民和他本人，并没有忘记柳亚子先生过去同情共产党人、赞助革命、为反蒋统一战线效力的功绩。还表明，革命斗争是长期的、艰难的，新中国的诞生，是包括柳先生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的结果。但对柳亚子先生自命清高、自负才学、自觉待遇低、自恃有功于革命，因而功成而退的思想，却进行了认真的批评。

毛泽东作为“二十三年三握手”的诗友、挚友、诤友，作为新中国的“开天辟地”者，这种发自肺腑的友情和善意的规劝，情真意切，动人心魄，终于唤起柳亚子先生老当益壮的情怀，打消了归隐的念头。

婉议

《沁园春·长沙》带有浓厚的议论色彩。中心论点是：毛泽东及“百侣”这些革命家就是祖国命运沉浮的主宰。上半阙提出问题，“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下半阙未直接回答，却回忆以往的战斗生活，但答案却明确无误地含在这回忆里，只是手法上较为婉转些。

诗的表情达意要委婉，不宜平直；曲折方能深远，诗最忌讳的是浅露。抒情诗如此，议论诗也如此。当然，委婉是为给读者留下思考、想象、回味的余地，绝不是要把诗写成猜谜语一样的朦胧诗。压根儿不想让人读懂，反正不是面向工农兵的。

自然，在诗中发议论，还有多种形式，如“借典”，“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便是。又如“寓哲”，即寓哲理于形象，“无限风光在险峰”便是。因在“一石击水使天惊”一节中已经论及，这里不再赘述。

以诗的形式发议论，自古以来，有过不少争论。其实，问题不在于可不

可发议论，而在于采用什么恰当的形式发议论。古今中外以诗的形式发议论的佳作是不少的。裴多菲的《自由和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不是在发议论吗？不是在世界上广为留传了吗？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不也是发议论吗？自古以来，它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又有谁能否认它是千古绝唱呢？臧克家的《有的人》一诗，全诗都是在发议论，所议人的生死价值，具有极强的战斗性，成了多少有志者的座右铭！

不过，用诗的形式，发好议论，实在不易。因为一般议论靠概念、判断、推理，靠逻辑思维，而诗要靠形象思维。一味地堆砌概念，又不讲音律，是不成其为诗的。清人沈德潜提出诗中的“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是对的。就应做到“缜细能精至秋毫，周密见天衣无缝。理密而不依赖形诸言辞，思精而不见做作。虽明明象有真迹可寻，但不能只凭理性来演绎；有意象快要产生的时候，奇妙的造化已经潜伏在心中了——即理念了”。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通篇都是鲜明的形象：大地、风雷、精生白骨、唐僧、金猴、千钧棒、妖雾等，评论的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事，阐述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斗争策略。可内容深刻而形式缜密，无懈可击。

另外诗中议论，不能象一般议论文那样用概念、判断和推理，而必须通过比喻等艺术手法。如《贺新郎·读史》一词中，“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人猿相揖别”是从猿到人的形象说法。揖别，就是拜别，表示珍重，合情合理，恰到好处。开头五字，飘然而来，写人类从无到有，是比喻。“只几个石头磨过”，指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代，把长达几百万年的整个石器时代纳入七个字之中，显然也是借助比喻。“小儿时节”，更是鲜明的比喻。指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喻为人类的童年时期。

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一封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上面所引三句是最好范例。“以小摄大，举重若轻，以俗为雅，亦庄亦谐，如话家常，饶有风趣”，既给读者以启迪，又给读者以巨大的艺术美的享受。

“黄州太守，犹输气概。”

这篇谈毛泽东诗词如虹的气势。

由于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所独具的特殊的历史地位和领袖气质，也由于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出口成调的非凡才能，所以，凡读过他的诗词作品的人，无不为他作品的包涵中外、贯通古今的丰富内容而赞叹，也无不为波澜壮阔、豪迈精深、气凌霄汉的磅礴大气所感动。

中华民族的文学史，有三千多年，连绵不断，光辉灿烂。在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达到如此完美程度的，他是第一人。新中国诞生以来，党内外作家、诗人如林，优秀作品如海，但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如此成功，更没有谁能超过他。正象成就卓著、德高望重的萧涤非先生所说：“‘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这是已故南社诗人柳亚子先生赠毛主席的诗句，可作千古定评！我们为伟大的祖国诞生毛泽东这样的风流人物而深感自豪！”

毛泽东的诗词为什么会如此的雄奇瑰丽，有如此之大的气势？除了政治思想和历史的原因外，单从创作的角度，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立意高远

古人谈诗词的创作，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嫖闺泪尽；或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锺荣《诗品序》）这说明诗词的创作是源于生活的，是由自然景物的变化，或某种生活的遭遇、社会事件的触动所引发的。所以，有革命的人，革命的经历，才有革命的诗情；有波涛汹涌的诗情，才能有诗风的豪放的气势，也才能有气势如虹的诗。

毛泽东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是他的诗词是从世界和历史的高度，反映现实的。千百万年的自然发展史，若干万年的人类史，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史，都熔于诗词中，如《贺新郎·读史》等，而且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史中最本质的东西——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用诗的语言就是：“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阶级斗争，又是多么的不可调和，何等的残酷！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起，同时也伴生出修正主义，近二百年来，二者的斗争，反反复复，曲曲折折，有时唇枪舌剑，怒目相向。甚至有时枪炮相加，杀气腾腾，好象地球也得改名“帝修”。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也反映在他的诗词里，如：“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七律·冬云》）等等，便是这场延续至今的斗争的写照。

从毛泽东的诗词里，更可以清晰地听到中国革命的脚步声。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代起，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到有计划的社会建设，由他谱成了中国革命的交响曲。讨伐军阀，消灭蒋匪，驱逐日本，打败美帝，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战

天斗地，威武雄壮，由他绘成了举世瞩目的历史画卷。即使不多几篇以离情、悼亡为内容的诗词，如《贺新郎》、《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等，也无不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紧密相连。

毛泽东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历史证明，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都不能与他匹敌。他的敌人很多，但没有一个私敌，因为他为整个无产阶级而战斗。他的一生，又是操劳的一生，不管是戎马倥偬之中，还是日理万机之时，不分昼夜，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试想，他为了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还有什么没贡献出来？他的一生，还是创造的一生。他继承、捍卫、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便是毛泽东思想，他使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他高举反帝反霸的旗帜，向世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伸出援助的手，成为世界人民独立解放的指路明灯。他无私、坦荡、奉献的精神，是贯串他的诗词的红线。他的诗词，就是他永垂青史的不朽的丰碑！

正是伟大的历史，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也正是这伟大的诗人，才创造出这伟大的诗篇！

形象宏伟

毛泽东诗词里的形象都是宏大的，无论是人，还是物。即使是反面形象，也绝不是生活中一般意义的形象，而是与典型化的环境相协调的形象。

请看下列诗句中的形象。

《七古·送纵字一郎东行》中有：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贺新郎》中有：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沁园春·长沙》中有：

“携来百侣曾游……”

《西江月·秋收起义》中有：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西江月·井冈山》中有：

“我自岿然不动。”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中有：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有：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有：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渔家傲·反二次大“围剿”》中有：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清平乐·会昌》中有：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七律·长征》中有：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念奴娇·昆仑》中有：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中有：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沁园春·雪》中有：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中有：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有：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有：

“一唱雄鸡天下白……诗人兴会更无前。”

《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有：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七律二首·送瘟神》中有：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七律·到韶山》中有：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中有：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七律·答友人》中有：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有：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卜算子·咏梅》中有：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七律·冬云》中有：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有：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贺新郎·读史》中有：

“盗跖庄0 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念奴娇·鸟儿问答》中有：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象这样含有宏伟形象的诗句还有许多，如立于天地之间，眼观“北国风光”的诗人形象，“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一篇读罢头飞雪”、“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等。诗词中的诗人形象更是宏大的，上帝的领地不过是“小小寰球”，而诗人的活动大地却是无数的银河系。正是这些叱咤风云、改天换地的革命者，才砸烂了旧制度，“一唱雄鸡天下白”，“换了人间”。

还有万户侯、地主、军阀、蒋介石、魔怪、虻蜂、白骨精、域外鸡虫、苍蝇、蚂蚁、虻蜂等等腐朽、渺小、卑贱的反面形象，更衬托出正面形象的宏伟。

意境广阔

《沁园春·长沙》上半阙所描绘的光彩灿烂、生机勃勃、“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江南秋景；《沁园春·雪》所描绘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惟余莽莽”、“山舞银蛇”、“红装素裹”的“北国风光”；《七律·登庐山》所描绘的“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的楚地吴天；《浪淘沙·北戴河》所描绘的“白浪滔天”、“一片汪洋都不见”的天水相连的大海；《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所描绘的“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十万工农下吉安”的雪里行军的雄壮图画；《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等诗词所描绘的“雾满龙冈千嶂暗”、“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激烈的战斗场面；《七律二首·送瘟神》第二首所描绘的“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的大规模建设的情景；《水调歌头·游泳》里所描绘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远景；还有《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里所描绘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世界形势图等等。

所有这些景象和场面，都不是为一时、一地、一物、一景所局限，而是上天、下地、祖国、世界、地球、宇宙，所呈现在眼前的都是寥廓无际、惊天动地的大场景，才使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具有感天地位鬼神、令人回肠荡气的艺术感染力。

语言奇丽

正象高尔基所说：“英雄的事业，需要英雄的语言。”毛泽东的诗词，之所以有如此宏大的气势，撼人心魄的力量，再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它雄奇瑰丽的语言。

“横空出世”、“一山飞峙”，如仙人挥手，神灵使差，招大山飞来，气势磅礴。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横扫千军如卷席”，一个“捣”字，一个“卷”字，写出红军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凌厉攻势，以及飞速发展壮大的气势。

“俱往矣”，三个字，力足扛鼎，几千年的历史，多少“英雄”、“豪杰”的业绩，由今朝的风流人物的一只巨手轻轻翻过，并开始书写了崭新的一页。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使我们自然想起鲁迅先生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冷”，一“热”，表现了毛泽东多么鲜明而严正的无产阶级立场，多么庄严而深切的爱憎感情，对帝、修、反的藐视，对人民的崇敬，溢于言表。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一个“吹去”，一个“上来”，又分别嵌一个“浪”字和“山”字，构成一幅多么美妙、生动的图画，而它的象征意义，又是多么的鲜明！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末句一个反问，何等深沉！罗荣桓同志对于党的事业之不可缺少，他的去世所造成的损失之无法弥补，给毛泽东所带来的悲痛，都是语言难于表达的。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诗人利用“装”与“妆”谐音，极巧妙地写出中华儿女的“奇”，赞扬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

对于毛泽东诗词所表现的博大胸怀、宏伟气势，柳亚子曾激动他说：“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是苏（东坡）、辛（弃疾）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激动之状，不能自己，遂填了《沁园春·次韵和毛主席咏雪之作》一词，兹将词的下半阙抄录于后，以资参考：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大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秋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想象奇伟，风格浪漫

古今中外，就诗歌创作手法而言，不外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派别。凡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的诗歌作品，就属于现实主义诗歌范畴；凡是在诗歌中一方面表现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美好未来和理想的热烈追求，这样的诗歌作品就属于浪漫主义诗歌的范畴。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文明古国，历朝历代都曾出现过文人荟萃、诗坛繁荣的大好局面。但由于我国是长期闭塞的农业社会，封建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崇尚务实的文化心态，使得传统诗歌在创作方法上主要表现为现实的而非幻想性的。当然，幻想性的浪漫主义作品并非绝迹，但却为数极少。这就造成了我国诗歌发展史上颇乏浪漫主义和幻想性作品的缺憾。

然而到了当代，伟大的毛泽东同志却以炫人眼目的光辉高居于文坛之上，成了一位了不起的“狂放的浪漫主义诗人”。据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评论：毛泽东是一位既崇尚务实又富于幻想的人，他生长在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对当时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深恶痛绝。他“个人性格之伟力可撼山岳”，“他领导的革命推翻了旧中国，并对中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其变化之猛烈，使任何一个大国历史上的社会突变都相形见绌”。“他从不自满，总是探索一个充满人性的、具体实在的社会主义”。“他是不屈不挠的中国人，他与世界意识形态进行了尖锐的交锋”。这就是说，永远地不安于现状，永远地追求新的境界，这就是这位伟人的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在他的感情世界里，永远跃动着诗人般的激情和变革的力量。所以他创作的每一首诗词，虽都立足于现实，但却都闪烁着一种理想的光辉，充满着对理想境界的执著追求和热切希望。他的诗词也就成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七律·答友人》就是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瑰丽的艺术形象热情歌颂我国人民不畏困难、顽强奋斗的革命精神，展望社会主义祖国光辉前程的优秀篇章。这首诗写于1961年，当时国内形势是严峻的。但毛泽东对前途依然充满信心，他认为困难是暂时的现象，一种令人神往的美好前景就在不远的将来。因此他用了轻松浪漫的笔调，将自己的思乡之情同湘文化中的美丽传说巧妙地融为一体，写出了一曲对家乡湖南的美丽赞歌。可以说这是一首友谊之歌（答友人）、怀乡之曲，同时也是现实与理想的二重奏。诗是这样写的：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点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是一幅非常明丽神奇的图画：高高的九嶷山上，白云随风飘动，神话传说里上古时代的神仙姐妹娥皇、女英从青翠隐约的九嶷山上乘风翩然来到了人间。她们为人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波澜壮阔的生产建设所吸引，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喜悦，离开了寂寞的仙境，来到了生活沸腾的人间。那湘地特有的布满了点点泪痕的斑竹，是她们旧时代辛酸生活的记录，而灿若红霞的华美彩衣又是新中国光明幸福的现实生活的象征。两位翩翩下凡的仙

子在湖南大地上看到了什么呢？她们看到的是洞庭湖涌起一层层连天雪浪，听到的是英雄的湖南人民在高歌猛进，唱出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感人诗篇。看到这样一幅令人振奋的社会生活画面，诗人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端。他从湖南进而联想到整个中国，从眼前联想到了未来。他仿佛看到，在不久的将来，伟大的中国将会沐浴在辉煌灿烂的金色阳光里。

这是一首别具风采与情韵的诗歌。在这首诗里，诗人发挥了奇特的想象，借用了神话传说（帝子、斑竹）故事，以极度的夸张（洞庭波涌连大雪，长岛人歌动地诗）和强烈的对照（斑竹一支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手法进行构思，将这首诗写得热情奔放，格调激越，激动人心。充分表露了作者对一种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和坚定信念。在当时国家尚且面临困难的情况下，诗人为自己的国家、为新生的社会制度描绘了如此令人神往的美好境界，就使这首诗犹如一轮红日将重重迷雾驱散，给全国人民以热情的鼓励和明确的指引，可以说这是革命浪漫主义手法最成功的运用。

《蝶恋花·答李淑一》是一首全部用神话式构思的幻想诗篇。这实际上是一首悼亡词，是悼念追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爱妻杨开慧和战友柳直荀烈士的。谈到悼亡诗，一般的思路大约是作者怀着沉重的心情，追忆逝者生前的生平事迹，性格为人，所作贡献和死后给亲朋带来的精神上的巨大创痛等等。然而毛泽东的诗词文章总是力避平庸，注意开拓新意的。他的这首悼亡诗并不循从一般的思路，而是将自己对亡妻和战友的痛惜怀念崇敬之情，高度熔铸在一首仅有六十字的小令之中，又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让烈士的忠魂离开人间，轻轻飞升太空，在月宫中遇上神话传说中被惩砍伐桂树的吴刚和上古时代因偷吃不死之药而飞入月宫的仙女嫦娥。二仙对这两位不凡的人间来客大为崇敬，一个捧出天上名醇桂花酒热情款待，一个舒展宽大的水袖以长空作舞台为忠魂献舞。正当他们兴高采烈情绪正浓的时候，忽然传来人间降龙伏虎革命成功的消息。这突然而至的好消息，使他们兴奋激动，热泪滂沱。一时间抛洒的热泪化作了倾盆大雨倾泻到人间……多么美妙神奇的想象，多么不同凡响的形象夸张！在这里，人被神化，神被人化，天上人间，人神同台，他们同情感共哀乐。透过诗人创造的这一艺术佳境，使人突出感受到：革命烈士对革命理想的追求是生死不渝的，即使壮烈牺牲化作忠魂也执著不贰；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烈士不仅受到广大人民的普遍尊敬，就是天庭仙界也不例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那是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的；而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也是顺天应时，天人同庆的。正因此，这首词并非单纯地悼亡怀旧，而是透过塑造杨柳二烈士不朽的英雄形象，进而宣扬革命，宣扬自己共产主义的人生理想。这是一首异常成功的艺术佳作，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手法巧妙结合的美丽诗篇。

《念奴娇·昆仑》也是一首通过奇特浪漫的想象，抒发诗人改造中国和世界宏伟理想的壮丽词章。

这首词写于1935年10月。那时长征已近结束，红军即将抵达抗日前线。此时毛泽东登上岷山，远望高大古老的昆仑山，联想到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情在胸中升腾，于是喷吐成篇，唱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强音：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在这首词里，作者驰骋想象，把昆仑山描绘得磅礴雄浑，高大严寒，历史悠久，傲视人间，并且具有人的情感和灵性。它有时性起，“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有时又使江河泛滥，形成灾害，“人或为鱼鳖”。岁月悠悠，它给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和痛苦！然而对于这样一个祸及人类的庞然大物，千百年来，谁也不曾关心评论过它，更谈不上管束改造它，使它造福人类了。而此时的毛泽东，却面对高寒多雪的昆仑慷慨抒怀，他以一个时代巨人的气魄和口吻对昆仑山发话指令：要改造你昆仑山这高寒多雪的旧貌！我要倚天抽剑，将你腰断三截，分赠世界，合理处置，使全球凉热均等，人类共享幸福太平。

对这首词的主题思想，毛泽东曾明确表示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细细想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帝国主义确实就是横亘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的“昆仑山”。你看，东有日本，西有德国，再加上美英等世界列强，它们四方伸手，处处侵略，掠夺杀戮，奴役颠覆，搅得世界永无宁日。毛泽东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决心削平帝国主义这座大山，使全世界人民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奴隶和压迫，过上同享幸福的自由生活。这首词以雄伟的气概开头，又以雄伟的气概结尾，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抒发消灭帝国主义的豪情，描绘改造世界的雄图，歌唱共产主义的美妙理想。

在毛泽东意识领域里，不断变革是它的核心。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曾说：“毛泽东极其痛恨一成不变。他认为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动，将来也永远如此。”正因此，在这位伟大人物的脑海中，永远有一种高于现实的理想在鼓动着不断地探索，不停地前进。在他的感情世界里，永远激荡着的诗人般的激情要抒发，要歌唱，所以他写出的一首首诗词，不管是马背上哼成的小令，还是来自长征路上和秦晋高原的绝唱，不管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写成的美丽词章，还是六十年代向修正主义发出的战斗诗文，无一不是表达自己对终生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执著的信念和追求。正因此，他是当之无愧的最善于表达崇高理想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亦庄亦谐，幽默风趣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同时又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诗人。他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斗争，置身于整个革命的历史进程，他用诗词的形式记录了这些曾发生在眼前的历史镜头，使一首首携带了战火硝烟、时代风云的壮丽诗篇，成了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毛泽东在自己的诗词中，或抒发壮志豪情，或歌唱斗争胜利，或与敌方进行论战，可以说每一首诗都是一次历史性的珍贵记录，每首诗都反映了一项重大的革命主题。如何承载这些重大的主题，作者不是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来进行政论式的说教，而是通过诗的优美形式、夺人的艺术魅力来完成实现的。特别是在一些篇目中还带有寓言的特点、漫画式的幽默和喜剧的色彩，这就使他的诗歌作品显得多姿多彩，具有特别强的艺术感染力。

1963年写成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可算是一首国际题材的词作，反映的是反修的重大主题。当时国际形势是动荡的，帝国主义的嚣张，中苏关系的恶化，反华浪潮的不断掀起，形成了“雪压冬云”、“寒流滚滚”、“万花纷谢”的严重局面。面对这种严峻的国际气候，毛泽东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写出了《满江红》这样一首战斗的词章，给予对方以迎头痛击。

词的上阕写道：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尽管恶势力一时猖獗，貌似强大，但毛泽东在任何敌人面前显示的总是巨人般的形象。在他眼里看来，整个宇宙空间那么大，小小地球上的几只碰壁苍蝇又算得了什么！别看这几个小小丑类又是挣扎，又是怪叫，其实更加显示了它们形象的丑陋和行为的可笑。而当时的修正主义者在国际舞台上也犹如苍蝇一般，处处钻营，大喊大叫，东一处讲话，西一个报告，歇斯底里，丑态毕现。毛泽东俨然一位漫画大师，将其形象与苍蝇的丑态联系在一起，维妙维肖地画出了他们形象的丑恶和本质的虚弱，表现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修正主义者的深深的憎恶与鄙视。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此句中的两处用典都十分耐人寻味。有关唐人《南柯太守传》的典故恐怕是尽人皆知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酒后醉卧大槐树下，酣然一场好梦。梦中来到一处所在，谓之“大槐安国”。这位外来客一时间福星高照，攀龙附凤，荣华富贵，好不自在。然而一觉醒来才发现这原来是南柯一梦，梦中的“大槐安国”不过是槐树下的一个大蚂蚁窝罢了。作者用此典故真是妙不可言。他无情地讽刺了现代修正主义跃武扬威、称王称霸的狂妄行径。既令人发笑，又值得人深思。

“蚍蜉撼树”，典出韩愈诗：“蚍蜉撼大树”，用在此处意在讽刺修正主义者妄图按照个人的意志逆转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真可谓利令智昏，可笑不自量！

这首词涉及的论题是重大的，论战是严肃的，然而毛泽东通过一系列的比喻和用典，似乎信手拈来，使文意显得极为轻松，而那艺术效果却又是异

常辛辣犀利，足以致敌于死命。词人就象一位幽默大师在向人们讲述一个笑话，令人发笑，促人深思，正所谓庄中有谐，庄谐合一，显示出幽默的力量。由于诗句形象而又深刻地概括了生活中的某种哲理，往往成了人们的口头用语，比如这“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一句，就成了这样的名言。

1965年发表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就主题而言，也是针对修正主义的。不过此词侧重表达的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作者的原则立场。这首词在形式上也是很有特色的。

我国古代的词，在最初的形成阶段，内容形式都比较单一。但到了宋代，词一下进入了辉煌发展的阶段，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较大的发展和突破。从那开始，词的形式渐趋灵活，并产生了“以诗人词”，以对话入词的作品。比如李清照的《如梦令》就有“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样生动传神的词中对话。毛泽东的这首《念奴娇》就避开了传统表现手法，而采用了对话入词，通过两鸟问答的方式，来揭示重大主题。这就使这首词作新颖别致，诙谐幽默而又不失郑重。

词的上阕写鲲鹏与蓬间雀不同的神态和气质。诗人让这两只不同胸襟和气质的鸟儿在“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严酷社会现实面前作对比亮相：鲲鹏鸟显示的是展翅壮飞的雄姿和“背负青天朝下看”的沉稳，隐隐透露出它内在的伟力。而蓬草之间的这只小雀则被吓得惊呼哀叹，仓皇四顾，急欲逃飞。其胆怯猥琐之态毕现，与鲲鹏适成鲜明对照。

下阕写两鸟对话：

鲲鹏问：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鲲鹏怒斥：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在这里，作者假两鸟对话，形象地揭示出当时在社会主义营垒内，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战争和平观和共产主义远景观。在这里，雀儿代表了被诗人否定的一部分人的观点，这部分人向往着“仙山琼阁”般的所谓“三无世界”（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以为1963年秋苏美英三家鉴订的一个条约就可永保世界和平。并津津乐道所谓“土豆烧牛肉”式的“福利共产主义”。而鲲鹏鸟则代表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它面对这一套庸人哲学和自欺欺人的荒唐观点，忍不住痛斥怒骂：“不须放屁！”诗人之所以通过鲲鹏鸟这样痛快淋漓地怒斥对方，足见自己愤怒至极。毛泽东对任何事情从来不抱幻想，在他看来三国订立的那一纸条约，本身就各存私心，是场骗局，怎能确保世界的永久和平？至于“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那更是对共产主义宏伟理想的歪曲和亵渎！他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继续奋斗，力求世界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就在这喜笑怒骂的十个字里，不仅表现了诗人的愤慨之情，而且还透露出他对当时世界问题的深沉忧思。

这首词颇具寓言的味道和喜剧的效果，看起来是那么轻松诙谐，实际上是通过非严肃政论的形式来表达严肃的政治原则问题，真正做到了庄与谐的

高度统一。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诗，也具有类似的特点。比如《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这首诗主要是针对柳亚子先生的思想问题而对他进行真诚的开导和教育的。可以说这是一首热情洋溢而又坚持高度革命原则的抒情诗。

柳亚子先生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有过较大贡献。但在革命刚告成功新中国尚未诞生之际，他便闹开了个人情绪。由于对自己估价过高，又自恃有功，总以为党和人民没有公正地对待他，使他感到委屈，所以便直言不讳地向毛主席发牢骚，并要回归故里，过隐居生活。很明显，柳亚子的思想病根就是个人主义在膨胀。但他毕竟是个有功于人民的民主战士，是个有一定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又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对他的思想问题的解决处理关系到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所以毛泽东以极诚恳的诚度，用对方最易接受的和诗方式与对方叙旧谈心，善意规劝，诚挚挽留，以此来打动和开导对方，并对他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和教育。应该说，诗的主题是重大的，影响作用也是深远的。可是毛泽东在写这首诗时，那语气又极为平易和蔼，象啦家常似的那么轻松。特别是“牢骚大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两句，那意思是说：老朋友啊，一个人牢骚太多，肝火过旺，愁肠百结，可是要伤害身体的呀。对待一切事情，都应该把眼光放长，从大处着眼，不要只着眼前这一点才才好。这话说得多么得体，既说出了做人处世的原则，又包含了对对方的体贴爱护，还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幽默（牢骚太盛防肠断）。丝毫没有领袖居高临下的批评指责，也没有抽象生硬的理论说教。使人听了，如沐春风，如饮甘露，内外舒服，心悦诚服，并能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这足以显示出毛泽东诚恳待人又善于启人心扉的领导艺术。

总的来说，毛泽东同志的政论文章，平易浅近，深入浅出，使人易于理解接受。他的诗词，形象生动，富有美感，又有幽默风趣的风格特点。正象他的为人那样，他是那么博大精深，却又那么平易近人，处处显示了独具的幽默和风趣。这一切大概就是毛泽东这位领袖人物具有的气质和特点吧。

情理交融谱佳篇

毛泽东写于1950年11月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步柳亚子先生词的原韵，仅以四十二个字把上下几千年的的是是非非作了精到的评说，又把与柳亚子先生几十年的友情蕴含其中，确是一首史诗绝唱，又是一曲友谊赞歌。

柳亚子原词《浣溪沙》是1950年10月4日和5日连续两个晚上在怀仁堂观看《和平鸽》舞剧，由舞剧歌颂和平，联想到美国在朝鲜挑起战争，由感而发，即兴而填此词。毛泽东看到柳词后，站在哲人的高度，由一斑而窥全豹，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历史规律，同时对柳词中对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成立所洋溢出来的满腔热情和爱憎分明的正义感，深感欣喜和赞赏，并由此而联想到柳亚子先生的一贯品格，于是便填写了这首和词。这首词既是对历史的回顾和总结，也是对时局的表态和判断，还是对柳亚子先生人格的肯定和评价。

这首词，其本身的重要意义暂且不说，仅就其填写的时间看就非同凡响。1950年6月25日，美国纠集十五国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悍然挑起了朝鲜战争。27日美国派出海军和空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第七舰队向我国领土台湾沿海游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和图们江进逼，直接威胁我国东北边境的安全。面对这复杂的时局和严峻的考验，刚刚经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的年轻的共和国何去何从？毛泽东同志“冷眼向洋看世界”，站在时代的高度，高屋建瓴，权衡利弊，进行了冷静的思考，作出了科学的判断，下定了应战的决心，并充满必胜的信念。于是10月8日，毛泽东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10月25日至12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接连发动第一、二次战役，歼敌五万余人，收复平壤，把敌人赶回“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朝鲜战局。毛泽东写《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这首词时，恰值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捷报频传的时候，所以，这首词是以艺术形式记载了这一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对中朝人民，而且对世界人民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史学价值。请看：

颜斄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这首词采用了明线（或理线）和暗线（或情线）写史叙情的方式。明线综合概括了纵贯亘古的历史，语粹词精；暗线则把与诗友、挚友柳亚子几十年的友情贯串起来，情真意切。

先从写史的角度看，首句以典型化的手法，形象地勾画出古代历史的缩影。战国时，齐宣王召见大臣颜斄，君臣双方都希望对方趋就自己，结果互不相让，又都自觉有理。齐宣王认为臣仆趋奉君王是天经地义、合乎礼仪的，所以作为处士的颜斄理应在进见时，走到他的跟前来，向他叩拜问安；颜斄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臣仆向君王靠近，说明臣仆是仰慕君王的权势地位，而若是君王下位来迎臣仆，那么世人便觉得君王礼贤下士，天下贤士闻之便会

主动趋向、尊重、爱戴这样的明君贤玉，就会为明君所用，国家也会因得人才而兴旺昌盛。当然，这里讲的是历史故事，但它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它是整个古代历史的生动写照。毛泽东同志正是艺术地选取了这一历史典型简笔投影，反映了古代历史的普遍规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内部的和阶级之间的）。

二句“多年矛盾廓无边”，由典型到一般，对首句作了补充，进而对旧的历史作了概括。所谓补充，就是说“颜斶齐王各命前”这种矛盾和斗争，从时间上说是“多年”都存在；从空间上看，是“廓无边”。“廓”，边缘。“廓无边”，没有边缘，即说不尽道不完的意思。所谓概括，就是用“多年矛盾廓无边”把整个旧社会的历史一言一蔽之作了明确判断，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普遍存在不可避免的。

然而，历史发展到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十月一日，对中国人民来说，犹如度过了几千年的漫漫长夜后，听到了雄鸡高唱，看到了光焰的朝阳，挣脱了身上的枷锁，获得了主人的地位。数千年的历史来了个地覆天翻，神州大地仿佛换了人间。所以词的第三句说“而今一扫纪新元”。“而今”回应上句的“多年”。“纪新元”即“新纪元”。从词的含义看，“而今”和“纪新元”同指解放后的中国。“一扫”是指“颜斶齐王各命前”和“多年矛盾廓无边”旧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以主人翁的姿态开创着自己历史的新纪元。

上阕三句，形象而概括地描述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首句写点，形态毕现；二句写面，言约意丰；三句划限，在解放前后、新旧历史之间树立了一块界碑，它标志着旧的历史已成过去，新的历史刚刚掀开。

下阕，初看是毛泽东对柳亚子先生《浣溪沙》词的赞赏和对朝鲜战争捷报频传的喜悦兴奋，实际上，全词“一意贯底”，下阕只不过是上阕词义的自然延伸和顺理成章的发展，是“纪新元”的拓宽。

首先，“最喜诗人高唱至”，“诗人高唱”即指柳亚子先生的《浣溪沙》，而柳同所高唱的正是歌颂和平，歌颂“工农大众力无边”，这不正是“纪新元”的核心内容——中国人民成了历史的主人吗！请看柳亚子先生原词：

浣溪沙

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演出《和平鸽》舞剧，欧阳予倩编剧，戴爱莲女士导演兼饰主角，四夕至五夕，连续在怀仁堂奏技。再成短调，欣赏赞美之不尽矣！

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妍！

其次，“正和前线捷音联”，也是“纪新元”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余年来，是中国人民倍受耻辱的百余年来，是东西方列强践踏蹂躏中国人民的百余年来，也是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重压下奋起抗争的百余年来。只是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飘扬在中国上空的时候，中国人民才“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才“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抗美援朝，敢于和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为首的十几个西方列强公开抗争，敢于和当年在旧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的强敌兵刃相见、一决雌雄，而且初战告捷，

频传佳音。这就以不容置疑的事实证明中国人民不但有能力荡涤中国大地上的一切污泥浊水，以其辉煌的光焰普照人间，而且也有力量面对一切凶恶的敌人保卫住自己用鲜血和生命得来的胜利果实。抗美援朝的胜利，确实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历史中扬眉吐气的一页。饱经战争创伤，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是逼近家门强加在头上的非正义战争，这怎么能说不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新纪元呢！

最后，“妙香山上战旗妍”是与柳词“天安门上万红妍”的回应。天安门是中国革命成功的象征，“妙香山”是朝鲜人民的革命圣地，此处是以“妙香山”代指朝鲜，“妙香山上战旗妍”是指朝鲜战争的初步胜利使迎风飘扬在空中的反侵略战旗更加鲜艳夺目。

再从叙情的角度看，这首同与柳亚子先生畅叙友情这条暗线（情线）也是很清楚的。首句“颜团齐王各命前”，一方面是写史，一方面是喻今，用颜眉与齐王的矛盾借指柳亚子与蒋介石的斗争。在“二十二年三握手”的长期交往中，毛泽东同志把柳亚子先生比作颜颡，这里面蕴含着对柳亚子深厚的感情、真挚的信赖、崇高的赞颂，也反映了柳亚子二十多年来的高风亮节给毛泽东同志留下了多么难忘的记忆。他们第一次相识是1926年5月在广州。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柳亚子先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毛泽东同志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两人同时参加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借口“整理党务案”，大肆排共、反共，对此，毛泽东据理反驳。当时，柳亚子先生态度明朗地支持了毛泽东，并在初次会晤、相对品茶、畅谈国事时，明确支持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反共叫嚣，谴责蒋介石策划中山舰事件等反共阴谋。

这第一次会晤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后来柳亚子曾根据第一次相识的印象写诗“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把毛泽东与孙中山并称为“两列宁”，并认为毛泽东堪称统帅和旗鼓。毛泽东在几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友谊时也说：“饮茶粤海未能忘。”第二次会面是1945年秋在重庆，当时毛泽东是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恰好柳亚子这时也在重庆。柳亚子非常敬佩毛泽东不畏艰险、大智大勇的胆识和气魄，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犹“雨霖苍生”。在渝期间，两人接触较多，且不断有诗书往来，柳亚子此时曾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便手书《沁园春·雪》词赠柳。第三次会面是1949年初在北平。当时中共中央筹备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2月，毛泽东电邀在香港的柳亚子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3月25日，毛泽东抵达北平，柳亚子同各界人士亲赴西苑机场迎接。当晚，毛泽东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柳亚子等，柳亚子异常高兴，即席赋诗三首。此外，自1945年以来除书信来往外，柳亚子曾多次赋诗赞颂毛泽东，毛泽东也曾先后三次和词酬答，所以毛泽东对柳亚子先生的为人是很了解的，把柳亚子比作颜颡不是毛泽东的礼貌用语，而是毛泽东对柳亚子先生人格的推心置腑的肯定和赞颂。

新中国刚刚成立，柳亚子先生便赋诗填词，满腔热情地歌颂人民政权的建立，对人民的翻身解放和革命大业感到由衷的高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柳亚子先生观看了舞剧《和平鸽》后，当即填写了《浣溪沙》作出反映：“推翻原子更金圆”，“战犯集团仇美帝”。对此，毛泽东非常赞赏，所以在词中才有“最喜诗人高唱至”。“最喜”二字，是毛泽东看过柳词后，

内心兴奋喜悦之情的自然流露，也是对柳亚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凛然正气的一种钦佩和鼓励。当然，“最喜”二字主要是指诗人的高唱恰巧与前线的捷音一块到来。

至此，从 1926 年 5 月广州第一次相识，共同反蒋，到 1950 年北平共事，同心抗美，可谓几十年如一日，心心相印，肝胆相照，同舟共济，荣辱与共。这就不难理解从 1919 年 4 月至 1950 年 11 月，仅一年半的时间，毛泽东在建国前后日理万机的情况下，竟三次与柳亚子先生和词酬唱，其友情之深、交往之厚，当不言自喻。

这首词，从写史的明线看，由“颜斶齐王”的故事，到“多年矛盾”的延续，直到“而今一扫”的现实，是一条自古至今，由远而近的发展轨迹，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简笔勾勒。下阕承接上阕，是上阕的延伸和拓宽，是“纪新元”的补充和注脚。从叙情的暗线看，从把解放前的柳亚子比作颜斶，到解放后“最喜”诗人高唱，不难看出他们的诗情同友情一样深。

全词仅四十二字，竟写出这样大跨度、大容量的绝唱来，真可谓粹语精词贯亘古，情理交融谱佳篇。

一样悼亡妻，境界各不同

正象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一时代的代表思想一样，每一时代也必然有这一时代的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所以有秦汉散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的说法。而每一种文学样式，又都有成就特别突出的作家作品。以词为例，词本形成于唐代，而且有了较为优秀的作家和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长相思》（汴水流）等等，甚至有一些作家因为风格相同，而形成流派，如刘禹锡的《浪淘沙》（日照澄洲）、温庭筠的《忆江南》（梳洗罢）、韦庄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便开了花间派的先河。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南唐后主李煜，虽然唱的是亡国哀怨之音，但在词的创作艺术上却达到相当高的成就。

尽管如此，词的创作，真的冲破婉约派的羁绊，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艺术创作上也达到高峰期的，那还是到了宋代，即使婉约派，也是到了柳永、欧阳修、李清照等，才达到极致。尤其到了苏轼、辛弃疾，才一扫词坛萎靡之风，创造性地开一代豪放派新风。陆放翁说：“词曲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豪气，超脱尘垢，于是《花间》为之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

此后几百年，在词坛上尚没有能超越他们的。只是到了毛泽东，于词坛突起，从内容到形式，其成就都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正如柳亚子评价毛泽东的诗词时所说：“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秋情着意雕。”又评说：“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毛泽东的诗词，真可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苏、辛也确实无法望其项背。

但作为诗词大家，他们的作品风格，也不是一律的豪放，也不乏细腻深沉的佳作，他们的悼亡妻词，便是一例。

单说悼念妻子的佳作也不少，如传为千古美谈的陆游与爱妻唐碗的爱情悲剧的故事。陆游已八十一岁，白发苍苍，老态龙钟，仍不忘长眠九泉之下的唐碗，写了两首怀念她的诗：

十二月二日梦游沈氏园亭

其一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其二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诗人目睹旧物，触景生情，梦中见到往昔与爱妻在沈园相会的情景，怎不叫人痛彻肺腑？后人便根据他的词《钗头凤》、唐碗的同名和词及有关故事，把他们的爱情悲剧故事搬上舞台，为大家所熟悉。

又如中国词坛有“清之李后主”之称的纳兰性德，虽是个公子哥儿，但却汲重感情，尤其对结发之妻，异常钟情。他说，如果爱妻象天上的明月那

样，始终皎洁，那么，他情愿卧冰踏雪，为她牺牲一切。可惜，不幸的是，在他二十三岁时，爱妻一病身亡，他痛不欲生。在《沁园春》一词的小序中写道：“丁巳（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时作者二十二岁）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淡妆素服，执手哽咽，语多不复能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可见他对亡妻的哀悼悲恸到什么程度，这细腻、深沉的感情，便凝成了《蝶恋花》这首词：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长如玦。若是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纳兰容若创作这阕词前后的思想感情状况，词的构思和结构，似都步苏轼悼亡妻词的后尘，感情的深沉程度、词的艺术造诣似也不及苏词，故不作详细分析。

下面仅将苏轼和毛泽东这两位诗史上地位显赫的诗人的悼亡妻词作些比较，以显：一样悼亡妻，境界各不同。

在这里，自然无意苛求古人，只是想通过比较，领悟毛泽东博大而宽广的胸怀，伟大而崇高的人格，了解他在诗词方面杰出的艺术成就。

为比较方便，把苏轼和毛泽东的两首词分别抄在下面：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蝶恋花·答李淑一
毛泽东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同是年轻时胸怀壮志、心地广阔、多才多艺的伟大诗人，同是悼念自己亲爱的亡妻，感情同样真挚而深沉；艺术上都显示出极高的造诣，都把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他们都是豪迈之情的大手笔，却都以柔婉的语言，写出细腻、令人柔肠寸断的词来。都是悼亡诗，而且都成为这类诗词中的绝唱。

下面重点比较其相异的地方。

—

两人的创作意图完全不一样。苏轼由于与王安石变法派政见不合，从权开封府推官，乞外任通判于杭州，再移知于密州（今山东诸城）。虽刚四十

岁，正当不惑之年，却过早地衰老，想“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诗酒趁年华”，甚至干脆想学庄周“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就是借悼念爱妻王弗，抒发他十年中，虽怀“奋励有当世志”，但却宦海沉浮、仕途失意、坎坷不得自由、生活颠沛艰辛和无限郁闷悲观之情。这悲，是个人的悲；这痛，也是个人的痛。出发点、落脚点，都是个人。

毛泽东却不然，他是经过三十年的浴血奋斗，缔造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又取得伟大成就时写的这首词，词借奉和李淑一大作，怀念爱妻杨开慧、战友柳直荀两位伟大战士，颂扬革命，颂扬先烈为革命生死以之的献身精神，以激励还活着的人们，尤其革命后辈，发扬先烈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坚持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忧，是为革命；喜，也是为革命。这生离死别，一切都是为了革命。

二

词中的人物形象不同。苏词中，有两个形象，苏妻：死后十年的王弗，无限孤寂，凄凉，已“尘满面，鬓如霜”；年少时的王弗，聪颖贤慧，有识见，夫唱妇随，完全一位才女形象。更主要是诗人自己：十年酸辛，仕途多艰，怀才不遇，虽正壮年，却两鬓如霜，满怀思念，一脸悲苦，以泪洗面。这形象使人平添愁肠，歔嘘不止！

毛泽东的词的形象则有：为革命叱咤疆场，视死如归、英勇献身的伟大战士杨开慧、柳直荀，虽死犹生，他们的英魂飘飘升仙的形象；还有无限崇敬烈士，热烈欢迎英魂为他们捧酒起舞的吴刚、嫦娥仙人形象，以及先烈为革命胜利而喜悦之泪如雨，群众为革命胜利热烈祝贺的场面。这些形象，令人肃然起敬，倍受鼓舞。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古人的游仙诗，诗人是在其中的，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而毛主席的游仙词，诗人却不在其中。

三

词的意境不同。王弗十六岁与苏轼结婚，英宗治平二年病逝，第二年归葬于故乡四川眉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作者在山东密州，遥想千里之外家乡的一座孤坟，何等悲凉！夜晚，明月当空，冈上长着矮矮的松树，爱妻孤零零，长眠在这里。这境界虽在想象中，可对于一个遭遇不幸的人来说，又怎么受得了这悲苦的煎熬啊！

毛泽东的词意境则不然。杨开慧、柳直荀两位烈士的英魂飘飘升仙，仙人奉酒相迎，境界寥廓而高远，静穆而庄严。尤其嫦娥于万里长空婆娑起舞的场景，本已热烈感人，正当此时，人间传来“伏虎”的消息，就更使人激动万分，以致泪飞如雨。这人间天上，烈士仙人，桂酒歌舞，这是一种多热烈而神圣、多彩而优美、宏大而鼓舞

人心的境界！

四

诗的情调不同。一个泄郁闷之气，一个发天地豪情。苏词的调于是个“悲”

字，人生维艰，堪悲；眼前处境艰难，堪悲；梦前思妻，堪悲；梦里见妻无言，堪悲；醒来孤苦，堪悲；前途茫茫，更堪悲！所以，低沉的晦暗，读了，令人抑郁、窒息！

毛泽东的词格调却是高昂、明丽的。亲人、同志捐躯，令人悲哀。但烈士是为人民献身，重如泰山，死得其所，虽死犹生，虽死犹荣。为他们感到自豪，为他们受到鼓舞，为完成先烈们的遗志，更忘我地奋斗不懈。

五

创作方法不同。苏轼的悼亡词，笔势跌宕，婉转开合，速缓顿挫，虚实结合，白描手法，语言平易质朴，于思念亡妻的悲哀中，揉进了个人的身世与感慨，深婉执著，感人至深。想象倒也丰富生动，但所写皆是梦，梦前，梦中，梦后，都是现实的。所以，他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

毛泽东的词就不同了。他所写的人，立足于现实，又超乎现实，完全神仙化典型化了。所颂扬的不止杨开慧、柳直荀两位烈士，而是所有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所写仙境、仙人的活动场面，都是为典型人物幻想出来的典型环境。既奇特绚丽，全是想象中事，又是合乎情理的。忽而人间，忽而天上；忽而烈士，忽而神仙，全是理想中事。所以，他的创作方法，是革命浪漫主义（是为主）与革命现实主义（是为辅）相结合的。

前人说：颂扬之词难作，“倘尽言富贵，则尘俗；尽言功名，则谀佞；尽言神仙，则迂阔虚诞”（张玉田《词源》）。避其三者而为词，才是佳作。毛泽东的艺术高明之处，在于不直言杨、柳两位烈士的业绩，也不直接歌颂他们的贡献，而是写他们的英灵飘飘九霄，仙人奉酒起舞，烘托他们的事业之伟大，境界之崇高，精神之不朽。尤其妙的是，烈士游仙，而诗人不在其中，一反古人，不蹈袭前辙，着意创新，为人叫绝。

郭沫若对《蝶恋花》词的评价极高。他说：“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体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

熔铸前人意，传我无限情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即使在戎马控侮、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也绝不忘读书。他的记忆力也使人惊叹，许多诗文，他都能背诵。每到用时，随手拈来，纯熟之极。

很值得学习的，是他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他喜欢古但不泥古，学习古人的长处，却不步古人的后尘。他总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些古人诗句，到得他的手里，一经熔铸，便会熠熠生辉。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其间各个党在国际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统一。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道：“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中国有句古语：‘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这么大的世界性会议，这么庄严的论题，毛泽东却讲得如此通俗、风趣，引起满场笑声，毛泽东宽广的胸怀博得大家热烈鼓掌。于是，一致同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求大同，存小异，互相支援，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挑战。

大书法家赵孟 有件艳事：他有位贤良的妻子，叫管道升，善画墨竹、兰、梅，亦工山水、佛像，诗词歌赋也造诣很深，本来是女子中魁首。但赵孟 却意想天开，要纳妾，又不便开口，便填了首词，给管夫人看，其中有：“岂不闻上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无过分。”还安慰她：“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

管夫人知道后，自然很不高兴，可又不便发作。为了劝阻丈夫，也填了一首格调新颖、内容别致的《我侬词》：

我依两个，忒煞情多！譬如将一块泥儿，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忽然欢喜啊，将它来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团、再炼，再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那其间啊那其间，我身子里也有了你，你身子里也有了我。

完全用口语，却形象鲜明，感情真挚，使赵孟 深感内疚，于是打消了纳妾的念头。

虽然不能说毛泽东讲话中的比喻，就一定来自这首词，但毛泽东一定熟悉这首词，大概不会错吧。

毛泽东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词《卜算子·咏梅》，就是熔铸陆游的同题词而成的，不过是“反其意而用之”罢了。

陆游的词，上阕写梅花在黄昏、苦风凄雨中的孤苦和冷寞。下阕是：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与群芳对立，孤芳自赏，自傲。托物言志，陆游慨叹的是自己空有报国志，终无施展时。

毛泽东的咏梅词，确与陆游词决然不同。上阕环境险恶，梅花却无限欣喜，含无限自豪。下阕则是：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让春色春情

给群芳，隐于山花烂漫中，露出会心的笑，多么崇高的风格！歌咏情，毛泽东同志以前人所不可能具备的昂扬的格调，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艺术地塑造了一个无私无畏、自信自强、自豪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又极富浓郁的意境。

宋代词坛，苏轼是豪放派的代表之一。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人交口称赞。可结尾句却是：“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是个有大抱负、又才华横溢的人，却借颂古时英雄事业有成，叹自己一生虚度，无惊人建树。最后这样结尾，足见他痛苦难言，消极之至。纵笔力雄健，风格豪放，但终不能给人半点鼓舞力量。

毛泽东的《菩萨蛮·黄鹤楼》词，其结尾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与苏词相比就大不一样了。虽然，面对长江，滚滚东流，事业艰险，心情苍凉，对江酹酒，最后却奇峰突起，结在“心潮逐浪高”上，确似见他感慨万端，心潮难平，更激起他对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毛泽东洒洒大江，但却能脱俗超群，精神所致，情如狂潮，奔流入海，震撼时代。不说这种革命的无私无畏和乐观主义精神，单说气魄的宏伟，也是苏轼所无法比拟的。

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里，有句：“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以在毛泽东的词《念奴娇·井冈山》词里，看到这句的影子：“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同是回首往事，辛弃疾想到的是：四十三年了，现在了望长江北岸的扬州，还记得那时候遍地燃烧着战火，令人伤怀，令人气愤，倍感压抑。毛泽东所想到的是：抚今追昔，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买在来之不易，那血与火的战争年代，那流血牺牲，都还历历在目，象是刚刚发生在昨天。活着的人们，当牢记革命传统，努力奋斗，争取更大的胜利。

不仅寓意翻新，就是遣词造句，也有显著的变化，自然流畅，不留痕迹。

《七律二首·送瘟神》第二首颌联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就是熔铸前人诗句而来的。王安石有诗句“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李贺有诗句“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西厢记》中也有“红雨纷纷点绿苔”的句子。不过毛泽东用“红雨”、“青山”，配以“随心”、“着意”，有静有动，赋予大自然以生命，一切就都活起来了。既描写绚丽多彩的自然景物，给人以美的享受，又抒发了天随人意，人定胜天的喜悦心情。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有许多名句，充分显示出他思想、艺术方面的独到之处。即使有的诗句是由前人的诗句熔铸而来的，甚至是同样的词句，但也看出毛泽东的高超之处。又如南明陈子龙有首词《二郎神·清明感旧》，开头句是“韶光有几？催遍莺歌燕舞”，叹明代，好景不长，令人感慨。其实封建时代，只有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哪有社会的“莺歌燕舞”？陈子龙所以这样说，不过是衬托下面的感念亡国之情罢了。

可“莺歌燕舞”到了毛泽东笔下，真正别开生面了。“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莺歌燕舞，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真是祖国江山如画，神州一片升平啊！

这莺歌燕舞，有名有实，与全词和谐，才真是用得恰到好处。

毛泽东博览群书，诗词中许多词句，都有来历。《念奴娇·昆仑》一词中，有句：“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这“倚天抽宝剑”，便是

来自楚国宋玉的《大言赋》：“方地为舆，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以地为车，以天作车盖，挎着倚天之外的宝剑，何等的不俗，何等的英武。然而，大言而已！

毛泽东借来这倚天宝剑，就不是大言，而有了实用了。把昆仑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所向往的是，帝国主义全部消灭，共产主义实现了，使昆仑山变祸害为造福全人类。借以表达，中国人民应当对世界革命、世界人民的和平幸福，作出较大的贡献。

这个抽“倚天之外”宝剑的只能是象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何等的伟人，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抱负，何等奇绝的畅想！

《念奴娇·昆仑》一词中，还有一句：“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来自南宋魏庆之辑《诗人玉屑》“知音”姚嗣忠条：“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对比之下，可看出毛泽东翻新的功夫来。

原句只写雪，未写寒，便失了感觉。而且为表现雪大，所以用“败鳞残甲”作比，似也不甚贴切。这两句诗的意境与生活的真实相去较远，也显得有些呆板。而毛泽东的“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句，就不同了。不但写雪，而且写寒，即不但写眼见，而且写所感；不仅写形象，而且写气势，互相映衬，生动亲切。尤其用了“飞”、“搅”两词，则更传神，显出卷下纷纷扬扬、漫天鹅毛大雪来，使蜿蜒不绝的昆仑山脉，好象无数玉龙飞舞起来。写了山，其实突出了大风雪，着墨不多，生动形象地活画出肆虐人间的风雪世界来，这样描写为下面写它危害人间、抒写诗人的理想作了铺垫。

有时同是熔铸前人的诗句，也自有新意。杜甫有首《缚鸡行》：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
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
虫鸡子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
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杜甫的意思是，虫蚁和鸡对于人来说，无所谓厚非，本属自然；人也没有必要因自己的喜好和厌恶对鸡虫分厚非，从而抒发对现实的感慨。

鲁迅先生也有诗《哀范君三章》，“其一”中也有关于“鸡虫”的诗句，便来自杜诗。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茶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鲁迅先生是说，“鸡虫”都不值得重视，用来比喻那些争权夺利的可鄙人物。另外，当时自由党主持人何几仲排挤范爱农，为范爱农所鄙视，所以说“白眼看鸡虫”，以赞扬范爱农正直、不趋权贵的品质。鲁迅先生用“谐音”的修辞法，“鸡虫”谐“几仲”，非常巧妙，顺手给何几仲一枪。

毛泽东在《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一诗里，也有关于“鸡虫”的诗句。与杜甫、鲁迅的诗比，又添新意。

鲁迅先生虽以首句交代了背景：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成立，袁世凯便篡权，准备复辟；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俄帝国主义入侵伊犁。可鲁迅先生所指，还是那些争权夺利的小人，尤其指排挤范爱农的何几仲。毛泽东的诗句的意境，就广泛得多了。“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这实为写景，为诗人展开想象、抒发情感，创造一个广阔深远、空蒙飘逸的典型环境，“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虽然以形象、贴切、生动的比喻，肯定了在全国迅猛发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但老友相会，情谊依旧，面对国内外形势，终有别一番滋味。

在这里，毛泽东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治情怀：国内外敌对势力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非议，只不过是可厌的“鸡虫”小事，与我们要走的路、要达到的目标相比，都是不值一提的。其高瞻远瞩，恢宏旷达，思路深远，都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立意高远，遣词造句的功夫，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看来似经过千锤百炼，实际却是信手拈来。

毛泽东在谈到学习语言的时候，提出：“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就是要求“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古人语言中有生气的东西。毛泽东实践了自己的主张，继承了古人一切精华的东西，包括语言，并为己所用。既继承，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的论著、诗词中，随处都可见到毛泽东从古人那里学来的健康的東西，而且推陈出新，做出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翻新入化见奇功

古往今来，讲话写文章，赋诗填词，总少不了引用典故。自然，也有高明与低劣，工巧与笨拙，隔与不隔的区别。用得好，翻新入化，使内容丰富多彩，给人以教诲、有益的熏陶；艺术上绚丽多姿，给人以美的享受。用得不好，内容上晦涩，味同嚼蜡。所以，用得不好，不如不用。老舍先生就主张“留神少用术语。”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

“谢家池上，江淹浦畔”，为什么就隔？主要在于用典，不浅近。谢灵运有“池塘生春草”句，所以“谢家池上”，便是指春草。江淹的《别赋》里，有“春草碧色，春色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因此，“江淹浦畔”仍指春草。这样用典，不易懂，艰涩费解，需得详作解释，否则，便成了读者负担。

有的隔之又甚。李商隐的《锦瑟》有“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句，用两个典故，不懂典故，便不懂诗句，其实懂了“庄生梦蝶”、“杜鹃啼血”的典故，仍然难懂诗句，这样以辞害志，反犯了诗家大忌。

当然他用典不隔的佳例也不少。《无题》中有句：“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虽在用典，但不用解释，单看字面，意思也清楚。是说那女子用团扇遮掩她的娇羞之态，明明看得见，可她坐车走了，却无法接谈。

真正好的用典，贴切自然，绝不留痕迹。如鲁迅先生的《自嘲》：“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千夫指”来自“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孺子牛”，则来自齐景公模仿牛让孩子牵着鼻子走的故事。事实，读者不了解这两个典故，也不影响领会这两句诗的深刻而鲜明的含意。

毛泽东同志的语言修养很高，也是善于用典的行家里手。他用典入化，极值得称道。他用典的成功，在于做到了三点：恰当，用之当用，有助于表情达意；入神，不为用而用，而是赋予新意；易懂，绝不以辞害志，即不隔。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上阕是：

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

这里便恰当地用了颜斶和齐王的典故。《战国策·齐策四》称，齐宣王召见颜斶，说：“斶前！”斶却说：“王前！”齐王自然极不高兴，因为齐王认为臣叩见君，是天经地义；而让君趋见臣，岂不大逆不道？丧了自己的自尊。可颜斶自有自己的道理，所以他抗辩说：“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与其）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毛泽东用这个典故来作比喻，是指解放前蒋介石要柳亚子听从他的反革命主张，而柳亚子则要蒋介石听从他的革命主张。南辕北辙，有如水火，互不趋就。毛泽东把柳亚子比作颜斶，确实看出他对柳亚子先生为人的深切了解，不愧为知己之交。更含着对他的人格颂扬。

1926年5月，柳亚子和毛泽东都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柳亚子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会上，蒋介石悍然提出《整理党务案》，实质上是排斥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的领导权，掌握

在他自己的手里，实现篡党夺权、独夫统治的阴谋。毛泽东在会上坚持革命立场，不畏强暴，仗义直言，坚决反对蒋介石。而柳亚子先生伸张正义，支持毛泽东的革命主张。并出于义愤，进而认定，蒋介石是个祸害。“曲突迁薪今已矣，一夫不杀血成河”（柳亚《恭谒孙中山先生之灵堂有感》）。他自注说：“一九二六年夏，余游广州，初见蒋贼，即决其必反，力劝浑代英募力士狙击之，为中国除大害。代英不从，卒酿一九二七年南京上海之变。当时为蒋贼张目者，狗盗黄金荣、张啸林，文妖则吴敬恒、李煜瀛之流，滔滔皆是。”

毛泽东深知柳亚子的为人，1945年与柳亚子有诗书往来，毛曾在回信中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

知道了毛泽东与柳亚子先生的交往，知道了柳亚子先生一贯追求革命，大义凛然，一身正气的为人，就会更觉得毛泽东在这首词中，引用“颜闾齐王”这一典故的深刻含意和无比贴切。用典要恰当，这是多么典型的范例。

诗词里用典，不仅要恰当贴切，而且要入化，要赋予更新更深刻的含意，使之有更新的生命力。《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是当时整个世界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的概括，是一曲高彻云霄的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战歌。

上阕是：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表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这些反华小丑们的渺小、狂妄、日暮途穷的惨景。其中“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两句，便借助了一个典故。

唐李公佐小说《南柯太守传》载，有个叫淳于棼的人，梦见自己在“大槐安国”做了驸马，又在南柯郡当了二十年太守，自然权势显赫。等到妻子死后，官被解除，槐安国用车子送他回家。醒后追寻梦游之处，原来是在一株住着一堆蚂蚁的大槐树穴中。

这个故事寓意浅显易懂，为人乐道，广为流传。可毛泽东借这个典故，用在这里，却有着新的极为深刻的含意。

回想六十年代初，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一段辉煌时期之后，由于背离了马列主义，实行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因而同我们党和国家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我国边境上，出现了许多严重事件：

10月20日，印度军队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中国边防军英勇还击，迅速粉碎了印度的侵略。

11月起，苏联连篇累牍，发表几百篇文章，抨击中国的内外政策。另有四十多个共产党、工人党随声附和，又是作决议、又是发文章，多方指责中国共产党。

一时节“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形势极为严重。

另外，当时我国国内正面临着建国以来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内外搅扰，使我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但是，这群反华、反共的小丑，不过是几个碰壁的苍蝇；他们的反华叫

器，也不过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他们的反华反共的图谋，仍不过是“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

这个典故用在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即它艺术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吓不倒、压不垮的。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顶住了国际反华势力的巨大压力，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列主义的指导，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人的指挥棒。

对于国内困难，从党中央主席，到每一个普通党员；从每一个高级干部，到每一个普通百姓，同心同德，节衣缩食，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既要温饱，又要建设。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全国形势逐步回升。出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大好局面。

中国共产党巍如泰山！

中华民族坚如磐石！

我们面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国际形势，尽管“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却有着“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无畏气概。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反共活动，不过是嗡嗡叫的苍蝇，“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大气魄的写照。

这个典故，用在这里，确实有崭新的内容，增添了神奇的表现力。

毛泽东驾驭语言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他不但巧于用典，用得准确，而且使之推陈出新，通俗易懂。《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上阕是：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所反映的是新旧军阀的互相混战的时期。

1927年10月，蒋介石和李宗仁与武汉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

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广东派的战争；

1928年4、5月间，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四派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

1928年6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夺取华中的蒋桂战争；

1928年秋，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夺取中原的战争……

关于“一枕黄粱”的故事：一枕，睡一觉；黄粱，小米。意谓黄粱梦。典出唐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流落邯郸客店的卢生，向道士吕翁哀叹自己穷困不得志。吕翁给他一个枕头，说枕着它睡一觉，就能称心如意。卢生就枕而睡，果然封侯拜相，享尽荣华富贵。可醒来却是一梦。这时，店主在他睡觉前做的小米饭还未煮熟。

因为这个故事，内容幽默、风趣、通俗易懂，所以家喻户晓，尽人皆知。毛泽东借用这个典故，讽刺帝国主义支持的走狗军阀，一个一个，一次次地做着争夺地盘、扩充势力，妄图称霸中国，盘剥人民的黄粱美梦，又一个一个，一次次地象黄粱美梦一样破产。

也正是这些军阀们的“黄粱梦”，使战争频繁，山河破碎，人民涂炭。这就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懂了一条真理：“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

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更大的战争。”

也正是军阀们的“黄粱梦”的破灭，才教育人民懂得，要结束灾难，拯救自己，拯救国家，就必须打倒军阀，打倒土豪，打倒帝国主义，建设自己的红色政权。军阀们的争斗，也确实给了人民以实现自己愿望的大好时机，使井冈山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并且能使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毛泽东学富五车，胸藏万卷，所用典故，随意而生，并且意图清晰，通俗易懂，浑成无迹，使诗人的感情自然流出，撼人心魄，足见其匠心独运，艺术精湛！

千种风情状山容

诗人写诗，咏物言志。咏物是依托，言志是目的。咏物咏得巧妙，就能收到极好的言志效果。毛泽东的诗词，借景抒情，咏物言志，得心应手，自然得体。他在诗词中，状山写水，唱雪咏梅，取材极为广泛。然而涉及最多的还是大山。你看，在他公开发表的三十多首诗同中，山几乎无处不有，无处不在。从南国的武夷山、乌蒙山、井冈山、白云山，到人西北的昆仑山、六盘山。这些山，各具情态，各有性格，不同色调，不同神采。有的明媚秀丽，有的峥嵘险峻；有的磅礴雄浑，有的如微波细澜；有的令人乐观，有的气氛悲壮；有的善解人意，有的桀骜不驯……这些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用不同笔调状写的大山，无不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清晰而又深刻的印象。

在艰苦的长征路上，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十六字令三百》，实际就是三首歌唱大山的组诗。你听：

—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二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三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三首小令犹如三个特写镜头，兀现于读者面前。

第一幅画面，直逼云端的高山，站在峰巅回首惊喜的战士；

第二幅画面，千山万壑，重峦叠嶂，山脉起伏，犹如翻江倒海的狂涛巨澜，又如万马奔腾、鏖战正酣的战场。

第三幅画面，峭峰陡立，直插青天，宛若擎天石柱，挺立于天地之间。

多么生动而有气魄的高山峻岭图！它们高大雄伟，气势磅礴，挺拔刚毅。它们各自独立，而又构成统一完整的画面，并从中闪射出一种战斗的风采和阳刚之美。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是一曲歌唱首次反“围剿”取得伟大胜利的辉煌赞歌。

开头两句“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先赞颂奋起迎敌的红军“气吞万里如虎”的战斗威势。

“雾满龙冈千嶂暗”，是具体描绘工农红军在峰峦迭嶂的龙冈一带设险埋伏诱敌深入的战场外景和气氛。这时，整个龙冈山区，云遮雾障，硝烟弥漫。无数山峰，一片昏暗。此处犹如藏龙卧虎，令人莫测。这险峻的地势和惊险紧张的气氛，足以使敌人心惊胆寒，这就为下文活捉敌酋张辉瓒，取得龙冈大捷，蓄好了文势。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的一开头就写：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诗人用拟人手法，以具体的形象告诉读者，面对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不用说根据地军民，就连白云山也好像有了人的灵性与感情：山头怒云腾起，犹如一个汪怒的人要陡然而起向敌人扑去；山下一片喊杀声震天撼地；满山的枯木朽株也好像在为我军助战，一齐向敌人示威。诗人把白云山描绘成一幅怒不可遏、威不可犯的凛然神态，有力地烘托出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感人情景。

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毛泽东率军经过用战斗保卫下来的大柏地，他禁不住诗兴大发，作《菩萨蛮》一首以抒情怀。词的上阕写道：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这是一幅明丽动人的山乡风光图：天边出现了七色彩虹，仿佛有人手持彩绸当空挥舞。骤雨初歇，烟霭方收，夕阳斜照，清新如洗的山峦，呈现出时明时暗的苍翠之色。这是一幅多么迷人的大自然的风光画面。看到这幅画面，你会联想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解放区的歌声永远唱不完”那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的歌声，联想到生活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人民是多么幸福。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忆秦娥·娄山关》最后一句对山势气氛的描写：“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毛泽东描写的红军攻占并越过娄山关的雄伟场面：夕阳的光焰辉映着群山巨峰，放眼望去，前面征途上那层层叠叠的山峰，如同狂涛巨澜浩瀚无边；象鲜血一样染红了半边天的一抹夕阳，有力地烘托着娄山关和遵义大战的壮烈气氛。这壮阔的画面，将战争胜利的场景与大自然的景象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极为深邃的艺术境界，不仅给人以壮美的感受，还使人产生深沉的思考。

而在长征路上红军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却是另一番风采风貌。在《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中，毛泽东是这样写的。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仅就山景而言，六盘山的风貌与以前的许多大山都不相同。这里的画面是明朗的，调子是欢快的。它展现的是这样一幅图景：秋高气爽，蓝天万里，空中飘动着几缕淡淡的白云。在巍峨高耸的六盘山上，鲜艳的红旗迎着秋风自由的舒卷、飘拂……

画面是如此的鲜艳，意境是如此的开阔，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胜利的自豪和无比的喜悦。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怀着胜利完成长征之后的欣喜，以极其轻松的笔调写下的中外知名的伟大诗篇。诗中曾有三处写到了山。有意思的是诗人为了突出红军战士的精神力量，便有意缩小了人的视觉比例，把绵亘四省的五岭山脉比作轻轻腾起的微波细浪，把气势磅礴的乌蒙山说成是在地上滚动的小小泥丸。其想象之新奇，用意之巧妙，简直令人拍案叫绝！难怪姚雪垠要为这两个妙句举酒干杯了。

《七律·答友人》是毛泽东在1961年用浪漫主义手法写成的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诗篇。一开头对九疑山的描写就极为优美：

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九疑山高高耸立，白云在这里浮动飘飞。一对仙女从青翠隐约白云缭绕的山中乘风驾云翩然来到人间。

这想象中的画面优雅绮丽，而且带有一种迷人的古典美，与下文描绘的如火如荼的社会现实互比互衬，效果十分理想。

1965年，毛泽东写了一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词中井冈山的景象气氛与当年的井冈山大不相同。三十八年前，这里是“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黄洋界上炮声隆”，一派战火硝烟的战争气氛。三十八年过去，毛泽东“千里来寻故地”，看到的则是“旧貌变新颜”，一片新气象：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这里不似当年，却又胜似当年。遍山黄莺啾啾，紫燕翻飞；高山流水，琴韵铮铮；蜿蜒的高路，盘山绕岭，直入白云深处……好一派生气蓬勃、明艳秀丽的新世界！

此外还有“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岳麓山；“风展红旗如画”的武夷山；“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的昆仑山；拔地而起，飞峙大江之滨的庐山……这些山带着各自的风貌特征，带着时代留下的深深印记，带着诗人的无限风情，被载入了一首首感人的诗篇。可以说每座大山都有一段光荣历史，每个镜头都有一段革命斗争故事。毛泽东写山堪称一绝，毛泽东的诗词堪称史诗。要问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娴于写山？据名家分析，因为他从小就熟悉山，喜欢山，与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大山给了他革命成功的条件和机会，大山铸塑了他坚强的性格和意志。所以他对山有着一种特别亲切厚密的感情。他在诗同中描写山，歌颂山，借山抒怀，借山言志，甚至与大山对话，一点也不奇怪。不过毛泽东写山，不同于古代山水派诗人那样寄情于山水。山水派诗人借自己的诗唱，或流露遁世的消极，或显示做世的清高。毛泽东则不然，他写山总是那么超脱，那么自然，写山而不单纯写山，或寄托情思，或抒发壮志，或歌颂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正因此，他笔端饱含着无限激情，借助于山的各种形态气势，写出了无数壮丽动人的革命诗篇，给读者留下了那么多令人难忘的“山”的形象。

旧曲何妨唱新辞

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一封谈诗的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里强调了文艺创作，尤其是诗词创作的思维规律——形象思维，又特别强调了比、兴两种表现方法，但也不能忽视“赋”这种表现方法的正确应用，并举了杜甫《北征》的例子。

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最早是从《诗经》的创作中总结出来的。历来有不少大家曾作解释，最常引证的有《毛诗正义·关雎传·疏》：“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善恶”，“则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

朱熹也注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刘勰所著《文心雕龙·铨赋》中则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其内容大同小异。不过严格地说，赋，是一种写作方法，是为使“义必明雅”。而比、兴则是两种修辞手法。是为了“词巧丽”。义明雅而词巧丽才为诗。不过，在实际创作中这三种手法的运用，不可能截然分开。就如《北征》，总的来说是叙事为主，所以主要用赋。写诗人由从肃宗所在的凤翔，到他的家所在的鄜州的经历、辞别皇上的忧虑；路上的所见景象及感慨；与妻儿相见时的悲喜；在家中仍关心国家形势；对国家形势与前途的喜与忧。慷慨陈词，长歌浩叹，严紧写实，指点有据。从头到尾，一一道来，指事议论，写景抒情，确实充分发挥了赋的长处。

但是为了使叙事、述志、达情形象化，诗中也有比、兴。杜甫写一路上所看见的景物：“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就用了比。“如丹砂”、“如点漆”就是比喻。回家以后，想到安史之乱，约回纥出兵相帮，“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以“阴风”暗比回纥所到之处抢劫掳掠，给人民带来苦难，这就是兴。兴也是比，只不过略“隐”罢了。

毛泽东的诗造诣很深，表现之一，是对于赋、比、兴手法的运用，达到技巧浑熟，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的程度，表现了高度的艺术才能，是“义明雅而词巧丽”的完美结合。

先说毛泽东如何运用“赋”这种方法的。不要说叙事诗，即使抒情诗，也以叙事为基础，因为“睹物生情，情以物兴”。

如《菩萨蛮·大柏地》，通首词描绘景物，七彩斑斓，山川秀丽，令人心旷神怡。这首词写于率领红军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所取得的第一次大胜仗之后，尽管面临极端艰苦的局面，毛泽东于胜利之后，“登山则情满于山”，所以写了这样一首极富革命乐观主义的词。所用方法，虽也含比、兴，但主要是赋。

又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通首词在叙事。上阕写白云山首战告捷，下阕写红军在辽阔的战场上远程突击，连续作战，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气概，以及敌人自嗟自叹，向隅而位的惨象。其所用的手法中也有

兴、比，但主要的也是赋。

再如《七律·长征》、《西江月·秋收起义》，所用手法虽有比、兴，但通观全篇，所用主要方法，还是赋。因在有关部分曾已论及，所以不再重复。

以上都说明诗中描景、抒情、述志都可以用赋的方法。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诗中用赋，绝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而必须做到叙中有情，情中有景，借助比兴。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首联、颔联、颈联都是敷陈其事，回忆已往，直抒胸臆，朴实深沉，毫不雕饰。句句悲切，字字哀痛。表现了毛主席的最大伤恻和最深的思念。正因为意切情深，所以，读之也撼人心魄，催人下泪。

上例可谓叙中有情，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则是敷陈中含景。这首诗主要用赋，所以寓意深沉，气象宏伟，格调崇高。只要了解这首诗的历史背景，只要熟悉诗中所用典故，读这首诗，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幅幅十分壮观的图画。

以赋为主的诗词中，是少不了比兴的，唯独如此，才能使“词巧丽”，形象鲜明。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上阕“万木霜天红烂漫”是兴；“天兵怒气冲霄汉”是比。红军的声威，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历历在目，是一幅战斗图画。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即使完全是述志抒情的诗句，也是含着形象的。如读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你脑海里不会出现那个为图虚名而丧大业的楚霸王吗？就不出现鸿门宴、垓下之战的场面吗？谈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难道你脑海里不会出现鲲鹏、蓬间雀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吗？一个伟大，一个渺小；一个崇高，一个卑微；一个不为淫威所屈，一个吓破了胆。两相对比，形象何等鲜明。

以上说赋，下面说比。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即修辞手法之一种。因在“雅义丽词共赏析”一节中已详谈，所以此处不再赘语。需稍作说明的是，毛泽东运用比的手法，也是很灵活多样的。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七律·长征》）五岭比作细浪，乌蒙比作泥丸，以物比物。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念奴娇·井冈山》）把毫不隐瞒的反帝、反修、防变的磊落胸怀，比作高悬天际的朗朗日月，以物比情。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以景比意，以浪前的景象，比在全国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以斥鷃和昆鸡比喻诽谤、打击罗荣桓同志的小人，也泛比革命队伍中的一切小人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大鸟和老鹰比喻崇高伟大的罗荣桓同志，也泛比真正的广大的革命者和真正继承捍卫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此为以物比人。

最后说兴。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先言他物，目的在于引起所咏之词，这他物或起烘托作用，或起对比衬托的作用。

如《水调歌头·游泳》，下阕开头“风墙动，龟蛇静”，是写蛇山与龟

山相对的形势，如严守大江的卫士，这是兴。目的却是写“起宏图”：要在长江上驾起一座铁桥，把长江天堑变成通途，更要筑坝拦截万里长江，调动长江水为社会主义建设大业服务。写龟蛇二山是虚，“展宏图”是实。

又如《忆秦娥·娄山关》一词中“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是兴，先写景物：西风、霜晨、残月、雁叫，简练的十几个字，构成色彩浓烈的图画，造成一种紧张、热烈带几分肃穆的气氛，用来烘托急速行军、灵活机动、勇往直前的红军队伍。以西风、霜晨等起兴，以“碎”、“咽”作比，相辅相成，赞扬红军英勇无畏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菩萨蛮·大柏地》一词的下阕，充分运用了比兴的手法。“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是写记忆中的战斗场面，是兴。“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才是诗人所要赞颂的。由上阕赞美大自然宏丽的景色，转到下阕赞美威武雄壮的战斗场合，赞颂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预示昨天的战争，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的序幕。

起兴的作用有两种，一是引起全篇，如《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即起兴，以下便引起刘兰芝与焦仲卿整个爱情悲剧故事，二是引起个别人或物，如《诗经》中的《关雎》一诗的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即是。前两句是起兴，后两句引出淑女和君子。

毛泽东的诗词中，二者都有很好的范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的开头，“钟山风雨起苍黄”，就是起兴，并且统领全篇。南京发生了沧桑之变，才有赞颂它解放的伟大历史意义，才要教育激励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真正更加伟大的胜利，是乘胜前进，一鼓作气，解放全中国。

有时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诗词里面，有的是比，有的却是兴。《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下阕的首句是：“一唱雄鸡天下白”。《贺新郎：读史》一词的尾句是：“歌未竟，东方白。”这两句中的“白”，都是象征中国革命的胜利的。所不同的是，后一句是“索物以喻情”的比，因为毛泽东写这首词是在丰泽园的灯下。而前一句则兼属于“触物以起情”的“兴”，因为写成时正当东方发白。写天亮了是虚，歌咏新中国的诞生、人民的团结、当家作主是实。这虚实之间，看出毛泽东的艺术技巧纯熟完美的程度。

雅义丽词共赏析

诗文写得生动感人，主要决定于作者的生活体验是否丰富，观察是否敏锐，提炼是否深刻。但如果没有一定的语言修养，同样也不会有佳作，因为语言终究是思想感情的外衣。

语法能使话说得对，而修辞则能把话说得好。毛泽东曾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可见，要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把话说得准确、鲜明、生动，并减少语误，就非讲究修辞不可。

修辞的范围很广：反复修改，消灭、减少语误，是修辞；遣词造句，字斟句酌，是修辞；恰当地运用一些修辞手法，也是修辞。关于消灭语误，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自然也有，如误“遗误”为“贻误”，但终究是极个别现象，所以，无需说。至于字字斟酌、句句锤炼的工夫，在“意新语工求至善，苦吟千古绝唱辞”一节中也已论及，所以也不再赘语。这里重点谈谈毛泽东如何巧用各种修辞手法的问题。

说起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比拟”等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在学习和研究，一般知识还是有的。所以，对于各种修辞手法，就不想从有关基本知识的角度去说明。只想从毛泽东所掌握的修辞手法的丰富、运用极其纯熟方面，稍举例证，作点极简要的说明。

一、比喻。

通常可分为明喻、暗喻、借喻、博喻几类。如：

“奇儿女，如松柏。”（《杂言诗·八连颂》）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沁园春·雪》）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十六字令三首》）

在议论文里，借比喻明理；在记叙文里，借比喻感人；在诗里，借比喻构成形象、达情。

二、夸张。

习惯分为夸大、缩小与意义上夸张。如：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卜算子·咏梅》）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七律·长征》）

“一篇读罢头飞雪”，（《贺新郎·读史》）

感情强烈，情绪激昂，要增强气势，常用夸张。

三、比拟。

常分为拟人和拟物。如：

“枯木朽株齐努力”（《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以物拟人。

“龟蛇锁大江”（《菩萨蛮·黄鹤楼》），以物拟物。

巧用比拟可使诗词更富生活气息。

四、借代。

借代可以有多种形式。如：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七律·到韶山》）借象征物代事物。

“六月天兵征腐恶”（《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借事物特征代事物。

“铜铁炉中翻火焰”（《贺新郎·读史》），以具体代抽象。
用借代可使要表达的意思具体、形象、风趣，突出事物的特征。

五、引用。

从内容方面说，引用有许多种，如引文、引诗、引典、引谚等等。而从形式上看，可分为三种。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水调歌头·游泳》）——引散。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西江月·井冈山》）——正引。

“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念奴娇·鸟儿问答》）——反引。

引用可以增强表现力，具有讽刺性。

六、对比。

对比，有修辞和写法之分，句中对比属修辞，行文对比属写法，这里讲修辞。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正比。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西江月·秋收起义》）——反比。

对比可使要表达的意思更鲜明、强烈、感染力强，是非、优劣分明。

七、衬托。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正衬，也叫陪衬。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卜算子·咏梅》）——反衬。

运用衬托，可使要表达的事物更鲜明、突出，因而更具感染力。

八、对偶。

形式上习惯于分三种。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正对。

“高大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七律·冬云》）——反对。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七律·到韶山》）——流水对。

句式整齐，极富节奏感和音乐性，有的也形成鲜明的对比。

九、反语。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贺新郎·读史》）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这种手法具有冷嘲热讽的作用，极富战斗性。

十、排比。

“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杂言诗·八连颂》）

这种形式为群众喜闻乐见，平易、风趣、连贯而有气势。

十一、反复。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忆秦娥·娄山关》）

反复有强调，使某一意思或形象更为突出、使诗词更富节奏感的作用。

十二、双关。

“歌未竟，东方白。”（《贺新郎·读史》）

既实指毛泽东彻夜工作，已经天亮了；又虚指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诞生了！

含意丰富，而又耐人寻味。

十三、烘托。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蝶恋花·答李淑一》）以景托情，以热烈的气氛烘托胜利的伟大。

烘托似绿叶衬红花，也是极富表现力的。

十四、层递。

“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杂言诗·八连颂》）

这几句诗运用层递手法（兼顶针），结构紧凑，句意层层深入，语势不凡，表达有力。

十五、转类。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沁园春·长沙》）

将名词活用力动词，诗句更为新颖活泼。

十六、拆字。

“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翰，不怕鬼，不怕魅。”（《杂言诗·八连颂》）

既达意清楚，又显风趣，灵活而不呆板。

十七、点染。

点，即点明；染，即渲染，染似画龙，点似点睛。在毛泽东的诗词中，这种点染，既表现在句与句之间，又表现在上阕和下阕之间，而且都是染在前，点在后。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如梦令·元旦》）前句为染，后句为点。

《忆秦娥·娄山关》，上阕写景，烘托气氛，是染；而下阕写红军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乐观精神，是点。

内容鲜明，主要形象突出。

十八、象征。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念奴娇·昆仑》）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七律·到韶山》）

使抽象的意思形象化，易于理解。语言凝练，而发人想象。

十九、连珠。

上句的尾词，是下一句的首词。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卜算子·咏梅》）

衔接紧凑，珠连璧合。

二十、点化。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本是个极普通的谚语，稍加改造，意义广泛而深刻，用于革命和科学研究，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十一、精警。

用语简练精彩，含义深刻而富于教育意义。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七律·冬云》）

二十二、委婉。

话不太露，以曲折的方式，予以表达。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意在批评，用语造句却很委婉、温和，易于接受。

二十三、倒装。

“君今不幸离人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联系前面的内容应为“今君不幸离人世”。“今君”颠倒为“君今”意在突出主要形象。

二十四、直率。

心地坦荡，有话直说，冲口而出，毫不掩饰。如：“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念奴娇·鸟几问答》）

二十五、重迭。

“风烟滚滚来天半。”（《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关山阵阵苍。”（《菩萨蛮·大柏地》）

运用重迭，可以加重表现力。

二十六、讽喻。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很显然，这是规劝，诚挚而友好。

二十七、移就。

又叫移用，即把写一事物的词语，用在写另一事物上。

“人猿相揖别。”（《贺新郎·读史》）“揖”本是写人的动作，用于写猿，增加许多风趣。

二十八、通感。

即把听、视、味、触觉沟通起来。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七古·送纵字一郎东行》）沟通了视觉和感觉。

二十九、设问。

无疑而问，但必自答。既便于作者陈述，又易于引起读者注目，从而提高表达效果。

“纤笔一技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三十、反问。

也是无疑而问，但不作答案，因为答案就含在问话里。不过答案与问的形式正好相反。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还有一种疑问句，问者既不答，也不是让读者答，因为没有明确肯定的答案，只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思考。如：“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又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这样可促使读者尽量展开想象，从而使诗含不尽之意。

以上罗列了三十种修辞方式，其实毛泽东诗词里所用的修辞法还不止这些，在这里只是说明毛泽东的博学、语言造诣极深。修辞方式虽多，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从内容方面着眼，例如比喻、对比、借代、双关、反语等等；一类从语言形式方面着眼，例如对偶、排比、倒装、顶针、设问等等。

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法，才使毛泽东的诗词更显其雄奇瑰丽的特色。

修辞的作用确实是不容忽视的。如最简单的单音词的重叠，“风烟滚滚来天半”，句中的“滚滚”一经重叠，就极富表现力。上阕写龙冈战役，“大兵怒气”，杀声震天，一举捉了张辉瓒，从而使反第一次大“围剿”，大获全胜。下阕，却是一波才平，一波又起。“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滚滚”一叠，表现敌军不甘失败，卷上重来，掀起涨天尘土，何等气势汹汹！然而却又以更惨的失败告终。这样上阕“滚滚”所渲染的敌人不可一世的气势，就成了红军获得胜利的反衬了。

优秀的诗篇，绝不会仅仅用一种修辞方法，即使再成功，其表现力也是有限的。往往是许多修辞手法在一篇中的综合运用，相得益彰，才使主题格外鲜明，感情格外充沛感人。如毛泽东的《贺新郎》一词：“挥手从兹去”，与李白《送友人》开头第一句“挥手自兹去”，仅差一字，并且“从”与“自”意义又相同，可看作引用。

“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似由柳永词《雨霖铃》中的词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熔铸而来，只是又赋予了新意，所以，可看作点化，也含有双关。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更明显是由“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点化而来。

“人有病，天知否？”是反问，而不是设问，因为作者未作答，也无需答，不能答，答反会造成局限，影响诗意。

“凭割断愁思恨缕”，既是“愁恨”、“丝缕”的互嵌，更主要的是移用，丝缕可以割断，而愁恨是无法割断的，移用罢了。

“过眼滔滔云共雾”、“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这是比喻，一看便知。也含有夸张。

“重比翼，和云翥。”这是双关，既指未来夫妻重聚，永远恩爱；也指重聚后，互相勉励，共赴革命。

正由于“引用”、“点化”的运用，才使夫妻的恩爱，柔情似水，缠绵无尽，正由于“移用”、“比喻”、“双关”的运用，才突出了为祖国献身的决心，显示出革命的激情。

正由于这些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革命的自我牺牲精神与夫妻儿女的依恋，昂扬的革命激情和夫妻的缠绵柔情，才都得到充分的表达，并使之浑然一体。

正由于这些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才使革命激情和爱侣柔情纠合到一起，互相衬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钟灵毓秀。尽管为了革命，但革命者终究也是人，也食人间烟火食，所以，“自古伤离别”，泪眼相望，执手难舍，突出了爱情的深厚无限。尽管爱情无限，但是为了革命，也只得“凭割断愁丝恨缕”，并且“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态度如此坚决，也就更反衬出毛泽东革命第一的自我牺牲精神。

不管为这两种感情的纠结，如何伤心，如何缠绵，但诗人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充满乐观，满怀豪情的。所以，词的结尾是：“重比翼，和云翥。”

正由于这些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才更具诗情画意，含无限的艺术魅力。既有儿女情长，又有英雄本色：“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感情的波涛，澎湃于胸中，是难以说尽的，只好由“人有病，天知否？”一句反诘，蕴千言万语都在不言中。若是原句“重感慨，泪如雨”，就显得大

露。一语道破，就不如用反问手法，显得内在、含蓄，意溢言表，诗味浓烈，而且结构上也避免雷同，更为凝练。而开首五字，自成一言，统领全词，明白晓畅。一路重霜，半天残月，这诗的意境，即使今天读来，也历历在目，倍感凄清。

另外，有的词句，读来耐人寻味，但若究其修辞手法，却不易确切地说出，真要说出，又会因人而异。如：“我失骄杨君失柳”，这句究竟是实写（“杨”、“柳”实指杨开慧和柳直荀烈士）？还是双关（既指杨花柳絮，又指杨、柳二烈士）？还是借代（借杨、柳二烈士代所有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似都有道理，完全不必拘泥于一种。

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这许多修辞手法，熟烂于胸中，只要表情达意的需要，便顺手拈来，无不得心应手，恰到好处。

意新语工求至善，苦吟千古绝唱辞

《礼记·表記》中，说孔子主张，著文作诗，要“情欲信，辞欲巧”，文，生于情，可见情对于行文的重要性。而情对于诗，则更重要。情，是诗的灵魂。无情，则无诗。这是强调“情”的重要性。

单有正确的思想内容，就是佳文妙诗吗？显然不行，还要有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其中就包括用词工巧。许多诗句传之千古而不衰，词工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孟子也主张：“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意即著文作诗，用语不工巧，不是好诗；过于工巧，刻意追求，则必晦涩，适得其反。只有天然工巧，而不刻削，才是上乘好诗。

古人作诗，用语工巧的佳例极多，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春夜喜雨》最有代表性：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其中的“知、潜、细、俱、独”，用语如此新巧，如此传神，实在难得，真是写活了。

所以，“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运用语言，能达到如此程度，实在不易。

毛泽东深有体会，并带几分感慨他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其中甘苦，无亲身经历者，是难体味的。

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对他的诗词，象对待其他论著一样，都是进行了反复推敲，几经修改，才抄定的。有时，为一首诗同的完美，彻夜不眠，一次又一次地坐下，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站起，在室内踱来踱去，反反复复地吟哦。即使最后抄定，还要抄给自己的诗友，如郭沫若、臧克家等，征求意见，其态度之谦躬，其言词之恳切，都使他们“心里激动而又感动，感动而又钦敬”（见臧克家《毛泽东同志与诗》），不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至少是他自己满意，他是不肯罢手的。

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就必然“新”。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之外，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理论、路线和政策。马克思、列宁强调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毛泽东于此同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则特别重视农民的基础作用。列宁领导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然后领导农村，毛泽东则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道路。对待富农、资本家，苏联采取驱逐、消灭的办法，毛泽东则采取利用、改造的政策，如此等等。他坚持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走俄国人的路”，又使马列主义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意新”，必然“词工”，不说毛泽东的理论著作，单说他的诗词，为做到尽其情，达其意，在词语的斟酌上，下多少工夫，费多少心血，有多少创新，都是难以估量、难以统计的。

为更好地体现对工作的负责精神，对作品精益求精的严肃态度，对艺术

孜孜不倦的追求，这里试举些例子，以与大家共得这美的享受。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是《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的点题之句，其中一个“暮”字，用得极好。一点明时间，自然，举行起义，不一走都在晚上，但晚上农民便于聚集，便于起事，也是常理。二与“愁”字相应，也极好地点明起义的时代特征，人民处于“地主重重压迫”之下，国民党反动势力制造白色恐怖，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人民只有一条路，举行武装起义；也烘托出凝重、激越、悲壮的氛围。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是《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的末句。这一句，用在末尾，尤用“悲歌”一词，突兀奇绝，恍如晴空霹雳，振聋发聩，触发诗情，使达到壮气撼天的境界。这固然体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更使我们深味到毛泽东此时悲他的内心世界：“百万工农”的无私无畏，是可敬、可歌、可泣的；唯其如此，他们的鲜血更不能白流，他们的头颅更不能轻抛，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对革命最宝贵的财富，是应惜而又惜，慎而又慎的。毛泽东眼看着重蹈第一次“左”倾路线的覆辙，自己又不能及时纠正，只好与大家一起唱一支国际悲歌！这难言的感情是何等的深沉！

真是万千感情都在不言中啊！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十六字令三首》之二）其中“酣”字用得巧妙。“酣”，是痛快的意思。“战犹酣”雄健有力。“万马战犹酣”，其声威就更加浩大。读者由此完全可以想象到，骑在马上的人——“我”，于万山丛中，是何等的雄姿！正是“我”和战友们，不畏艰苦，乐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才使红军这股铁流不可阻挡。

在这句之前，毛泽东把群山想象为“倒海翻江”的巨浪，构成“万马战犹酣”的背景。这样，两相映衬，极为壮观。对山的想象是虚，对万马奔腾的描写是实，有虚有实，虚实结合，构成了激荡、壮阔的境界。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清平乐·六盘山》）1957年最初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时，“红旗”本作“旄头”。“旄”是古代旗杆上用牦牛尾所作的装饰，文学作品中常用来指旗帜。1961年秋，毛泽东的手书稿在《甘肃日报》上影印发表时，将“鹿头”改为“红旗”。这样，红旗映衬着蓝天绿野，就更增加了全诗的鲜明和亮度。红军战士望着如火的红旗，在山上西风里哗啦啦自由地舒卷，战士们轻松的心绪和必胜的豪情，便更自然地烘托出来了。这样以写景为主，寓情于景，明确地点出红军战胜敌人之后登上六盘山的兴奋景象和活跃欢快的心情。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沁园春·雪》）一个“惜”字，领起以下三句。引出历史上五位“英雄”人物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一个“惜”字，较为客观公允地评价了他们的功过优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有雄才大略，武功卓著，可“惜”文采、风骚（指文治）都差些。他们都曾建功立业，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不愧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英雄。但他们都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最大代表，都曾给人民带来灾难。所以，他们根本无法与今天的无产阶级英雄模范人物相比。

武功有余，而文治不足，几乎是这几个封建统治者的共同特点，但是，毛泽东在这里，目的不是评论这些历史人物的功过，而是为了“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所以，只能用一个“惜”字，使评论不流于呆

板、程式化，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没有高超的艺术才能，没有驾驭语言的技巧，是难以做到这样恰到好处的。

说到用词的工巧，下面的词句最有代表性：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上阕一个“俏”字，结上启下，提挈全篇，使梅花美得俊逸，美得机智，美得妙趣横生，美得使嫉恨者无可奈何。真可谓传神之笔。而下阕一个“笑”字，与“俏”字呼应，由外至里，由表现到精神，真高明奇绝之极，令人拍案叫绝。这个“笑”，是看谁笑到最后的笑，也是充满着自信、预示未来胜利的笑。她在群花之中，与百花同在，与百花同享胜利的欢乐。但她却是百花魁首，百花之神，领百花争艳！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的领袖，有极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有雄才大略，能高瞻远瞩；他无私无畏，勇往直前；他胸怀博大，始终乐观。他有宏伟超凡的气魄，又有诗人的气质。他酷爱梅花，所以，他以一个精确传神的“笑”字，给梅花注入脱俗卓越的精魂。说《卜算子·咏梅》是咏梅诗词的绝唱，并非过誉。

张玉田在《词源》中说：“诗之赋梅，惟和靖一联而已。世非无诗，不能与之齐驱耳。词之赋梅，惟姜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大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颖题诗在上头。’诚哉是言也。”说姜白石的咏梅词意新颖而词工巧，值得推崇，可以；说其前无古人，便言之过甚，不过还勉强可以；若说他的词“后无来者”，“真为绝唱”，历史证明，就是不实的妄言了。姜白石的咏梅词与毛泽东的咏梅词相比，不说姜白石词的思想境界根本无法与毛泽东词相比，单说艺术，从典型的塑造，包容之大，意境的奇绝瑰丽，炼字炼句的功夫，毛泽东都比姜白石高明得多。如果拿张玉田的话评价毛泽东的词，倒是切实得多。

毛泽东用词的工巧，其细心、认真的程度，是极为感人的。

在《七律二首·送瘟神》的第一首中，有两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有人对这“八万里”、“一千河”，有所非议。毛主席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曾作了解释。照抄如下：

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

对待一个两个数字，所下的功夫，所表现出的严肃的科学态度，极端的负责任，思想的极端活跃、奇特，都是为一般人所望尘莫及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科学的导师，同时又极重视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自然辩证法》就是根据科学的最新成就写成的。毛泽东也如此，他关于“原子无限可分性”的主张曾天才地推动了物理科学的发展。他对宇宙的无限性的认识，又是多么深刻，多么富于想象力。有人说，毛泽东的思想极为活跃，为常人所无法追及，此为一例。

何止一句一词，就是一个标点，毛泽东也绝不轻视，总是再三斟酌，反复推敲，不达至善，便不罢手。

《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1957年、月于《诗刊》发表时，有两句的标点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而在收入《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时，毛泽东根据别人的意见，这两句的标点位置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改后，胡乔木又反映袁水拍同志的意见，提议将这两句的标点仍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好，毛泽东当即同意。

首先，词的句数，每句的字数，音律，字的平仄，固然严格，但也不绝对化。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的下半阕第四、五句为：“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下阕的第四、五句也是四七断句。而辛弃疾的《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的下阕的第四、五句却是：“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桔千头。”可见两种断句法按词律都是允许的。

可这样再三改动，功夫何在呢？

毛泽东始作“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既表明长江大桥正在修建中，但是桥的雄姿，已呈现在目前，南北畅通的理想也即将实现，两个分句，意成因果，恰当，平易，自然。

“别人”的意见，建议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也自有道理，似大桥尚在建设中，这样断，能充分突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气势。毛泽东接受建议，遂改，可见这个标点的位置，尚未成定见。

毛泽东听取袁水拍的意见，当即同意改回，除却六、五断句更切合自己要表达的意思外，这“别人”的断句法，达意的着重点有所不同，而且遣词造句上，也欠妥当。因为这句的中心词显然是“天堑”、那“南北”就是“天堑”的定语，显然不当；若理解为，根据词律的需要，有意将“天堑南北”倒置，则达意重复，也不妥。这改来改去，却只为一个标点的位置，如此牵肠挂肚，呕心沥血，毛泽东于词的工巧求至善上所下的功夫，是何等的感人！其谦恭、负责、精益求精的精神，更堪为人师表！

诗即其人：

做人，他无私无畏，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一生，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贡献出一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诗，他学习前人，超越前人，呕心沥血，反复推敲，每成一诗，便求至善，他为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永世不可磨灭！

古人说：“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锻炼，字字敲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字面亦词中之起眼处，不可不留意也。”1959年夏毛泽东为国内外形势所激发，灵感所致，诗兴勃勃，遂成《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两首诗，他嘱胡乔木送郭沫若，请他“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老将《七律·登庐山》的三、四句改为：“但道蜿蜒回百盘，热情挥雨洒山川。”毛主席深受启发，十分高兴，但又经自己推敲，这首诗的前四句则成了：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又送郭沫若看过，再行修改。

这样改后，“旋”比“盘”更有升腾感；“看”与“冷”配搭，比“观”更富感情色彩，因而也更显有力；原来的“热肤挥汗”改为“热风吹雨”，境界大开，其情操、其胸怀都达到极高的境界，而且更富诗情画意。

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原是：“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也改为：“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由赞扬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品质，而成了抚今追昔，赞扬陶渊明当年的幻想，已成为今天的现实了。另外，这首诗还有个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也根据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建议，删去了。可见他在意新语工求至善方面所下的功夫。

有一个词，在毛泽东诗词里，使用率很高，这个词就是“飞”。兹把用“飞”的句子，摘录于后，与大家共赏。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沁园春·长沙》）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念奴娇·昆仑》）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清平乐·六盘山》）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水调歌头·游泳》）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蝶恋花·答李淑一》）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笼四百旋。”

（《七律·登庐山》）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七律·答友人》)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七律·冬云》)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飞鸣镝。”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贺新郎·读史》)

“参天万木，
千百里，
飞上南天奇岳。”

“五井碑前，
黄洋界上，
车子飞如跃。”

(《念奴娇·井冈山》)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念奴娇·鸟儿问答》)

“飞”字，字的妙用，五十首诗词，竟有十五首十六次之多，而且处处珠玑，处处生辉，处处工巧，处处奇绝，处处传神，表现出诗人飞动的气魄，飞扬的豪情，飞闪的风采！

“浪遏飞舟”，一个“飞”字，含“中流击水”者的豪放气概于言外。

“飞将军自重霄入”，一个“飞”字，使勇猛机智的红军，如自天而降，呼之即至。

“一桥飞架”，一个“飞”字，使社会主义建设的轰轰烈烈的景象，展现目前。

“一山飞峙大江边”，一个“飞”字，使神笔移山，有造化之能，神采毕露。

“飞上南天奇岳”，一个“飞”字，诗人为社会主义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欢欣鼓舞、心情激动的神情，如历历在目。

如此等等，真可谓一词而使境界全出！

即使举世闻名的文豪们，对毛主席遣词造句的工巧，所表现的语言方面的造诣，也无不惊叹、钦敬之至！

一石击水使天惊

一篇文章，即使洋洋洒洒，也总有些句子，或对于揭示主题，或对描景，或对抒情，或对于结构上的承转关锁……显得精彩，不同凡响，不可缺少。

诗词也是如此，虽然一首旧体诗词，字句不多，但相比之下，也有些关键性的句子，而且从这些关键性的句子运用上，足可看出诗人的思想修养、文字造诣。

古人说：“词中句法，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拍搭衬副得去，于好发挥笔力处，极要用工，不可轻易放过。读之使人击节可也。”如姜白石（即姜夔 kuí）《扬州慢》云：“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张玉田《词源·句法》）这具体而形象地说明了这类关键句的作用。不过表现在一首诗词中，其关键句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是非常灵活的。

统领

《贺新郎》一词的开头句为：“挥手从兹去。”毛泽东与杨开慧于1920年冬结婚，1921年秋，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伴随毛泽东进行革命活动。1922年10月生岸英，1923年11月生岸青。就在此不久，毛泽东为革命需要，又要离开刚生产的妻子，其心情是可以想象的。这首《贺新郎》词，就是毛泽东赠给夫人杨开慧的。

以“挥手从兹去”开头，似源泉，一切感情之水由此汨汨而出。由于离去，才有惜别依依，似水缠绵的柔情；由于离去，是革命的需要，才有“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这样为祖国献身的革命豪情。而且这儿女情，革命志，缠绵、昂扬、融恰地纠合起来，浑然一体，真挚动人，确是典型的“革命加恋爱”的代表作。再加“重比翼，和云翥”的结尾，更给一切年轻伴侣们千秋万代永不磨灭的充满着革命人情味的希望。

清人李青客有首类似的词，《貂裘换酒》（实为《贺新郎》）的开头句为：“作计吾归矣！”也起着统领全篇的作用。不过他接下去，便是“算长安衣冠物望”发了许多牢骚，所以方法虽同，但与毛泽东的《贺新郎》根本不能相比。

又如《沁园春·长沙》一词的开头一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也是统领全词的关键句。正是在这个特定的季节——“寒秋”和地点——“橘子洲头”，才描绘出一派立体的寥廓万里、绚丽多彩、万物竞争、生机勃勃的江南秋景（上半阙）。也正是在这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刻，才忆起那世界发生重大变革的峥嵘岁月，才忆起那“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的不寻常的青春气概，既赞美锦秀山河的壮美，又悲愤大好河山的沉沦，这种高大、辽阔、巍峨、宏伟的壮丽景，这种包举宇内、主宰祖国命运的浮沉的英雄情，都是由首句而来的。

点题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是《念奴娇·昆仑》一词的末句，也是点题之笔。1931年10月，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二

万五千里长征。他们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克服了人间难以想象的困难，胜利到达陕北，这时，抗日的前途顿放光芒，革命的发展无限广阔，毛泽东信心百倍，豪情满怀，遂以如椽的大笔，借描写、评论昆仑，高唱出改造世界、消灭帝国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曲凯歌！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统帅高瞻远瞩的博大胸怀。豪情汹涌，气势盖世。以雄伟开头，又以雄伟结尾，浑然一体，气度不凡。

鲜明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是《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词的结尾。因为是对比，所以格外鲜明，赞美、鼓励之情，溢于言表。

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1927年起，便怀着对社会人生的鄙视与愤怒创作，成为有影响的现代作家。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转变成自觉的革命者，用自己的一技“纤笔”，对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所以毛泽东称赞她为“文小姐”。

1933年她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并押到南京，囚禁了三年。直到1936年秋，她才逃离南京，到达陕北。先后在中央警卫团、中央党校、文协工作。填这首词，就是为她要到前线总政治部工作时，毛泽东满怀高兴，给予支持，所以称她为“武将军”。

评价很高，又很恰当，感情深切而真挚，格调高雅，鲜明而健美，诗风自然而朴素。

精警

统领之句居首，点睛之笔多在尾，而精警之句，所在就不一定了。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其颈联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确是极为精辟、极富创造性、极富教育意义的。这里毛泽东改变了“穷寇勿追”的传统，主张“穷寇必追”，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把敌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掉，不要留下后患，绝不能象图虚名的项羽，不利用自己的优势战胜敌人，反会让敌人卷土重来，葬送已取得的革命成果。这既总结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又表现了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的巨大胸怀和战略眼光。就是开始反对渡江的国内外的同志和朋友，也为事后的胜利所折服。这是全诗最深邃的哲理所在。由于概括之深，影响之大，已形成一条普遍真理。对待古代文化，要吸取其民主精华，剔除其封建糟粕，此为一例。

又如《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诗，其中两句为：“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是末句，也是全诗的主题所在，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格外鼓舞人心的警句。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曾总结自己的经验体会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如果想领略无限壮丽的风光，就必须不畏艰险，不辞辛苦，勇于攀登。否则，就不能浏览最美的景观。这一点，毛泽东与王安石是相同的。所由此引发的见解是：无论创建宏伟的事业，还是研究高深的学问，都必须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否则，就会半途而废，也

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王安石并未到达“险以远”的地方，更未亲自领略“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并为未到达这样的境地、取得实际体验而遗憾，只是从想象和吸取教训的角度总结出以上的体会。而毛泽东却是亲自到达了“险峰”，亲自观赏了这“无限风光”并取得亲身体会的。再者，两人的感受也不同。王安石囿于个人，而毛泽东胸怀的却是国家和国际反帝反修的艰巨斗争。思想境界的崇高，眼光的开阔，气魄之宏大，都是王安石所无法比拟的。单说其艺术性也如此。王安石为文，毛泽东为诗，语言简练、形象、含蓄、意境开阔，艺术上确有令人荡气回肠的境界。

毛泽东这首诗发表之后，遂使游客趋之若鹜，“仙人洞”也顿时名闻遐迩了，这关键一句是起了极大的宣传教育作用的。足见其艺术的感染力之大。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境界崇高，胸怀博大；又因为他是无产阶级理论家，造诣很深的诗人，驾驭语言的能力极强，所以，他通晓古今中外，知识渊博，表情达意，挥洒自如。至于警句，在他的文章里随处可见。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尤其为人传诵、至今还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的是：“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看看国内外的无数触目惊心的事实，毛泽东的教导多么亲切、多么英明啊！

象这样深刻的警句，在他的诗词里还有不少，如：“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杂言诗·八连颂》）“牢骚大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等等。

这些精警的诗句，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有勉励人进步的，有鼓舞人勇于奋斗的，有指导国内外重大斗争的，有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或寄理于景物，或寓教于形象，通俗易懂，又便于实行，造句又极为凝练，极为精彩，形象生动，耐人寻味。

生情

1927年春，毛泽东同志填词《菩萨蛮·黄鹤楼》，末句为：“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1927年，是腥风血雨的日子，这位巨人，漫步在龟山和蛇山对峙的大江之滨，在蛇山，一座灰白色的建筑吸引着他，这座古塔便是建于公元三世纪的黄鹤楼。他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了黄鹤楼。茫茫长江，在脚下奔腾；沸腾的热血，在胸中激荡。民族在兴废之间，革命历成败之时。革命风云变幻无常，农村形势虽然高涨，党也处在人民拥护的顶峰。而党的上层却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共产国际还硬抓住统一战线不放，陈独秀又听命于他人的指挥棒，顽固坚持右倾投降路线，蒋介石已在磨刀霍霍，他还一味推崇这个刽子手。

正是一句“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才极为确切地表达了他百感交集又“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苍凉”的心情。为祖国、为人民、为党的忧思，发自肺腑，感人至深。读来如历其境，如见其人，如感其脉搏跳动，其

艺术的力量是巨大的。

挑起

《西江月·井冈山》一词的上片，尾句是“我自岿然不动”，无论对整首词的思想感情的表达，还是整首词的格调，都起着挑起的作用。

战斗激烈，敌军围困，气焰嚣张，恨不得一口吞掉红军，形势极为严重。可天地之间一统帅，胸中自有雄兵百万，镇定自若，从容布阵，指挥若定，所以，“我自岿然不动”；红军战士，有英明统帅，又众志成城，决战决胜，斗志昂扬，坚如磐石，所以也“岿然不动”。这正体现了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军事思想。

统观全词，诗人用欲抑先扬的手法，一方面岿然不动，蔑视敌人，为下阕写红军一旦打响，便势如破竹，使“敌人宵遁”作铺垫；另一方面也突出红军坚不可摧的英雄气概和革命战略家泰山崩于前、黄河决于后而不惊的伟大形象。这也正象演奏一个伟大的乐章，在高潮乐段开始之前，“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突然，万件乐器齐奏，高潮迭起，“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声震寰宇，令人惊心动魄。这样似流泉瀑布，大幅跌宕，确实极富艺术魅力。

逼转

《沁园春·长沙》一词的上阕的末句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便起着内容上点睛，而形式上逼转的作用。

“谁主沉浮？”是个设问句，诗人是无疑而问的，但正是这一问，不得再继续写景，而非转入叙事、抒情不可。这样下阕自然要作出答案：主宰祖国命运沉浮的就是，“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从形式上看，上阕极尽铺陈，通力描写：秋水长天，万物争峰的深秋境界；岳麓红遍的枫林，湘江清澈晶莹的碧水，搏击长空的雄鹰，摆动鳍尾的群鱼，蒸蒸日上，绚丽多彩，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正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句逼问，方引出下阕的回忆往昔，由景物的描绘，转到抒发豪情。直抒胸臆，尽情倾吐，如长江大浪，滔滔而下，痛快淋漓，气势磅礴，诗情画意，浑然天成。

又如《念奴娇·昆仑》一词，其中“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一句，在全词中也起着逼转的作用。上阕极写昆仑的肆虐，危害人民，但“夏日消溶”也不光为祸，到底也孕育了中华民族，及其灿烂的文化。这千秋功罪，是不可改变的历史，本来是易于评说的，关键是未来，如何让昆仑不为害人民，只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转为一句，“而今我谓昆仑”，并用一冒号，作了回答，使“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也正是这关键的一句，方引出无限情思，深邃辽远，境界极高。

字斟句酌，妙笔生辉

古今中外的诗人，都非常重视语言的锤炼，选择最恰当的词语，表达诗歌的主题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使诗的形象鲜明，意境优美，感情动人。一首凝炼的诗，往往妙用一字，通篇生色。在这方面古人有不少佳话流传至今。比如唐人贾岛的诗句“僧敲月下门”最初是“僧推月下门”。后经诗人反复苦思，又与大文学家韩愈推敲酌定，才将“推”字改为“敲”字。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是经过了多次改换才选定一个“绿”字的。据说这个“绿”字就妙不可言，妙就妙在它生动传神。通常的动词，诸如“到”、“过”、“入”等，虽也可用，但用后文意平淡，意象板滞。而这个“绿”字，一经动用，就将“春风”和“江南岸”联系起来：春风一吹，江南大地一片新绿，色彩鲜丽，生机勃勃。它显示了一个过程，一种动势，一种形象，这样一幅画面便活了起来，形成了意境，平添了生气，遂成了古今传颂的佳句。

毛泽东在这方面也堪称是炼字高手，打开《毛主席诗词》，几乎是篇篇有佳句，处处有妙词。耐人寻味，经得起咀嚼。比如《沁园春·长沙》一词“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一段景物描写，其中“染”、“透”、“击”、“翔”几个字就用得极为出色。“染”是着色的意思，“尽染”连用，给人的感觉是：秋风一吹，山枫变红，从红一点红一片到红遍全山，从红及一层山坡到红遍整个岳麓山，形成一片火红的世界。在萧瑟的秋天里，这里却显示出一派勃勃生机，与王荆公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碧”是鲜亮的绿色，“透”是澄澈见底的意思，“碧透”就是说满江的湘江之水，清碧见底，荡漾着极浓的春意，使人自然地联想起白居易那“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诗句意境来。“击”是刻画雄鹰双翅用力拍打，形容它强劲有力的飞翔姿态。“翔”原指鸟儿不扇动翅膀的飞翔，这里用来形容鱼儿在水中自由轻快活泼地游动。这不仅将雄鹰矫健的雄姿，游鱼轻松自如的神态十分传神地状写了出来，而且显得有笔力，有声势，神韵足，情味浓。试想，如果将原句改为“鹰飞长空，鱼游浅底”，那神韵就会差得远，诗味也就荡然无存了。

《清平乐·蒋桂战争》，是毛泽东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于马背上哼成的。词的上阕是：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诗中“突”、“重”、“洒”几个字的选用就很得名家欣赏。这首词写于1929年秋天，当时正是新旧军阀混战的年代，在各个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各派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地盘，扩大势力，连年混战。如1927年10月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同年12月蒋介石和广东军阀争夺广东的战争；1928年4、5月间蒋桂冯阎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1929年3、4月间的蒋桂战争；8月蒋和冯、阎的战争等等。“军阀重开战”一句中的“重”字，极恰当地写出了军阀混战的频繁和连年不断，表达了毛泽东对这种非正义战争的深恶痛绝之情。“洒向人间都是怨”中的“洒”字，用得形象而又传神。“洒”有抛洒纷溅之意，频繁的军阀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与负担，使得国家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人民当然怨声载道，群情沸腾。一

个“洒”字就将战祸涉及面之广，人间无处不怨愤的情况十分形象化地表达了出来。“风云突变”的“突”字，更有其深刻的历史内涵。据载：1928年10月，毛泽东曾预言“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并预示这对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和日益发展十分有利。但当时党内有些人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然而战争毕竟爆发了，这使许多人感到意外，一个“突”字就十分传神地写出了由于政治形势的急转直下，骤然变化，给人们带来的意外与震惊。由于这首词在选字用词方面的准确和凝练，便十分形象地描绘了那一段革命历史，生动地展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军阀混战的画面，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是歌颂根据地人民胜利粉碎蒋介石第一次大“围剿”的一首壮丽诗篇。下阕是这样写的：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最后的这个“乱”字，用得十分精妙，可以称为传神之笔。这个“乱”字，不是横七竖八、乱七八糟的意思，而是无数红旗迎风翻卷飘舞的样子。由物及人，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壮观的感人场面：面对敌人的进攻，根据地军民群情激奋，摩拳擦掌，高举红旗，整装待发，人人准备上阵，个个紧张热烈，那气氛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它不仅写出了根据地遍地红旗猎猎翻卷飘舞的景观，还进一步显示出群众发动得广，发动得深，一切被压迫者奋起造反，形成了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热潮的生动局面。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的下阕是：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是用浪漫主义手法，描绘革命运动的壮丽景观的。这其中的“席卷”、“直捣”两个词用得十分形象得体。“席卷”，形象地表现了亿万工农卷入革命斗争，那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所到之处，摧枯拉朽，荡涤一切，象风扫残云一般所向披靡。“直捣”，则表现这支力量锐不可挡，无坚不摧，向着敌人盘据的一切据点，象棍捣杵春般地冲击而去，形象传神而又别具一格，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

《忆秦娥·娄山关》，上阕写红军向娄山关进军的情景，那气氛是悲凉凄清的：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人人都说其中“碎”和“咽”字用得好。马蹄踏在结了霜冻的山岩上，哒哒作响。行军急促，蹄声细碎杂沓，故用“碎”字。“咽”，原指声音窒塞，此指军号声在清晨寒风中抖动振荡，传播不畅，时断时续，犹如气咽难喧的实况，这就将红军当年在黎明前冒着风霜严寒紧张激烈地进军作战的情景气氛真实地描写了出来。读后如掩卷骋思，再联系日常的生活体验，你会倍感诗人选字用词的精当高明。

《十六字令三首》也是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战地中炼就的佳作名篇。第一首是：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这“惊回首”的“惊”字，就包容了无限意蕴：红军万里长征，跨越万水千山，一路快马加鞭，不管山势高低，一直向上攀登。及至登上顶峰，回望苍穹，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是肩擦白云，离天三尺！如果将这刹那间的表情定格，将是一幅多么生动的画面呵！在这里，山的高大险峻是以“惊”的表情中显示出来的。这个“惊”字，不仅表现了对山势高大险峻的惊异，而且还表现出工农红军在越高峰跨绝壁之后的一种喜悦、自豪和胜利的心憎。这个“惊”字，与其说是人惊异于山的险峻高大，不如说是诗人以独特的形式对红军战士无畏精神的欣赏和赞美。

《念奴娇·昆仑》是一首内容宏伟、气势磅礴的光辉诗篇。它通过对巍峨昆仑的艺术描绘和联想，表达了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埋葬帝国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抱负和崇高理想。词的上阕写昆仑山的高大和永恒，描写它的瑰丽景色，评价它对人民的功与罪：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作品一开头，就把一座巍峨大山推到了读者面前：“横空出世”，卓然不群，睥睨尘凡。这种人格化的描写，下句更为突出：“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这个“莽”字用得实在出色，仅此一字，就将昆仑山的特点简洁而又深刻地勾画了出来：它不仅躯体庞大，而且生性粗莽，梁骛难驯。冬日里，它可以“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季里，又会造成水患，泛滥成灾，使“人或为鱼鳖”。千百年来，它就象一个生性鲁莽的巨人经常闯出祸端。对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竟无人对它问津，这就为下文诗人抒发豪情——改造昆仑，使之造福人类蓄好了文势。

《清平乐·六盘山》是毛泽东经过六盘山时的咏怀之作。六盘山是红军万里长征最后翻越的一座大山。毛泽东和红军指战员们，刚刚取得了对敌战斗的俭剂，又意气风发地登上六盘山，望着万里晴空，自由舒卷的红旗，心潮澎湃，激情满怀，不禁写词唱道：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词的内容好，字的炼意也好。其中“望断”一词就用得特别有韵味。你看，在深秋十月，寥廓晴朗的高空，飘浮着几缕淡淡的白云，阵阵南飞的雁群，掠空而过，消失在遥远的天际。毛泽东仁立在六盘山顶，目送着南飞的雁阵。雁群渐飞渐远，直到消失在天边，他还在久久地深情地凝望着，凝望着。领袖的心啊，似乎也同大雁一起飞向了南方……就在那个方向，有他和战友一齐培育的革命摇篮井冈山，有广大军民浴血奋战开辟的大片红色根据地，有和红军结成鱼水深情的广大人民，有留在那里坚持战斗的革命战友。

鸿雁南去的道路，正是红军万里跋涉走过的光辉路程。在这由南国到北国的万里行程中，红军曾付出了多少珍贵代价，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可我们毕竟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万里长征，到达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十送红军》的民歌不是唱道：“鸿雁能够捎来书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说”吗？南飞的大雁啊，就请你将长征胜利的喜讯带给日夜牵挂红军的广大人民，请把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心，告诉给那里的革命战友。由此可说，“望断南飞雁”，画面深远，情景交融。“望断”一词，使人产生无限的遐思和联想，并衍生出深远的意境和浓郁的诗情，堪称今古绝唱。

《卜算子·咏梅》是一首意境深邃、格调昂扬，使人百读不厌的好词。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咏梅，一扫千古陈格旧调，赋梅以优美的艺术形象和全新的时代精神。他笔下的梅花，坚强而不畏强暴，大方而不怕孤寂，俊俏而不争名利。严寒中她挺拔俏立，欢乐时她含羞隐退，多么崇高的品德，多么伟大的精神，多么高洁的情操！在这首词中，一个“俏”字统率全篇，上片以“俏”字收束，下片以“俏”字领起，全篇着重烘托一个“俏”字。这个“俏”字形象太美了，她美得俊逸而不妖冶，美得机智而不傲气。风霜对她无耐，严寒使她倍加精神。在这首词中，毛泽东选用了最恰当的字词，塑造出最美的艺术形象，达到了最理想的表现效果。

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毛泽东对自己的诗作也是严肃认真、千锤百炼、精益求精、苦心炼就的。这充分表现了他对社会、对人民、对艺术的高度负责精神。正因此他的诗篇才得以饮誉社会，永存人间。

巧用副词壮诗情

古人说：诗言志，词抒情。诗词以抒情述志为本，自然不能“为文而造情”，而应“为情而造文”。然而诗词是文学艺术，“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别林斯基语），就不能不注意语言文字的锤炼。而且从表达的角度看，选词炼字，不仅重要，也十分困难，正如刘勰所说：“意翻空而易奇，言证实而难巧也。”

毛泽东的诗词，绘多娇江山雄奇景，颂改天换地宏伟业，抒一代风流凌云志，不仅立意高远，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气势如山，豪情似海，而且“锤字坚而难移”（刘勰语），言意相合，密而无际，字字珠玉之声，句句神采飞扬。吟咏毛泽东的诗词，思想上受教育，感情上得鼓舞，而且是一种美的享受。毛泽东诗词中实词运用之妙，各家评注文章多有论及，虚词的运用一般涉及不多。这里仅就其副词的运用，谈一点感受。

在诗词创作中，实词运用切当，固然不易，虚词巧妙安排，也许更难。副词，一般语法著作把它划入虚词，然而它们大都有一定的词汇意义，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常用于动词、形容词性词语之前，对其加以限制；某些副词，又兼有关联作用。因此，副词的运用，对写人叙事，状物抒情，言志说理，乃至结句谋篇，有其不可忽视的独特的作用。毛泽东是语言大师，他的诗词中，运用了大量的副词，而且安排巧妙，坚而难移，显示出诗人极高的语言功力。毛泽东诗词中的副词，用于写人叙事句，则使形象更加鲜明，层次更加清晰，令人如见其人，如历其境；用于状物抒情句，则切景切情，使情景交融，更悦人眼目，动人心魄；用于言志说理句，则切理切志，使理足志显，更发人深思，激人奋进；用于结句谋篇，则诗词的起承转合，更觉缜密无间如天衣无缝，前后贯通似水到渠成。这些副词在写人叙事、状物抒情、说理言志、结句谋篇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具体到某一诗句，某一首诗词，虽然可能有所侧重，但又往往融为一体，很难截然区分。现试举数例，与读者共赏析。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这两句诗承开头两句的写景叙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转入抒情。问句力敌千军，答句气冲九霄。一问一答，塑造了，一位胸怀大略、指挥若定、威风凛凛的革命大将军的形象，洋溢着诗人对彭德怀同志的无比信赖、赞誉之情。在答句句首用一个“唯”字，使彭大将军的形象更加高大突出，也更显示出毛泽东对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重要地位的充分肯定，真是一字千钧！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诗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光，纵观历史，思接千载，在“输”、“逊”、“识”前分别用“略”、“稍”、“只”三字加以限制，客观地历史地评说了封建阶级的几个英雄人物，既肯定其功业卓著，又指出其文治不足，极有分寸，含蓄地透露出批判封建主义的主旨。这一点睛之笔，既显示出诗人鲜明的立场，科学的态度，又切理切情，饶有诗味，其中“略、稍、只”三字的作用，实在不可低估。在评说封建阶级的代表人物之后，诗人猛转笔锋，转入对当代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赞颂。他巨笔一挥，在“往”字前大书一个“俱”字，如铁帚横扫，将历代英雄人物逐入“博物馆”；又在“看”字前

加一个“还”字，以排山倒海的激情讴歌了当代的无产阶级英雄，“俱”、“还”二字，用得坚实有力，使诗情倍增，堪称生花之妙笔！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水调歌头·游泳》）诗人化用民谣和典故，点出自己的行踪，以叙事开篇，似觉平凡。但这两个分句句首分别冠以“才”、“又”两字，前后呼应，一脉相承，显得紧凑、轻松、自然、亲切，使我们联想到毛泽东的指导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不断深入实际，巡视大江南北，风尘仆仆，辛苦劳碌的形象，也使我们感觉到革命领袖那豁达、乐观、自信的情怀。联系后面描写诗人与风浪搏击的喜悦和改造长江的宏图的词句，我们又会感到，这豁达、乐观、自信的诗情是笼罩全篇的。所以，“才”、“又”二字，看似作者信手拈来，又实在是不可等闲视之。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这两句以写景抒情开篇，前句嵌一个“皆”字，使读者视野大开：漫天飞雪，千山裹素，万顷铺棉，河蒙玉面，树摇琼枝。这洁白的世界，壮丽肃穆而又充满生机，令人心摇魄动！后句镶一个“更”字，由景入情，使读者感受到了红军战士顶风冒雪赴疆场去迎接革命高潮的迫切心情。“皆”、“更”，二字又使前后两句紧密相连，飞舞的雪花、皑皑的大地和英勇红军高昂的战斗激情互相映衬，画意诗情浑然一体。再联系下面的“风雪迷漫”、“过大关”、“下吉安”等句，可以说，由“皆”、“更”二字所带引的宏伟气势、豪迈激情笼罩全词，令人不能不拍案叫绝！

“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七律·长征》），这是毛泽东的千古绝唱《长征》诗中的开篇后句和煞尾前句。开篇后句写红军将“万水千山”（诸多艰难险阻，无数流血牺牲）“等闲”视之，已属气概非凡，“等闲”前再加个“只”字，就更加突出了红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作者在说：战胜千难万险，越过万水千山，只不过是小事一桩而已！这是何等伟大的气概！这是何等宏伟的开篇！煞尾前句在“喜”字前加一个“更”字，上承中间四句“腾细浪”、“走泥丸”、“云崖暖”、“铁索寒”所洋溢出的乐观情慷，并照应开头“只等闲”的豪迈气概，不仅结构完美，天衣无缝，而且层层推进，把红军高昂的革命斗志，乐观的革命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因此，这“只”、“更”二字，在阅读这首诗时，不可不仔细玩味。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首联用“一……便”构成条件复句，阐明了一条根本规律——对立统一的规律，风雷一起，妖精便生，多么形象透彻，令人警醒，敢于正视当时的激烈斗争。颔联两句中间置“犹”、“必”二字，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及其处理方法加以鲜明的对比，作了深刻的分析，令人不得不服，难怪郭老读了和诗之后诚恳地表示：“受到很大的启发。”这饱含哲理的诗句写得如此深刻有力，发人深省，当然主要是由于毛泽东有高瞻远瞩、洞察世界风云变幻的伟大思想，但与诗句中准确地运用了有关联作用和限制作用的副词，也不无关系。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这首句破空而来，气魄非凡，意境开阔，将“凌云志”与“井冈山”合在一起吟咏，再加用一“重”字与前面的“久”字相呼应，将革命的去，建设的今天，少年的雄心，老骥的壮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雄心壮志因凌云高山而更显其崇高。而且今非昔比，伟大诗人今日的伟大情怀和勇于攀登的坚强意志，

与三十八年前相比，已达到了一个更高更新的境界，这寻常而又奇崛的开头，表达了诗人高旷的意志、豪迈的情怀，境界开阔，冠盖全词；若抹去这个“重”字，改用“再”、“又”等字，则突兀之势锐减，难以摄领全篇，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重”字用得好！

从上面所举请例，毛泽东诗词中副词运用之准确贴切，可见一斑。学习毛泽东的诗词，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佳句，往往都有副词在暗中增色壮情，足理显志，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除上述各例，他如：“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战地黄花分外香”，“风景这边独好”，“万马战犹酣”，“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等等。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评述，我们在欣赏毛泽东的诗词时，自当细细加以品味。还应当指出，毛泽东诗词中所用副词，大都是现代词语，通俗易懂，虽是大手笔，但绝不故作高深，这正如其人，虽为群众领袖，然作风平易近人。毛泽东的诗风，当代某些“朦胧”诗人，实在应该好好学习！

有文章谈到：毛泽东写完《卜算子·咏梅》一词后，曾经过反复修改。“犹有花枝俏”一句中的“犹”原作“独”。改后使“犹有”和前句的“已是”相对，更增添了词的韵味：尽管已经是朔风怒号，坚冰高悬，然而梅花却还是铁枝戳云，繁花怒放，俏艳夺目，两相对比，使人心为之大振！该词用陆游原调原题，将“独”字去掉，换成“犹”字，则与陆词情调完全相反，的确是反其意而用之，更加突出了革命家的非凡气魄和革命情怀，切景、切情、切志，实在是改得好！“俏也不争春”句中的“俏也”二字原作“梅亦”。改“梅”字为“俏”字，属实词的取舍，这里且不去说。用“也”字代“亦”，“亦”是文言，“也”是白话，其义相同，改与不改，似觉无妨。但仔细吟咏，就会觉得用“也”比用“亦”读起来更加通俗晓畅。毛泽东的诗词是写给现代人看的，这“亦”字的改动，或许也包含着他为读者着想的良苦用心。从这“独”、“亦”两个字的修改，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副词的运用，是字字细加斟酌的。介绍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文章，谈实词修改的例子很多，谈虚词更动的，我们只看到上述两例。但可以推想，毛泽东诗词中那些包含着副词及其他一些虚词的佳句，在创作时，他也一定在虚词的选炼上下了很大功夫！这大概不是妄断吧？因此，读者朋友们，欣赏毛泽东的诗词，请千万不要忽视虚词！

诗如话

诗如其人。毛泽东伟大而质朴；崇高而平易近人；他才华横溢，又谦恭自律。表现在他的诗词里便是：博大精深，艺术之光照人，但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诗如话”所讨论的，便是毛泽东诗词的内容和语言形式朴素、通俗易懂的风格特点。它的通俗、朴质，又不是有些人所主张的“散化”，诗如果真的散化了，失却了韵律、音乐性，也就不成其为诗了。

鲜明、生动、活泼、幽默、易读、易记，是毛泽东论著的重要风格特点，即使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也无不如此。所以能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变成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进行改天换地的斗争。毛泽东的诗词，在这方面的艺术造诣，也达到极高的境界。白居易非常重视诗的通俗性，所以有新诗吟罢读给老妪听的佳话。但与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所拥有的亿万读者相比，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了。尤其毛泽东化平俗为神奇的艺术才能，更是令人惊叹不已的。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这首诗，直抒胸臆，朴素深沉，绝无半点雕饰。读来极为平易，而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深情厚谊却表现得极为充分。感情的潮水，滚滚而来，表现诗人十分悲痛而深沉的心情。另外，这样质朴的诗风，与所缅怀的罗荣桓的人品气质，也是相一致的。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回忆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进行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奔突于丛山草莽之间，虽然生死与共，却很少一起相处，深感痛惜和遗憾。“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长征中罗荣桓英姿勃勃，战功卓著，不过更值得大书特书的却是攻占锦州之战。攻占锦州是中国革命战争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因为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转折点。“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继续颂扬罗荣桓的美德和胸怀。他无私无畏，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他襟怀坦荡，从不怕诽谤和打击，是高翔的雄鹰。“今君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毛泽东面对国内外严重的斗争形势，投笔问苍天，这悲哀和思念之情达到顶点。这是人世间无与伦比的悲恸和悼念。

统观全诗，除了五、六句运用了一个典故外，通首诗无一艰深、无一费解的词句，任埋藏心底的感情，如火山一样毫不掩饰地喷发出来。坦诚说来，明白如话。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一诗的风格，朴素、明白如话，与前首是相同的。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读着诗，你就会想象出：阳光初照，演兵场上，一队队女民兵，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勇敢豪迈，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极富生命力的。即使今天，“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战争的思想，也是不容忘记的。一首诗，全是通俗的白话，都能读懂，不用任何修饰，也不会发生任何歧义。

自然，如何使旧体诗词写得通俗易懂，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是有许多借鉴之处的。

记叙入诗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水调歌头·游泳》一词，完全是记叙：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情景，各个记叙的要素都有了。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不久南巡——

5月29日，先到广州；

5月30日，又飞到长沙，畅游湘江；

5月31日，再飞往武汉；

6月1日，中午，晴空万里，畅游长江，从武昌游到汉口，全程十四公里，历时两小时；

6月3日，下午2时，毛泽东再次畅游长江，从汉阳回游武昌。又游了十四公里；

6月4日，毛泽东执意不游东湖，第三次畅游长江，从汉阳回游武昌。

读着这些日记一样看来寻常的诗句，你会想见毛泽东为国事操劳的繁忙日程，你会想见他仆仆风尘的巨人的身躯，你还会想见他不惧大风大浪、偏向潮头立的英姿，你还会想到，中国人民跟随伟大领袖毛泽东，不管遇到什么时代的狂风恶浪，只要熟悉风浪的特点，培养勇毅的精神，坚定的信念，无论什么困难，什么敌人，都不可怕，都可以战而胜之。

俗语入诗

古来不少文人骚客，不屑俚语入诗；入诗，似有伤风雅。毛泽东则不然，象做人一样，不受任何传统习惯的局限，生活中有时也不修边幅，他说话做文章，就不避俚俗，甚至“粗话”也可入诗。只要战斗、建设需要，什么刀枪剑戟、洋枪洋炮、砖头瓦块，都可随手拣来，打击敌人，教育人民。

“教条主义狗屎不如，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主义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呢？”

该是够俗够粗了吧，可把教条主义的无用，表达得多么透彻无余，而听的人，又是多么明白，痛快！

毛泽东写诗填词，也如此，不避俚俗，只求表情达意，淋漓尽致。如《念奴娇·鸟儿问答》的下阕：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不须放屁”，脱口而出，对现代修正主义者，极尽冷嘲热讽，藐视愤恨，嬉笑怒骂，痛快淋漓。这样的俗语，现实生活里，活在人民口头上，有

如此强的表现力，拿来一用，有什么不好？据说，周恩来在病榻上收听这首词，听到这里，也竟笑出了声。可见它的艺术感染力。

民谣入诗

民谣流行民间，活在人民口头上，为群众所喜爱。民谣入诗，可使诗词通俗易懂，喜闻乐道。《十六字令三首》中的第一首是：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末句便出自民谣：

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

“离天三尺三”，明显是夸张，极言山势险峻。毛泽东引来表现：山势如此高峻，“我”却“快马加鞭未下鞍”，疾驰其上，何等英伟，何等豪迈！英勇的红军将士，经千难，历万险，勇往直前的英姿，便跃然纸上。本来通俗，又经点化，增加了神奇的表现力。

神话入诗

神话传说入诗，不但使诗词通俗，还可增加诗情画意，增加无限的艺术美。

《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下阕是：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社会主义建设多么轰轰烈烈，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多么神奇诱人，高峡平湖、映着万千明珠的景象多么壮丽，鼓舞人心！尤其末句，引一神话，巫山上，那位亭亭玉立的神女，看到这动人的景象，远非治水的大禹可比！面对这人间的奇迹，不禁惊呼：“这世界真是大变了，祖国的面貌真是大变了，即使天上仙境，也哪里可比？”这神话的活用，平添了多少瑰丽，增加了多少诗憎画意，引起人们多少美丽的遐想！

对话入诗

即使在现代诗里，运用对话，尤其用得好，也是相当困难的。毛泽东在旧体诗词里，运用对话，技巧又如此纯熟，不能不说是他在诗词创作领域里的一项创举。

《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上阕写鲲鹏展翅的壮阔气势，及其居高临下，俯视人间现实世界的英姿。同时，也写出“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的情景，及雀儿的惊恐与哀叹。

下阕，则全是对话，一问、一答、一驳。鲲鹏问得理直气壮，毫不含糊，

抓住实质，一针见血，戳穿骗局。雀儿的回答洋洋自得，振振有词，滔滔不绝，恬不知耻。最后一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既是坚决有力的批驳，又是对现代修正主义叛卖行为的怒斥，更是诗人立于马列主义原则立场的庄严声明。两个形象，一大一小，一美一丑，鲜明对比；又庄又谐，各具情趣，高度统一。

谚语入诗

谚语，是在群众中流传的固定语句。它属口头创作，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其中许多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表达深刻的道理，谚语来自民间，不少又是韵语，它通俗、易懂、易记，所以活在人民的口头上，群众喜闻乐道，有广泛的教育作用，如“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人心齐，泰山移”，等等。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与人民群众有着共同的语言。他善于活用谚语，便是明证之一。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词，就是以谚语“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结尾的。这条谚语，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中国，可以说妇孺皆知，到了毛泽东的笔下，巧妙地稍作改造，便成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了。不仅丰富了这条谚语的内容，极大地增加了它的表现力，而且与开头“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相呼应，实现“凌云志”，需要“肯登攀”，“重上井冈山”，也需要“肯登攀”。其实，无论干什么，要想有所作为，是非有点“登攀”精神不可的。看，产生了多么大的逻辑力量。

1927年，中国处在群魔乱舞，人民处身水火、山河破碎的难明长夜里，毛泽东怀着挽狂澜于既倒的凌云壮志，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子弟兵，上了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燃起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终于“天下红遍”，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三十八年过去”，虽然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井冈山已是“旧貌变新颜”了。面对“六亿神州”、“春风杨柳”、“莺歌燕舞”的新面貌，毛泽东这时的凌云志又是什么呢？是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更高的速度，更大的成就，以使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并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同时，面对当时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是包含着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推进共产主义运动的。

毛泽东故地重游，心潮起伏，无比激动，久有的这凌云壮志，能实现吗？他肯定地口答：“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不但坚走人民的信心，鼓舞人民的斗志，而且还给人民以无穷的力量。

胸怀凌云壮志，是可贵的；而不畏艰难险阻地不断攀登，则更可贵！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胜利和成功，都来自胸怀壮志而又肯于攀登的人！

我们不要盲目的实际家，我们更不需要脱离实际的吹牛家。

看，用这个平易而又通俗的谚语结尾，使这首词立刻达到很高的境界，加强了词的思想性和艺术的魅力。

引散入诗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水调歌头·游泳》）所引原句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毛泽东根据需要，不为所限，舍会未句。这是名副其实的散句：“孔子在河边上说道：‘奔流而去的河水，是这样匆忙啊！白天黑夜地不停留。’”虽属文言，却含意浅显，明白无误。是在谆谆教导我们，创建史无前例的新生活的一代人，要珍惜时间，只争朝夕，为人民造福啊！

落笔生花

作诗著文，开头极重要。俗话说，诗文有一个好的开头，便成功了一半。所以，许多名家名作的开头，都是焦思苦虑、反复推敲而成，为此有许多佳话。

有的同志以为，开头是小事，其实不然。一个成功的作品，必须有高雅而丰富的内涵，但也必须有优美的艺术形式，而且应当做到尽可能的完美的统一。如一幅优美的画，一件上好的艺术品，这第一笔，往往影响整个作品的成败。

诗的开头，要比文章的开头更难。毛泽东在战争期间，戎马倥偬；建设时期，日理万机。所以，和鲁迅先生一样，作诗不多，但“哼成”一诗，便成绝唱。

所以成功，除了毛泽东有深远的思想，博大的胸怀，高瞻远瞩的眼光而外，还得力于很深的艺术造诣。单是诗的开头，便足见他独具的匠心。

总览毛泽东已发表的五十首诗词的开头，即如鲜花纷呈，各具姿态，美不胜收。试举几例，与大家共赏。

平易

不少诗词的开头，或如记事，或如叙旧，或如抒怀，平易得很。但这平易绝非平庸，而是平易中感亲切，平易中见真情，平易中显雄奇！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七律·到韶山》）多象一篇记叙文的开头，为后文回忆可歌可泣的岁月，为描绘生机勃勃的建设景象、交代了时间、地点和起因。毛泽东故乡一别，三十二年，这种伟大的献身精神，怎不感人肺腑，令人崇敬！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完全是老友重逢，促膝叙旧，为后文诚挚的规劝、殷切的期望，作了铺垫，这多么自然地表现毛泽东质朴、亲切、近人的伟大人格！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水调歌头·游泳》）毛泽东于1956年5月29日到广州，5月30日到长沙，5月31日到武汉。这时毛泽东已年逾花甲，为深入调查研究，直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仍不远万里，仆仆风尘，倍尝辛苦。毛泽东只用两个典故开头，形象、含蓄，毫无斧凿之痕。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填于1957年5月11日，杨开慧、柳直荀两位烈士，已牺牲二十多年，毛泽东也已六十四岁，为悼念烈士赋词，而且这样开头，直抒胸臆，确实既象看到烈士忠魂飘飘升仙，又象见到毛泽东怀着无限崇敬、满腹深情，向烈士捧出一颗永志不忘的红心！

所以，几首诗词的开头，同为平易，却或平易得含蓄，或平易得真诚，或平易得深沉，气象万千，各具诗情画意。

引人入胜

这是任何艺术作品成功的先决条件。首先读者爱读，才能陶冶他的性情，获得美的享受。一个作品是否引人，往往取决于开头。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演兵场上，洒满早晨的阳光，全副武装的女民兵，个个英姿飒爽，朝气蓬勃，严阵以待，一幅振奋人心的演兵图，多么引人！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忆秦娥·娄山关》）遵义会议后，红军有了胸怀雄才大略、善运筹、用兵真如神、又指挥若定的统帅，军情振奋，但终究未摆脱危局，眼下高山大壑，晨霜风烈，也含几分悲壮。这样着笔，怎能不牵动人心。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是一幅感大地鬼神战斗图画。这样开头，不仅使人想见浩荡长江之上，百万雄师，奋力向前、勇猛拼杀的壮烈场面，更会使人想到这场战斗的伟大意义。既要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又要对世界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这几首诗词的开头，或描景，或抒情，或大气磅礴，都充满了战斗的激情，振奋人心。

低唱与高歌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的上阕与下阕的首句和《七律二首·送瘟神》的首句，就分别是低唱与高歌。

“长夜难明赤县天”与“绿水青山枉自多”，起调低沉，表达诗人对旧社会的揭露与批判，充满了对劳动人尺在旧社会处身水火的同情。而“雄鸡一唱天下白”与“春风杨柳万千条”，起调高亢、激越，为祖国解放欢欣鼓舞，为消灭了血吸虫，人民健康，无比喜悦，甚至激动得夜不能寐。内容上形成鲜明对比，形式上跌宕起伏，产生极强的艺术效果。

突兀

这种开头，如高山坠石，不知其来，往往产生落笔鬼神惊的艺术效果。

《念奴娇·昆仑》的开头句是：“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巍巍昆仑，若横亘天际，高耸入云，遗世矗立，气势磅礴。突出其高峻，是苦难的祖国的见证。这样落笔，出常人意料。仔细品味，才觉得非这样不能与下文写它风雪肆虐，评其功罪，赋予它新的使命相称。

又如《七律·登庐山》一诗的开头是：“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庐山耸立大江之滨，满山苍翠，山路盘旋，雄伟壮丽，一派非凡的气势。这与眼观世界风云，俯视祖国巨变，国际国内的斗争澎湃于胸中的内容相称。内容形式，极为协调、完美。

所以，这种突兀的起始，正由于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才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阔大

凡大手笔，著文赋诗，无论描景，亦或抒情，都着眼于大处。境界宜深远，景物宜壮丽，感情宜博大。绝不能平庸，小家子气。《菩萨蛮·黄鹤楼》的开头是：“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这里确实做到了“即阔大之景，抒阔大之情”。面对浩瀚无际、滚滚东流的大江，沉沉一线贯串的

祖国南北，山河壮丽，却不知命运如何，这位历史巨人，怎不心潮逐浪、难以平静啊！

不过，最典型的还是《沁园春·雪》的开头：“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其境界之阔大，其气势之宏伟，亘古未有。这首词虽作于1936年2月，却在1945年10月于重庆书赠柳亚子先生，1945年11月14日才被重庆《新民报晚刊》传抄发表，以后别的报纸也陆续转载。毛泽东所想的还是中国的命运，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要战而胜之的是美帝国主义所扶植的蒋介石反动派。要表达这样深邃博大的思想，必须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宏伟的背景。这样落笔，就最精当不过的了。

包举

指气势宏大，笼罩全篇。如《七律·长征》的开头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红军为北上抗日，作战略转移。红军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统帅下，以亘古未有的英雄气概，以百折不挠的勇毅精神，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丽诗篇。这样落笔，确实气度不凡，起到统领全篇的作用。以下诸句，从内容到形式都具体化，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又如《念奴娇·鸟儿问答》的开头句：“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气势上便包举全篇。凌空望远，视炮火连天为历史必然，只有失去奋斗目标的蓬间雀，才吓破了胆，贪图“土豆烧牛肉”。只有立足于世界历史的巨人，才能主宰这场反帝反修的斗争。

自古以来，象这样落笔的诗词不乏其例，如豪放派的代表词人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开头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确是气度不凡，落笔也能包举全篇，显其艺术造诣的精深。但读后，却鼓不起劲来。因为词人站在历史的面前是被动的，是无可奈何的。只能任历史长河的浪涛冲刷而去，气粗却缺乏信心，色厉而内荏。

而无产阶级革命家站在历史面前，却是积极的，主动的。他们顺应历史的规律，掌握历史的规律，是为改造世界，造福人类。他们面对历史的波涛，有时也兴叹，也茫然，甚而悲愤。但是，兴叹之中却蕴含着对信念的无比坚定，茫然之中却蕴含着对未来更热烈的追求，悲愤之中却预示着更勇猛的战斗！

渲染

譬如挥毫作画，先行泼墨，创造一种气氛，意在烘托。然后叙事抒情，更显形象、生动、感人。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西江月·井冈山》）远见，近闻，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号角嘹亮、雄壮，战场的景象，如火如荼；气氛紧张肃穆，预示着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展开。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仅此二句，足以鲜明地烘托出战场战火烧天，红旗招展，红军喊杀震天的战斗气氛。工农红军，怒气如熊熊烈焰。军民团结，共赴仇敌，战火闪闪，衬以红烂漫的万树红叶，展示出一场多么激烈而又必胜的战斗。

即使写现代国际重大斗争题材的诗篇，毛泽东也擅长运用这样的技巧。

如《七律·冬云》的开头：“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冬云、飞雪、花谢，俨然一幅萧条的严冬景象。看是写自然，其实是象征。回想当时，帝国主义疯狂反共反华，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掀起背叛马列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逆流恶浪，真是一时乌云翻滚，大雪漫天，万花纷谢，形势严重。尤其一个“压”字，多么形象地显示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又多么深刻他说明，捍卫马列主义原则，在坚持战斗的共产党人肩上的担子，该有多重啊！所以，这样以象征开头，为后文称颂“驱虎豹”的英雄、不怕熊罴的豪杰，欢喜大雪的梅花，作了多么有力的烘托！

正因为这些诗词的开头，具有立意高远、传神、如画的特点，所以，才产生了强烈的引人的艺术效果。

余音绕梁

好的结尾，应当和好的开头一样重要。好的开头，应该有使人触眼难舍的力量；好的结尾，也应该有余味无穷，使人爱不释手的作用。文章的结尾，应当做到“言已尽而意无穷”。这就象聆听一首美妙的乐曲，曲罢，仍绕梁三日，甚至使人“三月不知肉味”。又象观赏一幅名画，虽然放下，其景仍历历在目，其情仍汹涌在胸，甚至铭记终生。

这充分说明诗词的结尾绝非小技，不足轻重。实际上它是一个完美作品的有机部分。一首曲子再好，结尾却逆耳，一幅好画再好，结束却是败笔，多让人扫兴，又怎么能给人以力量，催人奋发呢？

所以古人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张玉田《词源·咏物》）诗词的结尾，同诗词的开头一样，做到好处，实在不易。

如何结尾和如何开头一样，没有固定程式可循，全依据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灵活处之。毛泽东诗词的结尾，也极见功夫，确值得学习和借鉴。以下仅举几例：

放开

所谓放开，即就题收住，戛然而止，却含不尽之意。这样结尾，往往是以景结情。例如：《如梦令·元旦》一词，是反映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作战略转移，行军路上，虽然艰苦，但却斗志昂扬，充满必胜的信心。“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风展红旗，有声有色，勃勃生气。既含蓄地表现了红军战士怡悦的心情，又令人憧憬着革命的美好未来。

又如《清平乐·会昌》一同的结尾：“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这首词填于1934年夏，当时革命处于危急关头，红军正准备离开革命根据地，作战略转移，开始长征。毛泽东虽然遭排斥，正确的军事路线遭否定，但他仍以博大的胸怀，对革命无限忠诚，鼓舞大家，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大家，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看到前途，就象巍巍南粤，满山松柏苍翠，郁郁葱葱，充满生机，充满希望，令人鼓舞。这样结尾，寓意确是极深沉的。

浅露

放开，形象而含蓄，给读者留以深思遐想的余地。而浅露则不然，浅显易懂，易得要领。

如《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的结尾：“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除“金瓯”一典外，其余各词，一读便知，无半点费解处。联系全词，这通俗之中，人民解放之后，分田分地的喜悦之情，又溢于言表，不失为诗。

又如《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结尾句是：“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是个明白无误的因果复句，而且用了象征的手法，借一个妇孺尽知的神话故事，来类比一场严肃的反修斗争。修正主义是个国际现

象，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便产生了。虽给共产主义事业造成灾难，给世界人民造成损失，但却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坚决揭露和批判，屡遭破产，成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过街老鼠。六十年代初期，现代修正主义象白骨精一样，又兴妖雾，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于起配合帝国主义、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勾当。所以，必须再请有火眼金睛的孙大圣来，以识破现代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并使这伙妆成美女的妖精丧生金箍棒下。这时中国和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很深刻的教育。

毛泽东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斗争中。这反映在他的诗词中，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的结尾：“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无情地嘲笑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不过是碰壁的苍蝇、撼树的蚍蜉，直言不讳地向他们宣战，并自信会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毛泽东诗词的浅露，甚至能让人看到他的心态，直率得无丝毫掩饰。他让语言这个完全没有阶级性的工具；绝对驯服地为表达他的革命的思想感情服务，喜笑怒骂皆都入诗。《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的结尾就是：“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毛泽东极度蔑视现代修正主义的感情，表达得真是痛快淋漓！

深沉

革命道路从来不是坦荡的，总是布满了荆棘和坎坷。革命者的感情也从来不都是满怀喜悦的，有时也有悲哀和壮烈。这在毛泽东的诗词中，虽然不多，但总还是有的，而且这些诗词的结尾也同样精妙感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毛泽东曾经欢欣鼓舞，斗志昂扬。但蒋介石却叛变革命，挥舞屠刀，使共产党人血流成河。而党内，又是由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统治着，毛泽东在革命成败的危急关头，也曾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在1927年春登黄鹤楼时，面对“茫茫九派”、“沉沉一线”，在《菩萨蛮·黄鹤楼》的结尾，发出了“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慨叹，感情如潮，悲壮之至，动人心魄。

《忆秦娥·娄山关》一词的结尾，也是以象征手法，表达浓烈的感情的典型。“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遵义会议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革命仍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红军虽开始取得主动，但终究还没完全摆脱困境，真是前途多艰，困难多于顺利不知多少倍。所以，面对如海的苍山，如血的残阳，心情沉郁，思虑万端，又是何等的深沉！

自然，这与古代诗人如李白、崔颢、辛弃疾等抒发这类感慨的诗词有一根本不同，即他们总是消沉、失望、无可奈何，而毛泽东却是坚定、必胜、勇往直前。

还有一首词的结尾，必须议及，因为它是表达感情深沉、催人泪下的典范例子，即《蝶恋花·答李淑一》），结尾句是：“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诗人以夸张的手法，写革命烈士听说中国革命获得彻底胜利而欣喜异常，激动的泪水汇成滂沱大雨，倾盆而下，感情的强烈，几不自胜。铁石心肠，也会为之垂泪。其艺术感染力也达到极至的地步。

引典

引用典故结尾，既可以丰富诗词的内容，又可以增加艺术的表现力。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结尾：“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用的就是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在与颛顼的这场激烈战斗中，共工是胜利者，是战斗英雄。

用这个典故类比红军所进行的反第一次大“围剿”取得胜利是非常贴切的。不是吗？“雾满龙冈”、“风烟滚滚”，战斗还不激烈？“前头捉了张辉瓒”、“不周山下红旗乱”，战果还不辉煌？这些“来天半”的“天兵”（工农红军）个个不是惊天动地的英雄？所不同的，共工是个人英雄，而工农红军则是革命的集体英雄。

又如《水调歌头·游泳》一词的结尾：“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所说的“神女”，是“巫山神女”。她的故事，据《襄阳耆旧传》所记：“赤帝女曰瑶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故曰巫山神女。”当时天下洪荒，野兽出没，民不聊生。舜派大禹治水，禹用疏导的办法，是巫山神女，帮助大禹凿山通水，全归大海，从此才天下太平。这是一个多么优美而动人的故事，神女的功绩又是多么值得称颂！所以至今“巫山神女”还是长江三峡的重要一景。毛泽东借神通广大的神女的“惊”叹，来衬托“换了人间”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变化，多么自然而有力！就在神女的身边，一桥飞架，天堑通途；西江石壁，高峡平湖，一幅多么壮丽、鼓舞人心的图画！这样，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就不是这位神女所能比拟的了。

象这样用典结尾的例子还有不少，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尾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七律·登庐山》的结尾：“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看，“沧海桑田”、“世外桃源”的典故，毛泽东运用得多么得心应手！而且一经妙手点化，不但增加了诗的高雅的意境，而且赋予它多么崭新的意义。

点睛

也叫画龙点睛。这是诗文常用的手法。《清平乐·六盘山》一词的结尾：“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即是。这时，红军长征，已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余里，跨越了十一个省，险山峻岭，雪山草地，敌人的围追堵截，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可作这样战略转移的目的，却是为了抗日，为了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设新中国。所以，在写了蓝天、淡云、飞雁、山峰、红旗之后，宕开一笔，点明“何时缚住苍龙？”突出了这首词的主旨，及时地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下一个革命的目标，引向未来。

又如《念奴娇·昆仑》，与《清平乐·六盘山》是同期作品，毛泽东这时所想的，就不止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止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甚至也不止革命胜利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是更宏伟壮丽的未来，在地球上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不但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这首词的结尾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再恰当不过地表达了毛泽东无产阶级的博大胸怀和无产阶级崇高的使命感。

比照

毛泽东的诗词的结尾，有的呈鲜明的对比，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如《七律·冬云》的结尾：“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这里有两个形象，梅花和苍蝇。同在漫天大雪里，梅花充满生命的活力，而苍蝇冻死。这是多么鲜明的比照。既突出了梅花高大的形象、傲岸的风骨，也突出了苍蝇的渺小与卑贱。这就更突出了它们的象征意义。

又如《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词的结尾：“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里有两个对比。一个是蒋管区和解放区的对比。一位文小姐，用一枝纤笔，爱国抗日，反被绑架，被关进监狱；而在解放区，却受到热烈欢迎，还是这位文小姐，却成了抗日的战士。一个是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一个是民主自由的人民政权，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另一个是丁玲同志自身的对比。同样一个人，在旧社会，在反动统治下，是个小姐，要反抗压迫，要爱国，也只是一枝纤笔而已。可在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却成了飒爽英姿的武将军，和男同志一样，去打击敌人，为民族的解放，为人民的幸福而战斗，这又是多么形象的对比！

毛泽东的诗词的结尾，依内容的需要，确是变化多端，引人注目，发人深省，值得借鉴。

巧连红霞百重衣

行文的承转关锁和开头结尾一样，同属于诗文的篇章结构问题。文章的承转往往通过过渡段，或起上下承接作用的词句。而诗词的承转情况就复杂、灵活多变，因为诗词，尤其旧体诗词，高度凝练，含意却极为丰富，所以形式上跳跃性很大，要做到似散却聚，珠玉成串，确实非下大功夫不可。

这里，仅就毛泽东的诗词的承转关锁，谈一点感想，以求教正。

直承

即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直接承转。如《卜算子·咏梅》一词，上阕写严冬到来，风雪严寒，坚冰百丈，梅花仍俏然开放。下阕紧接着说，不为争春，而为报春。如果说，上阕表现梅花不畏天寒地冻、风雪侵袭的一副傲骨，那么，下阕则充分表现梅花极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且，战斗乐观的情绪力透纸背，绝没陆游式的半点孤芳自赏、哀惋自叹的味道。中间承转，未留半点间隙。从形式上看，上阕结尾句是“犹有花枝俏”，而下阕的首句则是“俏也不争春”，也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联系1961年12月的国际形势，想想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意义深远的斗争中的处境和地位，这首词的内容和形式，确实达到高度的完美和统一。说毛泽东的这首词，是前无古人的咏梅绝唱，确实不过分。

顺承

是指一个事件的各个环节，或几个事件之间，依据自身发展变化的先后顺序，自成承转。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开头句“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写红军埋伏在龙冈镇，战斗即将打响的紧张的气氛，是事件的开端。“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写激烈的战斗场面和辉煌的战果，是事件的发展。下阕写蒋介石不甘失败，以二十万大军卷土重来，气势汹汹，而红军“唤起工农千百万”，在一举夺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之后，还为夺取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揭开了序幕，是事件的高潮和结果。条理清楚，衔接紧凑自然，与事物发展的内在的逻辑顺序完全一致。

递承

是指两层意思，不止上下衔接，而且更进一层。如《采桑子·重阳》一词，上阕写日月无限，人生易老，但重阳又到，却是“战地黄花分外香”，充满生机，美得奇特而诱人。下阕写尽管秋风劲吹，不似春光，但举目了望，江天万里，霜红无限。虽不似春风徐来，万物苏醒，生机勃勃，但却是秋风劲吹，摧枯拉朽，能迎来江天万里的收获季节，还能迎来一个更加明媚的春天。这首词极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毛泽东在当时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的情况下的心境，同时也充满了人生的哲理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确是进了一层。

反承

是指下一层意思不按上一层意思顺接下去，而是从相反的方向着笔，以完全不同的色彩，绘出另一幅迥然不同的图画，引出一层完全相反的意思，形成强烈的对照，产生极佳的艺术效果。《七律二首·送瘟神》的第一首写：江山秀丽，可血吸虫猖獗，就连神医华佗，也无可奈何。致使千村薜荔，万户鬼歌，天地虽宽，却一样悲欢。

第二首却没有接着写下去，而一扫低沉、令人窒息的气氛，唱出“春风杨柳万千条”这样激越的调子，绘出一幅消灭血吸虫后，神州绚丽，六亿人民精神焕发，斗志昂扬，战天斗地、轰轰烈烈，改造中国的动人画图，表现了中国人民崭新的时代风貌。

婉承

是指一层意思之后，不是直接下去，而是宕开一笔，似另辟新径。待叙完之后，才知仍是上层意思的延续和完结。《沁园春·长沙》一词，上阕是写，深秋，独立于橘子洲头，所见千山万岭，层林红遍；雄鹰、游鱼，或搏击长空，或翔于浅底，真可谓万物峥嵘。于是结尾提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问题。

下阕既没接着写景，也没直接回答所问，而是轻轻一笔，“携来百侣曾游”，缓缓宕开，展现出一幅新天地：青春少年，意气风发，才华横溢，乐观奔放，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他们指点江山，壮怀激烈，憎恨黑暗，抨击时弊；有时在湘江游泳，江水浩渺，却无所畏惧，击水所致，洪波巨浪，即使急驶中的船只，也被阻挡，何等的英雄气概！

读罢掩卷，便自然明白了“谁主沉浮”的答案。主宰祖国命运，领导革命的，原来就是这些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答案是肯定的，只是委婉些罢了。

意承

是指一首诗词中的各层意思，或由一条思路，或依一种逻辑关系，使之承转关锁，构成一体。如《七律·到韶山》一诗，毛泽东家乡一别，三十二年，现在回到故园，怎不浮想联翩。土豪劣绅，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祸国殃民。工农奋起，高举红旗，燃起革命燎原烈火，并最终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扭转了乾坤。正因为有成千上万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人民才得以解放，翻身作主人。活着的人们，怎能不发愤图强，艰苦奋斗，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奋斗、前进、再奋斗、不断前进，正是这条革命的逻辑贯串了全诗。

诗词的承转关锁也是灵活多样的，没有固定的框架。不过，需格外注意的是，要力避平铺，要有跌宕。即要有抑扬顿挫，铿锵有声；起承转合，疏密有致。尤其律诗，首联应该平稳，颔联应该和平匀称，颈联应该振起，尾联应该收结。最重要的是中间两联。

《七律·长征》一诗，首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平稳如高楼地基。颔联“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承上斗峭而来，却缓脉赴之。颈联“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耸然挺拔，别开一境。二联和平，三联陡起，表情达意，艺术形式俱达佳处。尾联“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越千山，渡万水，爬雪山，过草地，千难万险，一朝胜利，怎不群情激昂，喜笑颜开，前途光明，倍感鼓舞？就此收结，紧凑完整。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承转关锁最为精彩、最令人倾倒的是《贺新郎·读史》一词。

这首词，上阕基本上是敷陈其事，不置可否，不动声色。下阕则大发议论，爱憎分明，情绪激昂，大声镗。而二者之间的承转关锁句，就是“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对于这个“过片”句的作用，萧涤非先生极为称赞，并有极为透辟、极为精彩的分析。

上阕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概述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正是由这一句“一篇读罢头飞雪”，才转入下阕对剥削阶级的所谓“正史”，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挞：那不过是各阶级社会中的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对劳动人民极尽贬低、污蔑欺骗之能事罢了。毛泽东愤怒他说：这纯粹是欺骗，而且已欺骗了几千年！为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为他们的代表人物如跖、庄0，陈胜等正了名，使颠倒了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这就彻底批判了剥削阶级的唯心史观，以及这种欺骗和严重危害性。正由于这一句，才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壮烈斗争，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功绩。正因为这胜利来之不易，所以毛泽东才极为感慨，欢欣鼓舞！

这一句极为绝妙，还在于在结构上占有重要位置，正是词论家所称道的，既写得藕断丝连，又如“奇峰突起”，使读者至此，精神为之一振。

虽仅此一句，却清楚地看出他诗词的功底多么深厚！

和诗的承转，更复杂些。如毛泽东和郭沫若、和柳亚子的诗词，有时一诗唱和，几经往来。要说明诗词的承转关锁，颇费笔墨，自不必赘语。不过，只要反复诵读，仔细品味，自会受到启迪，得无限乐趣的。

毛泽东诗词的创作方法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是毛泽东于1958年提出的文艺创作原则,也是进行文艺鉴赏和文艺批评的标准,它对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艺术水平,都起了极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毛泽东既是这条原则的倡导者,又是这条原则的实践者。他的诗词,是运用“两结合”的原则的最高典范。

严格他讲,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因为任何文艺作品,都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至少也是由现实生活所引发的,所以文艺创作必然是现实主义的。任何文艺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都是形象思维,都少不了对现实生活的集中、概括,使之典型化、艺术化,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以任何文艺创作又必然是浪漫主义的。所谓某作家某作品是现实主义的,或某作家某作品是浪漫主义的,只是有所侧重罢了。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他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他用马列主义的原理观察、分析、解决问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关头,正是有了他,才一次次拨正了错误航向。反映在他的艺术实践中,便是极清醒的革命的现实主义。毛泽东又是一位彻底的革命家,他有共产主义必定要实现的坚定信念,而且一生矢志不移。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制度,都是产生于伟大的理想之中。没有伟大的理想,就绝不会有美好的未来,所以在中国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尤其在革命处于极端危难的关头,他总是以革命的理想凝聚、教育、鼓舞大家勇往直前,克服困难,争取新的胜利,这反映在他的艺术实践中,便是革命的浪漫主义。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的大风大浪里,在血与火的磨炼中,养成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的伟大人格,加上他贯通古今、渊博无比的知识,思接千载的想象力,视通万里的广阔胸怀,过人的诗词天赋和才华,所以,他的诗情似岩浆奔突于胸中,他的诗词创作如火山喷发,光彩夺目,有的是现实主义的佳作,有的是浪漫主义的精品,有的则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完美的统一的绝唱。

他的诗词的成就,现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尚无来者的。

一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首先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的。他对中国革命过程中,阶级与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人们所处的时代、环境,都作了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并把历史的画卷展示给人们,使他们在丰富多彩的艺术生活中汲取教益,从而去改造世界,创造更新更美的生活。

《贺新郎》、《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产生于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期间,是那个时代的反映。

《西江月·秋收起义》、《七律·长征》等十七首诗词,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包括中央苏区和长征两个阶段),这些作品是这一历史时期的诗史。

《沁园春·雪》、《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产生于抗日战争前夕。不过,

创作这两首词的时候，主要对付的还是蒋介石。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产生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时期，它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是新中国诞生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的真实记录。

《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七律·登庐山》、《七律·答友人》等九首诗词，产生于我国开始进行有计划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所经历的重大变革，党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以及改天换地的伟大成就。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贺新郎·读史》、《念奴娇·鸟儿问答》等十二首诗词，既是六十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党砥柱中流的伟大形象的缩影，又是我国、我党所度过的不同寻常的岁月的写照。

毛泽东的诗词是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的浪花，又是中国革命史的一面镜子，它反映了社会大变革的本质——无比优越、朝气蓬勃、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了极端落后腐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还展示了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未来蓝图。

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现实主义，也不是呆板不变的，而是灵活多变、丰富多采的。

以“真实，最高的真实”，再现“真正的人，真正的生活”，“象他们实际的那样，应该的那样”。绝“不再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象凸面玻璃一样，在一种观点之下，把生活的复杂多采的现象反映出来，从这些现象里面，汲取那构成丰满的、生气勃勃的、统一的图画时所必需的种种东西。”（别林斯基语）

《西江月·秋收起义》，作于1927年，就是真实地反映了我党“八七”会议前后，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举行武装起义，实行武装的农村割据的那段历史。具体记叙了那个时代的阶级关系，秋收起义的声威，正在进军中的、威武雄壮的红军队伍。语言平易，如实记来，白描手法，毫不夸饰。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为吊祭罗荣桓同志而作。罗荣桓同志和毛泽东一起领导了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几十年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这首诗既赞颂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我党卓越的领导人之一的罗荣桓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贡献，崇高而光明磊落的人格，又表现了作者悲痛愈常、难以言表的深厚感情。这是真实的记录，所以感人至深。

这种真实而直接的“生活的复制、再现，”绝不是简单的照相，而是经过了作者艺术的再创造。如《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所记，从起义的酝酿组织，到起义的发动爆发、发展，是极其复杂的，也存在许多思想、行动上的问题，但这都不是本质的问题，本质的问题是：中国革命发生了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转折，从而结束了党的幼年时期，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作品是革命的现实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所以，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人物的塑造，环境的描写，甚至遣词造句，都无不打上作者的立场、观点等主观意志的烙印。

如《清平乐·会昌》一词，本作于1934年夏季，正值中央苏区面临极其严峻的形势，反五次“围剿”已持续了近十个月，已失去内线歼敌的能力，实行战略转移已不可挽回。革命处于危难中，但毛泽东基于对中国革命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所以能高瞻远瞩，于挫折中看到光明，而不被一时的现象所迷惑，当再过会昌这片用鲜血和生命浇灌的土地时，仍能心境开朗，写出“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佳句，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并以此鼓舞大家的斗志。

毛泽东有些词极富想象，但就创作方法看，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如《浪淘沙·北戴河》，上半阙所写意境多么广阔：幽燕之地，海阔天空，任你展开想象的翅膀。下半阙一句“往事越千年”，把你引入历史的长河，又是多么悠远。真是名副其实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了。

但这首词反映的仍然是现实：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疗养地，一边工作，一边休养。一天，狂风大作，波浪万叠，他不顾劝阻，依然于白浪滔天、汪洋无际中下海游泳，回来后仍兴犹未尽，抚今思古，遂成这首词，以赞颂有计划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国泰民安、清正廉洁的大好局面，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极其伟大的事业！所以，无论就选材，还是创作的意图，其创作方法都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的。

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反映生活，与典型化原则并不矛盾。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要进行概括，也容许虚构、想象和夸张，但它绝不同于浪漫主义，它忠实于现实生活本身的规律，是实际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另外，文艺作品反映生活，可以是全方位的，也可以取某个角度；可以是反映全貌的巨幅画卷，也可以是取一个或几个有代表性的镜头。《七律·长征》属于前者，《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等以某一事件为内容的诗词，便属于后者，都属于现实主义的作品。

有的作品，其创作方法可能更复杂些，如《沁园春·雪》。从内容上看，上半阙写北方隆冬的雪景，写了长城、黄河、秦晋高原，气象宏伟壮丽，气势包举。下半阙则通过评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历史人物，得出不能与当代“风流人物”相比的结论，似与当时的现实无联系。

可毛泽东曾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他们的时代都曾建功立业，烜赫一时。但他们毕竟都是压迫、剥削人民的封建统治者，都曾给人民造成无数的苦难。他们把祖国的大好河山，甚至把人民都看作他们个人的私有财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他们个人，才是主宰一切的。

《沁园春·雪》所批判的正是封建主义的这个反动侧面，而这种批判，正好是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蒋介石对内实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政，对日本帝国主义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卖国政策，他“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所实行的政府包揽抗战，实际是压制抗战，不抗战。红军北上抗日，作战略转移，他欲消灭红军于长征路上；红军过黄河东征，他却以数十万大军，并勾结阎锡山进行阻击，难道这不是历史的反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依然搞他的蒋家王朝，实行个人独裁，大打内战。所以，毛泽东在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期间，把《沁园春·雪》抄赠柳亚子先生，仍是对封建主义的这个反动侧面的批判的继续。在批判的同时，说明只有今朝的风流人物，即无产阶级，才能使祖国山河更加信美多娇，才能让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青春，才能领导抗日战争，夺取胜利，才能使人民成为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真正主人。

虽然这首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吐纳珠玉”、“卷舒风云”，极其鲜明，又极其含蓄，但反映的毕竟是现实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毕竟是在这种斗争中的思想感情。所以，这首词的创作方法仍然主要是现实主义的。

二

郭沫若同志曾说：“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批判，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说，文艺活动的本质是应该就是现实主义。但文艺活动是形象思维，它是允许想象，并允许夸大的，真正的伟大作家，他必须根据现实的材料来加以综合创造，创造出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创造过程，你尽可以说他是虚构，因而文艺活动的本质也应该就是浪漫主义。”又说：“鲁迅诚然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但未尝没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的成分，甚至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吧。”而“二者”结合最好，成就最高的“最显明的例证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了。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发展了，他是最伟大的一位现实主义者，但我也敢于说，毛泽东同志同时又是最伟大的一位浪漫主义者。”他是一位伟大的实践家，又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一家献出六位亲人的生命，他自己也把全部的精力和生命献给了中国和世界人民。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人类最伟大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事业。

创作诗词时，他“从客观的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上面，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测——所愿望、可能的东西，并以此使形象更为丰满。”每当这时，他总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感情激动，如江海波浪起伏。有时如大彼大浪，汪洋无际，形之于纸，便成为雄浑的诗，如《沁园春·雪》之类；有的如微波细浪，涓涓细流，涟漪波光，便成为俏丽的诗，如《采桑子·重阳》、《菩萨蛮·大柏地》之类。在这些诗词的创作中，总少不了想象、概括、虚构和夸张，所以其创作方法，也必然是浪漫主义的。

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于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瑰丽奇特的想象，常以热情奔放的语言，夸张的手法，塑造形象。凡浪漫主义的作品，一定极富于想象。而富于想象的诗词，其创作方法，并不都是浪漫主义。因为想象，表现在毛泽东的诗词里，是摇曳多姿的。

联想

由现实引发，想象所至，可以是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但其基本特点，都是现实存在的。如《七律二首·送瘟神》，据这两首诗的小序说：“读六月三十日（1958年）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想南天，欣然命笔。”眼下现实是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由此引发，想到几千年来，虽祖国山河秀丽，却无奈血吸虫肆虐，使村庄荒芜，万户萧疏，恶鬼猖獗，人民苦难深重，即使神仙也无能为力。所想虽然是过去的，但却是现实存在的。

又在遥望南天中，想到全国的大好形势，人民群众翻身作主人，焕发出

无限的主人翁精神和创造才能，江山又多情，有意配合，六亿神州，正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前人未曾经历过的改天换地的伟大事业。所想，虽然广阔无际，但仍然是现实存在的。

想象

这种想象，是植于现实，却又不局限于现实。它是以现实为基础，按照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和生活的逻辑，所展开的想象。所想，可能是现实中所没有的，但在未来的现实中必定会有。所以这类诗词的创作方法，其基调是现实主义的，但含有相当的浪漫主义成分，甚至一半对一半。如《念奴娇·昆仑》，写于1935年10月。当时长征已接近结束，但还没有完全胜利结束，还未到达陕北。可毛泽东却想到，在世界上反对、消灭帝国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又地大物博，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把昆仑“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多么伟大而崇高的思想境界！当时所想，不是现实，但谁能说这是空想？谁能说这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世界不会成为现实？

又如《水调歌头·游泳》，作于1956年6月，毛泽东不怕大风大浪，竟然于6月1日、6月3日、6月4日，三次畅游长江，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鼓舞，感情激越，诗情大发，挥毫填成这首词。当时长江大桥还在建设中，可毛泽东已想到“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但不久就证明毛泽东的想象是完全合理的。

更为宏伟的想象是：“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不是现实的，但谁能说这种想象不是合理的？这“高峡出平湖”，不但不是无法实现的神话，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成为连神女也会惊讶的现实。这次七届四次人代会上，就已有一个专家组提出了修建三峡大坝的设想，虽未列入八五计划，但已提到四化建设的议事日程，这证明毛泽东在这首词中所表现的远见卓识、伟大预言，是何等的科学！

幻想

幻想也是由现实引发的。任何幻想都产生于自然和社会的现实。它不象理想，是合乎现实规律的、终究会实现的想象；而幻想（即使非常美丽的幻想）不仅现实中没有，即使将来也不会有。但需要注意的是：科学可以假想，但绝不能幻想，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文学艺术却是可以幻想的，不但允许，而且这种幻想还可以增加艺术的美和无限的魅力，甚至幻想只要合乎情理，合乎艺术的真实，也可以出不朽的作品，如《西游记》；当然，幻想也有时代性，如人们想登月宫，想上天入地，在神话时代，是幻想，而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就成了理想。

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曾作《桃花源记》，文中说，秦时有些人逃到一个偏僻宁静的“桃花源”地方避乱，从此与世隔绝，过着和平美满的生活。直到晋代才有一个武陵（湖南常德）的渔夫，因迷路偶然发现了这个美丽而幸福的地方。这一幻想，在封建社会里，根本无法实现，纯属幻想。

可毛泽东的《七律·登庐山》的结句是：“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这一问，非常有风趣。“世外桃源”根本不存在，为人所共知，

又怎么去那里耕田？可仔细一想，确实问得深沉。陶令、乱世，已成为遥远的历史的记忆，但古人所幻想的没有战乱的、和平、恬静、老幼幸福的社会，在今天，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却成了现实。许多“桃花源”岂不山口大开，与民同乐？如果大诗人陶渊明还能仙生今世，愿意去那里耕作，怡养天年，怎么能不受到热烈欢迎呢？陶渊明的想法奇，而毛主席的想法更奇。这奇，是“奇丽”、“奇特”。正由于这一想法，才增加了歌颂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力，才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正是这奇特的一问，才增加了诗的无穷韵味！

优秀的文艺作品，一定要有理想，要有丰富的联想，也要有奇特的幻想，因为幻想才更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三

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法，是要求文艺家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把革命理想和革命现实，把革命气概和求实精神，把革命趋势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用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塑造动人的艺术形象，歌颂新生事物，抨击腐朽事物。

毛泽东是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典范。《念奴娇·鸟儿问答》词，作于1965年，它所反映的是：1963年美、英、苏订了限制核武器试验的“三家条约”，妄图保持核优势，大搞核垄断，进行核讹诈；现代修正主义大搞和平过渡、和平竞赛，散布战争恐惧，妄图苏美主宰世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我们产生了极尖锐的分歧；亚、非、拉出现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领土主权完整，反对霸权主义，坚持马列主义的原则性，在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上反对修正主义；坚持革命，反对制造欺骗世界人民的幻想，并强烈地谴责和抨击了那种“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

这首诗中所塑造的形象，如“鲲鹏”；所创造的意境，如“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炮火连天的人间城郭（双关，有真实的一面）、仙山琼阁、与雀儿问答等，却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所有形象、环境等都是作者选择、概括、甚至虚构出来的，是经过艺术处理创造出来的，所以，这首词的创作方法，虽然含有现实主义成分，但主要还是浪漫主义的。

《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是古今诗词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运用“两结合”创作方法产生的精品。诗中的形象，如杨开慧、柳直荀两位烈士的英魂，仙人吴刚、嫦娥，无论眼前和未来的现实中都不会有的；所创造的意境，英魂升天，仙人于万里长空中奉酒起舞，人间伏虎，英魂挥泪等更是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的，所以它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的作品。

但就这首词的主题而言，“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在宣扬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出：革命烈士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革命家抱有革命的乐观主义，对于革命的关心是生死以之的；抱有正义感的群众（吴刚和嫦娥）对于革命和革命烈士是怀抱着无限的尊敬和同情的；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该象同志一样，亲密无间。”（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所以，这首词的创作方法，又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

这首词所写，既是天上，又是人间；既是烈士英魂，又是仙人；既是现实的革命，又是重霄九上的仙境；既是幻想，又是现实。人间天上打成一片，

“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实践，有几点是必须遵循的：

一、必须把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理想产生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脱离现实的“理想”，再美好，也是空想。可没有理想的现实，也没法向更高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象毛泽东著名词章《念奴娇·昆仑》那样，揭露了帝国主义虽疯狂于一时，但它毕竟是腐朽没落的东西，必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走向灭亡；而共产主义世界虽然还是遥远的未来，但它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因为这是历史的大潮流，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又如《卜算子·咏梅》，现实虽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张牙舞爪，把个共产主义运动搞得污烟瘴气，形势是“悬崖百丈冰”，但它毕竟无法阻挡“山花烂漫”的春天的到来。这样才能引导读者既清醒客观地认识世界，又给人以鼓舞和奋发向上的力量。

二、必须在创作中揭示矛盾和矛盾斗争的前景。象毛泽东那样，在他的诗词里，所揭示的矛盾基本上有四种：一是国内的阶级矛盾，如《西江月·秋收起义》、《沁园春·雪》等等作品，所揭示的中国人民与蒋介石所代表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二是国际间的阶级矛盾，如《念奴娇·昆仑》和《七律·冬云》等等作品，所揭示的是中国与所有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矛盾。三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等，反映的是朋友、同志之间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而在这些诗词中都展现出必然胜利的光明前景，预示了美好的未来，并且不久便得到历史的证明。

三、必须歌颂新时代的新人，揭露批判一切反动腐朽的东西。在毛泽东的诗词里，对风华正茂的青年革命者，对高举红旗和“农奴戟”的农民，对当今的风流人物无产阶级，对反帝反修的无畏的战士，对人民解放军的普通战士等等，无不满怀热情，进行讴歌。而对万户侯、对军阀、对蒋介石、对帝国主义、对修正主义，对苍蝇、蓬间雀等等，无不横眉冷对，予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从而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四、必须把政治倾向性和真实性统一起来。象毛泽东所做到的那样，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这构成了他的诗词的基调。但他对这场伟大斗争的艰巨性，如敌人作为真老虎吃人的一面，革命者的流血和牺牲，从不回避。在他的诗词里都有鲜明而充分的反映。这一点是易于理解的，所以不必多说。

五、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学传统。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在我国文学创作中都有着光荣的传统。如果说由《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和由《离骚》开创的浪漫主义还是涓涓细流，那么到了唐代的诗，宋代的词，明清的小说，如《红楼梦》等等优秀巨著的出现，便汇成了江河，蔚为壮观了。毛泽东是继承了这个光荣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的了，发展成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并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使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创作出许多令人拍案叫绝，脍炙人口，为人民群众喜闻乐道，争相传诵的艺术精品；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毛泽东的诗词同

他的名字一起，将与天地同在，与日月争辉！

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

毛泽东是中国当代最卓越最伟大的诗人，这已为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人民所公认。他的诗词如历史画卷，展现在我们眼前；象革命惊雷，回响在我们耳边。他诗思深邃，虽然诗词数量不多，但人们无不为此作品的丰富内涵而赞叹，也无不为他的宏伟博大、气势磅礴所感动。他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能，熔铸了这些雄奇瑰丽的诗章，也镌刻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艰难困苦而又威武雄壮、灿烂辉煌的历史。

有位著名的评论家说过：没有任何一位诗人能依赖自身而伟大，他必须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成为社会、时代的喉舌。

有伟大的时代，才有伟大的诗人。

有伟大的诗人，才有伟大的诗篇。

毛泽东本人扎根于中国的土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他了解中国，超过当代国内外的任何人。他有持之以恒的奋斗目标，又有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再加上他的艺术素养和天才，才是一位当代独领风骚的诗人。

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中国亘古以来的一位伟人，半个多世纪的火热的斗争生活，又孕育了他的伟大诗篇。他的诗，便是一部形象的中国革命史。

他的理论才能，在于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他的政治才能，在于他象一位舵手，在每一个革命的关头，都能拨正历史的航向，他结束了三千年人剥削人的历史，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时代；他的艺术才能，在于用一支生花的妙笔，自铸出前无古人的壮丽诗篇。他以诗词的形式，艺术地反映了历史的各个关头和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从他的诗词里，会看见历史的足迹；也会听见革命的风雷。

他的诗，是一部史诗。

他的诗词创作过程的共同特点是：革命实践活动于前，进行艺术概括于后。

—

《沁园春·长沙》，是他早期革命活动的反映与总结。这首词写于1925年，这以前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大致是：1913年初到长沙读书；1917年主持校友会，与蔡和森等常一起谈古论今，或到湘江游泳；1918年创建新民学会，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18年秋去北京；1919年3月回长沙，主编《湘江评论》，就主张“民众的大联合”、“砸烂旧世界”；1921年7月下旬，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在上海参加党的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去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长沙；1923年11月又离长沙去广州；1925年春节过后，回韶山，9月经长沙转赴广州。这几年中，毛泽东除了参加领导工人运动以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从事农民运动和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卓越的成绩。所以，1925年9月到长沙期间，漫步湘江，望着万山红遍，漫江秋色，全国革命形势逐渐高涨，自然引起令人欣慰的回忆，他心情舒畅，情绪高昂，吟成《沁园春·长沙》这首词。

上阕写景起兴，暗比革命形势大好。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制订的最

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更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这些，在该词里都有着鲜明的反映。尤其在上阕的结尾提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根本问题。下阕便明确自答：主宰国家、民族命运的，就是风华正茂、挥斥方遒、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和《贺新郎》都写于这期间，虽都是赠别诗，但也是这个时期的革命活动、思想感情的反映。

二

《菩萨蛮·黄鹤楼》写于1927年春，虽仅此一首，但却是一个历史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写照，它是革命由高涨转入暂时低潮的反映。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于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工农运动迅猛发展，革命日趋高涨。

但到1925年，孙中山于北京病逝；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日渐猖獗，蒋介石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阴谋步步得逞。尤其严重的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由一味退让，发展到屈膝投降。到1926年，蒋介石通过《整理党务案》排斥了共产党，把党政军财所有大权篡夺到手。到1927年年初，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在北伐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但独夫民贼蒋介石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勾结反革命两面派汪精卫，终于挥舞屠刀，把千百万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革命人民投入血泊中。

就是在这个历史关头，在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这时已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地提出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也预见到“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到1927年3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仍存有挽救革命的时机，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使党完全处于任人宰割、坐以待毙的境地，所以，尽管毛泽东与把持领导权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了顽强的斗争，但终因不处于党的领导岗位，只能眼见革命危机四伏，万分焦虑。1927年春，他在武昌登临黄鹤楼，望着烟雨中浩荡的长江，联想起崔颖的题诗，“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才发出了“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浩叹。

三

如果说《菩萨蛮·黄鹤楼》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结，那么《西江月·秋收起义》就是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的开端。

1927年，蒋介石攫取了上海工人阶级三次武装起义的成果，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的反革命真面目也公开暴露，由限制到肆无忌惮地煽动反共，最后大规模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再有土豪劣绅的反攻倒算，反动军阀如张作霖的策应，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李大钊、

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英勇牺牲，革命遭到惨重失败。

尽管4月27日至5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批评了陈独秀忽略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错误，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仍未彻底清算，毛泽东“保存武力”、“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正确意见，又未被采纳。直到“八一”南昌武装起义失败之后，中共中央于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彻底清算并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路线，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才得以接受和贯彻。

9月9日，毛泽东便回到长沙，制定暴动计划，经过和湖南省委共同发动、组织，领导了永垂青史的秋收起义，正如《西江月·秋收起义》词中所写：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举起了工农革命的旗号，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并且“向潇湘直进”，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左”倾机会主义者，生搬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大搞城市暴动，使中国革命屡遭挫折。这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血的教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辟了“井冈山道路”，从此中国革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丰富、发展马列主义的创造才能。

作为这一历史阶段总结的，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一诗。他以炽热的革命热情，坚定乐观的革命斗志，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绝无先例的艺术构思，熔铸出这首千古绝唱，总结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这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歌颂了红军感天地位鬼神的英雄业迹。如果把这首诗换成更通俗的形式，那就是：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

这段神采飞扬的评述，和《长征》诗，真是异曲而同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人类历史舞台上所上演的最为辉煌壮丽、最为光彩照人的一幕。所以，它也就自然出现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一个高潮。除了这两首诞生于历史关头的诗词外，还有十五首诗词，是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的。

《西江月·井冈山》，作于1928年9月，反映的是，击败湘赣两省敌军第二次“会剿”、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毛泽东十分兴奋，“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遁”，所描绘的就是这次战斗的雄壮场面。

《清平乐·蒋桂战争》和《采桑子·重阳》写于1929年的秋季，所反映的是下列历史事实：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蒋桂战争；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蒋冯战争；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开辟了赣闽根据地。“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就是创建闽两根据地情况的再现。“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廓江天万里霜”，也是这一时期，虽在建军原则、建立根据地等重大问题上产生矛盾，但毛泽东同志仍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体现。

《如梦令·元旦》写于1930年1月，古田会议之后，部队由古田、归化、清流、宁化翻武夷山进入江西途中的情况。部队冒寒风，穿深山，跃溪涧，“直指武夷山下”。山峦起伏，红旗招展，战士精神抖擞，真是“风展红旗如画”！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作于1930年2月。反映的是：红军迎风雪，战严寒，翻山越岭，向吉安进军途中的情景，也反映了红军乘蒋冯战争扩大根据地、粉碎蒋介石阻击红军的阴谋、取得歼敌胜利的情况。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作于1930年7月。“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反映的便是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混战，乘机大发展，以及赣西南根据地、黄公略红六军发展壮大情况。

1930年2月，蒋介石以十万大军，分进合击苏区开始，以被歼九千余人，师长张辉瓒被俘，谭道源师被歼大半的失败告终。红军取得反第一次大“围剿”胜利。

1931年2月，蒋介石不甘失败，又以二十万大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风烟滚滚，压向苏区开始，又以二十八师大部被歼、打五仗被歼三万余人，丢枪二万余支，狼狈溃逃的失败告终。

毛泽东就是在反“围剿”频传捷报声中，创作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和《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两首著名的词章。

《菩萨蛮·大柏地》，是1933年夏重过大柏地时所写，虽然歼敌近两个团，俘敌团长以下八百余人，取得胜利，但这仅是回忆中事。正是从反面衬托出他当前的不快心情：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斥，强使其“暂时请病假”，调离军事领导岗位，改做政府工作。

《清平乐·会昌》一词作于1934年夏，这时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不得贯彻，遭“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打击，正确建议遭博古、李德拒绝。处于无权地位的毛泽东，眼看战局一日不如一日，心急如焚，所以词中虽然有“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的描写，表现其勃勃朝气，壮志未已；虽然有“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词句，表现其坚韧不拔、永不衰竭的革命意志，语言雄奇高亢，其实心情却是抑郁的。正如诗

人在自注里所说的：“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会昌》正如前面那首《菩萨蛮·大柏地》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

读着这首词，怎能不想起我党这段令人肠断的历史。

《十六字令三百》，作于1934年至1935年之间，遵义会议之前。红军冲破四道封锁线，艰难西进，强渡湘江，进入湘桂边界的西延山脉，又随即进入群峦起伏的贵州山区，红军正在长征中，借山势高大、气吞霄汉，表达红军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决心。不过若仔细品味，仍含着郁闷凄苦的滋味。

但是到毛泽东填词《忆秦娥·娄山关》的时候，虽然仍感到“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但情况终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红军开始摆脱了被动处境，并四渡赤水，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人、再取遵义的胜利。所以，写这首词，心情还是非常兴奋的。毛泽东即使心情还有些沉郁，但却不抑郁，因为他现在思考的是如何挽狂澜于既倒，统率红军长征胜利、完成北上抗日的大业。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突破天险腊子口，越过了岷山，他这时一扫沉郁的心情，感到“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就是怀着这种心情，于1935年10月，创作了《念奴娇·昆仑》。尤其得知陕北保存有红军的消息，更使他兴奋异常，决定革命落脚点放在陕北。《清平乐·六盘山》就是这段历史的写照。

由彭德怀同志指挥的对马鸿逵、马鸿宾骑兵的一战，大获全胜，可看作是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吴旗镇的奠基礼。

至于毛泽东所写《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就是对彭德怀这次汗马功劳的赞扬。

如果说这两首诗仍属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历史阶段的话，而作为历史航船的舵手、党的领袖、全军统帅的毛泽东，所想的已经是“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已经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了。

四

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国内局势也发生急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在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之后，又于1935年夏策划了“华北事变”，攫取热河、察哈尔和河北的领土主权，因而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所以，中共中央于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毛泽东还于长征途中，登上岷山，但见风雪弥漫，群山飞舞，一片皆白。他联想到祖国大好河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民族危急，心潮翻滚，他把这种感情便熔铸在《念奴娇·昆仑》这首气势宏伟的词里。

不过，毛泽东作于抗日战争前夜的诗词，所见到的很少，仅《沁园春·雪》和《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两首。

《沁园春·雪》作于1936年2月。读这首词，自然会想到下面这段历史。1936年1月，红军为表示抗日的决心，便东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但却遭到军阀阎锡山、民贼蒋介石的拦击，红军为顾全抗日大局，保存国力，履行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于5月回师陕北。

毛泽东在自注中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未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诗人面对雪后初晴的高原风光，历数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的“文治武功”，抒发中国共产党人拯救全民族的远大志向。这里批判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就是针对卖国贼蒋介石的，他不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代表吗？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与慈禧太后“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主张，不是如出一辙吗？批判封建主义的这个反动侧面与抗日救国是完全一致的。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就是勉励丁玲同志去陇东前线，参加为打退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红军发起的山城堡战役。这次战斗的胜利，严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五

至于反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1946—1949）时期的诗作，所见也不多，仅有《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两首。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于1949年4月。这是中国革命进程中一个最伟大的历史关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一再策划“划江而治”的阴谋，以求一逞。国际上的朋友，也有的劝我们不要过江，怕引起美国干涉，爆发世界大战。

1948年12月30日，针对这种形势，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批驳蒋介石元旦求和声明，提出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

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历史上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

3月至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妇、青等群众团体成立，以迎接全国解放；

4月1日，国共开始在北平举行谈判，20日，南京政府拒绝我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1949年4月21日，这个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反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随即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一千余里的战线上“过大江”，并于4月23日占领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首都”南京。

捷报传来，毛泽东浮想联翩，写下了这篇气势磅礴、足凌千古的最后大决战的颂歌，艺术地记下了这个砸烂！旧中国、创建新中国的伟大时刻。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仅指要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还指在全国胜利后，由新

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继续革命，绝不停留。为此，特别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今天读着这首诗，想想我国的现状和当今世界的变化，该是多么亲切、多么值得令人深思啊！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虽然是老朋友之间的酬唱之作，但绝非一般的世故来往，而是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会忘记朋友们的贡献，诚恳地表示愿与他们一起合作继续革命，从而调动了民主人士的积极性，继续前进，为建设新中国出力。

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10月8日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从1950年到1952年，是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1959年7月，创作九首诗词，形象地记录了新中国第一个十年的经历。

这九首诗词，其中有四首是奉和酬唱之作。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是奉和柳亚子1950年10月所赋新词《浣溪沙》的，以记新中国诞生一周年。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写于1950年11月。“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是记述志愿军赴朝参战，并庆祝取得重大胜利的。

《七律·和周世钊同志》写于1955年10月，写思念旧友和故乡，并借以赞扬农业合作化运动，也表达了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观察。

《蝶恋花·答李淑一》作于1957年5月，是为怀念夫人杨开慧和战友柳直荀而写的。

其余五首是赞扬新中国的新面貌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

《浪淘沙·北戴河》作于1954年夏，讴歌祖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美好的憧憬。

《水调歌头·游泳》作于1956年6月，词中所写，显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已基本结束，毛泽东已开始考虑放弃抄袭苏联，摸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七律二首·送瘟神》是为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毛泽东分外高兴，“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而成这两首诗。“五岭”、“三河”；“银锄落”、“铁壁摇”是全国劳动人民发挥极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山辟岭，改天换地，团结奋战的真实写照。

《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具体、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极不寻常的时代。当时，国内，在我们无产阶级内部，在党内，围绕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国际上，“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们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胜谁败！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七

历史的车轮，轰轰烈烈，进入六十年代。整个世界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斗争错综复杂，千变万化。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又出现了一个高潮。仅从1961年2月，到1965年秋，就创作了十二首诗词，为这几年的国内外大事，风云变幻，作了形象的记录。

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我国遇到大灾人祸，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上至毛泽东，下至人民群众，生活都很艰难。1960年8月中共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并贯彻《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国民经济走出了低谷。

这时我国在外交上也处于极不利的局面。美国使越南战争升级，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不断游弋，核潜艇出入日本，威胁亚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苏修领头，其他党附和，对我党进行围攻的局面。特别是苏联，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对我国由政治孤立，到经济遏制，到以武力相威胁。我国处于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包围之中。

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诗词，都是反映这两大中心的。无论他面临多么艰难、复杂的局面，他总是镇定自若。他以为，威胁也罢，封锁也罢，孤立也罢，一切困难都将被战胜。所以，总是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坚信乌云必将散去，曙光就在前头。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斗争形势复杂，美帝国主义自以为得手，社会帝国主义也特别猖狂。所以，1958年毛泽东提出：“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当时大办民兵师，大练武，做到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就反映了这段历史。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等八首诗词，都是反映这个充满威武雄壮的历史大背景的。只是这大同之中，又各有小异，构成了各首诗词的特色。

有的高度概括，四句二十八个字，反映一个时代的风云特征，有的俏丽、工巧、坚定乐观，有的把区分两类矛盾写入诗词，有的大气磅礴，使人回肠荡气，有的则寓庄于谐，等等。

特别值得分别一说的是：

《贺新郎·读史》，是对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的哲学概括。毛泽东学识渊博，贯通古今，高屋见瓴，既说明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是人类阶级社会产生以来，阶级斗争的继续，又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的和 international 的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歌未竟，东方白。”）作了评析，鼓励革命者，对五帝三皇，对本质腐朽但一时还是真老虎的反动派，要敢于斗争，敢于夺取胜利，要做“盗跖庄0”、“挥黄钺”的“陈王”式的风流人物。这是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虽是一首痛悼亡友之作，读之让人肠断，但“君

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也反映了毛泽东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的心态。

毛泽东对于脱离群众的作风，对于党内的腐败现象，对于变修变色的危险性，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修正主义的教训，他采取整风、社教，甚至采取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来解决防修反修的问题。这也就是他满怀欣喜，写下《杂言诗·八连颂》的原因。他以为只要不忘“为人民”的宗旨，只要“拒腐蚀，永不沾”，只要“意志坚”，并做到“八不怕”、“团结力”等等，就可以永远立于天下而不败！

八

正象毛泽东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他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又是一位有卓越成就的诗人。

他主张文艺为工农兵，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忧患欢乐息息相通，使文艺成为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所以他的诗词，总是歌颂胜利，歌颂光明，即使党处于最艰难的时候，他也仍然慷慨悲歌，发愤向上，以高昂的革命的乐观主义，引导人民，坚定不移，坚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即使革命处于最危急的时候，他也总是歌颂理想，因为他坚信，一切崭新的社会制度，都起源于理想，革命的鲜花和果实，需要千百万人的汗水、鲜血和生命来浇灌。从而激发战士为新生活而战的斗志，培养他们神圣的使命感。

他主张作家艺术家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他自己就是：一生生活在群众中间，与人民同呼吸，共生死。他因人民的解放、幸福可以高兴得夜不能寐，也可以因人民的困苦而痛哭流涕。战争时期，他戎马倥偬，同战士一起出入于枪林弹雨，转战高原峻岭；建设时期，他走遍大江南北，不辞辛苦，日理万机。每当感情酝酿、强烈到寝食不安、骨鲠在喉的程度，才进入创作实践。所以他的诗词，都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或者是呕心沥血“吟”出来的。

他主张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文学作品都是美的，“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他的诗词无一不是来自社会生活的，而且没有一首不是把生活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正象鲁迅先生作品中连叭儿狗等等也典型化了一样，毛泽东诗词中的梅花、雪；鲲鹏、蓬间雀；山，水；红军，烈士等，甚至连秋、冬也都是典型化了的。对这些形象无不赋予丰富的内容和感情，显示出艺术的理想美和艺术的感染力量。

他主张文艺家对自己的作品要负责，要认真修改。他对自己的诗词，无一不进行反复推敲，反复修改，反复征求别人的意见，有时为一首诗几经往返。即使对自己战争时代的作品，也要反复斟酌，甚至连一个字、一个标点也不放过，改定之后，还要反复吟哦。

“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已成为对他的诗词成就的千古定评。

他的思想哺育了不止一代人，也不止中国人；他的诗词，作为中国和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也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珍视和称颂！

毛泽东的诗词，将和他的英名、他的事业一起永存，将同日月一样光照

千古！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

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 ——毛泽东书法艺术特色臆断

毛泽东——这个象太阳一样光芒四射的名字，在本世纪是无人不晓的。虽然他已经殒落，但是，他的光芒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头。

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理论家，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军事家，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光明的新中国。又率领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赶走贫穷，走向富裕。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领袖，而且他还是杰出的艺术家，在最赋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趣味的王国里——书法的王国里，建造了自己的丰碑。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久为人仰。他的书法流布中外，高可居摩天大楼，低可进茅屋陋舍。他的书法，流传在人们的手上，流传在人们的口头，更流传在人们的心间。我们不仅可以说，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知名度，是任何一位现代书法家无法比拟的，而且，我们还要说，毛泽东书法艺术的高度，也是任何一位现代书法家无法比肩的。

这倒不是说，因为他是领袖，他身处高位，他可以君临一切，他的书法艺术因其政名而名扬天下。恰恰与此相反，他确实确实是一位杰出的书法艺术家，是中国现代书法艺术的主将和旗手，倒是因为他政名盖世、太响了，倒遮掩了他书名的光辉。

品评毛泽东书法艺术，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工程，应该予以高度的重视，认真的对待，仔细的探求，以便对毛泽东的书法作出客观的评价，进一步弘扬和丰富我国文化的瑰宝——书法艺术。

至今，在中国书坛上，还未见到系统地研究毛泽东书法艺术的著作问世。只是看到一些纪念文字、回忆录等类的零散材料，谈及毛泽东书法艺术。这显然是很不够的。

因此，我们不揣寡陋，抱着尝试的态度，对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研究，做点基础性的工作，以期书界同仁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注意。引出金玉。

在研究毛泽东书法艺术时，我们着重在他的书法特色、师承渊源、人民性和历史地位等方面，予以探索。

豪逸有气能自结撰

一、品评的基本依据

毛泽东的书法作品，就我们所见，从1915年到1966年，在半个多世纪里，面世的足有四百五十多件。长的千万字，短的二三字。就书体而论，有楷书，有行书，有草书，惟不见甲骨文、篆书、隶书。沿着毛泽东六十多年的书迹，我们可以将他的书法活动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1900—1919），学子时期。入私塾，进师范，步入社会，初学书法。这一时期的代表书作有二：一是1915年读《明耻篇》后的批语（图一）；二是1918年举办工人夜校的《夜学日志》（图二）。前者是颜体意味，后者是魏碑气息。

第二时期（1920—1937），大约十八年，是书法探索时期。这一时期，他由一个身无分文的学子走上了驾驭中国革命航船的领袖地位。在书法之林

里，他倾听，他观察，他神游，他探索着自己的道路。这一时期的代表书作有三：一是1921年6月20日致国昌诸兄的信；一是1933年左右为鼓励军民反“围剿”的题词；一是1937年8月为抗大二期毕业证的题词。前者流媚如“二王”，中者变为左斜而瘦硬，后者左斜而骨丰。中者和后者，显然已走出了碑帖，酿制着自己的墨花。

第三时期（1938—1949），大约十二年时间，是书风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他已经成为公认的领袖，率领党和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他的书法，在狂风巨浪中淘漉，在战火硝烟中锤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很多，特别出色的有：

1938年11月，为一次青年工作会议的题词：“努力前进，打日本，救中国”（图二十七）。

1942年4月，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三周年的题词：“准备反攻”（图四）。

1945年10月，手书《沁园春·雪》。

1949年11月29日，为“国立美术学院”的题字和致徐悲鸿院长的信。

这一时期书作的风格是骨气洞达、豪迈超逸。字势右斜，左伸右收，方笔侧锋，长枪大戟。

第四时期（1950—1960），大约十一年左右，是书风深化时期。这一时期，是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时期。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六十岁上下，正是领袖人物的华岁英年，他胸纳万有，精力过人，在书法上博采众长，深化升华，力登泰山十八盘，终于到了南天门。随意挥洒，皆成佳作。特别出色的有：

1952年6月10日，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1954年，为武汉人民战胜1954年洪水的题词。

1956年12月5日，手书《水调歌头·游泳》。

1957年5月11日，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图十一）。

1958年9月，为“首都民兵师”题词。

1960年10月8日，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人员题词：“艰苦朴素”（图十四）。

这一时期的书风，在豪迈的气势之中，增加了灵动峻拔、雄强老辣，字势由险绝，复归平正。

第五时期（1961—1966），为书法造极时期。这一时期，经过天灾人祸，经济建设正常进行，社会稳定，人心向上。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七十岁上下，人书俱老，“从心所欲，不逾矩”。他的书法进入了泰山巅峰，一年一个面貌，篇篇珠玑。代表作品有：

1961年9月9日，手书《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1962年（？），手书《采桑子·重阳》（图十七）。

1962年（？），手书《忆秦娥·娄山关》（图十九）。

1963年2月28日，为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图十五）。

1963年2月5日，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图十八）

1961年2月4日，手书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中国书法的艺术之巅——草书的殿堂里游目骋怀，老笔纵横，只求意足，不见字形。

这时，也正是在这时，毛泽东虽然年逾古稀，但仍然是雄姿英发，精力

充沛。按照书法艺术的规律和他的创新求索精神，1966年以后还应该有一个衰年变法时期，以使草书书法飞跃到一个更高更新的境界。但可惜的是，因为政治运动，我们未能看到这位一代大师继续前进的足迹。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中国书坛巨大的损失。

二、品评的艺术标准

中国书法，经过千百年来的演进发展，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精品佳制，同时，也逐渐地创造和发展了书法理论，其中，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书法批评理论。

据传，书圣王羲之留下的理论著作，有云：“夫书者，玄妙之伎也。”（《书论》）而要尽善尽美，就要讲“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

南朝齐书法家王僧虔第一次提出神采问题：“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

到了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提出：“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文字论》）进一步提出：“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书议》）

宋代，苏轼提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东坡集》）黄庭坚则主张：“书画以韵为主。”

明代，祝允明主张：“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论书帖》）而董其昌则主张：“书家以豪逸有气、能自结撰为极则。”

到了清代，不管是大吏文人，还是释道诸家，大都主张“以气为主”。总其要者，以刘熙载之论为最，提出：“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可以为书。”“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学书通于学仙：炼神最上，炼气次之，炼形又次之。”（《艺概》）

简单地引用历代著名书家的一些书法批评主张，可以看出书法艺术的审美意识在不断深化，审美鉴赏的标准，在变化中不断丰富。

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五对矛盾：道与理，神与形，气与韵，情与意，性与功。这十个字代表了十个书法概念。这五对矛盾就是书法审美鉴赏、书法批评的基本范畴。

但是，这五对范畴和十个概念，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之所以无法界定的原因是：时代规范的变异和千百年来人们的审美意识的递变，大概可论，精确难述。

就书法艺术而言，对于这些范畴和概念中的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理性部分，应该予以扬弃；艺术部分应该予以保持和发扬。本着这个精神，我们试作如下理解，并建立我们的书法批评标准。

道：天道，包括自然规律、社会发展、生命运动等。

理：理念，哲学思想，包括书法美学等。

神：神采、神妙、神奇、精神等。

形：笔迹，包括形状、形势、形质等。

气：气魄、气度、气势、气象、气概、气局等。

韵：风度、风神、风韵、风趣等。

情：感情、性情、心境、情操、情怀、情绪等。

意：意志、意趣、意境、意象、意念等。

性：天性、天机、天才、本性、悟性等。

功：功力，包括各种技法把握和对书法的浸淫程度以及专业学养、文化素质等。

这些作为艺术概念的内涵，既包括传统的内容，也包括人类到了二十世纪的时代内容，包括这个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虽然说的不清楚，但还是可以感知的。

在这些范畴中，“气”与“韵”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这个主要矛盾中，“气”又是主要矛盾方面。以气通韵，以气达道，以气示理，以气生神，以气赋形，以气体情，以气察意，以气显性，以气量功。一句话，“气”是书法艺术之灵，“气”是书法艺术的生命。

三、毛泽东书法的艺术特色

基于以上对毛泽东书法的简要分析和对书法批评标准的概括，就不难探求毛泽东书法的艺术特色了。

在探求毛泽东的书法艺术特色时，应该充分估量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他是一个既善于破坏旧世界，又善于建设新世界的人。

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发现，他的书法艺术有三个巨大的支撑点：一个是他的创新精神，一个是他的天纵自然、一个是他的豪雄之气。

他对传统的书法，钻得深，吃得透，心追手摹，独悟天机，得笔得气，吸取精华，自成机杼，不践古人。他对自己的书法，也不断地扬弃，日有所进，年有所改，壮有所行，老有所攻，求新求变，终生不疲。

他胸纳万有，雄视古今，豪气鼓荡，真力弥漫，做天下第一人，作天下第一书。真可谓“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

在这三个巨大的支撑点之上，让我们用以下八点来描摹他的书法艺术特色。

睿文精义，思逸神超；
天机颖异，灵动纵逸；
笔挟风涛，浑然无迹；
豪气倾海，神采射人；
意趣酣昂，变化万千；
点画坚浑，结体奇绝；
章法变贯，意新理妙；
力屈万夫，韵高千古。

众采百家专擅一体

翻遍《毛泽东选集》，查遍其他的有关文献，还未发现毛泽东自己的有关书法的文章。在研究他的书法渊源时，只好从一些零星的材料中探求。

在毛泽东身旁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陈秉忱回忆说：“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的笔迹来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谨严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毛主席仍时常阅览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等帖，一直带在身边）。……全国解放后，更多地阅览法帖，1949年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中间，所存拓本及影本碑贴约有六百多种，看过的也近四百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

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

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说：“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体的，写起来很有气魄。”

唯一能看到的毛泽东说自己书法的，是他1958年10月16日致他的秘书田家英的信：“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毛泽东自己的手书，当然无可怀疑。

陈、田二家的话，也应可信。因为陈、田二人跟随毛泽东多年，日月共度，晨昏相处，自然是最有发言权的。陈秉忱是清末山东金石大家陈介祺的曾孙，本身就是书画家。田家英聪慧好学，工作之余专事研究清代书画，造诣不浅。所以，他们都诸于书道，所作的回忆，不会是外行观景。但，考虑到毛泽东身居高位，是否也有不便道及的，也未可知。

遵照毛泽东的信和陈、田二家的回忆，根据六十多年的传世书迹，试对毛泽东的书法家承情况作些探讨。

毛泽东的书法，总的来说是以“二王”为指归，众采百家，取精用宏，化“他神”为“我神”，专精一体，卓然成家。

早年，学魏碑，学颜真卿。1915年的《明耻篇》读后批语，是颜体。1918年的《夜学日志》，是魏碑体。1925年致国昌诸兄的信，是“大王”行书体。

二十年代后半期到三十年代上半期，形势骤变，武装割据，环境恶劣，生活不定。只有极少书迹传世。

三十年代的书迹最早是1936年11月2日致许德珩等教授的信。字势左斜放纵，已铸成他一生的字根。（字根是指字迹的根本韵律气象）

1940年大约是左斜字势的终结。

1941年大约是右斜字势的开始。

1940年2月7日为《中国工人》月刊写的发刊词，一律是左斜长瘦字势。

1941年5月所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草稿，则变成一律右斜长瘦字势了。但字根未变。

1941年后，虽战争环境恶劣而困苦，但总算安定了些（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这年以后似在学苏轼、学黄庭坚。大约有四、五年之久。

典型的例证是，1945年10月4日，致柳亚子的信，长枪大戟，字势险绝。但点画精到，真力弥漫。大有苏黄气韵。

1949年，是个繁忙而愉快的一年。取得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虽然千头万绪，但书道未偏。大约从这一年起，似在审视和品尝郑板桥的“怪”味。典型的书迹是：手书章碣《春别》诗（掷下离觞指乱山）；手书温庭筠《苏武庙》（苏武魂销汉使前）；手书崔与之《水调歌头》（万里云间戍）；

手书萨都刺《满江红·金陵怀古》（六代豪华）。以上是手书的古代诗词，是供欣赏的书法。实际上，从1949年开始，在不供欣赏的私人书信里，郑板桥的书味也是很足的。1949年6月19日致宋庆龄的信中“专诚欢迎，以便就近”等字；1949年8月19日致江庸（翊云）的信中“时局发展甚快”等字。尤其是到了1950年3月14日致龙伯坚的信和致刘揆一的信，那就不仅是字形，就连章法行气，都可看到“板桥体”的影子。这时的书法长枪大戟没有了，变成了温厚灵动的面貌了。

与此同时，在他的书法里出现了对草书的冲动。这种冲动，到了 1954 年就变成行动了。

1954 年以后他的字又骤然一变，变得道美跌宕，刚气内藏了。这好象是取法王铎的结果。

最能说明这一进程的，有三件书作：一是手书温庭筠《经五丈原》（铁马云雕共绝尘）；一是手书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折》（游艺中原）；一是手书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神龟虽寿）。除以上三件外，追摹王铎的书作很多，如手书王之涣《登鹳雀楼》、手书李白《将进酒》、手书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手书刘禹锡《听旧宫人穆氏唱歌》、手书崔护《题都城南庄》、手书李商隐《筹笔驿》、手书李商隐《马嵬》、手书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等。

在私人书信中，典型的是 1954 年 3 月 31 日致彭石麟的信。在诗词中是 1956 年 12 月 5 日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在题词中是 1958 年题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图八）等。

学王铎后，使“提按起倒”、“顿挫转折”等笔法，日趋精熟。

但是，这些只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在他的书法活动中，并不是这样单纯、死板的。实际上，学书过程是一个神游书海，目览千帖，逐渐融通的过程。就是在他学王铎的同时，他又心摹手追张旭和怀素了。

最早的例子是 1956 年 12 月 29 日致周谷城（东周）的信，已经是一片化机，满纸龙蛇了。这封信的书法，实际上是他攀登草书高峰的起跑线。这在他的书法艺术实践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个起跑线，是他走过了五十多年的书法道路之后，才到达的。他完全具备了起跑的资格和力量。环顾当时书坛，一片寂寞。攀登草书高峰，非他莫属了。

因此，在起跑后，他于 1958 年 10 月 16 日致田家英的信，就公开表明了他誓攻草书的决心。从而，越过了王铎，直取张旭和怀素。

学张旭的典型例子，是手书陆游《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图二十四）。字势连绵，一片烟云，中锋建骨，侧锋生姿，意笔相从，豪迈飞动。

学怀素的书例，是手书李白《忆秦娥》（箫声咽），硬毫走笔，点画简约，连绵跌宕，雄奇超逸。

当然，在书法韵味上，虽然各有所托，但不是截然分开的。从此以后，他手持长锋羊毫所书的精品，都是旭、素合一，化他神为我神的。

从以上简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书坛上的崛起，有他的主观条件：他天资聪绝，观察精到，神摹于心，命笔得韵。他竭力从历代碑帖中，汲取营养，学不纯师，有人有我，众采百家，专擅一体，最后达到造我神韵、有我无人的独到境界。

说到这里，我们对毛泽东的书法所以成功的研究，仅仅说了一半。还有另一半，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另一半——

任何一个巨人的出现，任何一个巨人的成功和失败，归根结底，都不是他个人行为，而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是那个时代的抉择。

毛泽东在中国现代书坛中崛起，不是他个人意志的结果，归根到底，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和选择，是我们这个时代造就的。

毛泽东的书法道路，并不是在他自己选定的条件下走过的，而只能在他直接碰到的、现实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走过的。

他从书法王国的传统中走来，他从时代的风云里走来。他又带着强烈的

时代气息和由传统积淀于他的个人特质，走进书法王国的殿堂，建造一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书法艺术丰碑。

代表人民服务人民

中国书法，是东方艺术的明珠，是东方艺术的灵魂，是中国文化的瑰室。作为艺术，中国书法，既是神秘的，又是公开的；既是高雅的，又是普及的。它是民族性的爱好。它是一种每个中国人，从童年时就培养起来的、共同的审美天性。

书法，与其他艺术一样，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而这种反映，正是通过千百年来人民群众的创造和积累来实现的。所以，书法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的艺术，最终还是要再回到人民群众中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说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他这样说了，他也完全彻底地这样做了。

他是人民的一员，他又是人民的代表。他是群众的领袖，他又是群众的朋友。他的书法艺术来自人民群众。他的书法又服务于人民群众。

他非常珍惜延绵数千年的书法艺术遗产，如大量的历史碑帖、石刻等。他善于从传统文化和直接现实生活环境中，去寻找艺术进步和创新的源泉。

他善于捕捉和把握人民群众的审美感觉和审美意识，把群众作为书法审美的主体，敢于把一切创作交给人民群众去检验。

他凭借人民群众提供的历史舞台，施展才华，走笔留墨。他的书法作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所欣赏，在亿万人民中传播。

他主张艺术家的历史责任，不仅要反映和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生活，还要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意识。通过文艺作品的媒介作用，使“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他也正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向人民群众提供新颖的、感染力强烈的书法作品，去增加他们的审美经验，扩大他们的审美经验，扩大他们的审美视野，从而使书法艺术成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形式之一。

当我们提到毛泽东书法人民性的时候，就不能不提到书法的实用性。

迄今为止，毛泽东传世的书法作品，据我们所见，大约有四百五十多件。计有各种题词二百多件，书信八十多件，自制诗词和手书古诗词一百四十多件，其他三十多件。其中，除了诗词书法外，都是实用书法，约占全部书作的三分之二。可见其实用书法数量之大。

看来，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性和实用性的结合，非常重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结合。他用他六十多年的书法活动和书法作品说明了这两个结合。

书法艺术的特殊之处，就是它不能离开文字。离开文字的任何线条组合，都不是书法艺术。实用与审美，实用性与艺术性，实际上是书法美学的一对范畴，一对矛盾。表达意思，是实用，传达感情也是实用，“感到好看”就有用，有用就是实用。书法艺术来源于实用。书法艺术的发展动力是实用。书法艺术的最终检验尺度还是实用。书法离开了实用价值，就象书法离开了人民性一样，就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没死亡。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就是在实用中产生，在实用中展开，在实用中提高，在实用中与历史结合，在实用中呼吸时代气息，在实用中与人民群众联络，在实用中实现艺术性与实用性的高度统一，在实用中达到书法艺术之巅峰。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艺术性，并不亚于“小小寰球”、“人生易老天难老”等诗词。而“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的实用性，也不小于“向雷锋同志学习”、“一定要根治海河”等题词。

艺术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统一，这就是毛泽东书法艺术的又一特色。这也是毛泽东比之现代任何一个书法家的都伟大和高明之处，是毛泽东以书法艺术的形式对我们这个英雄时代的杰出贡献。

一代宗匠书法大师

毛泽东，在中国现代书法中应处于什么地位，这要从书法的本质和本位说起。

中国书法的本质是什么？中国书法的本位是什么呢？

唐代书法理论大家孙过庭在《书谱》中说：“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大地之心。”又说：“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随其性欲，便以为姿”。他既阐明了书法是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更揭示了书法的本质，书法美学的哲理。

“情动形言，取会风骚”，这是中国书法的箴言。书魂就是骚魂。

中国书法的书体，经过几千年的嬗变，排列成了这样的序列：篆、隶、楷、行、草。这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创造，这也不是无序的偶合，这是中国经济运行在各个阶段的产物，是中国文字形体的发展规律。

草书，是最末的一位，但又是最高的一位。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一文中说到唐代草圣张旭的书法：“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

韩愈说的不仅是张旭的书法，而且是揭示了草书（当然包括整个书法）的本质。

由此可见：“中国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宗白华《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

中国书法艺术所传达的，正是这种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心理秩序结构与外在宇宙（包括社会）秩序结构直接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奏的伟大生命之歌。书法艺术是审美领域内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的直接统一的一种典型代表。

以上的论述，揭示了这样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中国书法的本位，就是草书。换句话说：草书在书法艺术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皇冠，狂草则是这个皇冠上的明珠。

谁攻下了草书，谁就登上了中国书法的巅峰，谁就是大师，谁就是一代宗匠！

因此，在中国书史上，只有擅长草书者，可称为“圣”，未见工于其他书体而称圣的，这不是历史的疏忽。这正是历史的严格和公允。

汉末张芝称为“草圣”。

晋代王羲之称为“书圣”。

唐代书家林立，但称上“草圣”的只有张旭一人。而与张旭齐名的，仅

狂僧怀素而已。

宋以后称一代大家的莫不以擅草而名世。

清初书家翁方纲，虽然他自己不事草书，但他提出了“世间无物非草书”的书法本位的命题。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他说：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致田家英的信，在当时书坛，乃至今天的书坛，具有多么大的震撼力量，具有多么大的书法美学意义。真是振聋发聩，灵犀一点。这封信也表明了毛泽东在书法道路上盘桓了五十年之后的主攻方向和决心，成为他攀登书法之巅的宣言书。

由此，也可以很清楚他说：毛泽东以他晚年的草书成就（1960—1966），已经登上了书法艺术的巅峰，摘取了中国书法王国里的皇冠，足堪称为一代大师，一代宗匠，一代旗手。

我们无意去贬低近百年来的几十位书法高手，但能进入草书的也仅是二、三人而已。而这二、三人的草书器局比之毛泽东来，相差甚远。或者可雁行者，谁与？

故曰：毛泽东是天下第一人，毛泽东的书法是天下第一书。信然哉！

【注】

见《书法》杂志1980年第2期

见《书法丛刊》第19辑《田家英专号》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

雄浑豪放气韵生动 ——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章法欣赏

中国书法艺术，上下三千年，中外九万里，成为亿万人代代追求、创造和欣赏的艺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甚至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这是由书法艺术的本质决定的。中国的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以文字为载体，不断地反映着和丰富着华夏民族的自然观、宇宙观和人生观，反映着人的生命的本质力量。

中国书法艺术的章法问题，历来是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模糊概念，历来是具有巨大弹性的书法创作和书法欣赏的具体问题。

毛泽东书法艺术中的章法美，既有他继承优良传统的成分，也有他自己的创新的贡献。

隋代僧人书法家智果的《心成颂》，可以说得上是在书法艺术中，提出章法问题的第一人。他说：“回展右肩，长舒左足；峻拔一角，潜虚半腹；间合间开，隔仰隔覆；回互留放，交换垂缩；繁则减除，疏当补续；分若抵背，合若对目；孤单必大，重并乃促；以侧映斜，以斜附曲。覃精一字，功归自得盈虚，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伏。”

他说的是那样的具体，又是那样的含糊。但，中心的一点，他点到了。那就是协调对比、变化统一的形式美原则。

但是，在我们赏析毛泽东书法艺术中的章法美的时候，不仅要看形式美，而且还要包含意境美、气韵美。也就是说，不能把章法问题只看作一种安排、组合、构图等纯技术性的手法，而是应该当作书法艺术的形式美、意境美、气韵美的总体把握，进而去探求书法艺术的最高审美标准——气韵神采的内涵。

为了欣赏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章法之妙，不妨从几何形式、轴线变化、黑白对比、线条质感、总体效应、署名关联等几个问题分别探讨。

多变的外在形式

与研究世上万事万物一样，我们在研究书法艺术时，也必须在空间里去找到它的位置，即它的几何形式。

毛泽东传世的书法墨迹很多，诸如：文稿、批语、信札、题字、题词、诗词等等，采用的外在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但主要的几何形式是方矩阵型和横幅手卷型。

方矩阵型

方矩阵型，多数是题字、题词。

1915年读了《明耻篇》后的批语：“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十六个字，正好写成四字一行的4X4的方矩型。十六个字占有的并非是十六个相等的方格，而是有避有让、相承相就的整体，看上去统一和谐，实则富有变化，气韵生动。

1938年为一次青年工作会议的题词：“努力前进，打日本，救中国”（图二十七）。正文三句十个字，分为三行，一句一行。各占其位，各具生态，有苍雄之风，有茂密之韵。落款“毛泽东”三字紧随第。三行之侧，撑起了整个幅面，险而益隐，令人叫绝。

1940年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成立两周年的题词：“正义战争必然要战胜侵略战争”。分作两行书写，“正”字重量如山，且向左下倾斜，看来岌岌可危。但第二行的“战胜侵略战争”的“战争”二字颀长而有力，且作右仰承接状态，顷刻化险为夷。落款“毛泽东”三字，又象坚实的巨柱倾依在第二行三分之二处。外加两行小字：“祝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之成功”，更显得这个矩阵威容赫赫，浩气长留。

1942年4月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三周年的题词“准备反攻”（图四），“准备”是繁体字，“准”字上体浓重而集中，横画以千里阵云之势，托住上体，下垂又重又粗拉下。“备”字“人”旁和角框开张，承接“准”字。“反”字积蓄力量，收缩体形，紧接“备”下。“攻”字“工”旁夸张，直撑地面，斜拉而上与“欠”相交，“欠”加重笔画捺脚，突然一挑，特别有力。“准备反攻”虽是一个单行矩阵，却是自接自应，动态感特强，确有一股积蓄力量，鼓舞斗志，准备反攻的豪气充实其间。是一幅一见不忘的感人之作。

1960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写的横幅“艰苦朴素”，“艰”与“苦”相呼，“朴”与“素”相应，四个字轻重、大小、向背、浓淡处处相补，韵味十足，犹如四位廉洁官员，朴朴而立，各司其职，令人起敬。

1949年致国立美术学院徐悲鸿院长的信（图七）。首行“悲鸿先生”，“悲鸿”二字特大。第二行“来示敬悉”。写得“来”长，“示”小，“敬悉”突出。第三行：“一张，未知可用否。”作让势。第四行：“顺颂教祺！”又大又草，与“悲鸿”相呼应，落款“毛泽东”，三个大字下署年月日。这个矩阵型，非常得体，字势承接，性情摇荡，一片生机，美感顿生。

1954年为武汉人民战胜1954年洪水的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分作六行，每行六至八字不等，在写到第三行“洪水”后，留下一个字的空白，接着书写完毕。这个方矩阵型的笔法劲健而流畅，字体瘦长而上下连带，如行云流水一样。而中间的空白，给整个矩阵带来了活力，如白日，如和风，也如旋涡的中心，是那般的自然而生动。

1949年4月29日，手书《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是一幅横式的矩阵形。“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写到了这里，矩阵已算布置就绪。但他并未满足这常规的写法。所以接着写下去：“奉和柳先生三月廿八日之作”，然后放纵用笔，写了“敬祈教正”的谦词，大笔署下“毛泽东”三字，为了更加完整，落款时间，顶行而书“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至此，矩阵完成。在矩阵中，首字“饮”，二行的“年”、“国”，四行的“肠断风物”，五行的“浅”等字突出，而落款时的风趣灵动，正与之相对应，使整个篇章熠熠生辉。

1955年6月9日，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字分为二行，每行四字。但八个字所占的空间位置是很不相同的，这不但是因为每字的笔画有繁简，而主要在作者心中的概念，以及由此概念流动出来的神韵，变为一种具体的构图（或结构），一种排列组合，一种黑白空间。此幅字首行，加长“英雄”二字所占地步。第二行加长“永垂”二字的长度，并加大重量。就形成了在一个矩阵中“短长”和“长短”的避就照应，象两棵并立的参天大树，虽然枝叶的参差长短、厚薄深浅是不同的，但从整

体上看，两树都是高伟雄壮的。

1958年9月，为视察安徽时写的一封信“校名遵嘱写了请选用。旅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写完了以后，大概觉得未尽人意，所以在首行末尾，圈去“请”字，旁添“四张”，在第二行首字“选”上加“请”字。将“旅”，用浓墨加粗，写成了“沿”字，又将“有希望的。”句号改为逗号，接添半行小字：“有大大希望的。”似又觉“大”字连用不妥，又圈一个“大”字。至此，一幅短矩阵型，在无意中构成了。“沿”字居中，浓墨粗笔，显得格外醒目。第一行末尾被圈去的“请”字，也形成了墨团，与中心对应，压稳阵脚。而第三行“气蓬勃”三字，流动飞扬，虽在空间上未显太大，但在气韵上，却是饱满之笔。第四行有意避让，神态自若。整体效应是：既稳重，又风发。不工而工，未求佳而佳，准确、生动地凝结了作者的心态、风范和豪情神韵。

1963年2月28日，为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图十五）。这矩阵型的题词，可谓是其所有矩阵型章法中最为杰出的一幅。

七个字，分作两行，天圆地方。“向”字，撇笔劲纵有节，抢势收笔，将左边的竖，写成具有外拓顿挫型的点。横折竖钩，这四笔一气呵成，峻拔右肩，粗大有力，里边的“口”随字势加上，先断后连，很有节制。“雷”字写得开张、疏朗，不用重笔。横画取右斜势，“雨”字头的左边一竖，变成了一个凌空而下的点，悬在一旁；横画和右折，变成先去后来的首尾相含的偏环形；中间一竖，以立木支千钧的力量拉下，顺势趯笔，将“雨”中的四点变成相互顾盼的两个长点；“田”字的左边竖也变成一个内倾的点，横折竖钩，既有力度又有变化，“田”中的“十”，用环形的构筑，断而复连。整个“雷”字写得虚和灵动。“锋”字的“金”旁，书写成竖立起的瘦长体，为右边的一半铺垫和让出空间，“夆”采用大度的提按环转、断连起倒的笔法，写得极为高伟开张。“同”字的左边一竖为避免重复，不再写成点，而写成一短竖，横折竖钩，写成力度有变化的右斜式框架。里边的部分，浓墨连带。然后飞笔写“志”，将“志”的“心”，写成三横点。“学”字用重笔跳动连带一笔写下，并拉一条很强劲的游客与“习”相接。“习”字的字势右斜。基本用三个半圆和两个小圆组成，稳重而活泼。整体看来，两行字中留有大片的空白，使人觉得空阔而高远。“习”与“锋”意接笔断，使人觉得稳定而坚强。看这一幅字，使人有一种仰视的感觉。上部直插蓝天，下部坚如磐石，气韵雄放，神采飞动。这个题词面世时，书界人士震动。这是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毛泽东的书法已走人大草，已在大草的艺苑里留下了耀眼的明珠。

1964年为遵义会议会址的题字：“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分为三行，每行两字，但章法不俗。1964年，毛泽东已在草书的殿堂里几进几出了。而且，他的岁数已逾古稀之年，正是“从心所欲”的时候，因此，用笔不讲法而有法，不遵章法而自成章法精到。这六个大字，两个“会”字，一大一小，中小外大；两个“义”字，一行一草，中大外小。不意呼应，自然关照，大气凛然，令人动容。

毛泽东的书法，随意由之，看不到专事安排的意象。“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自然本象和人化自然，生命的本象和生命的活力，都化为笔墨的形式，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哲理的启迪。

假如我们把毛泽东的某一幅方矩阵型的书法，采取坐标剪裁的方法，把

它们的外廓用线联接起来，我们马上得到了一个预想不到的奇妙效果：一幅平面剪影图显现出来，黑白对比强烈，意象大变，奇幻无比，这也是毛泽东书法章法的一种神秘之象。

例如：1915年的“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图一）这个方矩阵，把每个字的外廓用线连接起来，就会发现，这是十六个形状不规则的花片、叶片，以不同的方向和速度，在碧空中摇荡、飘动。

如果把“准备反攻”四个字，用同样方法连起外廓线，就会出现一个手持宝剑的古代将军，起步行走，似急务在身，要立即去完成。

“向雷锋同志学习”，用线连接后，你怎么也想象不到，竟是一幅育婴图。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妇女，欣喜地举抱着站立在她腿上的孩子。显得那么亲切动人。

这也许，不是我们研究书法章法的份内的事。但也许，它正是开拓章法美的一个方法，不然，为什么书法的章法是那么奇妙，又是那么神秘呢？为什么言语不达，而能心领神会呢？在研究毛泽东书法艺术上，应自有法眼，不因循守旧，而能有所创见。在章法问题上，应包含着结体、布白、节律、韵律和意境诸多内容，这也许是一种新的理解和方法吧。

横幅手卷型

横幅手卷型，从文字来说，多为诗词；从时间来说，多出于五十、六十年代。

1957年1月12日，致《诗刊》编辑部的信，以流畅的笔法，传达了作为诗人的思想感情，构成了一个横幅手卷型的作品，令人爽神。这卷书法章法的奇特之处，一反“上齐下不论”的程式，变成了“上下都不齐”的新法。有的字高出一一点，有的高出一撇。既反映了字无常形的规律，也反映了“章法无定式”的形式美规律。

1961年9月9日，手书《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二十八字分为七行。前三行用劲健轻捷的笔法，写到了“乱云飞渡”，每一行的结构大体是头尾字大，中间字小，但中间变化不定。这三行是远景。写到“仍从容”时，“仍”字突然从远景中跳出，走近作者，形成一个大山头。“天生一个仙人洞”，“洞”字占的空间很大，但“洞”不黑，线条较细，表明洞在眼前，而且光亮透明。“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风光”与右斜的前几行背反起来，写成左斜。这一背反带来了变幻的广阔天地，也积蓄了强大的弹性和能量，蕴藏着一种新的意境。“在险峰”三个字，突然将弹性、能量释放出来，果然在新的天地里，开辟了一种新的意境。这种意境，犹如人登上了险峰之上，饱览平时难以看到的美景。“在险”二字有些左倾，似要倒了，但接下来是个最大的字——“峰”，字势变为右倾，这样就承接了上二字，好象是峰上之峰，虽然危险，但确实有强大的山体依托，不会倾危的。

从整体上，在章法上，此卷的横幅手卷型，给人一种由远及近，由模糊到清晰，由平稳到险绝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人享受了尺幅之间的天广地阔、变化无常的哲理性的形式美、气韵美。品味之际，进一步领略到了作者的兴奋之情以及反映出来的喜气洋洋、敢登险峰的神采。

1961年10月7日，书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二十八个字，共写了七行，每行的字数不等，是4、4、4、4、5、2的排列，比较大的字有“万、墨、

莱、动、地、浩、茫、惊”等。但笔画并不厚重，书体楷行草兼有，所以空白较多，密中带疏，给人一种肃清旷远之感。

章法至此是完成了，但意犹未尽。

接下去，写了“鲁迅诗一首，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书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至此，意尽笔停。

最后的“的朋友们”四字占了两行，提笔而书，以大字结束。使此卷的高潮不在正文，而在于署款题名。这是此卷书法在章法上的创新。

这样的章法处理，给正文的肃清旷远，注入了新的因素，使正文立即活动起来，热烈起来，亲近起来，这是此卷章法艺术的神韵之妙，使人感觉到了主人的一片感情。在横幅型章法上，使人有宽大浩渺、雄飞逸超的美感享受。

1962年9月18日，给日本工人朋友们的题词，是一个横幅型，较长。

“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问的。”题词字大墨饱，行笔流畅，以行书为主，共十五行，每行的字数是4、2、4、3、3、3、3、3、3、3、3、3、3、2。但并不显得单调，因为每个字的伸缩大小、向背就让，自然天成。

在正文之后，写了几乎与正文一样的署款：“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与正文的字迹一样大，上齐天，下齐地。

整体看，这个横幅型，博大、壮观、有气势，前后一贯。它反映了作者的坚定的信心、巨大的热情和真诚的期望，浩然正气满纸，令人感动，自然地就领略了韵律之美。

这样的章法处理起码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每行二至四字的书写，使我们感到时代的快节奏；正文与署款的合写，使我们感到畅通强烈的韵律。

1963年2月5日，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图十八）。“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一百个字，共分了三十一行。

起首写了宽大高伟的“满江红”三个字，使后两行只能变轻变小。从“有几个苍蝇碰壁”直到“蚂蚁缘槐夸大国”，这是一个波浪，其中的高峰是“几声凄厉”的“几声”。从“蚍蜉撼树谈何易”到“飞鸣镝”，是第二个波浪，高峰是“撼树”和“下长安”。从“多少事，从来急”到“光阴迫”，是第三个波浪，高峰是“从来”。从“一万年太久”到末尾“全无敌”，是第四个波浪，这个波浪更大、更高、更猛、更强，其中的高峰是“翻腾”、“风雷”、“无敌”。

全卷一行字数只有两个字的，就有六处之多。而且都是波浪的高峰。因此横幅型的章法，一行字数多者，显得平稳、明亮、力弱；一行字数少者，显得跳宕、色暗、力强。

此卷，犹如临江观涛。江似横练，浪如墨舞。浪从风威，风助浪势。逐浪翻滚，高峰叠起。令人鼓舞和惊心。章法的韵律美和意境美，可以类同诗词的韵律和意境美。用苏轼的“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念奴娇·赤壁怀古》），来形容此卷书法的韵律美和意境美，不是很恰当吗？

奇妙的轴线变化

在欣赏书法时，我们的传统的办法，是从用笔、结构、章法三个基本要求上，去探微取精；是用“近取诸身、远取于物”的方法，去类比形容。这些要求和办法，成为我们研究、创作和欣赏书法的宝贵财富。现在和将来，这些要求和办法，仍然是我们研究、创作和欣赏书法的价值基点和取向。

但是，在章法的赏析中，从字里行间纵轴线的变化来着眼，也是一种方法，它更可开阔视野，增加审美的情趣。

毛泽东，以他博大的胸怀，雄放的性格，随意的笔情，书写的书法作品，往往是跌宕起伏、自然成趣的。从他的书法里，可以强烈地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他的手书宋玉的《大言赋》句：“方地为舆，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纵轴变化得就比较明显。

第一行，轴线从“方”字开始向右下，折转又向左下，至“地”字折转垂下。写到“为”字又转向左下，再回到右下。至“舆”字，稍为偏，折转直下。

第二行，轴线从“圆”字中稍带右弧度穿过，至“天”字，折转左下，至“为”字，遂折转右下，至“盖”字又折转向左下。这条轴线与第一行轴线相距较大，以曲对曲。

第三行，轴线基本上贯穿“长剑耿介”稍左斜直下。

第四行，轴线基本上以左弧度贯穿“倚天之外”。第四行轴线与第三行轴线相距较近，以直对弧。

这种轴线的变化，把字体大小所占空间位置、行距和作者书写过程的时序轨迹反映出来。这变化的轴线，本身就是一种美的构成，一种以线性构成的形式的韵律美。

手书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笔法锐利雄放，有断壁削崖之气。

此卷共十一行。前四行，四条轴线基本垂直平行，所以，不管字大字小，笔轻笔重，墨浓墨淡，势屈势缩，每行的字都是随着轴线直下。这四行虽然显得放纵、跳宕，但由于中轴线的稳定，在章法上就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或错位险绝的情况。

次四行，出现了轴线变化。第一行和第二行中轴线相近，上宽下窄。第三行和第四行的轴线远离一、二行，成为相背的弧线。这样，在这四行中出现了大块的空白，增大亮度，字势显得收缩，为下几行的大度发展准备了空间。

最后三行，果然出现了大的跳跃。“可以永年”和“曹孟德诗”，基本上是“V”字形，上开下合。这就使洒脱劲健的笔法，得到了夸张和摇摆的配合，显得神韵顿生。

此卷就因为有了卷末三行的变化，才使整卷神采射人。

手书《木兰诗》共四十一行。轴线的变化不大，基本是垂直的平行线，但，此卷后半部分也有变化。写到木兰代父从军，从“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阴（燕）山胡骑鸣啾啾”开始，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铎（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有较大的摆荡。“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装。阿（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也有较大的摆荡。

平铺直叙，轴线垂直平行。一旦有感情上的变化，轴线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轴线垂直平行，是一种清和之美，给人一种稳定感、安全感、愉悦感。轴线大变，反映了感情震荡，书法可以显现各种动态美的效应。

手书李白《梁父吟》，是在印有红丝栏的信笺纸上写出来的。一笔一画，稍有飞连。而且每行都在红丝栏内，不突格，不出天地。与手书岳飞《满江红》和手书汤显祖《牡丹亭·惊梦》是一个时间写出的，同属一个风格。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的楷书了。比起其他手迹来，这是他的阵地战。

虽然是正楷书写，但仍清新、活泼、爽利、动人。为什么呢？除了他的用笔变化多端外，主要的是两种轴线的交织效应所致。《梁父吟》的单字，字体狭长。但依据每个字结构组合部分的多寡和所占空间大小、以及笔画时序的先后，形成了每个字的扭动摇摆，一波三折。用美学术语说是“曲线美”“S”形。每字都是变化多姿。把静态的楷书，书写成动态的物象。一个个都象是玉女临风，楚楚动人。因此，每行的轴线，也因字的大小多少，而摇曳摆动。有三春杨柳的生机，有十里荷花的清艳。

这样的章法处理（尤其是楷书的章法），是高人一着的。楷书的章法，很容易“状如算子”，上下左右。四平八稳。虽笔法夺人，但是终感板结，无生气、无动感，初视尚可，久视无不疲人。

但，毛泽东的楷书，采用了字和行两种曲线摆动的方法，使字势生动，这是他的高明之处，这样的章法值得研究。

手书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此卷与手书白居易《琵琶行》是同时间的书作，都是在印有红丝栏的信笺上，突破格局，顶天立地，无边无涯，写出的行草书。这种横幅型手卷，因为是小行草书，字形的方向、向背、倾斜和扭动，比楷书幅度要大，变化要多。因此显得灵动超逸、活泼感人。中轴线的变化，因字而易，因行而易。

此卷，共十九行，真正恣荡不羁的，也就是四、五行。如“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入（落）明湖青黛光”，“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手书白居易的《琵琶行》与李白手卷的章法，大同小异。“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破裂（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等等，这些段落，因为书者随着歌辞的感情变化而有所感悟，因感悟而转化为笔墨，形成了章法的变化，给人一种不可名状，但可感知的形式美、韵律美和意境美。

手书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此卷书写，好似随着李白的诗意而摇荡，章法显得灵动。

一上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轴线就摇摆倾斜。接下来第二个四行，轴线一齐往右下角倾斜。第三个四行的轴线改变了方向向中间集中。因此这八行便发生了一种震动性的巨变。而诗的内容，也是浪漫的。如“长空（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览）日月，”

这里轴线的摇摆，出现了节奏的快慢变化，韵律的紧张和舒缓的更替，传达了一种含蓄的情怀。

手书崔与之《水调歌头》。

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竖幅。从这条竖幅上看，不论是单字结体，不论是点画笔法，也不论行气篇章，都可以看到清代书画大家郑板桥的影子。

这也是一幅轴线变化强烈的作品。

“水调歌头。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这第一行的轴线就从右上角，经过一波三折，直斜下来。

“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这一行继续了第一行的斜度，成了一个轻度弧线。

“人苦百年涂炭，鬼哭三边锋镝”，其中“人”的一撇一捺，“年”和“涂”的横画，极力向外延长，使左右两行，避就让开。

“天道久应还。手写留屯奏，炯炯寸心丹。”这一行上倾西北，下倾东南。

“对青灯，搜（搔）白首，漏声残。老来勋”，这一行反倒以不直而取直。

“业未就，妨着（却）一身闲。梅岭绿阴青子”，这一行又东北倾向西南。

“蒲问清泉白石，怪我旧盟寒。烽火平安”，上部还有空间，下部已经到边了。

“夜，归梦到家山。”这一行已无空可斜。

此卷手书，有意思的是：字的结体本身，就是“S”形，以宽、斜取势。字与字各自独立，不作连笔。行与行之间，没有定规，可大可小，可弯可直。这样就在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留下了众多的大块空白。因此产生一种零散的感觉，但，零散并非丑恶。这种零散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出入，形成了这样一种“碎石铺路”的美。这是一种个体优美、而整体不规则的美。给人一种神秘的、含蓄的形式美、韵律美，令人向往，也令人莫测。

手书《西江月·井冈山》。

这首词，以雄浑的气魄，歌颂了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的英雄业绩。

这书法，似为毛泽东 1962 年前后所写。

标题“西江月”本身就是一个西北至东南的“S”曲线，动感极强。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共分九行，行行都是一个头尾摆动的黑龙，显得特别雄壮。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共分九行，其中一行只有两个字的，如“成城”、“黄洋”、“声隆”、“军宵”，就占了四行，其跳宕、摆动的幅度之大、变化之多可以想见。在章法上给人一种大气凛然、锐不可挡的气势。

大起大落的黑白对比

在中国书法理论中，早就有“计白当黑”的说法。计白当黑，就是书法上的黑与白的辩证统一：写黑留白。书法不仅要从黑处品味，也要从白处品味。统而言之，要在黑白的辩证统一中去品味书法。这也是章法中的一个奥秘。

毛泽东的书法，总体来说，是茂密的，但并非不着力于白处的经营。他的书风豪放雄逸，就是在黑白的对比中表现出来的。

手书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这是在毛泽东的书法里不多见的一篇书作。前五句，即从“大江东去”直到“一时多少豪杰”，字势内收，行距开阔，留出大块空白，疏朗清新，追风走马，余地很大。后六句，由于字势开张，点画飞动，空白处稍小，但也比他的其他书作大得多。尤其是后三句：从“故国神游”至最后“一尊还酹江月”，字势飞动，空白骤增，使人有灵动劲超、松摇绝壁的感觉。

手书《清平乐·蒋桂战争》。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62 年前后所写。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匝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此卷写得大气凛然，强劲茂密。这个感觉是从黑白对比中得出来的。前七行，字体宽大，字接字，行挨行，但，空白之处尚可跑马。后七行，字体变长，空白加大。而这种增大，不是字小势弱，而是为了突出最后的章法的耀眼之处——“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浓墨重笔，从而使整个书作，精神倍增。

手书《采桑子·重阳》（图十七）。

这卷书法，似与《清平乐·蒋桂战争》所书时间相仿佛。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在四行中间，留出大片空白，这是茂密中的疏朗。后九行，凡是笔画重的地方，都有大片的空白。这是以白衬黑，以淡养浓的手法。在强烈的黑白对比中，以白求黑，以白生黑，突破了一般的黑白对比概念和表现手法。

手书高启《梅花》（九首之一）。

前三行比较密集。从“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一直到“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书法的感情张扬起来，因此，加大了字形和笔画的对比度，黑白对比产生了很大的落差。如果以三行为一组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三行：“月明林”和“来”、“寒”等字，字大画粗，留下的空白，只有用小字“下美人”、“依疏影”来陪衬。第二个三行：“萧萧竹”、“漠漠苔”，已占有了大部分空间，“春掩残香”、“自”等字，就只有以细笔画带出。留出上下左右的空白。最后的“几回开”三个字，写得特大，但轻重浓淡处理得很好，“几”字较为浓厚，“开”字笔画纵横连带，视若柴门。“回”字最别致，是一笔画下的三个圈，笔致有味，大圈内的空白竭力地向外扩张，显得空阔深远，里边的似连又断的两个圈，形成了一个螺旋体，在急剧地收缩，好象越走越远。这样的黑白对比强烈的章法把人带入了一个左右摇曳、上下跳动的黑白场中，不见字形，只见神采，模模糊糊，苍茫一片，给人带来一种莫可名状的欢乐和享受。

手书严遂成《三垂冈》。

这卷书法，在书法的黑白对比中，也属于别致的一种。全卷共十三行，以第一行、第九行、第十行、第十三行为骨干行，笔画粗浓以黑为主。其他文字，分成各行夹在其中，笔画较细，以白为主。这样的强烈的黑白落差的章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四座高峰和两个峡谷、一个峭壁。高峰劲险无比，峡谷河流如银，峭壁下是万丈深渊。

致于立群的信，写于1965年7月26日。信用九纸写成，每纸三至四行不等，每行三至五字。这是他晚年所作，又是私人信件，更显得老笔纵横，大起大落，犹如苍龙作雨，云涌风从。在章法上，他已到了“任意为之无不佳”的程度。在每张纸上都有大块的黑，同样也有大块的白。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是上黑下白，有的是下黑上白，有的是斜线黑，斜面白，有的是中黑边白，有的是边黑中白，等等，变化多端，耐人寻味。从总体效果来看，是上下偏黑，正文比较白。如第一页“立群同志”，起笔就聚墨注笔，在饱满中略带枯笔，有“带燥方润，将浓遂枯”之美。第九页“并祝郭老安吉，毛泽东”重如泰山之峰，豪气凛然。

手书《敕勒歌》。

此卷采用的黑白对比方法，又是另一种类型。这里字的结体以宽为主，笔法轻柔，用墨不多，各行之字相互侵让避让，使行距不明显。这一篇之内的黑白对比，就形成了既不很黑、也不很白的中间色——灰色。这样的对比，给人一种苍苍混混、迷迷茫茫的感觉。这是一种章法上的苍茫韵味的美。

丰富多彩的线条质感

如果把书法艺术当作线条艺术，那当然是失之偏颇的。但，如果说这种说法抓住了线条质感的表现，就抓住了书法，这倒是一语中的的。

毛泽东的书法，是从中国书法深厚传统中走来的，也是从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浪涛中锤炼出来的。从三十年代他的书风开始形成，到六十年代他的书法走向巅峰，铸造了他书法艺术的核心——丰富多彩的线条。

手书李白《将进酒》。

此书法，是写在四尺宣纸的十二开纸上，硬毫施墨，点画飞动，笔法劲健，但粗细差别不大。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尊空对月。”“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须（愿）长醉不愿醒。”“主人何为言少钱，直（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你（尔）同销万古愁。”线条潇洒，利落，峭健，飞宕，是一种俊美的质感。

手书李白《忆秦娥》。

书写时间与《将进酒》相仿佛，也是硬毫施墨，但笔画的连带多，跳动少。如“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线条的粗细对比平和，墨色均匀，连绵飞动。因此，此卷的线条，是一种优美的质感。

属于线条优美质感的，还有手书秦观《鹊桥仙》。是书写在红丝栏信笺上的小行草书。“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虽然笔画较重，但每个字的造型特别美，线条的轻重缓急也很合法度，给人爽快、优美的感觉。

手书林通《梅花》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墨色淡雅，行笔节奏轻快，点画飞动，连绵不断。此卷线条的质感是流畅轻健之美。

手书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篇幅很小，不足一张信笺，但点画精到，流动连绵。“郁姑（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字体颀长而姿态华美，线条富有流畅轻健之美的质感。

手书陆游《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

此卷点画连绵不断。“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漏声断，月斜窗纸。”“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几乎是字字相连，非常流畅，但线条拉出后，粗细、轻重、转折等，姿态各异，飞而不浮，畅而不滑。“铁骑无声”四个字，点画由粗变细，细如发丝，又由细变粗，一笔贯下，劲健流畅之态，跃然纸上。线条的质感之强，妙不可言。

手书李白《下江陵》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纯用铁线一笔写下，字势博大，气势磅礴，但线条却淡似轻烟，给人一种苍茫浩大之美的感受。

手书温庭筠《经五丈原》，是一篇难得的佳作。“铁马云鵬共绝尘，柳营高压”（图二十五）一笔写下，“铁”最重，施墨最多，至“柳营高压”，已是中锋涩进，线带飞白。“象床宝剑（帐）无言，从此焦（谯）周是老臣。”用墨不多，而笔锋如剑，点画如锥划沙，不由人想起唐代李邕的《出师表》的笔法来。这是一种劲健豪放的线条。用这种线条组合起来的字、编织出的章法，给人一种峻美、劲健、强放的美感。

手书王实甫《西厢记》曲词。此卷的线条，又有自己的特色。“游艺中原”、“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铁砚呵磨穿。转至得云路”、“雪窗萤火十余年。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怕你不雕虫篆刻，断简残篇。”（此处曲词与原作有很大出入，恕不一一标明。——著者）其中“难入俗人机”最有代表性，线条在流畅中见粗细、浓淡、疾徐、润枯的变化，用笔方圆结合，中侧锋并举，连中不断，线条有一种屈铁、断崖式的劲健之美。

为人们熟知的《七律·长征》（图十六）的线条，是流畅的、劲健的，又是豪放的、苍厚的。“万水千山只等闲”，线条迟重而深稳；“乌蒙磅礴走泥丸”，线条流畅而坚劲；“三军过后尽开颜”，线条粗壮而雄放。

手书刘过《沁园春》的线条，是楷书的线条。点画顾盼生情，线条柔中带刚。如“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不若孤山先探（访）梅。须晴日（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真好象古人说的“点点如桃，撇撇如刀”，横线颀长而有力，竖画劲健而摇曳，折笔有肩，挑笔有顿。这样的线条，干净，利落，沉稳，劲健。总之是一种峻拔刚健的线条美，构成此卷章法上活而不死，同而不腻，沉稳活脱，错落有致。加上署款：“南宋人刘过沁园春词一首赠辛稼轩”，这就更是一卷完整的书法作品了。

致华罗庚的信，写于1964年3月18日，这时，毛泽东的书法已险绝有余，逐步走向复归平正的老辣阶段。开首“华罗庚”三字又粗又大，占了一张纸的三分之一。“先生：诗和信已经收读”，第二笔写了两行，字体被压成细长，而墨色由饱到渴。接着又写了第三笔“壮志凌云”，又是浓墨施笔。四行下来，满篇墨色，但线条还是很讲究的。“已经收读”的渴笔带下，“壮志凌云”的一笔一顿。第二页上写了三行。第一笔一行：“可喜可贺”，第二笔一行：“肃此”，第三笔一行：“敬颂教”。都是上浓下枯。第三页上，也是三笔写下。第一笔一行：“祺”，第二笔一行：“毛泽东”，第三笔二行：“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此卷线条，是老辣之笔情，没有楞角，没有硬性的折线，也没有劲健的点画跳宕，而是笔随情走，柔中带刚，棉里裹铁。这样的线条，厚重雄放，质感强烈，大气豪情，尽于纸墨，有一种震

撼人心的力量，使人过目难忘。

手书贾岛《忆江上吴处士》句：“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图二十六）

此卷的风格，用笔和线条质感是现在见到的毛泽东书法中绝无仅有的。一共十个字，成为一篇，无署名，无年代。估计，可能是毛泽东1966年以后所书。用软毫施墨，笔笔藏锋，行笔无时不在提按之中运行，点画的顾盼照应，形完神足，长画多用战笔，各字独立，笔断意连。这样的线条，有一种悬崖铁枝的雄放之感，欣赏此卷书法，可以看出它经过了多大的巨浪拍打冲刷，经过了多么千辛万苦的磨难，才有这样的苍颜雄风。

雄浑豪放的整体气氛

书法作品的整体气氛如何，是章法中一个关键部分，是书法作品成败的至要问题。

毛泽东的书法，从形成书风，到深化升华，到步入巅峰，不论是实用性书法部分，如题字、题词、书信等，写上两个字，四个字，或一个短句，成几句短文，乃至文章草稿；也不论是观赏性书法部分，如赠诗、写诗、抄诗等，雄浑豪放是他书法整体气氛的主线。这条主线，尤其是进入到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就显得更加清楚。

1915年手书的《明耻篇》批语，虽然只有十六个字，虽然是学子阶段的书作，但已具有颜体的庄重雄厚之气。线条果敢，对比强烈。

1938年所书的“努力前进，打日本，救中国”的题词，寄托着中华民族的雄风，满载着全国人民的希望，笔挟必胜的意志。这是作者怀着一种勇敢抗敌的激情，而挥笔写下的，可谓豪气满纸。这样的书作，在当时的所有文人、学者，甚至享誉全国的书法家，是不可能写出来的。这是火热的战场上的产物，经过枪林弹雨的洗礼，是不可能在任何学府、书斋里产生的。

1945年所书的《沁园春·雪》，是以强劲的线条、独特的结体写成的书法佳作。其奔放雄健之气，贯穿始终，溢于纸背。在当时（以至于在现在）具有巨大的艺术震动力量。从而向全国宣告：在书法艺术的王国里，正有一颗巨星冉冉升起。

1952年所书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整体气氛，除了生动活泼、意气风发外，一种向上的豪强之气，充满在字里行间。

1958年所写的“十三陵水库”（图十二）五个大字粗壮有力，气势雄浑。有了这个题字，使十三陵所有的古代匾额，黯然失色，无力掌面。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在书法的金字塔上——草书的园地里耕耘，精品叠出。

1961年所写的《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以连绵不断的线条，大小相间的组合，浓枯相生的墨色，茂密错落的布白，顶天立地的行气，表达了作者宽广的胸襟，压倒一切的气概。

几乎与此同时的是所书《清平乐·蒋桂战争》和《采桑子·重阳》。

《清平乐·蒋桂战争》，此卷纵横奔放，“龙岩”二字衔天尾地，气势恢宏，“真忙”二字笔法跳宕，“一片”二字字势伟绝。

《采桑子·重阳》，此卷老笔纷披，苍劲超逸。“天难老”一波三折，

内含劲铁；“分外香”黑白相间，逸气飞扬；“廖廓”意连笔纵，骤雨旋风；“江天万里”顿挫飞动，浩气飘举；一个“霜”字，顶天立地，气吞日月。

大约是1962年所写的《忆秦娥·娄山关》，气势磅礴，苍茫雄浑。“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西风”二字起首大度潇洒，“风”字留下大片空白，使“西风”冷峻空旷；“霜晨月”笔锋淡扫，沉浸在苍苍茫茫的西风之中。“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气贯天地。“雄关漫道真如铁”，一个“铁”字，如断崖劲松，盘屈迎风。“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如苍龙出海，云涌风从，上凌日月，下掠山河。此卷书法，反映出毛泽东的盖世豪气，在天地混沌、苍苍茫茫、飘飘渺渺、迷迷离离之中，显出无比的厚重雄放之气，令人倾倒。

1964年2月4日手书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破）楼兰誓（终）不还。”横空出世，大笔纵横，豪气倾海，雄风万里。

1963年2月5日所书《满江红·和郭沫若》，站在地球之外，凌空落笔，正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何等胸怀，何等气魄，何等境界，何等笔墨！真可以飞出地球，纵横太空。

1965年7月26日致于立群的信，真是“凌云健笔意纵横”，随意挥洒，皆成佳作。

磊落大度的署款题名

研究毛泽东的书法，不能不注意他的署款题名。他的署款，别具一格，令人难忘。

大约在1937年以前，他的署款题名大小不超过正文。以后他的署款就逐渐大起来。尤其是五十年中期和后期，署款更加雄放。

1937年1月30日致徐特立的信，署名“毛泽东”三字，不大不草。

1938年12月11日致杨令德的信，署名“毛泽东”三字，既草且长，超过信纸的一半。

1954年3月12日致黄炎培的信，署名“毛泽东”三字，笔走如飞，向右倾斜，几成阶梯。

1956年12月29日致周世钊的信，署名“毛泽东”的“东”在“泽”字之右。

1956年12月5日手书《水调歌头·游泳》，署名“毛泽东”和年月日比正文既大且草。

1957年5月11日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署名“毛泽东”三字，又大又草。

1961年10月7日书赠日本访华朋友的条幅，署名“毛泽东”三字占一行。

1961年12月26日致臧克家的信，署名“毛泽东”的“泽”字又粗又大。

1963年以后写的个人信件：署款都是占一行或两三行。

这样的署款变化，明显地反映了历史的变化。毛泽东六十五岁以后，落款特别放纵，七十岁以后，落款就顶天立地。这时，他已成书法艺术自由王国里的一员主将和旗手了。

【注】

毛泽东手书古代诗词，大多是凭记忆书写的，凡与原作文字有出入者，则在讹字后加括号注明正确的字。

方框内的文字系脱文。

豪气倾海神采飞扬 ——毛泽东书法漫步

恩格斯在赞扬欧洲“文艺复兴”时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感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如果将恩格斯的这段话，拿来形容二十世纪二十至六十年代的中国，也是非常适宜的。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就是“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中国社会“需要巨人”，而且也“产生了巨人”。这个巨人，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他在“思维能力、感情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都称得上是巨人。当然，毛泽东超越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任何最伟大的巨人，因为那些巨人只是冲破欧洲中世纪黑暗的闯将，而毛泽东却是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土地上，粉碎封建殖民枷锁，推翻资本买办，赶走帝国主义，建立人民政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英雄。毛泽东有多方面卓越的、超人的才能。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而且还在东方艺术的皇冠上留下了异彩，他又是一位足可代雄的书法艺术大师。

翻开毛泽东书法作品的历史册页，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的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书法艺术世界里漫步，若游群玉之山，满目琳琅；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那“飞走流注之势，惊竦峭绝之气，滔滔闲雅之容，卓犖调宕之志”（萧衍语），不衫不履，浑然天成，将人带到一个极有魅力的意境中去，置身于一个强大的神秘的艺术意境，会感受到无比的愉快和欢乐。

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活跃了八十多年，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同时也在书法世界里游艺了六十多年，留下了大量的文稿、手记、文批、书批、书信、诗词、题词等书法作品，这是中国人民的珍贵的财富。

那么，就书法艺术而论，足可代雄的毛泽东，在攀登中国文化最纯粹、最玄妙、最有代表性的书法艺术高峰时，画下了怎样的轨迹呢？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之谜。它吸引着亿万人去作各种各样的推断和猜测。

翻遍《毛泽东选集》，也未能找到毛泽东论书法，或者说到自己学习书法的经过或经验。而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倒是有一封他关注书法的信。信是1958年10月16日写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志的。原文是：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片（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这封信很短，但却传达了重要的信息。对于研究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这一文件，直接地表明了毛泽东书法的历史分期，1958年大概是一个分界线。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几十年的陈秉忱同志回忆说：“毛主席在青年时代就打下了书法基础。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的笔迹来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谨严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毛主席仍时常阅览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等帖，一直带在身边）。那时，他的书法已显示出用笔恣肆，大气磅礴，形成以后变化万千的风格。全国解放后，更多地阅览法帖。1949年

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中间，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约有六百多种，看过的也近四百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总之，毛主席从青年到晚年，虽然一生经历着革命的狂风巨浪，但也没有放弃在书法上踏实地用功夫，由于长期的刻苦钻研，因而达到了精邃的功力素养。”

陈秉忱同志又说：“毛主席十分重视我国传统的书法遗产，并借以奠定自己的书法基础，但决不就此停步。更贵贵的，是他推陈出新，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不断演变，不断发展。毛主席早年攻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碑帖的情形和大量的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

陈秉忱（1903—1986），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人，是清末著名金石家陈介琪之曾孙，家学渊博。1937年参加革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他于文学、书法、绘画、金石等有深厚的根基。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之前，先签订的一个文件，就是由他正楷缮写的，作为正式文本。1950年毛泽东去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正式文本，也是他正楷缮写的。

《毛泽东选集》1—4卷本的封皮隶书“毛泽东选集”五字，也是他的笔迹。因为他身居伟人之侧，承办党和国家的重要事宜，书法之名，不为世人所知。在他逝世后，党和国家专为他举办了《陈秉忱书画展》。从他的地位和经历来看，他的回忆文章是具有权威性的。

根据毛泽东的那封书信和毛泽东传世的大量墨迹，参考陈秉忱的回忆，以及其他方面的零星资料，我们可以粗略地勾画出毛泽东书法活动的轨迹。

我们试将毛泽东的书法活动分为五个时期：

学子时期（1900—1919）

探索时期（1920—1937）

书风形成时期（1938—1949）

书风深化时期（1950—1960）

书法造极时期（1961—1966）

为了展现得清楚，让我们分期予以梳理。

学子时期（1900—1919）

我们假定毛泽东从七岁志学，执笔习字（也可能比这假定还早），从小就受到了中国旧文化的熏陶。1913年—1918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1917年冬创办工人夜校。1918年与蔡和森创建新民学会。同年8月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1919年7月创办《湘江评论》。在此期间，作为一个有为的青年，忧国忧民，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和道路。在书法上，仅作为一个莘莘学子，而对着这个古老艺术孜孜以求。在杨昌济老师家里，耳濡目染，看到了不少好的书法碑帖。

但这一时期所见的墨迹甚少。典型的书作有三：一是1914年（？）的退书便条；二是1915年5月书写的《明耻篇》读后批语；三是1917年冬书写

的《夜学日志》，三个年代，三份书作，字体不同，各具面貌。

《退书便条》，竖式，四行，行书：

咏昌先生：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毛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又国文教科二本，信一封。

字形狭长，内宫紧收，点画准确合度，体势清劲简直，大有《圣教序》集王字的风范，也可以认为直托清初书法大家翁方纲的字法。

《明耻篇》读后批语（图一），字形瘦长，横画细，竖画粗，以侧取势，唯趯笔较弱：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竖成行，横行列，组成了一个茂密的正方形。直接表达了毛泽东对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严正批判，反映了一个“身无分文，心怀天下”的赤子报国之心。

《夜学日志》（图二），字形扁宽，右肩上耸，捺脚波挑，是明显地受了魏碑字体的影响。值得玩味的是“首卷”二字，笔法简古，似有汉简的意趣。

从以上简要例证赏析中，不难想象到，这时期，正是毛泽东的书法起步期。

探索时期（1920—1937）

这一时期，对毛泽东来说，是人生的巨大变化期。由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力挽狂澜于既倒，担当了革命的最高领导和军队的统帅。但在其书法发展的进程上，并没有与这种人生急风暴雨的空间大跨度发展相适应，只是在探索着，寻求着，平稳地前进着。

这一时期，面世的书法作品不多。尤其在1926—1934年的九年时间里，编入《毛泽东选集》的，有十篇文章，但未见墨迹，估计可能在战争中失散了。

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书作有：

1921年6月20日《致国昌兄并转中局诸兄的信》：

国昌兄并转中局诸兄：

（一）一、二、三、四、五号通告均到，即遵第一号通告于六月十七号开大会改组，表决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选举执行委员会三人如下：

书记——毛泽东。组织部长……

似在忙中走笔，点画虽然简约，但行笔圆润，流畅潇洒，完全摆脱了魏碑的胎息。行距上宽下窄，略显扇形式样，煞是有趣。

1925年11月21日，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的墨迹，行笔自由圆转，神态自若，沉着洒脱，反映出他的开朗自信的心情和坦荡幽默的趣味。（他表示：鉴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该会“实无存在之必要”）
1933年左右，瑞金反“围剿”时鼓动红军的题词。行书，八

敌人已经向我们基本苏区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敌人……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字形上下伸展，左右倚对，点画开张，行气简洁疏朗，虽无新奇之处，倒也显得清秀。

1936年11月2日，致许德珩等教授的信：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

此信情真意切，书法随意，点画飞动。

1937年6月25日，致何香凝的信。信用红界格纸，有三纸之多。表达了对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尊重。字体颀长，其中“中华民族”、“苦斗不屈”等字，生动感人。

1937年5月7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名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行书，横式，文件草稿，实用性很强，但其随意挥洒，天趣盎然。有几页修改甚多，倒显得特别率真可爱，气韵生动。

1937年，为《国防卫生》的题词：

增进医学水平，这个刊物是有益的。

行草相间，加有标点，三行字，最后一个“的”字独占一行，显得格外夺目传神。其他字大小相间，以侧取势，行气有致。

1937年8月，为抗大二期毕业证的题词(11)。竖式，行书，五行：

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首行“勇敢、坚定、沉着”，笔力沉雄，六个字互为犄角，借势而立，险而不危，如崖托劲松。“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四行字稍带动感，错落变化，已显示出他书风的形成。这个题词的笔势很典型，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书法探索时期与风格形成时期的联结点。

书风形成时期（1938—1949）

毛泽东以他卓绝盖世的才能，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接着又取得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政权。这一时期，他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战争，经受了陕甘宁边区的极端困苦的生活，经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就是在这些狂风恶浪中，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在这些狂风恶浪中，磨练了他手中的羊毫笔，形成了他个人书法的独特面貌。

这时期，就毛泽东的书风来说，又可以细分为三个小阶段。

初段，1938—1941年

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

1938年，为陕甘宁边区《边区教师》杂志的题词(12)，共九个字：“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图三）。字形大小无大的差别，“教”字左伸右缩，“育”字反过来，右伸左缩，而“新”字却又左右平衡，接下去各个字左撑右峻，蕴藏着催人前进的鼓动力。

1938年10月，为一次青年工作会议的题词(13)。行书，三行：“努力前进，打日本，救中国”（图二十七）。字距行距都很密集，但又和而不犯。竖画略带反弓，横画上斜，给人一种力量很大的动感，表现了威武雄壮的气势。

1939年4月，为延安《新中华报》的题词(14)：“为消灭文盲而斗争”。“消灭”二字作承接状态，稳重而有弹性。“争”字的最后一笔，猛然拉下，垂而不直，涩行而进，稍带“屋漏痕”的自然风姿。其中“文”字很特别，捺脚又出现上挑的笔法，表示了对魏碑的回归。

1939年，为延安《团结》杂志的题词(15)：“团结战胜一切”。竖写，由左向右行，这是毛泽东书作中，绝无仅有的。六个字全是中锋运笔，“团”字用墨最多，左竖重打，右竖重下，在六个字中几乎占了一半的地步，使其他字成为众星捧月之势。

1940年1月25日，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两周年的题词(16)：“正义战争必然要战胜侵略战争。”竖式，三行。开首第一个“正”字，覆盖第一行字，似“龙腾玉池”。最后的“战争”二字紧结成一体，作为结束，承载着第二行字，若“凤落碧树”。相映生辉，章法清奇。“毛泽东”三个字、连成一体，占有竖行五分之四的地步，大气凛然。

1940年2月10日，为《新中华报》创刊一周年的题词(17)：“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十二个字每六字一行。其“步”字的一撇直下出锋，给人一种向上的积极感。末尾“一”字笔画较粗，承上作结，稳定坚决，正与文章相对。

1941年1月31日，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18)。横式。这是很宝贵的资料，全录如下：

岸英、岸清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清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

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捡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此信字势较其他墨迹为长，长可径寸。字距行间，被颇长的点画所遮蔽，犹如进入丛林一般，密不透风。因为是给儿子写信，行文随意，自成异趣。

1941年7月，为抗日战争四周年题词(19)。只有“团结”二字，横行。“团”字峻拔一角，字框内留在大片空白，既显现了强大的张力，含有心宽容物的气象，而“结”字，体态匀称，提按灵动。“团”主“结”副，合璧天成。

这一阶段的书法，在用笔上渐生提按，在章法上加强了对比和整体感，惟笔力稍弱。在这一段中，另见有毛泽东的著文《改造我们的学习》，是用硬笔写成。虽非书法，但总览全篇的结字，惊人的是，他一改字势左倾的旧习，突然转为字势右倾的字体，这种改变，虽不具有质的裂变性，但也说明，他对书法的追求，即便是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仍是不改初衷。

中段，1942—1944年

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

1942年4月，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三周年的题词(20)。四个大字：“准备反攻”（图四）。这四个字，纵轴基本垂直，字势拉长，点画对比强烈。“准”字上部密集，重墨浓彩，横画凌空一扫，竖画下拉逐渐加力，“备”字偏旁轻带，右部结构下开上紧，“反”字稍小，予以压缩，“攻”字又加力提按，捺脚上挑。虽然是简单的四个字，却具有重、轻、压、弹的节律变化，可以感到峻拔外露，雄健内含，给人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豪迈之气，传达了“准备反攻”的文字内容。

1942年，为拍摄《南泥湾》电影的题词(21)。有两幅，是姊妹篇。一曰“自己动手”，一曰“丰衣足食”。这两幅题词，几乎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可说是毛泽东的正书了。这个正书，与1915年写的“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明耻篇》读后批语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个是学子之志、一个是伟人之召，内容和形式都有质的变化。这八个字，是毛泽东表达了“我书我怀，我铸我魂”的居高临下的气魄。用笔简约而精练，结体以斜扶正，以缺补全，左撇右捺，力可断金，惟竖钩嫌弱。但，八个字自然天成，有朴素简洁之美。

1942年，为延安无线电材料厂的题词(22)。竖式，行书，五行：

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在毛泽东的书作中，这一题词，是很特殊的一篇。其特殊处就在于疏朗。其他的书法都是字字相接，行行相亲，茂密有余，疏朗不足。而这一篇则恰恰相反，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疏朗。行间字距，足可跑马。

1942年，为中央党校的题词(23)：“实事求是”。正书，横行。字体颇长，距离宽阔。但，和谐对称，不失为佳作。

1943年1月，为生产英雄罗章题词(24)：“以身作则”。横行，密集，竖画挺俊，点画凝结。使人有“铁枝梅花”的联想。

1943年1月，为生产英雄何维忠题词：“切实朴素，大公无私”。横行紧结，但横轴呈波动形，动势感人。这篇题词的可贵之处，在于用笔用墨。出现了干湿浓淡、轻重缓急的变化。显得老笔纵横，雄达扑人。

1944年1月9日，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信较长，恕不录）这篇书法，彻底地采用右势结体，极力夸张左部，而收紧右部，出现了左竖、左撇重笔延长的现象，有一种“大风拔树，长枪刺地”的感觉。

1944年4月29日，致解放区开明人士李鼎铭先生的信(25)。横式。内容是讨论历史的。“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字势右倾，长剑拔地，字小者如豆，字大者如钱，一片竹林，淹没了行距。

1944年11月21日，致作家茅盾的信(26)（图二十三）。横式。“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开始的“雁冰兄”三个字，字径可达二寸以上，“了”字由上一行伸到下一行。其他字，也是大小由之，极尽心胸开朗之态。

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的信(27)。横式，行书。这也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兹录如下：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的了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此信书法，字形比其他信件小得多，字形长且倾斜，给人一种万马奔腾的感觉，但也稍有挤压感。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书风渐自有成，字势右斜，笔画力度大增，简净与

雄拔，茂密与疏朗，朴素与华美，同时并存。

末段，1945—1949年

1945年11月，为冼星海逝世所写的悼词(28)：“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竖式，三行。“为”、“冼”、“海”、“致哀”数字，大于其他字，斜长字势，面带怫郁。

1945年9月，题字(29)，“诗言志”三字，竖行。“诗”字的言旁粗壮上挑，“寺”趁势成反弓形，“志”字突出“心”的跳跃，三个字的点画，成斜线状态，甚为活泼。

1945年9月，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题词(30)（图十三）：“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此幅书法，可说是他书风形成期内典型代表作之一。“庆祝抗日”四字一个比一个小，“庆”字尤大，且左边的一撇，重笔浓墨下掠，力鼎千斤。“胜利”二字，又放大直下。“利”字的竖刀，藏锋涩行，铺毫加重，凝重而富有弹性，同时与“庆”的左撇，上下呼应，使题词的第一行象强风中的擎天柱，成立大地。第三行“万岁”二字，沉稳而又勃发，与首行相对衡。第二行“中华民族解放”，夹在中间，蕴藉着无限的力量。从整个气势上，给人一种豪情满怀，扬眉吐气的直觉感。如果将其每行的曲轴线和势差相比，这就是一幅“松舞东风”的意象图画。

1945年10月，手书1936年填写的《沁园春·雪》。这首词，是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他也很爱这首词，因此，他多次书写过。比较起来，能代表他书风的，还是他1945年去重庆和平谈判时写下的好。这一篇词，连同书法，震动了山城重庆，也震动了全国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界。使他们认识了毛泽东，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中国的革命，词是非常豪爽的，气势磅礴。而书法，是用正楷书写的，雄峻超逸，豪气吞海。远远望去，北方的原野，奔驰着千军万马，铺天盖地，有席卷一切的力量，所向披靡。“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飘”字作结，是第一个山峰。“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腊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高”字是第二个山峰。“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娆”字是第三个山峰。接下去，就山峰叠起，目不暇接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突然，断崖万丈，笔走谷底，“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这时，走出低谷，再次上升。“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雕”字突出的大。“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朝”字达到最高峰，使人惊心动魄，胸襟大开。

1945年10月4日，致柳亚子的信(31)（图五）。竖式。是毛泽东书风成熟的代表作，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也是他本人书写的《沁园春·雪》断为1945年的佐证。此信全文如下：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

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

这幅书作，与《沁园春·雪》的笔法、章法完全相同，甚至连每行的纵轴线的变化也相同。所不同的是：比《雪》的笔法来得灵动清爽，笔锋墨色历历在目，不象《雪》卷书法的样子，是经过多次翻印的。说它是成熟之作，指它的骨力峻达，豪气凌空。这里对中锋和侧锋运用得非常熟练，尤其是侧笔的夸张取势，铸造了毛泽东书法的基本个性。使他的书法面貌形成，就有神采不凡的大气，区别于书史上任何名家。这样的书法用笔和结体，为他五十年代进攻大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4月，为“四·八”遇难烈士的题词(32)（图六）。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这幅书作，可以看出，在结字、用笔上，他又有突破性的进展。在用笔上，简练而富有力度，笔笔到位，沉着痛快，点画大为改观，骨力加强。挑笔一改过去的浑浊，显得格外清劲。折笔处翻笔重打，迅速趁势边走边提，啄笔来得突然，凌空一闪，既得到字法的配合，又得到布白的呼应。“为人民而死”五字，跳宕摇情，重如泰山；“虽死犹荣”四字，利落潇洒，细而不弱。“而”字的结字，出现了第一横画左高右低，第二横画左低右高的方向和力度的变化，改变了横画一味左低右高的单一写法。这幅题词，是毛泽东书法的精品。如果与十二年后他给刘胡兰烈士陵园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相比，后者的用笔虽更为纯熟，但在气韵神采上，都大逊这幅书作。

1946年5月17日，给陈昌奉的信(33)。横式。此幅书作，笔法、气势虽不算上乘，但却在市白上，加入了构图意识。上款和正文与下款形成了一个横卧的四边形与一个竖立的四边形相接，给人一种平实、安定的感觉。

1947年，所见书作不多，有几幅书作，如为徐特立同志七十寿辰的题词，给延安中学学生的题词、为中共葭县县委的题词等，有的失真，有的特色不明显。比较好的是1947年11月18日给吴创国的复信(34)：

创国同志：

十月二十五日来信读悉，甚为感慰。消灭一切敌人，你的志向很对，你对农民土地斗争所表示的热情非常之好，你的诗也写得好，我就喜欢看这样的诗。你年纪高，望保重身体！

这幅书作，字画不甚夸张，仍然保持他字距行间的紧结的习惯。在笔法上出现了意连笔不连的新格局，洋洋洒洒，如天女散花，表达了他的愉快的心情。

1948年12月11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信，也就是著名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手稿。因为，书写时主要的心思用在谋略上，对书艺似不经心。

1948年，毛泽东的代表书作，有两件，一件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题词(35)：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另一件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土改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题词(36)：

依靠贫衣，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

这两篇书作，无论从何角度说，都是精彩的。点画的洗练果敢，用笔的提按起倒，布白的疏密有致，尤其是笔法上的跳宕捩阖，大起大落，一波三折，笔断意连，体现了他功力深厚，而又天纵雄逸的神采。反映出他对未来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刚毅、自信、豪爽之情溢于点画之中。

1949年4月，手书《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图三十）。开首着力于“钟山风雨”四字的表达，接着以一泻千里之势，写“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至此一个大的停顿，接着用豪迈自信、通晓天道的哲人的超尘胸襟，写下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十四个字正与“钟山风雨”相呼应。这篇作品，用笔圆劲，章法自然。布白有纵行无横行，行中有空，各行字数无定格，随势变化，奇趣盎然。整体感是：字字相承，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气势浩荡。

1949年4月29日，手书《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横式。与上首七律书写时间相隔不久，但韵味迥然不同。如果说上首书作是豪情满怀的话，那么这一首七律书作就是文质彬彬了。前四句如远海之帆，畅叙怀旧之情。接着越说越近，促膝谈心，转而又放眼展怀，令云帆远去，潇洒之极。特别是落款，不再提行，一气呵成，有一种幽美的布白奇趣。

1949年9月，为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题词(37)（图三十一）：“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这幅书作也是一件佳品。竖轴线的垂直，和“毛泽东”三字的落款，都可体味到他严肃认真的心情。各行的首字左部偏旁，点画高扬，使得每行其他的字虽有倾斜，但不致乱阵，给人一种堂堂正正的整体感。这幅书作，用笔精到，既能看到沉著的用笔轨迹，又可看到点画照应空间关系，使人赏心悦目。

1949年9月10日，为《中国儿童》杂志创刊号的题词(38)：“好好学习”，笔法飘逸俊秀，充满着对祖国花朵的热望。此幅书作，与九年前所书“天天向上”，均属楷书，相配起来，真是无意的天作之合。当然，“好好学习”四字的意态更能代表他已经形成的书风。

1949年9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年战绩》一书的题词(39)：“人民的胜利”。横式。这是在取得了战争胜利后的喜悦的反映。“人民”二字写得就比较饱满。经过“的”字的过渡，着力写下了“胜利”二字。横轴微微上鼓，表示了心绪的平衡和激昂。

1949年9月29日，为《新华月报》创刊号的题词(40)：“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四个“爱”字，由于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各具面目，相互照应。

1949年11月29日，为“国立美术学院”的题字和给徐悲鸿院长的信（图

七)。“国立美术学院”六字，横式右行，很具特色。如果玩味第一个字，就会发现，这几个字的形式动态美，是那样一致。横画和竖画，虽有上斜和内向的趋势，由于粗细、长短等力度的变化，更加以斜线和不同方向的点，使每个字的纵横轴线变形相交，表现出动态性的曲线美，中间充满着雄逸之气。作为美术院校的校名题字是十分和谐的。

给徐悲鸿的信，可以说是空前的潇洒。从这封信的书写，再经五十年代十年的深化，使毛泽东的书法，终于走上了高峰。

悲鸿先生：

来示敬悉，写了一张，未知可用否？顺颂教祺！

文简词敬，表达了作为全党全国的最高领导人，对艺术事业的热情关怀，对艺术家的由衷的尊敬。最精彩的字是“悲鸿”、“敬悉”、“教祺”等，两字相合，上下承接。这样的书法，可说是他后来大草的滥觞。

总之，这一时期，毛泽东在百忙中，仍在书法——这个神秘而又实在的艺术之林里，大胆求索，终于初步找到了自己的园地。这一时期的后半段，出现了他书法道路上可贵的脚印——书作精品。这些精品，无论从理性的表达上，还是感情的寄托上，都足以与同时代人的优秀书作相媲美。

书风深化时期（1950—1960）

从政治上来说，这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对于毛泽东来说，刚拂去战争的烟尘，又挑起了巩固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担。这时期的毛泽东，正是六十岁上下。这个年龄，对于一般人来说，已经步入了人生旅途的晚年。而对于世界瞩目的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来说，正是他领袖人生中最可宝贵的年华，千锤百炼，经验丰富，胸纳万有，光芒四射。从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来看，也正是毛泽东的黄金时期。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他借书抒怀，纵情挥洒，建造了一座中国书史上的金字塔。

这一时期，他的书作，精品叠出，令人目不暇接。为了观望这位步上书坛金字塔高层的大师的路径，我们试把这一时期再分为三个小段。

初段，1950—1953年

1950年，所见书作至多，其中不乏佳作。

1950年2月，他在视察哈尔滨时，作了五幅题词(41)，每幅都表现了他的从容仪态。

第一幅：“学习”。竖式。浓淡相宜，点画生动。

第二幅：“学习马列主义”。竖式。特别是“马”字字头的横画，又粗又长，险而不危，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意趣出于字外。

第三幅：“奋斗”。体格宏伟，字势开张。

第四幅：“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竖式，点画呼应，气势飞动。

第五幅：“发展生产”。“发展”二字上部伸展，下部收缩，给人一种昂扬上升之感。

1950年6月14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开幕词的标题：“开幕词”。竖式。“开”字完左简右，飞笔

劲足，“幕”字的草字头异常开张，下部收紧，“词”字右伸左缩，三个字连贯下来，飞动感人。

1950年10月，手书《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与其他的毛泽东的手书诗词一样，都是有意为之，独立成篇，每篇都寄托了他的意志和感情。这是与文人柳亚子的唱和诗，心情自然是轻松愉快的。他在操笔书写这首词时，显出了一幅轻骑竞原的图画。在用笔上突出横画和左撇的力度，以其特有的楷书笔法，赋予每个字不同的形态。起首“长夜难明赤县天”犹如烟云笼罩着大地，直到“人民五亿不团圆”。待写到“一唱雄鸡天白”后，豁然开朗，轻笔驾兴，一气到底。落款“毛泽东”三个字，也显出了过去少有的行楷体势，与正文气韵，十分协调。

1951年1月15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的题词(42)：“努力学习，保卫国防”。这幅书作的特点，是竖成行，横成列，宽松疏朗。这是过去题词中没有的。

1951年4月，为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题词(43)：“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幅作品，“百花齐放”，显得有些熟后生的意趣，“推陈出新”，又回到了生后熟。这种笔法过程的时间性，同时出现在一幅作品里，是很少见的，这反映了心态的落差，表现了有意差别的美。

1952年，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题词(44)：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这是一幅十分精彩的书作。每个字求得底线水平一致，一反过去左伸右缩、底线由左向右斜去的字势，大大增强了稳定感。如果将每字的底线与两行的中轴线相交，就成了田径场上的白线方格，可以想见，每个字都变成了运动员，奔跑跳动，非常有趣。再从字的处理上，也很巧妙。两行都是行头行尾字大，而两行中间的四字，采取了不同的变化。第一行是大小大小小大，第二行是大小小小大大。使两行字势变化不定，令人驻足逸想。

1952年，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的题词(45)（图三十四）：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竖式，二行。有意思的是，虽笔法的轻重无多大对比，但却在“惕”和“国”字上出现大的白色，涨力的结果，使整个题词，成了一个有基座的铁塔，使人可以联想到人民军队的钢铁长城的形象。

1952年10月5日，致齐白石先生的信(46)。竖式。

白石先生：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这件书作十分珍贵。书作和文意一样轻松愉快，点画跳动，自由欢心。尤其是“感谢”、“谢意”等字，开张潇洒，最为醉人。

1953年所见墨迹不多，四、五件书作中，比较突出的是2月23日写给柯庆施的信和为《新华日报》的题字(47)。是在一张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的

信笺上部书写的。红线以上是一封信，红线以下是所题的“新华日报”的题字。“新华日报”四个字，除“日”字外，基本上同在一个高度上和红线上，显得十分紧凑而明快。信的内容是：“柯庆施同志：提议《新华日报》换一个报头，原报头写得大垮。”不知原报头是他何日所写。他已经很不满意了，嫌它太垮，而主动提议换写一个。当然，这一个是他满意的。这说明，毛泽东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与日俱变，不断提高。

中段，1954—1957年

1954年夏，手书《浪淘沙·北戴河》(48)。竖式。这幅书作很值得玩味。其他诗词作品，都是先写正文，后注诗词名称。这一幅却是先书词牌名。此例一开，以后年代的手迹多有仿照。“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轻松开始，无意夸张。“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稍为一停，“知向谁边？”搁笔沉思，风云入怀，另起行书写下半阙：“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显然下半阙比上半阙感慨遥深，布白紧密，笔画洒脱。这幅书作可以说是冲淡中见奇崛，平易中见变化，变化最大的一点，是草字的渗入和增加。例如：“浪、戴、河、落、燕、滔、船、都、谁、边、千、魏、挥、东、临、碣、有、遗、风”等字，都离开了行书草化了。从这个事实出发，我们可以推知，毛泽东对书法的审美逐渐开发，在1954年已经敲开草书的大门，准备登堂入室，问鼎书坛了。

1955年3月，为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的题词(49)：

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这也是一幅难得的书法精品，它以少有的疏朗布白，灵活而又稳定的结体，沉雄而又遒丽的笔法，展现了一幅这样的图画：在阳光灿烂、碧空万里的祖国的天空，编队飞行着强大的机群，我空军指战员英姿英发，豪情满怀，俯视着神州大地的山山水水，背负着亿万人民的关怀和希望，警惕着远方可能出现的敌人。在这幅书作里，“空军”、“战胜”各是两字相连，“建”、“卫”、“准”、“略”等单字，一笔贯下，既有感人的气势，又有优美的造型。这幅书作，不知毛泽东是在何种情况下和以何种心情写成的。象这样不激不厉、冲和灵动的佳作，非有神来之笔是不能写成的。假令事后再书，恐难企及。1955年3月，发表为武汉人民战胜1954年洪水的题词(50)：

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这幅书法，在毛泽东的书法历程中，应属于突变性的撼人之作，气势恢宏，神采照人。书法中运动感和质感，均有惊人的增强。出现了三字或五字，一笔书的联绵笔法，如：“五四年”、“可能发生的”等。字的结体，虽然仍保持了以斜求正的方式，但字的底线明显地发生了逆转，长枪大戟式的大撇也没有了，这样就给草书的用笔和结体铺平了道路。字形上有的夸张很长，如“庆”、“后”等字，有的压缩得弹性十足，如“贺”、“武”、“人”等字，又给人一种“长松挂剑，磐石卧虎”的意象。这幅书作和七年后毛泽东的另一名作《七律·长征》手迹可称为姊妹篇。只不过《长征》的气势更

雄放，用笔更加老辣罢了。

1955年5月12日，所书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肃反工作的方针。方针两句话似楹联，所以书作也是采用一句写完，另起行再写一句的形式，使其相对：

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
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这也是一篇佳作。潇洒联绵，茂密紧凑。远远望去，一片云烟，意蕴无穷。字字承接，上下相连，行行错让，左右不犯。可是，在走笔落墨时，是何等沉著痛快。欣赏这样的作品，可以使人从酣畅的笔墨中，领略到作者那成竹在胸，笔挟风云的豪情。

1955年8月5日，给韶山乡政府的回信(51)(图九)：“韶山乡政府各同志：给我的信收到。互助合作大有发展，极为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因是回信，考虑到收信人的水平，从效果出发，以飞动的行书为主，兼有个别草书。但，潇洒自如，大气扑人。

1956年6月，为山东烈士纪念馆题字：“革命烈士纪念馆”。用笔放纵，字势宽展，横画纤细，竖画浓重，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尤其是“纪”字“纟”的末尾与“己”的首笔，“念”字“人”字头的两笔，由飞丝相连，“人”字头下的部分由五个方向不同的点表示。从整体上给人一种既庄重雄伟、又缅怀长久的感情寄托。

1956年12月5日，手书《水调歌头·游泳》。竖式。这也是一幅名作，行草相间。开首一个“才”字，好象耸立崖头的英才，他面对着滔滔东去的长江，感到无比的诱人，纵身入水，与风浪为舞。然而他的心情，此时是较为平静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在水中仰望蓝天，使人心胸感到无比的宽阔。“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一段文字的书写，迥丽轻松，宛如游泳。写完“今日得宽余”，他好象想起了什么，上了岸。是的，他想到他的国家，他的人民，他的蓝图，是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时，他激情高扬，心底震荡，挥笔写下“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最后，满意了，过是英豪的伟业啊！书写了比正文单字大几倍的大草落款“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豪放之气，出于笔墨千里之外。

1956年12月29日，致周世钊(东园)的信(52)(图十)，是这一阶段的具有开放性的书作。现录如下：

东园兄：

信及诗收读，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顺祝平安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有人断言，毛泽东是从1958年年底才开始写草书的，论据是他于1958

年10月16日致信秘书田家英，请他代借历代草书碑帖披阅。但从这幅书作看，毛泽东的草书已经很好了，草势放纵，道美流畅，枯笔尤其精彩，云烟满纸。

字的结构，中锋行笔，已有张旭、怀素的气息。而且，一上手，就是自家面目，不承习旧路，“读”、“蒋竹如”、“南岳志”尤为动人。于落款处，也显大将倜傥之情。在“顺祝平安”之外，写了“毛泽”二字，已到纸边，无法再向外写了，因此“东”和“十二月廿九日”就往里写，别有一番情趣。

1957年1月12日，给《诗刊》杂志的回信(53)。主要说：十八首旧体诗可以发表；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书法潇洒自如，意气风发。其中特别精彩的部分是：“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其中的“未”、“载”、“几”等字最具风神。

1957年5月11日，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54)(图十一)。竖式。这幅作品是毛泽东的书法精品。精就精在：恣肆任情，内心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特点是以情纵笔。这是一幅自己过录自己的词，不可谓之不熟。但却发生了以前过录自作诗词中没有的现象：错字、掉字和重句。这是一幅1957年上半年作的词，5月份书写的，但考其笔法，却又不自觉地渗入了1955年以前的笔法。因此，可以想见毛泽东当时的心态是不平静的。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虽然是伟大领袖，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老人。怀旧之情，时游心际，再加上当年春节时，接到了老友李淑一女士的信和她在1933年怀念丈夫柳直荀的《菩萨蛮》词。毛泽东此时的心境是“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并有“有游仙一首为赠”。好一个“感慨系之”！有多少种思绪齐涌心底。虽然是时过境迁，但是，与杨开慧的刻骨铭心的情感，又怎能忘记呢？而这些事确实实地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只能以游仙寄之吧。

“我失骄杨君失柳”，开头第一句刚写了“我失”两个字，不由自主地写了个“杨”。是的，他失去的，是他夫人杨开慧。但，词的文字排列，应先写“骄”字。如果，在“杨”字上另写“骄”字，似为不恭，不如抹去“杨”字，写“骄杨”。但，心潮未平，第二个“杨”字的“日”中间一画，抖动了两次，真是写“杨”惊心了。“柳”字写完，稍微一停，镇静下来，一笔写了“杨柳轻跑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桂花酒”三个字特别大，想见忠魂们，接酒而饮，慨然致谢。“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写到这里，他好象被长袖舞空的场面陶醉了，不自觉地又写了一个“忠魂舞”，而且写得是那样的认真。打上句号后，遐思返回大地，他清醒过来，一看多写了，就抹去“忠魂舞”；再看还写掉了“娥”字，就势加上后，这才接写“忽报人间曾伏虎”，在写“泪飞”后，他把浓烈的情思和沉稳的理性压缩在一起，一笔一顿，一画一念，跌跌宕宕地写完了“顿作倾盆雨”

末段，1958—1960年

1958年5月25日，到水库工地劳动时，应水库指挥部请求，而题写“十三陵水库”五字(55)(图十二)。

这是毛泽东的即兴之作，是其书作中的大字。是一幅雄浑峻拔的佳作。“十三”两字作依势状态，“陵水”两字作承接状态，“库”字劲长，最末

一笔横画，与最初的点相呼应，最后的一竖挺而不直，力感很强。五个字字字独立，又字字关照，神采照人。

1958年7月1日，手书《七律二首·送温神》(56)。横式。毛泽东“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幅书作虽然是硬笔写成，但那夸张的字形，飞动的态势，另有一番情趣。如“读、浮、遥、笔、歌、悲、欢、尧、桥、岭、动、铁、臂、纸、烧”等字的结体，特别感人。

1958年9月，视察安徽时写的一封信。“校名遵嘱写了四张，请选用。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竖式。四行成长方形，大气凛然，宛若万山蹙动。

1958年9月，为首都民兵师题词(57)：“首都民兵师”。横式。这幅书作又是一个精品。五个字横向排开，奇伟高大，犹如百万雄兵顶天立地，大步走来，气势之大，难以言表。“首都”与“民兵师”成相反倚角，“都”与“师”两字竖画，用力拉下，象是两面大纛旗，形象生动，威风千里。

1959年10月，在一幅画上的题字(58)：“江山如此多娇”。横式。六个字都是长体结构，前四字向右，后两字向左，既相映生辉，又互相连结。象在卫星上俯视大地，会看到长城、长江、黄河、泰山以及江河湖海的水网，山岳原野的起伏，壮丽之极。

1960年4月，为海南岛海榆中线公路纪念碑的题词(59)：“加强海防，巩固海南”。竖式。这幅书作，象个大的城池，“加”、“卫”、“巩”、“南”四字，占据四角，象是耸立的堡楼，“强”、“防”、“固”、“海”四个字，组成一个菱形的四角，活跃在城堡之中，妙趣横生。

1960年10月8日，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60)(图十四)。横式。

艰苦朴素

这幅书作，意态从容，笔笔精到，可称为毛泽东所有题词中的绝品，精彩之极，无以复加。毛泽东奋斗一生，由当初的一文不名的书生，到今天全中国人民的领袖，但始终没有忘记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本色。这本色中最可珍贵的莫若“艰苦朴素”了。毛泽东的一生也是艰苦朴素的一生，为人师表，身教于前。这个题词，是对身旁的工作人员所题，其心情可想是极严肃认真的。但，秉之于笔时，又是潇洒自如的盖世风度。“艰”字开笔以侧取势，顿挫涩行，开张左旁，峻拔右部，接着打笔写“苦”，改变一般人写“苦”字时，中间横画拉长的结体方法，使中间一横，猛然缩短，就势重笔写出“口”，前两字写得相当成功，书意大增，继用中锋轻笔写“朴”，最后以较重的笔写完“素”字。四个字浓淡干湿，提按转折，恰到好处。其技巧之纯熟，可以造极。其中意连笔不连的有十来处之多，更使人玩味无穷。

总之，这一时期(1950—1960)，从实际上的书作来看，毛泽东在审美视野和审美情趣上，有质变性质的开拓和提高；在书法的具体技艺——用笔、结体、布白上，有惊人的成就。1955年到1957年，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代表作品，或神采射人，或妙趣横生，足可雄视书坛。但从1958年到1960年，书作不多，佳品传世也少。但是，这个小小的低谷，并不是踏步不前，更不是退步，而是在徘徊中积蓄力量，以便跃得更高，去摘取书法王国中的明珠。

书法造极时期（1961—1966）

这一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自然灾害，自力更生，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最后又进入了最大的政治运动。这个时期，他的书法进入了高峰期。一年一个面貌，令人惊叹。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为两个阶段予以叙述，而且要详细品味。

第一阶段，1961—1963年

按照毛泽东1958年给田家英的信所透出的信息，到1961年，他专心志于草书的研究和创作已经两年多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61年以后的作品，篇篇是珠玑。关键的一点是，当他一进入中国书法的高层——草书的世界，一下子便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草书写意性。恣性任情，随意挥洒，皆成妙品。这是毛泽东绝顶聪明的所在，也是他的书法可以雄视一代的主要原因。

1961年8月25日，致胡乔木的信(61)。横式。内容是劝慰胡乔木安心养病，“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此信书法，专事中锋，以行书为主，关心之情溢于笔外。

1961年9月8日，致董必武的信。竖式，“必武同志：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顺祝健康！”此信的精彩处，开首的“必武同志：遵嘱”这六个字为两竖行，组成一幅墨象图画，线条的摇曳，令人想象不尽。“宁夏”二字一笔写下，笔如游丝，力度不减。

1961年9月，手书《清平乐·六盘山》。竖式。这幅作品，飘洒自如，初得草书用笔。如“飞、雁、城、万、峰、风”等字，独具韵味，中锋的力度、质感都很好。在行式的组合上，也出现了大的变化。此卷，正文共有十四行，每行的字数变化如下：4、3、2、4、3、5、3、4、3、3、5、2、2、3。最多的五个字，最少的两个字，不管每行几个字，每个字所占的空间和展缩向背的方向，都不一样。其变化之多，意象之美，不可以言。“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越写字势越开张，感情好象随着大雁向南飞去。“不到长城非好汉”，感情又回到了大地。“屈指行程二万”，“屈”与“万”之间字形变小。“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突出了“红旗”和“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突出“缚”，犹如万丈长缨，左盘右绕，缚住苍龙。如果欣赏点画的跳动，立在面前不是一幅字，而是万水千山。

1961年9月9日，手书《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61)，竖式。这幅书作好象是用软毫所写，显得苍劲挺拔，风卷云舒。“暮色苍茫看劲松”，“劲松”显得瘦硬。“暮”字作篇头，写得十分得体，倾而不斜。“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妙在“乱云飞渡”四字的意象，如李清照词中所描绘的“落日熔金，暮云合璧”的图象，异常感人。但，更为精彩的是最后一句：“无限风光在险峰”，把人带入重峦叠嶂，峭壁悬崖，上摩苍穹，下临深涧的无限风光当中去。“风光”和“峰”等似得张旭草法之笔。

1961年10月7日，书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62)。竖式。书写的是鲁迅的一首七言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

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诗一首。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书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诗文、落款一气写下，行草兼有，以中锋行笔。在章法的组构上，出现了奇思异构。诗文占了七行，落款也占了七行，一半对一半。其中“毛泽东”三字占了一行。可以说这样的章法，在现代书法中是没有的，古代书法里更没有。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气魄之大。“朋友”两字一笔写下，既有妙趣，又有妙理。

1961年9月16日，手书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句赠庐山乡党委诸同志(63)。竖式。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大气磅礴，正好反映了他当时“登庐山，望长江”的胸怀。字不兼行，其中“动风色”三字最为传神。

1961年11月6日，手书高启《梅花》九首之一(64)：

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开始三行，为了保持与诗文的释注相衔接，未能放开，从第四行起，笔走龙蛇，采取大小兼之的组合方法，因势而行，自然成趣。其中“月明林下美人来”、“东风愁寂几回开”，大有怀素草法；“林”字，如高风掩树；“来”字，如渴骥奔泉；“回”字，如石破天惊。令人掩卷不忘。

1961年10月16日，手书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句。一竖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与诗的对仗相谐的是，书法也很对称，“海内”与“天涯”字体长大，“存知己”与“若比邻”字较紧结。如果裁为对联，也是佳书。

1961年10月16日，手书《沁园春·长沙》(65)，竖行横卷。这幅书作，气贯长虹，势吞日月。远远望去，满纸云烟，一片苍茫。我们无法知晓毛泽东当时的心情到底如何，但从字里行间游动着、包涵着的韵律来看，他到了自己的家乡，自然有一片怀旧之感，也许还有什么别的情感。通过这篇书法，铺天盖地，一泄为快。因此，这一手卷所含的情感，是特别的感人。欣赏这一书法，也可以知道，这位伟大的六十八岁的老人，他的精力是如此充沛，他的意气是如此的风发，他的笔力是这样的强劲，他的胸怀是这样的通畅，他的感情是那样的丰富，令人尊敬而佩服。

这卷书作以草书为主。在一百多字的《沁园春》中，有一多半字是以草书书写的。而且，凡是字眼处，用笔施墨也特别着力。

如果作些孟浪之想，在这卷草书中，尚有奇趣的结体可以探讨和欣赏。如“寒秋”，“寒”字的宝盖左侧夸张向下，右侧紧收，涵盖了“秋”字，成了落花知秋的情态。“层林”的“层”字，左边的一撇直下，“尸”字头下的“曾”和“林”字上下紧连，给人一种山峦高耸，一片翠绿的感觉。“自由”两字一笔连写下来，“自”字较小，“由”字奇大，由三条相交的弧线组成，给人一种畅通无阻的感觉。“飞”字的组合奇特，一笔左右盘绕写出，犹如群鸟竞飞。

1961年12月26日，致臧克家的信。这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这

一天正是他的华诞之日，自然是兴奋之极，谈的又是轻松的事，所以，笔下生风，龙蛇竟飞。

克家同志：

几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耐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专此奉复，敬颂
撰安！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此信书法，大有变化。看来，他对于大草已经得笔得法了，“事”、“来”、“奉”、“泽”、“年”等字的中画，向下走时，增加了方向、力度、浓淡、粗细的变化；“惠书”、“请你”、“等候”、“专此”等字，增加了笔和意的默契，有断有连，有疾速，有涩留，耐人寻味。“家”、“几”、“诗”、“发”、“时”字等，富有张旭之笔态，藏锋、重打、转折等运用自如。最可宝者，这封信的笔法无无细软处，避免了鼠尾之嫌。

1962年4月20日，手书《七律·长征》(66)(图十六)。这幅书作，是毛泽东的草书代表作，传遍了千家万户，印制在各种器物上，流走海内外。

这卷书作，似用兼毫所写。骨气洞连，豪迈超逸，遒美之至。“万水千山只等闲”，有摧枯拉朽之势。“间”字右竖钩，力可撑天。“金沙水拍云崖暖”中的“云崖”两字，如河汉星列，高伟之极。“三军过后尽开颜”最为精彩，豪迈之气，乐观之情，足退万军。尤可玩味的是“三”字，由过去左上斜，改为右下斜，成为调整整个篇章的传神之字。“过后”两字，顶天立地，鲸吞海水，感情挥发得最为得意。诗美，书法也美，可谓珠联璧合，自然天成。

1962年4月27日，手书发表《词六首》所加的按语(67)。竖式。“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书法遒美流畅。可以看出，他在书法上正在追求一种含蓄韵味，锤炼绵里裹铁的草法。此卷中，“搜集起来”、“略加修改”等处最为传神。

1962年4月20日，手书《清平乐·六盘山》。竖式。七个月以前，毛泽东为宁夏书写了这首词。过了七个月又写了一次。此卷《六盘山》，比上一卷在骨力和含蓄上都有增强。“缚住苍龙”四字，为一篇的精彩处。

1962年9月18日，给日本工人朋友的题词(68)。竖式。

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

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

其中，“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各位朋友之命”书写得俊逸沉郁。其他文字的书写，看来注入的理性之水太多，充满着对日本人民的美好关心和希望。

1963年2月5日，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69)（图十八）。竖式。

这卷书法，是毛泽东的草书代表作，流传国内外，美妙之极，令人赞叹。它笔挟风涛，神采射人；它负阴抱阳，韵高千古；它大气磅礴，变化万千；它雄浑苍润，古朴天真……，即使把形容书法美妙的词都拿来，也不够用了。

古今中外，可曾见过这样的词吗？“小小寰球”，啊！毛泽东站在多么高大的空间支点上，看到的是“小小寰球”！地球太小了。

古今中外，可曾见过这样的书法吗？轻如寒烟，重若崩云，点如苍海，画若银河。

如果我们也升上蓝天，俯视这幅书法，你不感到山舞河飞物象的朦胧吗？你不感到沧海桑田的变化之巨吗？

欣赏这卷书法，可以使你奋飞，可以使你欢乐，也可以使你沉思，可以使你清心。

作者的感情，都在他的笔下，挥洒出来了。我们从这里看到的只是神采，而无视字形了。孔子说：“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个矛盾，是个千古难题。但毛泽东在书法上予以释解了：逾矩才能从心所欲。从此以后，毛泽东的书法又进入了一新阶段。

1963年2月28日，手书“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70)。

这是在毛泽东题词书法中最精彩的代表作，也是他写意书法中最精彩的代表作。

雷锋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他震撼了社会，震撼了人民，震撼了物质生产，震撼了精神生产。伟大领袖毛泽东也为这个二十二岁的小老乡的精神所感动，挥笔书写了这个在书法史上足可流芳百代的题词。先用骨力峻迈的笔法写了“向”字，稍一停顿，写了“雷锋同志”四字，又停顿了一下，以更大的热情，从心中流出了他书写过千遍万遍的“学习”两个字，一幅杰作就完成了。古人说，不激不厉，志气平和，是衡量书法的最高标准。现在看来是不对了。对于震撼社会的力量，用书法形式美去表达，不能不是又激又厉，豪气盖世了。

1963年11月17日，为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的题词(71)。竖式。

一定要根治海河

这幅书作，用软毫写成，七个字，写了四行，分为两组。字虽然不多，但其神采足可与“小小寰球”长卷相匹。老辣之气，凝结笔端。

1963年5月26日，给张干（次仑）的信(72)。竖式，草书。分十行书写。

次仑先生左右：

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惇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敬颂早日康复。

字体随意，草法任情，用笔简捷，气韵跳宕，“次仑、书、读、感谢、怀念、收纳、幸、康复”等字，尤为风韵。

第二阶段，1964—1966年

1964年8月1日，为《解放军报》思想战线专栏的题字(73)：“思想战线”。横式，草书，成方块形。“思想”二字紧结，“战线”二字草法放纵，相映自成佳构。

1964年，为1935年遵义会议会址的题词(74)。竖式，分三行，草书。

遵义会议会址

按说这样的题词，字少，而又重复，比较难写，六个字又分三行更加困难，但他将此幅字，处理得大气老辣。“遵”字上重下轻，两个“会”字，在外边的，大一些，在中间的，收缩些。两个“义”字，以变换写法处理，最后一个“址”字，将“土”写得高长粗大，与“遵”字斜向相对，因此神韵自生。

1964年3月18日，给华罗庚的信(75)。竖式，草书。

华罗庚先生：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

敬颂

教祺！

开首一个“华”字就占了首页四行空间的四分之一。“壮志凌云”四字，一笔一结。“肃此”二字占了一行，由此可见任情发笔、意气风发的心态，不言自明。落款处的“十八日”，使人立刻想到是来自怀素的《自叙帖》，但较怀素粗老些。

1964年3月18日，给高亨的信(76)（图二十）。竖式，草书。

高亨先生：

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

敬颂

安吉！大气磅礴，任意挥洒，对精通古典文学和哲学的教授高亨，更是如此。两字、三字等连写增多。如“已收”、“极为感谢”、“典册”、“安吉”、“毛泽东”、“一九六四年”等，大有趣。1965年6月26日，给章士钊（行严）的信(77)（图二十一）。竖式，草书。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晒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此幅书法，老笔纵横，苍劲有力。开始四行，至为精彩。

1965年7月18日，给郭沫若的信(78)（图二十二）。横式，草书。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

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颂安吉！并问力群同志好。

此卷大气扑人，神采焕然，枯笔过半，犹显苍老。

1965年7月26日，给于立群的信(79)。竖式，草书。

立群同志：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你给我的信，以及你用很大精力写了一份用丈二宣纸一百五十余张关于我的那些蹩脚诗词，都已看过，十分高兴。可是我这个官僚主义者却在一年之后才写回信，实在不成样子，尚乞原谅。你的字好，又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

敬问暑安！

并祝郭老安吉！

这卷书法，率意为之，实为不工而工的佳作。尤其枯笔运用极妙，如“精力”、“诗词”、“官僚主义”、“原谅”、“增进健康”、“郭老安吉”等字，淡如云烟，苍如崖松。

1965年9月15日，为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的题词(80)（图二十八）。竖式，行书。

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此幅书法，是近几年来没有的式样，行距如此之宽，真迹不偶。

1965年10月，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题词(81)。竖式，草书。

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用草书作为题词，此为第一次。草法规范，又不落俗，自有门家。“筹”字最有情趣，拉长的笔画，给人一种运动力感。

1966年8月，为《新北大》、《中国妇女》杂志的题字：“新北大”、“中国妇女”。这两幅题字是一个时间写的。总体上还是苍劲有力，大气凛然。好象也透出一些理性的回归，以及一些沉郁之气。

毛泽东，这位卓绝的领导人，这位才华横溢、独出机杼的书法艺术大师，到1967年，他才刚七十四岁。根据他强壮的身体（他

1966年还横渡长江），旺盛的精力，超人的智慧，渊博的知识，高度的修养，按照他的书法历程，他还有一个大草的巅峰期，一个衰年变法期，在草书的基地上建造自己的大草方舟。但，这个阶段没有走下去，他过早地突然地衰老了。这是非常遗憾的。

因为，在他之前（清末以来，近百年时间）的书法家们，极少几个能够进入草书艺术的宫殿。大多是恪守“二王”家法，不敢越雷池一步，更没有探窥草书殿堂的想法，大概都缺少毛泽东的气概、胆略和才能。而独具条件的毛泽东，却在书法的道路上，驻马踟蹰了。

但是，不论如何，当历史跨进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他以七十岁的高龄，毅然决然地向中国书法王国的皇宫冲刺了，而且取得了成功。

从这几年（1961—1966）的墨迹来看，他与草书的圣人们——张旭、怀素等，已成熟人，“开篇玩古，千载共明；削简传今，万里对面。”毛泽东此时于草书，确实是得笔、得法、得意、得趣、得神了。

附说：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在毛泽东书法艺术的长廊里，游观了他六十多年的书法，暂告一个段落。但是，还有一篇最精彩、最传神的作品，我们还未来得及欣赏呢，这就是毛泽东的著名手迹：《忆秦娥·娄山关》（图十九）。

《娄山关》词，作于1935年2月，描绘了红军第二次攻占娄山关的战斗。肩负最高领导责任的毛泽东，才上任一年，能否挽狂澜于既倒，拯救红军，拯救中国共产党，拯救中国革命，毛泽东面对着这滔天巨浪，真是思绪万千。他自己也很难说清楚。这首词，无论从遣词造句，写景发意，音韵节律，色彩情感，哪方面，都是苍茫悲壮的。如果，从文学角度说，它真实地、鲜明地、准确地、生动地反映了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的生活，那末，这个作品，就是异常杰出的。这首词在毛泽东的心底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至每读到和写到这首词时，就勾起来他那历史的悲壮感。

因此，以这样感情的积累，毛泽东就在1961年至1963年的那一天写了这首词。

从书法艺术来说，这是现代中国书法史上的绝品，是毛泽东传世的精品之精。

整幅作品，苍苍茫茫，无天无地，象残阳萧瑟，如屈铁盘丝，犹危峰叠起，似巨浪击空。骨全肉莹，光彩射人。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道劲于苍茫之内。

这卷书作，标志着他草书的最高成就，表达的是一种十分模糊的感情。

“西风烈”，书法伊始，一改过去笔重字大的习惯，突然改用轻笔，以瘦硬开始。

“长空雁叫霜晨月”，“长空”二字压缩后施放出“雁叫霜晨月”，而且是一笔写完。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浓笔写出。感情的匣门，突然大开，一笔写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

这时，沾笔一顿，写出

“残阳如血。”

“毛泽东”

笔法沉著屈郁，奇拔豪迈，令人神迷心醉！

从格式上，似用三个单元写下的，每单元四行，共十二行。每行字数的排列是：

6、4、4、3；

4、5、3、3；

5、5、4、3。

可见每个单元，都是头多尾少。

字形的变化，更随机而化，和而不同，违而不犯，无处不好，满纸精彩。

【注】

《书法》杂志 1980 年第 2 期
见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
见杭州毛泽东题词展览馆
见《历史教学》1984 年 10 号
见湖南博物馆
见《红色故都——瑞金》一书

(18)(25)(26)(27)(31)(46)(52)(61)(63)(64)(72)(75)(76)(77)(78)(79)见
文物出版社版《毛泽东书信手迹选》

- 见《国际卫生》1941 年第 2 卷第 1 期
(11)见《光明日报》1961 年 1 月 13 日
(12)见《东北日报》1948 年 6 月 6 日
(13)见《解放军报》1965 年 8 月 28 日
(14)见《新中华报》1939 年 4 月 19 日
(15)见延安《团结》杂志
(16)见《新华日报》1940 年 1 月 23 日
(17)见《新中华报》周年纪念版
(19)见《新华日报》1941 年 7 月 7 日
(20)见《八路军军政杂志》1942 年第 4 卷第 1 期
(21)见《人民日报》1960 年 8 月 25 日
(22)见《中国青年报》1961 年 5 月 17 日
(23)见《青海日报》1961 年 7 月 17 日
(24)见《人民日报》1960 年 12 月 2 日
(28)见《天津日报》1949 年 10 月 30 日
(29)见《长江文艺》杂志 1962 年第 5 期
(30)见《人民日报》1965 年 8 月 29 日
(32)见《解放日报》1946 年 4 月 20 日
(33)见《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
(34)见《工人日报》1960 年 8 月 27 日
(35)(36)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8 年版
(37)见《出版工作文件汇编》1960 年第 1 辑
(38)见《中国儿童》杂志 1949 年 9 月创刊号
(39)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年战绩》一书
(40)见《新华月报》创刊号
(41)见《黑龙江日报》1967 年 2 月 28 日
(42)(45)(57)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
(43)见《天津日报》1952 年 9 月 28 日
(44)见《解放日报》1965 年 9 月 12 日
(47)见《新华日报》1953 年 2 月 23 日
(48)(61)(62)(69)见文物出版社单页
(49)见《人民日报》1955 年 3 月 29 日
(50)见《长江日报》1955 年 3 月 31 日
(51)见《韶山》一书
(53)见《诗刊》杂志 1957 年第 1 期

- (54)见《诗刊》杂志 1958 年 1 月号
- (55)见《人民画报》1960 年第 17 期
- (56)见《诗刊》杂志 1958 年 10 月号
- (58)见《人民日报》1959 年 10 月 30 日
- (59)见《解放军画报》1960 年 4 月 30 日
- (60)见《中国青年报》1961 年 8 月 2 日
- (65)见《湖南日报》1968 年 6 月 25 日。
- (66)见《解放军报》1965 年 7 月 31 日
- (67)见《人民文学》1962 年第 5 期
- (68)见《人民日报》1968 年 9 月 18 日
- (70)见《人民日报》1963 年 3 月 5 日
- (71)见《河北日报》1965 年 11 月 17 日
- (73)见《解放军报》1964 年 8 月 1 日
- (74)见《文物》杂志 1965 年第 1 期
- (80)见《人民日报》1965 年 12 月 9 日
- (81)见《西藏日报》1965 年 10 月 31 日

笔惊风雨纸生云烟 ——毛泽东手书古诗词墨迹欣赏

毛泽东的一生，不管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学子时期，还是惊涛骇浪的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巩固政权、经济建设时期，都没有离开过笔墨，都十分关注、欣赏、临摹历代书法碑帖，走出一条自己的书法之路，创造一种独具风格的字体，在书法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

他一生留下了大量的墨迹。如果说，他的文章草稿、文件批阅、读书批语、题词题字等，是实用书法的话，那末，他手书自作诗词、手书古代诗词的墨迹，就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观赏，是观赏性的书法了。

不能说实用性书法没有艺术性或较少艺术性，因为中国的三千年的书法史表明，传世最多的、历时最长的都是实用性书法。优秀的实用性书法，包含着丰富的艺术性。而观赏性书法，正是实用性书法的派生物，是实用性书法的升华，当然艺术性更集中、更典型、更强烈，因而也更具有艺术魅力。毛泽东的书法，也正是这样。

战争年代，风云突变，戎马倥偬，生活象急雨旋风一样，飘忽不走，很少有闲性逸意。“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的最过硬的原则，也是毛泽东日夜操劳的大事，那时的一切文艺形式，一切文化活动，都要服从这个原则，都要为这个目的去工作、去奋战，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与人民群众并肩战斗。

全国政权的建立，虽然是百废待兴，有艰巨的建设任务，但生活毕竟是安定得多。作为伟大领袖，日理万机，运筹帷幄，心情毕竟是轻松了些。这就给他的书法发展提供了条件。

历史造就了毛泽东，也造就了毛泽东的书法艺术。

从传世的墨迹来看，自从1950年以来，毛泽东在闲暇之际，挥毫作字，手书古代诗词。

中国文学，能够朗朗上口、并与心律一起跳动的，莫过于诗词歌赋了，毛泽东有着中国文学的深厚修养，挥毫作字时，自然就想到这些，随着笔尖，就流淌出来。

从墨迹来看，毛泽东书写这些纯观赏性的书法，有二十多年的历史，集中在他一生的后半段。这个时期，正是他书风成熟，走向巅峰的时期。所以，这些书作，艺术性是很强的，是他一生书法艺术的精品。

欣赏这些书作，我们宛如走进了一个艺术之林，浩然大气，珊瑚玉枝，劲松挂崖，远山衔月，屈铁盘丝，柳絮花朵，鲸吞海水，空中夹鼓……各种美的意象，各种美的形态，各种美的声音，诗情画意，难以尽说。让我们随着毛泽东的笔迹，踏着这颜色之王——黑白相间的书迹，尽情地欣赏吧。

六朝以前诗词

1. 手书宋玉《大言赋》句

方地为舆，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

“长剑耿介”等字如壁立千仞，“倚天之外”等字，似空阔无边。如大

漠落日，巨龙曳尾。字径方寸以上，硬毫书写。

2. 手书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淡淡，山岛耸（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五十六个字写在一张带红丝栏的十六开的信笺上，潇洒自如，尤其是后四行，更为恣情。碧海扬波，云帆点点，巨风忽来，浪涛溅飞，若隐若曜，天水一色。欣赏这幅书法，好象让你经历了一次难忘的航行。笔法跳宕，点画洒脱，以道美取优。“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八字，至为精彩。

3. 手书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死（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曹孟德诗一首。

这幅书作，是毛泽东书风深化期的作品，十分动人。字大径寸，硬笔中锋，心无一碍，挥洒至美。使人立即想起明末草书大家王铎，更想起了唐代大书法家怀素。此卷的手迹，简直直脱怀素的《自叙帖》。唐代伟大的诗人李白，曾专门写了《草书歌行》来赞扬怀素的狂草。其中有：“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形容得淋漓尽致。如将李白的诗句用来赞扬此卷书作，也是十分合适的。书作中“老骥伏枥”四个字苍劲跌宕，“可以永年。曹孟德诗”八个字组成一幅“直挂云帆寄沧海”的图画，搏风斗浪，一往无前。

4. 手书六朝佚名《木兰诗》

此书是长卷，三百多字，一气写下，可见他精力多么旺盛，书兴多么浓烈。从心挥写，一笔不苟，越写越有兴致。而且，每字都在一寸左右。看来，他在写这幅长卷之前，是有充分准备的，唐代书法大理论家张怀瓘说：“书者，先散怀抱。”就是在创作前，先要凝神静虑，沉密神采，心正气和，才能下笔随意，一贯到底。

此卷的神采，就是清新自然，气韵生动，一贯到底。近三百字的长卷，无一笔走神失韵，就此一点，足可宝藏。如果仔细玩味其中的章句，就会觉得妙趣无穷。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但（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牒（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以清新如竹的笔法，写得自然洒脱，仿佛给人一种曦辉晨露的感觉，十分可人。“当户织”、“机杼声”、“可汗大点兵”诸字，尤为生动。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

市买鞍鞞，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鞍（鞭）。

字势逐渐走入开张奔腾。每纸六行的格式为五行所替代，每字独立的形式，似岸边白杨，一字排开，飒飒招人，各有风姿。“木兰”、“替爷征”、“长鞍”等字，写得横画摇曳，用笔跳宕，点画打笔清爽，各有攸归，变化灵动。

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朝（旦）辞黄河去，暮宿青海（黑水）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阴（燕）山胡骑鸣啾啾。

这一段的书写，表现力是十分丰富的，“朝辞爷娘去”，如春风拂花；“不闻爷娘唤女声”，如绝壁摩云。随着诗意而走的感情也是明显的。“鸣溅溅”、“鸣啾啾”等字，写得水声四溅，胡马争鸣。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铎（折），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诗歌进入了代父从军的高潮，书法也相应地进入了抒情的高潮。“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各字的姿态不同，情感化入点画之中，给人一种跋山涉水，快速行军的感觉。“朔气传金铎，寒光照铁衣”，又是字字相连，笔笔飞动，给人一种北风呼啸，大漠冷烟的边塞实感。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象登上泰山的南天门后，使人猛然松了口气。步入快活三里，顿感心旷神怡。“坐明堂”、“尚书郎”等字，写得劲丽可人，潇洒有余。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装。阿（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

此时，书法又高扬起来。诗歌中反复、对仗所表达的喜悦之情，人物的活动，变成了笔墨上的轻歌曼舞一样的欢快、雀跃。尤其是当书到“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的时候，四个“我”字，四个面貌，欢欣明朗，一片生机。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见伙伴，[伙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诗歌虽然进入尾声，但是书法却又掀起了高潮。书法的意象，与所书写的文字，既同步，又不同步；既同意，又不同意。这是书法的绝妙之处。大书家的书法，内涵多有。仔细品赏，转有所悟。“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

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其中，重字不重笔，以既劲健峭拔、又流丽俊美的格调，写完最后一个“雌”字。

笔停，意未停。其神韵的光环，仍照耀着卷尾的空白处。

5. 手书六朝扶名《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此卷书迹，气势恢宏，屈铁盘丝，力在字外。天地一色，上下合一，苍茫一片，烟云化机。如果从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去看天，去看地，你的眼睛看处，心里想处，留下的有形的轨迹，就是此卷的最好释解。充沛的感情发挥和深沉的理性的控制，浑为一体，使人既有哲理的感触，又有感觉的升华。美矣哉！

前两行的书迹，盖天托地，后三行笔势，牛羊牧歌。

唐五代诗词

6. 手书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帖书迹，是毛泽东少有的楷书，看来是五十年代所书。

南朝梁武帝萧衍评王羲之的书法，借用袁昂的话：“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萧衍这评语，是对王羲之的楷书（当时叫隶书）的。看了不少王羲之的书作，楷书一个个四平八稳，状如方格里的棋子，无多大生气。其行草书，个个灵动劲俊，倒有些“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意思。

现在来品味毛泽东的这幅楷书，立刻使人想起“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这两句评语。拿它来形容或品味毛泽东的楷书，实为恰当。

毛泽东的楷书，或是行楷，在字势上都是左开张，右压缩。这样，就给人一种左龙右虎的感觉。左为龙，字势夸张，长画较多；右为虎，字势弹性大，短画较多。左开张，犹“龙跳天门”；右压缩，似“虎卧凤阙”。飞龙健虎，气量无限。

7. 手书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句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此卷，落下的时间为“九月十七日”。根据字迹判断，可能是1957年前后所书。

此为一个小幅，但字较大，两笔写成，墨色较淡，而志趣浓厚。篇中夸张了“落霞”与“秋水”，把一般人容易放纵的“孤鹜”、“齐飞”这些字画比较多的字比较长的字，相反地倒简洁到辅助的地步，这是很奇特的构思和章法。“长天一色”几个难写的字，又写得体大力足。使得“一色”成了书眼，别有一番情致，耐人寻味。

8. 手书宋之问《灵隐寺》句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一笔贯下，直到笔枯为止，写出沧海日升，浙江潮涌的壮丽景色。十个字，字字为草法，首尾相接，笔意承连，一气呵成，无做作之感，无安排之意，浑然天成，游丝细如发丝，仍力含干钩，可贵之极。

这种一笔写下的大草书作，是毛泽东书作中绝少的。

9. 手书贺知章《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此卷书法的特别处，是他对书法技巧的探求。从书迹看出，他对如下技巧有追摹：尖笔的运用；游丝体的掌握；连绵体的衔接。他是成功的，这几个方面，已经达到了非常纯熟的程度，“鬓”字、“识”字最为精微。

10. 手书王翰《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此卷笔法弹性十足，布白疏朗，连笔很少，字字独立，但字字欲跃。“卧”、“战”的点，远离本体，最具神韵，笔笔干净利落，真可谓“雄武神纵，灵姿秀出”。这大概与志气平和的心态有关。估计为其五十年代中期的书迹。

11. 手书王之涣《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首著名的唐诗，几乎要被历来的墨客写烂了。诗人们可以见景生情，书家们可以借墨抒怀。历代的书家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怀。而毛泽东的这卷手迹，却以一种百川归海，眼收万物的豪情，狂草而书。“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十个大字以惊电遗光的速度，纵逸不羁的笔力，飞墨落纸，给人一种千帆竞秀，百舸争流的飞动感觉。

12. 手书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破）楼兰誓（终）不还。

此卷是毛泽东 1964 年 9 月所书，仪态万方，老笔纵横，构造了这样一种意象：孤峰四绝，回出天外。一座座的高山，峭拔刺天，山腰里云雾缭绕，断崖上劲松搏风。

这是一幅异常精彩的佳构。笔随人意，墨随情布。一入笔就是凌空取势，蕴含着苍骨劲力，写出的“雪山”“孤城”，苍茫博大。“不斩楼兰誓不还”的“楼兰”二字，力量最大，而又最模糊，给人的神秘感最强。

13. 手书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五）

大漠风尘月（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此卷书法全用圆笔，淡墨轻扫，内藏筋骨，字体颀长，上下伸展，给人一种顶天拔地之感。“浑”字中画，垂下拖笔，抢笔收势，在其书法里不多见。“月色”二字的线条的组合，特具风味。

14．手书王昌龄《出塞》（二首之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此卷书法为淡墨行书，看似平常，却耐人寻味。功夫精深，天成质特。正象古人所赞：星剑光芒，云虹照烂；鸾鹤起舞，风行雨散。虎踞佳林，龙伸丽天。对于草书的欣赏，容易受其气韵的感染；对于楷书的品味，容易受其端庄的吸引。而对于行书，却容易被忽略。因其疏朗，容易被白色的张力所吞噬；因其清淡，容易被无形的空间所埋没。五代时杨凝式的行书《韭花帖》不为常人所理解，就是这个原因。

15．手书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之三）

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其中，“玉颜不及寒鸦色”，是这首诗的诗眼，也是这卷书迹的特殊之处。不禁使人想起了怀素的《食鱼帖》，那笔致，那情性，既得其形，也得其神。

16．手书李白《梁父吟》

这个长卷，似书于1956年后。如果从中国书法史的比较学来说，这又是毛泽东的一种创造，是可以名垂中国书法史的一种字体。它集各种楷书的成分于一体，既庄重，又活泼；既豪爽，又遒丽。笔笔落下，笔笔提起，干净爽快，在转折处，或者实转，或者暗转，变化多端。比起唐楷、它活泼些；比起瘦金体，它大度些；比起魏碑，它灵动些；比起晋楷，它开张些。最主要的是融进了时代精神和作者自己的个性。所以，它用不同的质和形显现出来。观神采，熠熠射人；观字形，奇奇惊人。这样的断语，有识之士是可以理解和赞同的。

此为长卷，竖式，写在有红丝栏的信纸上。每行八字左右，不出格。

近三百字的《梁父吟》，不掉不错，笔笔认真，功夫何其深，精力何其大，心底何其诚，逸兴何其壮。作为领袖，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崇敬之心如此虔诚，对追求书法艺术如此勤奋，怎么能不成为书法大师呢？！

此卷的字法和章法，别具一格。

长啸梁父吟，何时见阳春？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吐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凤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君不见高阳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逞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转（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

壮士当群雄。吾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明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触关阍者怒。白日不照我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猘磨牙竞人肉，骆虞不折生草茎。手接飞猱搏雕虎，侧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哈尔为徒劳。梁父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 岷当安之！

本来，李白的诗豪放不羁，用草书表现应为合适。但毛泽东却用这种独创的字体去表达，也是一种意境。

17. 手书李白《将进酒》

这卷《将进酒》草书，是毛泽东五十年代晚期的作品，是精彩的佳作。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接连写了十七个草书，六处连绵字，可见胸有成竹，笔随人愿。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又接连写了几个可连但又未连的字，如“明镜”、“白发”等。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尊空对月。”又用枯笔写了“人生得意”四字。“须尽”二字以拙味写出，与其他流美的字形相映成趣。“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用浓墨一笔写了十四字，使“复来”二字成为渴笔。

“烹羊宰牛且为乐，但（会）须日（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象是进山看景一样，前面的是走进山门，现在是拾级而上，虽处处新奇，尚未到达佳境。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已到佳境，“侧耳听”三字，犹如好风扑怀，使人一震。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须（愿）长醉不愿醒。”“长醉”二字，又似丽日行天，万物披光。

“古来圣贤皆寂寞（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姿（恣）欢乐（谑）。”这是跳动的山头，起伏的河流，尽收眼底，令人欣喜。

“主人何为言少钱，直（径）须沽酒（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你（尔）同销万古愁。”忽然，阵风袭来，强云吞日，大地变成了淡蓝色，又变成暗黄色，苍茫一片，天地不清。“与你同销万古愁”一笔带出，韵味顿增，最后连观景的人，也化进混沌之中去了。

多么美妙的意境，多么迷人的意象！

18. 手书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句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这卷手书，是毛泽东在1961年9月去庐山时，应庐山乡党委诸人的请求，挥笔书赠的。登庐山，望长江，感慨万千，自然就联想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句，写下了这卷水墨淋漓的佳作。远远望去，如山层叠嶂；近近一看，如大江曲转。“动风色”三字写得山摇地动，一片激情。

19. 手书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8 年前后所写。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是人所共知的。总揽和别裁，恐怕是他的两个重要方法。在古典诗词中，《诗经》、《楚辞》的句子，常在论文、讲话中使用。而对唐代大诗人李白，似乎更有所偏爱。从手书古代诗词墨迹来看，李白的几首长诗，他都写了。

此卷长诗，是写在有红丝栏的信笺上的，顶格而书，无天无地，无左无右，豪气纵横，行草相间，用差别不大的线条，上接下连，左突右冲，洋洋洒洒，非常壮观。此卷不象前面提到的用楷书写的《梁父吟》，而是用行草写出。情随物异，笔随情发，难免掉字。但，此种现象，在书家身上历来如此，无伤大雅。

重要的是气贯始终，风格守中，自然就会神采射人。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开篇一气写到此，字势、笔法、情感逐渐放开。“势拔”二字，力鼎万钧。

天台四万八千里（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

“欲倒东南倾”五字，如骤雨狂风，从天而降，一泻为快。“四万八千里”五字，如水影竹帘，摇曳生辉。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青（清）猿啼。脚着谢公履，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这一段，好象月夜乘舟，笛声迎风，好一派自然轻松之气，“云梯”、“半壁”诸字，写得很精彩，正如唐诗中所说：“藤悬查蹙生奇节，划然放纵惊云涛。”

千岩万壑路不定，眠（迷）花歌（倚）石忽已瞑。熊咆龙泉（吟）殷〔岩果〕，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列缺霹雳，喷然中间（丘峦崩摧）。洞天石扉，喷（訇）然中开。

这时，他书乘逸兴壮思飞，与诗里描绘的景象，融为一体了，有“千岩万壑”，“列缺霹雳”，也有云青欲雨，水淡生烟。

青冥浩渺（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云（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离别（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乘云驾雾，天上人间，思接千载，神通万里，幻觉环生，浑浑沌沌。身在何处，不可知也。笔走宇外，意守方寸。

我生承化（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时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岩（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从天上下来，回到人间，又思脱俗，随时入山。笔锋逆入平出，千折万回，最后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写得潇洒做世，使人回肠荡气，神往不已。

此卷手迹，中锋力挺，结体灵动，错让有致，危而不倾，流而不滑，纵而不狂，违而不犯，臻妙之至，无以复加。

20. 手书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此长卷的书风，又为一变，变紧结为宽松，变茂密为疏朗，变放纵为收敛，变峻拔为超逸。实为精当之作。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空（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写开始几字，尚属意连绵，但自“昨日之日”起，一字一结，意连笔不连，“乱我心者”等句，如果单独拿出，几不认为是毛泽东所书。出神入化，变化万端，令人陶醉。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览）日月。

长空秋雁，高楼酣卧，以侧锋取势，极酣畅强劲。但，联想起小谢清发，逸兴思飞，又走笔如龙，以抒情怀。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在这结尾，又回到一笔一势、一字一结的意念上去，使一个个字，意足神完，笔简韵长，“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更有一番迷人的魅力。“明朝散发弄扁舟”，流动着一种俊迈超逸的神采。

21. 手书李白《送储邕之武昌》前四句

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

竖式，三行。笔法似棉里裹铁，形象是风清月淡，飘飘欲仙。楼月照人，黄鹤远去，徘徊于万里长江之上，朦胧中显出人间城郭。仙景可想，实地难得。

22. 手书李白《登益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此卷书法，在章法处理上是很别致的。第一行字大径寸，所占空间广宽。第二行字小一半，但笔力不减，在空间上与第一行拉大距离。第三行与第二行紧靠，第三行又推开第四行，增大距离。第五、六行，笔法放纵，行距相当。这样的变化，给人一种运动感，启示着自然万物和人类生命的本质力量，就是运动，就是变化，就是变革，就是演进。在这里，意象的感情传递和形象的理性赏析，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三个“凤”字，个个不同，以及两个“凰”字，都在第一行里出现，犹如大鹏搏风，鸱鹏展翅，在有限的空间里，有五个翼大如天的大鸟在飞舞，这小小的地球，难以承受。从高空俯视，千山万壑，都成了土丸，江河湖海，都成了水珠。第二行和第三行，好象叠起的横断山脉，是那樣的拥挤，又是那樣的险要。“幽径”、“晋代衣冠成古邱”的斜体结构，也给人一种壁立千仞之感。不过，世界并不是处处如此。还有另一番天地，以流畅的笔法，散落的结体，书写了“三山半落青山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啊，令人陶醉的一片朗日绿洲！最后、以轻快的笔法，放大字体，写出了“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与第一行，遥遥相对，对称而和谐，成为一篇佳作。诗的结尾，给人留下的是愁肠未伸，而书法给人的意象，却是一种好风入怀似的明快。

23. 手书李白《下江陵》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此卷书作，似为毛泽东 1960 年前后所作。万物入怀，大气外拓，断崖千仞，飞流万丈，云烟苍茫，游丝屈金。

奇景的章法布白，可给独具法眼的人以很多启迪。书法是一种变化了的点画线条的形式美。孟浪一些，或说得时髦一些，以现代的审美意识来审视书法，可以正看，可以倒看，可以斜看，可以横看，不同的视角，可以产生不同的视角效果，带来不同的美感。数学上的排列组合，带来了数学的生机。而书法上的排列组合，则可以为书法艺术带来巨大的激情。

基于这种审美意识的审美方法，来审视这卷书作，就别有情趣。

这卷书作，分行轴线强烈摆动，以致造成视觉上的无行无序的感觉。如果将“辞”、“彩”组合在一起，似为一对狂舞的情人；“白”、“云”组合，象巨风掠空；“两”、“岸”组合，象优伶角力……千变万化，不可思议，美不胜收。

这是一种审美方法，这也必将是一种创作方法。

24. 手书李白《越中怀古》

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啼（飞）。

这卷手书，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那个时间，正是他的书风由成熟转入深化的中期阶段。成熟的书风，形成于 1938 年至 1949 年的十一、二年的时间里，代表之作，是其《沁园春·雪》和《致柳亚子先生的信》。而从 1950 年起，其书风走入深化期，逐渐改变了左伸右缩、峻拔一角的习惯，由阳气过盛，走向负阴抱阳，转折处变钝变圆，左偏旁收缩，右结构向下深

沉。基本使用中锋，使笔法方圆兼备，方圆转化，在骨力劲健处，加以柔丽圆润，外柔内刚。

此卷手书，就具有这样的风格特色。“越王勾践破吴归”，清秀劲健；“战士还家尽锦衣”，飘逸流动；“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啼”，开放大度。

25. 手书李白《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予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去），枫叶落纷纷。

这卷手书，看似平常，但仔细品味，有一种祥云初驾，飘飘天外的气势。笔法跳动潇洒。在章法、结体上，似有明人气息。“空忆”、“高咏”、“明朝”诸字，更为飘动。

26. 手书李白《忆秦娥》

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此卷书作，似为毛泽东 1960 年前后所写。他的书法，经过 1950 年至 1960 年的十年的深化期，基本的格调（如豪放雄健、灵动超逸等）未变，而具体的笔法、结字、布白等则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笔法上，先是方笔为主，后为方笔圆笔兼有，最后则以圆笔为主，而方笔辅之。在结字上变峻斜字形、左伸右缩，为平正字形、左缩右伸。在布白上变密不透风、行距大小，为疏可跑马、行距加大。

这幅书作，正是已经变化了的风格。

提起《忆秦娥》，从书法上说，就会使人立即想起毛泽东的书法名篇《忆秦娥·娄山关》。那种苍苍茫茫、豪气倾海的气势，在这卷书作中，也可以领略几分。尤其是“秦楼月，年年柳色”、“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等字，最为传神。

27. 手书崔颢《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书法讲究墨色的变化，始自明朝。书画大家董其昌，就是个能手。他的书法墨色发淡，使人一看便知笔锋的铺毫情况，非有极深厚的功底，不敢作淡墨书法。然而，这个称雄当朝的书法家，其书格调，始终平平，未脱俗家气。

此卷书迹，似为毛泽东 1960 年前后所写，是淡墨的成功之作。淡墨的书写，要求用笔迅速，下笔准确，上卷书法，除第一个字“昔”有点墨浑笔外之外，整幅字，看起来如蛟龙出水，鱼过瀑流，既生动活泼，又沉著痛快。

使用淡墨而出现游丝的牵连，更显得老辣，三个“黄鹤”，各具姿态，若飞若翔，若行若藏。“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最为得笔得

意。

28. 手书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句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皆（俱）欢颜。

这是一个短篇，共十六个字，却分为四行书写：每行字数是4、6、5、1，可见章法、字法变人之奇。“安得广厦”四字，浓墨疾书，一个“厦”字又高又大。“千万间，大庇天下”这几个字，以枯笔侧锋一字一顿，苍老结实。简单的一个“大”字，横画、撇、捺，每自施笔，沉著得使人回味无穷。“欢颜”二字，放纵飘动，以作为全篇之结。整个看去，笔画的准确灵活，章法的疏密相间，意味无穷。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1960年前后所书。

29. 手书杜甫《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层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淹（潦）倒新停浊酒杯。

此卷书迹，是瘦笔草书，有意这样写的，也许可能是一种实验性的。

总的印象，恰如碧海鸥飞，长空掠影。

中国书法是由两种颜色之王——黑白组成的。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书法是一种黑白空间的视角艺术。落墨于黑，着眼于白，计白当黑，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表现手法。黑是一种美，白也是一种美。黑和白同构于一个空间，采取不同的组合，就会产生不同的意象。白色增多，就给人一种空旷、博大、深远、迷离的内涵，使人产生各种意象。

此卷书法，以盘铁屈金的瘦笔落墨，在广阔的背景上，留下了丝丝笔迹。这时，这种细细的笔迹，象宇宙中的黑洞一样，具有一种强大的吸力，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远。而这背景上留下的大片白色，象是强烈的光，具有一种张力，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这种吸力与张力、黑去白来的视觉效果，给人一种飘渺浩荡、气吐海纳的艺术感染力，从中得到审美的愉悦。

假如说，白色太强、太大，会使黑色受挤压埋没，这时，就会使人感到白强黑弱。此卷书迹的不足处也正在这里。

30. 手书杜甫《秋兴八首》其二中的前四句和其一中的后四句夔府孤城落日斜，每倚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1957年后所书。

草书，竖式，字势开张，画笔的质感很强。

“夔府”二字开篇，犹如疾风劲草。“每倚北斗”，左曲右挑，内含峻骨。“听猿”、“八月”、“故园”等字，组合奇妙，高韵感人。

总的感觉是一幅云帆沧海，天风海涛的图画。

31. 手书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图三十五）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此卷手书，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

仔细玩味，妙在飘逸。

书法有藏锋与露锋之别，藏锋表现厚重，露锋表现飘动。此卷书法，以露锋为主，而字势中宫紧收，横、撇、捺等，稍开张，运动感、向上感、轻松感比较强，所以给人一种飘逸的印象。此卷章法有上浮之感，不够稳定。

如果深究，如“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等字，似有唐代诗人兼书法家贺知章的笔法。贺知章的书法精熟，草书尤妙。

32．手书杜甫《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此卷手书，似为毛泽东 1960 年前后所写。

1958 年 11 月以后，根据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的信而断，从 1959 年开始，他于书法中专心研究草书，当然在草书中首推的，当是唐代的草圣——张旭。张旭的大草，以传世的《古诗四帖》为代表。就笔法而论，是以中锋为体，侧笔取势，气象磅礴。

这卷手书的笔法，也正是以中锋为体，侧锋取势，豪气流天。各行比较起来，此卷书法采取了“上分下混”的章法，给人一种运动中的稳定感。这种章法的形成，除与毛泽东个人的气质、学养、胸怀等主观因素有直接关系外，与社会进入现代文明，节奏加快，生产密集，时间相对缩短，空间相对缩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审美意识和审美方法，终究是时代的产物。

因此，毛泽东开创的这样紧结密集、上分下混（或曰“有分有混”）的章法，将是书法创作的一种不可少的形式。

此卷中的“岳阳楼”、“吴楚”、“坼”、“乾坤”、“浮”等字，最为得意得法。

33．手书岑参《奉和杜相公发益州》句

朝登剑阁云随马，夜渡巴江雨洗兵。

这两句诗，是很雄壮的诗句。

书法也是云随马走，雨洗兵行的气象。天上与地上的物象，统在笔墨之中，统在点画之内，“云随”、“夜渡”、“雨洗”六字，笔致最佳。

34．手书戴叔伦《转应词》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胡前一声愁绝。

此卷手迹，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

从事书法的人，都知道，在书写中，不怕字多，只怕字重。重字，在书法创作中，会产生一个心理障碍。在字形的处理上，容易雷同。因此，一般避免书写重字过多的诗文。

但是，毛泽东的上卷手迹，专写重字。这首《转应词》共三十二字、按

单字算只有二十二个，重文却有八个。很不好写。而这一篇处理得却是独出心裁。第一行写了六个字，其实就是两个字——“边草”，“边”字拉长，“草”字变小变简。“千里万里”字势缩小，不让“万”扩大。然后，放胆写“月明”和“明月”。“明”和“月”都有“月”字，采用了一草一真的写法。所以，总的看很流畅和谐。

35. 手书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此卷手书，似为毛泽东 1960 年以后所写。

唐人形容怀素的草书，有诗云：“寒猿饮水撼古藤，壮士拔山伸劲铁”，“临江不羨飞帆势，下笔长为骤雨声”。用这些形象的比喻，来形容毛泽东的草书，实不为过。

此卷书迹，正是如此。“回乐峰前沙似雪”，一个“峰”字，写尽拔地而起、重峦叠嶂、峭壁断崖、横空出世的形势。真是一个奇特的结构，不知他在当时以何种心情挥笔写下的。“受降城下”四字，写尽月色朦胧，灯光闪烁，旌旗暗卷，冷气天降的形势。“不知何处吹芦管”中的“吹”字也是一个妙构，只见一个人鼓腮而吹，身随声动，声含伤感，幽鸣传远，征人延脰的意境。“一夜征人尽望乡”，这是诗眼，也是书眼。“一夜征人”四字不激不厉，与首行的“回乐峰”三字相对成趣。

此卷确是毛泽东书法中的精品，可以说是字字珠玑，行行生辉。

36. 手书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访宿》前四句

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

二十个字，写得开张四射，直可比作大树临风，劲枝摇曳。不过，虽是一片动态，可贵的是动中有静，动静相生。“静夜四无邻”，诗静书不静，景静情不静。“荒居旧业贫”中的“贫”字就十分文静，“雨中黄叶树”是动，“灯下白头人”是静。这时，诗文和书法又谐和了。

37. 手书李涉《宿武关》

远别秦城万里游，乱云高下入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

这是一幅淡墨书卷。

此卷书迹，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气象不凡，有关山万里、云烟千秋的感觉。“万里游”三字的构造，如伟船巨帆，“万里”字细瘦，“游”字体宽，且成三点支撑。“乱云高下”，如云卷山麓，晦暝不开。“一夜潺湲”，象百丈瀑布，声闻十里。“关门不锁”四字，如山头林立，似惊雷滚山。各有所象，妙趣横生。

38. 手书韩愈《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

荆山已去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新破蔡州回。

此卷书迹，似为毛泽东 1954 年前后所写。

此卷写得格外清新。大气磅礴、雄健超逸，是指毛泽东的整个书风而言，指他的书法本质表象而言，并不是每幅书作，都是如此。在毛泽东传世的几百件书迹中，不乏清新爽朗、秀丽俊俏的作品，这幅书作就是一件这样的作品，可用“三秋月照丹凤楼，二月花开上林树”来比喻。“荆山已去华山来”中的“荆”字写得很壮观，尤其右边竖刀，写得力鼎千斤。而其他的字，就如柳枝新月了。“相公新破蔡州回”，具有唐宋人气息，平稳道丽。末尾一字“回”，未提到行头去写，而是放在“蔡”旁并列，也是一种有视觉兴味的处理。

39. 手书白居易《琵琶行》

此幅长卷，是毛泽东传世的最长的一幅了，点画认真，随心而动，诗与书结合在一起，书法随着诗意的起伏而起伏。六百字，是个不小的篇幅，他都沉心静气地写了出来，而笔随情动，传达了诗人的感情和书家的感情。

让我们随着这幅长卷，且走且看吧。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此卷是写在大十六开的红丝栏的信纸上的。一开始就顶天立地写了第一行。“一字为一篇之规”，至关重要，“浔”字草法起头，这第一个字已为全篇定了调子：草书。

“主人下马客在船，有（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书法的感情，开始进入诗文的感情。其中“酒”字的三点水与“西”，相距甚远，似有疾走回望之态。

“忽闻水上弦歌（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发”字写得如美女插花，动态感人。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这时的书法如月色朦胧，琵琶声碎。

“移舟（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里的书情传达得很好，“添酒回灯”写出了欣喜之态，“灯”字的跳宕，似乎见到了明灯一盏。而“千呼万唤”四字又写得暗淡无光，不肯出来，本身收缩得很小。“犹抱琵琶半遮面”，写得“琵琶”有遮羞之势。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著者补注：不知什么原因，此处掉了四十二字〕

“轻拢漫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这一段在书法形象上，竖行的轴线摇动，笔画较前跳宕。“小”字的中间一画，奇粗，两点如山，隔河相望。“霓裳”二字，上下相称，举步欲舞。“绝”字如壁削山开，裂然有声。上窄下宽的结构，一是显得下部的稳定，一是显得上部的活泼。仔细分析这时的字，并不是颀长了，而是展宽了，这样就增加了字的弹性，减少了上下的拉力。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是千古妙句。不仅音乐如此，书画也同样如此。“无笔画处皆成妙境”，书法的黑白对比强烈，无白也无黑，一味的墨，也没有美。“此时无声胜有声”七字，着墨不过，笔法轻轻跳过，“声”字写得悠扬飞动，似传递着那“幽愁暗恨”。

“银瓶破裂（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书法清脆有声，“银瓶”似触地而破，碎片四飞。“铁骑”似旌旗招摇，大地震动。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拨当”二字写得特别奔放，“裂帛”二字又写得瘦长，离心力与向心力在变形中，显得格外紧张。

“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这几句写得沉稳消静，一笔一画，不连不带，进入了曲终夜静，琴弦驻声，江月拭泪，波浪不惊的暂时的感情低潮之中。“江”字的三点水重若崩云，调整了这时沉稳的笔画。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装成每被秋娘妒。”这段书法稍活跃。“虾蟆”是不常用的字，而二字相连，似在同行。“名属教坊第一部”七字，曲线调动，顿生异想。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这一段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笔法，“缠头”、“一曲红绡”、“欢笑”、“春风”等字，纵横摇曳，好象天风乍起，已觉波浪。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日（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装泪红阑干。

这段就书法而言，是个小高潮。笔法大张，情怀驰骋。“弟走从军阿姨死”，似有无限同情。“暮去朝来颜色故”的“颜色故”达到一个高峰，崩云卷浪，似有无限不平。而“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装泪红阑干”又将书法的情绪，转入一个低谷。字画清秀，自可忆昔。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经过中间一个小低谷，书法情绪回升了一个新高度，琵琶之声已使诗人惊奇不已，自说身世更令诗人同情。这种诗中感情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书家的心理。

中国书法的载体是中国的汉字，而这汉字不是随意地抽样拼凑，而是非常讲究的文章和诗词歌赋。这种书法的载体——它是音、形、义的统一体，不能不满载着人的情感。正因为有了情感，才有审美意识，才有美感，才去探求美、表达美。说书法不受文字字形和文字字义的制约和负载，纯以线条的变化，来说明书法的属性，可能只是一种臆语吧。

基于此，我们才能看到书者的感情，在很大成分上是因为文字而生发的。此卷手书，也正是如此。

虽然，这卷手书，是以一种小夜曲的形式，给人慢慢述说和传递一种古老的感情。但，从点画的组合和跳宕中，总能感觉到笔中之情。

诗歌是感人的。书家可以斟酌这种感情，但书家不一定有那样的感情。所以，毛泽东手书的古代诗词，以他卓越的才识，去理解诗中之情之意，那是简单的。但，那种感情，并非一定引起他的共鸣。他的书法包涵着诗言情意，但更蕴藏着和生发着他的美感，以及对这种美感表达的特殊方法。

此卷书法，写到此，书意大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墨从天降，犹如大风横树。

自（我）从去年离京城（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盆（湓）城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啁（嘲）晰难为听。

这一段书法情绪，又陷入了沉思，随着诗人的思绪，来遣笔落墨。“谪居病卧”、“无音乐”、“黄芦苦竹”、“杜鹃啼血”、“春江花朝”、“夜猿哀鸣”等字，也都写得平中见奇，自有风姿。

今夜间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渐（暂）明。不（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咸（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更（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此段的写意情绪的发挥在前四句，“琵琶语”、“耳渐明”、“翻作琵琶行”，字势俊洒，随笔赋形，也可能是一种理性的关照。最后时刻，书意把人又带入了一个小低谷，让人去盘回品味。

40．手书白居易《寄殷协律》（图三十三）

五岁优游同过日，一朝消散似浮云。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几度听鸡歌白日，亦曾骑马咏红裙。吴娘暮雨萧萧曲，自别苏州更不闻。

此卷手迹，似为毛泽东 1955 年以前所写。跌宕性情，柳暗花明。章法气韵均佳。“五岁优游”，首字有力有韵，“抛”字动感特别，似急旋掷球，力在形外。后三行，露锋较多，显得飘游浮动。

41．手书刘禹锡《始闻秋风》

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独（却）回。五夜飕飕枕前觉，百（一）年形状镜中来。马思边草拳毛动，鸱盼青云倦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独登（上高）台。

此卷手书，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所写。

总的印象：宽袍大袖，行劲坐稳。

书悟渐深，信意运笔，不觉其精微，方是精微处。此卷书写平稳中见奇崛，游动中见沉雄。“今听玄蝉我独回”，“马思边草拳毛动”，“为君扶病独登台”，最能体味不觉精微而精微的神态。

42．手书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二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惭（暂）凭杯酒长精神。

此卷书迹，似为毛泽东 1951 年前后所写，看了这卷书法，似将人带进了巴楚（今四川、湖南一带）山水，只见丛林高低，不见山头大小；又见一片

阴凉，光影摇曳。前两行，笔毫披山，力透纸背。后几行，笔锋掠水，上下翻飞。明代书法家董其昌说：“古人神气淋漓翰墨间，妙处在随意所如，自成体势。故为作者，字如算子，便不是书。”此卷，“妙处在随意所如，自成体势”。

43. 手书刘禹锡《玄都观桃花》

紫树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此卷手书，似为毛泽东 1955 年以后所写。

字势横竖相长，行间带草，遒劲俊美。宋代书家姜夔说：“迟以取妍，速以取劲，先必能速，然后为迟。若素不能速而专事迟，则无神气；若专事速，又多失势。”（《续书谱·迟速》）此卷，既有神采，又得布势，原因很多，其中能迟速相合，至为重要。

44. 手书刘禹锡《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尽（半）是苔，桃花开（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此卷手书，似为毛泽东 1955 年以后所写。

他对书法的研究很深，对笔法掌握得很熟，粗如华山，细如兰草，飘如彩练，涩如枯藤，急如旋风，迟似抽丝。此卷是他的一个新的追求，新的表现方法。四行行草书，就象“桃花开尽菜花开”，一片花海，满纸生香。

45. 手书刘禹锡《听旧宫人穆氏唱歌》

曹随织女渡天河，学（记）得云间第一歌。莫（休）唱开（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

此卷手书，似为毛泽东 1960 年前后所写。

看此卷草书，足见他对怀素草书的领悟和掌握之深。神韵既得，外加己意。笔势、笔意酷似《自叙帖》。怀素是酒肉不拒的和尚，放荡不羁，酒酣而书，满纸龙蛇，以“狂僧”名世，为我国书法史上的奇人奇书，他的书法，以“狂”取神，为历来书家所崇敬。自唐以后的写意书家，没有不学他的，但真正掌握其神韵的，仅一、二人而已。自清以降，三、四百年间，尚未敢于攻书狂草者。当代大家沈尹默、郭沫若、沙孟海、林散之等，均不入“狂”。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气吞日月的毛泽东的身上。多少年来，他向往、他追求，终于在 1960 年以后，进入了“狂草”的宫殿，留下了精品佳作，足可与怀素比肩。

46. 手书刘禹锡《和令狐相公别牡丹》

平章宅里一栏花，临到开时不在家。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

此卷书作，似为毛泽东 1960 年前后所写。

共四行，第一行起笔稍有所束，后三行无拘无束，骏马入阵，驰骋扬鬃。尤其后两行，字字奔腾，“门外即天涯”，真是神骥千里，已往返天涯了。

47. 手书贾岛《忆江上吴处士》句（图二十六）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64 年以后所写。

十字行草，老辣苍劲。他的书法，经过 1950 年至 1960 年的深化升华期，更为成熟了。清代隶书大家尹秉绶说得好：“诗到老年唯有辣，书如佳酒不宜甜。”毛泽东到 1961 年以后，又是于草书几进几出，更为升华了，苍老雄健，真气内充。达到了“凌云健笔任纵横”的自由王国。

看这十个字，无论是横、竖、撇、捺，还是连带转折，都是一波三折，疾笔涩行。正可谓“天机泼出一池水，点滴皆成屋漏痕”。

这短短的十个字，是他行书的精品，可以为他的行书作总结了。

48. 手书崔护《题都城南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8 年前后所写。

首二行，以圆笔写出，屈铁弯金，意连笔不连，自成异状。后二行以侧锋写出，峭壁削崖，骨峻风生，雄气内含。

49. 手书杜牧《过华清宫》

长安回望绣成堆，宫殿（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3 年前后所写。

杜牧的这首诗，是个讽刺诗。为了妃子能吃上新鲜的荔枝，皇帝不惜舍尽人力，从万里之遥，飞马传递。象这样的诗句，配以轻笔淡墨，最为适宜。这卷书法，也正是采用了这种表现方法。

四行行草，可用“一骑红尘”来比喻。这“一骑红尘”，穿过如花的长安大街，进入道道宫门。风掣雷电，十万火急。

50. 手书杜牧《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此卷手书，似为毛泽东 1958 年前后所写。

草书四行。“雨纷纷”、“欲断魂”、“何处有”、“杏花村”等字形，好象是阳春三月，风雨迷漫，山影恍惚，溪桥如断，桃花飘落，炊烟已散。这种迷茫的意象，跃然纸上。

看来，写什么内容的诗文，用什么样的笔法，这应是书法家的基本修养。如果，用非常飞动活泼的笔法，来书写这种苍凉味道的诗词，在感情的统一和发挥上，必然陷人悖逆之道，使创作者与欣赏者发生隔膜。

51. 手书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8 年以后所写。

诗和书法给人的意境，都是个迷人的月夜。“二十四桥”四字犹如座座桥梁，“明月夜”三个字很明亮。运笔爽逸，一笔写下，侧锋为之，如断崖横空。而“玉人何处教吹箫”，箫声已断，玉人何在？在迷蒙之中，只看到了躲在暗处的秋山，和那来自远方的秋水。“江南”二字用枯笔，可以想见秋尽草凋的情景。

52．手书杜牧《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8 年以后所写。

从书迹来看，1958 年以后，他进入草书世界，忽儿用硬毫。忽儿用软毫，在硬纸（如信笺等）上多使用硬毫；在宣纸上，多使用软毫；硬毫以连骨力，软毫以取苍老。

此卷书法（连同上一卷），使用的是软毫，但还不是长毫。既藏骨力，又含苍老。

印象是：江水荡漾，白帆片片；岸立千尺，长虹如线。

53．手书杜牧《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8 年以后所写。

看这幅书法，给人一种桃花流水，飘飘泊泊的意象。“烟笼”二字，似有笼罩天地的气势。接下来便是溪桥人家，近水而居，淡月传声，田园牧歌。但，整体又是春水东流，不激不厉，那山影、那月色、那桃花，都逐波而动。

此卷书法的柔情蜜意，是别具一格的。

54．手书杜牧《赠别》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以前所写。

行书四行，如树引强风，花受甘霖。“娉袅”二字跨度很宽，表现了强大的弹性力量。“豆蔻梢头”长度很长，表现了拉力与张力的对峙，“春风十里”、“卷上珠帘”等字，显得柔媚可掬。

55．手书杜牧《遣怀》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8 年前后所写。

草书五行。与诗文的轻盈相适应，书法也是轻舟过山的姿态，“江湖载酒”四字，写得大气凛然，象一阵巨风而过。到了“十年一觉”，犹如大风过后，忽见好月，给人一种清新愉快的感觉。整个书法力度很强，又轻松欢快，但绝不是“楚腰纤细掌中轻”的文弱之气。

56. 手书杜牧《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此卷与上一卷笔法大致相同。不过，在感情上不象上卷有压抑感。这卷手书的感情，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风光里。

黄点绿山，光披红叶。总的印象是欢愉、明亮的。

笔法的跳宕，表达了喜悦之情。“霜叶红于二月花”七字，更有一种“不似春光，胜过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的秋天之美。书法的墨，是黑色的，但却表现了白的美，难道不是这秋霜之美的反映吗？

57. 手书杜牧《边上闻笳》

何处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鸟没狼烟。游人一听头堪白，苏武争禁十九年。

此卷与上卷书写时间大致相同。

用“大漠落日、莽原起雾”来形容这卷手书，是不过分的。虽是淡墨所书（按说淡墨是容易失神的，历来的精品，墨色紫黑，光彩夺目），但豪苍之气，贯于行间，犹如大漠落日，非常壮观，这是第一、三行的气象。而第二、四行，却是另一类与此对应的景象，牛羊下来，牧马归圈，薄雾袭来，一片暝色，人们进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

58. 手书温庭筠《过陈琳墓》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篷过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随芳草，铜雀荒凉隔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

书法欣赏是个困难的事情，直观的感触和深含的韵味，有时并不一致。此卷书法，字体颀长，连断有序，真可谓：春虹饮涧，落霞浮浦。前四行，几乎是一笔写下，笔连意连并举，如春虹饮涧一样绚丽多彩。后四行，又停笔凝兴，一字一结，只作气韵上的贯通，不作笔画上的连接，如落霞浮浦。那斑斑点点的景物，不管是山上、川底、河里、岸边，都被那落霞染上了一层迷人的颜色。

59. 手书温庭筠《赠知音》

翠羽花冠碧树鸡，未明先向短墙啼。窗间谢女青蛾敛，门外萧郎白马嘶。残曙微星当户没，淡烟斜月照楼低。上阳宫里钟〔初〕动，不语垂鞭过柳堤。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8 年以后所写。在向草书堂奥进军时，他的步伐是坚定而迅速的，不仅在字形上作大的改观，而且在章法上也作了质变性质的调整，更重要的还是对气韵、神采的恰到好处的把握和发挥，而这一切都是在写意中完成的。“谢女青蛾”、“门外萧郎”、“斜月照楼”，既是本诗的句子，也是本卷书法的精神飘没之处，还是对此卷书法最好的形容。

60. 手书温庭筠《经五丈原》

铁马云鹏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下国卧龙空悟主，中原逐鹿不犹（由）人。象床宝剑（帐）无言，从此焦（谯）周是老臣。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62 年以后所写。此卷虽是硬毫所书，但表现力十分高超。既有百丈悬崖之险峻，也有万里烟波之苍茫。龙飞天门，风起玉池，……不论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这是毛泽东在草书的王国里，登堂入室后的杰作，是精品之精。

“铁马云鹏”四字，如横空出世的莽苍昆仑，

“共绝尘，柳营高压”七字，似枯藤万丈，劲铁连空，攀之苍穹可登。

“汉宫春。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下国卧龙空悟主”，在毛泽东的书法中第一次出现连续七个字，右角下沉，字字象钢打铁铸一般。

“中原逐鹿不犹人。象床宝剑无言，从此焦周是老臣。”无一笔懈怠，可谓长松依绝壁，蹙浪惊海鸿。

此卷书法，以气作支撑点，“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文赋》）。

评品此卷书法，不能不再提怀素。怀素的草书流布中唐以后，仅是唐人盛赞他狂草之妙的诗歌，就有十五首（在唐代描写书法和书法家的诗歌，仅有二十七首），这大约是他书名冠世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的书法与怀素一样，也是极为杰出的。此卷就是他的代表作。用唐代诗人韩偓赞扬怀素的诗歌来形容这卷书法，信为恰当：

何处一屏风，分明怀素踪。
虽多尘色染，犹且墨痕浓。
怪石奔秋涧，寒藤挂古松。
若教临水畔，字字恐成龙。

（《草书屏风》）

61. 手书温庭筠《送人东游》

荒戍落黄叶，浩然离故关。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何当重相见，尊酒慰离颜。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3 年前所写。

此卷书法，如萧瑟秋风，天涯孤棹，黄叶纷飞，江上残阳。

62. 手书温庭筠《苏武庙》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识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3 年前后所写。

这时，他的书法风格，已基本形成，并开始趋向深化。这时的书法，尚带有硝烟战火之气。就此卷来说，可以用“雁断胡天，归塞草烟”来比喻。点画的跳动，字行的错位，仍是这一时期的基本表现手法。

63．手书李商隐《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深（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8 年以后所写。

李商隐的这首诗，是一首著名的无题诗，如何释解，已成千古之谜。因此，在书写这首诗的时候，很可能带上各自的感情色彩。

表面上看来是一派晴川历历、芳草萋萋的景象。笔法刚柔相济，章法不激不厉，气韵俊俏流利，其实，内含着“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含蓄、模糊之美，给人一种空阔浩渺、博大无垠的感觉。象诗文一样，“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有一种既有所指，又无确指的苍茫之象。

64．手书李商隐《筹笔驿》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原（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词庙，梁父吟成恨有余。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60 年以后所写。

李商隐是个有才华的诗人，他一生不得志，只有借诗取骚了。这首诗比况较多，但意义明显。此卷书法，龙飞凤舞，熊蹲虎跃，是其佳作。“猿鸟犹疑”、“梁父吟成”等字的沉稳，“上将挥笔”、“终见降王”、“管乐有才”、“关张无命”、“他年锦里”等字的飞动，都是神采熠熠之处。

硬毫落硬纸，容易失笔走形，但此卷书法，却象蚕食桑叶一样，涩进生骨，雄健有余。

65．手书李商隐《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莱（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

在李商隐的无题诗中，这也是有名的一首。多家释解，莫衷一是。此卷书法，以宽大的结体，密集的章法，刀劈斧剝似的笔力，行草相间，一气贯底，有意无意地带入了原诗的感情。春蚕尽力，蜡炬放焰，云鬓飞雪，夜寒无伴，东风无力，蓬莱路断，虽有青鸟，锦书难言。这种诗的内涵韵味，无不为历来的文人动容沉思。但是此书法的意象，却并不是这样的伤感、迷茫。他把诗的神韵美感，赋予笔端，转换为书家的性情，反其道而行之。因而书意和诗意就大相径庭。此卷的书意，只是借助于诗的文字和韵律，造成了一

个宏伟的建筑，鳞羽参差；描绘了千山万壑，峦峰掩映；比况了桂林山水，索纤委婉。

66．手书李商隐《马鬼》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旅）传宵锋（折），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年（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60 年以后所写。

如果论诗，这是一首怀古凭吊之作，抒发了李商隐对杨玉环的深沉的同情。读此诗者，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但，这也是一首读烂了的诗，同情已经飞出了诗的躯壳，留下了难言的美感。而这美感，具有一种神奇莫测的感染力，游荡在诗外，又游荡在欣赏此诗的人的心里。这好象是文人墨客，在书写古代诗词时的一种共性感受。当然，文人墨客在写古代诗词时，又是各具法眼，各抒己怀的。

此卷书法，就好象是这样写成的。其神韵在于轻捷俊爽。具体说来，这卷书法行笔极为流畅，全无犹豫滞留之处，表现了高度纯熟的提按动作，提多于按，节奏强烈，沉著痛快，丝丝入纸。在用锋上，保持一种非常合理的状态，因线条的质感特别润畅，粘连过渡、游丝牵挂，恰到好处。线条的头尾护藏、中间加粗的处理，以及左环右绕的行笔轨迹，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力度，给人一种劲健、流畅的美感。总之，此卷书法，应进入他的精品之列。

67．手书李商隐《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

幼时读《千家诗》时，常常是有嘴无心地朗朗诵读这首《嫦娥》诗。此时欣赏，则是有心无嘴了。此卷书法，清新、俊逸，给人一种来往于人间天上，那样的轻松、飘动，而又俊劲明媚的感觉。“嫦娥”二字最为潇洒，还是那么样的长袖善舞。

68．手书李商隐《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世（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60 年以后所写。

风格与前卷《马鬼》相同。但也有不同之处：此卷更加增强了草势。“可怜夜半虚前席”，字字草法，形断意连；“不问苍生问鬼神”，字字草法，笔笔相连，给人一种骏马腾飞，只见其神，不见其形的感觉。

69．手书许浑《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

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残云归太华，疏雨过终（中）条。树色随关迥，河声入海遥。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8 年以后所写。

看了此卷书法，使人立即映入脑际的是：好不面熟！象唐代书僧高闲的《千字文》？象宋代的大书家米芾的《论草书》？还是象康里夔夔的《诗卷》？……，象又不象，不象又象。

此卷书法，二纸八行，草法完备。全篇只有三处相联，其余各字独立，笔法轻捷，结构简明，法度严格而变化多端。运笔以中锋为主，偏锋为辅，方中带圆，起止清爽利索，刚健有力，决不含糊，节奏明快，有虚有实，映带左右，一气贯通，似有大雅君子之风。

70．手书许浑《谢亭送别》

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惠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初所写。

行笔无滞，流畅飞动。“满天风雨下西楼·是寺的落实处，也是书法的意象所在。行舟急流，劳歌相送，人已远去，红叶青山。

71．手书李远《赠写御容李长史》

王座烟销研水清，尤须不动彩毫轻。初分龙（隆）淮山（河）秀，再点重瞳日月明。宫女卷帘皆暗认，侍臣开殿尽遥惊，三朝供奉应无敌，始觉僧繇浪得名。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

乍看此卷点画纷披，貌不惊人，仔细玩味，令人吃惊。这是一幅大象胖外、真气内充的佳作。结构精密，体裁高古，岩岫耸峰，庭旗列陈。豪情出字外，老笔任纵横。在一张十二开的纸上，书写五十六字，初看拥挤，再看透风，三看即马驰无碍了。

72．手书罗隐《雪》

尽道丰年瑞，丰年瑞（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4 年以前所写。

行草兼写，走笔轻挺。行距宽大，字瘦长而连贯，空白宽广而跳宕，好似“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大块的空白，犹如大雪飘飘，万物皆白，含有一种冷盈的感觉。一个个的字，都成了在大雪纷披下，静静地承受着严寒的小鸟，以静制动，几被吞噬。

73．手书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依云栽。芙蓉开（生）在秋江上，莫（不）向春（东）凤怨未开。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60 年以后所写。

一个“栽”字，透出此卷书法的气息。轻按急转，高扬横画，边行笔边上提，以致细如发丝。又一转笔，按中有提，提中疾按，形成枯笔，嘎然而止，抬笔写出“木”与“戈”的一撇的连笔，又是嘎然而止，声似裂帛，形

同断玉，态势险绝而苍老。这篇书作，老笔纵横，神采逼人，气韵生动，格调高雅，令人爽神。这也许是他有怠追求、无心自达的结果。

74．手书薛逢《开元后乐》

莫奏开元旧乐章，乐中歌曲断人肠。邠王王笛三更咽，虢国金车十里香。一自大戎生蓟北，便从征战老汾阳。中原骏马诛（搜）求尽，沙苑而今（年来）草又芳。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所写。

“中原骏马”四字是此卷的书眼。此卷书法，犹如初拥千骑，凭陵沙漠的气势，呈现出轻灵、敏捷、俊逸、爽朗的艺术风貌。“乐中歌曲断人肠”，轻灵如骏马一跃。“虢国金车十里香”，敏捷似猿飞树头。“沙苑而今草又芳”，俊逸如飞天迎经。“莫奏开元旧乐章”，爽朗似尊者开怀。

75；手书韦庄《绥州作》

雕阴无树水难流，雉堞连云古帝州。带雨晚驼鸣远戍，望乡孤客依高楼。明妃去日花应笑，蔡琰归时鬓已秋。一曲单于暮烽起，扶苏城上月如钩。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

韦庄此诗，写了他的塞外感怀。而这书法却也正是一番“夏云奇峰，暑日盛景”，河山赤赤，烈日炎炎的奇趣妙景，八行，行草相间，恰如变化无常的夏云，无数的奇峰，此起彼伏。行距的增宽，笔画的纤细，正是白光夺人，赤日炎炎。而那些笔画呢？真正地成了“雕阴”了。“难”、“雨”、“楼”、“明”、“归”、“曲”、“烽”、“城”、“如”等有圆环的字，都不是地上的树和水，而是天上的云形。这种书法意象，动态感很强，它使本来不变化的一块“白色”，经过墨线的加入，生动起来，运动起来，以致成了此卷书法一种特殊的韵味。

76．手书司空图《归王官次年作》

乱后烧残满架书，峰前犹自恋吾庐。忘机渐喜逢人少，缺粒空怜待鹤疏。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酣歌自适逃名久，不必门多长者车。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后所写。写在一张有红丝栏的信笺上，共八行，草书。每行的字，都是顶格破栏，字距行距，淹没在高山大河似的线条当中，茂密而沉重。真可谓气势雄远，真力弥漫，一片化机，满纸烟云。“乱后”与“峰前”，“吾庐”与“人少”，“鹤疏”与“涨满”，“小栏”与“酣歌”，都可跨过红丝栏，横向相对，结成妙趣，茂密的结体，给人的幻觉重重。结体虽然如此茂密，烟云不定，但还是字字独立，违而不犯，可见笔力之厚，关照之精。

77．手书章碣《春别》

掷下离觞指乱山，趋程不待凤星残。花边马嚼金衔去，楼上人垂玉筋看。柳陌虽愁风袅袅，葱河犹自雪漫漫。殷勤莫厌招衷重，恐犯三边五月寒。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4 年前所写。

看了此卷书法，蓦然想起了清代乾隆年间的书画大家郑板桥。郑板桥以画竹名擅画界，又以六分半书冠世，有一种章法，名曰“碎石铺路”。此卷书法，正有些碎石铺路的味道。

“掷下离脑指乱山”，起首一句，一改过去四角夸张、内宫不紧的结体方法，变为中宫紧收、四角对应，字势宽占地步。加强行笔、点画的顿挫，一字一结，相望相依而不相连，字距有空挡，行距有空白，飘飘洒洒，你铺我垫，你伸我缩，字势偏宽而有斜势。一篇书下，妙趣顿生。

78. 手书唐彦谦《仲山》

千古（载）遭踪吊（寄）薛萝，沛公（中）乡里旧山河。长陵亦是闲邱陇，异日谁知与仲多。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7 年前后所写。

此卷书法，用笔沉稳，点画流畅而无壅滞，结构宽博恣肆，拙厚朴茂，左右顾盼有情，上下依侧呼应。行气跌宕，或放或收，或连或断，或方或圆，各行其妙。“薛萝”二字又连又长，“长陵”二字，又小又粗，“旧山河”三字写得潇洒，“千古遗踪”四字相映生辉。

79. 手书杜常《华清宫》

行尽江南数十程，晓风残月入华清。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向长杨作雨声。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8 年以后所写。是用软毫写在一张十二开纸上的八行草书。雄放恣肆，“有着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之感（唐张怀瓘《书断》）。表现最典型的字是：“晓风残月”。“晓”字的“日”旁较大，而“尧”却被简化而压抑，压抑的能量，一笔扫下，变为“风”字的一边，然后提笔，转折，又将笔势收于腹内。“残”字另起笔，以侧笔取势，连笔再将“月”字写出，笔锋又中断“月”腹。这样的挥洒，透出了作者的豪情峻骨。“西风急”三字，又是一种苍茫景色，“西”字写得跳宕起倒，稍有峭意，接写“风”字就笔力遒劲了。“急”字不急，而带翻笔涩势，聚结了弹力，但又未施放出来，犹如勒缰之马，意在急奔。

80. 手书韩偓《已凉》

碧阑干外绣帘垂，腥（猩）色屏风画折枝。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所写。

小诗小景，但韵在诗外。书法也是这样随诗情而赋笔。这里没有雄放恣肆，没有刚健超逸。这里有的是气清若兰，性雅高奇。欣赏此卷书法，感到兰花朵朵，条叶交伸，一片馨气。草书笔法，淡墨轻行，如高士山中，行吟溪畔。面对山水，心怀清幽，调雅景奇。其中“腥色屏风画折枝”最有韵味。

81. 手书张 《钱塘夜宴留别郡守》

四方骚动一州安，夜列尊罍伴客欢。箏箏调高山阁迥，虾蟆更促海塘（涛）

寒。屏间佩响藏歌伎，幕外刀光立从官。沉醉不愁归樟晚（远），海（晚）风吹上子陵滩。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所写。

行草相间，正是他书风深化开始的风格。“钱塘夜宴”四字已代表全篇笔墨，是小草书。“钱塘”二字，象是杭州玉皇顶上的松柏，挺干延枝，盘根崖上，迎风而摆，似有招人之意。“夜宴”二字，写得耸立淡雅，如六和塔，立于钱塘江边，穆穆然，有高雅之貌。其他如“屏间佩响藏歌伎，幕外刀光立从官”，也写得劲健清捷。最后，在章法上，当最后还剩下一个字，需另起行时，不再抬起，直落未行字旁，不受古法拘束。

82．手书张焜《登单于台》

边兵春尽回，独上单于台。白日地中出，黄河天上来。沙翻痕似浪，风急响疑雷。欲向阴关度，阴关晓不开。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

大漠沙丘，风起浪翻，书意中含有一种平沙起雷、云生天际的清远劲静的韵味。淡墨起笔，行书为主，稍带草意。“白日地中出，黄河天上来”，无遮无盖，视线辽阔，笔势开张。“沙翻痕似浪”，写得简约跌宕，似遇强风袭来，有顶风勇进的气势。“阴关晓不开”，一个“晓”字，似有风迷马眼，举蹄长嘶的动感。

83．手书李煜《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裳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向（晌）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

不论李煜的历史地位如何，作为词人他是合格的。这卷书法以轻松愉快的笔调，疏朗错落的布白，流畅痛快的线条，表现了一种春江落花的气韵。书意和词意在这里不是协调一致的。“一向贪欢”四个字，写得清和高远，雅健俊逸，不象词意有着理性的批判。“无限江山”写得爽气感人，也不是词人心里的亡国回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写得如少女起舞，长裙飞扬，更无帝王变囚徒的天壤落差。

84．手书李煜《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此卷书法，与前卷一样，书写时间相同。

淡墨而书，犹如冰心玉壶，晶莹透亮。“春花秋月”，流美娟巧。“小楼昨夜又东风”，激流推舟。“雕栏玉砌应犹在”，高楼飞檐。“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溪蒲承霞。此卷书法，美在流畅，美在轻松，美在悠扬。

宋代诗词

85. 手书林逋《山园小梅》句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昏黄（黄昏）。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60 年以后所写。

这是形容梅花的警句，被历来写梅花、画梅花的诗人、画家所引用，也是书家乐于挥洒的句子。毛泽东很爱梅花，他有一首很著名的咏梅词。词中说：“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把梅花高洁的性格都写绝了。在欣赏这卷书法时，什么矫健清新，什么遭美俊逸……，都恐怕不够了。

欣赏这卷书法，应该在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词中去寻找路径。观其全篇，宛若是“悬崖百丈冰”，“她在丛中笑”，因此，此卷书法包涵着梅花的高洁品质——以巨大的热情和虔诚，盼望着春天的到来，盼望着百花竟放。因此，这卷书法的意象，在两难中统一起来：一方面，悬崖百丈冰，这是外形，是线条，是冷的，是白色的，另一方面，是梅花在花丛中可喜的笑容，这是内在的，是意境，是热的，是彩色的。“影横斜”、“水清浅”、“浮动月昏黄”都是字字相连，游丝飞动，似悬崖百丈，水柱倒挂。而独有“暗香”二字独立，藏在丛中，笑迎春天。

86. 手书柳永《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豪）奢。重湖叠（清）佳（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渔（菱）歌唱晚（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衙（牙）。乘醉听萧鼓，吟赏（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所写。

一片山水，满纸云烟。诗也轻健，书也轻健，诗情和笔意统一了。这一卷洋洋洒洒的妙笔墨花，正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情致，当然，也有“云树绕堤”、“怒涛卷霜”的气象，字字珠玑，争光夺彩；行行罗绮，轻飘柔纱。重湖如镜，云影尽映；叠 巍峨，松生峭崖。“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香飘天外，色染烟霞，渔歌唱晚，钓叟歌乃；羌管萧鼓，嬉嬉莲娃。

这里的用笔、结体、章法，统统融汇在这美景之中，那线条，那色块，那寓意，那神采，统统都在意象中变化、开发。这不也是欣赏书法的方法吗？是的，这样的欣赏方法，不失为揭示书法艺术神韵的一个方法。

87. 手书范仲淹《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这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8 年前后所写。与手书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第19条)为同一个时间,使用的是同样的信笺纸,不过墨色和线条较淡、较轻。

范仲淹的这首词,是一首著名的写秋思的词。而毛泽东的书法却是轻松欢快的。以小草的形式写出,纯用中锋行笔,笔法洗练,结构在飞行中求平衡,抛接飞扬,好象快船乘风。

88. 手书程颢《春日偶成》

云淡风轻近午天, 旁花随柳到(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此卷书法, 似为毛泽东 1958 年以后所写。

《千家诗》收入的第一首, 就是此诗, 表达了作者的闲情逸致。而这卷书法的意象, 却是大大地超越了闲情逸致。书法以诗文为载体, 表达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情致。前两句“云淡风轻近午天, 旁花随柳到前川”, 几乎是一笔连下, 重若滚石, 轻若银丝。好象是天马踏云而飞。“学少年”三字, 犹如接地的刚风, 从天而降, 天马又返回了。

89. 手书苏轼《题西林壁》(图二十九)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卷书法, 似为毛泽东 1954 年以前所写。

苏轼是宋代的文豪, 词著名, 诗也著名。这是一首表达理性的诗。而书法, 似乎是受到苏轼诗意的影响, 将哲理性, 隐藏在文字的线条组合和笔情的摇荡之中。此卷书法点画精到、行笔畅达, 好象把人带入了群山之中, 横过几岭, 侧过几峰, 远的也爬了, 近的也登了, 但大自然的真面目还是未找到。卷末, 用重笔写了“在此山中”四个特大的字。这一处理, 很巧妙地表达了: 你所要寻求的真谛, 正是你所处的直接环境。

90. 手书苏轼《惠崇春江晓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蒹蒿满地黄芦(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

此卷书法, 似为毛泽东 1958 年以后所写。

书写在红丝栏的信笺里, 按照他的习惯, 还是顶天立地, 不分行距。雄放恣肆, 大气扑人, 结构茂密, 行笔跳宕, 是本卷的直接风格特点。要之, “春江水暖鸭先知”七字最为传神。

91. 手书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 惊涛掠岸, 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 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人生如寄, 一尊还酹江月。

此卷书法, 似为毛泽东 1953 年以前所写。

苏轼的这首词，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豪放潇洒，气魄盖世。毛泽东很喜欢这样的诗词。自然，苏轼的气魄比起毛泽东来，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描绘山河之美，抒发胸怀之志上，还是相通的。所以，他在书写苏轼这首词时，采取疏朗的布白，以示天地之阔，胸怀之大；又以大起大落的笔法，传递与自然节律一致的心律；以个别字或短句突发性的飞动跌宕，表达情感的高潮，以水墨淋漓的笔墨，书写山河的壮丽。开首一个“大”字，涵盖了一切，接着笔似江水，滔滔流去，到“三国周郎”出现了第一个浪头。继以鲸吞海水的气势，引笔直下。直到“故国神游”，才突然爆发出地动山摇的巨响，“多情”二字，达到高潮。情系于江？情系于海？情系于史？情系于人？恐怕都有了。这情变成了酒，让这酒随着大江进入大海吧！

92．手书秦观《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河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

宋代词人秦观的词，柔情似水，蜜意如火，属于婉约一派。这首词借牛郎、织女的神话，引发一段感叹：两心相印久，何必在朝暮。

此卷书法，书写在一张有红丝栏的信笺上，行书八行，具有一种轻捷矫健的风格，笔法灵动，点画沉著痛快，细微处也见精绝，不落俗套。各字独立，相互顾盼。确为小幅字卷中的精品。

此卷手书的意象，也是与词意大致相同。可以用“金风玉露，银汉暗渡”来形容。

书法的气韵和节律，与词韵恰合。大体上分上、下两阙。上、下阙的书法，以乐曲句子为断，成为每个乐曲句子的文字最好组合。虽无标点，但停顿的空白已经显现得很明白，感情的抒发比较平稳，体现了中和灵动之美。

93．手书岳飞《满江红》（图三十六）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歇（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6 年前后所写，与书写李白《梁父吟》（第 16 条），时间相当，都是用楷书书写。一笔一画，提按顿挫，起倒转折，一丝不苟。这就是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的楷书。这种楷书，是在四十年代的楷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代表作是《沁园春·雪》和《致柳亚子先生的信》。神韵一致，格调迥异。用笔上也变粗犷为精劲。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书坛上的奇葩，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种新鲜的字体。这种字体，以倚取正，以险致平，在笔画的提按飘动中见骨力，在点画的疏朗处见风神，在虚中求实，在实中求虚，浓淡相映，枯润相生，高低相合，大小相称。用笔方圆兼备，迟速适宜。

94．手书陆游《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图二十四）

雪晓清前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60 年以后所写。

陆游的诗，在豪放中不乏柔情。这首词，虽梦断关河，仍是豪气满纸。

此卷书法，老笔纵横，豪气冲天，比陆游的词意高大得多。字与字连绵不断，以长体字势，增加纵向的向上的拉力、离心力；以横向的使转，占有空间，加强线条的厚重感；以枯笔掠空，槽加视觉的苍茫感；以侧笔起势，增强意象的刚度和骨力。满纸化机，气韵寒峭。其中“铁骑无声”四字，既是此卷书法的代表，力能扛鼎、气冲牛斗，又是对此卷书法的神韵的评价。

看吧，滚滚铁骑，从天而降，万鬃扬空，鸣声震地，铁蹄乘风，一往无前，什么力量能阻挡呢？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气势之大，无以复加。

95．手书陆游《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何似（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60 年前后所写。

从书法的用笔来看，最大的特色是中锋铺扫，粗为大树，细为丝绳。从章法布白来看，卷首几行和卷末几行空间较宽，卷中几行较窄，但不管所占地步的宽窄，都是密集性的布白，尽量加大线条的流量和密度。所以，据此欣赏，此卷书作，恰似“天山关河”的意象和神采。天山横亘天际，山峰堆集；关河纵走地涯，河网盘绕。令人遐想无限，感慨万千。

笔法中的不足是：这一时期（即 1958—1961 年）的部分作品，提按掌握欠佳，线条力度不足，似有丝绳鼠尾之嫌。

96．手书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郁姑（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是（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子，山深闻鹧鸪。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6 年前所写。

辛弃疾也是壮志未酬藉翰墨抒豪情的爱国词人，他的词作，雄深雅健，豪放不羁。此词的情调是在悲哀中透出一丝倔强。

此卷书法的气韵不在词意上，而在笔画连贯流畅之中，透出的俊逸的神采。

此卷为小幅书法，一张带有红丝栏的信笺上飘洒着清俊之气。这股气，溢于纸外。

97．手书辛弃疾《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

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依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此卷书法，与上卷《菩萨蛮》大概同时。

虽与上卷书法书写时间相同，但在气韵上，不象上卷轻捷矫健，而在流畅的笔画中，稍带有沉郁之气。这大概与本词内容有关。从字的结构和笔法上看，笔画的长度明显地变短，飞动感明显地减弱。尤其到了下半阙，单字的形体内聚，不开张，甚至出现了星散碎石的字形和笔画，仿佛透出了一种“怨春不语”、“烟柳断肠”的不快情绪。

98．手书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绿树听 鶯，更那堪、杜鹃声住，鹧鸪声切。啼到春归无啼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秋（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此（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伴我，醉明月！

此卷书法，似与上卷《菩萨蛮》时间相当。

辛弃疾此词悲壮之情，贯穿字里行间。而此卷书法，却是另番情衷。无哀，无怒，无悲，无恨，有的是欢快、豪情、热望和轻松。走笔落墨，在有红丝栏的信笺上驰骋，表现了绿树莺啭，芳菲争斗，琵琶声脆，翠辇金阙，一派生机，一片虹彩。书写到最后，激情并发，“谁伴我，醉明月”的“明月”二字又长又大，又亮又响。反其词意而挥之，不也是书法本身独有的一种审美乐趣吗？！

99．手书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载（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此卷书法，书写时间似与上卷相同。

这首词，朗朗上口，节律很强，抒发的是少年壮志，平生豪情，可谓脍炙人口。此卷书法深受词意影响，笔法大起大落，跳宕恣越，飞动飘逸，表达了一种“满眼风光，长江浩荡”的情怀，神采奕奕，热笔炙人。其中，“千载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等句，最为畅逸。

100．手书刘过《沁园春》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坡仙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装临照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白云（言）：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阁开。爱东西（纵横）二涧，纵横（东西）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不若孤山先探（访）梅。须晴日（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南宋诗人刘过的这首《沁园春》，是赠给辛弃疾（稼轩）的，是开玩笑的，幽默感很强，真可谓是个调笑令，但是用大调牌写的。

书写此词时，毛泽东并不采用同样玩笑的形式写出，而是写得很工整，是用楷书，一笔一画写出来的。这样词意与书意就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词意是轻松的、愉快的、幽默的、调侃的，而书意是庄重的、严肃的、正经的、认真的。

此卷书法，断金嘎玉，削峰劈岩，古雅朴茂，峻健峭逸。

他的书法自 1945 年形成了长枪大戟、以斜取势的笔法以后，这种外长内豪的书风，一直在自己的轨道上奔跑，并在前进中充实内涵，改善装束，到了 1948 年，长撇变短，斜势减级，但豪气、阳刚之美始终在加强着。1950 年后，字的外形更为改观，基本演变成此卷书法的面目：长伸左部，峻拔右角，横细竖粗，字体加宽，字的底线趋于水平。这样的字体，犹如高官外出，一派肃肃然、赫赫然。

101．手书刘过《沁园春》

此卷书法，为草书，文字内容同上卷（第 100 条），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

看来，在书写这首词时，即使用草书，他也没有被词意所牵。这里写的是正正规规的草书，没有词中的孟浪意思。

在仔细欣赏这草书后，就会知道，在 1955 年他虽然已写草书，但不如六十年代以后那样的豪放。或者说，还是晋人的行书、草书的气韵，还是王羲之、王献之的风范，还没有进入唐代颠张狂素的大草世界。因此，说它是正正规规的草书。总的风格，还是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

此卷书法，可用“风雨渡江，峥嵘阁开”来形容。

102．手书崔与之《水调歌头》

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人苦百年涂炭，鬼哭三边锋镝，天道久应还。手写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对青灯，搜（搔）白首，漏声残。老来勋业未就，妨着（却）一身闲。梅岭绿阴青子，蒲涧清泉白石，怪我旧盟寒。烽火平安夜，归梦到家山。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

崔与之的这首《水调歌头》，有一股“老来勋业未就”的怨气。可是，这卷书法，却写得快心、欢愉，甚至于还是怪味很足呢！从这里，我们可以探知，毛泽东此时的心态，是无比的欢快，喜气洋洋，万事如意，甚至是童心突起，在书法上有意无意地要汲取“扬州八怪”的气韵，走出“二王”的樊篱。

此卷书法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

从结体、行笔、行气、布白、情致、韵味，一直到神采，摹仿郑板桥的“板桥体”，形神兼备，且带有他自己的气质、风神。

这样的书作，在他传世的书作中是少有的，但也是非常可贵的。它是我们研究毛泽东的书法艺术的一分珍贵的资料。

103．手书文大祥《过零丁洋》

辛苦艰难（这逢）起一经，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萍浪（沉雨）打萍。攸恐滩头说惶恐，伶仃（零丁）洋里叹伶仃（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60 年以后所写。

文天祥的这首诗，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绝命诗，它表明了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质。

此卷书法，是倾怀放胆之作，是泼洒豪情之作。毛泽东把对文天祥气节的崇敬心情，带入了毫端。以精美的书法，写出文天祥的诗，一吐胸中的激情。

大笔饱蘸，书写任情。

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不只是写一个文天祥，而是要写出中国古代史上、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革命史上的无数个文天祥，无数个比文天祥更加英勇、更加高大的英雄人物。在这里，那些文字、那些线条、那些空白，组成一个浩大的纪念碑群。它顶天立地，横亘穹庐；它钢打铁铸，与日同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二句，写得最为精彩。

元明清诗词

104·手书萨都刺《满江红·金陵怀古》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正（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螿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

此卷书法，似与崔与之《水调歌头》（第 102 条）同时书写。

郑板桥的书法，号称“六分半书”，五味俱全，柔中含刚。看来，毛泽东想改进自己的书法形态，以达到绵里裹铁的外柔内刚，在苦思着，探求着。而临摹郑板桥的书法，就是一种切实的努力。当然，这种临摹，仅仅是一种过渡手段，绝不是他的目的。

此卷书法，力求每一笔，每一横、竖、撇、捺、折、钩、挑等，着力磨练，“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抄；一点之内，殊岖挫于毫芒。”（孙过庭《书谱》），所以，效果特佳。

“正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螿泣”等字，神韵流彩。

105·手书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折》句

游艺中原，脚碾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看诗书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棘围呵守暖，铁砚呵磨穿。转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十余年。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怕你不雕虫篆刻，断简残篇。（和原作有出入，恕不一一标注。——著者）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62 年以后所写。

这卷书法，是他的精熟之作，神采射人。这时期，他专攻大草，经过苦心的钻研，终于得笔、得法、得意了。形象他说，此卷书法如鹏搏九天，龙游四海。

“游艺中原”，大笔开篇；“如蓬转。望眼连天”，屈铁盘石；“棘围呵守暖，铁砚呵磨穿”，壁立于仞；“鹏程九万里”，苍烟杨柳；“难入俗人机”，飞鸿落霞；“篆刻”“残篇”，云鹏追风，等等，精彩至极。

此卷书法，可与手书温庭筠《经五丈原》（第60条）同看，属于一个时期，一个风格，一个神韵的书作。

106．手书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折》句

九曲风涛何处险，正是此地偏，带齐梁，分泰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揽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贯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正似弩箭乍离弦。（和原作有出入，恕不一一标注。——著者）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1960年以后所写。

豪气外溢，性情跌宕。可借用所书《西厢记》的词句来形容：九曲风涛，水上苍龙。

此卷书法，对比强烈，落差悬殊。有的笔画用墨如泼，有的却是淡扫蛾眉。有的线条似万丈长纒，有的却是短如狼毫。有的字大如山，有的字小似蚁。有的行笔风驰电掣，有的却涩如钻山。变化之多，令人惊叹。

欣赏此书作，可参看手书文天祥《过零丁洋》（第103条）。

107．手书高启《梅花》（九首之一）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裁。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儿回开。

此卷书法，毛泽东自注为1961年11月6日所写。

高启这首《梅花》诗，是一首著名的咏梅诗。“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将梅花比为高士和美人。毛泽东在书写这首诗前，有个小序，说：“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可以推想：毛泽东是很重其人、很爱其诗的。当然，诗中的感憎，也自然地流注于笔端。

在此卷书法中，用笔的大起大落，字与字的大小对比强烈，可以看到他笔挟风涛，满纸激情，既有百丈悬崖的险峻，又有瑶台琼姿的绚烂；既有山中高士的傲骨，又有林下美人的风骚。总之，他在书写这首诗时，是纵思放怀、雄姿英发的。

108．手书高启《吊岳王墓》

大树无枝向北风，十年遗恨位英雄。班师诏已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栖霞岭上今回首，不见诸陵白露中。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1957年前后所写。

提起岳飞，敬仰之心油然而生，领袖亦然。

书作是写在两页带有红丝栏的信笺上的。“大树无枝向北风，十年遗恨位英雄”，十四字一笔写下，字如长龙驾风，吞吐云雾，头在东海，尾曳昆

仑。后几句字迹变小，但不变气势。雄放畅逸，令人驻足。

109. 手书汤显祖《牡丹亭·惊梦》句

原来是姹紫嫣红开这，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也，忒看的这韶光贱。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8 年前后所写，与李白《梁父吟》（第 16 条）书写时间概同。

此卷书法，几同楷书。每个字的结体都有些扭曲，借以增加动感。用笔洒脱、干净、准确、流丽，可见功夫之深。如果用“功夫”和“天然”这两把尺子，来品味毛泽东书法的话，应该说：二者俱佳，两美同臻。

110. 手书汤显祖《牡丹亭·惊梦》句

此卷书法，为行书，文字内容同上卷（第 109 条），似为毛泽东 1958 年以后所写。

词中有句：“云霞翠轩，雨丝风片”，也正是此卷书法的写照。

111. 手书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

十年磨剑，五陵作（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落魄（拓）江湖，且吩咐、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60 年前后所写。

朱彝尊这词、凄切有余，独乏继续“磨剑结客”、“歌筵新声”。而此卷书法就不同。没有什么“涕泪飘尽”、“空中传恨”、“落魄江湖”、“白头无分”的悲凄之情，而是以长剑作毫的锐气，以沉雄超逸的笔法，抒发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怀。“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等句，写得老辣遭美。

112. 手书严遂成《三垂冈》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赤）手难扶唐社稷，连城拢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61 年以后所写。

虽然《三垂冈》有英雄之气，但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此卷书法的雄放之气相提并论。

品味此卷书法，其起伏的章法，大度的用笔，密集的结体，犹如天风海涛，龙行云从。

在第一页上，“三垂冈”三个大字作为标题。接着写下两小行刚劲紧结的小字，又接写两行瘦长粗壮的稍大一点的字。第二页上共写四行，中间两行字较小，两边两行字较大，一个“灯”字大过二寸，做居左角。最后三页分为四行书写。中间两行字小字多，两边两行字大字少。各行的字数是：3、7、7、6、4、4、5、4、4、2、4、6、3。可见，强烈的对比，悬殊的落差，莫测的变化，产生了奇异的神采，使人品赏不尽。

113. 手书林则徐《出嘉峪关感赋》（四首之一）（图三十二）。

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啼。飞阁遥连秦树直，燎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峻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函关（崤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

此卷书法，似为毛泽东 1955 年前后所写。

小行书，笔法精致，布白疏朗，字势飞动开展，确似飞阁遥连，瀚海苍茫。“谁道函关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十四字至为传神。

114. 手书林则徐《出嘉峪关感赋》（四首之二）

东西尉候往来通，博望星搓笑凿空。塞下传前歌敕勒，楼头依剑接崆峒。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除是卢龙千古（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

此卷书法，与上卷（第 113 条）书写时间概同。不过字势较为开张，跌宕幅度较大，笔法运用较为丰富。但在神采上一样熠熠照人。可品为“长城饮马，古戍盘雕”。

总之，毛泽东留世的手书古诗词墨迹，是中国书坛上的一大幸事，也是留给书法艺术之林的宝贵财富。这些手书古诗词墨迹，是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这十余年的作品。而这十余年，正是他书风特性深化和走向巅峰的时期，所以，这些书法墨迹，就尤为珍贵。

唐代伟大的诗人李白，曾在一篇《上阳台》的书作中说：“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我们可以说，毛泽东的书法，笔含万物，气象万千，经天纬地，山高水长，非有老笔，雄放何穷。是矣哉！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探微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伟大的天才。他是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其文学修养也相当之高。他一生写的很多诗词，流传甚广，脍炙人口。而他的书法，又独具一格，影响甚大。就我们所见到的题词、诗词来看，毛泽东的书法，大体分为行书、行草、草书。下面笔者就这几种书体，以及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

毛泽东的行书多见于各大报的报头题词，各杂志的封面题词；有些诗词也用行书。分析其行书，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字形大部呈欹侧势。也就是说，看上去字大都向右或向左倾斜。但仔细揣摩，每个字又都保持了它本身结构的重力平衡。这种字势，就是人们常说的似敬反正。这种字势给人以“险”的感觉，较一般人的结字求“稳”明显不同。常见的“人民日报”、“新华书店”等，就有这个特点。比如“人”字，左撇又高又长，右捺很短，二者反差甚大，造成一种“险”势，看上去使人似乎觉得此字要向右倾倒；但右捺在顿笔后将要轻提出锋驻笔时，却不象一般人的书写那样，向右下方向（这样字的重力就不平衡了），而是微向右上方向。这捺笔的笔势的处理，就加强了这捺的支撑力，与又高又长的左撇保持了力的平衡，使得整体“人”字收到虽“险”却“稳”的效果。

二、字形较长。毛泽东的行书，字形都较长，呈长方形，如“北京”的“北”字，人们一般写得较扁，但毛泽东却将“北”字的两竖写得很长，整个字形成为长方形。此类例子不再多举。

三、横画向右上方的斜度较大。人们写横画，一般较平，或者微微向右上方偏斜。而毛泽东写横画，向右上方的倾斜度特别明显，斜度较大。比如人们常见的“新华书店”、“北京”的“京”、“中国青年报”等字，其横画都是如此。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写的每个字，其横画几乎都有这个特点。这也是他结字成欹侧势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笔画多露锋。毛泽东的行书，不少字用笔用露锋。这在入纸起笔时多见。“中国青年报”中的“青”字。第一横的起笔，以及竖画的起笔，都显示出了这一特点。这种露锋用笔，显得笔意活泼，字有精神。

五、用牵丝加强笔画间的呼应。如“中国青年报”中的“青”字，第二横没写作横，而写成了点。这在笔势上与上横有所避复，显得用笔灵活，而且往左下方又有牵丝，使之与第三横的连带很自然，很紧密。第三横的驻笔处紧接着往左下方又有牵丝，使之与“月”连带自然紧密。所以整个“青”字收到了笔画呼应、结体紧凑、用笔活泼的效果。“北京晚报”中“北”字的左边，上一短横与下一斜提问的牵丝，“报”字“幸”的最后一竖与“报”之间的牵丝，同“青”字的牵丝一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六、以简省的笔画代替复杂的笔画。《沁园春·雪》中的“天”、“失”、“采”等字，以点代捺；“山”字，以点代其中间的一竖；“娇”、“骄”二字右下端的“口”，“弯”字的“彡”、都作了简化。这样处理，书写简便美观。

毛泽东用行书写的完整作品很多。不论是字数较少的题词，还是字数较

多的诗词，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其原因是：一、气脉贯通，流畅自然。气脉贯通，使得个个独立的字成为一个整体；流畅自然，加强了作品的气势，显示了整幅作品的美。二、字大小浓淡，各得其宜；布局巧妙，错落有致。“人民日报”是横行题词，独体字。字体大的“人”、“报”两字各占一边，互相配合照应；“民”、“日”两个字字体较小，居中，与“人”、“一报”组合在一起，显得错落有致，特别是加上四字气脉贯通，就更增加了整体的美。《沁园春·雪》，整首词字数较多，字字独立，用行书写成。整首词写好多竖行，每竖行的字大小相差明显，但却在一条轴线上，上下呼应，气脉贯通，错落有致。整幅作品居中间一行中的“娆”字，墨浓字大，赫然醒目；和“娆”字情况相近的“封”、“飘”、“须”、“射”、“朝”等字，各占一角，与之遥相呼应，显示了布局的巧妙、结构的紧凑。整幅作品虽用行书写成，但气势雄强，好象一气呵成。革命即将胜利，新中国更加可爱的坚定信念，激越的感情，豪迈的气魄，溢满字里行间。

总之，毛泽东的行书，柔韧清秀，滞洒险峻。独具风格。

二

毛泽东的行草见于题词，但更多的见于诗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清平乐·六盘山》等，都是用行草写成。所谓行草，即一整幅作品中，既见行书字，又见草书字，是行书、草书的成功结合。这种作品，较之行书作品，行笔更显流畅，气势更显充盈，而且往往上下字由牵丝连属。“向雷锋同志学习”仅七个字，第一、第二两字连用行书，其余五字都用草书，而且“同志”、“学习”四字，分别由牵丝连属。整幅题词，行笔流畅，有气势。“雷锋”两字大，“同志”两字稍小，参差错落，布局美观。看后似乎令人想到，毛泽东在题词时，在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时，感情在激荡，特别是在写到“学习”时，情不自己，一气呵成。因而这题词，显得很有号召力。这幅作品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每个字的右半部都高，造成了一种欹侧势，字字显得活泼。再如《清平乐·六盘山》，每行字有大有小，而且相差很大，但却参差错落，饶有韵致。每行的字由上而下，彼此呼应，在一中轴之上。行行直，不偏斜。足见布局的巧妙。作品中，有行书，有草书，行草结合，交替使用；过渡自然，衔接紧密；给人以起伏跌宕、疾迟缓急的节奏感。从而又使人体察到作者所表现出的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要“缚住苍龙”的激荡感情。作品中有句读，特别是“万”与“六”之间、“风”与“今”之间，距离较大，但从头至尾，气势有力，一贯到底。“指”、“行”、“程”、“二”与“六”、“盘”、“今”、“日”，字虽小，但却与整幅的诸多大字一样神完气足。

总之，毛泽东的行草作品，在用笔、布局、气韵乃至表达感情诸方面，都获得了很大成功。

三

毛泽东的草书，在其书法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总括起来讲，可分为小草和大草。小草，较之行书，书写便捷，笔势飞动，但基本属字字独立，较少有牵丝连属。而大草，则字与字多由牵丝连属，较之小草，其笔势之飞动更为明显。毛泽东的草书，不论是小草，还是大草，都给人以草而不乱、

书写有素、挥洒自如的感觉，都获得了很大成功。《沁园春·长沙》文字较多，第一行，着墨较浓，书者情绪较稳定。“看万山红遍”之后，挥笔加快，笔势飞动，欣赏祖国美好风光的激动心情流露于字里行间。至“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墨又稍浓，书情又稍稳定，给人以沉思感。回忆“同学少年”以至“中流击水”，行笔又显疾速，“意气”、“激扬”、“记否”诸字，牵丝连属，作者书情复又高昂。“浪遏飞舟”四字，墨又加浓，书写速度减缓，似乎使人感到浪势之猛，“同学少年”的革命意气之盛。其气韵与第一行吻合如一，使整幅作品收到完美的效果。

总之，这是一幅成功的小草作品。作品中，字枯涩浓淡、大小长短，各得其宜，错落有致。作者挥洒自如，字字飞动，虽大都字字独立，但气势连贯，流畅自然。作者既抒发了革命豪儒，又使作品获得了很高的艺术价值。

1983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编选了毛泽东工作之余书写的大量古诗词。这是一批难得的珍贵墨迹。其中草书数量很大，而且大草又占很大比重。人们熟知常写的李白《下江陵》是大草。作品中，不少字由牵丝连属，少数字虽无牵丝连属，但意连气贯。书者书写迅疾，挥洒自如，字有大有小，错落有致。作品似一气呵成，气势浩大，似乎使人感到飞流直下，一泻千里。李白当时愉快的心情也在书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是大草，书者书写第一行，情绪稍显稳定，书写稍慢。第二行以后，书者激情骤起，一发难收，书写速度迅疾，很多字由牵丝连属，有些字虽无牵丝连属，但书写奔放的气势，使作品浑为一体。整幅作品看去，书者书写时，似乎是意不在字，而是在抒情，在沉湎于对“向天横”的天姥山的向往与“梦”之中，在抒李白那种倜傥不羁、蔑视权贵之情。可以说，毛泽东的这幅作品，使李白写此诗时的心境得到了很好的表露；这幅作品使诗情、书情得到了完美的和谐统一。

其他诸多大草作品，同样获得很大成功。

四

从行书、行草、草书诸体来看，毛泽东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相当高的，其影响也是相当广大的。毛泽东的书法所以获得很大的成功，笔者认为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酷爱书法、有天分

毛泽东从青少年直到晚年，一直酷爱书法，对书法有浓厚的性趣，有深厚的感情。他非常珍爱“文房四宝”。他和贺子珍结婚时，贺子珍了解到他酷爱书法，专门用几天时间亲手特制了一只多用挎包，赠送给他。他非常高兴，说是自己的“家宝”。以后经常随身携带，练习书法。酷爱书法是学好书法的保障。不爱书法，与书法无情的人，永远不会在书法方面获得什么成功。有的人也喜爱书法，但在书法方面天分不高，甚或无天分，也难以或者不会获得成功。毛泽东酷爱书法，又是伟大的天才，在书法方面有天分，所以他的书法获得很大成功。

二、勤学苦练，持之以恒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在为中国人民日理万机、昼夜操劳。但是，他从没间断过练习书法。他说：“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

他一生总是挤时间练习书法。晚年，他的书法比青少年时期有更大的进步。这种勤学苦练、持之以恒的精神，的确令人钦敬！在练习书法中，毛泽东有深切的体会。他说：“练习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的健身之法。”我们说，书法是一门艺术，需要有天分。但要想在书法方面获得成功，最主要的还是靠勤奋，还是靠坚持不懈的刻苦练习。自古及今，哪一个书法家不是主要靠勤学苦练而获得艺术成功的呢？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

三、虚心学碑帖，博采众长

毛泽东说：“学字要有帖”。可见他虚心学古人，学碑帖的精神。同很多人一样，在学习书法中，他走的是正路。从毛泽东的用笔、结字、布局等方面看，特别是从他的草书来看，他的确是临摹过不少碑帖、下过很深功夫的。他的用笔、结字有来历，布局有渊源。但是他学习书法又不囿于学古人碑帖，他非常善于博采众长。即使是在战争年代的行军路上，遇到碑刻好字，他也要驻足好久，细心揣摩，而且经常是恋恋不舍地离去。每到殿宇厅堂，遇到好字，更是如此。他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古庙都有造诣很高、价值很大的书法艺术，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的宝库，我们应该很好研究和学习。”毛泽东这种虚心好学的精神是他在书法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四、胸襟宽大，见识广博

临摹过碑帖和没临摹过碑帖的人，其书法有“文”、“野”之分，这是人们常有的知识。但是同是临摹过碑帖、书法造诣很深的人，其书法又有不同的风格，这也是人们常见的现象。究其原因，有很多方面。诸如临摹碑帖不同，性趣、爱好不同等等。不过，人的胸襟、见识对于书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又是人们公认的事实。颜真卿、岳飞胸怀祖国、气宇轩昂，他们的书法就表现出了一种宽博豪爽的大将气度。张旭、怀素见到公孙大娘的娴熟的舞剑，深受启发，书艺大进。毛泽东一生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其胸怀之宽广、见识之广博，世人共仰。这无疑对他的书法，特别是草书，有着不可估量的裨益。

五、善创造

大凡有成就的书法家，都经过临摹碑帖这个阶段。毛泽东的确是临摹过不少碑帖的，这在前边已经谈过。不过仔细分析一下，他学怀素最力，特别是草书，受怀素《自叙帖》影响最大。拿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自叙帖》相较，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很多字不但形似，而且神似。如毛泽东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的“开”、“古”、“为”、“得”等字，和怀素《自叙帖》中的“开”、“古”、“为”、“得”等字，就属于这种情况。其余的字，即使是形异，也确是神似。总的来说，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相同的地方：一是笔画都较细圆；二是字形都较长；三是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透旭、翩翩自肆的写法，四是在“神”上很相似。但是，毛泽东又不囿于怀素《自叙帖》，他善于创造。他说：“帖中要发挥”。他临摹碑帖多，见识广，能博采众长，特别是加上他博大的胸襟、领袖的气质，在书法上他又加进了不少自己的东西。这就在笔画上、结字上与怀素《自叙帖》又有所不同。怀素《自叙帖》的笔画细圆遭劲，毛泽东的笔画细圆柔韧；怀素《自叙帖》的结字较长，毛泽东的结字长中多欹侧。因此，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使得毛泽东写出的

字，毛泽东的书法作品，几乎是人人一望而能够比较容易地辨认得出。但是，在书法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并非不需要花大气力就能朝夕形成，这要有很深的造诣。毛泽东的才分、勤奋、胸襟、见识、学养、气质等诸多因素，使他在书法上形成自己的风格，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笔者认为，如果说怀素的书法风格是“超迈”，那么毛泽东的书法风格则是“飘逸”。怀素的《自叙帖》所表现出的豪迈气概超出一般书家，非一般书家所能及；而毛泽东对此帖发生了如此浓厚的性趣，下了如此深厚的功夫去临摹，正表现了他的豪迈气概。在临摹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飘逸”的书法风格，又使得他的书法表现出的深远的意境、超凡的气势、仙人振袂似的美丽多姿，非一般人所能企及。打开《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哪一幅作品、特别是草书作品，不是意境深远，气势超风，如仙人振袂美丽多姿呢？

另外，毛泽东的书法自然。看他的作品，似乎给人这么一个感觉：他挥洒自如，无意求好，但结果却好。这的确给刻意求好、作品却显矫揉造作的作书者树立了榜样。还是李白说得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书法还是不失自然为好。

五

书法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它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很多书法家不畏艰辛，奋进不止，在书法上获得很大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著名的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就是书法家中的佼佼者。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领袖在书法上获得如此的成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有志于书法的人们学习的榜样。

（本文系袁宗轩所作）

毛泽东书法墨迹原作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

秋收起义旌旗奋 罗霄井冈建红军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之后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领导湖南秋收起义。毛泽东到达长沙后，立即向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同省委领导一起详细讨论研究了有关起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确定了湖南秋收起义的具体计划，成立了秋收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1927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具体部署了发动起义分路合攻长沙的计划，将武昌原国民政府警卫团编为第一团，安源煤矿起义的工人自卫队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编为第三团，将流落在鄂南的一部分旧军队和通城、崇阳的一部分农民自卫军编为第四团，共同组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9日，震撼湘赣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是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的，中共湖南省委发动长沙工人赤卫队和近郊农民首先起来，破坏了岳阳至株洲的铁路交通。与此同时，工农革命军四个团，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向长沙进击，并先后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但是，当时整个革命形势已开始趋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起义军某些指挥员缺乏经验和警惕，措施不利，第四团中的旧军队在进攻平江时临阵叛变，以致起义先后受挫。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集合了受挫后的起义部队，召开了前委会议，分析了当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攻占长沙这一中心城市已不可能，决定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南进途中，在江西芦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三湾改编第一次把支部建立在连上，并成立了营以上的各级党委，建立了党代表，选举了士兵委员会，建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部队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湘赣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区域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毛泽东指出，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党和军队要执行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设根据地三项任务；并把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还正确地提出了团结当地农民武装力量和土客籍群众共同建设根据地的方针。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以天险的茨坪、大小五井、茅坪等村庄为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向井冈山四周的永新、宁冈、遂川、茶陵、酃县、桂东、莲花等县出击，扩大根据地。从文家市到茨坪，历时一个多月，辗转作战，终于将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呢？因为：（一）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而罗霄山脉南接广东、北衔湖北，东西分界江西、湖南，一切革命的举动都足以影响湘、鄂、赣三省的工农群众。（二）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并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三）井冈山上村落，出产稻米和各种杂粮，四周连接着物产较为丰富的地区，便于红军筹款、筹粮。（四）井冈山位于江西的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和湖南的茶陵、酃县等县之间，以宁冈为中心，周围五百里，纵横八十里，峭壁耸立，森林蔽天，只有五条坎坷崎岖小道通向山里，形势险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因此，是

很好的军事后方根据地，最有利于红军的军事割据。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经过十分艰苦的斗争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到达边界时，党的组织已全部被敌人破坏了，群众革命情绪受到严重挫伤。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首先恢复和建立边界各级地方党组织，还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充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带领边界军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因陋就简地办起了红军医院，自己上山采药，村村办起熬硝盐厂，自己动手熬硝盐，自己种棉花，纺纱织土布，实行正确的工商业政策，开办红色圩场，繁荣根据地的经济。这样，根据地的红军和人民，依靠包己的力量，采用种种办法打破了敌人的反革命经济封锁，渡过了艰难的岁月，赢得了创建红色政权的胜利。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一支完全新型的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人民军队成长发展了起来。红军中严格实行党代表制度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发展大批工农战士入党；坚持实行民主制度；加强部队的阶级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正式宣布了红军的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又提出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以后逐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纪律，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和团结人民起了很大的作用，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使军队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927年底，毛泽东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上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这样，就使红军从根本宗旨上区别于任何旧式的军队。由于群众武装、地方武装的组织不断扩大，从而创立了正规红军、地方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开展了真正的人民游击战争。在1928年4月朱德率部和毛泽东会师后，适应当时的情况，又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人民游击战争的基本战略战术，为日益发展的武装割据的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军共八千余人，在宁冈砬市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名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尤其是6月23日龙源口大捷，歼敌一个团，打垮两个团，缴枪千余支，取得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达到边界全盛时期。

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区域的进军，以及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八一”起义和湘南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会师，创立和扩大井冈山根据地，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结合起来的最好的典范。这个进军是在革命暂时失败的形势下，革命力量被迫从城市退却下来，正确地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革命基础深厚的农村，特别是数省边界的边区，地势险要的山区，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边界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创建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

黄洋界上炮声隆以一当十败敌兵

1928年4月至7月，在湘赣边界，由于贯彻了毛泽东当时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军事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根据地区域一天比一天扩大。可是，当时的湖南省委却采取错误的冒进方针。7月17日省委代表杜修经乘毛泽东不在酃县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只知形式地执行省委要红四军去湘南的指示，造成二十九团全部损失，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历史上的八月失败。

正值二十八、二十九团要去湘南之际，毛泽东便率领三十一团两营兵力，在永新阻击吉安来犯之敌，“在广大群众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井冈山的斗争》）从俘虏身上搜到敌军命令，8月1日敌人以六个团兵力直取宁冈的作战计划，终于被红军打破，未能实现。

可是狡黠的敌人乘我去湘南部队攻打郴县受挫，便向我猛攻，红军不得不退出永新。8月中旬，部队按毛泽东的部署，在永新、莲花、茶陵边境集结。

部队到达集结地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便召集连以上干部讨论行动问题，并总结永新阻敌的经验。但突然得到我军在湘南失利的消息，毛泽东当即决定，由他亲率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桂东去迎还大队，命令第一营坚守井冈山。他说，五百五十里井冈山的地势好，有红米南瓜吃，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党恢复了，群众起来了，这是很好的割据地区，我们在这里有了依托，可以进退自如地打胜仗，扩大割据地区，敌人对我是无可奈何的。若失掉井冈山，我们将会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了。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率第三营取间道向桂东去了。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布置了第一营和团部特务连的工作后，就带着团直属部队到井冈山部署防务去了，一营和团部特务连留在当地打游击，做群众工作，保卫红色政权，牵制与迷惑敌人，密切注视着湘赣两省敌人的动向。

情况紧急！湘敌第八军一个师配合其主力在桂东与我二十八团激战，从酃县进攻宁冈，奔袭井冈山，夺我根据地；妄图迫使我军在白区作战遭受失败。一营营长陈毅安得此情况后，留第二连、团部特务连坚持当地工作，率领第一、第三两连，用急行军的速度，于8月29日赶回小井，执行保卫井冈山的任务。部队一到小井，当即进行紧张的战斗动员。根据当时毛泽东坚守井冈山的指示，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讲明了敌我形势、作战任务、应有的精神和各项注意事项。经过动员，指战员个个摩拳擦掌，精神抖擞，誓死保卫井冈山。后方医院也进行了动员，轻伤兵员要求重返前线杀敌，重伤兵员充满了胜利信心，处之泰然。儿童团、少先队也全部动员起来，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严防敌探进出。赤卫队持各种旧式武器，夹杂着少数钢枪，担任警戒，准备配合作战。妇女们组织后勤队，为前线服务。全体军民决心为保卫井冈山而贡献一切。正是“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了。

第一、三两连准备好了，就从小井出发，跨过一千四百三十米高的山峰，进到黄洋界阵地。黄洋界位于井冈山北面，海拔一千三百四十三米，距小井十五里，只有荆棘丛生的一条小路可通。黄洋界左侧山峰高一千三百五十一米，与八面山相连；右侧山峰一千二百六十八米，可通往茅坪；背面（东）

山峰一千五百五十八米，与桐木岭连成一气。西面是敌人的进攻方向，地势很低。山峰之间，如万丈深谷，极为险峻，真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了。

湘敌第八军一个师从酃县经宁冈之睦村、大垅、桥林、陈家全、源头村，到腰子坑，距黄洋界约三千米，这是我军防御的主要方向。从酃县到源头村，只有一百一十里路，相距可以说不远，但酃县东南部，即是边界割据地，井冈山是边界割据地的腹地，这里有巩固的红色政权，深入地分配了土地，武装了群众，敌人不敢轻易来犯，即便是胆敢来犯，在我军民的英勇抗击下，必遭灭顶之灾。

黄洋界哨口，是井冈山险要哨口之一，它与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上岭四大哨口相配合，构成井冈山的全面防御系统。从茅坪到黄洋界，沿途山高路远，构筑了防御工事。赣敌熊式辉师一个团，虽然已进到宁冈新城，有三十二团袁文才部在茅坪以北游击阻敌，束缚了敌人手足，难以同时来进犯。只要派出警戒取得联络就行。其它四大哨口，有三十二团王佐部和赤卫队警戒。各哨口都筑了防御工事，无后顾之忧。就黄洋界来说，指挥阵地的工事，就筑在哨口通小井一个稍低的山峰上，营的指挥所就设在那里。山峰下的小道上，有一棵大树，毛泽东、朱德行军或运粮上山，常在这棵树下休息。从黄洋界向西伸出一个小山梁，好象一个舌头，由高往低向前延伸约一千五百米，山梁上小竹、灌木、茅草丛生，草丛里都插有削尖了并用火烤过的坚硬锋利的竹钉，平常无人行走，哨口工事按坡度前低后高的地形，构筑几道壕堑。壕墙很厚，都用石块和土坯筑成，高出地面一米多，相当坚固，且是垛形，便于隐蔽射击。每一个或两个工事，可容一班人，互为犄角。工事面前地形陡峭，我可依托着工事俯瞰射击敌人，敌人则无法接近我壕堑。

8月29日黄昏，敌人进到源头村，观察地形布置警戒。我军闻讯，即进入阵地。

8月的夜晚，山下虽然闷热，山上却很冷，凉风阵阵寒气袭人。战士们都睡不着，干部们便凑到一起聊天，议论用兵打仗的事，大家谈到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从国内到国外，从古代到现代，无所不及。最后大家谈起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事，异口同声地认为，在秋收起义中，余洒度不听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指挥，没有把第一团带到铜鼓集中行动，只顾招兵买马，结果被敌人假投降所欺骗，在平江长寿街附近的金坪，遭到敌人的埋伏，以致损失一个营。而第三团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进攻浏阳东门市、白沙市，连战皆捷，敌人败退达浒。但主要是因我兵力未能集中，敌军一营加强火力逆袭我三团，我不得不退至创阳排埠。敌人即转向浏阳县去打我孤立无援的第二团，致使第二团遭受惨重损失。这是余洒度不听毛泽东指挥，自行其是，分散兵力，致使我军遭到敌人各个击破的严重教训。只有毛泽东洞察当时革命低潮已经到来的形势，在文家市毅然决然地带着一、三两团进到罗霄山脉中段，创造了湘赣边界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才走上了前程似锦的光明大道。关于明天的战斗，陈毅安营长带有结论似的口气说，湖南的敌人以为我主力正在湘南和永新，山上无红军，是奔袭“空城”井冈山的好机会，因此，便轻装进到了黄洋界，想取胜邀功。我们处于地利人和的有利地位，是有后方的作战，可以持久地打；而敌人既无后方，又在我们根据地内作战，是不能持久的。毛泽东迎还了大队，如果从大汾插入敌后，敌人便会溃退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股敌人消灭一部或大部。若敌人早退回去，毛

泽东带着部队从遂川方面打回来，即使打不着这股敌人，也同样可以打败敌人而归。只要我们坚决按照毛泽东临别时的坚守井冈山的指示去办，艰苦奋斗，一定能够取得保卫井冈山的胜利！他的话，给大家增添了无穷的信心和力量。

8月30日，云雾散后，敌人爬上了小山梁，向我攻击前进。由于敌仰我俯，草丛里插了竹钉，敌兵只能一个一个缓慢匍匐行进，每一个兵又都要保持一定距离才能射击。敌虽以一个师人马企图偷袭井冈山，可是由于地形限制，使用在火线上的最多只能是一个营。我两个连的兵力进入阵地后，又加固了工事，做了许多单兵掩体，还拣了些石块，必要时作投掷用。我前沿壕堑是第一连的一个排，其余二排作第二梯队。第三连除向茅坪派出一个排警戒外，其余在阵地休息待命，敌人鱼贯式队形进攻无效，使用机枪射击掩护，然而低射妨碍它的士兵前进，高射则子弹在空中呼啸，无明确的射击目标。我则弹无虚发，每弹必打死或打伤一个敌人。敌人仗着人多，中午便更换了进攻部队，攻击也更猛些。但他们一连发起多次进攻，却未能通过小山梁介个隘路，有竹钉刺脚板，好似触了电，无法前进。跑也不行，爬也不行，哭的哭，喊的喊，倒下去的有的刺破身手，有的刺破肚皮，任凭长官怎样督促，敌人就是无法接近我前沿阵地，象这样的竹钉防线，不只在黄洋界有，在八面山上，在鹿寨底下，也布置了竹钉，以加强防御力量，事实证明，这种防线在井冈山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中是十分有效的。下午4时许，我红军战士们把南昌起义部队留在茨坪修械厂修理的八二迫击炮抬来了一门，放置在营指挥阵地附近，向敌人发射了三发炮弹，其中一发正落在敌指挥阵地爆炸了。敌人原以为我主力部队不在山上，听见我隆隆的炮声后，又以为我主力部队回到了山上，直吓得魂飞魄散。“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夜间，敌人乘云雾弥漫，我无法下山追击之际，逃之夭夭，溜回到酃县去了，困在宁冈新城之敌，则不敢越雷池一步。此次战斗敌人死伤三百余人，而我红军仅伤数人，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9月26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回到井冈山。当毛泽东得知我井冈山以两连兵力，按照他的指示，坚守井冈山，打退了十倍于我之敌的进攻时，非常高兴，挥笔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首光辉词章。他在11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我军之所以能够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不仅是由于我红军指战员英勇善战，根据地人民大力支援，井冈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临别时对坚守井冈山作了具体的安排，授予了“空城”退兵之计，正是：黄洋界上炮声隆，以一当十败敌兵。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特别是1930年七、八月间，红军大规模的集中行动，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在湘鄂赣闽诸省的统治。10月，蒋介石在战胜冯玉祥、阎锡山之后，随即调集重兵，对我红军和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而敌人的主要矛头是对着中央革命根据地。

11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以鲁涤平为总指挥，兵分八路，由北向南，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对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第一次“围剿”。

这时，我红一方面军四万人左右，由吉安经峡江向袁河流域推进，正在新余县罗坊、清江县黄土岗一带做群众工作。不久，红军总前委得悉国民党军队已向我根据地发动进攻的消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立即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红军反“围剿”的方针问题。会上，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红军历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提出了撒开两手，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作战方针。11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罗坊园前村红军总司令部，签发了东渡赣江、实行“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消灭之”的命令，具体部署了红军的作战计划。

11月上旬，敌人开始进攻。敌人占领吉安后，即由赣西尾追红军过江，沿赣江和抚水之间地区，自此而南向我根据地进犯。敌人从吉安到建宁，建立了长达八百里的弧形围攻线，分东、西两路，西路由鲁涤平的第九路军负责，由张辉瓒担任前线指挥，这是“围剿”的主力；东路由朱绍良的第六军负责。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则由赣江西岸的萍乡方向远道赶来，从永新和万安向泰和推进。

敌人气势汹汹，妄图依靠兵力、武器的绝对优势速战速决，因此急于寻找红军主力作战。但我红一方面军遵照毛泽东制定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方针，就是不与敌人交战，几次使敌人扑空。12月1日，红军主力已全部集结于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养精蓄锐，待机破敌。

12月24日，红军总司令部发现敌谭道源五十师于午前11时到达源头、上潮、芦峰岭一线，有继续入侵小布之势，当即由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签发了红字第九号命令，“决定明（二十五）日先歼灭来犯小布之敌”。

为了做好战前的动员工作，第二天，总前委和红军总部在小布举行了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主席台两旁柱子上，挂着一副醒目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后撤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最后他满怀信心地宣布：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大踏步地进退，敌人已掉进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胜利就在眼前！

毛泽东那振奋人心的话语，给予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

会后，红军立即由小布出发，轻装向北运动，在通往源头的道路两旁埋伏下来，“专候”谭道源由芦峰岭下山。

谭道源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谭师进入我根据地后，进展缓慢，一则因

为根据地处处坚壁清野，寸步难行；二则谭道源小心翼翼，唯恐被红军歼灭，直到2月26日师部才进驻源头。源头在宁都、永丰两县边界芦峰岭的山腰，夹在庐木峰和牛姑之间，是一条狭长地带，上下山只有一条小道可通，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谭道源到了源头，便不敢再向前走了。谭道源师刚到源头，红军就已经在源头通往小布的途中布下埋伏，准备歼灭它。

红军在那里一连等了两天，就是等不到狡猾的谭道源，只得撤回来。有的战士憋不住气，直接找到毛泽东，问他为什么不打就在鼻子底下的敌人。毛泽东耐心地给战士解释，说明我们在小布地区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引诱敌人来钻，可是敌人始终不脱离所守的坚固阵地，如果我们硬攻，伤亡代价就很大，现在撤回去，再等机会等等道理。

小布设伏，没能使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就范，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却向龙冈逼近了。红军总部当机立断，决定攻打张辉瓒。

夜已经很深了，毛泽东与朱德依然在昏暗的油灯下研究具体作战方案，最后，毛泽东紧握的红铅笔，在作战地图龙冈周围，画上了一个大红圈。于是一个集中兵力、全歼敌人的大歼灭战即将开始了。

张辉瓒率领的十八师，兵员充足，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曾有“铁军”之称。这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张辉瓒奉蒋介石、鲁涤平之命，负责前线指挥，他决心打几个漂亮仗，以作为自己加官晋级的筹码。

正当张辉瓒率部由永丰向东固方向推进准备同公秉藩师、谭道源师会合攻击东固根据地的时候，由于我红军的主动撤离，公秉藩师已先期占领东固。张辉瓒比公秉藩晚一天到达东固，凌晨浓雾之中，张辉瓒误认公秉藩师为红军，强行攻击，激战四个多小时，互有伤亡。直到午间大雾消散，方知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干上了。

公秉藩挨了打，认为张辉瓒是妒忌他先占东固，抢了头功，一气之下，折回富田“休整”去了。张辉瓒孤军深入，不得不实行分兵，留下一个旅看守东固作后方阵地，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九千人马于12月29日到达了龙冈。

红军总部获悉张辉瓒师开抵龙冈的消息后，立即下达攻击龙冈张辉瓒部的命令，命令规定各路红军向龙冈方向攻击前进，乘敌正在运动之时，出其不意地将敌军全部围歼。

龙冈，属永丰县，位于永丰、吉安、兴国三县交界处。四面环山，孤江自南而北穿流其间，形成一个狭窄的冲积盆地，从地形看，和一个“瓮子”差不多。

12月30日拂晓，雾气蒙蒙，红军按照总部的安排，顺利进入预定阵地。

毛泽东和朱德向着海拔四百三十米高的黄竹岭指挥所走去，毛泽东一边走，一边风趣地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曹兵，今天，我们借晨雾，全歼顽敌啊！”两人爽朗地笑起来，周围的同志也笑了。

张辉瓒果然按照红军的预料，率师部和两个旅由龙冈向东行进，来钻为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口袋”。五十二旅刚走到表湖以东的小别大拱桥时，就遭到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军的迎头痛击。

敌人陷入重围，仍然垂死挣扎，作困兽之斗，仗打得异常激烈，敌五十二旅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向张辉瓒告急，张辉瓒派出一个团增援，又被红军截击，死伤大半。张辉瓒见大势已去，急命五十三旅抢占龙冈西南的万功山，

掩护师部向东固方向退却。但是，我红十二军抢先占领了万功山，把敌人压在了山下。

下午，第三军团和红四军的大部分队伍，分别从龙冈西北和东北方向包抄过来，把张辉瓒紧紧地锁在“口袋”里，形成了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形势。

下午4时许，红军指挥所发出了全面攻击的信号，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从四面八方冲向敌群，顿时，枪声、军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红军仅有的一门早先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大炮，这一次大大地派上了用场。

这一仗，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被活捉，他率的师部和两旅人马死的死、伤的伤、俘的俘，九千余人，无一人漏网。

事后，毛泽东曾满怀豪情地写下了他的著名词篇《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龙冈战斗，是红军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好典型。毛泽东谈到龙冈战斗时曾说过：龙冈战斗打得很理想。反“围剿”的第一仗，就全歼敌人，不漏一兵一卒，这在战争史上也是少见的。

龙冈战斗的胜利，充分地证明了红军从战略防御中改变敌我形势，从防御转为反攻，基本上是依靠集中兵力这一着。因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是战略上以少胜多，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最好的作战方法。红军反“围剿”，在战略上是处于防御、内线、被“围剿”的不利地位，但是毛泽东通过集中红军的兵力这一着，在战斗中使用了几倍于敌的兵力，便改变了进退、攻守、内外线的形势，在局部地区对被分割的、孤立无援的敌人进行个别的围歼，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蒋介石派了十万兵马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地进行“围剿”，红军却集中了四万兵力在龙冈围歼了张辉瓒的九千人马。这就叫做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这是“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正是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指挥作战上，才使得张辉瓒一败涂地。

红军旗开得胜，第一仗就歼灭了所谓的“铁军师”。老奸巨猾的谭道源，听到张辉瓒被活捉的消息，如惊弓之鸟匆匆由源头向宁都县的东韶撤退，企图向东路军靠拢，挽救其所将被歼的命运。

1931年1月2日，红军总司令部在小布颁发了追歼谭道源，进攻东韶之敌的命令，决心要把谭道源师歼灭在东韶这块四面环山、道路狭小的洼地之中。

红军战士发扬了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冒雨勇猛追击。担任诱敌任务的小部队和地方赤卫队截住了谭道源的后卫团，歼敌两个营。第二天，红军主力就追上了谭道源。

1月3日清晨，红十二军在浓雾的掩护下接近敌人，发起了攻击。谭道源刚刚率众退到东韶，未得片刻喘息，就被迫仓猝应战。我第三军团、红三军不久也陆续赶到，几支部队一起对敌人进行猛烈攻击，敌人阵势大乱，官

兵竞相溃逃。别看谭道源前进动作不快，逃跑却不慢，一直逃过南城，跑到了抚州。

这一仗，歼敌两个团。

红军五天内打了两个大胜仗，歼敌一个半师，共一万三千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从实践中证明了毛泽东制定的诱敌深入方针的正确性，红军实行诱敌深入，虽然暂时丧失了一些土地，在一部分人家里打烂了一些“坛坛罐罐”，换来的却是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敌人的“围剿”，武装了自己，不但恢复了失地，而且扩大了根据地。

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并不甘心，1931年2月初，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去江西，代行总司令职权，重组南昌行营，他从各地搜罗了二十万杂牌军，开始了第二次“围剿”；并疯狂叫嚣，要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

1931年4月1日，敌人以江西的宁都为主要目标，全线发动了进攻。敌人吸取了第一次“围剿”“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失败的教训，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作战方针。敌人为了防备冒进深入，被红军各个击破，规定部队每天行进五里、十里或二十里，而且在大队人马行进的前一天，要预先进行侦察。每到一地，马上修筑坚固的工事。

4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从黄陂来到宁都西南面的青塘。在青塘，举行了苏区中央局的扩大会议，讨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会上，刚刚到达的王明派遣的代表们认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无法打破“围剿”，提出应采取“分兵退敌”的策略。毛泽东在会上详细地介绍了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全面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红军是能以少胜多，打破第二次“围剿”的。并提出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当时，虽然王明路线的代表们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最后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占了上风。

4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在青塘的红军总司令部下达了《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强调“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

王金钰指挥的敌第五路军，4月1日开始分左中右三路进攻，另一部巩固后方，维持交通。4月7日，右路的公秉藩师及王冠英旅侵占富田及固陂圩。这些杂牌军，害怕步张辉瓒的后尘，到了富田和固陂圩就开始大修工事，以免被红军吃掉。

4月23日，红军主力先后到达集中地，为了及时捕捉战机，红军大胆接敌，再向西移动四十里，集结于东固。

东固位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部，在吉安、吉水、兴国、泰和、永丰几个县的交界处，四面群山环抱，地势险要，这里又是著名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

东固、富田两地相距四十里，中间隔了一座大山，名叫白云山，山势陡峭，其中，九寸岭、观音崖是富田通向东固的两个必经的险要山隘。

红军三万多人隐伏在东固山上，等了又等，但王金钰和公秉藩硬是不肯出来。总司令何应钦多次督催逼迫，但胆怯而又狡猾的王金钰和公秉藩，用所谓大雨冲垮道路、桥梁等各种借口，死死地蹲在富田和固陂圩坚固设防的阵地里不出来。红军中有些人不耐烦了，要求快打。但毛泽东要求红军继续潜伏待机，一定要等敌人脱离阵地后，在运动中加以歼灭。

红军迫敌而居，在东固山区足足等待了二十五天之久，敌人终于脱离阵地，象蛇一样爬出洞来了！

尽管王金钰、公秉藩在富田和固陂圩徘徊观望，但是坐镇南昌督战的总司令何应钦却发来一道又一道“金牌”，严令他们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之前，“如期攻下东固，树备路之先声”，否则，就要“取消番号，撤职查办”。

5月15日，红军初建的第一部电台抄收到了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电台的通报。从敌台的电报，从红军侦察员、地方群众向红军总部报告的敌军动态，都一致证实了，第二天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和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将分别从富田和固陂圩向东固进发。

敌人终于出动了！事实证明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总部的判断和决心是完全正确的。

于是，红军总部立即作出具体作战部署：派红三军为中路军，沿东固通中洞的大道前进，设下埋伏，准备奇袭敌公秉藩师；派红四军、红十二军为右路军，抢占九寸岭和观音崖，迎击敌人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另派第三军团为左路军，迂回包抄，直捣敌人的后方阵地富田和固陂圩，端他的老窝，断其归路。

晚上，黄公略正在红三军指挥所里，借着松明的微光，伏在军事地图上研究着行军的路线，他在思考着：敌人将在明天中午之前抢占制高点——将军帽，而我军如何寻找一条捷径，缩短行军时间，先敌到达将军帽呢？

就在这紧要的时刻，毛泽东亲自来到了红三军的指挥所，他和黄公略一起带着警卫员连夜去调查行军路线。经过一位七十多岁老农民的指点，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缩短半天行程的小道。红三军出发后，沿黄土坳、鸡公坳一带山径小道，直向桥头岗、伯佐、中洞穿进。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穿峡谷攀峭壁，终于抢先占了将军帽和接近中洞方向的几个制高点。在当地独立团、赤卫队战士的帮助下，又赶修了工事，严阵以待。

5月16日清晨，毛泽东身着旧灰布军装，肩上斜背着挎包和一把油纸伞；朱德背着竹叶斗笠，手里拿着望远镜，两人健步登上白云山的指挥所。这两位出生入死，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战友，每逢重大的战斗，总是在离火线不远的地方，亲自指挥作战。

白云山上，白云缭绕，一场关门打狗的战斗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那公秉藩从固陂圩吃过早饭便率领师部直属队出发了。由于山道狭窄，他们只好摆成一字长蛇阵，一千多人的队伍，他们就拉的有五、六里长。

敌军在山间艰难地爬行，隐蔽在白云山上的红三军，正待机破敌。

突然，发动进攻的信号枪声一响，红三军由山上以战斗队形猛冲下来，高山滚石，势不可挡。正在山间行进的敌军，遇到红军如此猛烈的侧击，兵力无法展开，机枪重炮也不能发挥作用，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横七竖八地倒卧山道两旁。那些尚未死伤的官兵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晕头转向，纷纷惊呼：“红军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呀！”

这时，红军在前，独立团、赤卫队在后，不断向敌人冲杀。

死到临头，敌公秉藩仍妄图负隅顽抗。他一面命令特务营组织抵抗，一面命电台发出紧急呼救信号。公秉藩指示位于他前后的两个旅“着率所部轻装跑步前进，支援山坑”，并且向邻近的敌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援电报。

但是，公秉藩是枉费心机，敌人苦心经营的富田、固陂圩的堡垒；已全部被第三军团攻占了；敌人囤积于该地的大批粮食、军火等物资，全部被红军缴获了，敌人的后路也完全被切断。而位于公秉藩师部直属队前后的两个旅，也落得同公秉藩一样的可悲下场。

在九寸岭和观音崖，红四军、红十二军同样向敌四十七师的王冠英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虽然，敌王冠英旅比红军早到达该地，抢占了两座山头，凭险顽抗。但红四军立即发动强攻，迫击炮集中向麇集山头的敌人猛射，为夺回这两个制高点，红军师长曾士峨和政委罗瑞卿站在火线前沿，指挥作战。罗瑞卿的腮部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伤势很重，但他顽强屹立，继续指挥部队。在红军指挥员英勇果敢的指挥和鼓励下，战士们手执刀枪，向山头冲去，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终于把敌人压了下去，打垮了敌人。

从白云山到富田，红军各路部队在几十里的战线上，展开了歼敌大竞赛。

这一仗，缴枪五千多支，机枪三十多挺，迫击炮三十多门。同时，还缴获了公秉藩自备的一百瓦的大电台。从此，红一方面军不但可以在内部用电台联络，而且可以同远在上海的党中央，以及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直接通电报了。

打胜了第一仗，红军胜利会师于富田。

王金钰所部郝梦龄师害怕被歼，连夜由藤田逃回永丰县城。为了追歼王金钰第五路军的另一个师——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大队人马，冒着大雨，由富田穿过圳头，直指水南。

敌郭华宗率部由陂下仓皇逃到水南，一看浮桥被炸过不了河，又从水南逃到白沙，准备天亮后继续逃跑。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红军击溃郭华宗驻水南的一个团后，5月19日天没亮就追到了白沙。兵分三路，立即发起攻击。郭华宗前临大河，后有追兵，被打得狼狈不堪，红军顺利地歼灭了郭华宗师一部连同逃窜到这儿来的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缴枪四千余支和大量物资。同时还缴获了两门七五山炮和一百六十多发炮弹，建立了红军的第一个炮兵团。

位于白沙东侧的是敌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的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

5月20日，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在宁都县的南团，接到南昌行营何应钦来电，奉命驰赴沙溪增援王金钰的第五路军。5月22日，高树勋师在中村被红军紧紧包围。战斗进行了两天一夜，23日上午，红军发起总攻击，高树勋慑于被歼，急忙率领残部狼狈东逃。

红军在中村击溃了高树勋师，势如破竹，日夜不停地向东奔袭。

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和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分别被红军打垮后，东线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更感岌岌可危了。朱绍良为保存实力，除留胡祖钰的第五师守卫广昌外，慌忙率部向南丰撤退。胡祖钰则在广昌城内拼命地加固工事，修筑了一条五里多长的土墙，墙外加挖战壕，还修了许多碉堡，妄图坚守广昌。

5月26日，红军追到了广昌，把城团团围住。胡祖钰率领十四个团的兵力负隅顽抗，作困兽之斗。第二天，红军发动了攻城战，在红军猛烈的炮火轰击和奋勇冲杀下，敌军不得不丢掉外围工事，缩进城内。

这时，毛泽东、朱德到前沿阵地，亲自指挥战斗。他们同军以上干部共同仔细地研究和部署了攻城的方案。考虑到敌军已集中了十四个团的守城兵力，并且拥有坚固的防守工事，而红军的力量还不足以达到两倍或三倍于敌的绝对优势，一口吃不下这么多敌人，毛泽东决定，一方面集中兵力，采用声势浩大的总攻势逼退敌人；另一方面，网开一面，放一部分敌军逃去，以便迅速夺取广昌城，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打开通路。

27日傍晚，红军开始总攻。战地上，近二百挺重机枪和几十门迫击炮齐射，地方武装在煤油桶里点燃爆竹噼啪作响，城外大小山头上前来助战的城

郊农民杀声震天。守城的敌军不知道到底有多

少红军攻城，一个个吓得胆颤心惊，师部慌忙向朱绍良发出呼救的急电。

总攻发动以后，红军又悄悄地把广昌东北面的渡桥开放了，给敌军让出了一条逃命的路子。时不多久，敌人象潮水般地向这座桥涌来，桥窄人多，不少人被挤得跌下河去。

后来，红军对残敌展开了政治攻势，晚上9时，红军终于顺利进入广昌城。

广昌战斗获胜后，我红军一部分兵力北上追歼逃敌，毛泽东等人则率领主力部队一万多人向东进入福建，攻打建宁。

建宁是闽赣边界的一个重镇，山地纵横，地势险要，没有大的河川阻隔，行动比较方便，而且这里是闽西北的“鱼米之乡”，我党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对付敌人新的“围剿”。因此，毛泽东预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的一仗，就是打建宁。

驻守建宁的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共四个团，约七八千人，装备精良，号称“福建第一师”。当刘和鼎得知广昌城破，红军向建宁进军时，便破坏了通向石城、宁化的木桥，烧毁河里的船只和竹筏，闭城严守。

但是，红军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建宁。5月30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向县城发起攻击。红三军团在大雾中迅速地对各个山头上的守敌进行分割包围，夺取了外围阵地，一直打到了城下。这时，红十二军也迅速从右翼截断敌人通往宁化的道路，占领水南东面山头。经过半天的战斗，红三军团从西门、北门突破缺口，红十二军也从南门突破缺口。敌军被迫涌向东门城楼和大桥，仓皇逃命，刘和鼎从建宁逃到将乐，他手下的七八千人马，连同被红军俘获后释放的在内，总共只剩下了五六百名残兵败将。

从5月16日开始，到5月30日结束，十五天中，红军由西向东横扫，走了七百里路，五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彻底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大“围剿”。事后，毛泽东曾赋词一首，以记其事，即《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七百里横扫敌军，生动地反映了红军打运动战的鲜明特点。这种大步前进，大步后退的运动战，毛泽东用极简单的话概括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运动战，而不打阵地战，这在红军没有扩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一切的“走”，又都是为了“打”。走，你就打不着我，打，我就看准了打，集中优势兵力狠狠地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你消灭。

风云滚滚我谈笑 卅万敌军任我调

蒋介石第二次“围剿”惨遭失败后，仍不死心，再次纠集三十万重兵，自任总司令，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但是，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和“磨盘战术”，大胆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一周之内，连续三战，三战皆捷。敌军始终扑朔迷离，不知我军主力所在。起初，我军巧妙地穿过敌军空隙，大踏步东进以后，敌人依然驱兵向西、向南急进，日夜辗转于兴国以北的崇山峻岭中，直到我军在莲塘、良村、黄坡给了他们一连串沉重打击之后，才恍然大悟，连忙转旗向东，向着我军主力合击过来。

敌军采取大包围态势奔向黄坡地区。其部署是：陈（诚）罗（卓英）挺进纵队四万余人，由西北长驱疾进；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挺进纵队四万余人，由西南方向逼近；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三师跟踪而进；孙连仲军两万余人由东南，朱绍良的左路军由正北和东北方向猛力进迫。

蒋介石以为使用如此优势大军，分进合击，抓住红军决战，一举消灭之，是毫无问题了。

这样想有他的道理。当时，我军兵力不过三万余人，而且刚刚经过二次反“围剿”的大战和莲塘、良村等连续战斗之后，部队尚未得到休整。而敌人的兵力超过红军六七倍，且又经过严密部署，从四面八方包围奔杀过来，气焰十分嚣张。

大敌当前，怎样才能挫败敌人的狂妄企图、达到歼敌的目的呢？多谋善断的毛泽东，沉着地命令部队在山里休息，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研讨情况，制定胜利的决策。

部队一休息就是三天，这三天真是不简单啊！了解敌情的同志个个心绪忐忑不安，注视着侦察人员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有毛总政委在这里，一定有办法制服敌人。

红军总部住在杨寨村，连日来，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在总部办公室地图旁研讨军情，听取侦察员汇报敌情，谋划着打败白匪“围剿”的通盘大计。

不平凡的三天即将过去，然而情况愈来愈严重。在总部的军用地图上，蓝色箭头形成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情况正在飞速恶化……

第三天下午，黄公略、罗炳辉等领导同志，都齐集在总部开会。直到天将黑时，毛泽东宣布会议暂停，并发出了出发的命令。

部队出发了。总部同时也离开杨寨村，向南翻过几座山。部队走了约二十多里路，来到永丰、宁都、兴国三县交界的地方，毛泽东命令部队停下来。这是一个峡谷的谷底，毛泽东叫传令兵把地图铺在沙滩上，点亮马灯，压着地图纸角，首长们再次围着地图坐下，继续开出发前暂停的会议。经过认真地分析敌情，毛泽东最后决定：十二军向东北方向佯动，吸引敌人的注意，诱惑和调动敌人，将敌人牵走；我军主力通过兴国那个缺口，跳出合围圈子，进到泰和附近，荫蔽休整，以便以逸待劳，歼灭敌人，粉碎“围剿”。同时，又亲自向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仔细地交代了任务，要十二军一路上扬旗鸣号，大张声势，诱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由此突围，吸引敌人出击，以调动和分散敌人。

十二军在罗炳辉军长和谭震林政委的率领下，穿过敌人空隙之后，一路浩浩荡荡，向北直插，果然，蠢猪似的敌人跟着来了，我军又怕把敌人甩得太远，便走走停停，保持不即不离状态，紧紧地牵住了敌人的鼻子。

行军逾夜，天色大明，敌人的飞机跟上来了，在十二军行军纵队上空嗡嗡乱转，左歪右斜地向下侦察。

为了更有效地诱惑、麻痹敌人，上级传来了命令：“拉开距离，旗子打开！”于是，部队的距离拉的更长了，一个连拉成一个营的架子；有红旗的展开红旗，无旗的拿出了各种花色包袱皮，高高地摇晃着。走到尘土多的地方，战士们故意象孩子们那样跳跃前进，荡起浓厚的尘土，漫天飞扬。从空中和远处一看，红旗招展，烟尘滚滚，人喊马嘶，气魄洽大，简直不是一支不足万人的队伍，而是一支几万人的大军！飞机乱转一阵之后，便得意地回去报信。

为了进一步贯彻好毛总政委的指示，红十二军上下一致行动起来，为敌人设下了更多的“圈套”：在我军行经的道路上，每逢岔路口，都用石灰画上箭头，写上“三军团由此前进”，“四军团由此向北”，“……”；一到宿营地，便忙个不停，只要会写字的，就都拿起粉笔号房子，见门就写。围追我主力的敌军全部被十二军牵着鼻子拖了出来，而我主力却安全到达预定地区开始整训。

为了使主力部队能创造更有利的歼敌战机和进一步疲惫敌人，红十二军的行动又作了新的部署：哪座山高就翻那座山，哪里道路险峻就从哪里走。江西到处是绵亘起伏的山岭，山路上荆棘棱石遍地。这对于行装笨重、补给困难、又缺乏山地行动素养的大队敌军来说，简直似难耐的酷刑；但对于艰苦奋斗、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来说，却算不了什么。

十二军拖着敌人经白沙、藤田转到安乐的大、小金竹，离东韶十多里路时，发现敌人后续部队已到东韶，我军仍不进东韶，而在东韶以北十里森林地区埋伏起来；黑夜派出一部兵力奔袭东韶，佯攻敌人。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到达，怕被我消灭，就在当夜仓皇溃逃。我军当即追击敌人，歼灭敌人后尾梯队一部，从容地收复了黄陂、小布根据地。

我军主力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兵强马壮，士气旺盛。敌人已精疲力竭，士气低落，蒋介石下决心撤退了。

毛泽东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向全军发出命令：立即出击！英勇善战的红军，在毛总政委的英明指挥下，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终于以只有敌人六、七分之一兵力的劣势，取得了歼灭敌人、恢复与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的全面胜利，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

声东击西有主动 四渡赤水出奇兵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几乎陷于绝境的红军开始神奇般地恢复活力。四渡赤水就是恢复毛泽东领导地位后的第一个漂亮仗。

1935年1月19日，第一方面军从遵义出发，向川黔边境的赤水前进。当时，红军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险恶。蒋介石为阻止我军北进或东出湖南，纠集了其嫡系部队和各路军阀一百五十多个团共约四十万人，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区。前面是敌军把守的长江天险，后面是围追而来的敌人重兵，红军能否跳出国民党的重兵包围圈，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毛泽东胸怀全局，高瞻远瞩，作出科学的决策：灵活机动，避实就虚，避强击弱，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使敌人造成错觉，继而调动敌军，乘隙脱险。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变被动为主动。1月下旬，一方面军进抵赤水河畔的土城，击溃了守敌，又给从北面赶来的敌军以重大杀伤，红军由上城、元厚场一带一渡赤水河。进抵离长江几十里的四川叙永，积极准备渡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由于在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自作主张，破坏了统一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各省军阀，集结重兵封锁长江，阻止一方面军入川，同时对红军形成大包围。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如果继续北上硬攻，将对红军极为不利。毛泽东果断地决定放弃原来的渡江计划，命令部队西进至云南的扎西（即威信）地区，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

红军在扎西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宣传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力量。蒋介石发觉后又急急忙忙调兵遣将，追赶而来。但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出奇不意，乘贵州境内敌人空虚之际，突然又从扎西挥戈东指，2月中旬在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二渡赤水河，再度进入贵州，把敌人远远抛在长江两岸，红军进入贵州后，迅速占领桐梓，直取娄山关。

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最高峰，是桐梓通遵义的必经关口。地势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敌人有一个师的兵力把守，妄图凭借天险进行顽抗。但还是被我英勇善战的红军打垮了，一举夺取了娄山关。

红军通过娄山关，直抵遵义城下。从桐梓、娄山关退下来的残兵败将，龟缩在遵义城内。红军一阵猛打猛冲，迅速登城，城内的八个团，被彻底歼灭，红军再次占领遵义城。

红军回师的巨大胜利，大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的蒋介石急调两个师，杀气腾腾直奔遵义而来。红军再次同敌人展开激战。当时，天下大雨，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同敌人反复争夺遵义南面的制高点——老鸦山主峰，战斗异常激烈。入夜，红一军团从西侧插入敌人队伍中，霎时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陷入红军的重重包围中，顿时乱作一团，慌忙向南溃退。红军乘胜追击，直达乌江北岸。

这次，红军在遵义地区共歼灭和击溃敌人达两个师又八个团。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毛泽东的光辉诗篇《忆秦娥·娄山关》，就是这次战役的真实写照。

遵义大捷之后，蒋介石恼羞成怒，亲自到重庆“督剿”。他妄图故伎重演，采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老办法，用堡垒主义与重兵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压迫红军与遵义、鸭溪地区进之围而歼之。毛泽东洞察其奸，将计就

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的敌人前来围集，以利我军摆脱强敌尾追。蒋介石错误地以为围歼红军的时机已到，于是命令他的军队火速向遵义逼进。为进一步迷惑、调动敌人，毛泽东率红军又突然北进，在茅台一带三渡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装着北渡长江的态势。蒋介石扑了一个空，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赶紧调集大军堵截，并在云、贵、川边境大修碉堡工事，构筑封锁线，他的如意算盘仍然是围歼红军。不料，红军并没有渡江北去，待把敌人的兵力吸引到四川南部、贵州北部一带后，毛泽东又指挥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从四川南部重返贵州，在二郎滩、太平渡一带第四次渡过了赤水河，这就把敌人的主力全部抛在后面，使敌人的碉堡完全置于无用。

3月底，红军除留下一支部队在乌江以北地区牵制敌人外，大部分部队迅速渡过乌江，直向贵阳挺进。当时，毛泽东布置了巧妙的阵势：派出一支部队出击瓮安、黄平方向，装作东进湖南，和二、六军团会合的态势；而主力部队迅速向南移动，逼近贵阳城。红军部队打到贵阳城下，吓坏了正在守备空虚的贵阳城督战的蒋介石，他既害怕红军围攻贵阳，又担心红军东去湖南，于是便急调云南军阀部队开进贵州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以阻红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合。其实，红军既不要占领贵阳，也不是回师湖南，而是要经过云南迅速西去，渡金沙江北上。因此，毛泽东在布置这次战略行动时讲得很清楚：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蒋介石乖乖地按照毛泽东的指挥行动了。当敌人把兵力调集贵阳附近，云南十分空虚时，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乘虚从贵阳、龙里之间，迅速穿过湘黔公路，甩开敌人，大踏步地由黔南向云南前进了。

四渡赤水，是运动战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灵活机动，大踏步地前进，大范围地迂回，忽南忽北，声东击西，牵着敌人的鼻子转，迫敌陷于被动，使敌人穷于应付，疲于奔命，而红军的战略意图则得以实现。四渡赤水，是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的充分体现，它在中国战争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瞒天过海实堪夸 神机妙算渡金沙

1935年4月下旬，红军分三路从贵州向云南进军：一路是留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的九军团，他们胜利地完成任后进入云南，占领宣威、会泽，渡过了金沙江。另外两路是红军的主力，沿路翻山涉水，攻城拔寨，直逼昆明，云南军阀龙云一下子慌了手脚，因为他的主力部队全部东调增援贵阳，深怕红军乘机抄掉他的老家，他一面向蒋介石呼救求援，一面调动各地民团援救昆明。其实，毛泽东并不真要红军占领昆明，而是为了迷惑敌人，虚晃一枪，突然向西北方向的金沙江急进，准备渡过金沙江，以便摆脱后边的敌人。

金沙江属长江长游，蜿蜒穿流在四川、云南两省边境的深山狭谷之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惊涛拍岸，令人胆寒，两岸悬崖峭壁，形势异常险要。红军如果不能迅速过江，就有被敌人压在深谷中歼灭的危险。

这时，蒋介石一面急忙调遣军队增援云南，并亲自赶到昆明督战；一面派飞机在金沙江一线侦察红军的行踪。

红军一军团经武定、元谋，迅速赶到了当时川、滇的主要通道——金沙江边的龙街渡渡口。但此处因江面宽阔，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但为了迷惑吸引敌人，红军便伪装架桥，摆出一副渡江的架式。果然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将在龙街渡渡江，便集中全力围追，妄图围歼红军于元谋地区。当敌军麇集于昆明、元谋地区时，红军中央军委纵队和三、五军团分两路向禄劝方向的金沙江边急进，军委纵队、干部团抢占绞车渡，三军团抢占洪门渡，五军团殿后掩护。

5月初的一个黄昏，红军先遣队（干部团）火速赶到了金沙江江边的绞车渡渡口。这时渡口的船只已被敌人掳过江去，断绝了江上的交通。但先遣队却发现了敌探过江来侦察情况的小船，敌探不知哪里去了，便立即派两排红军马上乘小船悄悄过江。红军上岸后，两个哨兵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当了俘虏。摸清情况后，红军两个排立即兵分两路：一排往右扛国民党的一连正规军，二排往左订保安队。当一排赶到敌人的连部门口时，被敌人的岗哨发现了，刚捉到的俘虏按照红军的事先嘱咐作了回答。哨兵还没有问第二句活，战士们赶上前去，捉住敌哨的喉咙，冲进敌人的住院，踢开了房门，躺在地上的吸大烟的敌军还以为是兄弟部队发生了误会。当得知是红军“从天而降”时，一个个胆颤心惊，乖乖地做了俘虏。

当二排赶到保安队的驻地时，敌人正在打麻将，抽大烟。红军和船工机智地装着缴械的人骗他们开门。这些唯利是图的家伙听到有利可捞，马上出来开门。红军冲进去，把几十个保安队员全部捉住了。

红军迅速控制了绞车渡两岸的渡口，并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在渡口附近找到了七条小船，红军便从这里陆续渡江。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和组织了红军的渡江行动。毛泽东过江后，就在渡口边的一个潮湿的山洞里，日夜指挥着大队人马迅速过江。周恩来是渡江总指挥，他不仅协助毛泽东制定红军进军、渡江的路线，并亲自派遣突击队，抢占绞车渡渡口。当突击队过江后，他又派出一支部队沿金沙江北岸西进，迅速到达龙街渡口，阻击沿昆明经川康大道向北追击的敌人，掩护大部队过江，同时下令让一军团火速赶到绞车渡渡江。

绞车渡渡口，因为船少水急，红军渡江昼夜不停。夜晚，两岸燃起照明的熊熊火光，把江面映得通红。红军就靠这七条小船，经七天七夜，全部安

全地渡过了金沙江，过江后，便把江边的渡船全部烧毁。

当敌人赶到江边时，红军已经无影无踪了。金沙江滔滔东去，奔流不息，敌人只有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从此，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红军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转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古人的兵书上“三十六计”第一套胜战计中的第一计就是“瞒天过海”计。可以说，毛泽东率红军渡江中巧妙地运用了这一策略，佯装从龙街渡江，以此吸引敌人，实则赶向了绞车渡。正是：瞒天过海实堪夸，神机妙算渡金沙。

双管齐下兵分路 大渡河上争强渡

红军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后，继续向大渡河挺进。

安顺场是大渡河南岸的一个渡口，两边都是险峻的高山，部队在这深山中，没有回旋的余地，极易被敌人伏击歼灭。太平天国石达开所率全军，就是在这个渡口被清兵消灭的。

当时，蒋介石一面下令薛岳、周浑元等反动军队继续围追红军；一面下令四川军阀在大渡河沿岸修筑碉堡，布置防线，阻止红军渡河。蒋介石任命四川军阀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要他效法清代在大渡河边生擒石达开的四川总督骆秉章。

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毛泽东指出，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渡河算不得什么困难！毛泽东的话，给了红军指战员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红军先遣队冒着蒙蒙细雨在夜间火速赶到了安顺场。安顺场住有近百户人家，早有敌人在这里“等候”红军的到来，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来的这般神速，当先遣队到达时，敌人屋里还亮着灯光，隐约传出胡琴声和唱戏声。乘敌人毫无准备，红军很快地消灭了他们。

先遣队控制了安顺场渡口，积极准备渡河。但河边的船只已被敌人掳到河北岸去了，南岸边只留有一只作交通用的小船。红军从敌人手里得了这只小船，并找来了渡河的船工，决定进行强渡。次日上午，由十七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在连长率领和南岸我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乘一条小船，随着汹涌的波涛颠簸前进。北岸敌人对我渡船展开了猛烈的射击，子弹在船周围激起一串串浪花。但载着我勇士的小船依然劈涛斩浪迎着弹雨前进，小船一靠对岸，十七名勇士便立即登岸，向敌发动猛攻，很快打垮了敌人，控制了渡口的工事；小船又迅速返回南岸，继续运载红军过河，过河的勇士们猛撵敌人；敌人军心已乱，全部溃败。红军迅速占领了北岸渡口，乘胜追击，并在渡口下游缴获两只小船。但仅靠找得的几条小船，要很快渡过全部红军是很困难的，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央军委立即决定，红军一师继续渡河，沿左岸北上；主力沿右岸北上，直奔距安顺场三百二十里的泸定桥，以夺取泸定桥，然后通过大渡河与第一师胜利会合。

红军分左、右两路向泸定桥急进，5月27日，左路军先遣队自安顺场出发，翻山越岭，且战且走，第二天，突然接到军委命令，要他们在29日夺下泸定桥。时间只有一天，路程却有二百四十里。沿路不但有高山深谷，且有敌人阻拦，应当说，任务相当艰巨。为什么非要在29日夺下泸定桥？这是因为两旅敌人正在向泸定桥增援，如果比敌人到的迟了，红军渡河就更加困难。

赢得时间就是胜利。必须同敌人争分夺秒。红军立即加快赶路的速度。一路上，打垮了凭险据守的敌人，修好了被敌人破坏的桥梁。夜幕逐渐降临，最后变得伸手不见五指，这时又偏偏下起雨来。英勇的红军战士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冒雨急行军，突然，对岸山坳上亮出一长串火光，这才发现增援泸定桥的敌人，正在点起火把赶路。

摸黑赶路速度慢。于是，红军先遣队也点起火把前进。一点起火把，对岸敌人立即问话；红军回话时，巧妙地冒充是国民党的被红军打垮的队伍，敌人信以为真，糊里糊涂地同红军走了几十里。后来，雨越下越大，敌人经不起狂风暴雨的袭击停下来宿营了。这时红军先遣队一看正是大好时机，为

了早到目的地，哪怕风吹雨打，道路泥泞，沿着高山急流的曲径险途，继续向泸定桥急进。

一夜急行军，我左路军先遣队终于在拂晓抢先赶到了泸定桥，占领了桥西头。

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是四川通康藏地区的咽喉。桥是用十三根悬在空中的铁索联成的，两边各有两根铁索做桥栏，底下并排九根铁索，铁索上横铺木板做为桥面，桥头石碑上刻有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桥下激流奔腾，震耳欲聋。浊流从上游山峡间如瀑布倾泄而下，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礁石，激起无数的巨浪和旋涡。

桥对岸泸定城里驻着两个团敌军，桥头早已筑好了防御工事，并把铁索上的桥板全部抽去。敌人以为有此天险，万无一失，气焰十分嚣张。

为了迅速夺下这座桥，红军先遣队一到桥边便立即进行了战斗动员。战士们个个争先恐后，抢做夺桥的先锋。后来挑选了二十二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另有一个连携带木板，随后铺路修桥，下午，夺桥的激烈战斗打响了！

激越的冲锋号一响，红军二十二名突击勇士身背马刀，手持短枪，腰扎手榴弹，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攀缘铁索向对岸猛冲过去。霎时间，军号声，枪炮声，呐喊声，汇成一片，震天动地。红军勇士们扶栏突进，勇往直前。河水在脚下咆哮，子弹头顶乱飞，他们全然不顾，心中只有一个目标：杀过河去，夺下铁索桥！正当勇士们冲到对岸桥头的关键时刻，忽然东桥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原来敌人放火焚烧了桥头的亭子，妄图用烈火阻止勇士的前进，西桥头战友们的口号声给了勇士们有力的支援。勇士们个个发扬了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立即向浓烟烈火中猛冲过去，他们的衣帽着火了，他们继续前进，他们的眉发烧焦了，顾不得停一停。他们这种排山倒海、压倒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终于威慑、制服了敌人，胜利地占领了东桥头，打垮了守敌，一直冲到街上，同敌人展开巷战。敌人妄想反扑，这时红军增援部队已经过河，经过一番激战，敌人大部被歼，残敌抱头逃窜。我左路军胜利地控制了泸定桥，过河后和右路军取得了会合。

这样，红军主力便从泸定桥源源不绝地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军事上有句话叫兵贵神速，红军勇士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壮举，再一次证明，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完全能够战胜千难万险，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狭路相逢勇者胜 突破天险腊子口

1935年9月中旬，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渡过了水流湍急的白龙江，通过残缺而危险的栈道，到达了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四川进入甘肃的天险门户。两座高山夹着一道山沟，山沟宽约三十多米，两边是悬崖峭壁；山沟两峰之间，有一条水深流急的石沙河，河上横架着一座木桥，把两山连在一起。这座桥是过腊子口的必经之地。

常言说：“走过腊子口，象过老虎口。”甘肃军阀鲁大昌在这男驻有重兵把守。桥周围筑有许多坚固的工事，形成了纵横交叉的火力封锁网。敌人妄图凭借天险和重兵来阻挡红军的去路。从当时情况看，左右两边都有敌人的重兵，一边是胡宗南的主力部队，一边是杨士司的两万骑兵，红军要迅速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别无他途，只有通过腊子口这一条路。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经过研究后，决定夺取腊子口。先遣队接受了夺取腊子口的战斗任务。

入夜，夺桥战斗打响了！红六连三十多名勇士，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向敌人展开了正面猛攻。子弹象雨点般倾泻在敌人的阵地上，但狡猾的敌人龟缩在工事里一动不动，等我火力一停，勇士们开始向桥头冲锋时，敌人的手榴弹象雹子般扔了过来。由于敌人凭险顽抗，我方地形不利，连续几次冲锋，都未能奏效。

为了压倒敌人的火力，红军便进一步加强了攻击。轻重机枪象暴雨似地轰鸣，喷射出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但敌人一束束的手榴弹仍然不停地在我勇士突击的道路上爆炸，使我勇士难以前进。

毛泽东对突击队的战斗情况和力量配置十分关心，多次派人到前沿阵地了解情况。

红军虽然向敌人发动了多次猛攻，但一直没能接近桥头。后来部队决定让战士们暂时撤下来休息，准备再攻。

配合六连正面进攻的一、二连，在团长率领下，准备从腊子口右侧，包抄敌人的后路。但腊子口右侧的石壁非常陡峭，难以攀登。有位勇士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克服绝大困难，终于攀登了上去，然后用绑带当绳子，将战士们一个个腾空吊起来。

撤下来休息的红六连，在战地召开了党团员大会，组织了敢死队。挑选了十五名勇士，编成了突击小组，准备分两路向桥下集结，突击敌人：第一路从桥底攀桥柱运动到桥对岸袭击桥上敌人；另一路则在桥这边会同第一路，对桥上敌人实行两面夹击。

一场新的战斗又悄悄开始了。第一路战士，趁天黑慢慢地摸到桥下，再攀桥柱向对岸运动；途中因有人不慎掉下水，暴露了目标，敌人顿时向桥下猛烈射击，战士们无法前进，只得摸到一块岩石背后躲着，待机行动。另一路战士，在连长率领下，趁敌人往桥下扫射的时候，迅速冲到桥边，向敌人摔过去一排手榴弹；接着，冲进了敌人筑在桥上的工事，猛袭敌人，敌人没料到这一着，顿时乱作一团。躲在桥下岩石背后的战士，也纵身跃上桥面，拔出大刀，同桥上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右翼一、二连战士迂回也取得成功，冲锋号起，顿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炮声和呐喊声。

敌人被红军杀得晕头转向，以为自己已被红军四面包围，于是甩下枪支

没命地逃窜，勇士们胜利地占领了腊子口。部分残敌直向岷州方向败退，我红军部队乘胜追击，使得敌人狼狈不堪。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红军顺利攻占天险腊子口，就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所率领的军队完全是一支英勇顽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军队。

伤十不如断一指 直罗全歼先头师

1935年11月下旬，陕北已进入了寒冬。红十五军团在“打胜仗迎接中央红军”的口号下，一鼓作气，攻下了张村驿，打开了东村，接着扫清了附近的两个小据点。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来到了东村一带。从此，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了。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消灭红军计划的破产，预示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为了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大西北，毛泽东一到陕北，即首先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战计划，这就是直罗镇战役。

陕北的战局当时是这样：陕北红军取得劳山榆林桥胜利后，敌人以五个师的兵力组织新的进攻，东边一个师沿洛川、邠县（今富县）大道北上；西边四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邠县方面前进。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决定集中会师陕北的红军，在直罗镇一带，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并要求认真察看地形，再作具体的布置。

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前往直罗镇去看地形。大家首先登上了直罗镇西南面的一座高山。举目望去，直罗镇尽收眼底。它是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象一条白色的带子铺向镇子的中央，穿镇而过。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石头砌的寨墙却大部完好；镇子北半面，是一条流速缓慢而平静的小河。大家举着望远镜，从左到右，从东到西，细心地观察着道路、山头、村庄和河流。大家边走边观察，边观察边研究，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结论得出了：把敌人放进直罗镇，再消灭它。为了防止敌人利用镇东头的寨子作固守的据点，大家商讨后，决定把它预先拆掉。当天晚上，红十五军团派出一个营，连夜去拆那个小寨子。这时战斗命令虽然还没有下达，但战士们凭着自己的经验会猜测到，将会在这里打仗，同时坚信：有毛泽东同志亲自坐镇指挥，肯定能打个“瓮中捉鳖”的漂亮仗！

为了迎接这个大胜利，打好会师第一仗，红十五军团除留一个排在直罗镇警戒外，主力集结在张村驿一带，养精蓄锐，积极地投入了战前准备工作。各级干部层层深入，具体进行战斗组织。

红军情绪高涨，以逸待劳。一切准备就绪后，第三天下午，敌一 九师师长牛元峰带着部队在六架飞机掩护下，果然来到了直罗镇。

晚上，毛泽东下达了命令。按照已经确定的部署，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连夜急行军，在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毛泽东、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毛泽东的指挥所设立在距直罗镇不远的—个山坡上。战斗打响之前，毛泽东就特别指示各部队负责同志，一定要打歼灭战，战斗发起后，又一再嘱咐说：“要的是歼灭战！”

天刚亮，两路红军象两只铁拳，从直罗镇南北高山上砸了下去。敌人虽有防备，却没想到我军会如此迅速，及至发觉被包围后，直罗镇两边的山岭已被我军占领。南面—响枪，敌人立即向北撤，北边—响枪，他们又反过来向南扑。— 九师被夹击在两山之中—条川里。山谷中到处是枪声、喊杀声。— 九师是东北军的部队，是红军的老“运输队”了。有不少的士兵和军官曾经做过红军的俘虏，有的还不止交过—次枪，在我军猛攻之下，纷纷瓦解，交枪投降。—些拼命顽抗的，丧身于刀枪之下。

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军两路合攻，占领了敌人的师部所在地直罗镇。

最后牛元峰逃到镇东头的小寨里，指挥着一个多营负隅顽抗，死不投降。

这个小寨虽被我军事先拆毁，但敌人昨天下午到达后又连夜改修，加上地形复杂，易守不易攻。我们的一支小部队攻了一次，没能打上去。正组织第二次猛攻时，周恩来同其他领导从山上走下来。周恩来和干部们一一握手，详细地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恩来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他们。

枪声渐渐地平息下来。两边的山坡上，镇子里，到处堆积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到处聚集着俘虏兵。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个红军战士心里。

一 九师师长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要求董英斌解围。他哪里知道，董英斌派的一 六师还没到直罗镇，就被红军击溃了，并且在黑水寺被红军歼灭了一个整团。

晚上，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领残部突围向西逃跑，红军七十五师的战士，随即跟踪追击，一气追了二十五里，追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上，牛元峰率领的残部一个多营最后覆灭了，牛元峰也当了俘虏。

一 九师全师和一 六师的一个团的覆灭，彻底打乱了敌人进攻陕北的部署，迫使得敌人一 八师、一一一师不得不退回了甘肃境内；东路侵入杨泉源的一一七师也退出了郿县。陕北根据地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直罗镇战役，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与正确。

平汉线上败敌兵 釜底抽薪战火停

自1945年10月21日开始，至11月2日胜利结束的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是在毛泽东的部署和指导下，由率领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的刘伯承、邓小平具体组织指挥，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军为反击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举行的一次大规模歼灭战。该战役俘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二万三千余人，争取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领该军与河北民军万余人战场起义，粉碎了敌军沿平汉路对解放区的进攻，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了蒋介石以有力的揭露和重大打击，迫使他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

战役开始前的形势是这样：

1945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正式投降，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浇的蒋介石，却急急忙忙“下山”来要抢夺抗日战争的“桃子”，悍然对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对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我党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即巩固华北、争取东北、坚持华中）的方针。9月10日至10月12日，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上党地区粉碎了敌人的进犯，歼敌三万五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我党与国民党的谈判，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签订。但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不过是一个骗局，协定墨迹未干，他就一面密令所属“努力进剿”，一面将部分军队从空中和海上运送至华北等地，并且令其全力加紧从陆路推进，首要目标是抢占平津，夺取东北。在国民党向北推进的各路大军中，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所部的第三十军、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共四万五千余人，在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四十军军长）和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路北犯，并有第三十二军和伪军孙殿英所部跟进，其后续部队四个军，有的已进至新乡，有的正准备向那里开进。

为粉碎敌人的进犯，把好华北大门，确保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毛泽东决定由晋冀鲁豫军区以一部兵力截击沿同蒲路北犯之敌，并集中主要兵力歼击沿平汉路北犯之敌。

毛泽东在部署这次战役时，先后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晋冀鲁豫中央局，说明“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需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并且强调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他还对这次战役的任务区分和兵力使用作了具体指示。

我晋冀鲁豫军区根据毛泽东赋予的作战任务，对敌我情况和有利不利条件作了深入的分析，按照毛泽东关于“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的指示，决心集中第一、二、三纵队以及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军区的主力共六万人，并动员十万民兵和群众参战，准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作战，歼灭沿平汉路北犯之敌。

为便于集中力量从东西两面对敌人实施钳击，我将第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编为路东军；将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和太行军区、冀南军区部队编为路西军。另将太行军区一部组成独立支队，结合太行、冀鲁豫地方武装和民兵，先在黄河以北至安阳之间，采取各种方式滞敌前进，以争取时间掩护我

主力从上党和冀鲁豫等地向平汉线集中，并迫使敌人留置大量兵力于安阳以南的铁路沿线，减少其北进力量；等敌人通过漳河后，即以独立支队控制漳河渡口，阻止其后续梯队的增援，其余地方武装和民兵则继续钳制安阳以南的敌人。

整个战役共经历了阻击、合围、总攻、追歼四个阶段。

敌人的第一梯队三个军队新乡北犯后，求胜心切，沿途虽然遭到我独立支队、地方武装和民兵的不断袭扰打击，但由于没有与我主力接触，前进仍然比较快。10月20日，其先头部队已进占漳河边的岳镇、丰乐镇等桥头阵地，掩护架桥。为了保障我参战主力的集中，滞敌前进，我先行赶到临漳、南东方村地区的路东军的第一纵队于21日夜以一部奔袭敌人的先头部队，因被敌人发觉过早，在给他们一定杀伤后便撤出战斗。22日，敌人第一梯队的三个军分左、中、右三路开始北渡漳河，并以一部占领磁县，一部向南东方村进攻，主力则沿着铁路东侧前进，我第一纵队为不让敌人进入邯郸，以便尔后我主力在野战中予以歼击，除留下一个团在临漳以北地区阻敌外，主力赶到邯郸以南至东西向阳以北地区组织防御，坚决扼阻敌人。23日上午，敌人的先头部队在我工事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向我第一纵队的第一旅阵地展开攻击，我第一旅广大指战员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疲劳的精神，一边战斗，一边加强工事，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24日，敌第三十、四十军和新八军全部渡过漳河，倾注全力北犯。第四十军的第一六师等部，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向我第一旅阵地反复攻击竟日。我守军顽强抗击，以短促火力结合反冲击，打退敌人多次攻击。激战到黄昏时分，敌人用集中攻点的方式突入我阵地，但他们哪里知道，我参战部队已经大部赶到，对其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我第一纵队胜利地完成了将敌钳制在预定战场和掩护我军主力集结的任务。

我军主力到达后，便立即出击。但由于部队刚到，准备仓猝，当夜战果不大。25日夜，第二纵队全部到齐，再次出击，但由于敌人依据稠密的平原村落作掩护，并利用村落周围的树木设置鹿砦障碍，结合暗堡的火力封锁，使我进攻的效果仍然不理想。但这时敌人已被我四面包围，进退两难，在这种形势下，从新乡北进时就曾派人与我联系的敌新八军，更加动摇消极。26日，胡宗南的第十六军和孙连仲的第三十二军分别从石家庄和安阳南、北两个方向进行增援。

为了保证集中主力歼灭被围之敌，对于石家庄南下之敌，我增调太行军区一部在晋察冀军区一部协助下进行阻击，同时加强漳河阻援阵地；对于安阳北上之敌，我令太行、冀鲁豫两军区抽调中心区的游击队和民兵在安阳周围，开展游击活动进行牵制。对当面被围之敌，在其阵势未乱，兵力损耗不大，以及我后续部队到达之前，暂不与之决战，只以部分兵力利用夜间逼近敌阵，采取逐点割歼和渗入袭击等打法削弱和疲惫敌人。对敌新八军，又打又拉，促其反正。我军主力则养精蓄锐，进行战场练兵，研究战法，等后续部队到达后再对敌人发起总攻。对此，10月27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部署甚当。俟后续到齐，养精蓄锐，那时敌必饥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灭其一两个师，敌气必挫。”又说，“石家庄、新乡两处之顽共八个师，你们当面之顽共六个师，总计不过十四个师。在你们歼当面之顽一两个师，可能引起南北增援，你们须准备在连续多次战斗中总共歼灭四五个师，即能转变局势。”

10月28日，我后续部队全部到齐，各项准备工作也已就绪，于是便决定当日黄昏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在总攻前，我将围敌部队改为北、南两集团，北集团作为总攻的突击队，狠打敌四十军，并以西北和东南两面对打，重点是割歼已遭我打击、突出于其阵地北端的敌一六师。南集团钳制敌第三十军和佯攻敌新八军。同时，加紧对新八军的政治争取，由参谋长李达前往该军与高树勋进行谈判。我军发起总攻后，战至30日，先后攻克村镇二十余处，敌第四十军的第一六师大部被歼，第三十军也遭到我沉重打击。这时，敌人的南北援兵分别被我阻隔于漳河以南和高邑附近。为了坚决歼灭被围之敌，然后歼灭援敌，毛泽东又急电赵尔陆：“率六个主力团南进，协同太行部队歼灭由石家庄南进之十六军。”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高树勋率领其新八军和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起义。援军被阻和高部起义，对敌震动很大，使敌人失去战斗信心。

31日早晨，敌人的主力开始向南突围。由于我军预先估计到这一点，于是便有意让开了一条退路，在他们脱离阵地后，我便从东西两面多路出击，并以一部前出至漳河北岸进行兜击，以大量民兵密布各个交通要道捕歼逃敌。当日下午，马法五率领残部近两万人窜至南北旗杆樟、辛庄、马营一带企图据村顽抗。我当即集中优势兵力对其进行猛烈攻击。11月1日，我突入马法五的长官部，敌人失去指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我南北集团立即奋起围追堵截溃败之敌。11月2日，向南突围之敌，除少数漏网外，大部被我歼灭。南北援敌也闻风而退。

11月2日，毛泽东、朱德向率军起义的高树勋发去贺电。电文是：建侯将军吾兄勋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无论在什么时候，军事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燃起内战的战火，要实现和平，挫败国民党的猖狂进攻，在军事上给其重大打击，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毛泽东强调：“这个战役的胜利，关系全局极为重大。”并亲自部署和指挥了这次战役。我军的重大胜利，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同意签订停战协定。正是：平汉线上败敌兵，釜底抽薪战火停。

大敌压境疑无路 以弱胜强又一村

1946年9月3日至7日，我军进行了以歼敌整编第三师为主要目标的定陶战役，取得歼敌一万七千余人，活捉中将师长赵锡田的巨大胜利。这是在毛泽东直接部署和指导下，由刘伯承和邓小平负责指挥的一次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

1946年8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为了策应中原突围，配合苏中作战，突然向陇海路出击，一连打下了十余座重镇，攻入开封，共歼敌一万六千多人，控制了开封到徐州间的铁路三百余里。这拦腰一刀，砍乱了国民党在南线的作战计划，于是，蒋介石便集中了十四个整编师共三十二个旅约三十万人马，由白崇禧、陈诚在开封坐镇指挥，刘峙亲临前线督战，于8月28日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杀气腾腾地扑来。局势是十分严重的。敌人象把张开的大钳子，正向我军合拢，东路徐州绥署的五个多旅自汤山、虞城一线向单县、成武、丰县、鱼台地区进攻；西线郑州绥署的十个旅自封丘、开封、商丘一线向东明、定陶、曹县地区进攻。此外，在豫北的安阳等地区，还有大量的敌人配合作战。敌人的如意算盘十分明确，企图以三倍于我的优势兵力，乘我陇海作战后疲惫的时机，将我钳夹歼灭于陇海路以北、老黄河以南的狭窄地区。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究竟如何“挡”如何“掩”却往往由于军事指挥员军事艺术水平不同而使战争结果相差甚远。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毛泽东电示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陇海路北休整，诱敌深入，寻机歼灭。并指出对进攻的敌人，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胜，必须以三倍、四倍甚至五倍、六倍的优势兵力，先歼敌一部，再歼另一部，各个击破。

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面指示部队抓紧作战间隙休整，一面准备再战。他们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敌情，认为东路敌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装备好，战斗力强，而西路五个整编师中，只有整编三师是蒋嫡系部队，其余都是杂牌部队，如把整编三师诱到预定战场再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歼，敌人内部派系矛盾很深，其他杂牌部队不会积极支援，这时强敌变成弱敌，就好打了。整编三师一旦被歼，西路敌人必将震惊溃败；继而使敌人整个计划落空。于是便决定先打敌人的整编三师。

我军担任诱敌任务的是第六纵队，他们象磁石一样紧紧地吸住敌人，使敌人一步步迈向灭亡的深渊。但愚蠢的敌人对于勒在他们脖子越来越紧的绞锁却毫无察觉，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频频报“捷”。蒋介石的“嘉奖”电报接二连三地从南京发来，陈诚、范汉杰、刘峙等也都飞临前线督战。

敌整编三师师长赵锡田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似乎看到了军长的宝座在向他招手，他决心施展“雄才大略”，干一番“辉煌的业绩”。他驱其全部兵力，向北猛进。正当他蒙头转向往我军布好的口袋里钻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及时告诫前线将士：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要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必须集中三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将敌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刘、邓首长一面利用行军和作战的间隙，组织干部进行学习，使大家明确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指导原则：一面迅速对孤军深入的整编三师布下了天罗地网。

9月5日，敌整编三师已全部进入我预定战场，师部进至天爷庙，主力二十旅进至大、小杨湖，三旅进至周集。原来和敌整编三师并肩前进的敌整

编四十六师，被拦阻在四十里以外的曹县以南地区。这时，我二、六纵队为右集团，三、七纵队为左集团，向敌人展开分割包围作战。敌整编三师已陷入我重重包围之中。

当日下午，刘伯承来到六纵队司令部，召集纵队负责人会议，布置战斗。他要求当夜发起总攻，并提出用牛刀杀鸡的办法，集中六纵全部兵力，先歼驻在大杨湖的敌二十九旅五十九团，五十九团是整编三师主力的主力，人多，装备好。歼灭了这个强中之强的五十九团，就会使整编三师惊慌失措，士气动摇。这样的打法，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对这次战役的部署要求，会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进而把处于孤立状态的敌整编三师全部吃掉。六纵首长当即决定：由十八旅和十六旅四十九团担任主攻，十六旅和十七旅的一个团（另一个团在北面掩护十八旅主攻）配置在大杨湖东北四公里的大张集、范庄一线为预备队。

我军在天黑之后分头向前运动。五十二团从村东北进攻，四十九团由村东南攻击。五十四团任务最艰巨，他们迂回到敌人后面西南方向发起攻击。而他们的西面就是敌整编三师师部，战斗发起后，可能会受到敌人的夹击。五十三团两个营在他们南面，准备打援和掩护他们翼侧的安全。

我向大杨湖之敌的攻击是9月5日夜11时30分开始的。进攻信号一发，枪弹、炮弹象一阵狂风暴雨压向大杨湖，攻击部队乘势冲向敌阵，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经过激战，五十四团首先从村西南攻进了村子，占领了两座院子；五十二团、四十九团也相继从东北、东南攻入，夺占了几间房子。

敌人的整编三师五十九团虽然战斗前由于受到我军的连日阻击，部队疲劳，伤亡也较大，但它毕竟是敌军中的强中之强。我部队一进攻便遭到敌人疯狂的火力阻击。战士们前仆后继，十分英勇，却仍然进攻受阻，五十二、四十九团都未进入敌人纵深阵地。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敌人反扑出来，再要进攻，困难就会更大，二梯队也将无法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我已攻入村子的部队一部分连续向敌人进攻，以攻代守，阻止敌人反扑，掩护另一部分构筑工事，掩护二梯队火速进入战斗。这样，他们便稳住了阵脚，为后续部队创造了有利的进攻条件。

五十四团的情况最为紧张。他们攻入村子，夺下两座院子以后，敌人便开始了猛烈的反扑，敌人迅速从四面调集了大批兵力，一齐向我夺下的两座院子集中开火，争夺异常激烈。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浴血奋战。七连长紧靠在一堵墙边，拼命堵住企图冲出的敌人，一口气扔出了一百多个手榴弹，英勇地战斗到最后一息。机枪手有的牺牲了，有的负伤了，三营教导员抱起机枪就打。团长、政委、参谋长等，和团部所有人员都投入了战斗。正在我五十四团与敌人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敌人的三辆坦克从整编三师师部张牙舞爪地冲了过来，企图援助大杨湖的敌人，坦克冲到我团指挥所旁边时，团主任就抓起两颗手榴弹首先向坦克扑去，警卫员、电话员、通信员等十三个同志也随后跟了上去。在他们的英勇反击下，敌人坦克两边的步兵，有的被打死，有的逃跑。坦克见步兵溃逃了，慌慌张张地打了一阵炮，也逃了回去。但战斗依然在激烈地进行，我五十四团伤亡越来越大，在这危急的关头，南面的五十三团按照旅首长的命令，除留下一个排监视敌人外，其余部队飞跑前往支援五十四团，这样，便扭转了五十四团危急的局面。

担任主攻任务的十八旅已把作为旅预备队的最后一个营投入作战，但整个战斗仍迟迟不决。

当纵队负责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决走把纵队的第二梯队三个团立即投入战斗，以求在拂晓前全歼敌人。五十四团那个重要方向增加了两个团，经过一阵激战，形势很快急转直下。

经过一夜血战，6日拂晓，大杨湖的敌整编三师主力五十九团被歼灭了。赵锡田见他的师部暴露在我军直接攻击之下，慌忙调整部署，并企图南逃与敌整编四十七师靠拢。敌人一离开工事，我各纵队立即乘机追歼，一时广阔的田野上人喊马嘶，杀声震天。当天下午，敌二十旅、三十旅及整编三师师部，就全部在运动中被我歼灭。7日，敌人的整编四十一师、四十七师仓皇向考城逃窜，被我歼灭约两个旅；敌整编五十五师与六十八师向开封逃窜，又被我追歼约一个团。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优势与劣势是相对而言的，既没有绝对的优势，也没有绝对的劣势。在作战中，如何变敌人的优势为劣势，变自己的劣势为优势，这是检验一个指挥员军事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方面，而毛泽东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原则就是可以变劣势为优势的有效方法。从定陶战役当时整个战局来看，敌人的兵力处于优势，而我军处于劣势，而我集中一个纵队的兵力攻击他的一个团，从而又形成了我军的优势，造成了敌人的劣势。同时，首先被我歼灭的敌整编三师五十九团，是敌人的强中之强，它的被歼对敌人起到了震慑作用，敌人的调整又为我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敌人以三倍以上兵力却被我挫败，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军事原则的无比正确。

华东敌情多变幻 挥师莱芜操胜券

莱芜战役，是毛泽东指导，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华东野战军于1947年2月进行的一次运动战战役，这个战役，共歼敌六万余人，收复城市十三座，使鲁中、渤海、胶东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进一步巩固了我军后方，夺取了战区的主动权。

当时的情况是，国民党从1946年6月下旬开始，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内战。华东解放区是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蒋介石集中了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共六十二个整编旅（相当于师）约五十万的正规军，企图首先侵占我苏皖解放区，消灭我在该地区的主力；或压迫我军北撤山东，然后寻机与我主力决战。到1947年1月底，我华东野战军在连续进行苏中、皖北、鲁南等战役，取得歼敌近二十万人的重大胜利以后，为了继续执行内线歼敌的作战方针，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将主要战场转到山东境内，主力则集结在临沂地区休整待机。

蒋介石为取得侵占我苏皖边区一些城市和地方的表面胜利冲昏头脑，错误地判断我军“伤亡惨重，续战能力不强”。又侦悉我军主力集结在临沂地区，认为临沂为山东解放区中心城市，我军必将固守。因此，急忙制定了“鲁南会战”计划，派他的参谋总长陈诚代替薛岳指挥，以三十一万余人的兵力向我进攻。据说这个陈诚发明了个“豆腐渣”战术，让欧震领着八个整编师二十多个旅，从陇海路东段新安镇以北六十华里的正面上，分左、中、右三路从南向我临沂杀来；以第四十二集团军郝鹏举部配置在宝塔埠、驼峰地区担任侧翼掩护；以四个整编师为预备队，随后跟进。北线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所部三个军为辅助突击集团，由淄川、博山、明水一线分两路南下莱芜、新泰。各路敌军实行南北对进，分进合击，妄图围歼我军主力。陈诚说，三十多万人马“即使都是豆腐渣也能胀死共军！”同时，他还有个自鸣得意的安排，在南线的三路进犯之敌中，“烂葡萄”里夹上“硬核桃”，左路夹个整编十一师，中路夹个整编七十四师，右路夹个整编二十五师。

在鲁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之际，我华东野战军首长依据南线敌军紧逼我军北上，威胁我临沂安全的情况，拟将作战重心放在南线。待部队略事休整后，即准备南下打南线的欧震集团第七十四师。并以一部兵力牵制北线进攻之敌。毛泽东根据华东战区的情况，多次致电华野：“你们应以歼灭欧震六个旅至八个旅为目标”，“如果你们感觉打欧震需要集中更大兵力，则四、九两师可否留下一个师，打完欧震再回鲁中，即使泰安失守也不要紧”，“目前除以一部打枣庄，翌日起全军整训两星期，集中一切力量歼灭欧震”。华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抓紧休整部队，调整部署，往前线运送粮食弹药，积极进行战役前的组织准备工作，并拟定了攻歼欧震集团各路进攻之敌的作战方案，下达了作战命令。

正当我军准备对敌人发起攻击的时候，南线的敌人于1月31日首先向我发动进攻。敌人为了防止被我各个歼灭，在进攻中采用了“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术，推进速度每日平均不到十公里，占一地巩固一地，然后再同时进击。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当即电示华野：“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

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必须等待敌进至郯城、临沂之中间地带（比较接近临沂），然后打第一仗方为上策”。华东野战军坚决执行了这些指示，当敌人进到重坊、郯城、桃林地区时，我第三纵队对中路之敌展开了顽强的阻击，目的是要造成敌人左右两路比较突出，以利于我们寻机先歼灭敌人两翼中的一路，尔后再各个击破其他各路，敌人遭到我阻击后，各路均停滞不前。为了创造战机，确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华野决心放敌人进至郯城、临沂地区再进行歼击，并调北线第九和第十纵队迅速南下参战。

这时，北线的敌人已进到莱芜地区，威胁到我战区后方安全，华东野战军鉴于南线的敌人兵力集中，行动谨慎小心，不易分割等情况，便开始考虑改变保卫临沂的作战方针。于2月5日向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以一个纵队进攻白塔埠附近的郝鹏举部，吸引右路之敌北援或调动中路和左路之敌北进，造成各个歼敌的战机。第二方案，如第一方案未能奏效，除以一个纵队位于临沂以南监视敌人外，主力均集结到临沂以北地区休整待机。第三方案，如果南线敌人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以一个纵队留临沂地区与敌人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平毁胶济线，威胁济南，以吸引南线敌人进入临沂以北山地或增援胶济线，然后进行全力反攻，各个歼灭。报告侧重讲了第三方案的好处，毛泽东于第二天复电：“完全同意五日十五时电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2月6日夜，我二纵遵照陈、粟首长命令，以突然迅猛的动作向东南挺进，7日在白塔埠、驼峰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右路军侧翼的第四十二集团军郝鹏举部主力，并生擒了郝鹏举。在我打郝鹏举部时，欧震集团未敢增援和北进，左路军反而向后收缩。2月8日，北线的敌人也进占新泰。毛泽东依据战况的发展，于9日电示：“解决郝鹏举部很好，但就全部战略方针来说，如你们方针是解决南面，则似乎打得早了一点，可能影响敌各部进得更谨慎。打了郝鹏举后你们似应按兵不动（要有极大耐心），让敌各部放手北进，然后各个歼灭之。如你们方针是先解决北面，则打郝鹏举部并无妨碍。你们需在两个方针之间首先有所抉择。”

2月10日，华东野战军根据当时情况，最后决定，集中五十三个团的兵力，首先解决第七十三军及南北师庄第十二军的一个师，然后再转移兵力，解决进占新泰的第四十六师，并向胶济线进攻，以彻底解决北线问题。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决定。于是，我华东野战军主力，除留下三纵队和二纵队在南线继续阻击和迷惑敌人外，迅速放弃临沂连夜回师北上，直向李仙洲集团扑去，毛泽东在华野主力北移后指示：“为彻底解决北面（敌）三个军二十三个团之众，我韦国清纵队及八师似宜北上参战。”

临沂，是华东解放区的首府。保卫临沂，是全区军民的愿望，如今一旦放弃，许多人思想不通。敌人则得意忘形，狂妄不可一世。国民党宣传部长陈学沛在南京叫嚣：“攻占临沂为国军在鲁南决战的空前大胜。”陈诚更是大吹大擂：“陈毅残部已无力与国军作战，欲与刘、邓会合，国军正追剿中。山东大局指日可定。”其实，这时我华东野战军主力正日夜兼程开往莱芜、新泰一带。

坐镇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发觉我军主力有北上莱芜、新泰的迹象，即令刚进占新泰的李仙洲部急速回师。但陈诚却被我地方武装在西线运河上架桥和主力迅速西进北上之举迷惑住了，他断定：“华东共军迭经重

创，无力与国军决战，企图偷渡运河与刘、邓部会师。”因此不顾王耀武的主张，要李仙洲坚决重占新泰，向蒙阴进击，断切我们西退之路。还说什么：“歼灭华东共军主力在此一举。”李仙洲无奈，不得不再命四十六军和七十三军重新赶回新泰和颜庄地区。正当敌人六七万人往返“游行”之际，我华野大军已由远道赶来，包围了新泰、莱芜之敌——李仙洲集团。

20日夜，我八纵、九纵首先在何庄地区消灭了由博山南下归建的敌七十三军的第七十七师，切断了通往博山的退路；21日晨，我一、四、七、八、九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莱芜城及其以北地区，李仙洲率领的七十三军和刚从颜庄撤回的四十六军成了瓮中之鳖。当夜，我六纵歼灭莱芜以北吐丝口的敌十二军新三十六师；李仙洲逃往济南的后路也断了。

经过连日激战，莱芜城东、南、西面的重要高地皆被我军占领。敌人虽然不断抵抗，但越来越无望了。王耀武也感到济南空虚，命李仙洲率部向北突围，向济南靠拢。敌人统帅部也觉悟到所谓“陈毅残部已无力再战”，是自欺欺人的胡说，只好让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亲自指挥大批飞机轰炸、扫射，妄图为李仙洲打开一条生路。但李仙洲也明知无济于事，所以在给王耀武的信中悲鸣道：北撤部队能否安全和胜利，“只祈上帝保佑”。

李仙洲接到王耀武的命令后，于2月23日早晨率七十三军和四十六军的人马，乱纷纷地离开莱芜，分成三路钻进南北不到二十里、东西约五六里的山沟里。事先埋伏在西侧的我军战士，根据华野首长的指示，以最大的克制，一直等到敌人全部离开莱芜城，指挥员一声令下，我各纵队的大炮、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敌人的先头部队又遭到吐丝口附近我六纵的迎头痛击。敌人顿时骡马乱窜，车辆狂奔，建制混乱，再也不能有组织地抵抗了。我军乘机从四面发起攻击，将敌人截成数段。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突围之敌。这次战役，我军歼灭了敌人两个军又一个师，李仙洲本人也被生俘，李仙洲被俘之后，还不胜感慨他说：“我早知道你们要找到我头上来，可他们一定要我来碰！”

这时，被我三纵拦阻在南线的敌人，深怕我军“围城打援”，在临沂以北踏步不前，我军趁此机会解放了新泰、莱芜、博山、淄川等十三个县城，胶济路南北连成了一片。敌人四十天不敢出战，山东局势暂时稳定了。

毛泽东在指导莱芜战役中，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本来，一开始就确定了保卫临沂的作战方针，并准备集中兵力歼灭南线欧震集团，以部分兵力阻击北线之敌。但由于南线敌人兵力集中，一时难以调动和分割。此时北线之敌已进入莱芜、新泰，如果让敌人长期占领，必然影响我华东战区尔后的作战。同时对于北线冒进分散之敌，也便于我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因此，毛泽东果断地批准了华东野战军移师北上的计划。我不惜放弃华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不怕打破坛坛罐罐，直扑李仙洲集团，也是完全符合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军事原则的，其结果不仅共歼敌六万余人，还收复了十二座城市。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为我军制走的军事原则的正确性。

胸中自有百万兵 蘑菇战术显神通

1947年3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白白送掉六十五个旅之后，仍然野心不死，被迫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犯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仅陕甘宁边区，敌人就调集了胡、马军二十三万多人，妄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消灭西北解放军，夺取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枢。当时，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二万五千余人，形势十分严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在运动中寻机破敌。

对于撤离延安，当时许多战士甚至不少干部想不通，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毛泽东耐心地给同志们讲解道理。他说，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年，挖了窑洞，种了小米，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了干部，指挥了全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死保。他反复说明，作战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是个显而易见的真理。从全国战局、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看，暂时放弃延安，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过去8个月内，蒋介石已损失了六十多个旅，他能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机动兵力越来越少，因此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在解放区的两翼：山东和陕北，实行“重点进攻”。这正表示蒋介石已走近穷途末路，离灭亡之日不远了。目前全国正面临着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夜，我们要用百折不回的毅力，去克服所有的困难，促进新的高潮很快到来。对于如何解决对陕甘宁边区进犯之敌，毛泽东说，敌人有二十三万人，我们才两万多。两万多人要消灭二十三万人，是有困难的。要战胜敌人，得有正确的作战方针。现在，就靠你们作“留心”，牵敌人，磨敌人，让敌人围着团团转。这种办法就叫“蘑菇”战术。陕北山高路隘，你们牵上敌人去爬吧。等它爬够了，疲劳了，饿饭了，就寻找机会歼灭它。毛泽东的话，给大家拨亮了心中的明灯，增添了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力量。

3月16日，敌人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进抵垦区金盆湾、南泥湾一带，逼近延安的大门。在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在那里坚持工作。18日，敌人窜到延安城郊三十里铺，枪声已清晰可闻，毛泽东最后离开办公室。

3月19日，我教导旅和警备七团已歼敌五千余人，胜利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的任务，而自动撤离延安。在敌人占领延安后，我一纵用少数兵力，故意摆出阵势，漫山撒开，向西北方向的安塞转移，诱敌前进。敌机跟踪侦察，果然以为是大兵团行动，即以其主力五旅之众追扑上去。

敌人占领我主动放弃的延安空城后，就拼命吹嘘“胜利”，而此刻，我新四旅、教导旅和刚由河东过来的二纵，已到延安东北的青化砭一带隐蔽埋伏。毛泽东在离开延安时，就已决定要在这一带打一个歼灭战。而且判断，敌人一走会来，并且是实力较弱，便于歼灭的。

青化砭，三十里大川，公路两边都是高山，正象张开一条口袋。只是青化砭有个土寨子，要使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就得让出寨子。但这样一来，就会增加我攻击时的困难；不让出来，又不能全歼敌人。最后决定，拆北墙留南墙。因为敌人由南边来，既可以挡住敌人的视线，又减少了我军攻击时的障碍，这个巧妙的主意立刻被采纳了。

3月24日拂晓，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神不知鬼不觉，进入指定地区。一纵把敌人牵到安塞后，又掉头向东，赶到青化砭

参加战斗。刚刚布置妥当，就得到情报，敌三十一旅、一三五旅自延安分兵北犯，已进至拐峁、刘家沟了。但战士们等了一天，却不见敌人的到来，原来敌人在拐峁补给粮食，宿营了。

第二天天刚亮，敌人两架飞机到我设伏地点侦察一番，当确信没有伏兵的时候，他们的部队才出动。将近10点，敌人的先头部队闯进了伏击圈。他们虽然得到了“无有伏兵”的报告，但还是例行公事地朝半山腰扫了一阵机枪，火力侦察了一番。战士们一动不动。敌人没有发现目标，前进的胆子更壮了。我军一万多人，就集结在这里，吃饭睡觉，竟没有留下丝毫痕迹。由于有广大群众掩护，封锁消息，传送情报，敌人一举一动我军都了如指掌。敌人得不到群众支持，完全象瞎子一样乱撞乱窜。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时，我二纵就在尾部打响了，新四旅在前头捏住了敌人的脖子，一纵、教导旅自两侧合击，分割穿插，把敌人斩成数段。顿时，枪炮齐鸣，杀声四起，战士们个个如猛虎下山，似蛟龙入海，向敌人猛打猛冲。由于山高沟深，敌人躲无处躲，逃无处逃，只好等着挨打。

仅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三十一旅旅部并一个团近三千人全部被歼。旅长李纪云被活捉，并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撤出延安仅六天，我军初试锋芒，就旗开得胜。这一仗大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俘获的人员、马匹、弹药、物资，又充实了我们的力量。敌主力五个旅，武装游行到安塞，扑了一个空，听说三十一旅被歼，慌忙赶回救援，而我军已撤往几十里以外休整了。

青化砭战斗的胜利，不仅使敌人大为震惊，就连我军内部许多人也不曾想到会如此顺利。其实，马到成功这是毛泽东预料之中的。为着迎合敌人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的心理，在撤出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指示西北解放军一部，公开向安塞方向转移，以调动敌人主力到西北方向，而我主力则隐蔽在延安东北一带寻找战机。毛泽东分析，敌人在延安立足未稳，必然会派出警戒部队，向延安东北方向蟠龙一带伸展，以便确保外围。青化砭是去蟠龙的必经之路，地形险要，便于我军用兵。就一般而言，敌人会把战斗力较强的部队用来对付我军主力，战斗力较弱的放出警戒。而我军则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事前做好充分准备，以逸待劳，一鼓歼灭之。

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敌人认为是分兵所致，于是便迅速改变战术，一出动就是八九个旅，一下子摆开几十里的方阵，行则同行，住则同住，以为采用这个新制定的所谓“方形战术”，就不会暴露弱点，被我“各个击破”。其实，分兵也罢，“方形”也罢，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面前都失去了效力。不久，敌人又在羊马河受到一次比青化砭更沉重的打击，一个美械装备的整旅被我完全歼灭。

羊马河战斗是在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青化砭战斗刚一结束，我军主力便转移隐蔽休整，养精蓄锐；只派出小部队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其暴露弱点，出现过失，便于我们歼灭。果然，当敌人发现我军主力就在延安东北时，立即以董钊、刘戡两个军共八九个旅，紧追不舍。然而我军主力却按步不动，只由新四旅两个营佯装大兵团，牵着敌人的鼻子，经延长、延川、清涧至瓦窑堡，又来一次长途大游行。我“磨心”由于是小部队，机动灵活，且有广大群众的支援掩护，使敌人到处扑空。敌人的大部队，不仅行动不便，补给困难，还要不断受到民兵游击队的袭扰打击。实在是苦不堪言。

敌人到瓦窑堡，见不到我军的影子，粮食也吃完了。于是留整编一三五旅守备瓦市，主动南下集结于蟠龙、青化砭一线，进行补给。4月6日，我军于蟠龙附近的永坪地区，给从瓦窑堡南退的敌整编二十九军重大杀伤。敌人发现我军就在背后，马上又掉头北上。对于敌人这一阶段的行动，毛泽东作了极其精确的估计：“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全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敌三月三十一日到清涧不即北进，目的是让一条路给我走；敌西进瓦窑堡，是赶我向绥、米。现在因发现我军，故又折向瓦市以南以西，再向瓦市赶我北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18页）因此，毛泽东指示部队继续在现地区同敌人周旋，然后寻机歼灭它。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一纵便乘机诱敌。敌人误认牵制部队即为我军主力，便紧紧追来。敌人在瓦窑堡的一三五旅也急忙南下，企图与其主力会合。我指挥机关发现这是个“可乘之隙”，立刻命令主力部队坚决截击歼敌。在一纵继续牵着敌人向西游行之时，我新四旅、二纵和教导旅则在延榆公路两侧隐蔽集结，准备夹击敌人。

敌一三五旅在14日拂晓进至羊马河附近伏击圈，我军主力立即对敌人进行攻击。我军集中优势火力，层层排除敌人的抵抗。二纵和教导旅由东往西攻，新四旅由西往东压。阵地上，炮弹开花，浓烟滚滚。敌人见势不妙，急忙给胡宗南发电求援。胡宗南一边令一三五旅就地构筑工事，“固守待援”，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我紧紧吸住；一边令董钊、刘戡急速回转同我军决战。其实，他要消灭我军主力只不过是黄粱美梦罢了。这时董钊、刘戡的部队已被我一纵紧紧拖住，要回来已不可能了。只有后卫部队一个旅，跟一三五旅隔着一道山，可是又被我十六团二营顶住。不能前进一步，只好胡乱地打一阵炮，权作“声援”。而一三五旅由于一直等待主力接应，因此连逃跑的机会也错过了。我军以压倒的优势，猛打猛冲。经过六个小时的激战，敌一三五旅的四千余人被全歼，代旅长麦宗禹也被活捉，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由于我军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机动灵活，善于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善于制造和利用敌人的“可乘之隙”，在运动中捕捉战机，歼灭敌人。所以，敌一三五旅尽管有九旅之众作为接应，仍然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

我军撤离延安还不到一个月，就连打两个胜仗，歼敌近两个旅，鼓舞了士气，改善了装备，补充了人员。敌人连打败仗，士气低落，开小差的屡屡发生。毛泽东正确估计了敌人的情况，要求我军，继续采用“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使其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程度；并攻击敌人的薄弱部分，断其补给，使其饿饭。这样，下一次战役就是以攻打蟠龙最为有利。

蟠龙位于延安东北九十里，是敌人的大“粮库”。我打下蟠龙，就断绝了敌人的补给，无异于釜底抽薪。我军经过两次歼敌的锻炼，炮火大大加强，已具备一定的攻坚力量。蟠龙原有敌整编一六七旅把守，周围还有几个旅来往活动，要打，就必须把敌主力调开，使其孤立无援。因此，能不能调动敌人就成了攻打蟠龙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判断，当时敌人正急于赶我向北。因此我三五九旅便“投其所好”，积极出击，诱敌沿咸榆公路北上；同时，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组成南进支队，到延安以南破坏交通，断敌粮运。我军主力则隐蔽集结于瓦窑堡到清涧大路以南，等敌人一到绥德，就在蟠龙打响。敌人再想回援，至少需六七天，胜利就有绝对把握了。

敌人发现我三五九旅，便象鱼看到了诱饵，紧紧追上来，敌人九旅之众，

再加上前面机枪开路，也算得上浩浩荡荡了。敌人主力一上钩，我军主力便立即进入蟠龙周围，严密封锁了消息。经过两昼夜的紧张侦察，加上被敌人抓去挖工事的老乡跑回来提供的材料，我军已基本掌握了敌人工事构筑和火力配置的情况，并按顺序把敌人的工事标为五个阵地。其中的五号阵地是主要支撑点，其火力配备还不十分清楚。为了彻底弄清楚，便在附近的山沟里捉到两个去抓鸡的俘虏，这样，整个蟠龙的防御体系我们都了如指掌了。

4月30日，我担任攻击蟠龙的部队，进入攻击准备位置，一纵在西南，二纵独四旅在东南，新四旅在东北，完成四面包围。一切准备就绪，定于5月1日拂晓打响。不料天不作美，头天突然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由于山洪暴发，遍地泥泞，部队难于运动，只得推迟一天。

5月2日，云收雨住，天刚拂晓，战斗便打响了。我各路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连续夺取十几处前沿阵地。东线兵团突破鹿若、铁丝网，以对壕作业迅速逼近敌阵，直捣蟠龙。敌人仓猝应战，也不知我军来了多少，山炮、迫击炮、化学炮，只管乱轰一气。

战斗进展极其顺利，次日即将遍布群山的三十多个碉堡外壕大部占领。前来助战的两架敌机，一架被击落，一架慌忙逃走。我独四旅和新四旅七七一团借着炮火掩护，扫除了前沿阵地密布的地雷，接近敌人的主要支撑点五号阵地。敌人依仗纵深工事，和猛烈的炮火配合，进行顽抗，攻击难以奏效。我军重新调整火力，发起猛攻。七七一团一个排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逼近五号阵地前沿，迅速挖好单人掩体，紧紧贴在那里，分批轮流向敌人阵地投掷手榴弹，给敌重大杀伤和消耗。最后敌人不支，慌忙开来一连人换防。我军乘机发起攻击，夺取了五号阵地。接着又攻下了三号阵地，摧毁了敌人的山炮阵地。

4日黄昏，各部队由四周居高临下，向镇内之敌猛攻。敌人狼狈向沟里逃窜。战士们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疲劳的精神，奋力追歼。夜半，敌人的精锐部队整编一六七旅就被我全部歼灭。毙俘敌旅长李昆岗以下六千七百余人，缴获山炮六门，军衣四万多套，面粉一万二千余袋，骡马千余匹。

与此同时，我教导旅在青化硬以北地区阻敌，歼敌保警队一部。4日驻青化硬之敌整编四十八旅、八十四旅各一个团附坦克两辆，去解蟠龙之围，被我阻于青化硬以北十里处。5日晚该敌才得知蟠龙守敌被歼的消息，连夜冒雨南逃。南进支队也在这以后不久，攻克延安以南的门户金盆湾。我三五九旅则紧紧拖住敌人北上主力，就在我打下蟠龙的当天，他们得知后方告急，仓皇南下，等敌人抵达蟠龙，我军主力已到安塞地区休整了七天。

撤出延安仅仅四十多天，西北解放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三战三捷，歼敌一万四千多人，彻底粉碎了敌人打击我党我军首脑机关，并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的妄想。

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论断：敌人的优势只是暂时的。在西北战场上，尽管敌人骄横一时，占据了陕甘宁边区的所有县城，但由于我军采用了毛泽东制定的灵活机动的“蘑菇战术”，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对敌人一拖再拖，一磨再磨，使敌人越打越孤立，越打越弱，越打越少，陷入绝境。仅仅过了一年多，革命圣地延安就重新回到人民手中，敌人在损兵折将十万人之后，不得不狼狈逃出边区，落了个“人地皆失”的悲惨结局。正是：胸中自有百万兵，蘑菇战术显神通。

尖刀插进敌心间 千里跃进大别山

到1947年6月，中国人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经过一年的战争，敌人虽然受到很大的削弱，但是，无论在数量上或装备上它都还占着优势。当时，从表面上看，乌云依然弥漫天空，局势依然严重。

但是，毛泽东高瞻远瞩，科学地分析了革命形势，认为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这是因为，经过一年的军事较量，我军已歼灭敌人九十六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二十万人。敌人被迫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且重点进攻也遭到了挫折，成了强弩之末。国民党士气低落，军心动摇。而人民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军心、民心。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不断壮大，装备大为加强。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越来越为更多的指战员所掌握。

在重大变化来临之时，毛泽东认为，我们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完全被粉碎，我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看战略进攻，而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机不可失，对不再来！毛泽东及时作出了战略决策：“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哪里？毛泽东英明地选定在大别山地区。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曾是老革命根据地，这里的群众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的军队容易在这里立足。我军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腹部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无疑象是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

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毛泽东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即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跃进大别山；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质等率领的太岳兵团为右后一军，挺进豫西。三支大军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永）之间的广大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同时实施两翼牵制，即由陕北我军出击榆林，调动敌军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山东我军则在胶东发动攻势，继续把山东敌军顾祝同部往东引向海滨，以利三军的行动。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十二万大军在鲁西地区正面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全国性大反攻的序幕。

敌人惊恐万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为“六·三事件”，蒋介石慌慌张张于7月7日宣布全国“勘乱”总动员。这也从反面证明，我军渡过黄河，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决策，恰好击中了敌人的要害。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纠集了大批兵力，妄图将我刘邓大军歼灭于陇海路和黄河之间，或将其逐回黄河以北。

面对这种情况，我军应采取怎样的进攻样式？毛泽东指示，进军大别山

不能象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以半个月行程直趋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当时，毛泽东分析了部队跃进大别山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告诫部队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朝最好处努力。

渡河大军于7月中旬在鲁西南地区歼敌九个半旅后，8月上旬向南推进，11日越过陇海线，接着陆续跨过涡河、黄泛区、颍河、沙河、淮河，攻占了豫东南、鄂东、皖东大部县城，一路劈荆斩棘，于8月27日到达大别山地区。此后，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建立了三十三个县的人民政权，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估计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从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区——武汉至南京之间，插上一把尖刀。

实行中央突破，采取跃进方式，打向敌人战略纵深，是击中敌人要害、转变战争全局的极其英明的决策。这种以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一举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作战，这是一种独特的进攻方式，是史无前例的。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我中原三路大军互相配合，机动作战，共歼敌十九万余人，解放县城一百余座，在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把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战略后方，变成了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前沿阵地。从而使蒋介石在中原的防御体系被摧毁，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

攻济打援各有兵 守敌援军两哀鸣

济南战役，是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毛泽东亲自领导和指挥的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战役从1948年9月16日开始到24日结束，全歼国民党守敌十一万多人，解放了国民党部队坚固设防、重点守备的大城市——山东省省会济南市，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揭开了胜利序幕。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战争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展开战略进攻已经一年，胜利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部队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又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企图争取时间，恢复与加强军事力量，挽救失败的局面。

处在解放区四面包围中的孤城济南，是国民党部队支撑华北残局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位于津浦、胶济两条铁路交会点，南可向徐州呼应，北能与平津声援。蒋介石以他的嫡系军队的所谓“名将”王耀武为司令官，在这里设置“第二绥靖区”，以十一万重兵防守，并在日伪原有的城防工事基础上，修筑了以内城为核心，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防御地带，以距城二、三十公里的城镇为外围的永蚤性防御体系，总面积达六百多平方公里。1947年2月23日莱芜战役，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六万余人，蒋介石亲自飞往济南向王耀武面授机宜，指挥王耀武布置防务，固守济南。1948年8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裁并绥区，扩编新的机动兵团”，将每个兵团配备五、六个旅甚至十二、三个旅之多，并命令山东全境的国民党军队与地方保安旅统归王耀武指挥。王耀武则亲自督率所部到处征工征料，大量砍伐树木，加强防御工事，妄图长期坚守。蒋介石为了支援济南作战，夹击解放军，同时为了巩固陇海路东端，以作南京的屏障，在济南战役之前，将其在华东地区的主力编成三个兵团：第二兵团邱清泉部集结于商邱一带，第七兵团黄伯韬部集结于新安镇一带，第十三兵团李弥部集结于宿县、固镇地区，从事整理补充，准备作战。

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里，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争取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以上，以取得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要求华东野战军歼敌四十个旅左右，并于八、九月间解放济南。对济南战役的作战方针、目的和部署等问题，毛泽东、中央军委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了攻济打援的方针，指出：这次战役以既攻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为目的；在兵力部署上，应以一部分兵力攻济南，集中大部分兵力打授阻援。为了策应华东野战军攻济作战，同时对中原野战军作了相应的部署。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和部署是济南战役胜利的根本保证。

1948年8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前委召开了有纵队以上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研究了济南战役的具体部署。根据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确定以山东兵团全部，加外线兵团一部共七个纵队，组成攻城兵团，统由山东兵团领导人谭震林、许世友、王建安等指挥；另以八个纵队组成打援兵团，主力部署在运河两岸的巨野、嘉祥、济宁、兖州地区，准备阻击和歼灭来援的敌人。攻城兵团又依据济南地形和敌情，划分东、西两个集团，分别由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和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统一指挥。主攻方向置于西面，先夺取飞机场，断敌空援，然后东、西两个集团协同攻城。其他部队和地方武装分工配合济南作战和保障解放区后方安全。

战前，华东野战军前委颁发了《攻济打援政治动员令》，响亮地提出了“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大量歼灭来援之敌，争取战役全胜”的口号。参战部队指战员纷纷表决心，请任务，要求到济南城头、打援前线杀敌立功。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正式打响了。午夜12时，解放军攻城部队东、西两个集团，在南、北、东、西各百余里的广阔战线上，同时向国民党守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

战事以东郊最为激烈。17日上午，解放军以榴弹炮及重迫击炮，集中火力掩护步兵直向济南城东郊的屏障茂岭山、砚池山猛扑，与固守该地的敌十五旅展开激战。解放军以火力封锁敌人堡垒的射击口，战士们奋不顾身英勇向前冲锋，并向堡垒里投掷爆破筒。敌多处堡垒被炮火及爆破筒炸坏。守敌妄图负隅顽抗，他们也集中炮火向解放军还击，掩护防守茂岭山、砚池山的部队反攻。经过一夜血战，王耀武视为济南屏障的茂岭山、砚池山便被解放军占领。

东面战斗最为激烈，王耀武便认为解放军的主力可能在东，便将调往城西的十九旅和五十七旅由西面调回，并令七十三师预备队及十九旅向解放军反扑，企图夺回茂岭山、砚池山阵地。他们曾向解放军数次冲击，激战甚烈，均被解放军击退。

到20日拂晓前，王耀武吹嘘至少能守半个月的外围阵地全部被解放军占领。攻城西集团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包围了济南市的商埠，并占领了飞机场，完全断绝了敌人的空运补给。敌人西守备区的总指挥、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率领所属三个旅约两万人起义，撤离战场。

解放军的快速进攻和吴化文的起义，迫使王耀武考虑弃城突围，但蒋介石严令其坚守待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战况及时电示：“为预先准备在我军攻入城内，王耀武率其死党突围而出分路逃窜时，全歼该敌勿使漏网起见，你们应在其主要逃路及次要逃路，近距离及远距离，布置多层堵击力量。”并指出除由正规部队负责外，应布置通往各路之地方部队及民兵“节节堵击，是为至要”。华野前委遵照电示即令攻城兵团迅速向商埠及城垣攻击，并部署兵力防敌突围。同时详细研究了徐州之敌北援情况，进一步调整作战方案，随时准备歼击北援之敌。

解放军的高速度的进攻和吴化文的起义严重地动摇了敌人坚守济南的信心。王耀武慌忙调整部署，把主力撤入城内，同时留下较强的兵力防守商埠，商埠是济南城西工商业集中的地区，王耀武的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就设在这里。9月20日晚6时，解放军攻城西集团各纵队同时对商埠实施突击。经过四十多分钟猛烈炮火轰击和连续爆破，解放军多路突破守敌阵地，并肩向纵深挺进。第十纵队由商埠北面攻克敌人装甲车防守的济南火车站，直插外城角下，堵死了商埠守敌后退进城的道路，第十三纵队和鲁中南纵队由商埠南面向东北猛攻，切断了城内外守敌的联系。第三纵队从横贯商埠东西的经二路和经三路迅速前进。经过激烈战斗，直迫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当时王耀武早已撤入内城，这里仍然有他的精锐部队防守着。防区由几座钢筋水泥的高大建筑组成。四面马路上有明碉暗堡控制，院内院外工事密布，共有一百多个机枪火力巢和一千多个步枪射击孔。21日晚，解放军突击队在炮声轰鸣、硝烟弥漫中突破了严密设防的高大围墙，冲进院内。敌人从楼上地下四面八

方疯狂反扑，依靠着一切障碍物和工事进行顽抗。解放军火箭炮手和爆破手大显神威，一处处地迅速摧毁敌人的楼房和工事，为突击队勇士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经过激烈战斗，解放军战士于22日下午冲上了这群高大建筑的最高层，胜利结束了肃清商埠守敌的最后一战。

王耀武以为解放军攻占商埠后需要准备三、四天才能攻城，不料我军当晚6时30分就发起向外城猛烈攻击。我军各纵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连续爆破，勇猛突击，迅速多处突破城垣，先后攻入城内，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到23日就占领了外城大部地区，逼近内城。王耀武为了作最后的挣扎，急忙将剩余残部进行整顿，加修巷战工事，并集中炮火破坏解放军攻城准备。为了解济南之危，蒋介石一再督令徐州各兵团迅速北援，并且使用飞机对解放军已经占领的市区进行轰炸。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攻城兵团决定就在23日连续对内城发动总攻。当晚6时，解放军集中炮火向高十四米、宽十米的内城墙及敌防御工事猛烈轰击，攻城各部跨过护城河一齐扑向城垣。王耀武督率守城敌军拼死抵抗，战斗异常激烈。我军攻城东集团第九纵队一部由城东门南侧突破，一个多连英勇登上城头，与敌人展开激烈搏斗。由于护城河上临时架设的渡桥被敌人的炮火打断，影响了后续部队登城。攻城西集团第十三纵队两个营突破西南角，其中两个连击退敌人反扑，迅速入城，与敌人展开巷战，其余部队在突破口上与疯狂反扑的敌人进行激烈争夺，在这关键的时候，各部队领导干部深入到前线各主要方向，帮助基层干部总结攻城的经验教训，研究克敌制胜的措施。经过认真的准备，24日夜间2时25分再次发起猛烈进攻。在各突击点，枪炮声、爆炸声响成一片，火光冲天，浓烟弥漫。攻城东集团的第九纵队七十三团经过反复冲击，首先突破成功，占领了黑虎泉对面的城东南角，并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巩固了突破口，把代表人民心愿的“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红旗插到了高踞城头的敌人的制高点——气象台上，纵队主力和渤海纵队一部从这里涌进内城。攻城西集团的十三纵队一九团顽强坚持在突破口上，浴血奋战，终于在先突入城内的两个连接应下，击溃敌人的拼死反扑，控制了趵突泉附近城西南角。第十三纵队主力和第三纵队相继冲进城里。入城部队东、西对进直插纵深，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守敌步步顽抗，节节败退。这时，王耀武看到覆灭已在眼前，就留下他的参谋长指挥，自己悄悄地溜走了。

解放军东、西两路大军，迅速肃清了内城东半部和西半部的守敌，象一把大铁钳，从东、西两侧有力地合拢起来，紧紧钳住王耀武撤入内城企图顽抗待援的指挥所——山东省政府。守敌利用坦克、装甲车以及各种轻重武器垂死挣扎，省政府附近一片烈火浓烟。四面包围过来的解放军勇猛地冲破多层防御工事，冲进省府大院，消灭了顽抗的敌人。躲藏在地下室的第二绥靖区参谋长罗辛理等被迫派出代表请求投降。

敌人的最高指挥部投降了，济南宣告全部解放。原来预定二十天时间，结果只用了八昼夜，便攻克济南，全歼守敌。

为了贯彻毛泽东“攻城打援，分工协作”的指示，解放军在攻打济南的同时，集中了占参战部队半数以上的八个纵队，采取了夹运而阵的部署，在运河东、西设置了多道防御阵地，积极准备阻击和歼灭可能从徐州、商丘、砀山地区北援的敌人。中原野战军也严密地注视着中原战场的敌人，策应济南战役。国民党的援军，虽经蒋介石再三督促，但在解放军打援部队严阵以待的威慑下，迟迟不敢前进。到济南解放时，有的才前进了短短一段路程，

有的还在集结。蒋介石的所谓“北援”和“会战”计划彻底破产。

济南守敌最高头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敌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保安司令王耀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第二绥靖区副司令牟中珩等，也都在逃亡路上被解放区军民一一捕获。

这次战役歼灭了国民党一个绥靖区司令部、一个省保安司令部、二个师部、十一个整旅、二个总队、五个团，共毙伤俘敌八万四千多人，起义二万多人，俘虏敌人旅级以上军官二十三名。

济南战役的伟大胜利，严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重点防御”计划，动摇了国民党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锻炼和加强了解放军的力量，特别是攻坚能力。基本上解放了山东全境，从而控制了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北段，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联成一片，解放区后方更加巩固，生产建设和支援战争的力量都大大增强。这一切，都为伟大的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济南战役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攻城打援，分工协作”的作战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济南守敌虽已处于孤立地位，但兵力较多，工事坚固，有较强的防御能力，徐州附近又有敌人的三个机动兵团，随时可以北援。如果我们只顾攻城，那就很有可能在城还没有攻克之时敌人的援兵就已到达，攻城计划就会落空。我们把攻城与打援阻援结合起来，就可以应付自如，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而迫使敌人处于守城者无力守住，层层崩溃，增援者犹豫徘徊，不敢放胆赴援的被动局面，从而把济南战役的胜利放在一个稳妥的基础上。正是：攻济打援各有兵，守敌援军两哀鸣。

太原城下巧攻坚 提前拖后各有缘

1948年10月5日至1949年4月24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徐向前具体指挥，我华北野战部队进行了太原战役。这个战役共歼敌十二万四千多人，俘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及太原防守司令王靖国等，解放了山西省会太原，从而结束了封建军阀阎锡山对山西人民近四十年的反动统治。

1948年7月晋中战役的胜利，进一步鼓舞了我军的士气，我参战部队接着便直逼太原，将阎锡山的残部压缩至太原及其近郊的狭小地区。这时，山西省除太原和大同外，广大地区均告解放，太原敌军已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

太原位于晋中平原北部，濒汾河东岸。城南、北地形稍有起伏，城东五公里有罕山，地形复杂而隐蔽，并高出太原城五百米，可俯瞰全城，为太原主要屏障。汾河以西六公里有石千峰一线高地。城南武宿和城北新城有机场，是敌人获取外援的主要途径。

蒋介石和阎锡山企图依托太原易守难攻和能够生产自给的工业条件，作困兽之斗。他们除由西安空运一个师另一个团增援外，还抓工人、学生、商人和职员补入军队。经过两个月的整顿补充，共有正规军十六个步兵师、三个特种兵师和其他勤务部队，以及一些保安团和民卫军等非正规军，总兵力十万余人，火炮约六百门。阎锡山企图利用和依托太原的有利地形，坚固的筑城工事，优势的兵力和装备，与我决战于外围地区，固守太原。因此，在兵力的部署上，除了直属部队驻守城区外，其余部队全都部署在城周围各据点内，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心防御区和东南西北四个外围防御体系。

1948年7月，我华北野战部队第一兵团等部追歼晋中溃逃之敌后，乘胜逼进太原。16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时致电徐向前，指出：“……太原已成孤立，我军有提前夺取太原之可能”，你们“全军即位于太原附近休整，并于此次休整中完成攻击太原之准备”。根据这一指示，我军积极进行了夺取太原的战役准备工作，并制定了“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然后一举攻下太原”的作战方针。战役拟于10月18日开始，争取三个月内结束。并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正在我军进行紧张的战役准备之时，太原守敌却集中九个步兵师，于10月2日脱离筑城地带向南出犯，目的是向外扩张，抢劫粮食，并破坏我军的战役准备工作。敌情的变化在我准备工作不十分充分的情况下对我不利的，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敌人离开巢穴，则便于我野外分割围歼。于是兵团决定提前发起太原战役，首先歼灭出城南犯之敌。这一决定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后，于4日夜，我第六十、六十一军迅速包围了小店、巩家堡和南畔村等地敌第四十四、四十五师。5日10时至6日9时，我将敌人的两个师歼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得悉后致电徐向前：“歼敌两师甚慰”，“你们现有良好机会可以全歼南面及东面之敌，得手后敌必震动。望你们乘胜扩张，逐一全歼外围之敌，占领一切机场。”根据这一指示，我前线部队经过十一个昼夜的战斗，突破敌人南面的防线并向纵深推进约六公里，完全占领了南机场，以火力控制了北机场，在东面打开了敌军防御体系的缺口。为进一步扩张，兵团决心乘东面敌军防御薄弱之际夺取东山，以控制和夺取城垣基地。10月17日至19日，我第七军占领敌人的防御要点牛驼，其他部队也相继占领了敌人的一些据点。敌人为夺回牛驼，在炮火的支援下，连续多次进行猛烈反扑，由于阵地被毁，我军只得于21日下午暂时撤出牛驼。此时，由于马

庄和双塔寺一线敌人的工事坚固，不宜作为攻城的主要突击方向，所以我军决心继续夺取东山山麓的牛驼、淖马、小窑头和山头敌军东面一线屏障，然后从东面攻城。自10月26日开始，经十九个昼夜的连续攻击，完全占领了牛驼、小窑头、淖马和山头四个要点。就在我攻打这四个要点的日日夜夜里，敌人乘机在汾河西岸西铭附近构筑了临时机场，使敌人得以再从榆林空运第八十三师来援。加上敌人的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准备起义未成，这就给我们夺取太原增加了新的困难。

这时，全国军事形势愈来愈有利于我，不利于敌，华北我军主力和东北入关部队，即将发起平津战役。为防止北平、天津、张家口和唐山之敌逃跑，以利于我军就地歼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时电示徐向前等：“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再打一二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我军即暂缓进攻城垣，只继续夺占必要要点，控制南北机场。为彻底切断敌人空中外援，我军于11月29日至12月1日，占领了西铭临时机场周围的一些要点，以便对机场进行火力控制。此后转入围困，并向守敌展开了广泛的政治攻势。至此，战役第一阶段以歼敌三万四千余人胜利结束。

1949年3月，太原敌军为增强其防御，除得到空运第八十三师增援外，又慌忙将保安团、民卫军和警察补入正规军，并以第四十四师和第八、九总队残部为基础，强征一部分工人、学生、商人和职员，编成“铁血”师、“神勇”师和“坚贞”师。另编成第十、十五两个兵团部，仍保留六个军部十六个步兵师和三个特种兵师，共有各种火炮约九百门。同时，重新调整了部署，划分为北、西、南、东北和东南五个防御地域据守太原。

平津战役结束之后，我华北野战部队第十九、二十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炮兵第一师，于1949年3月底迅速开到太原前线，连同久围太原的第十八兵团等部共约三十万人，准备会攻太原。为统一指挥太原前线作战，中央军委决定组成党的总前委和前线司令部，徐向前分别担任书记和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根据敌人把主要兵力配置于城外第一线阵地，企图依靠集团堡垒和强大火力与我外围决战的特点，我太原前线司令部决心以全力首先攻歼敌军主力于外围，然后攻城垣和市区，并对各部队规定了攻击任务。在攻击准备期间，我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1949年4月3日关于“注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如有接洽机会应利用之”的指示，多次向敌人劝告，按照北平方式解决太原问题，但均被守敌所拒绝。

1949年4月20日，太原战役第二阶段的进攻正式发起。在城东北，我第二十兵团一个军突破丈子头，迅速西进，占领了新城以南的北机场；另有一个军的兵力，由兰村沿汾河两岸向南攻击，直插北机场以西的汾河铁桥，配合由丈子头西进之军，切断了北机场以北之敌的退路，另有西北第七军一个师配合第二十兵团，同时攻占了牛驼（城东北），进而向黄家坟之敌进攻，并钳制该敌，在城西，我第十九兵团和晋中军区部队，一路于汾河以西接连突破各据点，迅速进至万柏林地区，与由此向南插的一个师会合，切断了汾河以西敌人的退路，并将其包围；另一路于汾河以东突破杨家堡防线，攻占东西寇庄等地，并切断了双塔寺与太原城的联系。同时，我第十八兵团一部

在城东南肃清了双塔寺以南以东之敌，进而占领城南面粉公司等地。在城东，我第十八兵团主力和西北野战军第七军主力，连续攻占城东的剪子湾、仓库区等地，进而又攻占黑土港、大东关等地。到4月21日18时，城周围除双塔寺和黄家坟两个据点，尚在敌人手里之外，其余全部被肃清，我军各部均逼至太原城下，并积极进行攻城之具体准备工作。4月22日9时，敌人的双塔寺和黄家坟两个孤立据点分别被我攻克。至此，城外敌人全部被肃清，共有十三个师被我歼灭。

太原敌军在外围兵力被歼后，残部慌忙调整部署，企图据守城垣作最后挣扎。为迅速攻占城垣，我军也根据情况变更了部署，组织协同，并构筑了进攻阵地。同时，又向守敌提出和平解决太原问题的劝告，但敌人一意孤行，决心顽抗到底。于是，4月24日5时30分，我军分为十二路，在强大炮兵火力的支援下，从东、西、南、北四面同时发起总攻，到6时30分均突破敌人防线，突入市区。战斗到10时结束，全歼守敌，太原遂告解放。

在太原战役中，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奠定了我军胜利的基础。这个战役是在我军在各个战场正在进行战略决战的三个最大战役的时间内进行的，毛泽东一面指挥其三大战役，一面安排着太原战役，充分显示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有提前夺取太原之可能”，是毛泽东通过客观分析，作出的预言，而最后战役的胜利证明了他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我华北野战部队刚进行了晋中战役，很需要进行休整，如何解决休整与夺取太原的矛盾呢？“在休整中完成攻击太原之准备”，这实在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我歼敌两个师后，“乘胜扩张，逐一全歼外围之敌，占领一切机场。”这样就陷太原残敌于绝境。在我大军兵临城下，太原能迅速攻克的情况下，又要拖后攻击太原，这是因为“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因此，命令太原前线待“东北我军人关攻击平津时”，再攻太原。“提前”包围太原，是为了及时捕捉战机，而拖后攻克太原，又为了照应平津战役，因此，提前与拖后，都显示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艺术才能，这是一般军事家所做不到的。

战略决战方向明 东北战场克群雄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毛泽东及时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决战。三大战役，共歼敌一百五十四万余人，使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归于消灭，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而这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便是辽沈战役。

在决战前夕，战争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解放军的变化。到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已增加到二百八十八万人，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和实际战争的锻炼，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大大提高。人民解放军从敌人手中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和装备，建立了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解放区的面积已发展到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人口占三分之一以上。经过土地改革，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后方更加巩固，人民解放军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

国民党军队这时虽然仍有三百六十五万人，但第一线兵力只有一百七十万余人，而且大部分受到过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这时敌人已经被迫放弃“全面防御”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要点线。他们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猬集一团，妄图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这时敌人有五个战略集团，分别被牵制在五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共五十五万余人，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线的锦、榆段作为他们和关内水、陆联系的通路。华北战场为傅作义集团，共六十余万人，分布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他们海上补给的通路；太原孤城的守敌，已被围困。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六十余万人，集中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共约七十五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以及汉口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约三十万人，分布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除上述五个战场外，敌人后方的军队约二十三万余人，由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很难机动。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要大量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候，国民党1948年8月南京军事会议曾谋划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经营华南，但仍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这时候，如果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就会给我军以后的作战增加麻烦。如果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就可以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决定抓住这个决战时机，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毛泽东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择了在东北战场首先进行战略决战的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虽然都有利于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的时间，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军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则会受到华北、东北

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只有首先将东北之敌就地歼灭，才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又能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上的总后方，有利于东北野战军实施战略机动，支援华北、华东战场上的作战。另一方面，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敌人有正规军四十八万人，我主力部队连同地方武装共有七十余万人，敌人孤立分散，补给困难，我地区广阔，关内各区均可支援。毛泽东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

在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战场敌人据守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应首先指向哪里，是关系到全局的关键问题。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消灭该敌比较容易，同时也可以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但敌人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我军，掩护沈阳、锦州之敌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我军如先攻长春，便正中敌人下怀；而攻克长春，又会吓跑沈阳、锦州之敌，影响战役和全国战局的发展。锦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锦州的敌人比长春多，但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在北宁线上作战，可以吸引长春、沈阳的敌军来援，有利于战役发展；还可分割敌人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两大战略集团，华北敌军的增援则将因我华北解放军的牵制而削弱。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之地，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地，就关闭了东北的大门，形成了“瓮中捉鳖”“关门打狗”之势，而且控制了北宁线，更有利于我军向两翼机动作战。因此，从本质而言，锦州是敌人的致命弱点。毛泽东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要求东北野战军“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同时又指出，攻克锦州是战役胜利的关键，要求“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辽沈战役是完全按照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和部署进行的。当时，东北人民解放军除以一个纵队和七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之敌外，以六个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一个坦克营围攻锦州，另以两个纵队配置于锦州西南的塔山、高桥地区，三个纵队配置于黑山、大虎山、彰武地区，分别阻击由锦西、葫芦岛方向和沈阳方向救援锦州之敌。锦州地区的作战是9月12日开始的。正当我军攻克义县，扫清锦州外围时，蒋介石慌忙飞到东北亲自指挥，嚷叫“东北局势好坏，就在锦州一战”。并急调北宁线华北“剿总”的五个师和山东的两个师来援，连同原来在锦西的四个师，共十一个师，于10月10日起向我塔山阵地猛攻，但始终未能突破我军阵地。廖耀湘兵团（国民党第九兵团）十一个师又三个骑兵旅由沈阳驰援锦州，被我阻击在黑山、大虎山东北地区。

10月14日10时15分，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对锦州发起了总攻。首先是炮火准备，顿时炮声怒吼，震耳欲聋。敌人的汽油库爆炸了，霎时间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卷过半城，弥漫天空，太阳立刻暗淡无光。炮弹落在城垣上，掀起了泥土和石块，摧毁了钢筋水泥工事，炸开了缺口。尖刀连的战士跳出战壕，向小凌河飞快奔去。他们涉过齐胸深的河水，奋勇向前。我后续部队也迅速突破了敌人的前沿主要阵地。

敌人把小凌河当作守护锦州城的重要屏障，因此，极力阻止我过河。敌机在小凌河上投着炸弹，掀起高大的水柱；敌人的机枪扫射着河面，溅起成串水花。我指战员不顾弹片纷飞，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爬上了陡峭的河岸。敌人从两旁的暗堡里猛烈射击。我英勇的指战员奋不顾身，在敌人的交叉火网下，托着炸药和鞭炮筒向暗堡匍匐前进。霎时间，敌人的暗堡化为一片灰尘。

10时28分，九纵左翼师尖刀连已从南门侧面登上了突破口。敌人疯狂反扑，企图作垂死挣扎。我军尖刀连的战士们奋勇还击，打退了敌人七次冲锋。敌人越来越多，从一个排增加到一个营，堵住了突破口。战士们向敌人展开肉搏战，刺刀打弯了，用枪托打，用石块砸，使得敌人尸满突破口，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继续前进；我军炮火实施拦阻射击，护送战士们一步一步向敌人纵深发展。

在战斗中，各级指挥员亲临火线指挥，九纵的两个主攻师刚刚各进去一个多营，师级干部便跟着进了城。

虽然我军已冲进城去。但顽固的敌人仍然利用地形地物拼命抵抗。他们预先在每个街口都设了地堡群和沙袋工事，组织了交叉火力，能够互相支援。他们把抢来的门板、铺板、桌椅等物，堆在街道中间；在每条重要的道路上，都预先埋了地雷；利用每一座大楼、每个窗口，喷射着恶毒的火焰，企图阻挡我军前进。

但敌人无论怎样也休想阻止一往无前的战士们的脚步，地雷一个个被查出，地堡一个个被攻克。突破入城的各路纵队同时迅速向前推进。

敌人的部署被我军完全打乱了，通讯联系也中断了。

天色渐渐黑下来，但城内依然是鏖战正激。爆破声、枪炮声、喊话声此起彼伏。

这时的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范汉杰再也无心指挥手下的一帮残兵，而是在苦苦地思索着逃跑之路。夜间10时，九纵左翼师攻到敌六兵团司令部附近。右翼师一个团由欢乐街向牡丹街、富和街、国和街猛力发展，打退敌人多次反击；另一团切断了敌六兵团司令部之退路，并包围了铁路管理局。

夜12时，敌六兵团司令部以猛烈的炮火，阻挡了我一个团；又在离兵团部以东三百米远的陆军医院大红楼，阻挡了我向敌侧翼迂回的另一个团。

我军战士组织突击组、火力组、爆破组，使用了大量的黄色炸药，连续炸破了九个地堡、十二道铁丝网，冲进大红楼，将敌全歼。

不久，敌六兵团司令部便被我包围，几支赶到的部队互相配合同时向敌人展开攻击，终于在凌晨4时10分攻克了这一核心据点，全歼守敌。

就在锦州城内打得火热的时候，范汉杰化了装带着一帮人趁黑夜溜出城去，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被我在山口担任警戒的战士活捉。同时被活捉的还有国民党中将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少将政训主任方济宽等。范汉杰这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惨败面前不得不承认我军战略指挥上的英明，他说：“贵军神机妙算，弃长春，舍沈阳，突然闪击锦州，扼住我军战略咽喉重地，乃出我军意料之外。锦州，犹如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负华北，贵军夺下锦州，恰好象从中间折断扁担，使东北与华北分离，棋着厉害。但贵军孤军深入，非雄才大略之人，不敢作此贸然行动……”

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东北战局沿着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迅速发展。锦州十万守敌在三十一小时内全部就歼以后，长春

守敌一部起义，其余全部投降。此时，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但蒋介石仍然梦想夺回锦州，打开关内外的联络，严令廖耀湘兵团继续向锦州前进。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攻占锦州后，就立即向东北方面回师，从黑山、大虎山南北两翼合围廖耀湘兵团。10月26日将廖兵团包围于黑山、大虎山、新民地区，经过两日一夜的激战，全部歼灭该敌，俘虏敌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白凤武、郑庭笈以下十万余人。我军乘胜猛追，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再歼敌十四万九千余人。至此，解放了东北全境。

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到11月2日，共历时五十二天，歼敌四十七万余人。经过辽沈战役，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战争的双方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已超过了国民党军队。敌人总兵力下降到二百九十万人，解放军总兵力增至三百余万人。这一变化使五年胜利的预计进程大为缩短。

辽沈战役开始前，在敌人的兵力还处于优势的情况下，毛泽东就下决心向国民党的战略集团开战，表现了他那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宏伟气魄。而把决战方向选在东北战场，则显示了他胸怀全局、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

毛泽东为辽沈战役制定的“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的作战方针，规定了战役的主攻方向，抓住了战略和战役枢纽。从战略上看，我军把主攻方向指向锦州及其附近诸点，是对东北卫立煌集团和华北傅作义集团的中间突破。攻克锦州，隔断了东北、华北两敌的联系，使之成为两个孤立的集团，并关闭了东北敌军撤向华北的大门，造成了“关门打狗之势”。从战役上看，我军攻克锦州以后，可以向两翼侧动，不但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而且能取得战役主动权。锦州是联结东北与华北的枢纽，是东北通向关内的咽喉。攻锦不但能引起长春守敌的恐慌，而且能吸引沈阳之敌大举增援，从而创造在野战中大量歼灭援敌的战机。应当说，这个方针是一个无比英明的方针。

在这个战役中，毛泽东把歼灭战原则首次用于战略范围，是对我军军事学术的一个发展。

辽沈战役战场宽阔，兵力众多，情况非常复杂。毛泽东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指示东北我军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奔袭战、攻坚战、运动战、阵地防御战和运动防御战等战斗形式。各种战斗形式的综合运用，为以后组织实施大型歼灭战积累了丰富经验。

可以说，在指挥辽沈战役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他的卓越的统帅才能已达到“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度。

千军万马战淮海 运筹帷幄展英才

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又立即部署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

当时，由于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反动集团不得不采取以退为守的战略，把部队龟缩成几团。在徐州方面，以刘峙为首，集结了邱清泉、李弥、黄伯韬、孙元良四个兵团以及刘汝明、李延年两个绥靖区的部队，沿陇海线布防于徐州两翼，并以第三绥靖区冯治安的五十九军、七十七军置于徐州东北地区，妄图守住中原，屏障南京。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要求中原、华东全体军民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分批歼灭徐州地区之敌，不让敌人主力退据江南，以影响今后我军横渡长江、解放全国的进程。10月11日，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

我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的指示，根据“攻济打援”原则，首先集中以七个纵队向新安镇、阿湖地区的黄伯韬兵团突击；以三个纵队南北对进向运河车站方向突击，割裂黄伯韬、李弥兵团的联系；以三个纵队攻占韩庄、台儿庄，促使冯治安部起义，尔后直出陇海线，阻击可能由徐州东援的敌人；以两个纵队从两面侧击徐州。

与此同时，我中原野战军主力向徐州、蚌埠段津浦路突击，攻占宿县，切断徐州之敌向南的联系，孤立徐州，保障初战胜利。

徐州，南屏京（南京）、沪（上海），北通冀、鲁，为华北、华中的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蒋介石发现我华野、中野大军纵横驰骋津浦、陇海、平汉线之间时，便决定把所有可能集中的兵力蜷缩于徐州地区，准备全力与我决战，进行垂死挣扎。

由于战局迅速发展，敌军主力都向徐州集中，毛泽东曾指示：第一仗力争歼灭黄伯韬、李弥等二十一至二十二个师，如果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华野、中野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如果敌人不将徐州及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我们就可以打第二仗歼灭黄维、邱清泉，使徐州的敌人完全孤立起来。根据情况变化，毛泽东又调整了部署，由陈毅、邓小平直接指挥中野四个纵队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华野两个纵队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以便与宿县中野部队联结，如果徐州敌人向南退却，就集中六个纵队将他们歼灭。华野以三个纵队由北向南，一个纵队由南向北，以全力向李弥兵团攻击，控制徐州运河车站间的铁路，运河以东的主力则歼灭黄伯韬兵团。这样就把蒋介石的兵力割裂开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并占领徐州。

华野与中野主力，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徐州东、南、西、北几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华野十三个纵队从山东境内齐头向南挺进，横扫陇海铁路北侧三百里广大地区的敌军阵地，苏北兵团三个纵队则由徐州东南向西北攻击。几个晚上将敌人分割成为互不联系的好几块，东面的黄伯韬兵团被我包围。黄伯韬不敢应战，仓皇西逃，企图靠拢徐州。

我主要突击集团勇猛追击，逢山过山，遇水过水，不怕饥寒，不畏艰苦，人不歇脚，马不停蹄。

经过三天冲击，逃敌被我歼灭近两万人。黄伯韬部逃过运河西岸，准备继续西逃。殊不料往徐州的去路已被我山东兵团截断，而我追击部队迅速渡

过运河。终于在 11 月 11 日这一天，将黄伯韬所率几万逃兵前堵后追，全部包围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

11 月 11 日，碾庄攻坚战开始了！

我军根据毛泽东“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必须极大地注意学习阵地攻坚战术”的指示，采取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发扬我军夜战的特点，利用夜间对壕作业，隐蔽接近敌人，插入各村之间，加强侦察，充分准备，集中兵力兵器，逐个夺取，逐个歼灭。

位于包围圈西部的敌一军和位于南部的敌四十四军，战斗力比较薄弱，经过四天的战斗，即被我全部歼灭。敌二十五军和六十四军也被我打得焦头烂额，伤亡过半。

19 日傍晚，我对敌兵团司令部所在地碾庄圩发动总攻。经过一夜激烈战斗，20 日凌晨 5 时，碾庄圩被我全部攻占，歼灭敌人的兵团部及二十五军军部，俘虏敌人一万多名。黄伯韬东逃至大院上，继续负隅顽抗，但终于没有逃脱败亡的下场。至 22 日黄昏，经过十七天运动战和阵地战，蒋介石嫡系的第七兵团黄伯韬部四个军及其指挥下的第九绥靖区一个军，共十个师，约近十万人，至此即宣告全军覆灭。

为保障碾庄地区全歼黄伯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徐州以东、以南，我强大的阻援与打援部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阵地防御。

为了挽救黄伯韬，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地命令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全力驰援，兼程前进。于是，徐州“剿总”以其所谓主力军邱清泉兵团，加上李弥兵团，共五个军，在二十架飞机、百余辆坦克、百余门重炮的掩护配合下，沿陇海铁路两侧向东增援。同时，以孙元良兵团增防徐州，令平汉铁路上的黄维兵团迅速向徐州、宿县一线前进。

我徐州东侧阻援部队一面以三个纵队正面顽强阻击、一面以五个纵队侧击徐州，威胁敌人翼侧。到黄伯韬被我全部围歼时，邱、李兵团虽然付出了万余人、三十余辆坦克的重大代价，但仍被阻在距离碾庄地区五十余华里之外的大许家一线。蒋介石眼睁睁地看着黄伯韬兵团覆没，无可奈何。

在两大野战军的密切配合下，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胜利了。

初战既败，徐州守敌恐慌万分，为预防重蹈黄伯韬的覆辙，迅速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紧缩徐州，加强防御，不敢轻举妄动。南线李延年兵团遭到我严重打击后，唯恐被歼，迟迟不敢北进。而这时，黄维兵团已进入我中原野战军预设的“口袋”中了。

毛泽东根据战局发展的有利形势，决定乘胜扩大战果，采取南北堵中间围歼的方针，以中原野战军为主，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围歼黄维兵团。毛泽东特别指出，在黄维兵团被围之后，徐州敌人可能倾巢南逃。他重申歼灭敌人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决心，指示总前委和华野要对此作出妥善的部署，以便贯彻“分割敌人，各个歼灭敌人，坚决不让敌人跑掉”的既定方针。

11 月 25 日，中原野战军在双堆集地区完成对黄维兵团的合围，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进逼任桥、固镇。蒋介石此时却错误地判断我军可能先聚歼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所以命令这两个兵团于 26 日星夜南撤蚌埠，据守淮河，阻止我军继续南下，并同时令黄维兵团向蚌埠靠拢，令徐州杜聿明放弃徐州倾巢南窜，策应其行动。他仍然在做“守江必固淮”的好梦。

在中原野战军的铜墙铁壁似的合围之下，黄维已碰得头破血流，到 28 日再也不敢想“突围”了。徐州之敌连续向南猛攻七天，仍被我军阻滞在四

堡以北地区。我华野另一部追击南逃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歼其一部。蒋介石这时急召杜聿明到南京密商，让其避开我津浦路防御正面，从徐州西南绕道南下。同时又令徐州“剿总”司令刘峙飞返蚌埠，另组指挥所，督李、刘兵团再次北犯。企图南北对进，攻击我中原野战军侧背，解黄维兵团之围，尔后合伙南逃，以保存力量。

12月1日夜晚，杜聿明派杂牌军孙元良、李弥两兵团打头阵，以王牌邱清泉兵团殿后，共率二十六万人马弃守徐州，向西南狼狈逃窜。

我华东野战军立即命令南线机动兵团进行追击。我强大解放军对溃窜的敌人实行平行追击，多层拦击，多处兜捕，经过三天猛烈追击，终于在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所率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全部合围在徐州西南一百三十华里处的陈官庄地区。孙元良兵团企图突围，被我军全歼，仅孙元良只身逃去。

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各围住的一大堆敌人，都是建制较完整、兵力很大的精锐兵团。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辖四个军，其中有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杜聿明更是蒋的亲信，两个兵团中也有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蒋介石的所谓五大主力，其御林军七十四师已于山东战场被歼灭，新一军、新六军于东北战场被歼灭；现在就剩下这两个本钱了。蒋介石从空中每天大量接济这两大堆人，空军轮番地向我轰炸袭击，包围圈的敌人在空军的掩护下，以步兵坦克协同，不断向我实施反扑。

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形势，为加速战役进程，决心采取“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围住杜聿明，阻止李延年”的方针。

6日晚至15日，中原野战军以坚韧不拔、前仆后继、无比勇猛的精神，采取紧缩饿困，“攻占一村，巩固一村”的打法，经过反复争夺，连续对被围敌人实施攻击。虽然敌人猬集一团，以房屋为依托，地堡为骨干，作困兽之斗，并数度在空军掩护下企图向南突围，但已无力阻挡我军总攻的铁锤。经过二十余天的鏖战，在12月15日将黄维兵团全部消灭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敌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为我生俘。黄维兵团的被歼，是蒋介石在淮海战场上，继黄伯韬兵团被歼之后遭到的又一次致命打击。它不仅使蒋介石丧失了包括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在内的十二万精锐之师，而且也最后地孤立了被围在徐州西南的杜聿明集团，造成了我迅速全歼杜集团的大好形势。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方针的无比英明和正确。

在第二阶段之初，集结在徐、蚌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与我兵力对比大约是一比一。我军装备还处于劣势。因此，毛泽东指示，第二阶段仍应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既走方针，对敌人三个集团应是各个歼灭。遵照这一指示和根据北有杜、邱、李，南有李、刘，中间有黄维，分三路向我军前进的情况，总前委选择了孤立的又是立足未稳、经过中野长期消耗的黄维兵团作为第二阶段作战目标，使用了约十个纵队，并以华野主力作围歼黄维的总预备队，在歼灭黄维的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在保障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黄维兵团的前提下，对辅助方向，令华野以保障主要方向作战和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有利条件为原则，围困杜聿明集团，堵住李延年兵团，作为中野打黄维兵团的南北屏障。正是由于这种部署，使黄维陷入绝境，而杜聿明、李延年又不能相援，只好眼看着黄维兵团覆灭。

黄维兵团被歼灭后，人民解放军机动的兵力越来越多。蒋介石所下的杜聿明这一着棋，好象围棋一样已成为死子了。我们完全可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一举将其歼灭。

但是，毛泽东于12月22日指示：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应休息到1月5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毛泽东为什么指示围而不攻呢？原来这是毛泽东胸怀全局，从整个战略决战的高度考虑才作出的这一决定。

当时，蒋介石在中原战场上，继黄伯韬兵团覆灭之后，黄维兵团又遭全歼；在华北战场上，平津战役已开始，傅作义所指挥的六十多万国民党军队，为东北野战军解放全东北的胜利所震惊，加上大沽与天津之间交通已经全被截断，赶忙收缩兵力，企图海运南逃或西窜绥远。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于12月20日要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从速完成江防准备，又指示刘峙将总部不必要人员及笨重辎重适时南运，企图将主力转运到江南预定位置，守备江防。对华北方面的敌军，蒋介石打算“俾万不得已时撤回江南”，派船接运。在国民党部队将要南撤而未实行的时候，我淮海前线与华北战场部队采取“围而不攻”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互为呼应，推迟攻击，“缓和”局势，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这样可以麻痹敌人，使蒋介石暂不海运平津地区之敌南下，促使他们下决心在江北“拼”下去。这样，我军就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以便淮海、平津两战役互相配合，达到大量歼灭敌人的目的。淮海前线暂留杜聿明余部，又好比是扔出一块“鱼饵”，在我们歼击杜聿明战况紧急之际，李延年兵团可能再次北上救援。届时担任南线防御的中野各部，便可诱敌深入，围歼其一部。加上正值严冬，加强对敌围困，可以利用天时进一步造成敌人的困难，我们则可以养精蓄锐，以逸待劳。

杜聿明所率部队被我军围困期间，断草绝粮，饥寒交加，陷入了绝望的深渊。粮食吃完了，后来只好剥树皮、啃马骨头充饥，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状况。

正当包围圈内的敌军处于外无援兵、内无粮弹、日益走向死亡的时候，我解放区的广大人民，和以往支援任何战役一样，不辞一切劳苦，踊跃支援前线，保证我军在大风雪侵袭的严冬季节里，始终粮草充足，兵强马壮。从而也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说过的“人民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话的无比英明和正确。

我军在围困敌人期间，同时开展了群众性的火线劝降、瓦解敌军的强大的政治攻势。毛泽东亲自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从1948年12月16日到1949年1月5日的二十天时间内，敌军相继向我军投诚者就有一万四千多人，约等于敌军两个师的兵力。

1949年1月初，东北、华北两野战军分割包围傅作义部队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之敌南下的任务已经完成，毛泽东立即命令淮海战场对敌人发起总攻。1月6日15时30分，我军开始了对杜聿明集团阵地的猛烈炮轰，顷刻之间，敌人的地面工事和制高点火力层均在隆隆的炮声中毁灭。

我早已摩拳擦掌的各主攻突击队的爆破手，纷纷跃出工事，在炮弹爆炸烟雾隐蔽下，机智熟练地朝着早已摸透了的爆破点冲去，迅速地将阻碍我步兵前进的大小碉堡一一炸毁。16时，指挥号发出总攻信号，突击部队象锋利的钢刀一样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勇猛地插向敌人纵深。

激战到10日下午，我军摧毁了敌人最后的一个孤守点——刘集。这样，

杜聿明的包括王牌新五军在内的“南下兵团”约二十万人全部覆没，杜聿明也被我军俘获，邱清泉被当场击毙，只有李弥只身化装逃跑了。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六十五天。根据毛泽东的计划我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歼国民党精锐部队二十三个军五十六个师（内有四个半师起义）共五十五万五千人，并击退由南京方面来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彻底粉碎了敌人“力争华北，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防御计划，至此我华东、中原和华北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它的胜利连同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蒋介石集团继续盘踞中国大陆的信心，为我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在淮海战役的指挥中，毛泽东那高超的军事艺术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为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他根据华东战场敌军部署的特点，在兵力的使用上，采取了极为巧妙的部署，指示我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从一般情况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攻歼的目标上，毛泽东却在我有足够兵力及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胜利，切断了敌人海上退路，为战役尔后的阶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为隐蔽我军首先割歼黄伯韬兵团的意图，毛泽东要求我军从四面八方同时展开攻击，既“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又使敌人不能“及时查明我主攻方向”。这样，就为我以后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毛泽东亲自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对于瓦解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神兵天降围平津 解决方式各不同

当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刚刚结束，第二大战役淮海战役正酣之时，毛泽东又马上组织了第三大战役——平津战役。可谓是环环相扣，妙不可言。

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在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与打击下，又受到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国民党这时在战略上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就是华北的部队。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便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刘峙集团之围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而这个集团本身当时还有沿平绥线西撤绥远的企图。敌人无论撤退还是收缩，都将对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不使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主要关键。毛泽东利用了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人全部就地歼灭。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为了不使敌人逃跑，又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了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的敌军南下，又命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又命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作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这样，就可以稳住敌人，完成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敌人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的绝境。

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从1949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首先将敌人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新保安和张家口五个孤立据点上，截住其西窜南逃的通路。

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攻克新保安。24日，解放张家口，歼敌傅作义部“王牌”第三十五军和第十一兵团。

1949年1月14日，我军向天津发起总攻。15日解放天津，活捉敌警备司令陈长捷。

天津东临大海，整个市区被永定、大清、子牙、白河、运河诸水切成许多片断，容易难攻，国民党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早从1947年起即开始征调大批人力、物力、增修城防。市区内街全层层，直达核心区域，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环绕全城，还挖掘了水深三米、宽五米、长近五十公里的护城河，并且把护城河和防御前沿五里内的房屋完全烧毁，遍设碉堡群。陈长捷凭借着所谓“大天津堡垒化”的工事，指靠着深沟高垒、河流障碍，依靠着十个正规师、四个特种兵团及地方部队共十三万守备兵力，固守顽抗。

我人民解放军在天津前线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五个纵队共二十二个师，还有野司警卫团及待司大量的炮兵，坦克和工兵，另外，以一个纵队警戒塘沽守敌。

天津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城市。敌人的防御特点是：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皆平常”。我军加强东、西两面的攻击力量，把敌

人拦腰截断，就能打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又能自由地将兵力向两翼扩展。关于对天津的攻击，我天津前线指挥部确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然后分割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方针。

1月14日10时，我军向拒不投降的天津守敌发起了总攻。刹那间，炮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去，气浪象暴风。几百门大炮、几千发炮弹倾泻在城墙上、堡垒上、暗堡上。城墙的突破口烟尘滚滚，砖石、泥土飞上半空。城墙摧毁得只剩下一溜漫坡，碉堡、暗堡纷纷倒塌，地雷爆炸，铁丝网节节粉碎。敌人的大炮被我们的炮火压制住，根本不能还击。敌人两架飞机向我阵地飞来，在我高射炮的痛击下拖着两股长长的浓烟坠了下去。

等我军炮火袭击敌人阵地的时间结束，我一纵左翼主攻师的两个尖刀连便跃出战壕，提前发起了冲击，涌向和平门突破口。

尖刀连提前冲击的行动，牵动了城西主攻的所有部队的行动。前沿战士们，看到尖刀连在城墙上插上了红旗，立即象潮水一样，冲过护城河，涌向突破口。

各主力部队都向天津城垣发起猛攻，城西二个纵队，城东二个纵队，四个主力纵队向天津拦腰杀去。城南一个纵队也在冲击。

各突破口都展开了恶战。在城西和平门城垣两侧的几个突破口，战斗最激烈。敌人被炮弹震昏了，但他们一清醒过来，立刻从残破的地堡里钻出来，向我军反击。在楼房上，在地下室，在各地堡群，敌人反击的队伍涌出来奔向突破口。突破口刺刀闪动，杀声震天。市区敌人坦克也出动了，我军用反坦克炮射击。在和平门内敌人拆毁的房基上，形成一片开阔地。敌人涌过开阔地，我们就用化学迫击炮向那儿轰击。敌人一次又一次反冲锋……

突破口里面的开阔地上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和散乱的枪支。离突破口不远的房子里，挤满了缴枪的俘虏。后续部队以迂回、包围动作，经小巷转大街，开始分割敌人。向纵深不断推进。

巷战，街垒战，在紧张地进行。枪声、炮声、坦克的轰鸣声响成一片，敌人还在顽固地抵抗。他们从街心的碉堡里喷射出交叉火力，封锁着道路；从高楼顶上掷下手榴弹；从窗口丢出炸药。市区进行着逐屋逐街的争夺战。战士们编成四组一队队形，交替掩护，穿插分割。爆破手爆破碉堡，工兵在墙壁上掏开洞口，开辟道路。

一纵副司令员曹里怀和左翼主攻师师长贺东生乘坐坦克到战斗最激烈的前面去指挥，他们的坦克开到一幢大楼跟前，发现步兵正分队包围着大楼向前猛攻。大楼里的敌人凭借坚实的钢筋水泥墙壁，继续顽抗。我们的战士送上炸药去炸，炸不动，一见自己的坦克来了，高兴极了。曹里怀和贺东生本来是到前面指挥的，看到这种情况，立刻指示坦克为步兵们开路。他们坐在舱内，让坦克往大楼上撞击。坦克冲一下，退一下，猛然又冲一下。几阵猛烈的撞击，终于把大楼撞开一个大窟窿，步兵们欢呼着随坦克冲进了大楼。

在我军西路两个纵队攻占敌人第一线阵地金汤桥一带不久，东路两个纵队也杀开了民权门，东、西两路在金汤桥会师。从此，天津守敌被分割成数块，陷于极度混乱状态中。从天津南面攻坚的一个纵队，也早从南面突破。我各路大军乘势穿插、分散追捕，火速席卷全城，在15日8时攻占了敌人最有力的支撑点海光寺。一纵右翼主攻师，在15日拂晓首先打到天津警备司令部，敌我双方利用院内的墙角、沙袋，展开激烈的拼杀战，逐屋争夺，从院内打到屋内，从楼下打到楼上，抓了大批俘虏。后来，战士们冲进地下室，

活捉了天津警备司令官陈长捷。

就这样，经过二十九个小时的战斗，陈长捷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天津城即被我大军攻破，他的十三万人全部被歼。这个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第一次回到人民的怀抱。

天津战役的胜利，展示了我军强大的军事威力，教训了傅作义及其他国民党残余军队，如果他们执迷不悟，继续坚决与人民为敌，必将在人民解放军的铁锤下彻底毁灭。

天津战役结束后，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共九十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将二十万守敌团团围住。我们把炮兵全部集中起来，敌人惧怕的具有强大摧毁力的一五五大炮，对准了北平城墙。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我人民解放军向北平守敌发动了政治攻势，与傅作义的代表进行谈判，积极争取守敌接受和平改编，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在这个过程中，我全军将士以战备姿态积极进行整训，随时准备攻城。

事实上，早在1948年12月中旬，我军包围北平的那一天起，傅作义的代表就和我方代表开始接触，进行和平谈判。在政治上，我军一直积极主动地争取和平改编敌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在军事上，我军丝毫没有松懈，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一旦敌人最后拒绝放下武器，不愿意归向人民，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我军就坚决、彻底、全部地把敌人歼灭掉！当然，敌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它是决不会轻易放下武器的。起初，傅作义依靠着几十万军队和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等城市和战略要地，企图同我军较量一下，进行顽抗；当我东北野战军全部进关以后，他又梦想着率部跑到绥远、太原或者青岛、上海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所以，和平谈判虽然进行了一个多月，傅作义一直采取敷衍的态度，谈判时断时续，没有结果。我军在全部歼灭了平绥线的敌人以后，毛泽东于1月14日宣布了八项和平条件，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1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傅作义送出关于和平解放北平办法的通牒。直到这时，傅作义对和平谈判的态度，才算实际一些了。

最后，傅作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接受和平改编。

22日上午10时，北平的国民党部队，按照计划分别从各城门开出，到指定地点集结。正午12时，北平广播电台播发了傅作义将军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27日，守城的国民党部队大部分开出城外。31日，我一个师入城接替北平守备事宜。

2月3日，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举行轰动世界的北平入城式。

这一天，北平城所有大街小巷，人山人海，一片欢腾。人们穿红披绿，熙熙攘攘，手里捧着鲜花和彩旗，狂歌欢舞。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热烈欢呼古都的新生！

10时整，入城式隆重开始。坦克、装甲车、牵引炮车发出震耳的隆隆声，从永定门滚滚而来；随后是全副武装，浩浩荡荡的步兵行列。顷刻之间，欢腾的人群蜂拥而上，有的和战士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有的跨上坦克、装甲车和炮车，贴上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标语。鲜花插在英雄们的胸前，彩纸纷纷洒落在英雄们的身上；鞭炮、锣鼓响声连天。人民和战士融合在一起，在这一千多年古老的城市里，第一次欢度盛大的人民的节日。

平津战役从1948年12月5日开始，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五十六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至此，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被消灭殆尽，人民革命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夕。

平津战役，充分展示了毛泽东的高超战争指挥艺术。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鏖战正酣，毛泽东便命令参加辽沈战役的东北野战军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野战军的两个兵团，出其不意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稳住了华北的敌人，为歼灭和平改编华北敌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是棋高一着、匠心独运，实在是一般军事家所望尘莫及的。在平津战役中，创造了解决敌军的两种方式，这就是“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在我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劝告平、津守敌接受和平解决。天津守敌陈长捷等拒绝投降，我军便以战斗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了该敌。在天津解放之后，迫使北平守敌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法，这就使北平这一文化古都以不流血的方式获得解放。天津方式、北平方式以及平津战役之后的绥远方式，对于解决残余敌军发挥了重要作用。用三种方法解决敌军，是毛泽东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结合的思想，在敌军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和谈阴谋怎能骗 百万雄师下江南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为了进行垂死挣扎，又一次玩弄起和谈阴谋。蒋介石求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他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文告中，却提出了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为和平谈判的基础。显然，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蒋介石之所以在这时发表求和声明，是由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为了争取喘息时间，以便组织残余军事力量，卷土重来。他在发表求和文告前后，积极地进行了战争部署：以其心腹将领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负责长江防务，妄图凭借长江天堑阻挡解放军渡江南进；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同时还拟定了一项利用和谈争取在三至六个月时间内，在长江以南重新编练二百万国民党军队的计划。第二，美国的策动和压力。美国眼看蒋介石惨遭败北，众叛亲离，因此，阴谋策动由反动面目尚未暴露或在人民中有某些幻想的人物来代替蒋介石，装扮起和平“面孔”，欺骗人民，借以保存反动势力。同时，利用某些既同反动营垒有联系，又同革命营垒有联系的“自由主义人士”，鼓动他们呼吁和平，并竭力让他们混进革命阵营，组织反对派。第三，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民党内一些地方系军阀，企图利用对蒋介石的不利形势，取蒋而代之。1948年12月24日，桂系首领之一、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从汉口致电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目的是逼蒋下台。随后，在白崇禧操纵下的湖北省参议会也打电报给蒋介石，要蒋“改弦更张”，“恢复和谈”。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才发了求和文告，以退为进，向我发动和平攻势。

为了揭露美蒋的新的和平欺骗，以及他们策动搞所谓“南北朝”、“三分天下”、“划江而治”的政治阴谋，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里指出，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才能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一起掀掉，才能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真正的独立国，才能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的局面，也才能造成使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先决条件。相反，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会给反动派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晨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所以，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毛泽东指出，敌人将继续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象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彻底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并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求和的声明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求和的欺骗性、虚伪性。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及任何其他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

的一切权力。这样一来，就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谈阴谋完全揭穿了。

蒋介石被迫于1月21日宣告“引退”。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总统后，发表声明，同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条件为和谈基础。但是李宗仁的声明也是虚伪的。他企图通过谈判，阻止解放军渡江，与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使桂系掌握半壁河山。而且，蒋介石名曰引退，实则幕后指挥。毛泽东洞察其奸，并且深信，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打击，国民党的统治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但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拒绝这个谈判。这是因为，国民党还有一部分军队，如果它真能（部分地也好）接受八项条件，达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和平解放，使战争时间缩短，人民减少痛苦，地方减少破坏，这是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况且，部分地区的和平解放也是可能的。如果以后国民党拒绝实行八项条件，那便恰好暴露了他们要求“和平”谈判的欺骗性。

4月1日，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为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等，在北平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谈判，经过努力拟定了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国内和平协定。但是，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1949年4月21日，即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第二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各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和南方各游击区的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当日，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的湖口，东至江苏的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东、西、中三线发起渡江战役。21日，长江风平浪静，我解放大军千船竞发，以摧枯拉朽之势，直取对岸。中路大军首先在芜湖至贵池之间突破敌阵。东路在江阴至镇江间，西路在贵池至彭泽间，也相继登上南岸，仅两天两夜即彻底粉碎了敌人所谓不可超越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接着，各路大军向南挺进，转入战略追击阶段。5月3日解放杭州，并控制了浙赣线。22日解放南昌。27日攻占全国最大城市上海。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于5月14日从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二百余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15日，争取了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在贺胜桥、金口等地起义。16日、17日，先后解放武汉三镇，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四十三万余人。接着，各路野战军分别向南方和西北各省挺进，用战斗与和平两种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当年毛泽东曾满怀豪情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光辉诗篇，赞扬我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宣告蒋家王朝灭亡的壮举：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蒋介石一面玩弄和谈阴谋，一面加紧组织残余军事力量，妄图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针锋相对，采取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方针，可

谓是有理、有利、有节。尽管知道你谈判毫无诚意，还是与你进行谈判，算得上有理。所谓有利，对于那些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受他们和平欺骗的人们是最好的教育。所谓有节，先礼而后兵，做到仁至义尽，你不在和平条约上签字，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在南京政府拒绝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一声令下，我百万雄师便横渡长江天堑，冲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向全国进军。敌人不放下武器，就让他彻底灭亡，这也是以打对打的必然结果。

为国一统定大计 势如破竹扫残敌

1949年五、六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已经夺取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都城南京，并且已经解放了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等主要城市。我党中央一方面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指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在1949年下半年，继续向西北、西南、东南、华南进军，全部歼灭祖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

当时在祖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绝大部分猬集在华南和西南。据守广东的是余汉谋集团，据守湖南、广西的是白崇禧集团，据守西南的是胡宗南集团和川、云、贵等省的地方军阀。这几个集团的军队总数还在一百万以上，并且互相勾结，组织所谓湘粤联防和西南防线，企图建都广州、重庆，进行顽抗。

必须迅速地歼灭这些残余的敌人。但是怎样去歼灭这些敌人呢？毛泽东在进军的指示中指出，必须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对西南的作战，又强调指出：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这是一个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是一个极为英明的决策。这个方针，和那种赶着敌人，放走敌人，使敌人逃至海外或云贵地区得以负隅顽抗的办法完全不同，因为，这些残余的敌人虽然还有一百余万，但是，整个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他们是抵抗不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的；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下，他们很可能逃往海南岛或猬集云贵；这样，那就会增加以后解放海南岛和云贵地区的困难。采取大迂回的作战方针，先切断敌人的退路，才能全部、彻底地消灭这些敌人，免遗后患。

怎样来实现这个作战方针呢？毛泽东还精心规划了整个的作战计划：首先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等部，由江西到广东，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歼灭敌余汉谋集团；然后在11月，第四兵团由广东进入广西南部，迂回白崇禧集团的右侧背，第四野战军主力则进至柳州、桂林地区，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大包围，同时，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入贵州，占领贵阳，既切断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的联系，防止两敌逃入云贵，又在陕南的十八兵团形成对胡宗南集团的大包围；最后，在12月，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在第四兵团的配合下，歼灭白崇禧集团，第二野战军主力由贵州迂回川南，在第十八兵团的配合下，歼灭胡宗南集团，而第四兵团则在歼灭白崇禧集团以后，再由广西进军云南，解放云南。

毛泽东所规划的这个作战计划，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周密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计划，以后战争的发展完全是按照这个计划的顺序、时间和预想进行的。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要实现大迂回的计划，首先让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等部进军广东，歼灭敌余汉谋集团。

余汉谋集团在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中是较小的一个集团，其正规军有三个兵团共约十二万人。在当时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敌人仍然进行垂死挣扎，以苟延残喘。余汉谋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组成了所谓湘粤联防，也就是以湘南衡阳、粤北韶关等重点布防，企图借以保障两广，我第四野战军根据毛泽东所拟定的作战计划，决定以十二兵团、十三兵团等部在湖南衡阳、宝庆地区发起衡宝战役，寻歼白崇禧集团一部；同时，以四兵团、十五兵团等部攻占韶关等地，然后直下广州，歼灭余汉谋集团，以便下一步全歼白崇禧集团。

9月上旬，第四兵团各部先后开进到江西南部，而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欢呼声中向广东进军。

这时，四野主力已开始衡宝战役，正在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一部，原在湘粤赣边区布防的白崇禧的另一部被迫北调增援。这样一来，粤北余汉谋的部队就孤立了，其所谓湘粤赣联防就破碎了。因此，当四兵团和十五兵团跨过五岭出现在粤北时，韶关等地的敌人便弃城南逃。敌人弃守韶关等，正好为我军大开了广东门户，四兵团和十五兵团便勇猛追击，迅速向广州前进。

在追击作战中，我两个兵团的指战员发扬了不怕困难勇敢战斗的革命精神，各个部队每天行程一百三十余里。敌人为了阻止我追击，他们在许多桥梁上安放了炸药，准备破坏桥梁，迟滞我军前进。但是大部分还没有爆炸，我们的追兵便赶到了，在那里执行炸桥任务的敌军不是当了俘虏，就是仓皇逃窜。为了抵抗我军的猛烈进击，敌人还企图在清远、源潭一线布置防守广州的最后防线，但这种部署还没有完成，又被我们分路追击的部队所击破，部署防御的敌人转而溃逃，广州的敌人也不得不仓皇逃走。14日晚，我们两个兵团进抵广州，提前完成了毛泽东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的计划。

当时，余汉谋的三个兵团，除十二和十三兵团已为我军歼灭一部分外，其主力二十一兵团还未遭受打击。必须迅速判明这些敌人的逃向，加以歼灭。

为弄清敌人的逃向，我第四兵团一个军的主力在两岸还有敌人的情况下，顺北江乘船南下，一夜行进一百六十里，直插广州西面的三水、高要等地。这样一来，就卡住了北江、西江的汇合点，控制了由广州到广西的要道；并且在占领三水、高要的战斗中，歼灭了敌人的两个师，查明了敌人的二十一兵团等部是在向雷州半岛逃跑。

10月17日，毛泽东亲自发电指示，要乘胜直追，歼灭逃敌，既便于解放海南岛，又为进入广西歼灭白崇禧集团创造条件。

我第四兵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以惊人的顽强精神，继续以每天一百五十多里的速度进行了五天的英勇追击，终于在24日，在广东南海边上的阳江、阳春地区追上了逃敌。

逃敌二十一兵团等部共四万余人，当发现我部队追上以后，便将大批辎重和汽车焚毁，夺路向西逃跑。我们追击的先头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却毫无犹豫地抢占要点，阻止敌人逃跑，一天之内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我们追击的后续部队也逐渐赶到。25日，我军组织了对被围敌人的进攻。敌人为了逃命，在这一天之内，以三个师的兵力向西发动了八次绝望的进攻，但除去尸体越积越多之外，其他毫无进展。于是敌人便转而向南，企图在海横乘船逃跑，我军就势分割包围，经过一大的激烈战斗，到26日，全部歼灭了敌人，胜利地结束了广东作战。

四野的主力在衡宝战役中歼灭了白崇禧集团一部，陈兵在湘桂边境；四兵团和十五兵团在广东作战中，歼灭了余汉谋集团的主力，四兵团陈兵在广东西部。这就形成了能够南北合击白崇禧集团的有利形势。这种有利形势，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计划的英明。

当时退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还有五个兵团，余汉谋的十三兵团残部也逃入广西，共约十七万人。其逃跑的道路，一是西入云贵，一是南逃海外。四野执行毛泽东全歼敌人的计划，决定：以十三兵团为西路，沿黔贵边境迂回前进切断敌人逃往云贵的道路；以四兵团和十五兵团的一部为南路，进入粤桂边境的廉江、茂名、信宜地区，防止敌人向海南逃窜；以十二兵团等部为

中路，首先牵制敌人，便于西路、南路断敌人后路；等西、南两路切断敌人的退路后，即由北向南，围歼敌人。这样就使白崇禧集团陷入我人民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之中。

11月上旬，我东、西两路迅速前进。到东路大军到达廉江、信宜一线布防时，西路十三兵团已占领金城江，开始追歼敌人的十七兵团；我中路十二兵团等部已开始进攻，解放了桂林。白崇禧看到中路军步步紧逼，退往云贵的道路也被切断，只有夺路向海南岛逃窜，其实，在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夺路谈何容易。

但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白崇禧只好孤注一掷了，或鱼死，或网破，二者必居其一。为了夺取逃路，白崇禧以第三、第十一兵团为先头，以第一、第十兵团为后继，在逃向廉江以西的余汉谋的第十三兵团残部配合下，向我担任阻击任务的第四兵团发动了猛烈的所谓“南线攻势”。从11月25日开始，敌人以集中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我阵地连续猛烈地攻击，拼命夺路。但是，在我指战员勇猛顽强的抵抗下，敌人的每一次进攻都遭到了重大的杀伤，不得不遗尸而退。当敌人的气势开始下降之时，我担任阻击的第四兵团开始反击，从而使进攻夺路的敌人转向了全线溃退。

夺路逃向雷州半岛不成，白崇禧便先乘飞机逃往海南岛，并命令其部队迅速逃向合浦、钦州，乘船逃命。我第四兵团立即沿着粤桂边境和广西的海岸，开始猛烈追击，四野主力也分路兼程南下。

这次追歼战，异常猛烈。部队昼夜不停地前进，许多指战员脚上起了一层一层的泡，不少人腿也肿得老粗；在追歼中一直“马不停蹄”，指战员都没有领到棉衣，在严冬的旷野，翻山越岭地追歼敌人，寒冷异常。但是，指战员以惊人的顽强毅力，战胜疲劳和寒冷，毫不停息地追击敌人。这样，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我四野部队在第四兵团的配合下，追歼了敌人第三、十一、十三兵团的残敌，活捉了敌华中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控制了合浦；接着又向钦州急进。我广大指战员继续发扬惊人的顽强精神，翻山涉水，勇猛前进，四天行军六百里，敌人前脚刚到，我先头部队便赶到钦州。6日，四野主力在第四兵团一部的配合下，在钦州以北的小董圩、大寺圩地区歼灭了敌人的第一、第十兵团。我第四兵团的另一部围攻了钦州，歼灭了敌华中长官公署。

就这样，按照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计划，四野主力在第四兵团的配合下，顺利地全歼了白崇禧集团。

毛泽东在指挥华南和西南的大歼灭战中，曾多次指出不能让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退入云南，指出如两敌或两敌之一退入云南，则不仅易于逃向国外，并且由于云南的地理形势，我们不可能派几个兵团入滇作战，歼敌就要时日。因此，毛泽东就十分强调首先夺取贵州，既切断敌人胡宗南与白崇禧两集团之间的联系，又防止了敌人退入云南。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使敌人这两大集团都未能退入云南，这就形了解放云南的有利条件。同时，在党的领导下，滇桂黔边区纵队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已开创了广大的根据地，武装力量已发展到了三万多人。

1949年12月上旬，敌人的白崇禧集团被歼，胡宗南集团已陷于我二野主力和第十八兵团的夹击之中，卢汉将军在昆明宣布起义。但是，盘踞在云南的国民党第八兵团却继续与人民为敌，企图进占昆明，控制云南。为了打

击敌第八兵团的这种企图，中央军委即令滇桂黔边区纵队结合当地人民，保卫昆明，又令解放贵阳的第五兵团以其一部迅速进入云南支援。

敌人的第八兵团进攻昆明不成，便南下退集于蒙自、个旧地区，控制滇南，准备负隅顽抗。敌人自以为抵抗不成，还可以逃跑，因为拥有蒙自飞机场，况且离国境线不过一百多里。毛泽东为了歼灭这些敌人，除令驰援昆明的部队暂行停止前进以麻痹敌人外，即令驻百色的四野的一个军以一部速向滇越边境前进，占领金平、河口一线，切断敌人向越南的逃路，又令第四兵团以一部迅速向蒙自前进，协同滇桂黔边区纵队歼灭该敌。这样，毛泽东又布置了一个迂回、包围、歼灭敌人的作战计划。

第四兵团接到毛泽东的命令后，在1950年1月1日派一个军昼夜兼程向蒙自前进。南宁到蒙自约两千里，要翻越许多大山，但部队轻装急进，半个月就到达蒙自，首先袭占了敌人的飞机场，使敌人由空中逃跑的幻想成为泡影。

敌人完全没有料到解放军行动如此神速，他们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还刚刚从台湾飞来，准备把其第八兵团的二十六军空运到台湾去。但他的部队还没有飞走，我第四兵团的一个军便从天而降，这就使聚集在蒙自地区准备逃跑的敌人一下子乱了阵脚，纷纷向西、向南逃窜。这个军立即配合已经到达河口的我四野的部队和滇桂黔边区纵队进行追歼，先在个旧、屏边地区歼灭了敌人的二十六军，又向西追击向滇西南逃跑的第八军。

滇西南地区山高路小，形势险峻，易守难攻，大部队行动、作战都十分困难。根据这种情况，追击部队以营、团为单位，分多路追击。经过十几天的艰苦作战，终于在元江、镇沅地区歼灭了敌人的第八军，活捉了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

至此，人民解放军围歼华南、西南的敌人划上了非常圆满的句号。

我军围歼华南、西南敌人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战争指导路线的正确，再一次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正是毛泽东为歼灭华南、西南的敌人所确走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和作战计划，才使得敌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在人民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中束手就擒。如果不是采取这个方针，就不可能这样迅速地歼灭敌人。如果余汉谋集团的主力、白崇禧集团的主力逃到海南岛，就会大大增加解放海南岛的困难；如果白崇禧集团或胡宗南集团逃入云南，也会大大增加解放云南的困难；就是滇南的敌二十六军、第八军，如果大部分跑到台湾或国外，也会造成许多不利影响。正是由于毛泽东胸怀全局，高瞻远瞩，作出英明的战略决策，从而使我军在广东作战、广西作战和滇南作战中，势如破竹力克群雄，进而为我军进一步解放国民党当时仍然占据的地区扫清了障碍。

审时度势谁能比 不拘一格捣“天涯”

1949年12月，两广战役胜利结束，中南地区全部解放，毛泽东及时发出命令：准备解放琼崖。毛泽东特别指示，要在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问题。

海南岛是南中国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已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妄图以舟山、金门、万山、海南诸岛互为犄角，构成一道防卫台湾的海上屏障，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海南防御总司令”，纠集残敌约十万人，仗着五十多艘军舰，三十多架飞机，加紧巩固其所谓“陆海空立体防御”，不断派军舰到大陆沿海骚扰破坏，派飞机窜入广州、武汉等地狂轰滥炸，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安全。

毛泽东发出及早解放海南岛的命令，这是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早日发起海南战役，可以乘敌立足未稳，打烂其妄图赖以反攻大陆的海上部署，确保我国南方的安全。这对于巩固国防，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解放海南，是我军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渡海作战。雷州半岛至海南岛最短距离为四十里。部队登陆需要绕过暗礁及敌火力点，这样，最近距离也有一百二十里左右。当时我军一无渡海作战经验，二无机械化渡海工具，三无海空军支援，面对茫茫大海和敌人的陆海空“立体防御”、打这样的仗确实困难重重。毛泽东在部署攻打海南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作战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毛泽东的指示，透过错综复杂的关系，紧紧抓住了渡海作战的主要矛盾。就当时的条件看，渡海的困难很多，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动员木船，立足现有装备，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可是，林彪却同毛泽东的指示唱反调，不切实际地主张到港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器船，并要求军委准备飞机配合。

毛泽东批驳了林彪的错误主张，指出这次战役有琼崖纵队配合，敌人战斗力差等有利条件，教育大家坚走用木帆船渡海作战的信心。毛泽东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一个海上练兵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就基本掌握了潮水、风向的规律，学会了一套海上作战的本领。

为了大举登陆，参战部队首先以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从涠洲岛夺得了敌军的四百只大帆船，解决了部队当时船只不足的困难。

薛岳发现我准备解放海南的意图后，一面加紧海岸设防，一面调集兵力“围剿”我五指山根据地，增加了琼崖纵队的困难。为加强海南岛我之内应力量，同时为对我们的海练进行一次实战检验和战役侦察，我军决定先组织一个加强营向海南岛偷渡。3月5日黄昏，八百名勇士分乘十四只战船，顺风扬帆，直扑海南岛。6月14时，潜渡营在海南岛两侧的白马井登陆，海峡天险跨越了！潜渡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情绪，坚定了大家渡海作战的必胜信心。同时也初步显示出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的英明。

3月26日晚，我部队又以一个团的兵力组织了第二次偷渡。部队起航时，非常顺利。不料，后来风向突然变化，海上又起了大雾。联络信号失效，大部分船只漂流到敌人正面防御较强的地段，情况极其险恶。但勇士们毫不退缩，他们以猛烈的火力回击着敌人军舰、飞机、陆上的三面阻击，英勇奋战。有的班排是靠单船冲破敌人的严密封锁强行登陆的。全团上岸后，猛打猛冲，先后打垮了敌人十个营的层层堵击，毙伤俘敌八百多名，击伤敌舰一艘，击

落敌机一架，胜利地进入了五指山根据地。

一只单船也可以登上海南岛的事实，揭开了敌人正面防御的“秘密”，使作战部队看到了解放海南岛的时机已经成熟，坚定了大举登陆的决心。那时对下一步如何打法，有两种主张：一是万船齐发，大举登陆；一是继续组织小型潜渡。其实，毛泽东在下达解放海南作战命令时就明确指示：必须集中一次，运载一个军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的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巩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要依靠后援。

林彪却顽固地坚持后一种主张，硬是电令部队继续组织小规模偷渡。当时如果按照他的主张去做，必然会贻误战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参战部队几次要求抓住有利时机大举登陆，迅速解放海南，林彪都置之不理。是毛泽东亲自批准了渡海作战计划。4月16日，全军齐发，直捣“天涯”。

4月16日，东风拂面，平潮伏流，下午6点半，一声“起航”命令，我东西线部队分乘千百只战船顺风而下，直指海南。船行三十余里，敌人的飞机、军舰发现了我船队，拼命向我军轰炸、扫射和炮击。我船队一面还击，一面急速推进，凌晨两点半左右，一片黑乎乎的山峦出现在眼前，这就是战士们日夜盼望的“海南岛”。

敌人拼出全力作“困兽之斗”，岸上、海上、空中的各种火器，一齐向我船队射击。船队离岸还有五、六十米，战士们就跳进齐胸深的海水，勇猛地向岸上扑去。薛岳苦心经营了几个月的“立体防线”，不到一个小时就被突破了。仅用四个小时，我军就全部登陆完毕。部队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作风，迅速向敌纵深推进，很快就同接应的潜渡部队和琼崖纵队胜利会师。

第二天午夜，我登陆部队包围了临高城。但不见敌人反扑，不见薛岳早已组织起来的机动部队“围剿”。敌人主力到哪里去了呢？

登陆部队对敌情作了认真分析：根据敌人的部署和行动，薛岳很可能首先集中主力于东线，企图歼灭我东线部队于登陆滩头，然后各个击破。因此登陆部队当机立断，将临高城交给琼纵和潜渡部队继续围困，迫敌投降。我军主力则甩开临高，东进澄迈。部队赶到澄迈以北，就得知澄迈敌人一个师已调往美亭。澄迈方面已结束了隆隆的炮声。我军部队马不停蹄，冒着敌机的轰炸，迅速向美亭急进。原来我东线部队登陆后，马上包围了美亭之敌。薛岳闻讯迅速集中了四个师的兵力对我实施反包围，东线部队腹背受敌，态势非常严峻。西线部队当即分两路采取钳形攻势，以主力将敌人“反反包围”。敌我双方包围，反包围，内线外线，犬牙交错，展开了反复的肉搏战。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激战持续到23日拂晓，敌人的主力被歼，我东、西两线部队胜利会师。薛岳看到大势已去，急忙于当天下午发出总撤退命令。薛岳乘机逃跑，敌人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拼命逃窜，急急如丧家之狗，惶惶似漏网之鱼。我西、东两线部队相互配合，乘胜追击，势如破竹，歼灭了大量敌人。逃跑的敌六十二军（欠一个团），被我徒步追击部队赶上，不到两个小时就全部被歼灭，副军长罗懋勋被我活捉。半个月的时间，残敌尽扫，全岛解放。

海南战役的实践充分地证明，毛泽东指挥作战，从来都是审时度势，不拘一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立足现有设备，刻苦进行训练，努力提高军事艺术，灵活运用战术和变换战术，有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有什么地形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种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战争

指导艺术，对于今天提高我军的军事艺术，巩固国防，抵御外来侵略，仍有着重大的意义。

密过江攻敌不备 初入朝旗开得胜

1950年，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业待兴。而美国武装入侵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同时把战火燃到了我东北鸭绿江边。面对美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挑战，毛泽东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并为志愿军制定了扬长避短的作战原则，指示志愿军要广泛地实施夜间作战和寻机同敌人打运动战，并把敌人飞机对我军活动的妨碍程度和我军利用夜间行动作战的熟练程度，作为争取转变朝鲜战局的决定条件之一。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击美国侵略者的斗争。而我志愿军过江后的第一个战役就打了一个漂亮仗。出国前，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的作战方案是，我军入朝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地。第一阶段只打防御战。待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转入攻击。

但是，敌人的进展比我们预计的要快。就在我军10月19日渡江之夜，敌军已占领平壤，并迅速越过了我们预定的防线。由于这时敌人尚未发觉我志愿军入朝，还在继续分路前进，兵力逐渐分散。这种形势的出现，为志愿军利用敌人认为中国出兵可能性很小的判断错误和分兵冒进的弱点，在运动中实施突然袭击，各个歼灭敌人造成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于10月21日电示志愿军放弃原定组织防御的计划，改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他指示：此时是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后开始作战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毛泽东又几次电示：首战一定要对准态势突出而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第二军团。第一仗如不准备打东线南朝鲜军，则以第四十二军的一个师置于长津阻敌即够，该军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牵制元山、平壤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这样即可集中三个主力军，各个歼灭南朝鲜第二军团之第六、七、八师。他还指示志愿军在打法上以利于主力插到敌人的后面和侧面，全歼敌人原则；要注意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并反复叮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至关重要，迟则恐来不及。

彭德怀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立即集中第四十军集结于温泉以北、北镇以东，待机攻歼南朝鲜第六师于温井西北；第三十九军集结于云山西北，待南朝鲜第一师东援第六师时将其歼灭；第三十八军和第四十二军一二五师集结于熙川以北，准备歼灭南朝鲜第八师；第四十二军主力集结于黄草岭、赴战岭一带，阻敌北进，牵制东线敌人，配合西线作战。同时命令志愿军第五十军、第六十六军入朝参战。

10月25日，西线“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由于未遇到有力的抵抗，便头脑昏昏，便以师甚至以团或营为单位分兵冒进，逐渐逼近志愿军第四十军部队；其先头部队南朝鲜第六师第七团已进至古场洞并继续向鸭绿江边楚山前进。25日凌晨，进至北镇东南的志愿军第一一八师，奉命采取同敌预期遭遇的姿态占领温井以北两水洞至丰下洞东北侧高地，准备伏击向北镇进犯之敌；进至云山以北的第一二师也奉命以其第三六团进占云山东侧的玉女

峰等高地，准备坚决阻击从云山向温井北犯之敌。7 时左右，南朝鲜第一师先头部队，以坦克为先导，气势汹汹地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进至志愿军第一二师第三六团阵地前，该团突然开火，敌人猝不及防，遭一顿痛击后落荒逃回云山。

10 时左右，南朝鲜第六师的一个营和一个炮兵连乘汽车由温井迅速向北镇方向开进。当进到两水洞与丰下洞一带时，志愿军第一一八师第三五四团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一阵激战之后，立即分路冲向公路，将敌人分割成三段。第三五三团的两个营也立即从右翼出击，配合第三五四团的战斗。这股敌人遭此突然打击，顿时乱作一团，火炮未及开架，弹药未及开箱，即被全歼。志愿军一开战就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缩回云山的南朝鲜第一师先头部队经整顿后又发起进攻，企图抢占有利地形，掩护主力继续前进。志愿军第一二师第三六团坚决阻击，战斗十分激烈，多次打退了敌人。

当夜，志愿军第一一八师、第一二师各队以两个团乘胜攻占了温井，并歼敌一部。

志愿军在玉女峰、两水洞及温井所进行的战斗，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鉴于敌军过于分散，志愿军想一仗聚歼敌人两三个师也很困难，彭德怀临机应变，果断决走从 25 日开始以军和师分途歼敌一两个团，求得在第一次战役中以数个战斗歼灭敌人一两个师，制止敌人乱窜，稳定人心。毛泽东当即复电指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26 日凌晨，第四十军攻占了温井，歼灭南朝鲜第六师一部；29 日拂晓，他们又在龟头洞、立石洞将南朝鲜第六师、第八师各两个营大部歼灭。当晚，又将从楚山回窜的南朝鲜军第七团大部歼灭于古场洞、柳良洞、龙谷洞地区。与此同时，第三十八军已进占熙川，守敌南朝鲜军第八师仓皇南逃；第三十九军也已对云山之敌构成三面包围。

吃了败仗的美军并未因此而接受教训，当年太平洋战场的五星上将、如今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一面调整部署，以美军代替溃退的南朝鲜军；一面继续分兵冒进，做起感恩节（11 月 23 日）以前结束朝鲜战争的美梦。

此时，作为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敏锐地发现，敌人虽然调整了部署，但仍处于分散状态，利于志愿军各个击破。于是决定采取向敌后实施迂回，结合正面突击的战法，割断其南北联系，集中兵力，将敌各个歼灭于清川江以北。

志愿军总部于 11 月 1 日 9 时下达了作战命令。西线志愿军各军便陆续开始了对敌人的进攻。

第三十九军于下午 5 时对云山之敌发起进攻。这时，云山已由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换防，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第一一六师在炮火的支援下发起冲击，沿途遇美军一部顽强阻击，战士们猛打猛冲，于 23 时攻占云山西北的龙浦洞、二六二高地，直取云山。激战至 2 日 3 时，第一一六师占领云山后，即以一个团继续向云山东南上九洞方向攻击。第一一七师从东北方向云山以东的三巨里进攻，围歼南朝鲜第一师第十二团一部，于 2 日凌晨与第一一六师会合。从云山西南方向进攻并担任断敌退路任务的第一一五师主力，于 2 日拂晓截住并包围了从云山撤退的美骑兵第八团直属队和第三营共七百余

人。2日、3日，被围之敌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多次拼命突围，均未得逞。3日晚，第一一五师乘被围之敌疲惫绝望之际，发起猛烈攻击，将其全歼。

云山战斗，是志愿军首次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之大部及南朝鲜军第一师第十二团一部，共歼敌两千零四十六名（其中美军一千八百四十名），缴获飞机四架，击落敌机一架，击毁与缴获坦克二十八辆，缴获汽车一百七十六辆，各种炮一百九十门及大批枪支弹药、器材和物资。

在取得云山大捷的同时，志愿军在西线的其他部队也连战告捷。第四十军歼灭南朝鲜第八师、美骑兵第一师的炮兵各一部，逼近宁边。第三十八军攻占球场后，主力随即沿清川江左岸攻击前进，占领院里，构成了对西线敌军侧后的很大威胁。第六十六军进到龟城近郊，阻击与牵制了美第二十四师。第五十军由安东（今丹东）过江，进至新义州以南，准备阻击窜至南市洞的英国第二十七旅。

11月3日，西线敌军在志愿军的连续打击下，特别是其侧后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深恐后路被切断，对其不利，开始向清川江以南实施全线后撤。志愿军为不让敌人撤逃，采取了多种办法，千方百计想堵住敌人，终因次日下雨，徒步追击行动困难，使敌军得以乘车逃脱。至此，在西线战场敌军除少数兵力扼守清川江北岸滩头阵地阻击志愿军进攻外，主力部队均退逃至清川江以南。志愿军总部鉴于歼敌机会已失及其他考虑，遂命令西线各军于11月5日停止进攻，结束第一次战役。

在西线敌军猖狂北犯的同时，东线敌军也分路向江界和图们江边推进。为保障西线主力作战，阻敌不得西援，志愿军第四十二军主力在东线的两个师，在朝鲜人民军一部协同下，从10月25日开始，分别在黄草岭、赴战岭地区，以英勇顽强的精神与北进的南朝鲜首都师、第三师和美军陆战第一师展开猛烈的战斗。经几天激战，志愿军粮弹消耗殆尽，伤员不断增加，处境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指战员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坚守阵地。他们粮食吃完了就以草根充饥，弹药用完了就以石块作武器，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支援下的凶猛进攻。经十三昼夜苦战，歼敌两千七百余人，终于制止住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阵地，粉碎了敌人迂回江界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西线志愿军作战，为整个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英勇奋战，共歼灭敌人一万五千余人，粉碎了敌人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并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清川江以南，取得了初战胜利，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并取得了同美军作战的初步经验，增强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信心，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志愿军初入朝作战就旗开得胜，是与毛泽东的正确决策分不开的。首先，他能够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及时改变作战方案，变先组织防御作战半年后再进行反攻为争取运动战为主的方针。其次，指挥志愿军秘密入朝，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保证了战役的突然性。再次，为志愿军制定的先打伪军、后打美军、由弱及强、各个歼灭的作战原则保证了这次战役的胜利。

再进攻兵至“三八” 战局变世界震惊

1950年11月5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联合国军”被迫从鸭绿江边退至清川江以南，其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虽然志愿军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但战争形势尚未根本好转。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又在酝酿大举北侵的所谓“总攻势”。当时，他们在前线的地面部队已有五个军十三个师三个旅和一个空降团，总计二十二万余人，比第一次战役增加九万余人，且主要增加的是美军，并拥有飞机一千二百余架，坦克一千余辆，火炮一万余门。而且他们海军的大量舰艇也驶向朝鲜北部海域。当时，我志愿军仍没有空军，没有海军，没有坦克。敌人发起空中战役后，每天出动一千余架次飞机，轰炸和封锁鸭绿江与图们江上所有桥梁，并摧毁由北往南直至战线的所有交通工具、军事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敌军的狂轰滥炸，给我志愿军的兵员补充、粮弹供应造成很大困难。

毛泽东高瞻远瞩，指出：给“联合国军”第一个打击后，总的形势对中朝方面有利，只要抓住战机再给敌人一至两个较大的打击，就能从根本上改变朝鲜战局。他决心利用敌人恃强骄傲的心理和对志愿军入朝实力及意图判断上的错误，采取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的方针，争取在11月至12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为保证这一战役切实取得胜利，确定迅速调第九兵团入朝，进至长津地区，转变东线战局；东北军区用一切可能办法，保障东西两线粮弹、被服（保障御寒）之供给。……

11月6日，“联合国军”开始试探性进攻。7日，志愿军开始诱敌深入。21日，西线“联合国军”进至预定发起总攻势的“攻击开始线”；东线进至长津湖地区及鸭绿江边的惠山镇。

在“联合国军”兵力日益分散冒进的同时，亦即在其严密封锁鸭绿江和中朝人民后方每条道路的时候，志愿军第九兵团三个军十二个师十五万余人，悄悄地进入东线长津湖和厚冒江口地区，接替了第四十二军的东线作战任务，使志愿军在东线也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随后，第四十二军隐蔽地转入西线，又加强了西线兵力。这样，西线共拥有六个军二十二万余人。

11月24日，“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认为其“钳形进军的东路大军已进入包围态势”，战争已临“决定阶段”，便于当天上午10时在东京发表《公报》，宣布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开始。他集中在朝鲜的全部美、英、土耳其军和大部南朝鲜军共二十二万余人，以美军主力部队为东、西两线的主要突击力量，陆海空军联合向中朝边境大举进攻。这一天，麦克阿瑟还飞到朝鲜临空指挥，并沿鸭绿江飞行，窥视了中国领土。与此同时，敌人还大量散布了美蒋要联合“反攻大陆”的谣言。

就在“联合国军”忘乎所以地继续做他们圣诞节“庆祝胜利”的黄粱美梦之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根据战役前毛泽东关于“德川方面甚为重要”的指示及其在战役开始时拟走的作战方案，吸收第一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充分考虑当时敌情我情，制订了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反击作战方案。毛泽东对方案又作了重要修改。

25日黄昏，按照毛泽东和彭德怀制定的反击计划，西线第三十八、四十

二军，乘敌军立足未稳，出其不意，首先对进到德川、宁远的南朝鲜第七师、第八师发起突然而猛烈的反击。南朝鲜这两个师与美军相比，装备较差，战斗力也较弱；这里靠近两城间隔区，翼侧暴露；又是山区，不便机械化部队运动，便于步兵穿插。虽然这些条件对志愿军有利，但志愿军仍将这两个较弱的师作为“强敌”对待。毛泽东与彭德怀决定各以志愿军一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全歼；同时以第四十军攻击进入新兴洞、苏民洞地区之美第二师，以割断美军与该两师的联系；还电令第五十、六十六、三十九军，梯次东移，分别进入定州、泰川、云山地区阻击，吸引其当面之敌继续向北向西攻进，共同保障德川、宁远方向作战。担任攻歼任务的作战部队，对这两个师也非常重视。攻击德川的第三十八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为了形成对敌人的包围之势，战士们夜间爬过陡峭的七五五高地，徒涉岸边已结薄冰的大同江，一夜前进一百余里。最后终于将南朝鲜第七师五千余人大部歼灭，驻该师的七个美国顾问全部被俘。攻击宁远南朝鲜第八师的第四十二军，采取了南北夹击的战法，也将敌人歼灭其大部。担任割裂任务的第四十军，则将美第八师主力钳制于新兴洞及其以南地区，并歼其一部分。至此，志愿军按照毛泽东、彭德怀的部署，一举打开了战役缺口。26日晚，担任正面阻击的三个军向其当面之敌发起猛烈地攻击。

“联合国军”为堵战役缺口，急调土耳其旅和美骑兵第一师一部，从军隅里和顺川地区向德川方向机动，彭德怀判断，在当晚东线志愿军发起攻击后，西线敌军可能退向清川江南岸。随即按原来方案，令第三十八、四十二两个军于当晚向军隅里和三所里、顺川和肃川攻进，实行双层战役迂回，以利切断进入清川江北敌之后路，配合正面四个军首先歼灭美第九军两个师，尔后在敌撤退中，抓住并歼其一部。

美军第九军是美侵朝部队的主力。它辖下的美第二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著名的诺曼梯登陆，自称“永远不是第二的美二师”；美第二十五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马尼拉登陆作战的主力，曾获得过不少勋章、奖章；美骑兵第一师是美军中历史悠久、战功卓著的老部队，全师已无一匹马，但仍沿用其老称号；土耳其旅也是以剽悍著称。这些部队都是战斗力较强的。

27日黄昏，志愿军第三十八军主力两个师沿德川—军隅里公路及其北侧平行急进。在前进中他们分别遭到土耳其旅和美骑兵第一师的阻击。该军第一一三师经安山洞小路向军隅里南三所里迂回，这个师除去留下打扫德川战场和去安州南执行炸桥的人员以外，全师实际只有两个团插向三所里。一路上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十四小时前进一百四十余里，于28日8时前到达三所里，切断美第九军由军隅里向顺川的后路，一举震撼了敌人整个阵势。

当天夜间，东线第九兵团以第二十七、二十军两个军七个师的兵力，向进入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发起突然攻击。到28日早晨，完成了对柳潭里、新兴里之敌的包围，同时切断了各被围美军之间及其与黄草岭以南美军的联系，还逼近社仓里，与美第三师第七团对峙，东、西两线大量美军主力陷入困境。

为摆脱朝鲜战场困境，28日夜晩，麦克阿瑟在东京召开了有朝鲜西、东两线指挥官及美远东空、海军司令参加的紧急会议。但大伙一筹莫展，毫无良策。最后，麦克阿瑟指示沃克，“为避免被从东面迂回包围”，可于“必要时自行撤退”，扼守平壤一线。美第十军撤往咸兴、兴南一线。

朝鲜战局也震惊了华盛顿美国最高决策当局，他们连续召开会议，但均

没有找到能挽回败局的灵丹妙方，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为扭转朝鲜局势，“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他的讲话意味着，有可能马上要开始一次包括使用原子武器在内的世界大战。于是在全世界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在华盛顿无法挽救朝鲜战场危机的时候，28日，毛泽东致电志愿军领导人，祝贺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二军团主力的大胜利。同时指出，已出现大举歼敌的极好时机，要集中我西线主力歼灭美第二师、第二十五师、骑兵第一师三个师的主力。并指明：“只要这三个师的主力歼灭了，整个形势就有利了。”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电令，一面激励第一一三师坚决堵住逃敌，打退援敌；一面令第三十八军主力迅速向第一一三师靠拢；第四十二军迅速向顺川、肃川进攻；正面各军速向安州、价川方面攻进。

28日，志愿军第一一三师分别布防于三所里和龙源里，他们在这两地堵住了大量南逃之敌，将军隅里南通顺川的两条公路全部切断。

与此同时，我第四十二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一路冲杀，按时到达预定地点，正面的四个军也已进至博川、宁边、球场以南，从而使美第九军所属的美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土耳其旅全部和美骑兵第一师一部，以及南朝鲜第一师一部，陷入志愿军三面包围之中。只有经安州南逃肃川的路，尚未堵住。

29日，西线敌军开始全线退却。美第一军由清川江北撤至安州，准备经肃川向平壤方向逃跑。美第九军收缩在军隅里地区，企图经龙源里、三所里向顺川的两条公路突围。于是志愿军在平院里、军隅里、三所里、龙源里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围追堵截战。

敌军为了逃脱被围歼的命运，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兵掩护下，向我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龙源里、三所里一线阵地猛烈冲击，企图夺路突围。同时急调英第二十九旅与美骑兵第一师在顺川的部队北上救应。面对敌人强大的炮火，众多的兵力，我第一一三师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精神，坚守住了阵地。29日下午，我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二师于凤鸣里地区将美第二十五师一个团大部歼灭，随即与第一一四师分别向云龙里、龙兴里地区攻进，与第一一三师一起与南逃之敌展开激战。

30日，第四十军又歼美第二师一个营，攻占军隅里，军主力继续向安州攻进。第三十九、六十六军于风舞洞地区歼敌部分，迫敌溃逃后，第三十九军于凌晨时分由军隅里西渡过清川江，向龙源里以西攻进；第六十六军尾随第三十九军渡江，于军隅里地区肃清残敌。第五十军从博川东南逼进清川江。

30日，敌人以百余架飞机、百余辆坦克、数百门火炮，向龙源里、三所里以北我第三十八军堵击阵地进行更加猛烈轰炸，掩护大批撤退下来的美军拼命夺路，反复突围。敌人并调来B—29型轰炸机，大量投掷重磅炸弹、子母弹、凝固汽油弹、掠地杀伤弹。志愿军阵地犹如火海。许多指战员不仅负伤坚持战斗，而且在烈焰焚身最痛苦的生命最后一刻，仍顽强歼敌。可谓是英雄精神跃日月，革命豪气贯长虹。作家魏巍在他的著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对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二师第三三五团第三连在龙源里以北松骨峰堵击作战曾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从那以后，中国人民就以“最可爱的人”来称呼志愿军。

在龙源里把守这场堵击战最后一道“闸门”的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第三三七团第三连的指战员们，也是以这种精神，卡在南逃与北援敌人中间，

使南北之敌相距不到一公里而可望而不可及，不得不放弃从这里突围的企图。该连在打退敌人一个连至一个营兵力的多次冲击后，阵地上弹坑累累，树干遍地，全连仅剩五十余人。敌人在发起最后一次集团冲击时，连长张友喜带领战士与敌人反复争夺，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后来志愿军领导机关给该连记集体特等功。

后来，美第二师师长凯泽少将曾谈到“永远不是第二的美第二师”在龙源里以北被堵击的惨状：

“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沟里和公路上。大部分活着的，甚至那些还未受伤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麻木不仁，呆若木鸡。中国人的子弹犹如冰雹一样落到岩石中间，他们有的站在车旁，有的趴在车底下嚎哭……由于脸上落了厚厚的尘土，或者是由于瞠目结舌而变了脸型，看上去他们好象戴了假面具。”“步二师在穿过敌人五英里长的伏击圈时所经受的可怕的严峻考验就是这个样子，受到伏击的七千多人中大约有三千多名伤亡——还损失了大量车辆。”

30日夜，第三十八军八个步兵团向被包围的敌人英勇出击。第四十军的一个师也进至青谷里，协同三十八军作战。战至12月1日8时，敌人被迫遗弃大量辎重装备，分散突围。志愿军随即转入各个围歼。

12月1日，司令员彭德怀亲书嘉奖电对第三十八军通令嘉奖，电文最后的两句口号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第三十八军万岁！”

西线作战至1日19时，被围的敌人大部被志愿军歼灭，残敌折转西逃经安州奔向肃川以南。志愿军第四十军尾追敌人到安州，并于当晚占领安州。

志愿军在西线发起反击之后，东线的美军第十军和南朝鲜第一军团仍在积极地执行麦克阿瑟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继续北进，并将美第七师主力与美第三师向陆战第一师靠拢，进一步增强其主要方向的突击力量，以影响与制约西线战局的发展。

志愿军第九兵团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同敌人作战的。当时预备队第二十六军尚在厚昌江口，需六天时间方能到达前线，部队难于机动和加强兵力；尤其不利的是由于第九兵团是紧急入朝，对战区气候不了解，穿着单薄的棉衣来到朝鲜北部高寒山区，由于敌机猖獗，大批粮食、被服、弹药直到临战前夕还没有运到前线。战区普降大雪，最低气温为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志愿军面对的不仅是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而且还有环境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我志愿军指战员充分表现了英勇顽强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

27日夜，东线第九兵团第二十、二十七军同时对长津湖地区美军发起攻击后，第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第八十师和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师，分别对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的美军实施包围。第八十师趁夜杀伤新兴里之敌千余人，第七十九师歼柳潭里之敌一部。28日，第五十九师歼敌千余人，第五十八师攻占下碣隅里机场大部，歼敌八百余人。

经过连续两天的作战，查明被围诸点之敌共有一万余人，比我原估计的敌军数量多出一倍，原来在我开始攻击之前，敌人在各地已增加了兵力。兵团根据新的敌情和我军的具体情况考虑，决定集中兵力各个歼敌。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新兴里之敌，然后再逐个歼灭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

第二十军集中第六十师和第五十八师部分部队，于小民泰里、富盛里地区，把在五十余架飞机掩护下，由黄草岭以南北援的美陆战第一师一个陆战营、一个坦克营，英皇家海战陆战队第十四特遣队及南朝鲜陆战队一部，共

一千余人，坦克、汽车一百余辆放进阵地，采取拦头、断尾、截腰的战法，将其大部歼灭，二百四十人被迫投降。

当第二十军主力在富盛里地区聚歼北援之敌时，下碣隅里的美军也向南攻击，企图南北对进打开通道。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团第三连连长杨根思带领第三排在小高岭顽强阻击敌人，敌人向我阵地倾泻了大量炮弹，阵地上浓烟滚滚，烈火熊熊。敌人多次抢夺小高岭，都被三排击退，最后全排仅剩两名伤员仍坚守阵地。当敌人发起第九次攻击时，有四十多个美军爬近山头，在支援分队尚未赶到的危急关头，已负伤的杨根思抱起一个五公斤重的炸药包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相继，第二十六军主力于12月1日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在新兴里全歼美军一个加强团。

新兴里战斗后，毛泽东致电第九兵团，“庆祝我第九兵团的两次歼敌大胜利”，提出“应加紧歼灭被困之敌”，“并应准备与必然增援”的美军与南朝鲜军作战，“切实注意增强黄草岭南北阻援和阻止突围之力量”。12月1日，在全歼新兴里美军的同时，西线“联合国军”南逃，东线敌人也全线动摇。进入清津、惠山镇及新架坡之敌相继撤退。被围于柳潭里的美陆战第一师第五、第七两团，也全力进行突围。当第九兵团正调集兵力进行围歼时，他们在大量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于4日逃到下碣隅里，在我担任围歼任务的第二十六军由于大风雪所阻刚到达一部时，他们便突围南撤了。

在朝鲜西、东两线的沉重打击下，麦克阿瑟认识到，如不急速后撤，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于12月3日命令西线部队立即撤出平壤，东线部队立即撤到咸兴，然后向“三八线”实施总退却。

根据这一情况，12月4日，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准备先打平壤，“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攻进。”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我西、东两线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忍着饥寒英勇地截歼和追歼退却中的“联合国军”，给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东线的美陆战第一师，在强大的陆海空火力掩护下，于24日乘船从海上逃向“三八线”以南。此时，志愿军西线六个军已进至“三八线”。至此，战役遂告结束。

此次战役的胜利，大大超出了志愿军的预期目的。志愿军在朝鲜军民配合下，从11月6日至12月24日，连续作战四十九天，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收复了除襄阳之外的“三八线”以北的全部领土。这一战役的胜利，震惊世界，给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以沉重的打击。

诱敌深入、寻机破敌是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战术。在这次战役的指导上，他利用了敌人恃强骄傲的心理和对志愿军判断上的错误，指示志愿军一步步把敌人引向我有利战区，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从而打开了缺口。在战役中同时实施迂回包围战术，为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追究寇连续作战 再推进攻占汉城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沉重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发动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彻底破产，变成了圣诞节向“三八线”以南的总崩溃、总退却。这种情况的发生，立刻使美国朝野陷于一片混乱。美国政府连忙召开了一系列高级会议。会议承认朝鲜形势的发展使美国“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但仍然决意坚持其侵略政策。其具体措施是，一方面在政治上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打出“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时间，准备再战；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加紧扩军备战，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美国人民为侵略战争做出“任何必要的牺牲”。于1950年12月23日，命令刚刚接任败退中因车祸身亡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职务的马修·李奇微（原任美国陆军副参谋长）组织“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十三个师又三个旅，约二十万人的兵力，加筑“三八线”上原有阵地，建立纵深防线和整顿军队，准备抗击志愿军和人民军新的进攻。

毛泽东早在“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开始向平壤和向“三八线”溃退的时候，就对战争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应采取的方针进行了充分的考虑。他认为，虽然取得了两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扭转了朝鲜战局，但尚未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要赢得这场战争还必须做出很大的努力。当得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退守“三八线”，美国当局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缓兵之计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志愿军必须克服和忍受一切困难，协同人民军打过“三八线”去。他指出，目前美、英等国正要求志愿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们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他还指示志愿军：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根据情况，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志愿军主力退至开城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个时期，然后再战。

志愿军由于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部队已相当疲劳，后勤补给也更加困难。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根据部队当时的情况，对战争形势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朝鲜战争仍然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不利。敌军士气，虽然比以前低落，但仍然有二十六万左右的兵力。政治上，敌人如果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说来是很不利的，英法两国也不要美国这样做。敌如再吃一两个败仗，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志愿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

毛泽东同意彭德怀对战争形势的分析，但同时指出，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不过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然后投入战斗。因为主动权掌握在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毛泽东又于12月24日、26日两日，就战役的部署问题再次电告彭德怀。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下定决心发起第三次战役，集中志愿军六个军，并建议人民军新到前线的三个军团同时实施进攻，粉碎敌人在“三八线”的防御，如发展顺利，就相继占领汉城、洪川、江陵一线，尔后转入休整，

准备春季攻势。同时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地形特点，定下了具体作战部署：志愿军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五十军并加强六个炮兵团组成右纵队，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于高浪浦里至永川地段正面实施多路突破，并分别从两翼向七峰山、仙岩里迂回，断敌退路，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涟川以南的南朝鲜第六师，再歼坟山地区的南朝鲜第一师，得手后向议政府方向发展胜利；志愿军第四十二、六十六军并加强一个炮兵团组成左纵队，由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指挥，在水平至马坪里地段上突破，首先集中主力于水平至龙沼洞地段歼灭南朝鲜第二师一至二个团，得手后向加平、清平里方向扩大战线，切断汉城、春川间交通，另以一个师由华川渡北汉江向春川以北的南朝鲜第五师积极佯攻，策应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南进。建议人民军第一军团主力于东场里以东地区向汶山方向佯攻，配合志愿军右纵队歼灭南朝鲜第一师；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由杨口、麟蹄间突破，向洪川方向进攻，配合志愿军左纵队围歼南朝鲜第七师。

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还决定把发起战役的时间定在1950年除夕——12月31日17时，志愿军和人民军按照预定计划，经过短促的炮火准备之后，在全线发动进攻。当时，天不作美，“三八线”附近突然寒风呼啸，大雪纷飞，但英勇的志愿军和人民军战风雪斗严寒一往无前。

志愿军右纵队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各担任突破任务的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迅速徒涉冰冷刺骨的临津江、汉滩川。突破了南朝鲜军的前沿阵地后迅速向其防御纵深发起进攻。第三十九军从南朝鲜第六师与第一师的接合部突破后，军主力于1951年1月1日拂晓前占领了汶山东北的大村、武建里，前进了十公里，并策应了第五十军渡过临津江。该军第一一七师向敌纵深猛插，于1日拂晓到达指定位置东豆川里以南的仙岩里，截歼了南朝鲜第六师六百余人。从南朝鲜军右翼突击的第三十九军越过汉滩川后，军主力向抱川方向进攻，1日晨占领抱川及其西侧的新邑里，该军担任穿插任务迂回任务的第一一四师于1日中午进到指定位置七峰山后，发现西侧有一千余名南朝鲜军正在南逃，立即展开阻击，歼其四百余人。从南朝鲜军第六师正面突击的第四十军突过临津江和汉滩川后，其前峰第一一九师占领了东豆川里东山。当晚，志愿军右纵队继续发展进攻，人民军第一军团也渡过了临津江向坡川里前进，到2日晚，志愿军右纵队和人民军第一军团进到坡川里、议政府东北至抱川以南一线，已突入南朝鲜军防御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

志愿军左纵队第四十二军涉过永平川，一举突破南朝鲜军第二师道城岬、峨洋岩阵地。该军第一二四师不顾山高雪深，不怕敌机威胁，继续猛攻，沿途打破敌人十次阻击，于1月1日12时前到达济宁里以南的石长里，切断了南朝鲜第二师的退路，2日协同第六十六军主力将上南淙、下南淙地区之敌歼灭，圆满完成了断敌退路、围歼敌人的任务；该军主力在突击中于加平里以北地区歼灭南朝鲜第二师一个多营，然后向加平方向发展进攻，2日10时占领加平。第六十六军主力克服重重困难，突破敌人一道又一道防线，不断向敌人防御纵深猛插，在第四十二军第一二四师协同下，在上红磧里、下红磧里、上南淙、下南淙等地歼灭南朝鲜第二师两个团、第五师一个团大部和南朝鲜炮兵一个营，共毙伤俘敌三千二百余人，缴获各种火炮六十余门，各种枪一千五百余支（挺），胜利地完成了预定任务。

在志愿军、人民军的打击下，作为“第一梯队”在“三八线”附近组织防御的南朝鲜部队争相南逃，狼狈不堪。李奇微看到大势已去，担心志愿军

会实施深远包围，使其聚集在汉城附近的十多万部队和全部重装备陷于绝境，1月3日即令除以一部兵力在汉城以北高阳、道峰山、水落山一线进行掩护外，其余部队向北纬三十七度线迅速南撤。

1月3日晚，志愿军和人民军转入追击作战。志愿军第五十军一部在碧蹄里击退美第二十五师约一个营的抵抗之后，进至高阳以南佛弥地截断了英第二十九旅的退路。经一夜激战，全歼这个旅的皇家奥斯特来机枪团第一营及第八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缴获和击毁坦克三十一辆，装甲车和汽车二十四辆。第三十九军先头部队于回龙寺与美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一团遭遇，歼其一部，之后又在议政府以西釜谷里歼灭英第二十九旅两个连。第三十八军、第四十军追击至议政府东南水落山地区，击溃美第二十四师一个团。志愿军左纵队由加平、春川渡过北汉江，向洪川方向发展。人民军第二、五军团继续向洪川、横城方向攻进，截歼南逃之敌。

4日，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五十军各一个师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先后进入汉城。

为了不使“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据守汉江南岸，5日志愿军右纵队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在汉城东北和议政府东、西地区待命，第五十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留一个师守卫汉城）继续向南追击。第五十军在果川、军浦场歼敌一部，7日进占水原、金良场里。人民军第一军团5日占领金浦，8日占领仁川港。志愿军左纵队也继续向南追击，6日占领龙头里、砥平里；到8日，又先后占领杨平、梨浦里、骊州、利川。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于6日占领横城，8日占领原州。

至此，志愿军和人民军已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驱逐到北纬三十七度线附近的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第三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志愿军和人民军齐心协力，并肩作战，经过连续七昼夜的艰苦奋斗，以每小时前进一公里的进攻速度前进了八十至一百一十公里，毙伤俘敌一万九千余人，占领了汉城，粉碎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据守“三八线”，整顿军队，准备再犯的企图。

本来，我志愿军人朝进行两次战役之后，进行一个阶段的休整是十分必要的。但毛泽东从政治上考虑，从战略高度认识问题，要求志愿军克服和忍受一切困难，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以期最大限度地争取主动，应该说，毛泽东作为我军之统帅，实在是棋高一着，技高一筹。

争短期调兵遣将 为停战以打促谈

1951年1月底，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恢复了攻势，3月下旬，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地区。这时，美国同英、法等侵朝参战国之间及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对“联合国军”是否再次越过“三八线”和用什么方式结束朝鲜战争，再次发生分歧。后来美国经过与英、法等国磋商，决定在不扩大战争范围的前提下，稳步向朝鲜北部推进，待占领有利地区后，即以“实力政策”为基础，或与中朝进行外交谈判，或继续其军事行动，以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地位。

侵朝敌军根据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于4月初再次越过“三八线”，并计划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将战线推进到北纬三十九度线及其以北地区，认为这样政治上可取得谈判的有利地位。这时，“联合国军”地面作战部队共三十四万余人。

横城反击战胜利之后，我军为集结兵力准备新的反击战役，持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异常艰苦的防御作战。这一行动是根据毛泽东3月1日在对朝鲜战争形势的精辟分析的基础上实行的。毛泽东指出：根据一、二月份的作战经验，我因有三个军在咸兴以北战役中损伤较大，从事休整，致前线作战的只有六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很困难，还应留守备。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追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第二番部队于4月上旬到达前线以前，在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应避免战役性冲击。毛泽东提出：如敌逼我应战，就让敌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4月初，我志愿军第二番部队由国内及朝鲜北部咸兴地区开始向前线集结，争取在新的反击战役中能有志愿军九至十一个军和人民军二至三个军团参战。与此同时，我后勤部队亦增至十八万人，后勤保障工作虽作出很大努力，但敌人空中突击更加疯狂，因此，供应情况尚未好转，只能保障最低限度的供应，不能满足作战需要。

4月初，敌军未在“三八线”上停止，继续北犯。4月6日，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着重研究和决定举行第五次战役问题。会上，彭德怀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战争指导方针，并且指出：目前抗美援朝战争仍处于艰苦紧张阶段。为消灭“联合国军”几个师，粉碎其侧后登陆计划，夺回主动权，会议决定趁敌人实施登陆之前，进入“三八线”南北地区立足未稳之机，实施新的战役反击。在战役指导上，彭德怀提出：根据敌人战役布势上只有战术纵深，其主要兵力来自横方向的特点，采取战役分割包围与战术分割包围相结合的方针，以第四十军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战役缺口，协同第三十九军及人民军第三、第五军团东、西割裂，不使敌东、西增援。集中第九、第十九、第三兵团分别从东、西两翼迂回，结合正面突击，将敌人几个师分割包围于德川、水平、议政府、抱川地区，各个歼灭之。置第三十八、四十二、四十七军及人民军第二十一、第六军团于肃川、元山、平壤地区，以对付敌侧后登陆。

4月中旬，敌人发现我军战略预备队集结后，积极准备抗击我军的进攻。志愿军便决定提早发起进攻。

4月22日黄昏，中朝军队各突击集团按预定计划向敌人发起全线反击。左翼突击集团由宋时轮、陶勇指挥的第九兵团三个军及第三十九、四十军一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当面之敌在我军猛烈突击下，逐步后撤。我军乘机多路猛进，发展顺利。23日夜进占上海峰、白云山地区，歼灭美第二十四师和南朝鲜第六师各一部，完成了第一步任务。25日占领清溪山、中板里地区。“联合国军”右翼受到威胁。担任战役割裂任务的第四十军以勇猛的反击，打退南朝鲜第六师的进攻，乘胜直捣敌师主阵地，打乱了该敌部署，歼敌一部，缴获坦克十二辆、汽车五十余辆。尔后，分两路直插敌纵深。第四十军坚决地阻击了敌人的西援，于25日胜利完成了战役割裂任务，在此期间，共歼敌两千二百余人，缴获汽车二百三十辆、火炮六十余门。第三十九军前出到华川以南，将美陆一师隔于北汉江以东不得西援。

担任中央突击的第三兵团，由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突破敌前沿阵地后，23日将土耳其旅击溃，突破了美第三师防线。在哨城里、水平地区与敌人形成对峙。

右翼突击集团由杨德志、李志民指挥的第十九兵团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在扫清了临津江西岸之敌后，第一梯队师于23日晨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地冲过百米宽、齐腰深的临津江。第六十三军第一八八师迅速占领了英第二十九旅第一线阵地后，与敌人展开反复争夺，战斗十分激烈。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第六十四军，突破临津江后，由于炮兵被隔在临津江以北，未组织有效的炮火支援，在江南岸进攻受阻。此时第十九兵团二梯队第六十五军两个师也渡过临津江。此间，由第六十四军第一九一师侦察支队和第五六九团第三营组成的先遣支队，经过二十个小时的连续作战，突破敌人的七次阻拦，俘敌一百余人，于24日下午突入敌纵深二十五公里，胜利地占领了议政府西南的道峰山。这个先遣队在道峰山坚守三天四夜，象一把尖刀插入敌人胸膛。威胁着敌人的左翼。25日18时，第十九兵团向当面之敌发起猛攻。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南朝鲜第一师和英第二十九旅主阵地，勇猛地向日政府方向突击。在追击中歼灭了南朝鲜第一师一部和英第二十九旅格特斯特第一营及坦克团大部共四千余人。

西线“联合国军”在中朝人民军队的连续突击下，两翼受到威胁，且战且退，并在要点上顽强抵抗，以优势炮兵和航空兵火力迟滞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行动。中朝军队连续奋战了三昼夜，虽在加平方向上打开了战役缺口，对敌翼侧造成了严重威胁，但第六十四军未按时完成战役迂回，中央集团战术割裂任务晚了一步，战役发展形成平推，未歼灭成团师建制的敌军部队。

26日，彭德怀司令员就战役发展和下一步作战打算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作了报告，中央军委同意志愿军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并指出：从此次敌人且战且退和在此以前沿海袭扰的情况看来，敌人确有诱我军南下然后在北部登陆的企图。但敌主力如停在“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而我只有一个兵团及人民军向南进逼，估计敌人在未得到大量补充或援兵能使用以前，还会有一个犹豫时间，而仍然与我进行拉锯战，企图消耗我们。此种情况如果出现，对我并无不利。只要我们避免主力消耗，转而消耗和分散敌人，则推迟敌人登陆和向北进攻，便于我们完成各种准备，倒是合乎理想的，不过目前自应以敌人会很快登陆作准备，免得被动。

依照上述精神，26日西线我军继续向敌纵深发展进攻，占领了敌军锦屏山至加平的第二线阵地。28日右翼突击集团逼近汉城，第十九步兵团占领汉

城西北锦屏山、白云里地区，人民军第一军团在梧琴里歼南朝鲜第一师一个营的大部。中央和左翼突击集团占领了汉江北岸地区要点退溪院里、金谷里和磨石隅里、清平川。人民军金（雄）集团以积极行动钳制了东线之敌。敌军主力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组织防御。美骑兵第一师西调汉城，并在汉城周围组成了绵密的火力控制地带，妄图诱我攻城，乘机给我以大量杀伤。这时虽然在汉城以北歼敌战机已失，但是，经过第一阶段作战，出现了敌军由西南伸向东北的斜线防御形势，而且由勿老里以东至东海岸整个东部战线由南朝鲜六个师防守，态势突出有利于我各个歼击。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根据 26 日的作战方针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为继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坚决贯彻多歼灭南朝鲜军的精神”，以孤立分散美军，创造今后消灭美军的有利战机，28 日即停止第一阶段的作战，立即转兵东线，决心以南朝鲜军为歼击目标，集中第九兵团（欠第二十六军，附第十二军）及人民军金（雄）集团（第二、三、五军团）在勿老里至雪岳山地段上发动第二阶段作战。遂于 29 日决定停止进攻，准备新的作战。为对付敌人可能的登陆，将第四十、二十六军北调沙院里及平康以北地区。至此，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即告结束。

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第九、第三兵团用稍事整顿补充后即在三十九军掩护下东移。5 月 6 日，彭德怀经与人民军协商决定，东线作战集中第九兵团和人民军金（雄）集团，取正面突破，两翼迂回，双层包围，多路钳制的战法，首先歼灭麟蹄东南县里地区之南朝鲜第五、七、三、九师，然后视情况继续歼灭南朝鲜首都师和第十一师。以第三兵团（欠第十二军，附三十九军两个师）向九城浦里突击，割裂美军与南朝鲜军的联系，阻止美第一军不得西援；西线第十九兵团及人民军第一军团以汉城为重点，在高阳至加平段宽大正面上实施佯动，钳制西线美军主力。

5 月 12 日晚，西线我军开始对议政府、汉城、春川地区之敌实施佯动。李奇微被佯动所迷惑，惊呼“汉城面临第二次危机”，并判断我军在中线即将发起攻势。遂调美第七师，南朝鲜第二师增强中部防线。同时，第三、第九兵团于 15 日相继隐蔽进入作战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

5 月 16 日 18 时，我各突击兵团在短促的炮火准备后，向敌人发起猛烈的突击，敌军防线土崩瓦解，南朝鲜第五师、第七师仓皇溃退，我第九兵团之第二十军、二十七军及人民军第五军团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插敌人纵深。

第二十军第六十师主力于 17 日晨攻占了后坪里、美山里、旺威谷等战略要点，歼敌五百余人，切断了县里地区南朝鲜第三师、第九师南逃退路。人民军第五军团也于 17 日占领了县里东南之镇东里、芳台山各要点，切断了县里之敌东南退路，与第二十军对县里之敌构成了合围。

第二十七军在突破南朝鲜第七师防御后，第七十九师和第八十师攻歼了于论里之敌，尔后向院巨里方向进攻。担任迂回任务的第八十一师不停息地交互攻击前进。师长孙端夫亲率第二四二团第二营为先导，迅速向敌人纵深猛插，于 17 日 5 时突入敌纵深二十八公里，切断了县里之敌西南退路。该师主力在第六十师的协同下，在上南里地区将南逃的南朝鲜第五师、第七师击溃，全歼南朝鲜军五个营三千余人。

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配属第九兵团的第十二军，突破南朝鲜第五师防御后，于三巨里歼灭其第五师一部，继续在自隐里北侧与美第二师以及法国营展开激战。经两日艰苦的围歼战斗，全歼美第二师第二十三团两个营及法国

营大部。向深远纵深沙里地区迂回的我第三十一师主力被敌阻隔，只有一个团从敌左翼绕道插入敌人纵深，并于18日拂晓攻占长水院，因而未能达成向东沙里迂回的目的。

18日晨，县里地区南朝鲜军第三师、第九师动摇溃乱，开始向南及东南方向突围。我第二十军由西向东，人民军第五军团由东向西，对敌两面夹击，将该敌大部歼灭，缴获敌人全部重装备。志愿军第二十军与人民军第五军团在围歼作战中胜利会师后，又分数路共同进山搜剿残敌。为继续歼灭南逃之敌，第十二军、第二十七军和人民军第五军团一部于20日前进到丰岩里、下珍富里、东沙里一线。但因战役退路未被及时切断，致使溃逃之敌未能被堵击包围全歼，从而使溃逃之敌和增援之敌又迅速形成了东西相接的完整防线。于是，21日结束了第二阶段的作战。

在这一阶段作战中，我第三兵团第十五军发起进攻后，第四十五师攻占沙五郎峙，歼美第二师二百余人。第四十四师迅猛插入敌纵深，经一夜激战，将美第三十八团大部歼灭，毙伤敌一千八百余人，俘敌二百四十余人，有力地牵制了当面美军。第十五军歼灭美第三十八团大部之后，继续向纵深发展，因美第二师与美陆战第一师继续顽抗，前进受阻。第六十军第一八师以积极行动攻击当面之敌，19日夜占领洪川以北法所里，牵制了美第七师不得东援。

西线我第十九兵团以四个师的兵力于17日分别攻歼了高阳、金谷里、清平川、上泉里等地之敌。18日，第六十三军南渡北汉江，攻占通芳山、凤尾山诸要点，在抗击敌人反扑中，歼灭美军一个营和南朝鲜军三个连的大部，有力地牵制了西线敌人。20日，西线敌军为减轻我军对其第九军、第十军的压力，开始以美第一军三个师又三个旅的兵力向我第十九兵团展开进攻。第十九兵团随即转入了防御。

中朝部队为改善补给，争取主力集结休整、补充，总结作战经验，造成尔后有利战机，以便更多地歼灭敌人，决定将各兵团主力北移“三八线”南北地区。正在中朝部队主力开始转移之时，“联合国军”乘机以四个军十三个师的兵力，有计划地全线实施猛烈反扑。他们利用技术装备的优势，以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特遣队”，在航空兵掩护下，多路猛烈地向中朝部队纵深突击。25日，“联合国军”主力全面展开沿汉城、涟川、春川、华川、洪川、麟蹄公路稳步向北推进。

中朝人民军队向后转移，本是胜利回师的主动行动，但是，由于对“联合国军”有计划地组织以机械化“特遣队”的形式向纵深穿插割裂，迅速展开主力实施全线反扑估计不足，因而转移的组织计划不够周密，全线出现多处空隙，使敌“特遣队”得以乘隙而入，造成中朝人民军队在转移初期十分被动的局面。

中朝人民军队的争取主动，于27日将北移途中的志愿军第六十三、六十四、十五、二十六、二十军及人民军第五、二、五军团等八个军陆续展开于“三八线”南北地区组织防御。28至30日，第六十五军对进攻涟川的美第一军，第二十军对进占华川地区之美第九军，实施强有力的反击，歼敌一部，并收复华川。6月1日，志愿军四个军于新幕、鸡雄山、黑云吐岭一线构成了纵深防线。随着反击作战的胜利和全线防御布势的完成，“联合国军”的反扑行动被制止。6月10日，中朝部队主动撤出铁原、金化，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的汶山、涟川、铁原、金化、杨口、明波里一线。交战双方

均转入防御，至此，第五次战役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投入十五个军（军团）的兵力，奋战五十天，取得了歼敌八万二千余人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妄图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这次战役结束后，“联合国军”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场上出现了长达两年的战略相持阶段。

要使战争“尽量争取短期”，就必须靠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来实现。因为对于战争的发动者来说，是不会轻易接受停战谈判的。只有把他打得锐气全消，打得无招架之力，才有可能使其坐到谈判桌前。第三次战役，贯彻了毛泽东“以打促谈”的军事思想，使停战谈判终于被“联合国军”所接受。

巧用敌人书报 展我武略文才

毛泽东年轻时，便胸怀世界，心忧天下，又为了调查研究，所以，酷爱读报。这种习惯，使他了解国内外大事，调查实际，研究问题，较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并通过读报，帮助决策，指导战斗，推进革命。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约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这种读报习惯，直到上井冈山，即使在国民党包围封锁的情况下，也从没间断过。所以，他熟悉国内外形势，分析时事，具体透彻，有说服力。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利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有时，“文武”兼用，获得大批国民党的报纸刊物，精心阅读，了解信息，分析现象，把握本质，甚至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情报系统，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革命，消灭敌人。

1929年初，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时，急需判明尾追的敌人和瑞金城内敌人的动向，以制订下一步作战计划。在当时没有健全、得力的情报系统的情况下，于是决定派宋裕和带领一个连到瑞金县城“抢”报纸，弄到一批《国民日报》、《中央日报》和广东、上海、福建、江西的地方报纸，经过分析，印证了关于敌人的实力、动向和企图。他同朱德、陈毅商量后，决定利用大柏地以南十里左右的麻子垴山高坡陡，竹茂林密，谷地两头窄，中间宽，易于隐蔽埋伏的有利地形，把死命追赶红军的敌人诱人“口袋”阵，速战速决，打得特别漂亮，歼敌两个整团，活捉匪团长肖放平、钟桓，俘敌八百余人，缴获枪械八百余件。这就是著名的大柏地之战。粉碎了湘赣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所谓“会剿”。毛泽东欢欣鼓舞，豪情满怀，唱道：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菩萨蛮·大柏地》）

毛泽东就是这样，利用读报所组织的特殊的情报系统，制订了正确的战术，打败了敌人，壮大了革命的声威。

毛泽东把读报看作是间接的调查研究，他曾说：“问题的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报纸三项着手研究。”

1935年秋，红军突破甘南的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9月18日，占领哈达铺。毛泽东亲自率领的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原计划要经过甘肃东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通道，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建立根据地。现在占领了哈达铺，怎么办呢？红军指向何方？真是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9月21日下午到达哈达铺，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找到所有弄到手的报纸，聂荣臻、叶剑英也派通讯员送来报纸，和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进行翻阅，查找信息，发现《晋阳日报》报道，陕北有红军五万余人。《大公报》也报道关于陕北，甚至陕南农村“赤化”问题；还报道陕北红军完全占领着

延安、延长、保安、安塞等县城。从而了解到，陕北确是和敌人周旋的好地方，又有刘志丹的根据地，红军的力量还不小；还知道了徐海东的二十五军也在这里。他们所建立的根据地，是红军长征后唯一的一块完整保存下来的根据地。毛泽东认为，陕北地域辽阔，群众生活艰苦，又是穷乡僻壤，还有几万红军，是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的好地方。

于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等研究，作出重大而英明的决策，改变初衷，到陕北去！并立即召开干部会议，他说：“我们要北上。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要北上抗日，首先到陕北去。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现在改称陕北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红军整编，继续北上，10月19日，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旗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有诗赞道：

红军越岷山，哈达大整编。
万里云和月，精兵存六千。
导师指陕北，军行花道妍。
革命靠路线，红星飞满天。

毛泽东不但借读报，了解天下大事，进行间接调查研究，作出重大决策，消灭敌人，夺取胜利，而且利用报纸，阐述革命道理，指导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我胜利结束了辽沈、淮海、平津大决战之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妄图阻止中国革命继续前进，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卷土重来；不得逞，也要使中国划江而治，分裂中国。为此，毛泽东亲自写了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揭露敌人，教育人民，绝不能骄傲，半途而废，一定要彻底埋葬蒋家王朝。

另外，在革命发展到即将全面胜利的时候，也易产生骄傲情绪。所以，毛泽东1949年3月23日把进北平谐称之为“进京‘赶考’”，还说：“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大军摧毁敌人长江防线，歼灭守敌，胜利渡江。为此，4月22日，毛泽东亲自写了《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电》的电讯稿，赞扬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渡过长江；并赞扬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战斗，直捣南京。

4月23日，解放南京。下午，毛泽东起床后，坐在院落凉亭里的藤椅上，阅读《人民日报》号外，心情高兴，触发灵感，诗兴勃发，遂进屋写下寓意深沉、气象宏伟、格调崇高的珍贵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以神来之笔，点铁成金，总结历史的教训，阐述深邃哲理，明确

地告诫大家，占领南京是伟大的历史事件，标志着蒋家王朝的覆灭，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必须防止骄傲自满的情绪和停顿下来不再前进的情绪，革命历程辽远，同志仍须努力，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鼓舞全党全军永葆革命青春，保持旺盛斗志，继续前进。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著名诗篇：《七律二首·送瘟神》，可知道，这两首诗熔铸了毛泽东多少对人民的深情挚爱啊！

仅以江西余江县兰田坂为例，方圆五十里，近五十年内，患血吸虫病而死亡的竟达三千余人，二十个村子完全毁灭，一万四千多亩田地变成荒野，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影响生产，有首民歌唱道：

兰田坂的禾，亩田割一箩。
高兴两人抬，不高兴一人驮。

对血吸虫病，国民党“治”了二十年，日本也搞了几十年，都没搞出什么名堂来。解放后，毛泽东在1955年冬农业合作化高潮期间，就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年还亲自制定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1958年夏毛泽东视察杭州，7月1日子夜，读到《人民日报》关于余江县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展群众运动、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和《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的社论，十分高兴，一连读了几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声说：“好！好！全国都这样那该多好。这种小虫可害人哩，余江人民消灭了血吸虫病，我看了高兴。”他心潮澎湃，极为激动，伏案疾书：“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遂成《七律二首·送瘟神》。

第一首写小虫肆虐，人民苦难。第二首，则是写欢欣鼓舞的心情，颂扬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以及非凡的创造性，谨录于后：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调动敌我兵力 掌握战局主动

战争、战役和战斗，都是敌我双方各种因素的较量，诸如人力、军力、财力等等。虽然不能要求指挥员超越客观物质条件，去创造奇迹，却可以而且应该要求指挥员，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条件，多打胜仗。所以，打仗的胜负往往不完全决定于诸多物质因素，而取决于对战争、战役、战斗的主观指导正确与否。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又取决于指挥者对敌我双方能否有真实的了解，从而作出符合战争规律的决断，正确地指挥战斗。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已是中外军事家所公认的真理，也为许多著名战例所证实。

延安保卫战中，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二十三万人，美式装备，飞机、大炮、坦克车，物资条件不能说不优越，军势不能说不“强大”。而我军仅两万多人，还包括中央机关，装备很差，小米加步枪，物资条件不能说不“低劣”，军势不能说不“弱小”。然而作战的结果，却是敌人败了，败得很惨；我们胜了，胜得很伟大。关键全在于毛泽东知己知彼、决策的英明，不仅善于指挥自己，而且善于指挥敌人。

战争中的指挥者，能在全面、深入、正确地了解敌我的前提下，指挥自己的军队，取胜于敌，已是高明的指挥员。若不但善于指挥自己，而且善于指挥敌人，百战百胜，则需要指挥员具有精湛的军事理论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在延安保卫战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便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1946年7月，蒋介石反动派撕毁国共两党的和平协议，置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渴望于不顾，悍然挑起内战。到1947年7月，蒋介石损兵折将一百多万。几个月消灭共产党的牛皮吹破，可又不甘心失败，“全面进攻”破产，又来“重点进攻”。毛泽东胸怀全局，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明察秋毫。并清楚地知道，敌人表面气势汹汹，其实已是强弩之末，战争已到了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所以他作出了“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为达到此目的，一方面指挥我军开始全国性的战略大反攻，另一方面则指挥敌人，步步趋于灭亡。其指挥艺术的神妙，令人惊叹不已。

毛泽东顾全大局，兼及局部，不失时机，着着神机妙算。你不是气势汹汹重点进攻我山东吗？好，我大踏步后退，把几十万敌军引入胶东半岛；你不是险恶毒辣，要打击我首脑机关，破坏我神经中枢吗？好，给你延安，也把几十万敌军引入陕北。然后摆开“品”字阵，顺利作战略展开，令我刘邓大军实行中央突破二过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把一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毛泽东就这样将计就计，使敌人重点进攻阴谋破产，为我军的全国大反攻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不但指挥自己，而且指挥敌人，是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向来如此。在胡宗南占领延安前，毛泽东就预计好，要在青化砭先消灭一部分敌人。开始一部分同志不同意撤离延安，并要“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等。毛泽东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争地盘，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装，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等蒋介石算清这笔帐，后悔也迟了。蒋介石占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这个很重的包袱，然后我们收拾他，他就要倒霉了。我军官兵思想通了，于是群情

激昂，上下同心同德，积极主动。

毛泽东神机妙算，料定胡宗南这头蠢驴占领延安之后，会不可一世，必寻我主力决战，延安立足不稳，就会向蟠龙镇伸展。青化砭是延榆公路的咽喉，形势险要，非常有利于我隐蔽，消灭敌人。

所以，毛泽东派一支部队，佯装主力，“指挥”敌人主力“追”向延安西北，集中我军优势兵力，埋伏于青化砭，布好口袋阵，以逸待劳，打则必胜，而且速战速决。等敌人主力发现上当，急忙折回，敌三十一旅三千多人，已被我聚歼，还活捉了敌旅长李纪云，我军已无踪影，不知去向了。

二十天以后，又在羊马河消灭了敌一三五旅，歼敌两千余人，活捉敌旅长麦宗禹。敌人气急败坏，更急于找我主力决战。毛泽东又顺势，布署了蟠龙镇战役。

毛泽东先命令我军以一个旅的兵力，把敌人九个旅，由蟠龙——瓦窑堡一线，引向绥德，敌人果然乖乖听从指挥。尔后，毛泽东指挥我主力部队，抄敌人后方。两天两夜的激战，收复了蟠龙镇。这里的弹药、物资、军衣、白面，堆积如山，正好充实装备我军，壮大军力。等敌人发现再次上当，要赶回蟠龙镇，得六七天路程，已是来不及了，胡宗南只好呼天抢地，叫苦不迭了。又一次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伟大，是不可战胜的。

出于全局考虑，为配合陈谢大军出师豫西，威胁西安，支援刘邓大军南下，直取大别山，毛泽东决定我军出击榆林，且攻战激烈，进一步指挥敌人北上。

蒋介石的牛鼻子果然又被毛泽东牵动了，胡宗南慌忙把主力调往北线：一路钟松，率三十六师顺长城东进；一路刘戡、董钊统七个旅，顺成榆公路北上。蒋介石也大驾亲征，亲飞延安督战。

敌人被我调动之后，毛泽东又顺势命令我军做出榆林战斗。赶到榆林的钟松骄横不可一世，欲追击我主力决战。战机又来了。我军把钟松包围在沙家店之后，首先围歼了由乌龙铺向常家高山龟缩，想救钟松的敌第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仅用两小时，就活捉敌旅长刘子奇。

被包围在沙家店的钟松，更加惊恐万状，舍命突围不成。胡宗南大骂钟松无能，命令他死守待援，又大加申斥被我阻击于葭县的刘勘援榆不力。敌人象被捣了的马蜂窝，乱糟糟，好不热闹。沙家店战斗，从黄昏打响，我西北野战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发起猛攻，到天黑便结束战斗，也仅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全歼了胡宗南的看家铁师第三十师六千余人。几天前钟松还凶焰万丈，叫嚣一战结束陕北战争，沙家店一战，却土崩瓦解，一命呜呼了。

至此，我西北战场，连连告捷。敌人乖乖听我指挥，被牵着牛鼻子转悠，晕头转向，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被我狠狠地揍了致命的几拳，敌人的嚣张气焰已被我完全打掉了。西北战场，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以后我军又取得宜川、瓦子街等战役的胜利，浴血奋战一年又一个月零三天，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毛泽东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撤离延安时，毛泽东在枣园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说：“胡宗南和我们不是一个想法，他拼命要来延安，我们只好走。再过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回到延安，再请你来，那时，你愿住多久就住多久。”现在她听到延安重新解放的消息，赞不绝口，连连说：“毛泽东英明！毛泽东英明！”毛泽东英明，就英明在“知己知彼”、“多算胜，少算不胜”（《孙子·计》），

善于在历史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决策上；就英明在指挥艺术高超，不但指挥自己，而且成功地指挥敌人上。毛泽东自己也曾风趣他说：“我们怎么想，敌人就怎么做，有什么办法？”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这样的战例很多，如井冈山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震惊中外，使敌人目瞪口呆的“四渡赤水”战役；辽沈战役中首战攻歼锦州；淮海战役中首战歼灭黄伯韬兵团；平津战役中首战攻歼张家口、天津等等，都证明毛泽东胸怀雄兵百万，料敌如神，既指挥自己，又指挥敌人，用兵如神的军事艺术的高明。

《孙子·谋攻》曰：“知胜之道”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中心便是“知己知彼”，既指挥自己，也指挥敌人，也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

看来毛泽东是深谙此用兵之道的，岂但熟谙中华民族优秀的军事传统，而且能在现代化战争中，加以创造性的丰富与发展。不仅熟“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并且熟知，可以战，则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每战必胜；不可以战，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我时，让你打不着，我打你时，就一定吃掉你。不仅“识众寡之用”，并且熟识变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最后转化为战略上的优势，以寡敌众，以少胜多，取胜敌人。不仅了解“上下同欲者胜”，并且有整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制度，又有“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保证。不仅熟知“以虞待不虞者胜”，并且形成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军事原则。不仅深识“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并且能做到有贤必知，知贤必用，用贤必任。延安保卫战中，决策由毛泽东和党中央，而战役指挥则完全交给毛遂自荐的彭德怀将军。在华东战场，决策由陈毅，而战役指挥则完全交给较年轻却是常胜将军的粟裕。

不过，归根结蒂，还是“知己知彼”。1949年5月2日，毛泽东约柳亚子先生同游颐和园，泛舟湖心，谈起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时，柳亚子先生说：“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就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却说：“打仗没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

所以，无论是延安保卫战的胜利，还是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军事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也是毛泽东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军事传统，高超的指挥艺术的胜利。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一党的领袖，一军的统帅，他的成败，绝不在于做成功某项事业，打赢某一战役，而在于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切合历史与战争规律的决策，把革命逐步引向胜利。毛泽东就是一位能在历史关头作出英明决断的伟大领袖和车争统帅。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危机关头。蒋介石反动派磨刀霍霍，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又使党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毛泽东虽有“保存武力”，才有办法应付事变，“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主张，但却得不到肯定与实行。待到“八七”紧急会议举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立了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的路线之后，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要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毅然决定：“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决然回湖南，组织领导了决定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却又不受所限，陷于教条主义，而是走自己的路，创造性地开辟了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的“井冈山道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34年底，“左”倾机会主义先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代替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使三十万红军迭遭失败，损失百分之九十，根据地也丧失殆尽，被迫作战略转移；继之以“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逃跑主义，使红军损失惨重，仅存三万多人。

又是一个历史的危机关头。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他当机立断，作出决策，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导演了历史上威武雄壮、光彩夺目的四渡赤水战役，把红军从四五十万敌人重兵围追堵截、重重包围的绝境中解救出来，机动灵活，连打胜仗，恢复了主动，摆脱了敌人，从而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长期统治，也使蒋介石反动派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的图谋破产。又一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1936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蒋介石却坐镇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张学良出于民族大义，多次“哭谏”，要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蒋介石却冥顽不化，张、杨遂进行了“兵谏”，活捉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又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国家命运，也关系到我党我军命运的关键时刻。

毛泽东高瞻远瞩，顾及民族危亡之大局，不计一党一人之恩怨，并以十月革命活捉绞杀尼古拉·拿破仑兵败滑铁卢被擒充军作比较，说服党人国人，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不但不杀蒋介石，而且主张释放蒋介石。这就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冷静监视”、“以华治华”、“不战而胜”的阴谋，也使汉奸何应钦挑起更大规模内战的狡诈伎俩破产。遂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共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语）就连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看透了其中的高妙：“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

毛泽东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范，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胸怀，所作出这一的英明决策，这一历史壮举，民族义举，再一次震惊中外，不知感动了多少爱国、正直的中华热血男儿和世界上有远见卓识的和平友好人士！

毛泽东以政治家的宏大气魄，关键时刻作出英明决策的先例很多，如重庆谈判，靠反共起家、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蒋介石，居然戴起和平的假面具，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到 23 日，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毛泽东系党、国家的安危于一身，完全出乎美蒋反动派的意料，作出亲赴重庆谈判的决策，粉碎了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获得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钦佩！又如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我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大决战胜利之后，对是否过江，当时党内意见不一，有一些国际朋友，也不同意过江，怕美国干涉，引起世界大战。这确是关系到革命继续前进和就此止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毅然决策，百万雄师过大江，埋葬了蒋家王朝，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避免了“划江而治”的民族分裂的悲剧。

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关于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了。

1950 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以蹒跚的脚步跨进第二个年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同时派第七舰队强占我台湾海峡。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逼进鸭绿江，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屡次侵犯我国领空。气势汹汹，张牙舞爪，疯狂之极，狠不得要把这半边地球吞掉。

怎么办？出兵吗？面对的可是世界头号、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可是关系到新中国的安危，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啊！

毛泽东在党内认识不统一，国际朋友存有疑虑的情况下，经过不知多少日日夜夜，苦思焦虑，多方运筹，不怕威胁，不怕核讹诈，以空前的勇气最后作出了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英明决策。并从 1950 年 10 月，到 1951 年 6 月 10 日连打五个战役，皆传捷报，歼敌二十三万余人，把敌人赶回“三八线”，稳定了战局，迫敌停战。连美国的评论家都说：“毛泽东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又以阵地战顶住了美国。毛泽东打了他一生竭力避免的阵地战。”美国侵略者自己不得不承认，这是选择“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对象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毛泽东为维护朝鲜人民的利益，保卫新中国的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在中国和世界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胜败输赢各有术 扬长避短巧用兵

在人类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中，再没有比战争更充满辩证法的了。尤其战争发展到决战阶段，各个战役和战斗都特别激烈、复杂、变化多端，指挥上最不容易。所以，作战双方的指战员，对于战争中的辩证法的了解和运用，往往直接影响战争、战役、战斗的进程，甚至胜败。尤其是指挥员，头脑中多点辩证法，少点主观片面、形而上学，就会转化成强大的物资力量，就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夺取胜利。战争的指挥，也是一门艺术，是闪着刀光剑影、充满豪情和悲歌，影响所致甚至决定历史发展的一门艺术，是包含丰富多彩的辩证法的一门艺术。

优势与劣势

在三大战役决战的初期，敌人的总军力，仍有三百六十五万余人，而我军才有二百八十余万人；敌人所占地区和人口都多于解放区，又有美帝国主义在人力、财政上的大力援助，军事装备上也还比我占优势。毛泽东是如何促使这种优势与劣势的转化的呢？

充分利用有利于我军的战争趋势。敌人已由战略进攻被迫改为重点防御，江河日下；而我军为正义之师，已由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日益强大。单说军事，蒋介石反动派，妄图以重点防御，盘踞东北，稳住华北，确保中原，经营江南，卷土重来。毛泽东则顺势作出巧妙的部署，把敌人分割为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孤立的战场，每个战场又实行战役分割，如东北战场，把敌60余万大军分割为锦州、沈阳、长春三个地区，淮海、平津也无不如此，我又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包围、歼灭敌人的战术，所以，在战役和战斗上，就都处于优势了。这许多局部的优势，汇集起来，就造成我战略上的优势。终于打败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

主动和被动

战争、战役和战斗，在许多因素，如军力、地域、装备等等上面，都处于优势的一方，由于主观指挥上的错误，并不一定处于主动地位；而在诸多因素，如地域、财力、装备等等，处于劣势的一方，由于主观指挥上的正确，也就不一定处于被动的地位。

三大战役，毛泽东决策首攻东北，便从战略上取得主动。因为东北在地域、人力、物力、军力上，我军都处于优势。若首战指向华北，则有可能遭华北、东北之敌夹击，使我腹背受敌，陷于被动。也可能促使东北之敌撤退，增援华北和华东的敌人，甚至会造成我战略上的被动。

单看辽沈战役，毛泽东决策先打锦州，便使东北战局满盘皆活。不仅攻歼锦州，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使敌人处于被歼的境地，而且可以促使沈阳之敌卫立煌派军援锦，正好又造成我攻坚打援的态势。真是一着得当，着着主动。结果是攻占锦州，歼敌十万；打援一战，又歼敌十万。迫使长春之敌一部起义，大部投降，沈阳之敌被聚歼，夺取了东北战役的完全胜利，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的高超。

如果先打长春之敌，把主力部署于沈阳附近的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

打沈阳出来的敌人，即使攻歼长春之敌，但沈阳之敌却会因受我军威胁太大，而不敢出来。还可能促使蒋介石增援锦州，或促使锦、沈之敌撤出东北，那就有可能使我陷于被动了。由此看来，军事指挥员的主观的正确决策，对于取得实战上的主动，何等重要。

战略歼灭与战役分割

辽沈、淮海、平津大决战，是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而敌人由进攻转为防御的结果，而我军在防御阶段，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运动战，也随之转化为反攻阶段以消灭敌人强大兵团为主的阵地战。这是个战略性的变化。可就战略上看，单说军力，敌军尚有三百六十五万余人，我军二百八十五万余人，敌人似仍占优势。除东北战场外，淮海、平津战场敌人军力上也占优势。在这种敌我军力对比的情况下，如何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呢？毛泽东说：

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们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

在三大战役的实战中，是怎样“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造成我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的呢？首先把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分割在五个孤立无援的战场，然后巧妙部署，实施战略包围，使敌人动弹不得，这就把敌人抛入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接着对各个战场的强大之敌人兵团，实行战役战术分割，肢解体割为若干孤立部分，造成各局部上我军的优势和敌人的劣势，最后以我优势兵力，实行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最终达到战略上的歼灭。

辽沈战场，敌人五十五万余人，而我军一百万余人，本处优势，又加之把敌人实行战役分割，造成了锦州、长春、沈阳三个地区的孤立态势，然后以优势兵力，逐个歼灭了范汉杰、廖耀湘兵团、长春之敌、卫立煌集团，全歼东北之敌。

淮海战场，敌人六十余万人，而且实行以精锐部队为核心，猬集一起，密集防守，使我难啃难吃的战术；我军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六个纵队，加上地方武装，也有六十余万人，并不占绝对优势。但我军实行以优势兵力歼其一部的战术，首先打掉黄伯韬兵团，把敌人实行战役分割、包围，在几个战役局部上，我军都居于优势地位。然后逐个围歼了黄维兵团、杜聿明集团，最后达到了战略围歼的目的。

华北战场，傅作义拥重兵六十余万，我华北野战军也不占绝对优势。但待我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以后，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则处于绝对优势了，加之对敌实行战役分割，造成敌人津塘、北平、新保安、张家口等几个地区的孤立态势。然后，逐个歼灭，先歼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再歼天津之敌，后和平解放北平，最终达到战略歼灭的目的。

由此看来，要达到战略歼灭的目的，就必须对敌人实行战役包围，先造成局部上的优势，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各个歼灭，而且是先打分散和孤

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实现战略歼灭的总目标。

运动战与阵地战

无论进行什么性质的战争，要壮大自己，消灭敌人，攻城略地，夺取政权，运动战和阵地战，都是基本的作战形式，而且这两种形式又是以军力、财力和主观指挥的正确与错误的诸因素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

在解放战争的初期阶段，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敌人占据优势，处于进攻地位，而我军暂居劣势，处于防御地位，所以只能以运动战为主，在运动战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拘于一城一地的得失，绝对不消耗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

待战争发展到 1948 年 6 月，虽然敌军力数量上仍占优势，又有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援助，但从战略上看，敌人已处于战略防御，只有招架之力了。而我军却处于战略进攻、占据主动的地位了。我军也由占领农村、包围城市，转化为夺取城市，由消灭分散、孤立、弱小之敌，转化为围歼集中、强大之敌。这也就必然造成以阵地战为主的局面。即使到这时，运用两种战术形式，虽有主次之分，但仍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的。

辽沈战役中，攻歼设防坚固，又有十几万强大敌军防守的锦州是攻坚的阵地战；在塔山以近三个纵队的兵力，阻止敌人援锦的九个师，则是阻援的阵地战。而我军解放锦州，便挥师北上，迎击廖耀湘兵团，并在运动中加以围歼，又是运动战在前的阵地战。总之，东北战场，是以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而集中优势兵力攻歼锦州的运动战开始，又以围歼沈阳的卫立煌之敌的阵地战结束。

在淮海战役中，我军以十一个纵队，侧击、攻击、截击西撤的黄伯韬兵团，是运动战；而最后围歼黄伯韬于碾庄地区，就成了攻坚的阵地战。阻击邱清泉、李弥十二个师东援，则是防御中的阵地战。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挥师包围黄维兵团于蒙城东北的双堆集地区，是运动战；最后把他歼灭，就成了攻击的阵地战了。所以，整个战役，也是以消灭黄伯韬兵团、分割包围敌人的运动战开始，而以逐个围歼黄维兵团、杜聿明集团的阵地战结束。由此看出战争发展的必然规律，也看出运动战与阵地战之间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恰到好处地运用运动战和阵地战，并使这两种战法达到和谐辩证统一的极高境界。

初战与决战

在组织战略决战中，初战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往往决定整个战局的方向，影响决战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的转化。甚至初战的胜负，会决定战争全局或战役全局的胜负。所以，必须从决战全局的高度来确定初战，从而使初战和决战取得胜利有绝对把握。

历来的军事家虽然都对初战极为重视，极为谨慎，但初战指导的艺术，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象毛泽东那样，从理论上达到如此的成就，在实战上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初战东北，战略主动，稳操我手，为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东北战役，又首战锦州，确保了“关门打狗”的战术的成功和全歼东北之敌的胜利。又

如淮海战役初战歼灭黄伯韬，战役之始，先断刘峙一臂，使其成为独臂将军，完成了对淮海战场八十多万敌军的分割包围，奠定了淮海战役决战取胜的基础。再如平津战役初战攻歼张家口、新保安，绝傅作义西窜之望，接着解放天津，断其从海上逃跑的预谋，斩头去尾，使傅作义处于四面楚歌的绝境，遂使和平解放北平成功，创造了解决敌人的三种方式中的一种——北平方式。

战略决战的初战辽沈，而辽沈战役的初战锦州，淮海战役的初战歼灭黄伯韬，平津战役的初战新保安、张家口和天津，都是从整个战役的全局和战略决战的全局出发的，初战与决战都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所以，初战胜利，便成势如破竹、排山倒海之势，取得各个战役、最终取得整个战略决战的胜利。三大战役和战略决战的初胜，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初战原则，成为初战取胜的光辉战例。

速决与缓歼

“兵贵神速”，“战贵速决”，这是兵家常识，但也不可绝对化，由于战役决战或战略决战的需要，本来可以速决的战役或战斗，也可缓决，暂时留住敌人，不予歼灭。

辽沈战役中，对锦州一战，即为速决。毛泽东命令林彪、罗荣桓：“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并且“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所以，东北野战军，便以六个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一个但克营的兵力，围攻锦州，另以两个纵队配置于锦州西南的塔山、高桥地区，三个纵队配置于黑山、大虎口、彰武地区，阻击援锦之敌，确保锦州攻坚战的速度。

我军从1948年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进攻，仅经过三十一个小时，便全歼锦州之敌，俘获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以下十余万人，解放锦州。这么大规模的战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胜，其激烈程度可以想见，是为速决的典型战例。而对长春之敌则采取了缓歼的战术。开始，长春在我包围之下，完全易于歼灭，但这样打法却不利于辽沈战役全局，反有可能增加全歼东北诸敌的困难。先打掉锦州，迫使长春之敌一部起义，大部投降，不战而胜，岂不妙绝。

在淮海战役中，歼灭黄伯韬兵团，便是速决，所以，把此一战作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并作了以六至七个纵队歼敌三个师的部署。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22日结束，仅十六天时间，便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击毙了黄伯韬，还歼灭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的十二个师之一部。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到12月15日，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配合，又围歼了黄维兵团，生俘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同时歼灭了由徐州西逃的孙元良兵团。这时社拿明直接指挥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弃徐州西逃，也被围于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地区，本易于消灭，毛泽东却命令对其缓歼，待到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同华北野战军一起完成对平津地区之敌的分割包围之后，再歼灭杜聿明集团，此又一妙着。平津战役的初始阶段，对从塘沽、天津等地到新保安、张家口等地之敌，或围而不

打、或隔而不围，待到淮海战役彻底胜利，再将平津之敌斩头去尾，以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予以解决，更是缓歼的典型战例。

由此看来，速决和缓歼，全是依据战略或战役全局的需要而互为表里，不可分割。速决，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具备了战役全局的态势、敌我军力、财力等等都有利于我的条件；缓歼，不是不歼，“缓”而已，时机一到，坚决歼灭，关键是依据全局的需要，掌握好时机。一旦部署既定，有了稳操胜券的把握，最终还是要彻底解决问题的。

主攻与助攻

按照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军事原则，每战，必以我军主力歼灭敌人，而以少数军力予以配合，但也不可绝对化。毛泽东处理这二者的关系，也以实战需要，极为灵活。淮海战役中首战围歼黄伯韬兵团一战，便是很好的战例。

毛泽东的部署是，以六至七个纵队围黄伯韬三个师，却以一半的兵力（即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对付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十二个师的援助，并歼敌一部，达到顺利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对其余诸敌实行分割包围，又断敌海上逃跑的目的。

一般情况下，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目标上，毛泽东却在我兵力充足、敌军兵力集中、又不违背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的原则的情况下，采取了几乎相反的战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即主攻和助攻的辩证关系，灵活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既歼灭了黄伯韬兵团，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又为以后各个战役阶段的胜利，如歼灭黄维兵团、最后歼灭杜幸明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军事歼灭与政治攻势

任何战争，消灭敌人，都是以军事手段为主的。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极端手段。任何敌人都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立地成佛，退出历史舞台。这就象打扫灰尘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但军事手段也不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在一定条件下，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以瓦解敌军，也是重要手段之一，在处于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如汉刘邦围项羽于垓下，以“四面楚歌”的政治攻势，瓦解了项羽的军心。项羽自知大势已去，又无颜见江东父老，最后自刎乌江，留下一曲悲歌，便是很好的战例。

毛泽东的英明之处，超人之处，在于把军事歼灭和政治攻势这两种消灭敌人的方式，都科学化，一体化，艺术化了。关于以军事、政治手段消灭国内外的敌人（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战争等），毛泽东有着高深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创造性地总结出游击战、运动战等一系列的战略战术，以及政治攻势的方式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军事宝库中的瑰宝。就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敢忽视，也不敢不研究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和战略战术原则。在三大战役中，由于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败局已成，敌人内部各种矛盾，都迅速扩大化尖锐化了，也为我军运用政治攻势瓦解敌

军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

在辽沈战役中，歼灭了锦州顽抗的范汉杰和自投罗网的廖耀湘之后，整个东北敌军陷于覆灭的境地。我军便运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遂使长春之敌曾泽生部起义，郑洞国部被迫投降，也就造成沈阳卫立煌被歼成为定势。

在淮海战役中，我军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之后，处于强大的军事优势，便利用政治攻势，争取了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部的起义，迫使孙良诚、赵壁光、黄子华等部的投诚。在围歼杜聿明的时候，也发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虽杜幸明拒不投降而遭歼灭，做了俘虏，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也争取了敌人官兵一万四千余人来降。可见政治攻势的巨大威力。

在平津战役中，这两种进攻形式，运用得就更加纯熟、卓有成效。对平津之敌采取了“先礼后兵”的方法，先晓之以理，指出敌人面临被歼和接受和平解决两条路；后动之以情，为中国人民和官兵免遭生命财产损失，以后视敌人的不同态度采取了三种处理方式。对新保安、天津等顽抗之敌，采取坚决、彻底、干净歼灭的方式，而对北平之敌，则继续采取强大的政治攻势，讲清国内外形势，晓之以民族大义，保护古都，免遭后人唾骂；动之以深情厚谊，甚至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亲自做傅作义的工作，遂促使他坚定了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心，使古都北平的解放兵不血刃，同时也挽救了他自己，由反革命战争罪犯，成为对民族、对国家有了贡献的“大功臣”，还通过他促成了绥远国民党残部的起义。

由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总结出解决敌人的三种方式：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不过，运用这三种方式，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立足于军事解决，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顽抗的敌人。正象毛泽东所说：“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二是在造成强大的军事优势的威慑之后，再充分利用政治攻势，而且必须明白，这也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幻想不通过各种方式的斗争，便使敌人起义、投降是不切实际的。当然，不充分利用军事优势，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不认真地、耐心地做敌人的工作，一味地军事解决问题，也是形而上学，缺少辩证法。

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

任何战争的成败，都主要取决于这两个因素，最终取决于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在战争中尤其明显。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便是充分调动了军队和人民群众这两大因素的积极性，并使这种积极性发挥到极至。

在三大战役决战之前，党在军队中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开展了“三大民主”、立功运动、政策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大大激发起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和革命主动精神，能在以后的战斗中以惊人的毅力，高度的智慧，灵活的战术，勇猛无畏的牺牲精神，完成作战任务。在群众中，进行伟大的土改运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鼓励其发展生产，光荣参军，支援前线，形成“前面打蒋军，后方挖蒋根”的热潮。

在三大战役中，辽沈战场上，六、七十万军队直接投入战斗，三十余万

人作为后备兵源，另有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余辆大车，九万六千余名民工，支援前线，随军行动。淮海战场上，直接投入战斗的六十余万军队，四十余万地方武装，配合作战，二百余万民工推车挑担担，支援前线，军队打到哪里，人民便支援到哪里。我军与民的比例，竟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的程度。

这就把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军队和地方，前方和后方，全部动员起来，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无法逃脱灭顶之灾。兵民是胜利之本。所以，战略大决战的胜利，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

总之，无论是战略决战的整体，还是三个战役阶段，还是三个战役阶段的各个战斗，无不处处充满敌我双方的矛盾，无不充满辩证法，而且敌我双方，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军事与政治等等，无不依时间、地点、军力、人力、物力、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诸条件的不断变化而转化。毛泽东作为伟大军队的最高统帅，他的英明伟大在于，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胸怀和胆略，以科学的战略战术，在六亿神州的大地上，导演了一场史无前例、威武雄壮、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战略大决战，并使自己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战争的胜利！也不能不说这也是辩证法的胜利！

决战决胜决乾坤 妙手妙笔妙文章

翻开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纵横八千里，象辽沈、淮海、平津这样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是从未有过的。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面上，几百万军队进行会战，如此复杂，如此激烈，也为中外古今少见。若把这一战略决战比作一篇宏伟壮丽、光照千古的文章，那么，象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这样，在六亿神州这片大地上，以如此高超纯熟的艺术才能，生花的妙笔，书写出如此丰富多彩、奥妙神奇的妙文，也该是亘古未有的大手笔。

1946年7月，独夫民贼蒋介石，自恃手里有四百万军队，又完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充分”准备，接收了一百万日本侵略军的全部武装，再有美帝国主义军事、财政上的巨大援助，而解放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客观条件下却占“劣势”，所以，蒋介石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完全不顾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和平建国的愿望，撕毁了1946年1月间经过四十三天艰苦的重庆谈判而签订的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和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悍然挑起内战，又把中国人民投入血泊中。

但是战争自有它自己的规律，绝不依蒋的如意算盘而转移。蒋介石的军事力量的优势，帝国主义的援助，解放区的困难，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性质，人心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

所以，战争到了1947年的下半年，仅仅一年，便出现了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

到1948年6月，解放战争就完全出现了新局面：军事上，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每况愈下，总军力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能作战的一百七十余万人，被我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北、东北、华东五个孤立的战场上。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却在战争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由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十余万人，军事、政治素质不断提高，愈战愈强，一年多消灭了敌军一百多万人，并依靠蒋介石这个优秀的运输大队长，不断武装自己，无论内线作战，还是外线作战，都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不但能打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能打攻城略地的大规模的阵地战，并且已经创造了四平、石家庄这样攻坚战样板。事实表明，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操在我们的手里。眼下这篇文章如何做，就看毛泽东这位妙手的生花之笔了。

这里有段插叙，值得一提。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蒋介石反动派便挑起内战。在延安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到河边散步，正好遇到美国友人马海德和夫人苏菲。老友相见，非常亲切，便坐在河边的石头上促膝谈心。马海德问哈尔滨能否保住，毛泽东说：美国帮助蒋介石运兵凡十万到东北，要占领所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们也准备让给他，他暂时处于优势。让蒋介石高兴一点，将来消灭他也更容易些。马海德还问：蒋介石一共有多少军队？毛泽东说：他号称五百万军队，实际上真正能打仗的只有三百万左右。他如果往东北运去一百万，还有二百万，分布在全国各地。到那时候，蒋介石就没有后方了，他就会发现，他的末日来临了。他想挽救败局也来不及了。这使马海德非常感动，连声说：毛主席看问题，总是看得很远呀。战争的胜利，一定是中共的。

历史正是按毛泽东的预言前进的。到了1948年下半年，毛泽东的预言，就全部实现了！

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就象写一篇精妙绝伦的散文，内容复杂，变化多端，首先需要确定这篇文章的主题。有了主题，材料的取舍，布局谋篇，承转关锁，方法的运用等等，也就易于解决了。

当时面临的形势是：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又打内战，人民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军事上也有了这种可能，在力量对比上敌人形式上仍占优势的情况下，发展我们节节胜利的形势，组织力量，向敌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已完全可能。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敢于攻击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敢于同敌人强大的机动兵团作战，敢于打我军从未打过的大仗、恶仗，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即这篇雄文的主题：决战！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这一战略决策，妙在抓住时机上，早则不成熟，晚则时不我待。正如1949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社论中所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的错误，就是择时不当。”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扑捉战机的无比英明和果断。

主题确定了，文章如何做？话要一句一句他说，文章要一段一段地写，即使有挥笔而就的才能，也无不如此。尤其困难的是开头一段。因为战略决战阶段的斗争，最激烈，最复杂，也最易变化，瞬息万端。也象一盘棋，一着投错，满盘皆输；一步妙棋，也可使满盘皆活。真是一笔九鼎，一子千钧啊！所以，战略决战之始，首战哪里，就成了决战的方向问题了。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毛泽东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这是指战略上说的。真要打败他，策略上需要一仗一仗地打，而且不得有半点疏忽，尤其全国各个战场的形势，都不同程度地有利于人民解放军，但眼前的决战，第一个战役由何处打起？这就需要“知己知彼”了。毛泽东讲得更透彻更鲜明了：“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的侦察、思索、判断、决心、部署是怎样的呢？

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五十五万余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通过北宁线锦、榆段与关内水陆联系；华北战场为傅作义集团，六十余万人，分布于平绥线上的归绥、张家口，以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地，塘沽港是他们的补给线；太原的军伐阎锡山已被我解放军团团围住，已成瓮中之鳖；华东战场是刘峙集团，六十余万人，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连云港，西至商丘的陇海线，以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线上，企图阻止我大军南下；中原战场为自崇禧集团，七十五万余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以及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三十余万人，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下败将，被牵制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的一隅。这五个集团已被我战略包围分割，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

这篇自古以来规模最大的战略决战的雄文，根据敌人这五个集团的特点及其分布状况，确定为三大战区，共分三大段：

1948年9月12日至1948年11月2日，进行了辽沈战役，歼敌四十七万余人，完全解放东北；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进行了淮海战役，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人，使解放长江以北，已成定局；

1948年12月上旬至1949年1月31日，进行了平津战役，歼敌五十二万余人，全部解放了长江以北，并为渡江，解放全中国，建都北京，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这位文章大家，运用一技妙笔，所写的这篇妙文，真是处处生花，处处生辉，其艺术境界，实在是妙不可言，纵使唐宋八大家再世，也哪里能比得上一二？

首先，在军事力量对比上敌人表面仍处优势的情况下，作出进行战略决战的伟大决策，就气势豪放，声威夺人，大有排山倒海、不战而胜的气势。其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胆略，已为世瞩目。

以下仅就几处妙笔，与大家共赏析。

妙笔之一，是首战东北。从政治上看，东北解放区已占97%，

实力较强，军事上占绝对优势；而敌人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另外敌人曾有“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计划，但蒋介石优柔寡断，举棋不定。首战东北，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如“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等等。在战役上完全有了战必胜的把握。先打东北，也使蒋介石“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梦想成为泡影，同时还避免了我先打华；北，则会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真是扬己之长，击敌之短，一石三鸟的妙着。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这一战略方向的确定，是何等的英明！其宏图大略，全局在胸，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指挥才能，是何等的惊人！

妙笔之二，是进行东北战役，绝不先打长春，中敌人牵制我军的好计，而是先打锦州。打下锦州，满盘皆活，所以，毛泽东在1948年9月7日给林彪、罗荣桓的电报中说：“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10月10日，毛泽东又电令林彪、罗荣桓：“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锦州战役的胜利，完全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因锦、榆、唐一线敌人互相孤立，遂使打锦州的攻坚战成为确实可靠。打锦州是击敌要害，所以锦州打响，蒋介石便急忙飞抵沈阳，坐阵督战，甚至锦州已被我解放，蒋介石还下死命令，让廖耀湘夺回锦州。正因为如此，使我“打其必援”的战术又得以实现。攻占锦州，歼敌十万，攻坚打援，又歼敌十万，卫立煌集团就成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囊中之物，我军关门打狗的态势遂成；解放锦州也成了逼长春之敌一部起义、大部投降、我一举解放沈阳的伏笔。

妙笔之三，辽沈战役于1948年9月12日打响之前，在9月7日给林彪、罗荣桓的电报中说：“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而另一方面却命令华东我军避免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并且明确具体地指示，即使歼灭

敌人，也不要超过一两个整编师。

这一笔妙在，既可以使蒋介石继续做他的盘踞东北的梦，又可以促使蒋介石“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计划继续“优柔”下去，直至卫立煌集团的覆灭。如果华东我军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势必促使蒋介石下撤退东北的决心，真的如此，毛泽东把卫立煌集团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消灭的构想就不能实现，同时必然使华东敌军得到增援，这样，反倒增加了我们战略决战的困难，从而使整个决战的战局受到影响。历史的发展，确实证明了这一战役决断，不愧是惊世骇俗之笔！

全歼东北之敌卫立煌集团，完全解放东北之后，毛泽东又运用“兵贵神速”、“出敌不意”的原则，接着命令东北我军，不待休整，便秘密入关，可以看作这篇妙文的过渡段。这一军事行动如此神秘，如此迅疾，妙在会同华北我军完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但是，毛泽东又命令东北野战军“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

妙笔之四，是东北战役还在激烈地进行中，毛泽东便部署了淮海战役，并把这一战役分作三个阶段，而第一阶段的重心，就妙在确定“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等地上。因为淮海战场，蒋匪军六十余万人，若加上以后增援的一个兵团及其他部队，共八十余万人，取“一点两线，重兵密集”的态势，妄图以其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猬集一团，让我“吃不掉，啃不烂，歼不了”，并互相策应，守住中原，屏障南京。所以，要战胜他们，必须先行分割包围，使其不能机动灵活，互相迅速增援。所以，毛泽东的战役部署为：以优势兵力，即以二个纵队消灭敌一个师的比例，以六至七个纵队围歼黄伯韬兵团；而以五至六个纵队实行分割、阻援打援，牵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使其不敢舍命东援等。

歼灭了黄伯韬兵团，首先断刘峙一臂，使其成了独臂将军；而使我山东、苏北解放区联成一片；还切断了敌人的海上通道，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淮海的态势，刘峙集团陷于四面被围，孤立无援，又无路可逃的绝境。

此后，我军稍松了松套在刘峙脖子上的绞索，缓歼杜聿明，稳住了东北、华北敌军，待东北战役全歼敌人，彻底胜利之后，才紧接着完成了第二、第三阶段的作战任务：歼灭了黄维兵团和刘峙亲自指挥的杜幸明集团，又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从而使蒋介石“力争华北，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幻想彻底破灭，经营了二十多年的蒋家王朝已是大厦将倾，土崩瓦解，气数已尽了。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是何等的灵活！

毛泽东的辩证思想是何等的完美！

妙笔之五，是淮海战役鏖战正急的时候，毛泽东电令太原前线的徐向前、周士第，不要急于攻歼太原之敌，待到东北战役完全胜利，大军入关，淮海战役也已胜利，平津战役业已打响，再对太原之敌实施最后歼灭。这样做的妙处在于，既可以确保淮海战场之敌孤立无援，被我从容歼灭，又可稳住北平之敌，不致从海上逃掉或西窜，以增加我军日后消灭他们的困难。这是作战中战术上的策应，却是做文章中的细节，对于表现主题是何等的巧妙和不可缺少。

妙笔之六，是和平解放北平。淮海战役虽还在进行，但敌人被歼灭，我军稳操胜券，已成定局，所以北平之敌傅作义已成惊弓之鸟。傅作义六十多万军队便企图由海上逃走，或西窜绥远。但没等傅作义惊魂稍定，毛泽东便

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与华北聂荣臻兵团配合，以神速的动作，将敌人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五个地区，使敌人既不能从海上逃走，又不能西窜绥远，完全处于收不拢、逃不掉的绝境。在完成这一战役包围之前，甚至被围于张家口、新保安之敌，以及杨罗耿兵团所包围的敌三个师，都不先行消灭。淮海战场，也暂缓歼灭杜幸明残部。待我从容布阵完毕，再逐一歼灭。

1948年12月22日，围歼新保安之敌；24日攻歼张家口之敌；1949年1月11日，攻歼天津之敌，活捉顽抗的陈长捷，至此，华北之敌被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斩头去尾，分段歼灭。遂使北平二十万守军被团团围住，陷于毛泽东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之下，傅作义便率部起义，接受和平改编，北平遂和平解放。

毛泽东象一位艺术高超的设计师，成竹在胸，精密设计，彼此呼应，左右逢源，真达到妙不可言的境界。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战略决战这篇雄文已基本作成，不过还有两个插曲也非常精彩，很值得一提。

一是，当辽沈战役刚开始的时候，我军得到消息，说傅作义的部队已经从北平、保定出发南进，扬言要夺回早已被我军解放的石家庄市，并妄图偷袭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西柏坡。而我军在北平至石家庄之间，又无主力部署，所以情势十分危急。因而周恩来副主席作了如下部署：西柏坡的警卫部队，加紧训练，刺杀投弹，准备迎击敌人。若敌人敢于进犯，便坚决抵抗，掩护党中央、毛泽东安全转移，中央机关也做好了转移准备，当地农民也加紧秋收秋种、藏粮，准备转移。

毛泽东为了从精神上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便于1948年10月31日，亲自写了一篇新华社述评，公开警告敌人：我们已经作好了充分准备，你来对你没好处，你还是老实一点好。述评中还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你们究竟还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这样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几个兵了；总之蒋介石的整个北方战线，傅作义的整个系统，大概也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了，还在那里做什么石家庄的梦！

毛泽东在赞扬了玲的一首词中曾说：“纤笔一技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毛泽东用的不是纤笔，而是如椽巨笔，又顶多少精兵呢？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大概就难以计算了吧。

述评一播，果真灵验。敌人象《空城计》里的司马懿一样，退兵了，而且很快，也算得上“兵贵神速”，他们逃回保定、北平等地。不久，保定敌军也龟缩到北平。

瞧，一技多么名副其实的力敌千军万马的妙笔！

二是，在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天津又获得解放，傅作义的二十万大军，便处于我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真是有天大神通，也插翅难飞。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强大的政治攻势之下，傅作义一与我党派遣的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举行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基于爱祖国、爱民族的热忱，以保护北平二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古都文物为重，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

但在和谈条件尚未全部执行的时候，傅作义将军却请求要亲自拜见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央首长。

在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同意之后，傅作义和邓宝珊将军便飞抵石家

庄，受到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迎接，并陪同乘吉普到达西柏坡，受到周恩来的热烈欢迎。周恩来肯定了傅作义的爱国行动，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是位爱国将领，并勉励他继续与我党合作，欢迎他参加后来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使傅作义极为感动。

接着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

接见时，傅作义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第一句便说：“我有罪！”毛泽东却赞扬他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还勉励他说：你是功大于过。和平解决北平最好，你带了好头，立了个大功。将来你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还勉励他将来当个水利部长，更好地发挥作用。还给他讲了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傅作义极为激动，表示要“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证把工作做好。在我有生之年，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也好弥补我过去的过错。”

他是狐疑而来，感激而去。

以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得到完全、顺利的执行，还协助我党和平解放了绥远；直到解放之后，他任许多要职，如水利部长、国防委员等等，为建设祖国，全心全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看，毛泽东把这篇妙文做得处处伏笔，处处照应，承转关锁，浑然一体，多么细致入微，天衣无缝，绝妙之至！

总之，战略决战的这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先后消灭了蒋介石的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使蒋介石的老巢南京完全暴露在我军威胁之下，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指日可待，独夫民贼、内战、卖国的蒋介石也已成丧家之犬。

正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决战，使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得到充分发挥，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既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军事艺术，又使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在中国的革命战争中得以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成毛泽东自己独特的军事科学体系，及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他在战略决战里，洞察全局，高屋建瓴，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那非凡的英明和伟大气魄，是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的，对中国、对世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写作战略大决战这篇超世绝俗的妙文过程中，胸怀全局，周密布阵，此呼彼应，环环相扣，三大战役，各具特色。真可谓妙思泉涌，奔赴笔下，处处生花，异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起笔惊天地，落墨注鬼神”，中外古今军事史上，经过如此多，如此复杂，规模如此大的战斗，其指挥艺术发挥到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其军事理论具有如此鲜明的民族、时代特色，又具有如此的世界普遍性，毛泽东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

因地制宜学列宁 丰富发展游击战

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产生，也在斗争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在他的时代认为，必须以革命的暴力，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认为这种革命，必须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丰富发展了关于国家革命的学说。在他的时代，提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便开辟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使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他的时代，则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如中国，也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不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并在实践中，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井冈山”道路。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夺得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

从继承和发展中，明显地看出：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才有所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中，也是如此。如毛泽东对列宁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便有继承，有突破，有发展，甚至使这一理论达到高度科学化、艺术化的程度。

1906年列宁在《游击战争》一文中，曾说：“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一种斗争方式。”并指出：“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这就充分肯定了“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方式，并斥责了对游击战争的种种怀疑和攻击。

毛泽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极为严肃认真，尤其重视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但他绝不象“左”倾机会主义者那样，教条地照搬苏联的经验，搞什么“一省数省的胜利”，把希望又寄托在攻打大城市上，给革命造成难以弥补的危害。毛泽东认为，不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不承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阉割。应当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运用马列主义，又要在本国的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

列宁所指的“游击战争”，主要是指在“黑帮政府反对居民的武装冲突和搏战条件下，‘居民自发地、无组织地——因此也就往往采取不能奏效的坏形式——用武装冲突和攻击来对待这种现象。’”他还说：“有人说，游击战争会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弄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这是对的”，并进一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作唯一的斗争手段，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手段。”因而主张：“社会民主党应当好好培养和训练自己的组织，使它们真正能够起作战一方的作用，不错过任何一个打击敌人力量的机会。”这些论述，是列宁考察了俄国、那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而提出的，也许完全是对的。

但毛泽东没有无条件地照搬这一理论，更没有象从苏联回来的那几位秀才那样，无条件地实行。因为任何一国、任何革命的经验，既有普遍性的一面，更有特殊性的一面，因而只能学其精神，至于具体如何做，则要考察中国革命各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然后作出抉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具体环境的特点是：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但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敌人的强大，他们有武器、军事物资都远比革命武装强大的常备军；红军的弱小，数量、武器、作战物资远不如敌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便奠定了井冈山时期的战争形式只能是游击战的理论基础；其战争形式绝不能是苏联“十月革命”式——首先在大城市起义，然后推进到全国；也不能是采取中国的北伐战争式——长驱直入，占领大城市，而必须是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游击战；并且必须有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科学的战略战术；决定了中国弱小的红军，能够在与强敌的战争中夺取胜利。

所以，中国的游击战争，无论理论的深刻性，战略战术的科学性，指挥艺术的灵活、丰富多彩性，还是实践的有效性，都不是列宁所指的“游击战争”所能比拟的。

首先，中国的游击战争，绝非自发的、无组织的、盲目的行动，而是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有目的、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它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忠实支持；它有着严密的军事组织，尤其在三湾改编之后，军队完全在党的指挥之下，并有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保证，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即使有相当的游民、流氓无产者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但在党的教育影响下，也绝不会“把无产阶级弄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倒是这些游民、流氓无产者在党的教育影响下，在革命实践的自我教育中，锻炼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它还有坚强的纪律性，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和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更保证了军事行动的高度统一。

就是这样一支在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成功地、极为有效地进行了“游击战争”，取得了第一次到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人类战争史上发出耀眼的光辉，在中国、在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仅以第三次反“围剿”为例。蒋介石亲自出马任总司令，分兵三路，中路何应钦，左路朱绍良，右路陈铭枢。“进剿”军由第一次“围剿”的十万人、第二次“围剿”的二十万人，到这次的三十万人马，取“长驱直入”的战略，风烟滚滚，气势汹汹，直扑革命根据地。而我军却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安一点，由西而东，向敌人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诱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武之地。及至敌人觉察，回头向北，我则乘机打其疲劳者。然后向莲塘、良村、黄歧突进，四天连打三仗，三战皆捷，缴枪逾万。敌主力发现我意图，猛力并进，找我作战，我却穿插迂回，休整自己，疲劳敌人，使敌人的士气沮丧，我则避其锋芒，击其虚弱，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终使蒋介石无能为力，在自嗟叹，只好退却。真可谓不可一世而来，弃甲曳兵而逃。毛泽东所谱写的“游击战争”的篇章，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也熠熠生辉。

还是在井冈山游击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就开始形成了一套尽管带有朴素性质却是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后毛泽东又在实战中提出了“诱敌深入，避敌精锐，击其虚弱”的方针。这就包举了游击战中的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

个阶段；而战略防御又包括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形成了较为全面、又为实战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如：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游击主义，承认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役的速决战和战略的持久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思想，承认小后方思想；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权威的军事纪律，反对孤立主义政策，承认尽量争取一切可靠的同盟者，等等。总之，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也有防御和后退。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充满生动活泼的辩证法和高度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使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从理论到实践部趋于成熟。

然而，“左”倾冒险主义者，闭眼不看世界，不看中国革命的实际，好象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他们基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剧”、革命高潮的形成，甚至认为世界革命也即将成功等错误理论，提出了“三次反‘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错误路线，狂热地提出与蒋介石的战争是“国与国作战”，要“全面出击”、“夺取中心城市”、“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决战”、要“绝对的集中指挥”、“两个拳头打入”等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抛弃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反诬游击战为“游击主义”，“是山沟沟里产生的”，这些毫无马克思主义气味的鲁莽家和战争门外汉们的理论与孤行，最后导致了极为严重的恶果：“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成了逃跑主义。”使红军连遭劫难，损失大部，根据地丧失殆尽，被迫长征。造成了革命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恩格斯在 1849 年 4 月 1 日所作《皮蒙特军队的失败》一文中就曾指出：

皮蒙特人一开始就铸下的一个大错误，就是他们只用正规军队来抵抗奥军，他们想进行最一般的、资产阶级式的、规规矩矩的战争。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

这多么象是针对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所发的响箭，准确无误地击中其教条主义的要害，显出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卖质；也多么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英明，以及他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中国大而弱，它是个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大国，又是近百年来任人欺侮、任人宰割的弱国，但是，它所进行的民族战争，却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战争，因而是进步的；日本帝国主义小而强，虽然它的军力、物力、财力是强大的，疯狂一时，不可一世，但是它国小、人少，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因而是落后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既不会失败而亡国，也不会轻易速胜，但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却是肯定的。日本帝国主义凶狠、残忍，但它陷于中国人民战争的汪

洋大海之中，象一匹野牛陷于火阵，既不可能速决，又因人力、财力、军力的匮乏绝不能持久，所以最后的失败，也是必然无疑的。

反映在军事上，中国的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也决不能只是单一的正规军的对抗作战，而必须是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等的结合，相辅相成。

抗日战争的根本规律是战略上的持久战，而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论持久战》）随着这种防御——相持——进攻的发展和变化，各种主要战法也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第二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和阵地战为辅；第三阶段，以运动战为主（并非第一阶段的正规军进行的运动战，而是游击军所担负的游击战上升为正规军所进行的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而这三个阶段上的游击战的地位和作用也绝不完全相同。

运动战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游击战的特点则是：在战场、战地、战区的高度主动性，取得自由权；兵力的指挥和使用上的灵活性，分散以发动组织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及时转移，不拘于一城一地、坛坛罐罐；客观条件下尽可能严密的计划性。所以，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只能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且出现了“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

本来，游击战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即只起战术作用，但在中国，国大、力弱、抗日的持久性等特殊条件下，游击战就不但是主要的战争形式之一，而且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和作用。毛泽东把这种战略作用归纳为六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而且在战术思想和实战的指挥上的“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灵活地使用兵力；一切行动的计划性”，等等，其思考的严密性、灵活性，其得心应手的程度，都达到高度艺术化的境界。

在中国的军事传统中，出现过关于游击战争中的某项战略战术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如：“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孙子·九变》）便涉及到作战中的防御和进攻问题。“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便涉及到作战中的指挥和灵活地使用兵力。但这是朴素的，孙武没有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谈论现代化战争，尤其是游击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问题。

在国际上虽然有过游击战争，如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古巴、越南在解放战争中的游击战；也有一定的理论建树，如列宁的《游击战争》等，但没有任何一国能象中国的游击战争，有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既有阶级战争中的游击战，如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又有民族战争中的游击战，如抗日战争，更没有哪一位军事家象毛泽东那样，对游击战争，有如此全面、系统、科学、深刻的论述，不但肯定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方式，肯定它的战术地位，并由此制订出一系列战术原则，而且创造性地肯定游击战争的战略地

位，并由此制订出一系列战略原则。从理论上的论证，到具体的战略战术的制订，都既继承本民族最优秀的军事传统，也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传统，并丰富和发展了这些传统，使之发扬光大。

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确实有着自己独特的创造性，确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并达到新的高峰——到目前为止，中外还没有任何人能逾越的高峰。游击战争这篇文章，确实让毛泽东做活了，做绝了。毛泽东所表现的军事战略家的风范，其军事思想的深刻性，其军事艺术方面的造诣，不但史无前例，即使在现代，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还没有谁能与他媲美。

毛泽东的思维艺术

虱子和中国

四十年代，美国进步作家斯诺就成了毛泽东的好朋友。当年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穿着打补丁的皱巴已的布衣服，请斯诺吃夹红辣椒的馒头，跟斯诺一起打扑克，一面谈笑风生，一面用手搓着脖子上的污垢，有时毫不在乎地松开裤腰带伸手进去抓虱子。毛泽东对斯诺说：“如果你身上还没有虱子，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虱子和中国本无必然的联系，但毛泽东用了一个假言判断把二者连在上起之后，就会使人顿开茅塞，大彻大悟。毛泽东这种超常的思维，不单在于他丰富的联想力（由肮脏的虱子想到黑暗落后的旧中国），更重要的是锐利的穿透力和强烈的变革意识。

毛泽东思维的锐利穿透力，在于对旧中国看得透底彻里，从历史到现实，从微观到宏观。在此，毛泽东把旧中国的黑暗和落后看作犹如虱子。罗曼·罗兰说过：生活在一个太古老的民族，是光荣的同时，也是沉重的负担。的确，封建主义的一套，从孔夫子开始，到程朱理学，把我们这个民族层层包裹、层层捆绑了两千多年。旧意识已经把人们侵蚀得贫弱苍白，来一点风都要打喷嚏！国家的先进和不先进是可比的，不是靠吹的，谁承认这一点，谁就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历史上有过几次时机我们没有抓住：十八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在欧洲兴起，当时我国正处在“乾隆盛世”，社会封闭，信息阻塞，对世界的技术革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因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拉大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洋枪洋炮与大刀长矛进行了较量，日本抓住这个时机搞明治维新，收效很大，而中国的戊戌变法者却倒在血泊之中，于是，中国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就更大了。当然，世界产业革命、技术革命，它的意义将远远超出技术本身，将波及到生产组织、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世界前进了，然而当时的中国人民仍然被虱子啃噬着。

毛泽东思维的强烈变革意识，在于“穷则思变”的思想内蕴，这也是毛泽东奋斗终生的动力之一。这种思想在1958年《介绍一个合作社》中作了集中表述：“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毛泽东用“虱子”来比喻旧中国的丑，但揭露丑，是为美开辟道路。正如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创建共产主义一样。进取者的勇敢不是表现在对旧世界的蔑视，更表现在对新道路的开拓、对新世界的创造。历史证明，毛泽东这种强烈的变革意识，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冲垮了一个又一个的旧堡垒，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它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

目前，在改革的大潮中，毛泽东这种思维的穿透力和思维的变革意识具有重要的楷模作用。我们的改革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阻力，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可能来自现状，也可能来自传统。但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设险置难

历史越来越清楚地证明：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是伟大的壮举，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使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了巨大作用，这在世界上具有不可估量的划时代意义。而同时也展现出毛泽东设险置难的思维艺术。

毛泽东是在 1972 年邀尼克松访华的。这一举动险不险？险。难不难？难。它的险处和难处除了“四人帮”竭力反对之外，还在于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反美情绪十分高涨。全国的城镇和乡村几乎到处都贴着这样一些醒目的大标语：“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在军队或民兵的打靶场上，打靶的目标往往就是尼克松的漫画像。这一切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不可共戴天的仇敌，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不打不倒，一打就倒。谁敢和美帝有来往呢？就在这种背景之下，毛泽东决定邀请尼克松访华。为了使这个弯子不至于转得太急，为了使中国人民的心理上不至于承受不了，毛泽东在外交上下了一场场毛毛雨。先是 1970 年国庆节，毛泽东邀请美国作家斯诺以他私人朋友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并对斯诺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毛泽东还让斯诺给尼克松捎个信：“当作旅行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然后，让周恩来总理通过乒乓外交，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毛毛雨过后，中国人民慢慢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中美两国人民是要友好相处的，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和尼克松谈判。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在国际事务中，要想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就应当设险置难，从而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创造人间奇迹，显示出自己非凡的思维艺术。试想创作一件艺术品若无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之处，其艺术价值就一定不会过高。曹禺的《雷雨》，难就难在集三十年的矛盾于一日；乐山大佛，难就难在它的大，一只佛脚可容得下几个真人站立；苏州微雕，难就难在它的微，米粒之大，可刻得数首诗词的全文。由此可见，无险无难，也就无新无奇。当然，在同尼克松会谈这件事上，如果不会谈，对世界和人民不利；如果会谈过于突然，中国人民在心理上承受不了。二者均为毛泽东所不取，而是明里通过新闻媒介下毛毛雨，暗里通过巴基斯坦等国家牵线搭桥，使之水到渠成，恰到好处。于是，1972 年 2 月 21 日，毛泽东和尼克松终于在北京握手了。

毛泽东设险置难的思维艺术，使基辛格感到“中国人太精细微妙了，到底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的熏陶”，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此人气魄很大，是从大的全球战略上考虑问题的”。尽管毛泽东和尼克松这两位先驱者，以惊人的胆略打开了冰冻二十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离不开历史和时代的因素，但毛泽东在处理国际事务上设险置难的思维艺术，为国际间的开放、理解、沟通、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它的价值和意义，已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超出了当时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一般含义。毛泽东和尼克松的握手对话，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变了，说明一个旧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是他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1972年尼克松访华取得了成功，从此，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向着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变化。尼克松回国后，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汇报说：“尼克松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吸了一口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尼克松，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品质。前者片面，后者全面。毛泽东并没有否认尼克松（当然也包括毛泽东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但总的认为不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而是世界改变了尼克松。这是对于客观世界全面认识和总体把握的辩证思维，它体现了辩证思维的全面性特点。

长期以来，关于辩证思维或辩证法的全面性问题，一般教科书或理论研究都未能将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问题加以研究和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都曾多次谈到过辩证法的全面性问题，但都未将它作为辩证法的基本特征看待。他们认为辩证法主要体现于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毛泽东继承了他们的思想，结合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不仅肯定联系的原则、发展的原则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而且把全面性的原则也作为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加以肯定。他经常明确地将全面性与片面性对举，以标志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分歧和对立。他将形而上学片面的思维方法概括为“一点论”，将辩证的全面的思维方法概括为“两点论”。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片面性是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全面性原则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因而，对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作了集中的对比概括：形而上学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问题，辩证法是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应该说，这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

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首脑会晤，《上海公报》的发表，世界格局的改观，这不能否认尼克松特别是毛泽东的作用，但决定因素是时代的潮流，大势所趋。世界的发展规律，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中美双方早晚要谈，不是尼克松总统来。就是别的什么总统来，因为国际间的开放、理解、沟通、发展是顺天应民的大势。这个“天”，就是规律；这个“民”，就是人心所向。

世界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矛盾的世界，思维怎样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它？毛泽东认为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只要坚持运用矛盾的观点去分析事物的具体矛盾，就一定能全面地认识事物。如果否认矛盾，不懂得运用矛盾分析法，则必将陷入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从毛泽东对于尼克松访华作用的评价上，就透视出他全面分析矛盾的思维艺术：第一，坚持矛盾分析的客观性，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第二，必须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矛盾发展的全过程；第三，必须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矛盾各个方面的联系；第四，矛盾的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所以思维对它的反映应当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

是“三家”，而不是“一家”

鲁迅先生生前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当时并不为革命队伍内部所有的人都理解。例如，有的说他只是“革命的同路人”，有的说他只是“革命的追随者”，有的说“他的杂文不能入文苑”，有的说他写杂文是“浪费生命”，有的为他没集中主要精力搞小说创作而深感遗憾……而毛泽东从1937年《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到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先生作了与众不同的评价：鲁迅不是“一家”，而是“三家”，即“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与众不同的评价，表现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思维艺术。

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这是公认的。鲁迅以他不朽的作品，创造了我国现代文学的最高峰，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创立了具有现在价值和将来价值的里程碑意义的文学业绩。

说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是因为鲁迅有“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例如，1936年当托派的反动嘴脸还没有暴露的时候，鲁迅就大胆地指出其危险倾向。他能从现实和历史的联结点上发现今与古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现实现象的本质。他能从历史中跳出来，不为历史所驾驭而能自由地驾驭历史，使自己的思想具有一般文学家和思想家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第一，他发现中国封建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中国人从来没有取得做人的资格。他的《狂人日记》最先道破这种现象：中国人在被吃，只有做奴隶和做牛马的资格，所以中国人要讲民主，首先要争得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争得做人的资格，而这就要推翻封建专制，推翻吃人的筵席。第二，他发现了阿Q。这一伟大的发现，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和美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阿Q的形象包含的社会思想内涵十分广阔，鲁迅把自己对中国民族性的深刻了解熔铸在这一形象之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的恨假洋鬼子，阿Q的恨小尼姑，阿Q的革命，都是中国民族灵魂的典型表现。中国近代有不少思想家在研究中国的民族性，都想唤起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窒息的中国的“死魂灵”，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象鲁迅那样对中国的社会心理了解得那么深刻，达到那样成熟的程度。第三，鲁迅发现了“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娜拉走后怎样》）。这是最深刻的人生悲剧，是“五四”以后一代觉醒者和奋斗者的悲剧。“五四”时期，不少人提倡个性解放，这当然是进朱的。但鲁迅想得更深，他看到中国社会旧势力的根底十分坚固，要前进一步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社会的解放，个性也难以解放。近代史上，那些曾经同情革命和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但是，那些愿意前进的，往哪里前进呢？战友在哪里？出路在哪里？目标在哪里？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这是愿意前进的知识分子的时代大苦闷。鲁迅的这一发现，正是他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当鲁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之后，就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因为鲁迅深信：“在你们（中国共产党——笔者注）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鲁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

说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是因为鲁迅具有坚强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他在同敌人斗争中，“是一支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

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他的威胁、利诱和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具备一种在中国社会特殊情况下所必需的强大精神，即超常的韧性精神。鲁迅认为，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而他自己正是靠这种精神奋斗一生的。鲁迅之所以觉得特别需要这种精神，是从中国具体的国情出发的。第一，鲁迅对中国了解得透彻。当时的社会正是遍地黑暗，正是没有出路，而革命者正是要在黑暗中踏出光明，在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来。鲁迅相信“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的真理。他不把希望作为一种偶像来感召自己，而是在艰苦得几乎没有希望的环境里自己创造希望。正因为鲁迅有这种超常的韧性精神，才使他在旧中国那种异常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出辉煌的业绩。第二，他有着在战斗中智勇结合的深沉的理性，这是韧性精神的另一种表现形态。鲁迅看到中国旧的力量那么强大，单靠一鼓作气进行斗争就难免要碰壁，一碰壁难免灰心，一灰心难免半途而废。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必须用坚实的韧性来代替不坚实的“气”才有希望。他说：“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较为坚定的工作。”（《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认为，革命精神也是一种“气”，革命精神要保持它的活力，必须有理性支持，有科学的基础，必须把智勇结合的深沉理性注入革命精神之中。第三，鲁迅在前进的某一凯旋点上从不自满，而永无止境地继续战斗。一个人在逆境、失败中需要韧性精神，在顺境和胜利中仍需要韧性精神。鲁迅不仅不被艰难和失败所征服，而且也不被胜利和凯旋所征服，他把凯旋点当作新的战斗起点。鲁迅在取得某种成功之后，从来不企求鲜花、桂冠和纪念碑，而是继续在占有真理的基础上向真理的更高境界追求。正是这种超常的韧性精神，鲁迅才不断地把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与众不同，正说明他对鲁迅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与众不同。这与众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正体现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思维艺术。毛泽东对鲁迅的研究，不只是研究一个作家，而是通过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实体来透视中国，研究中国，进而指导中国的革命。毛泽东对鲁迅了解得非常透彻，包括鲁迅的生平、思想、性格及其著作。毛泽东把鲁迅当作我们民族的百科全书式的精神实体，鲁迅的思想和著作都具有典范性和“镜子意义”。毛泽东就是通过这面镜子，透视鲁迅生活的时代和鲁迅之前中国的基本历史风貌。正象通过莎士比亚可以了解英国，通过歌德可以了解德国，通过托尔斯泰可以了解俄国一样。人们对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的研究。时间已经很长了，但仍然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歌德，说不尽的托尔斯泰，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解剖和评价这些文化精华，其意义不仅在于对象本身，而且远远在于对象之外。毛泽东对鲁迅的研究和评价，既看到了鲁迅个人的思想和气质，又看到了历史和时代的特点；既把握了鲁迅这个对象，又超越了这个对象。

关于“青年”

着眼于未来，还是着眼于过去，这两种不同的思维取向，表现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前者是乐观的，进取的，充满活力的；后者则是悲观的，保守的，散发着暮气的。毛泽东关于青年问题的见解就表现了他着眼于未来的思维艺术。

毛泽东关于青年问题的论述很多，最有代表性的当是1957年他在苏联接见中国留学生的讲演了。1957年11月17日，莫斯科雪后天晴，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来到莫斯科大学的礼堂，他向中国留学生们问好之后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

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最后，毛泽东鼓励大家说：“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这些话对青年既有热情的鼓励、真诚的鞭策、殷切的希望、中肯的教诲，又有严格的要求。显然，这都是植根于他对未来的思考上。

绝大部分青年都很纯洁、乐观，有活力，有朝气，接受新事物快，进取心强。他们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新生事物，所以，对待青年的态度，往往是革新者和保守者相区别的的标志之一。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是从青年开始的，那时就提出重视青年精神问题、那时的刊物叫《青年杂志》、《新青年》、《少年中国》等，都突出了“青年”。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说：“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又说：“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这不只是对青年的重视，而且是对青年精神的赞颂。当时更有钱玄同先生说得极为直接，那就是“人过四十必枪毙”。这虽是带着情绪的愤激之言，但却反映了他的青年观，认为青年是宝贵的，是代表时代的。正如鲁迅所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灯下漫笔》）对青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当然，青年人也有不少缺点，老年人也有很多长处，决不能把青年人和老年人对立起来。但作为一种观念，是重视青年，还是轻视青年，有着本质的不同。

事实上，不少人在青春的黄金时代创建了非凡的业绩。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时，年仅二十二岁，创办《湘江评论》时，也只有二十六岁。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二十三岁就被称为当时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列宁二十四岁就写出了俄国共产主义者真正的宣言——《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毛泽东最爱读李贺的诗，《李长吉歌诗》所收二百三十三首脍炙人口的佳作，却是一个二十七岁短命诗人的作品。正如郭小川所说：“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要变成真珠，石头要化做黄金。”（《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的确，青年的敏感和创造精神一经和丰富的知识与成熟的经验相结合，就会相得益彰。他们是优秀成果的继承者，又是新道路的开拓者。

毛泽东在青年问题上着眼于未来的思维艺术，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

理论的深层思考之上，那就是列宁所说的：“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新者的党，而青年总是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的。我们是跟旧的腐朽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青年总是首先投身忘我斗争中去的。”（《孟什维主义的危机》，《列宁全集》第 11 卷，第 338 页）

“老九不能走！”

文革期间，“四人帮”在他们“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指导之下，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位居第九，故诬之为“臭老九”。毛泽东对“四人帮”这种践踏知识、摧残人才的倒行逆施非常气愤。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他借用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异常激动他说：“老九不能走！”两年以后，邓小平同志曾风趣地解释说：“‘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毛泽东信手拈来的这句台词，包孕着一个领袖居高临下的独特思维，其思维艺术在于：不但针对性强，而且语重心长、忧国忧民。一是给了“四人帮”以当头棒喝；二是再一次强调，革命和建设事业离不开知识分子；三是教育党的干部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老九不能走”，不仅在当时有其特殊的意义，而且具有永久的醒世作用。在当今世界，如果说信息是资源，那么人才就是资本。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就指出：“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爱才之心，识才之眼，用才之法，容才之量溢于言表。的确，单枪匹马是解决不了复杂的课题，应借助于“思想库”，靠人才群体的智能。据说，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钢铁大王曾发过誓：“你可以把我所有的工厂、设备、市场和资本全部夺走，但是只要你保留我的机构和人才，几年之后，我还是钢铁大王。”我们中华民族历来也有求才的优良传统。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已成为千古美谈。洋人、古人尚能求才若渴，我们更应当惜才如命。

“老九不能走”，也含有用才之长的意思，而用人才之长应是当代领导者人才观的核心，知识分子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求“足”、求“完”，是极不现实的。所谓“样样皆是”，必然一无是处。有高峰，往往有深谷；有才干，也往往有缺点；谁也不能十项全能。我们深信：“与人类现有博大的知识、经验、能力的汇集总和相比，任何伟大的天才都不及格。”（杜克拉《有效的管理者》）如果只能见人有所短，而不能见人有所长，从而刻意于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长，则必然形成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邓小平同志十分熟悉毛泽东关于知识、人才问题的思维艺术，他非常精辟地概括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事业服务。

理论思维的精华 ——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甚丰，最有代表性的是《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是毛泽东理论思维的精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是毛泽东这样一种思维艺术的结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巧妙继承和发展，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总的特征就是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践（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的统一。具体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为特征的辩证唯物论。辩证唯物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辩证唯物论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斗争，已不仅仅表现在理论领域，而且波及到我们党内的实际活动之中。例如，一些犯有“左”倾错误的同志，在理论上也承认唯物论和辩证法，但在实际活动中却往往从本本出发，主观武断，不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种以主观主义出现的、存在于党内活动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以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那种以较系统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有着显然不同的特点。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主要集中于批判、纠正和克服党内主观主义路线。在实际斗争中，他相继总结出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思想原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把实践纳入认识论，并把认识的能动性运用于反映论，指出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列宁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时，捍卫了认识论的反映论，同时又论述了认识论中的辩证法，提出了认识表现为一个辩证过程的思想，但未作全面展开。毛泽东根据我们党内纠正和反对“左”倾错误的需要，对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以及认识过程及认识总规律等一系列认识原理，均作了详细的科学表述。所有这些，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认识论著作题名为《实践论》，就充分体现了他在认识论中特别重视发扬自觉的能动性的思想。他还创造性地把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观点结合起来，总结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第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提出了它的研究对象及其基本规律。列宁处在动荡的时代，由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并表现得十分尖锐，他曾在一段时间内十分注重辩证法的研究，提出了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这一深刻见解，他把辩证法用于认识论，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重要著作——《哲学笔记》。毛泽东的《矛盾论》，继承和发展了列宁辩证法的思想，特别是对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开拓和引申，使之更为系统，更为深刻。《矛盾论》注重实际分析，揭露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理论上的荒谬，在实践上的失败，提出了一系列辩证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四，以社会基本矛盾为根据的历史唯物论。《矛盾论》批判了否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双方可以互相转化的机械唯物论观点。毛泽东还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我国革命发展的规律，从

而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又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第五，以人民战争为广阔历史背景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领导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体系。这就是：他从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并在经济、政治上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这样的国情出发，看到反革命势力内部不统一，进而提出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其主要形式，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还特别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要经历长期、曲折和复杂的过程，而我们的战斗力必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他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一系列作战原则。

毛泽东的每一篇哲学著作，都带有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特征，这是因为他研究、探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巧妙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毛泽东在哲学问题上的思维艺术。

美的追求

诗人们都在追逐着一种美。有的美可见，有的美可感。大自然创造的美，美在自然；劳动创造的美，美在匠心。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他所追求的美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这是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中提炼主题时，有别于其他诗人的思维艺术。诗是生活的升华，生活基础越深厚，开出的花就越肥实。诗又是时代的脉搏，对时代精神把握得越准，就越能发出时代的强音。我们的时代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毛泽东诗词所反映的现实，就是共产主义理想感召下的革命实践逐步取得胜利的现实。毛泽东诗词中，对共产主义精神追求、扶植、捍卫和张扬的思维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表达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的坚强信念。毛泽东诗词，主要通过革命战争时期的风貌，表明暂时显得弱小，但代表进步方面的新生力量，终将战胜那些表面上似乎强大，但代表落后方面的趋向死亡的势力。这种革命者的高瞻远瞩、所向无敌的气概，透过纸背，充溢着所有的篇章。时间的长河奔腾不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千百年来，多少向后看的诗人发思古之幽情，毛泽东恰恰相反，他站在共产主义的历史高度上，遥想“往事越千年”，无数的今天已成为昨天，无数的明天已成为今天，推移代序，人们以不倦的劳动和斗争把幻想变成现实，终于迎来了崭新的时代。请看：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诗词中反复出现“今”、“今日”、“今朝”等词语，决不只是在点明时间，更重要的是贯穿着立足今天，瞻望明天，抓紧今天，使明天胜过今天的精神。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讲到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的时候，热情澎湃他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这是毛泽东对长征历史意义的总结。从抒情的基调和语言的特色来看，它和“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七律，长征》诗一样，都是长征的颂歌，都是对我国人民所做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业的颂歌，更是对献身于这一事业的一切新人物的颂歌。我们的事业，岂止古往今来的“燕雀”不敢想象与不能理解，就是过往的“鸿鹄”也无不望尘莫及。如此激情，如此手笔，怎能不激励人们，“扫除一切害人虫”，重建一个“太平世界”，使“环球同此凉热”呢？

第二，歌颂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当然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们。是他们去兴革命之风，掀革命之浪，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广大劳动人民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做社会的主人，

做命运的主人。他们不是“无才可去补苍天”的顽石，而是“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栋梁，是“刺破青天锷未残”的高山！在我们祖国“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的历史舞台上，胜利者注定是“今朝”的“风流人物”，是“踏遍青山人未老”的新生力量。归根结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诗词中，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诗人的毛泽东，与中国人民的伟大集体，达到了融合无间的统一。“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诗中的“我”不是“小我”而是“大我”，是包括诗人在内的全体革命者的自称。这个“大我”，是作为真理的代表，以“挥斥方遒”的英雄气概，耸立于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阵前，高出于一切反动派以及各种艰难困苦之上。这使人想起，在那漫漫的长夜，有人怀疑我们的力量，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诘难，毛泽东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的力量所向无敌，革命的力量定会越战越强。

毛泽东诗词的共产主义精神，表现为坚决相信真理，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群众有能力解放自己，改造世界，争得美好的将来。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观察各种现象，从而进行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科学预见

抗日战争初期，国内外议论纷纷，战争的进展会怎样？中国会不会亡？许多问题摆到我们面前。当时，毛泽东指出：第一，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第二，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第三，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是带有超前意识的科学预见，真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它使在社会上颇为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退兵三舍。抗日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应验了毛泽东的预言。同时，抗日战争这台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正剧，使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大开了眼界，由此看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能够而且必须走在实际斗争的前头，看到了伟大的科学预见对历史的进程能够发挥出多么惊人的指导作用。科学预见，是毛泽东思维艺术的精品，它的核心就是科学。没有科学根据、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预见，只能是巫婆的胡言乱语和算命先生的主观臆测。而科学则是脚踏实地不离经验而又超乎经验的理论思维。毛泽东关于科学预见的思维艺术在于：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研究，分析它的历史和现状，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对它将来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判断。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科学预见，就是他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锐利的武器，全面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情况，分析了敌、我、友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及发展趋势之后而得出的判断。毛泽东关于科学预见的思维艺术，是个科学与艺术的有机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第一，重视科学预见的作用。科学预见在推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作用，自古以来是显而易见的。在社会领域，情况要复杂得多，但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没有端倪可察。对革命的指导者来说，正因为情况错综复杂，变化无穷，就更需要及时地提出自己的科学预见，来指导斗争的发展。无数事实证明，没有科学预见，人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徘徊，行动就带有盲目性，象在茫茫大海中航行，没有明确的航向，不清楚目标和航道，难免有一天会触上暗礁。概括他说，科学预见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能明确地指出革命发展的前途、道路，可以减少曲折，避免走大的弯路。——这是一种指引方向、指明航程的作用。二是它能使人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高瞻远瞩，树立起坚强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这是一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常常要把科学预见展示在人们面前。

第二，科学预见是从实践中来的，是建立在实际经验基础之上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科学预见是哪个天才人物头脑里固有的。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如果有人问。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完全弄清楚。”这个意思是说实践出科学，实践出理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预言，是在他参加并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之后，是在他对中国社会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科学预见，从形式上看，它走到了实践的前头；从实质上看，它正是前一段实践的总结和认识。一个科学预见的提出既不能靠书本上的现成结论进行抽象的推断，也不能只靠客观现象材料

的收集和罗列，而只能靠用科学的方法对客观事物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既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又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既分析事物的内部矛盾，又分析这一事物同周围事物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认清事物的现状，熟悉事物的特点，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向。可见，实践经验越丰富，对事物的本质就认识得越深刻，对事物未来发展的判断就越有把握，据此作出的预见就越具有科学性。

第三，科学预见要受到实践条件的制约。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事情的具体演变总是比原来的设想复杂得多、新奇得多。毛泽东说：“一般他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0页）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只能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进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他的认识总要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事物的本质有个暴露过程，人的认识能力也有个发展过程。因此，科学预见总是反映着一定的实践水平，绝不可能脱离这个水平。例如，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只能对未来的发展指出个大体的方向，而达到这个方向目标的具体道路、步骤则还看不清楚；有的只能对事物的发展提出两种可能性、两种前途，哪种可能性大一些，还没有把握；当然，有的则能比较明确地确定前进的目标和制定具体的方针、措施。斯大林在谈到为什么是列宁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时说：“无论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绝不能要求他们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预见五十多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可能性。”（《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2页）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对任何正确的理论和科学预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把它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来束缚自己的手脚。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因此，往往要对原来的理论和科学预见进行修改和补充，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预见是不是真正科学的，要由实践来检验，看实践的结果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只有这一个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在分析了抗日战争将要经历的三个阶段之后，说过这样一段话：“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30页）这一段精辟的论述，用实践的观点讲了科学预见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局限性，这是对科学预见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最好的说明，这也正是毛泽东关于科学预见的思维艺术之所在。

“小小寰球”和“只争朝夕”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且不说《毛泽东选集》，就是在毛泽东诗词中也无处不放射着理论思维的光辉。1963年，毛泽东写过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词，不但精深的内容和高超的艺术光彩照人，就是其中个别的语句所体现的思维艺术也令人惊叹不止。

其中“小小寰球”和“只争朝夕”八个字，就表现出毛泽东特有的时空观和时效观。毛泽东气魄宏大，是从大的全球战略和面向未来的视野来思考时空和时效的。这种时空观和时效观的特点在于其科学性。科学不是感想，不是时髦，不是猜测，科学应该是“学”，是脚踏实地不离经验又超乎经验的理论思维。

对这种科学的时空观和时效观，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开放搞活的进程，我们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了。我们与世隔绝多年，对世界发生的变化了解甚少，对外开放之后，一旦和外界接触，真有“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反映在人们的观念上，对比的参照系有下列变化：一是从只重纵向比较转为注重横向比较。现代化的概念不只是个历史概念，而且是个世界概念。二是由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把视野扩展到全世界，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和思考。封闭是封建主义的表现，其结果是落后，形成封闭的性格、习惯和观念。面对新形势、新事物总感到“不对劲”，很有点象鲁迅《风波》中的九斤老太。我们应当有全方位的触角，视野要在三百六十度的空间“扫描”，眼睛要有双重“焦距”，既要用望远镜观察世界的发展趋向，又要用显微镜观察内情。只有这样，才能胸有成竹地迎接时代的挑战。

在“小小寰球”上，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进，这是信息社会的特征。因此，获取信息、掌握信息和利用信息就显得特别重要。日本人把信息能力比作“鸵鸟的腿”，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前进；把信息意识比作“山鹰的翅膀”，翱翔万里，瞬间即可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可见，毛泽东的时空观和时效观，不但有重要的醒世作用，而且还有强烈的超前意识。

“借鉴”的思维艺术

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土地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它带有显著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完美结合，这个“结合”，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同现实情况结合，二是同历史情况结合。第二个“结合”，体现了毛泽东“借鉴”的思维艺术，即善于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借鉴，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同中国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进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带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传统的借鉴。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反抗压迫，具有顽强的革命反抗力，尤其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为中华民族创立了光荣的革命传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创立毛泽东思想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参加者之众、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世界史上所少见的。在创立毛泽东思想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总结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他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只是因为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得不到如同现在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于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旧式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这个工人少、农民多的国度里，无产阶级的领导，首先和主要的是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土地革命，就是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3、572、652页）。显然，这和传统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它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对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外来侵略传统的借鉴。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团结和统一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统一战线理论形成的重要条件。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人民友好相处，团结统一，互通有无，这是历史的主流。虽然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有些摩擦，但每一次大的冲突之后，必定有一次大的融合。久而久之，在人民的传统心理中产生了一种同类同种同伦同文的感情和维护祖国统一的需求。这种需求，促使人们加强团结、消弭分裂，顽强抵抗外来侵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中华民族的反帝爱国斗争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发展、系统化和完整化，特别是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确立，都是借鉴于这种反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传统。

第三，对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等思想的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墨子的兼爱互利、财产共有，道家的原始共产的理想，唐宋时期的“等贵贱、

均贫富”，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理想等，这些思想，虽然都反映了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要求，但也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基因。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很快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除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外，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思想中的积极基因，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借鉴这种传统文化的基础，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使人们在心理上不但有水到渠成之感，而且愿为之实现而奋斗。

第四，对“民本”等思想的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自省”观点，为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孔子早就提出了“爱人”、“重民”的口号，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西汉政治家贾谊得出了“民者，万享之本也，不可欺”的结论，唐太宗反复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语以自励。当然，作为封建统治者或封建统治的卫道士，他们的这些观点都有其特定的阶级内容，但毛泽东却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改造，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著名论断，从而形成了共产党人所特有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此外，“自省”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我们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正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对这个传统进行扬弃、提炼，并使之发扬光大的。毛泽东在谈到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倡导“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7页）毛泽东用古代经典来启发党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使我们党在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五，对古代某些思想方法的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实事求是”原为我国古代一个成语，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意是指河间献王刘德在作学问时，注意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得出真实的结论来。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改造，赋予了崭新的意义。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9页）这样，就把“实事求是”提高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必须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另外，提倡注重实际和调查研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主张“每事问”、“不耻下问”，荀子否定“生而知之”，韩非反对“前识”而注重“参验”等，都在强调注重实际和调查研究。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以全新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改造和继承。为了回答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经常深入实际，写出许霁具有指导意义的调查报告，在调查理论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反对党内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的重要著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英明论断。此外，中国有许多古训，如“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这些古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赋予革命的内容，有的成为我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的成为我们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有的成为我党某一方面的方针，有的成为我党在工作中的战略战术上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创立毛泽东思想的思维艺术，很值得我们深

思。当前，有些人以为改革、开放就是彻底否定文化传统，其实，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同样有害，不过，后者是民族保守主义，而前者则是民族虚无主义。

“适反有理”的“理”

一提“造反有理”，往往会在人们眼前呈现出一幅幅惨不忍睹的“文革”画面，令人不寒而栗。须知，那是“四人帮”在珍珠上面别有用心地涂了一层污垢而给人们造成的错觉。关键是准造反和造谁的反。当我们掸掉历史的尘垢，珍珠仍然闪闪发光。“造反有理”这句话，体现着毛泽东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审视，对未来的预见，对理论的梳理。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归纳！可见，通过观察和积累得来的是花粉，而正确的抽象思维，才能将花粉酿成蜜汁。毛泽东的思维艺术，就在于博采花粉，酿成蜜汁，进而把蜜汁洒向中华大地，滋润亿万人的心田。

“千头万绪”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批判的，是革命的，只有批判和革命，社会才能进步；只有彻底地破，才能真正地立。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毛泽东在看到一些优秀的传统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历史因袭：数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数千年来形成的封建意识，什么“存天理、灭人欲”，什么“尊经”、“崇经”、“法古”，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等等。在这种文化格局下，书，以“经典”为贵；言论，以“圣人”为准；经验，以先人为佳；行，以先贤为楷模。这种封闭的意识和封闭的社会结构，是人类的不幸，是社会的悲剧。当中华民族将要在这封闭、贫困的古船上沉没的时候，世界革命的狂潮以更加猛烈的巨浪冲向这条古船。于是，古船上有的人在震惊中觉醒了，勇敢地掀起了批判与革命的风帆，毛泽东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1917年，他发起并组织了“新民学会”，其宗旨是“改造中国和世界”。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五四”大潮中，他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了《湘江评论》，他在“创刊宣言”中说：“天不要怕，鬼不要怕，神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矛头所向，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这种批判、革命的精神，唤醒了东方的“睡狮”，推倒了“三座大山”，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这种批判、革命的精神，迎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 是怎样形成的

文艺的方向问题，即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个原则精神今天是否过时了？没有。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强调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党中央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调整了文艺政策，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口号，这跟毛泽东的提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正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这一文艺思想核心的形成，体现了毛泽东这样的思维艺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现状的分析。

一、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自文艺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的一个问题。中外文艺史上，凡是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人民群众保持某种联系。但是在无产阶级以前的文艺家或理论家，由于当时人民大众处于受奴役的地位，由于他们自己思想上的局限性，都不可能从创作上和理论上明确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中国，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这个革命的性质，便决定了作为它的一条重要战线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性质。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倡导，革命文学同封建复古派的斗争，革命文学内部的论争，革命文学社团的成立和发展等等，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全面地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科学地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于是，他从革命性质的高度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真正的人民群众的文艺运动并没有发展起来，称得上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文艺作品，还处在萌芽状态。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艺的方向问题虽然也有所涉及，但在理论上并没有进行深刻阐述，至少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提出文艺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的是列宁（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那是在俄国民主革命达到高潮的1905年11月。十月革命之后，由于革命运动和革命文艺的发展，列宁的上述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他在与蔡特金的一次谈话中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列宁论文学与艺术》）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并根据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具体实践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使之中国化。实际上，“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发展、完善和创造的过程。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他还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

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更明确、更具体地提出了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毛泽东根据四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根据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对“人民大众”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工人、农民、兵士是人民大众的主体，而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革命的同盟者”，因此，就当时的实际来说，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主要是为上述四种人服务，而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随着时代的进展和社会的发展，目前，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发展。

三、对现状的分析。毛泽东在科学地总结“五四”以来的文艺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之后，又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当时的现状：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的关系等，其基本观点都贯穿着文艺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这样一条主线。例如，根据当时文艺队伍的思想状况，提出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工农兵，必须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解决立场问题，从思想感情上和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和占人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打成一片；根据当时革命战争的具体情况，他要求艺术家的作品，“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根据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他提出文艺的普及必须向工农兵普及，文艺的提高必须是从工农兵提高，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等等。毛泽东解决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诚然，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具体问题的内容和形式都会发生变化的，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问题，我们应时刻保持理论上的坚定性。坚定的反面是动摇，而理论工作最严重的教训就是随风转舵。哪边风大就往哪边跑，左边的风大了，就把“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大搞什么“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写中心”；右边的风大了，就大搞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理论上的坚定并不等于思想上的僵化。实际生活在前进，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发展，然而发展是离不开原则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才能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如果离开原则，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哪里还谈得上发展？可见，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前提，恰恰是理论上的坚定性。

错误和“错误学”

翻开毛泽东的著作，不少文章论及到“错误”问题。既论述了错误产生的原因，又论述了错误的不可避免；既论述了错误的性质，又论述了错误的作用；既论述了对待错误的态度，又论述了改正错误的方法。如果把这些有关“错误”问题的论述抽出来，重新排列组合，真可建立一门系统的“错误学”。在毛泽东关于“错误”问题的论述中，有两段颇有代表性：其一，“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二，“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改造我们的学习》）显然，毛泽东对“错误”进行了多维的研究，立体的思考和多方面的分析。而这，正是毛泽东关于“错误”问题的思维艺术。

首先，错误是难免的。从个体讲，错误是与生俱来的，从群体讲，错误是人类的伴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话给很多犯过错误的人以安慰和鼓励。其实，这话本身就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圣人就不犯错误吗？孔子的弟子颜回烧饭时捞落在锅里的沙子，孔子误认为他先师而食。马克思主义两位奠基大师在处理彼此关系上，也犯过错误。马克思第一次见恩格斯时，就主观地认为恩格斯是个纨绔子弟，因而待之无礼。连周恩来总理都说：“如果我写书，我就写我一生中的错误。”由此看来，人人都会有错误。怎么办？第一是正视，第二是改正。只有这样才会前进。如果不正视错误，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

其次，错误具有重要的认识作用。正确的结果，往往是从大量的错误中得出来的，没有大量的错误做台阶，也就很难登上最后正确结果的高座。爱因斯坦对传统的科学史很有意见，因为传统的科学史把科学的发展写得一帆风顺。实际上，在每一个科学真理的发现过程中，总要遇到许多曲折和不幸、总要犯许多错误。例如，现代物理学的一个重要支柱——相对论，就是由马赫的哲学思想孕育出来的。而马赫的思想有唯心主义的因素，曾受到过列宁的批判。尽管马赫的思想是错误的，但在某些方面却有重要的认识作用，爱因斯坦就是在马赫的基础上创立了相对论。人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是科学探险的路标和向导”，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强调了错误的认识作用。

第三，错误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错误是真理的对立面，但对立面往往能启迪人们“反弹琵琶”，掉过头来寻求真理；能提醒人们来个逆向思维，走向正确之路。焦尔曾经相信过永动机的理论，于是他废寝忘食地研制永动机。失败多次之后，他开始从反面来思考机器运动时热与功的转化，进而发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被恩格斯称为十九世纪三大发现之一。可以这样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被永动机激发出来的。

当然，并不是说对错误要持无所谓的态度，更不是说犯错误越多越好。问题是要正视错误，改正错误，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有些事情的对与错，并不象碟子里的水，一眼就能看到底的。须知，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时间是真理的裁判。

关系和“关系学”

毛泽东的著作，几乎没有一篇不谈及“关系”。诸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目标和任务的关系，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工农关系，党群关系，中外关系等等，1956年他又专门论述了有关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十大关系”。毛泽东有关“关系”的论述，观点鲜明、见解深刻、分析全面、方法科学，而且以系统论为框架自成体系，是一种启迪人们正确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专门学问，在此姑且称之为毛泽东的“关系学”。这种“关系学”，重联系，重变化，重发展，重规律，体现了毛泽东把握于整体、剖析于细部、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的思维艺术。

毛泽东“关系学”的理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把客观世界看成是一个密切联系着的统一体，其中各种事物都是与它们周围某些有关的事物密切联系着和相互制约着，彼此之间起着影响和被影响、推动和被推动的作用。

毛泽东“关系学”的实际意义在于能科学地分析和解决革命与建设中实际问题，促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例如，科学、人才和教育，这三者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因果依赖关系，即科学靠人才，人才靠教育。所以，要想早日实现四化，就必须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要想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就必须认真地办教育。可是有的人感到生产是硬件，可以立竿见影，而教育则是软件，是赔钱买卖，出力不讨好。殊不知，不行春风，难得秋雨。播下的是龙种，决不会收获一只耗子。日本人就深悟“关系学”的真谛，战后尽管国家千疮百孔，但不惜血本办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后，科学技术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国民经济上去了。这才叫治病先治本。

毛泽东“关系学”的思想意义在于能让人们克服片面性。片面性是一种历史惰性，它是革命和建设的大敌，更是我们当前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大敌。片面性的产生，既有社会历史根源，又有思想认识根源。毛泽东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0页）这是片面性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毛泽东又说：“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片面性产生的思想认识原因。的确，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长期的封闭型的社会结构，积淀着人们惰性的心理特征，形成了一种单线的思维模式，进而造成一次又一次执拗的盲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坐井观天”、“陷于摸象”，明明是片面得很，却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大树特树”、“一句顶一万句”、“万岁，万万岁”，明明是伪科学和封建主义，却要贴上共产主义的标鉴。这些历史教训是沉痛的，大有反思的必要。反思之后就会感到，毛泽东的“关系学”，不只是医治思想上、认识上“片面病”的良药，更是同形形色色假马克思主义斗争的锐利武器。

社会是复杂的，世界是多变的，而入的思想更是一个万花筒式的独立王国。当今，要想处理和解决好千头万绪的问题，成为握有主动权的强者，就必须掌握毛泽东关于“关系学”的思维艺术。

关于民族化的思考

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民族化的观点，已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自始至终，贯穿着毛泽东“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原则，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化的思维艺术。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第一次对民族形式的内涵作了科学规定：“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就明确地把民族化作为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发展方向问题提了出来，在现代文化史上，这是第一次十分突出地把民族化的重要意义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批判地继承古代的和外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作为从事创作的借鉴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指出：“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由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文学艺术的民族传统、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民族形式等，就构成了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民族化的系统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体现了毛泽东“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思维艺术。这里的关键是“用”，“用”的目的，在于创作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文学艺术作品。

毛泽东关于文艺民族化的理论，其指导思想就是“继承和发展”。只有继承，“用”的基础才牢固；只有发展，“用”的方向才明确。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辉煌的文学艺术，形成了

自己特有的文艺传统。而文艺的民族特点是与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性格、心理、语言等等分不开的，它是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世世代代逐渐积累起来的，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对此，如果不熟悉、或不给予充分地尊重，那么，创作出的文艺作品，老百姓就不会“喜闻乐见”。但是，文艺不能永远停止在《小放牛》和《兄妹开荒》的水平上。尽管民族文艺传统有一定的稳固性。但也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外国先进文化的传入，人们的观念、心理、审美趣味、风俗习惯也会发生变化的。可见，民族文艺传统是稳固性和可变性的辩证统一。正如毛泽东所说：“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同音乐工作者的座谈》）这里所说的“教条主义”，是指无视中国文艺的民族传统的观点；这里所说的“保守主义”，是指死守传统、反对发展的观点。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非常熟悉，有很高的古代文化修养。他一贯重视对民族文艺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的狂草书法艺术驰名中外，他能熟练地运用古典诗词的形式表达革命的思想内容，抒发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情愫。这些作品大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美学价值，可说是“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

的楷模，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关于文艺民族化的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并指导了文艺创作的实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

一、从人民的欣赏习惯看。文艺是反映人民生活的，而人民生活本身就具有民族特点。这一特点，就形成了这个民族特有的欣赏习惯。例如，原先中国人比较喜爱国画和年画，不大喜欢油画。有的农民看完外国的油画之后百思不得其解，说“为什么把一个人的脸画得半边白、半边黑呢？”鲁迅说，外国人这样画有道理，因为他是站在一个固定的点上来看表现的对象，光线有明有暗，色彩有浓有淡，所以脸半边白半边黑；中国农民看画是绕着圈看的，人的脸两边都是一样，没有半边白半边黑。鲁迅的这段话，非常通俗他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欣赏习惯，而这习惯是长期形成的，文艺创作如果不尊重这一习惯，人民是不欢迎的。当然，习惯是个历史范畴，不是不可改变的。例如，在延安整风时，有一次文艺工作者为农民演出，有一位同志唱花腔女高音，用假嗓子，颤音特别多，唱完后，一位观众老太太鼓掌了。有人问老太太：“她唱得好吗？”老太太说：“俺能说人家唱得不好？人家姑娘‘打摆子’还给俺唱歌呢。”于是，一时传为笑谈。现在的农民，不但能听懂花腔女高音，而且还经常唱上几段流行歌曲呢。过去，老百姓看到芭蕾舞的剧照就摇头，现在连老太太都能跳上几节迪斯科了。

二、从表现思想感情的方式看。文艺作品是要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有许多感情是人所共有的，如喜怒哀乐、对生的追求、对死的厌恶、对爱的向往等等。但表现感情，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如外国人表示“没有办法”时，是两手一摊、肩膀一耸；中国人则是轻轻地摇头，微微地苦笑。再如，同样是女跑男追的嘻笑恋爱镜头，如果是外国电影，我们感到顺理成章；如果是中国电影，我们就感到很别扭。为什么？因为表达感情的方式是有民族特点的。当然，作为表达感情的方式也不是不变的：如果让阿Q和吴妈握手，那简直是伤风败俗。而现在，男女见面时紧紧握手，则是很大方、很文明的礼节。

三、从语言特点上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则是民族的。且不说语音和文字中国和外国大不相同，就是从语言风格来看，也是各有其民族特点的。“我把自己扔在一张椅子上”，这是欧化的语言风格，我们感到别扭；“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是中国的语言风格，我们感到亲切。当然，语言也在变。“五四”以前，一个人不能随便说“我”字，只有上级对下级，老子对儿子说话时才说“我”怎样怎样。一般在职人员要说“卑职”怎样怎样，客气一点就说“兄弟”怎样怎样，或者直接说自己的名字。五四运动主张个性解放，强调自我意识，就开始说“我”。“我认为”、“我赞成”、“我反对”等，在“五四”以前简直是“狂言”，可是现在，我们听起来不但感到习惯，而且给人一种力感。北京大学已故校长马寅初先生因以前的习惯没改变，一作报告就说“兄弟今天给大家讲……”学生听了就笑。为什么？因为习惯当改变时必须改变，不改变就要落伍。

四、从艺术形象上看。文艺作品是用形象反映生活和表情达意的，而这形象必须具有民族特征。例如，一提到黄河，我们就想到了我们悠久的历史，我们伟大的民族，因为黄河这一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已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河，而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所以，抗日战争时期的《黄河大合唱》就有

特别的鼓动性和感召力。如果用《黑龙江大合唱》，就不会有如此大的感召力。再如，荷花是我们民族出污泥而不染的象征，梅花是我们民族纯洁高尚的象征。所以，《爱莲说》和《咏梅诗》往往成为洁身自好者的座右铭。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形象在民族心理上也在更新。例如，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人性，把没有人性者视为畜牲，可见畜牲在我们民族心理中是最下贱低劣不过的了。而现在，大熊猫却成了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在我们民族心理上不但接受了，而且把它视为友谊、和平和进步的象征，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审视，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关于文艺民族化的理论，是植根于现实而又指导现实的理论，文艺在“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导下，只有坚持继承和发展的原则，才能创作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

文艺民族化，说到底是一个文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同志说：“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邓小平文选》第 183—184 页）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对毛泽东关于民族化问题思维艺术的最全面、最深刻的概括。

辩证思维的奇葩

——精兵简政

毛泽东于1942年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文章对精兵简政问题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今天，我们对精兵简政，不应当只看作是一般的光荣传统，而应当看作是什么时候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因为它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进而使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目前，在四化建设中，更有其重要的实际意义。党中央关于精简机构的方针一提出，就成为万众瞩目、群情振奋的大事。精兵简政，体现了毛泽东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更是他辩证思维的奇葩。

四十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毛泽东指出，当时“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这是对抗战极为严峻的形势的忧患；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尤以我军的各个根据地表现得特别尖锐”——这是对抗战前线险恶处境的忧患；“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截至今天为止，虽然比过去增加了几倍的困难，但还不是极端的困难。如果现在没有正确的政策，那么极端的困难还在后头”——这是对敌后根据地将要面临险恶处境的忧患；“抗战要有一个团结，在团结中有各种的困难。这个困难是政治上的困难，过去有，今后还可能有”——这是对政治的忧患；“但是还有一个困难，就是物质方面的困难。这个困难，今后必然愈来愈厉害”——这是对经济的忧患。这种民族的忧患意识，正是革命领袖崇高的使命感的具体表现，也是革命领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无产阶级忧乐观的具体表现。

在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之下，毛泽东毅然接受了爱国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实行精兵简政。对此，在革命队伍内部，有不少人想不通。但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坚决把精兵简政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在全党全军贯彻，于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加强了我党我军的战斗力。这表现了毛泽东强烈的变革意识。变革是对旧体制而言的，其阻力来自习惯势力。实际上旧体制已不适应新的形势，不变革本身就是错误，但大家习以为常，没有感觉到错误。而变革中出现一些即使很小的失误，甚至不是失误，因为大家不习惯，反而感到很突出。变革是开拓，是创新，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精兵简政是毛泽东在新形势下的一个创举。

精兵简政这一政策的确立和实行，始终贯穿着毛泽东深沉的辩证思维艺术。这里有几对矛盾：一是大局和局部的矛盾。有些人认为“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时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毛泽东认为，这是局部的事情，再勉强、再困难，也要服从抗日大局的需要。二是战争情况和战争机构的矛盾。敌人实行“三光”政策，我们的物质困难越来越严重，我们的机构庞大，鱼大水小，因此必须实行精兵简政，使战争的机构适应战争的情况。三是习惯和变化的矛盾。“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怎么办？改变习惯，服从变化了的形势。四是大和小的矛盾。精兵简政之后，我们小了，敌人仍然庞大，怎么办？那就要发挥我们的优势，讲究斗争策略，以小胜大。“铁扇公主虽然

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对这四对矛盾的分析 and 解决，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辩证的思维艺术。

继承与创新

诗的风格和形式犹如万紫千红的花，有的艳丽，有的质朴，有的浓郁，有的淡雅。毛泽东诗词的风格却如泰山之巅的青松，伟岸、挺拔、冷峻、豪放，这也正是我们民族的风格。毛泽东这一诗词风格的构筑和形成，凝聚着他继承与创新的思维艺术。继承，是对优秀民族艺术形式的继承；创新，是在优秀民族艺术形式之上又开辟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

抒情和鼓动的完美结合，是毛泽东构筑自己诗词风格的第一个特点。过去有人曾经把诗歌创作中的抒情和鼓动看作对立而不相成的两种成分，认为抒情是个人独白，即“说要说的话”；鼓动则是面对他人，即“说应说的话”。结果，抒情成为一种单纯的自我表现；鼓动，则成为一种言不由衷的口号。而毛泽东在抒情时，是抒个人之情，又是抒集体之情；既自励，又励人，“要说的话”与“应说的话”、感情与理智、个人意志与人民的利益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这就使毛泽东诗词在实际的生活和斗争中，发挥了特有的感召作用。“东方欲晓”，分明是征人早发，却说“莫道君行早”，这是以奋勇前进的精神自励和励人。甚至作为背景的江山也仿佛受到感召，而跃然纸上。“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这与其说是对山的描写，不如说是对人的赞颂和鼓舞。“山舞银蛇，原驰腊象”，与其说是把静景写成动景的修辞，不如说是真实的赋形写物，“山”不起舞，“原”不奔驰，哪能构成“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壮丽奇观？没有这壮丽奇观，那种顶天立地、力转乾坤的斗争气概又怎么能表现得这样强烈？在《七律·长征》中，一连五句，每句都有一个长征路上有代表性的地名（五岭、乌蒙、金沙江、大渡河、岷山），从而赋予全诗一种跃动、奔流的意象和抑扬顿挫的节奏，当然，这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生活所固有的节奏。再看：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清平乐·会昌》）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清平乐·六盘山》）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具体的进军目标，鼓动战士们向地理的也是政治和军事的目标挺进，因为只有认准目标，才能大踏步前进。毛泽东在鼓励人们战略上藐视敌人、藐视困难的同时，决不忘记指出胜利的取得并非易如翻掌。正因为有了“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这样坚强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有了“黄洋界上炮声隆”这样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才会有“我自岿然不动”的指挥若定，才会有“报道敌军宵遁”的胜利结局。有政治热情，又有深厚的思想，这是毛泽东抒情和鼓动的内核。

不离传统而又超越传统，这是毛泽东构筑自己诗词风格的第二个特点。不离，是指吸取了我们民族的优秀艺术精华；超越，是指在艺术上又有所突破，有所改造，有所创新。毛泽东非常了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状况，他多次指出，我们的民族地广人众、历史悠久，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历代劳动人民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酷爱自由，勇于举起革命的旗帜。这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流，也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主要之点。这种民族精神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了我们的民族文化。无论是文学还是艺

术，无论是语言还是风习，都有着中华民族独特的风貌。当然，这些东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人民受到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固有的作风和气派必然要寻找新的思想基础，这意味着新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将破土而出。毛泽东诗词敏锐地反映了人民群众中当时还处在孕育状态的这种新作风和新气派。毛泽东诗词中的景物描写，不论是“万山红遍，漫江碧透”的南江，还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不论是“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的井冈山，还是“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的大柏地；不论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娄山关，还是“红旗漫卷西风”的六盘山，这一切，不仅再现了祖国山河的特有风情，而且焕发出一种斗争向上的时代气息。“大江”和“龟蛇”在他的诗词中一再出现，并不是为了引人神往于飞去的黄鹤和行云的神女，而是为了揭示“心潮逐浪高”的英雄风貌和“天堑变通途”、“高峡出平湖”的建设画卷。此外，毛泽东还善于利用传统的思想材料，经过改造之后，使这些传统的思想材料具有一种全新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是对民谣“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的改造；“不到长城非好汉”，是对成语“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改造；“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则是对民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改造。改造，是为了创新。毛泽东一扫原作中消极、悲观的咏叹调，代之以积极、乐观的交响曲，真可谓妙手偶得，笔下生辉。再如，毛泽东借用吴刚、嫦娥的古老传说，表达对烈士的追念和崇颂之情，援引、点化孔夫子等人的语录或诗句，为我所用，表达革命的情怀等，都是不离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典范。这一切，都展示了毛泽东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

毛泽东继承和创新的思维艺术，使他的诗词独具一格，自成一派。当然，不了解原有的东西就谈不上继承，没有崭新的思想也谈不到创新。毛泽东谙熟中国古典诗词和民歌的写作技巧，又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峰之上，所以就能得心应手地构筑出自己诗词的独特风格，使自己的诗词具有中华民族的新作风、新气派。

“比较”的思维艺术

有比较，才有鉴别。毛泽东善于用比较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是他比较的思维艺术。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如果中国也象苏联那样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去”，中国虽是个大国，但经济实力不强，只能用游击战的形式——这是国情比较。这一国情比较，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并根据这一特点，确定了战略和战术。二十年代的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阶级关系非常复杂，于是，毛泽东就写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阶级比较。通过阶级比较，就准确地分清了敌友我，进而很好地解决了“革命的首要问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逐次回顾了五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分析了五次反“围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是历史比较。通过历史比较，找到了革命战争的规律，进而取得了革命战争的主动权。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里，毛泽东深入地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战争进程中政治、经济、军事、人心、外交等方面的异同、优劣、变化和发展趋势——这是过程比较。通过这一比较，提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著名预言，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各种理论都跑了出来，什么基马尔主义，什么唯生产主义，什么按劳分配主义，什么三民主义等等。毛泽东逐一以共产主义同其他什么主义进行了比较，结果使这些什么主义相形见绌——这是理论比较。通过理论比较，击退了敌人的舆论进攻，澄清了人们的一些模糊认识，得出了一个不容辩驳的真理：“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毛泽东比较思维的过程是：首先掌握第一手材料；第二是对这些材料分析综合，即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处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比较，因为粗与精、伪与真、彼与此、表与里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第三是在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判断；第四是在判断的前提下作出计划，进行决策。

毛泽东比较思维艺术的特点是：一、在比较时既注意事物的整体性，又注意事物的系统性。即除了在总体上把握事物的特点外，还研究事物的多个层次，多个侧面。二、在比较时注意同历史科学的结合。即不能就事论事，而要以历史材料作为参照系，立足现在，预测未来。三、在比较时注意质和量的关系。即既要注意量的多少、质的新旧，又要注意量对质的影响、质在量的影响下的变化。四、在比较时注意事物之间的可比性。即相比较的事应是同类或近类，否则，比较就失去了意义。

十九世纪以来，比较法对科学发展的重大影响越来越明显了，这在自然科学中是一目了然的；社会科学也不例外，比较文学、比较史学、比较哲学等方兴未艾。因此，认真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比较的思维艺术，不仅有助于我们思维的科学化程度的提高，也将会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

对“源泉”的思考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这段话强调了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是文艺创作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在这以前，不少文艺理论家对这个问题曾作过一些论述，但只有毛泽东对此论述得最通俗、最中肯、最精辟、最深刻，因为他总结了以往文学艺术在这方面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进而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整体把握。其思维艺术在于：他将《实践论》的观点贯彻到文艺创作的领域之中，强调了三个基本观点，推出了两个重要结论。

所强调的三个基本观点是：一、强调社会生活对文艺创作的最终决定作用。二、在强调社会生活对文艺创作的最终决定作用时，绝不是被动的客观决定论，他并不忽视作家、艺术家的主观能动作用，文艺的革命或反动、进步或落后的倾向性，主要是由作家、艺术家的立场和世界观决定的。三、强调社会生活对文艺的“源泉”地位，并不将它绝对化，而是对它作辩证的分析。一方面提出生活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指出生活只是文艺的“原料的矿藏”，是“自然形态”的“粗糙的东西”。这样，毛泽东就深刻阐明了生活与文艺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从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命题出发，合乎规律地得出下面这样两个结论：

第一，文学家和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投身到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中去。他满怀深情地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曾号召“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列宁全集》）第28卷，第83页）。他劝高尔基离开彼得堡，到实际生活中走走。1919年6月，克鲁普斯卡娅在“红星号”宣传舰上工作，列宁专门写信给她，让她设法在舰上为高尔基找一个舱位，好让高尔基能较好地接触实际生活。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也是很深刻的，而且贯穿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能动的实践的哲学思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大批文学家艺术家按照毛泽东的上述要求投身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洪流中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从而使文艺创作的面貌为之一新。

第二，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创作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具有典型性的作品。我们常常提到的“高度的艺术真实”，就是既来源于生活真实，又不局限于原始状态的生活真实，就是将“自然形态”的生活现象集中概括，“把其中

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经过艺术认识由感性到理性的深化和飞跃，达到通常我们所说的艺术典型的真实。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就对文艺创作的原理、艺术真实的本质，给予了极其深刻的哲学解说。这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毛泽东关于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的学说，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坚持这个思想，文艺就繁荣、发展；离开这个思想，不但在理论上会偏向唯心主义，而且创作也必然受挫，步入歧途。

关于“结合”（一）

毛泽东的一生，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生。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他关于“结合”的思维艺术之果。

毛泽东亲身参加并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在这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于中国革命的实践，自如地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功地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摸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维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以特有的民族色彩，明确、深刻地为中国人民阐述了什么叫“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指出，“结合”的原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把它“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0页）也就是说，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78页）。这种对理论的再创造，并成功地指导中国实际的过程，就叫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曾形象他说，这就叫“有的放矢”，即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

第二，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指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他一再强调，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作教条，而应当把它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科学来学习，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第三，他阐明了坚持这项根本原则的重要性。他指出，这个根本原则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78页）。这就把坚持不坚持“结合”的原则，坚持得好与不好，提高到了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高度来认识。

第四，他阐明了坚持和运用这一根本原则的主要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方法。他指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统一，“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也不能把握事物的规律。再一个方法，就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即“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没有这种调查研究工作，“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4、292、760、749页）。显然，毛泽东在谈“结合”的方法时，已把它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强调了。

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只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革命建设就会胜利，马克思主义就会发展，否则，革命和建设就要受到挫折，马克思主义就会被曲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一国两制”的构想，

这在四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这使得毛泽东“结合”的思维艺术，在新的历史阶段大放异彩。

关于“结合”（二）

毛泽东为什么反复强调并且努力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因为这个原则反映了人类认识真理、运用真理去改造世界的规律。其中体现了毛泽东在理论方面的深层思考，其思维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来思考必须坚持“结合”。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是第一性的，人们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能动的反映。主观认识只有符合客观实际，才能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获得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因此，离开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离开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便无法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无法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无法找到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也找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独特道路和方法。这样，即使有马克思主义这根“矢”，也射不到中国问题这个“的”上。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革命中多次出现曲折，就是因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上出现了偏差所致。因此，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时，就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可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本质上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是尊重不尊重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

其次，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来思考必须坚持“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统一，也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理论与实践为什么要结合、为什么要统一，以及它们是怎样结合和统一的。他特别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重要观点。所谓“具体的”，即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所谓“历史”的，即这种统一是发展的、前进的统一，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因为，真理不但是客观的、绝对的，而且是具体的、相对的。因此，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能在一定的具体的有限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概括，虽然对我们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然而，要使这一普遍真理在我国实现，即对发展着的实践产生具体的指导作用，还必须把它同今天的实践相结合，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达到新的统一。也就是说，要做一番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特色的再创造工作。为此，就必须掌握中国的特点，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第三，从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上来思考必须坚持“结合”。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个性即矛盾的特殊性，是事物所以千差万别的内在依据，是我们认识事物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和基础。从认识顺序上说，人们固然可以根据对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或依据某些普遍原理去分析研究某一具体事物，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因为虽然“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个别就是一般”，认识了一般，就为认识个别指明了方向——但必须看到“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把握了一般，“也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同上，第309页），人们只有再进一步去“识个别，才能抓住事物的特点，把握事物的本质；认识该特定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也才能找到解决矛盾、推动事物发展的科学方法。应用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正是基

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矛盾问题的精髓，毛泽东才一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主义，是从来不会成功的。

毛泽东倡导的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是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得出的必然结论，是毛泽东思维艺术的结晶。它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方面于一身，没有这三个方面贯穿其中，就根本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移情”的思维艺术

在毛泽东诗词中有这样一些佳句：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念奴娇·昆仑》)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沁园春·雪》)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七律二首·送瘟神》)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卜算子·咏梅》)

莽莽昆仑，不但会“飞”、能“搅”，而且还把“人间春色”“阅尽”；大山能起舞，高原能奔驰，还想同老无比个高低；红雨竟然有“心”，青山竟然有“意”；梅花“不争春”却“报春”，而且能在“丛中笑”……这些原本无知的自然之物，在人们眼里竟象人一样地有思维、有感觉、有情感、有性格，都使人非常动情。它们的生命从哪里来？来自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中“移情”的思维艺术。

“移情”，就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感、意志、思想赋予外物，结果好象外物也真正具有这种情感、意志、思想似的。也就是“我”进入了审美对象之中，使物带有“我”的思想感情和人品性格，亦即“我”化为物。这里所说的“进入”和“化”，当然都是一种想象，是一种“恍若”的心理状态，犹如庄周梦里化蝶，只是“我觉得”、“我以为”而已，并非真的就成了蝶了。“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外物实际上并没有变，变的是那与“我”的情趣、意念交融的物的表象。木石寓有生命，花鸟亦具人情，正是这种移情作用的结果。在心理学上，有人曾提出过“感情的幻象”，就是说，这是由一种感情的兴奋状态所引起的幻象，这种兴奋，使我们暂时多少有些失去理性，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现实生活的某种刺激，而引起人们的强烈感受和情绪激奋，以致在刹那间恍惚，产生某种幻象，这是常有的心理现象。文学创作上的“移情”和心理学上的“感情幻象”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总有相通之处。毛泽东诗词中的“红雨随心”、“青山着意”、梅花报春等，实际上是把人的特点加在物上了，使这些物变成了对象化的诗人自我。这些“幻象”因其来自深切的生活感受，表现了作者的真情实感，所以能唤起读者的同感和共鸣。也正因为这些“幻象”是基于一种真切的感受，所以尽管“物皆著我之色彩”而有所变形，但物的美学特性并没有因此而被歪曲、抹杀，反而更加鲜明、突出。《沁园春·雪》中对北国雪景的描写：“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把一幅静景写动了，把一幅死景写活了。你看，远处大大小小的群山，象银蛇在起舞，北国高原又象白蜡色的象群在奔驰，它们好似要与被风雪压低了的天空比个高低一样。北国的雪景是何等的奇伟和壮丽！这是诗人通过主观情绪的“真”，反映了客观对象的“真”。由于

这些“幻象”是主客观“真”的统一，在不无虚妄的形式中包含着合情合理的内核，这就把它同那种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幻象区别开来。人们之所以明知其为虚妄，而仍乐于接受和赞美它，原因就在这里。

物自是物，我就是我，为什么我之情能移注于物之上呢？原来，情都是由物而生、为物而发的。感情总是属于并指向一定对象的，这就决定了凡情总是可移的。又由于物通过感觉而成为“我”的表象时，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渗透性，这就决定了它可以充当感情倾注的受体。要移情于物，想象和联想则是桥梁。以我测人，以人测物，抓住二者联恰点（即可相比拟的地方），即可生发开去。例如，1935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曾经登上限山远望，一眼就看到了那莽莽苍苍、巍峨高大的昆仑山，由有形的昆仑山，想到了无形的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于是用昆仑来象征旧中国，进而想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更想到了旧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此刻，毛泽东的创作冲动油然而生，大笔一挥，写下了《念奴娇·昆仑》这首词。昆仑和旧中国的联恰点在于：昆仑山高大，中国地大；昆仑山形成于不知多少万年以前，中国历史悠久；昆仑山常给人民带来天灾，旧中国常给人民带来人祸。诗人的感情很自然地倾注于昆仑这个对象上，使这个自然之物，成为社会之灵。有“阅尽人间春色”的经历，有“搅得周天寒彻”的罪恶，诗人面对罪恶的旧社会，当然要下定决心加以改造，“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这就达到了借物咏怀的目的。很明显，移情于物，情是主导，因此，移情所造成的“幻象”，总是因人而异的，同一梅花，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写其坚贞；王冕的“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香满乾坤”，赞其高标；毛泽东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歌其不为名利、勇于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各人心目中的梅花，都是各自的情趣和品格的象征。情志不同，所造之象各异，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此话不假。

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中移情的思维艺术，对文艺创作有着很重要的启示作用，它给我们的启示是：移情贯串在一切审美活动的过程之中，不理解移情，就无从谈美的欣赏；不会运用移情，也很难谈到美的创造。

将来的诗什么样？

毛泽东对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不但写了不少优秀的诗词，而且还有一些精辟的诗论。他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说：“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是对将来诗歌发展的预见，这一预见的推出，包含着这样一种思维艺术：对中国诗歌源流的追溯，对当今诗歌创作的审视，对自己诗词创作经验的总结，对诗歌与生活关系的分析，对民族风格继承与发展的思考，而这一切，都集中在对民歌这种艺术形式的重视与强调上。

民歌来自民间，植根于肥沃的泥土之中，不矫揉造作，不装腔作势，不投人所好，不借华丽的外衣。它就象开在田野上、深山中那些不知名、不显眼的野花，各有自己的风姿，自己的芳香，自己的美。它美在自然，美在朴实，美在清新，美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无穷生命力。它本身就是生活，但又是生活的升华。它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大白话”，但又是人民群众的心声，人民的心声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从《诗经》中的“风”，到南北朝民歌，从“五四”运动的传单诗，到“四五”运动的《天安门诗抄》，都回荡着人民群众对时代的呼号和呐喊，都放射着人民抗争时血汗的闪光。在整个诗歌的长河中，民歌应是气势磅礴的主流。世间只要有人民存在，就一定会有民歌，而且将永远是诗歌长河中的主流。

只要是真正的民歌，则都是真话。人民不喜欢听假话，哪怕是那些乔装打扮、冠冕堂皇的假话，人民群众只当耳旁风。人民群众最看不起那种谁“得势”就捧谁、谁“失势”就骂谁、按“天气预报”而写的“诗”，最看不起那种投机取巧的市侩“诗人”。民歌的灵魂是真实。有人说，好诗总离不开“啊”，其实民歌更离不开“啊”，因为“啊”最真实。的确，语言产生于思索、掂量之后，而“啊”则不同，它产生于情不自禁。在这个意义上看，“啊”对感情的表达，比任何语言都更忠实、更纯真。民歌与“啊”密切相连，不妨夸张一点说，真正的民歌和那些无病呻吟的“正统诗”，有时正区别在“啊”上。任何诗句，只要它是真正的诗，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叹出来的，“言之不足而长言也”，此之谓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凡是民歌，总有“啊”。有的表面上没有，但在诗句中深深地蕴藏着。古人讲，读诗要“咏”、“吟”，要拉长声儿，就是要读出字面上没有而深藏其中的那个“啊”字的意思。诗离不开“啊”，但并不是说“啊”就是诗。如果单凭一个“啊”就认定是诗，那么树上的乌鸦个个都是伟大的诗人。某些装腔作势，“啊！啊！”不断的“正统诗”，正如“由于阵痛而咆哮的大山，却只分娩出一只耗子”。真实，是民歌的灵魂；真实，又是艺术的生命。因此，民歌将具有无穷的生命力。

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说：“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上的绝作了。”而民歌决不是这样的绝作，恰恰相反，它是人民群众都看得懂、听得懂的大众文学。出自人民之口，又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它不象旧诗词那样，格律太严，有平仄、对仗、押韵等规则，既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也不象自由诗，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自由散漫。它的特点是：精练、大体整齐、押韵。它一般是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生活斗争时的即兴之作，一旦“灵感”降临、触景生情，周围的一切都可入诗。星星、月亮、山川、大海等，可信手拈来入诗，以倾吐

自己的爱与恨、甜与苦、忧伤与追求、烦闷与向往等真儒实感。这些感情随着或低沉或高亢、或舒缓或激越的调子形成了激动人心的节奏，而这节奏和生活本身的节奏是完全合拍的，它体现着艺术上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传统的形式美植根于我国世代人的心目中、血液中、灵魂中，是否定不了的，它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显然，毛泽东所说的民歌中的“养料和形式”，一是指题材的社会性，即民歌是反映人民生活的最直接的文学作品，从民歌可以看到历史，民歌也是时代的镜子；二是指主题的人民性，即思想内容“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三是指表现方法的艺术性，即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同时也结合有浪漫主义的成分；四是指形式的民族性，即语言、格调的民族色彩和中国气派。民歌在实质上而不是在现象上代表了中国诗歌的主流。未来的诗歌，将是一种带有中国民歌养料和形式的、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新诗体。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刻舟求剑”的作法已为世人所嘲笑，然而现实生活中类似“刻舟求剑”的事并非个别。例如，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战争时，有些人仍然主张用老法子同敌人作战。有的提出“去正面打硬仗”，有的提出“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有的认为正规军不打运动战和阵地战是一种战略上的倒退。而毛泽东与上述观点相反，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就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中强调指出：抗日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后来，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作了结论：毛泽东游击战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其他思想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来自科学正确的思维，毛泽东的思维艺术是什么？是敏锐地感知新情况，认真地分析新情况，出奇制胜地解决新问题。

抗日战争一爆发，毛泽东就敏锐地感到了新的战争情况：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新的，即过去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军队；战场是旧的，即地域广阔的华北大地。日本是个小而强的国家，我们是个大而弱的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是非正义的，我们抗日是正义的；日本远离国土，在异国作战，我们在自己熟悉的故土上作战，更何况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久经锻炼的党，红军是一支久经锻炼的军队。这些情况和条件决定着这场战争的特点：战争的长期性，战争的广大性，战争的残酷性。这就是抗日战争所面临的新情况。从实际出发，从特定的条件出发，这是毛泽东认识和解决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出发点。抗日战争游击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就是这样确立的。后来，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归纳为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即“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为了贯彻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就从它的各个侧面、各个层次上展开来进行综合分析，逐个解决。首先，他分析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中的主要矛盾及其表现特点，着力解决游击战争战略的中心问题。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其次，他分析了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这两种战争形式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解决了游击战和正规战相互配合的问题。第三，他分析了战争赖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强调了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四，他分析了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强调了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要保持动态上的一致，从而根据不同的战争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第五，他根据量变质变的规律，分析了游击队要变成正规部队、游击战要向运动战转化，最后要以运动战解决问题。从而鼓舞了我军的士气，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军事和组织上的准备。第六，他分析了战争指导中的集中和分散的关系，提出了战略集中指挥与战役、战斗分散指挥相结合的指挥原则，从而使我军在战斗中，既有统一行动，又有灵活机动。毛泽东分析了各种矛盾关系，这样，就把握了战争的规律，抓住了战争的主动权。

根据战争的新情况以及对新情况的分析，毛泽东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一是战争的基本原则问题。他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是战争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反映着战争的根本目的和本质。它是整个军事行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又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毛泽东反复说明，一切军事行

动的指导原则，都要根据这个基本原则。二是运用基本原则于具体问题时，要具体分析它的条件。因为一般的原则在具体事物中的表现是不同的。因此，毛泽东运用战争的基本原则于游击战争时，就根据游击战的特点，提出不但要“保存自己”，还要“发展自己”的内容。这样，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就具体化为“保存或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原则。毛泽东又把这一原则具体化为六项方针：“（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样，毛泽东就从一般到个别，从宏观到微观，解决了战争中的新问题。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虽然是军事著作，但它所体现的毛泽东的思维艺术，为我们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树立了榜样。在新形势下，对于我们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于阿 Q

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问世以后，阿 Q 这一形象立刻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议论的浪潮此起彼伏，一直延续了三十余年。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纷纷扬扬，莫衷一是。自 1956 年，毛泽东对阿 Q 这一人物形象作了扼要而精辟的评述之后，大家才停止了争论。当然，毛泽东无意对《阿 Q 正传》和阿 Q 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全面的论述和评价，只是在《论十大关系》这篇报告中，以旁引和举例的方式顺便提到。他说：“《阿 Q 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 Q 革命。其实，阿 Q 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象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83—284 页）读了毛泽东这段论述之后，社会上、评论界关于阿 Q 这一人物形象的争论戛然而止，马上统一了认识。大家是慑于领袖的权威吗？不是。是迫于行政命令吗？更不是。是这段凝聚着毛泽东特有的思维艺术的妙语，使大家顿开茅塞，心悦诚服。这特有的思维艺术在于：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把人物形象放在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上，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剥离人物性格中的历史沉淀，捕捉人物心灵上的闪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顺便提到的关于阿 Q 的话，确是击中要害、画龙点睛的惊人之语，因为它解决了学术上的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解决了“阿 Q 是个怎样的典型”的问题。《阿 Q 正传》问世以后，有人说“阿 Q 是中国人的典型”，有人说“阿 Q 是中华民族的典型”，有人说“阿 Q 是人类的典型”，有人说“阿 Q 只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典型”。以上这些观点虽然不无合理的成分，但都只着眼于阿 Q 性格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意义上的理解，因此是片面的。毛泽东指出，阿 Q 是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的典型，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这段话中的一个“农民”、一个“落后”、一个“不觉悟”、一个“革命”、一个“拿点东西”，就对这一人物形象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评价。这里既有宏观上的把握，又有微观上的审视；既强调了阿 Q 及其性格的阶级属性，又顾及到阿 Q 性格的复杂性；既注意到阿 Q 性格的各个侧面，又指出了他最突出的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没有相当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没有高超的思维艺术，是很难解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难题的。

二是解决了关于阿 Q 的“革命”问题。有人说，阿 Q 的革命是胡闹，不足称道；有人说，“阿 Q 是革命农民的代表”，阿 Q“造反了”的呼叫是“时代的最强音”，阿 Q 最终“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以上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因为都没有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毛泽东说：“其实阿 Q 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拿点东西”，就是阿 Q 革命的目的。小说的第七章“革命”中，有一段关于“阿 Q 革命的幻想曲”，这段写得非常精彩：

……他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烛火象元夜似的闪闪的跳，他的思想也进跳起来了：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

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大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一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很明显，阿Q的革命，完全是一种盲目的举动。一是盲目的个人占有（占有钱财、东西、女人），二是盲目的个人报复（杀小D、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人），可见，阿Q的革命既没有土地要求，也没有政权要求，还不分敌、友、我，更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毛泽东的评价和鲁迅的创作意图是完全一致的，即对阿Q的革命观，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尽管如此，但阿Q和假洋鬼子有本质的不同，阿Q的要求革命和假洋鬼子的投机革命，也有本质的不同。阿Q的革命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反映了被奴役者要求改善生活处境的强烈愿望，毛泽东也深味鲁迅的创作意图，即对阿Q的革命要求是肯定的。所以，毛泽东对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提出了指责。毛泽东对阿Q的革命观是否定的，对阿Q的革命要求是肯定的。这就解决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难题。

尽管毛泽东不是以专题论述阿Q，只是在顺便举例中解决了这两个难题的，但毛泽东的思维艺术对从事文学评论的人来说，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策略”的威力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是1947年毛泽东在指挥延安保卫战时的一句名言，也是毛泽东在战争策略方面思维艺术的结晶。

1947年3月，正当中国革命新高潮到来的前夜，蒋介石调集胡宗南二十三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地扑向延安。我军将士群情激奋，纷纷请战，提出要同敌人决一死战，誓死保卫延安，誓死保卫党中央。然而，我西北野战军只有两万余人，装备又差。就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就指出“存地失人”的硬拼，其结果是“人地皆失”，只有暂时“存人失地”，才能达到将来“人地皆存”的目的。根据毛泽东的战争策略，我军进行了战略转移，暂时主动撤离延安。仅仅在我军撤出延安的第五天，我们就在青化砭一带歼灭了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活捉了旅长李纪云。二十天以后，敌人的第一三五旅又在羊马河被歼灭，代旅长夏宗禹也被活捉。又过了二十天，我军攻占了蟠龙镇，歼灭了敌人最精锐的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也成了俘虏。一个多月，我军三战三捷，取得了歼敌两万多的伟大胜利。经过半年的苦战，终于扭转了西北战场的严重局势，我军从战略撤退转入战略进攻。只用了一年零三十天的时间，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一伟大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策略的威力。而毛泽东这一战争策略的思维艺术，就在于：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回顾历史，毛泽东在各个不同的革命阶段，在各项工作中，都很讲究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族斗争的策略；以农村包围城市，是国内革命战争的策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策略；土改初期，“暂时不动富农”，是阶级斗争的策略；“不要四面出击”，是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反革命的策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不注意策略，就很难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鲁迅作过这样形象的比喻：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屋顶，他们就会调合，愿开窗了。……那时白话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汉字而作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从“五四”时期这位文化巨人的话中可以看到策略的威力。“废掉汉字而作罗马字母”并非真的目的，只是虚晃一枪的策略，提倡白话才是真正的目的。但没有那虚晃一枪的策略，则很难达到“白话得以通行”的目的。

当然，策略决不是耍手段，也不是开玩笑，它是一种“善于斗争”的巧妙的思维艺术。正如鲁迅所说：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毛泽东的批判意识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积习，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涌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十月革命的炮声，五四运动的热浪……虽然当时的中国社会象个万花筒，但是，历史大变革则是时代的主流——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般意义上理解，变革就是批判，但毛泽东的批判意识与众不同，他有着独到的思考，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毛泽东关于批判的思维艺术在于：一是“一切为了人”；二是破、立巧妙地结合。

“五四”前后，人们提出了不少新观念：个性解放、自主意识、抗争意识、反叛意识……其实，中国的大变革，归根结底，要实现列宁那句话：“一切为了人！”离开了人去谈意识，无论怎样解放，无论怎样多元，是忧患的，还是进取的，都未必谈到点子上。不论“意识”的名目怎样，关键在于看看这种意识是否能从意识主体与意识的对象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这个主体就是人，这个对象就是现实。因而变革意识的主导应当体现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的历史流向，毛泽东的批判意识则是基于这种历史流向的批判意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种种错误乃至反动观点的批判，是“为了人”，为了解放农民的革命性。《反对本本主义》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的能力。《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三篇整党文章中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批判，也是“为了人”，为了建立起新的党风、学风和文风。就批判意识而言，如果其中变革的理论很贫困，缺乏理论上的透辟阐述作为依据和指导，那么这种批判意识往往造成一种无的放矢的狂乱。毛泽东的批判意识，既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依据，又有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作为基础，还有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参照系。因此，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席卷全国，形成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新的党风、学风和文风建立起来了，我们的战斗力更强了，正在夺取全国解放的新胜利。可见，没有力度很大，目的明确的批判，就不能克服一切阻力和历史惰性，也就不会有新的超越。

毛泽东批判意识中破与立的巧妙结合，关键在“巧”和“妙”上，即破的对象明确，立的对象更明确。例如，反对主观主义以正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正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正文风。于是，实事求是的学风、团结战斗的党风、朴实明快的文风建立起来了。然而，历史和现实中不乏这样的批判者：拿不出新的东西，却急于打掉旧的，往往作无用的功——旧的东西象孙悟空的脑袋，杀掉一个又复生一个；或者大杀大砍了一阵，新的东西没出生，更糟糕的东西却出场了。所谓不破不立，是说破和立的对象都必须明确，立是目的，破只是个手段，当然，是必要的手段。

毛泽东的批判意识及其思维艺术，今天对我们有特殊的指导意义。目前，社会上有一股反传统的风，以为否定传统就是改革。请注意：在反传统时你的目的是否象列宁所说的“一切为了人”？在反传统时，你是否不加分析地把一些优秀的东西也同时反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在 1956 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次年，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作了充分的论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这一方针，以及有关这一方针的完整的理论，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一方针，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开始孕育，到 1956 年提出，是经历了一个长期反复思考、验证和提炼过程的。它凝聚着毛泽东“发展——针对——遵循”的思维艺术。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针对，是有的放矢，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依据；遵循，就是遵循科学和文艺的客观规律办事。

在毛泽东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就对精神生产部门之一的文艺创作需要充分的自由，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文艺没有自由等问题，作了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共产党宣言》）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艺术家和艺术创作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列宁发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说无产阶级革命给艺术家们“打开了大门，使他们脱离《共产党宣言》中非常精辟地阐明的那种低微的生活条件，进入了宽广的自由天地。”（《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列宁非常重视艺术创作的自由，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关于两个“广阔天地”的名言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从来不把问题抽象化。当他谈到自由时，总是把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严格区别开来，强调无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要比资产阶级的优越得多、广泛得多，因而是真正的自由。他说：“在一个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里，艺术家为市场而生产商品，他需要买主。我们的革命已经把艺术家们从这一最无聊的事态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革命已使苏维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订购者。每一个艺术家和每一个想做艺术家的人，都有权按照他的理想独立自主来自由创作。”并指出，“不准粗暴地对待艺术”（《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毛泽东后来所发挥的以文艺民主和文艺自由为核心的许多观点，大部先后涉及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概括为一条完整的方针。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不但明确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还有论述这一方针的完整的理论。这一重大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针对 1956 年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当时，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社会上虽然仍有各种矛盾，但主要的和大量的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一方针只适应于人民内部，它是一种解决科学文化领域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非问题的方针，不同于解决敌我矛盾所采用的专政的办法和强制的办法。提出这一方针的目的，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遵循、概括、反映了人类科学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文艺，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非常自由的人类精神活动，它

与机械的强制、奴役等等是不相容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说，贯彻这一方针，就要充分发扬无产阶级的文艺民主和文艺自由，就要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鉴赏能力，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作上帝，当作文艺作品最后的也是最权威的评定者。毛泽东在解释这一方针的要求时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段话里，毛泽东三处强调了“自由”、“自由发展”、“自由争论”，可见，社会主义的文艺自由是文艺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方法，而毛泽东是把文艺自由作为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以强调的。

对表彰英雄人物的深层思考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赞扬张思德、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号召一切革命者学习这种革命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他还高度评价刘胡兰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无产阶级的崇高气节，赞颂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又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毛泽东对英雄、模范人物的表彰，其目的不单纯是评价性和鼓励性的，也不只是因为通常所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更重要的是借此确立一种新的道德规范，使之发扬光大，形成以共产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新的道德风貌，即共产主义道德风貌。其思维艺术在于：不是通过道理上的说教，而是通过对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英雄形象的推出，使人们可感、可知、可学、可思，进而达到上述的目的。

首先，毛泽东以真实的英雄人物为例，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的界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史上，是列宁第一个把无产阶级道德和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的。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说，共产主义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就是说，共产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观点，结合张思德和白求恩这些英雄、模范人物的实例，对共产主义道德作了科学的界说。什么是共产主义道德呢？第一，共产主义道德是以共产主义精神为核心、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毛泽东强调“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就是要我们象白求恩那样，“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第二，共产主义道德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并号召我们，以张思德为榜样，使“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就是我们的宗旨。第三，共产主义道德是以革命的生死观为前提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因此，我们应当学习张思德同志，时刻准备为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第四，共产主义道德是以高标准、严要求为行为准则的。从品质上说，要象白求恩那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工作上说，要“极端的负责任”，“对技术精益求精”；从态度上说，要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纪念白求恩》）；从个人修养上说，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从思想方法上说，要全面地看待一切，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为人民服务》）。以上四点，就是毛泽东结合具体英雄、模范人物的实例，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内涵所作的科学界

说。可见共产主义道德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它包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一切行为规范。例如，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革命气节；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的公共道德；忠诚老实、光明磊落、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崇高精神；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正确处理等。总之，凡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行为，都是道德的；反之，凡是不利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由此看来，共产主义道德是共产主义事业按照其发展过程和最终目标要求于人们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武器。

其次，毛泽东以真实的英雄人物为例，强调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应贯穿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始终。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表彰张思德、白求恩和刘胡兰，以此对人们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于是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出现了一大批公正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自己宝贵的生命去殉人类的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又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周总理也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一号召和题词，推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雷锋的精神，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人民的道德水平。多少年来，雷锋精神成为千百万人民特别是青年学习的道德榜样，他的伟大精神，鼓舞和激励着人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于是，全国各行各业，出现了无数先进的英雄、模范人物。在他们的带动下，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要表彰一批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英雄、模范人物。其用意非常清楚，那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要抓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应把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贯穿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始终。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坚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社会风气就正，人民就团结，革命和建设就蒸蒸日上；反之，社会风气就败坏，人心就涣散，革命和生产就受到损失。我们不能忘记，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谁要是提起道德、情操、修养、革命的人道主义，便被扣上“封资修”、“复礼”等大帽子。他们完全颠倒了敌与我、是与非、善与恶、荣与辱的标准，破坏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以至于在一些党员、干部中间滋长了争名夺利、投机钻营、看风使舵、阿谀拍马、拉拉扯扯等恶劣作风；在青少年中间，出现了不少违法乱纪、破坏公共道德、打砸抢等犯罪行为。由此可见，能否坚持经常的、而不是断断续续的，踏踏实实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关系到能否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向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大问题。共产主义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它需要几代人长期斗争才能实现。只有经常地用共产主义道德培养出一代代新人，共产主义才能最终实现。

第三，毛泽东以真实的英雄人物为例，说明怎样培养共产主义道德。毛泽东对英雄人物的表彰，有两个方面：一是自我教育，自我修养；二是全党和社会的关心。毛泽东之所以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就因为雷锋是一位自我教育的典范。我们阅读他的日记，就会发现，他经常认真、勤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时刻以方志敏、王若飞、董存瑞、黄继光为榜

样严格要求自己，因此，他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自觉地在实践中磨练自己，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我们从雷锋的成长中，会得到很多启发和教育。实际上，毛泽东对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等英雄人物的表彰，就体现了党对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极大关心。这就提醒社会各界，党、政、军和工、青、妇，采取适当的措施，选用最好的形式，抓紧、抓好对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人才难得”

“人才难得”，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的确，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一位难得的杰出人才。“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毛泽东对叶剑英的评价，是说叶帅犹如北宋的大臣吕端，每逢革命的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以超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勇敢机智地捍卫了革命的利益。“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这是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以上，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史上几位杰出人物的评价，强调了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但毛泽东还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还说，“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这是毛泽东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所作的崇高评价。以上两方面的评价，相辅相成，形成了毛泽东关于人才问题的基本观点，也体现了他关于人才问题的辩证思维艺术。

首先，毛泽东认为人才在历史上起的重大作用是有前提条件的。其一，人才的重大作用是以承认人才的广泛性为前提的。人才，既包括少数杰出的人物，也包括各行各业中相对说来有较强创造能力的人物。这样的人才是一大批。其二，人才的重大作用是以承认人才来自群众、来自实践为前提的。尽管先天的素质对人才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人们的知识和才能，毕竟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人才是和群众血肉相连，是集群众智慧之大成者。其三，人才的重大作用是以承认社会环境制约人才为前提的。人才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这个社会环境，既包括社会制度、生产力、社会风尚等大环境，也包括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等小环境。人才决不会超越时代和社会的制约而发挥种种神奇的作用。其四，人才的重大作用是以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为条件的。只是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个时期、某一关键时刻，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某个事件中，人才方能起关键作用。以上观点，也正是毛泽东同历史唯心主义天才论的根本区别。

其次，毛泽东认为，事业造就人才，人才开创事业。如果没有特定的历史时代赋予人们一定的历史使命，决不会出现孙中山、鲁迅等杰出的人才，因为他们就是在出色地完成一定的历史使命中获得成功的。他们之所以成功，又因为他们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分析矛盾，把握规律，解决矛盾，进而在事业上有所开创。例如：精神领域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动力具体表现为先进思想战胜腐朽思想、科学战胜迷信、真理战胜谬误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具有先进思想、科学观点和卓越智慧的人才当然能站在运动的前列，起重大的作用。政治领域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动力集中表现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改革的实践活动。每个时代，代表进步势力、掌握真理、立志改革的人才，总是积极投入政治改革的进步潮流中，并能成为中流砥柱。经济领域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动力，这一动力明显表现在为适合生产力状况而进行的经济调节或经济改革的实践中。懂得经济科学、经济管理、经济改革的人才，自然要在这一实践中大显身手，起重大作用。生产力领域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动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表明，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多次飞跃，但是作为生产力主要因素的劳动者的体力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造成飞跃的原因主要是劳动者的智力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这种智力进步起重大作用的因素，一方面表现为劳动者中科技人才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为作为生产力客观因素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的进步，但后者的进步，要依靠懂得创造、革新、推广新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的科技人才。由此可见，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各级动力中能动的因素，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重大作用。事业造就人才，人才开创事业，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第三，基于以上的辩证认识，毛泽东很重视识才、用才和育才。识才，就要有伯乐的眼光，“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自古以来，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事例不胜枚数，而毛遂自荐，脱颖而出，更是不易，于是，伯乐就显得特别重要。历史证明，毛泽东当时对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的评价、对叶帅“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评价，不仅是慧眼独到的发现，而且是非凡的科学预见。用才，贵在知人善任。领导者不可能样样都高于别人，但必须有超群的用人才干。毛泽东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一文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刘邦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可见，知人善任，是用才的关键。任用一个贤才，就会有更多的人才聚集而来；若用了一个佞才，人才就会远离而去。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大批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其原因之一，即在于此。毛泽东一直很关心教育，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不但亲自制定教育方针，而且不只一次地亲自讲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为育才，指出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其育才的用心，可谓良苦。育才不易，护才更难。人才总有不同凡俗之处，一旦冒尖，往往招来种种非议，真可谓“人言可畏”、“高标见嫉”。爱才之心并非人皆有之，而妒才之人却屡见不鲜。在对人才的诽谤面前，有胆识者必须站出来讲话，力排众议，保护人才，让他们在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必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把毛泽东关于人才问题的基本观点概括为：“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天才论’”，但是“是尊重人才的”，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邓小平文选》第47—48页）。这一精辟的概括，不但抓住了毛泽东关于人才问题基本观点的核心，也展示了毛泽东关于人才问题的辩证思维艺术。为了开拓、创造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辉煌业绩，我们应当掌握毛泽东的基本观点，学习毛泽东的辩证思维艺术，重视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大力消除轻视和压抑人才的不良倾向。

时代的碰撞艺术

毛泽东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从教育方针到教育思想，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他都作过精辟的论述。教育事业本来就是一项面向未来的事业。未来是过去的延伸，是现在的继续。毛泽东教育思想就是现在同过去和未来相碰撞的产物，纵观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就会发现，他关于教育问题的思维艺术，就是“时代的碰撞艺术”。这里面包含着对传统教育的反思，对目前教育现状的审视，对未来教育的预测，在这三维坐标线的碰撞处或集结点上确定了坐标点——毛泽东教育思想。而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改革。

首先是教育观念的改革。过去，从封建王朝的“学而优则仕”到国民党政府的“党化教育”，其培养目标，都是剥削阶级的精神贵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精神贵族，只需要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我们又是为未来培养人才，世界的未来，正在向人类挑战。从五十年代中期，各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哪个国家能够最早地把具有新素质的人才培养出来，就意味着它能够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站住脚。未来世界的竞争，实质上就是教育的竞争。于是各国都提出了自己教育的培养目标。西德提出培养“向前看，敢于冒险，有事业心，不安于现状的人才”。加拿大提出“培养有知识、有适应能力和富于创新的一代人”。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教育方针的提出，既立足于现在，又着眼于未来。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各种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决定》中的提法，和毛泽东的提法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其中的“四有”、“两热爱”、“两精神”，对毛泽东提出的培养人才的目标，从德育和智育两个方面作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发展和补充，这是完全符合我国目前改革的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的。毛泽东所提出的教育方针，与他注重为革命和建设培养人才这一总的战略思想密切相关。他非常重视人的因素，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因此，改革旧的教育观念，目的在于扫除一切障碍，培养一代新人。

其次是教育内容的改革。“五经”、“六艺”等教学内容已随着封建社会的消失而成为历史陈迹，立足现在，面向未来，毛泽东对教学内容必然有新的思考。他提出，应当让学生掌握比较广博、比较全面的知识。所谓广博的知识，是指知识的门类而言的。毛泽东认为，自然科学是人类生产斗争知识的结晶，社会科学是人类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实践知识的结晶，而哲学则是这两方面的概括和总结。为此，青少年们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基本知识都应该学习。然而，学校的教学时数毕竟有限，因此，只能教学生学习最基本的东西。他坚决反对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指出，有些知识，如逻辑、语法，在中学可以学一点，但是不要考试，待学生将来在工作中慢慢体会。所谓完全的知识，是就认识的阶段而言的。毛泽东把人们的认识分为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他认为，对青年学生来说，这两个阶段的知识都应该

掌握。这就要求学校在教学中正确处理好一系列关系，实现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的统一，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的统一，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的统一，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学习前人经验和创新的统一。这就要既遵循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又考虑到青少年在教学过程中认识上的一些特点、学校教学活动的优越条件以及薄弱环节，科学地组织与安排教学工作。例如，毛泽东指出，从人类知识的形成来说，一切真知都是从实践的直接经验发源的，但是，每个人不能事事都靠实践来获取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而青少年学生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靠书本。这样，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指导下，以读书为主，以学习间接经验为主，以研究理论为主，通过学习去扩大加深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正是学校教学工作的特点、规律和优越性所在。但是这样做，如果处理不当，又很容易产生书本脱离生活、理论脱离实际，从而产生教条主义的弊端，使年青一代关在学校里十几年，不懂社会，不懂工农。因此，毛泽东十分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号召有实际经验的同志向理论方面发展的同时，还着重指出有理论知识的同志要特别注意向实际方面发展。另外，正是由于要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特殊的认识规律出发，毛泽东主张要将教学内容的结构体系与科学发展过程的顺序适当区别开来。他曾在一次谈话中说：“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解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他指出，学历史要略古详近，主要讲近代的；原子物理，也不必从最早的那个学派讲起，否则就学不完。因此，他建议搞教学工作要学会用辩证法。毛泽东还一再指出，中国是一个情况极为复杂的大国，各地条件不尽相同，因此，教学工作和教材都要注意地方性。除全国编统一教材外，应适当补充一些地方乡土教材。如农业课本由省编；讲点乡上文学；自然科学也要以乡土教材作补充，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教材必须加以调整、修改或补充，反对“一刀切”、“几十年一本书”的刻板僵化的教材模式。很明显，毛泽东关于教学内容的基本观点是：一、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二、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结合；三、强调要突破教材的封闭系统，应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更换或补充教学内容；四、强调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的综合。

第三是教学方法的改革。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过去的注入式、填鸭式教学方法只能为培养“会说话的工具”服务。社会主义社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提高和发展的社会，而世界新技术革命一日千里，日新月异，显然，“会说话的工具”是应付不了的。面对新情况，毛泽东发现教与学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要解决教与学的矛盾，主要途径之一就是改革教学方法。于是，他提出教师讲授要有启发性。他在《教授法》一文中，第一条就明确提出采用启发式，废止注入式。还指出，讲授的内容要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要有连贯性和系统性；语言要准确、鲜明、通俗、有趣味，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要求。他提出，要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开展讨论，要把思索的余地留给学生。他主张在高年级可开一些学术讲座，在高等学校有些课程里，应该介绍各种不同学派的观点，开拓学生的眼界，让学生去独立思考、分析鉴别。他大力提倡自学，在他看来，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学习上要有长进，就“要自学，靠自己学”。实际上，毛泽东本人就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他在自学上经验丰富，见解精辟。他认为，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是自学的强大动力；发挥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是搞好自学的基本立足点；善于求师问友是提高自学效率的重要条件；讲求实效是衡量自学好坏的主要标尺。教

师要重视、提倡并很好地指导学生自学，这是毛泽东关于教学要发挥学生积极性的一项重要要求。改革考试方法，又是改革教学方法的重要一环。考试是一根无形的指挥棒，不同形式和内容的考试，对人才的培养将起着不同的作用。为此，毛泽东反对把学生当作敌人，实行突然袭击，出些怪题、偏题去整学生。他指出：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很不赞成，必须改变。他主张从有利于学生德、智、体几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出发，建立科学的考试制度。他主张，在考试中，应该以能否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成绩好坏的标准。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就提出建议，让党校走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待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他强调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毛泽东反对在学习上“唯书”、“唯上”，在考试中照抄书本，而主张支持和鼓励学生发挥创见。在评分标准上，他说，如果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他鼓励学生，要把分数看透些，以便大胆地、主动地去学习。他教导青年，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与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跟在教师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纵观毛泽东关于教学改革的论述，其主要精神，在于积极主动地培养学生的以下几种能力：一是观察力，这是智能的基础，是智能金字塔的第一级台阶。任何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任何创造都始于观察。二是记忆力，这是智能的物质前提，是智能金字塔的第二级台阶。不储存大量的知识，就很难转化为能力。三是想象力，这是成功的“加速器”，想象力是人的智力结构中的一种动力成分，是智能金字塔的第三级台阶。想象力能涉及更深远、更广阔的领域。四是思维力，这是智能的核心，是认识活动的高级阶段，是智能金字塔的第四级台阶。观察得来的是花粉，而抽象思维才能将花粉酿成蜜汁。五是创造力，这是智能的明珠。创造力是成功的第一要素，是创造发明者不可缺少的智慧品质，是智能金字塔顶端闪闪发光的明珠。

开国第一刀

四十一年前，当摇篮中的共和国被腐败虫蛀，毛泽东盛怒之下，连续发布了三百道“猎虎令”，掀起了新中国第一次反腐败运动——“三反”（即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运动，有人称之为“开国第一刀”。“三反”同我们当前的“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相比，虽然在历史条件、具体做法等方面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两者在本质上和意义上是一致的，都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都是为着纯洁我们党的队伍、坚持共产主义纯洁性的斗争。“三反”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到1952年秋天结束，历时十个多月。当时这一运动的开展，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纵观这一运动的背景和始末，不难看出，毛泽东这位杰出的人民领袖，是怎样驾着共和国的航船，力挽狂澜、破浪前进的；更能领略到他那超凡的科学预见性和执法如山的高度原则性。而科学的预见性与高度原则性的结合，就构成了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的思维艺术。

一、超凡的科学预见性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读完郭沫若的史学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后，思绪万千。他透过郭沫若描述的历史风云，思虑着这一部值得中国共产党人永远警觉的兴亡史：因为胜利而骄傲，因为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所谓“打江山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一个含辛茹苦、流血流汗打下来的政权，因腐败而上崩瓦解了，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于是，毛泽东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发给每个党员，并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9年3月，全国解放在即。胜利了，毛泽东那颗叱咤风云的心变得更加沉重，他在划时代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8页）

这是毛泽东的预见，而这预见是以李自成的兴亡为参照系，以现实为依据，建立在科学分析之上的预见。毛泽东的思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一、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变了。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离开了人民，就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党将成为执政党，党的干部也将成为受人民委托的各级掌权者。在新的考验面前，有些党员干部可能并不珍重人民群众给予的荣誉和权利，继续保持共产党员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自恃有功，脱离群众，贪图名利，个人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以致堕落成不顾党纪国法、不管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者或贪污犯。

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变了。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入城市，并由城市领导农村。这对于加强无产阶级对整个国家的领导，

对于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意义十分重大。然而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盘踞的地方，也是民族资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地方，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很深。面对新的环境，有些党员干部可能并不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习和掌握领导和管理城市的工作艺术，反而经受不住花花世界、金钱美色的引诱而蜕化变质。

三、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对象变了。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工作对象除了原有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外，将多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将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的政策，将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以便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十分必要的。面对新的工作对象，可能有些党员干部不是坚持原则，对资本家进行团结改造，而是放松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贪图个人享受，吃私受贿，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

进城以后的情况，确实被毛泽东言中了。这不是神机妙算，而是辩证的分析、科学的预见。

二、执法如山的高度原则性

新中国成立后两年的事实告诉我们：有些共产党员，能经受起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的锻炼和考验，然而却经不起和平环境中的革命实践的锻炼和考验。象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刘青山、张子善是在三十年代初革命处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加入共产党的。他们在长期的艰苦的战争环境里，都曾奋不顾身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斗争过。一个因参加农民暴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后，遭到严刑拷打，丝毫没有屈服；另一个在被捕入狱后，还参加过绝食斗争和卧轨斗争。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确实不愧英雄的称号。可是在全国胜利后的和平环境里却堕落成人民的罪人而被处决。他们贪污、挥霍国家财产竟达三万多元。类似的案件，在全国各地并非少见。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开展，也不得不开展了。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及时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接着，党中央在12月间先后发出关于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和指示。12月8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电告各省、军区：“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元旦过后不几天，毛泽东再次发出同样的指示，这一次使用的字眼是“杀”：“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为了使“三反”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并取得更大的成果，1952年2月间，党中央发出了“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的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标准的教育，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要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1952年10月，“三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运动的胜利，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纯洁了党的肌体，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气，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毛泽东这“开国第一刀”，顺应民意，深得人心。从“三反”运动的全过程来看，虽说毛泽东

成竹在胸、指挥若定、从容不迫，使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他的心情并不平静，有时他恨铁不成钢，有时要“挥泪斩马谕”。但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必须来这“开国第一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事业的危害是很大的。它损害了党的威信，破坏了党群关系，“三反”是关系到我们党、我们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毛泽东执法如山的高度原则性，流芳后世。“开国第一刀”，也凝聚着毛泽东的深层思考：

第一，想通过“三反”运动告诉我们，在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共产党员不能停留下来，追求个人享受。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11—41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青山、张子善等一类人的蜕化变质，就是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新的发展阶段停留下来不再前进的事例。刘青山说：“老子们拼命打下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这话表明他完全忘记了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充分暴露了他以及和他类似的人，革命性已经完结。因此，应当经常（特别是在革命事业新的发展阶段上）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永远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

第二，想通过“三反”运动表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并不改变我们党所采取的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建国初期，我们党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完全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三反”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纯洁党的自身，并不是在那时就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只要资本家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在国家规定的限度内，还是允许他获得合法利润的。

第三，想通过“三反”运动证明，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建国初期，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迫切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并进而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三反”，制止了贪污、浪费现象和欺诈、盗骗活动的发展，保护了国家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限制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欲念，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力地保证了党的中心工作的开展和实施。

第四，想通过“三反”运动告诉我们，共产党决不允许自己的党员和干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共产党员必须严守党纪国法，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在“三反”运动中，党对违法犯罪的党员和干部的处理，比对不法资本家的处理要严厉得多。列宁早就说过，对于违法犯罪的共产党员，应当“比非党人员三倍严厉地惩办”。党并没有因为刘青山、张子善过去有过功劳，就宽恕了他们。不这样做，就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不能履行对人民的神圣职责，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经过对蜕化变质分子的淘汰，我们的党就会更纯洁，更健康，更会得到人民的信赖和拥护。

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执法如山的高度原则性，以及他对此的深层思考，具有重要的醒世作用，特别是对当前我们党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更有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科学的预见性和高度原则性的结合，构成了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的思维艺术。透过这一思维艺术，使我们体会到：一方面，“和平演变”的危险，我们不能不看到，不能不防范；另一方面，战胜“和平演变”的条件和

力量，我们也应给予充分的估计。应当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感召力与效果

无产阶级文学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因为它具有鲜明的社会效果，而毛泽东对文学的社会效果是非常重视的。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如何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社会效果？有人强调政治内容，有人强调艺术形式，毛泽东则强调“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文学作品，只要实现了这“三个统一”，就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社会效果。毛泽东“三个统一”的观点，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总体思考和对文学规律的深刻认识，显然，他关于文学社会效果问题的思维艺术，在于他对文学感召力的科学把握。

无产阶级文学的感召力的性质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学依靠怎样的意识形态去拨动与启迪读者的情智与理性，以达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目的呢？在毛泽东看来，必须依靠“三个统一”的力量，这是一种交融着思想与情感的艺术力量，但也是一种生气勃勃的，与社会进步思潮始终保持着血肉般联系的自觉力量，无论它产生于喜剧性作品，还是产生于悲剧性作品，其本质上不仅与社会、与人民维系着最广泛的相通性，而且就它的倾向性来说，都在于叫人更清醒、更全面、更科学地理解和认识过去、现在与未来，并以这种力量唤起崇高感和责任感，去实践改造今天、建设明天的伟大事业。在文学作品中，即使是对黑暗、残酷、丑恶、痛苦的艺术扮写，从中迸发出来的，也是一种充满沉思的、鼓舞人们去奋斗的奋发感，而不是那种四顾茫茫而无可奈何的悲叹。如果说，文学是一面镜子，那末我们从无产阶级文学这面镜子中，看到的是人类社会的光明前途，尽管其中也充满了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残酷斗争。

无产阶级文学感召力的核心，就是“政治”，就是“内容”，就是“革命的政治内容”，也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以及焕发这种理想的马克思主义。当然，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那种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而是真正的、不断发展的、活的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由于这一灵魂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文学产生出最新的、最富有探索性、鼓舞性的感召力。不言而喻，文学毕竟是文学，它不同于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科学论文，而是遵循自己的规律，以特有的表情达意形态驶向既定的思想彼岸的。毛泽东“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因为这种漠视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非但不会强化无产阶级文学的感召力，反而会削弱或僵化这种感召力，以致造成人们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误解，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只讲思想性，不讲艺术性。其实，无产阶级文学所特别强调的，恰恰是作品的社会效果，以及造成这种效果的文学感召力。如果一个作家不注重文学的感召力，而只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愿望上，停留在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上，那他的愿望和信仰无论怎样强烈、炽热，也只能是一个不合格的作家。不难设想，一部自称为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如果缺乏起码的文学感召力，那只是一堆没有生命的黑色文学而已。无产阶级文学的先进性及其在文学潮流中的旗帜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应该对它所能产生的感召力，提出更为严格的艺术要求。

纵观毛泽东有关文学艺术理论的著作，构成无产阶级文学感召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作家的世界观和信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有

头脑的作家，都应该在实践中形成与完善自己的信仰。信仰，是产生坚韧不拔的意志力与献身精神的意识源泉；对一个有所作为的作家来说，不具备一种稳固信仰，是不可思议的。连托尔斯泰都说：“一个没有明确而固定的新世界观的作家，是不可能创造出艺术作品来的。”（《文艺理论学习资料》下册，第498页）我们不要求每一个作家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也是很难达到的），但是每个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的作家，都必须自觉地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仰靠拢。因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然，“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却能帮助人们在同等才华的情况下，更深刻地审察现实，更生动地描写现实。这样，就会使文学作品具有一种精神指向性的感召力。

第二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把握。现实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一个作家如果不把自己的灵魂沉入人民生活的海洋，那他的灵魂一定是不充实的，所创作的作品也就不可能产生新鲜、丰富、深刻的感召力。只有真正理解了人民的理想与实践，以及种种追求中的欢乐与痛苦，才有可能把最好的精神产品还原给人民。这种以作品为“媒介”的从生活到人民的还原过程，正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感召力的产生过程。因此，无产阶级文学的感召力的产生，往往决定于作品与人民思想感情是否相通，与人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是否保持一致性。远离了生活，远离了人民，文学的感召力就会产生与人民的愿望相悖的离心倾向。可以说，在无产阶级文学的感召力中，真正体现着一个正直作家的良心，因为他的创作的全部出发点与归宿，都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当我们读到某些题材狭窄、思想苍白、缺乏时代色彩的作品的时候，不能不为这种文学感召力的衰退而引起深深的忧虑；同时，也令人清醒地意识到，深入生活、不断地从时代的潮流中汲取活泼的思想与充实的情感，仍然是摆在每个作家面前的新课题。

第三是作家对艺术形式的选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中我们体会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感召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接受性和喜闻乐见的程度，那么，作品的民族特色就必须引起作家们的高度重视。实际上，每个民族都有它独具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标准，而这种习惯和标准往往具有强大的相对延续性和稳固性。因此，一个作家能否尊重和适应这种欣赏习惯，能否按这种审美标准进行创作，就成为他的作品是否具有感召力的客观尺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这就是说，文学创作不能轻率随意地打断本民族欣赏习惯的延续性，不能不顾本民族的审美标准，更不能以贬低嘲笑的态度排斥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把西方某种文学流派的仿制品硬塞给中国读者。当然，这并不是对中国传统的东西部一律肯定，也不是对外国的东西部一律否定，批判地继承、批判地吸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必须

永远坚持的原则。再说，民族的欣赏习惯和民族的审美标准，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发展和变化。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无产阶级文学的感召力，作为作家，不能不重视人民群众的接受性和喜闻乐见程度。毛泽东对文学感召力的科学把握，是他关于文学社会效果问题的思维艺术的核心。

（注：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重构新的文化性格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性格中，除了勤劳、勇敢、朴实、人心思安、团结礼让、反对压迫和侵略之外，令人感到遗憾的就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迷信、保守和封闭。前者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后者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负担。因此，社会必须变革。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都不能不伴随着文化的变革。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进行革命的文化运动，就要重构新的文化性格，为此，毛泽东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中华民族新的文化性格是什么？七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把它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既是对毛泽东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今后文化建设任务的强调。重构新的文化性格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重构新的文化性格的思维艺术，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的艺术。

一、思想基础的奠定

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特别是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现实，是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特色，这就奠定了他重构新的民族文化性格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传入中国，立即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陈独秀所接受，从而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五四”革命群众运动的新阶段。当时的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他深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来融合中西文化。起初，毛泽东很重视国学，他博览群书，但读得最多的还是儒家的经史，而顾炎武等人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对他影响尤深。“五四”前后，他学习与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他提出：“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这时，就立下了重构民族新的文化性格的大志。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创建“新民学会”，并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就是从事重构新的文化性格的一种活动方式。1918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以后，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一道积极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但后来从出国留学的情况来看，收效并不理想，因此，毛泽东认为，与其糊里糊涂出洋留学，不如先下功夫弄清中国的国情。他在1920年3月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吾国古今学说制度之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又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由此可见，改造现实、重构新的文化性格是目的，而研究国情，学习外国的东西，只是手段。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立即着手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在所拟《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提出：“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

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因流于社会。”这一段话表明，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已明确地表示：要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强调研究国情，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来改造社会，造就人才，重构新的文化性格。难怪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所著《毛泽东》一书中为此着意指出：“‘自修大学’设在船山学社，这决非一个偶然的枝节问题，恰恰相反，它可以被看作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形成的中国革命的象征。因为‘自修大学’虽然极其强调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但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包括象王夫之这样的持批判态度的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党许多未来的干部，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毛泽东在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讨论会的过程中，继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他后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这个论断是相当深刻的。

二、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斗争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和德国，它不是直接从德国传入中国的，而是通过俄国这个中转站才在中国传播开来，并且得到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性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具有客观真理性，也即真理的绝对性，因此必须坚持。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抽象，因此认识不可能十分完善。所以，在坚持的同时，又要发展。毛泽东就是在这种坚持与发展中，通过马克思主义来重构中华民族新的文化性格的。

事实上，在新的文化性格的重构过程中，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统一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毛泽东就是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重构新的文化性格的。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在共产国际和我们党内都出现了一种教条主义的流行病。教条主义者不懂中国的历史、现状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只以马列主义的词句来指挥一切、号令一切，给中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被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当时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通过了有关政治、军事、土地等十八个文件。这些文件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消极影响。这就是一切听命于斯大林，使我们党内更加滋长了一种依赖国际、依赖十八个文件的本本主义的思想。针对这种思想，毛泽东尖锐指出：有的是志认为“党的第六次全体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反对本本主义》）

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依仗共产国际的后盾，严酷地统治着党中央，教条地套用“城市中心论”，并作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来推行。这个“城市中心论”王明推行了四年，差不多把中国革命葬送了。毛泽东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同王明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扭转了极端危险的局势，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为了清算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了著名的延安整风，在党内比较系统地解决了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统一起来，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为重构新的文化性格，迈出了极为坚实的一大步。

从毛泽东同教条主义斗争的理论和斗争的实践可以看出：第一，毛泽东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最后真理”、“终极真理”，而是看作一个系统的、多层次的、动态的、开放的思想体系。第二，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在特定环境中的语句出发，把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伟大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在反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中形成的。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曾经集中精力攻读马列原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作出理论概括，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都闪耀着他对马克思主义坚持而又发展的思维艺术的光芒。在这些著作中，都表达了他重构新的文化性格的观点、要求和方式方法。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对待一切外国思想文化的根本性原则：“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毛泽东不但提出了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的主张，而且又提出了吸收这些文化的基本原则：“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主张大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目的，除了“为我所用”之外，还想把外国的先进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而通过国情比较，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此，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得更明确：“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里所谓“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就是“全盘西化”，亦即全盘资本主义化的倾向。所谓“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全盘西化”，在我们党内没有多大的市场，而王明的教条主义，却影响很大。所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严肃指出：“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成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从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召开了历时十一个多月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极为认真地讨论了党的历史上有待澄清

的问题，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清算了教条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历史证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历史也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才会取得胜利。在胜利中，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等新的文化性格逐步形成了。这是毛泽东一个伟大的历史贡献。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称这一段历史为毛泽东生涯中“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从我党的历史来看，这一段毛泽东著作丰盈，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

毛泽东思想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也必然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坚持与发展的思维艺术，贯穿于毛泽东重构新的民族文化性格的始终。当然，一种新的文化性格是长期斗争的产物，不可能象制造机器一样在短时间内研制出来。但是一旦一种新的文化性格形成，就会长期地发生作用。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重构新的文化性格的斗争历程看，这是个千秋大计。目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新的文化性格业已形成。我们的民族将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科学的求实精神、顶天立地的气概、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富有生气和创造气质、积极的参与和竞争意识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毛泽东超常思维艺术例谈

所谓超常思维，是一种打乱习惯的思维模式，冲破常规、寻求变异的思维。它包括求异思维、发散思维、侧向思维等。它的特点就是科学性、进攻性和创新性。如果能把这种思维的流程用文字表达出来，那么作为读者，一开始往往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中间往往感到妙趣横生，最后感到茅塞顿开，从而受益匪浅。毛泽东善用这种思维方法，因为它能产生令人振奋的思维艺术效果，从而在人们思索之后，解决一个个严肃的社会、人生等问题。下举二例：

一、“对牛弹琴”

这一成语本《庄子·齐物论》“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味终”，郭象注：“是犹对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术终于昧然也。”宋惟白集《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二十二《汝能禅师》：“对牛弹琴，不入牛耳。”南朝梁代僧佑《弘明集·理惑论》：“公明仪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从以上三段文字来看，“对牛弹琴”这一成语，都是比喻对不能理解的人白费口舌、力气。有讥笑和看不起听话人的意思。这种解释已约定俗成。可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

在这里，毛泽东以超常的思维，一反过去对这一成语的习惯理解，进行翻新和“倒置”，赋予这成语以全新的含义。不仅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而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表达效果。毛泽东为我们勾画出一位“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宣传者的形象，他目无群众，眼睛朝天，既不管群众听懂听不懂，也不管群众欢迎不欢迎，却一个劲地在那里讲演。明明是人民群众非常厌恶的“老鸦声调”，他却自鸣得意“哇哇地叫”个没完没了。通过成语翻新，毛泽东也深入浅出地讲了一个重要道理：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必须要有针对性，必须看读者和听众，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宣传的目的。而党八股却“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地“乱讲一顿”，其思想根源在于没有群众观点，改正的方法，就是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学习。

二、“反其意而用之”

毛泽东在他的《卜算子·咏梅》词的题目之下有一小序：“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请先读陆游的《咏梅》词：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词中的梅花孤独、清冷，又遭受到风雨的侵袭，但依旧独自吐着芬芳，即使凋谢之后被碾成尘泥，也幽香如故。陆游以梅自比，一是慨叹自己抗金的抱负不得实现而又受到朝廷中投降派的嫉妒、排挤和打击的命运；二是抒发自己在寂寞中愁闷、幽愤的思想感情；三是表达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这首词的基调是低沉、哀怨的，流露出一种怀才不遇、孤芳自赏的情味。再看毛泽东的《咏梅》词：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处在冰冻百丈的悬崖之上，环境恶劣，但她迎雪盛开，显得格外俏丽。她不想和别的花儿争芳斗艳、独占春光，只想把春天即将来临的喜讯报告人间。等到山花漫山遍野盛开的时候，她却隐在花丛中和百花一起欢笑，共享春光。这是对共产主义战士崇高品质的赞颂。赞颂共产主义战士坚贞不屈、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赞颂共产主义战士不为名、不为利、乐于奉献、勇于牺牲的高尚品格。

“反其意而用之”这一超常的思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令人振奋的艺术效果。陆游的梅，是消极地忍受险恶环境摆弄的风雨飘摇中的梅；毛泽东的梅，却是向严寒示威、主动进攻的梅。陆游的梅，是在无可奈何的处境中孤芳自赏、与“群芳”对立的梅；毛泽东的梅，却是谦逊自处、和百花共享春光的梅。所以，“反其意”，就是反·消极颓废、屈服于命运、无可奈何为积极乐观、主动进攻、斗志昂扬；反目空一切、孤芳自赏为高瞻远瞩、谦逊自处。前者是命运的奴隶，后者是命运的主人；前者表现的是怀才不遇的旧文人的思想，后者抒发的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情怀。“反其意而用之”，这一“反”一“用”，就使二者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这是两种品格的对比，两种精神的对比，更是两个时代的对比。在对比中，读者受到了感染，得到了启迪。

象这样的例子，在毛泽东著作中很多。都展示出毛泽东科学的、进攻的、独创的超常思维艺术。仔细品味，确实怡人而醒世。

抗争·求异·图新

毛泽东的思维从小就与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小时候都听从父母的安排，沿着家长的愿望成长。但毛泽东从小就有反抗意识。八岁开始在本地的一个小学堂念书，一直念到十三岁。白天读《诗经》、《四书》，早晚下地干活。因教员很严厉，经常体罚学生，十岁那年，毛泽东逃学了，家里人找了三天才找到他。等他再回学校上学时，老师的态度比以前温和多了，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意识到“罢课”的胜利和“抗争”的效果。此后，他的思维更不循规蹈矩了。抗争、求异思维的勇气更大了。

大约十三岁的时候，一次毛泽东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因故父子俩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毛泽东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毛泽东，他骂了父亲后，就离开了家。母亲竭力追劝，父亲追骂并让他回去。毛泽东跑到一个池塘旁边，对他父亲恫吓说，如果再逼近一步，他就跳进去。最后，父亲提出要儿子磕头认错，毛泽东则提出如果不打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事情就这样以双方的妥协结束了。这件事使毛泽东抗争思维意识更强了。他认为公开反抗能保护自己，而一味温顺驯服，反而会使父亲对自己更严厉。毛泽东还从实践中总结出了同父亲辩论的有效方法，那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父亲责备他不孝，他就引用经书上老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父亲指责他懒惰，他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轻的多干活，并说等他到了父亲的年纪，准比父亲勤快得多。

毛泽东不喜经书，他不顾先生的禁止，公然在课堂上用经书遮挡偷看《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旧小说。十三岁后，父亲不再让毛泽东上学。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只好白天做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但他并不听父亲让他读经书的要求，而是背着父亲深夜里遮起窗户，读《盛世危言》等他感兴趣的书籍。这些书又激起了他复学的愿望和读书的热情。最后他逃离了家庭，外出求学去了。

在外边，他看到长沙的饥荒，群众要求救济，衙门不答应，群众示威游行，砍断了官府的旗杆，结果遭到了镇压，许多人被斩首示众，毛泽东深感不平。在乡下饥民发起“吃大户”运动，他父亲算半商，一些粮食也被穷人扣留了，毛泽东并不同情父亲。小学有一位新来的激进派教师，反对佛教，鼓励人们把庙宇改成学堂，众人反对，毛泽东却赞成并很钦佩这位教师。

十几岁的毛泽东根本不恪守“历来如此”一类大人物的教诲，他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很感兴趣。他从不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与众不同的求异思维，常常使他背离家教，违反校规。他如饥似渴地向他的未知领域探索寻觅。他放弃经书，进了新学堂，接受西方新学，他从自学中，了解了日本侵占朝鲜、台湾的经过，这些使他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第一次看到了于右任主编的宣传民族革命的《民立报》，从报上他看到了黄兴领导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深受感动。他还听说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他竟然激动得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提出请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院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湘江日报》上谈到社会主义（实则是社会改良主义），毛泽东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他热情地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他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他更是热情奔放。他利用自修，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

《物种起源》、斯宾塞的《逻辑》，还读了卢梭的著作，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孟德斯鸠关于法律的书，并认真研读了俄、美、英、法等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还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期间，绰号叫袁大胡子的国文教员使毛泽东受到不少教益，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伦理学教员杨昌济——他未来的岳父。杨昌济鼓励学生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对伦理学产生了兴趣，他还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著作，并在受到启发后，写了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当然这时的毛泽东同杨昌济都还是唯心主义者。另一位对他影响较大的是一位姓唐的教员，这位教员经常给毛泽东一些旧《民报》看，从报上毛泽东了解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他还从报上登载的两个学生周游全国的行动受到鼓舞。第二年夏天，他徒步游历了湖南五个县，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这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主动结交一些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能够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热血青年，以此，他团结了一批学生，形成了一个核心，他还与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在此基础上，1917年成立了新民学会。其中有罗学瓚、夏曦、何叔衡、郭亮、张昆弟、蔡和森、向警予，连同其他七、八十名会员。这时的毛泽东受《新青年》的影响较深。因此，他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这时他已抛弃了康有为、梁启超，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总之，二十五岁前的毛泽东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陈规旧俗进行抗争。他不满现状，他对一切不同于现状的东西都感兴趣，他象海绵一样饱吸着周围一切感到新鲜有用的东西，他求异心切，图新志坚。他离开家乡走向社会，他从南方到了北方，他甚至也想从中国到法国勤工俭学。他的求异思维和创新思维使他踌躇满志，四处奔波求索，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埋下了种子。

不去法国勤工俭学

1919年，中国的知识界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形成高潮，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首先响应，毛泽东本人也是由湖南去北京，由北京去上海为新民学会的会员南北奔走，筹措款项，准备成行，但他本人却不打算去，这是为什么呢？这与他时对局的分析思考、对现状的思维判断是分不开的。

直隶高阳人李石曾，清代巨宦李藻的后人，父亲亦为大官，祖传遗产很多。后赴法留学，学生物兼营商业，在法国还经营了一些工厂企业。李石曾精通法语，往来于法国上层社会，对中国官场也很熟悉，他趁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壮参战，劳力缺乏的机会，借助自己雄厚的资本，勾结法政界上层官僚，获得招募华工的权力。大战一结束，大批军人复员，劳力不再缺乏，一部分华工亦被遣送回国。李石曾看到再招募华工已无前途，便转而鼓动中国学生和知识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则继续招募华工，二则也可以博得青年学生的信仰，以捞取政治资本。1917年4月，李石曾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介绍留法勤工俭学规则，鼓吹勤工俭学的好处。于是勤工俭学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热潮。

人们不了解这些内幕，只想到赴法留学的好处，就连执教于北京大学的杨昌济教授、也从北京给肖子升、蔡和森、毛泽东（当时号称“三豪杰”）写信，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毛泽东的新民学会讨论了这封信，并首先起来响应。当时认为勤工俭学是反抗旧思想和剥削阶级的利器，甚至奉工读为主义。大家推毛泽东执笔，写出勤工俭学的实施方案，并经肖子升修改，送交李石曾。湖南学生先后汇集北京，等待赴法。新民学会在长沙时，打算全体赴法，并委派蔡和森代表新民学会会员进京进行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和另外二十人也于1918年秋启程赴京。赴法勤工俭学的全体人员，先到上海，然后远航法国。新民学会会员离京赴法时，同人纷纷赋诗赠别。当时，罗章龙写了一首五言律诗：

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

（1919年冬）

雪月映西山，冰封渤海湾。
围炉忻笑语，别意动燕关。
徒倚双轮动，踟蹰落日阑。
车书观万国，海上有书还。

新民学会还在上海的半淞园举行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会议委派他回长沙任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最后大家合了影，然后，赴法人员沿着吴淞口岸走向一艘法国货船。

毛泽东独自一人站在倾斜的码头上，看着朋友们鱼贯而行走进船尾的四等舱，然后，他大声对赴法的朋友们喊道：努力学习，拯救国家！

起初，毛泽东也打算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但他出于自己的思考，还是中途易辙，决定不去法国。这除了他在经济上学习法语方面的困难外，主要是他的思维与众不同。从根本上说，他认为个人的和国家的前途不在西方。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我认为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不多，我呆在中国或许更 useful。”正如当一位同学对毛泽东不能赴法表示遗憾时，毛泽东回答

说：“革命不可能推迟到你们从海外归来。”这便是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原因。

于是，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想法，带着满腹的政治计划回到长沙。他以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修业学校主事的身份为掩护，发起了青年读书会，又与其他人一起重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回到韶山，又成立了教育促进会，他还编辑并接管了《通俗报》。他还在同学的协助下成立文化书社，借以传播左翼文学的种子。他在文化书社成立时宣布：“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所以，毛泽东就在雅礼学校以低租金租了三间房作文化书社，并从杨开慧的母亲那里得到了经济援助。不久就在其他城镇成立了七个分社。书社中经营的书刊中有：苛尔卡普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罗斯之研究》和《新青年》、《新生活》、《新教育》、《劳动界》等。在何叔衡的帮助下，他发起了俄罗斯研究小组并筹划赴俄留学。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下，他试图组织劳工联合会。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他开始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时还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成立共产党组织的基础。毛泽东还把《通俗报》的许多人聘为修业小学的教师，依靠学校的薪水维持他们的生计。利用校友会的场所召集会议，给文化书社以补贴。毛泽东把第一师范变成了萌芽时期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大家庭。他还把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覃、妹妹毛泽建吸收进来为共产主义小组效力。

1921年初，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了三大例会。毛泽东主张采用俄国式的革命方法，反对“通过几十年的教育”改良。但是，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的大部分人反对他的观点，一些继续留在法国的人也写信反对这一观点。毛泽东倾向于苏联，而肖子升则不；毛泽东赞成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肖子升则主张个人自由，毛泽东决心组织起来夺取政权，而肖子升则仍愿做一个教书匠。肖子升对毛泽东说：“象刘邦和项羽那样大规模的争斗，在那稣基督和释迦牟尼看来，就象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而大打出手。”毛泽东无可奈何，只是说：“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很遗憾。”五四运动实际上以毛泽东和肖子升为代表分成了“主义”派和“问题”派。“主义”派主张在思想意识的指导下付诸一定的行动；“问题”派则主张研究具体问题而远离生活。这就是当时以及后来人们传说的，以李大钊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和以胡适为首的“五四自由派”。

毛泽东宣布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并把解体后和自己观点一致的人拉进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这时已经开始把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作为自己的指路航标，并于1921年作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之一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之中 ——有关农民问题的创新思维艺术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的农民问题一直没有引起注意。在“五四”的主题中，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在中国共产党的日程上，也没有它的位置，直到1924年还没有一位农民是中共党员，到处都认为农民没有闹革命的天才。

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毛泽东才督促他的仍持怀疑态度的同僚们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当时唯一的农民组织是彭湃创建的，他在广东的东部成立了农民协会。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新建的农民部部长。1924年7月，他在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中国历史上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政治反叛为目的训练农民的学校。同年8月，毛泽东应邀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第一课，使中国的农民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良好的开端。

中国国民党农民部的成立，激发了毛泽东的工作热情，但在中国共产党内农民问题却反响甚微。1925年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公报中，“农民”一词在每次提到时都与“工人”一词用连字号连接起来，好象农民不可能单独存在似的。

毛泽东在共产党内与众不同，他经常回到韶山，在农田里召开政治性会议，与邻居们交谈，与雇工们谈春播问题。1925年2月，他还离开韶山走了几个县或更远一些的地方，他住在农民家里，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从农民那里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把他的笔记本记得满满的，他象着了迷一样奔波在青山绿水之间。他在农民协会里成立党小组，他给农民讲共产主义，他努力与中国不再沉默的大多数接上联系。到1926年底，他使湖南的七十五个县中半数以上有了农民协会，会员人数达二百多万。仅在湘潭县，他就建立了二十多所夜校，一方面提高文化水平，一方面传播马克思主义。他用最通俗的语盲向农民讲革命道理。他说，大自然赐给每个人的都是一双手和一双脚，一切财富都要用双手去创造，但是，为什么富人不创造财富却可以坐享其成呢？……1925年8月，他在当年他父母住过的阁楼上，为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举行了庄严的典礼，发展了三十二名农民入党。乡村中第一次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喊。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国民党宣传部所作的报告，第一次公开表达了他的新思想：“迄今为止，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农民运动的高涨已在争论中占有重要地位。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全会上，农民部终于成立了。毛泽东被任命为农民部的负责人。当年年底，他在《向导》上又发表了两篇论农民问题的文章。

中国在二十年代中期，对莫斯科来说，最得意的是统一战线；对共产党的多数领导来说，最麻烦的问题是共产党怎样才能从统一战线中得到好处，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对毛泽东来说，最关心的是民众问题——实则是农民问题。他从湖南农民问题的调查中，对革命应该为了谁，什么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烈火，使之有足够的热度能融化旧的同时又能创造出新的等等革命的重要问题都有了明确的答案。他认为，革命应该为穷苦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住在农村，韶山周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毛泽东认为他们属于贫农或中农。星星之火应该在农村燃起，地主的压迫比城

市中资本家的压迫更严重也更残酷。1926年3月，他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半年后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毛泽东从自己掌握的事实材料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出发，明确地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认为，农民在革命的各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受压迫最深，而是贫困的人也是最革命的，这是一贯如此的。毛泽东断言：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之中。革命必须依靠农民，没有他们才能使旧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倾塌，即使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完全依靠他们，因为“军阀政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开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农民，而他们又是生活在地主阶级的统治之下”。“如果农民不起来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统治，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可能被推翻。”“另一方面，对于农民来说，一旦他们起来，他们就会推翻压迫他们几千年的地主和土豪劣绅的政治统治。”而“城市工人的政治目的只是为了获得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他们并不希望立即从政治上打垮资产阶级。”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乡村就象磁铁一样吸引着毛泽东。他于1926年10月结束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又用了三十二天的时间，在湖南的五个县作了调查。他看到农民协会在农村各地都占了统治地位，农民“象乌云一样汹涌澎湃”。地主被敲锣打鼓的人群拥着游街，其中罪大恶极的已被关进县城的监狱，有些地主则抛弃家产狼狈逃窜。农民还成立了长矛队维护新的秩序，“打倒帝国主义！”已成为连孩子玩耍时都喊的口号，甚至农民会向恶霸地主大声喝问：“喂，土豪，你知道不知道三民主义？”地主的权威扫地已尽，整个社会翻了个儿。对此，毛泽东欣喜若狂，同时也感到吃惊。

湖南农民运动，在很短的时间，以迅猛的气势荡涤着社会的污泥浊水，这充分显示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也证明了革命必须依靠农民，但同时却引起了各方面的震惊和非议。毛泽东曾以叶公好龙的故事讽刺那些“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的“革命者”们。他嘲笑一位指责农民已经被“赤化”的军事指挥员：“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

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见解是独特的，也是正确的，他以创造性的思维所得出的结论，包括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都已被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是革命的经典，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在当时看来，国民党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也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但他们的许多将领都是农民的剥削者，他们如果听说农民象湖南的农民那样发展下去，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当农民运动真的发展起来时，毛泽东就被汪精卫指责为煽动叛乱者。就是共产党内的一些领导人也是醉心于工人运动，迷恋于城市暴动，他们甚至嘲笑毛泽东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说什么“山里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就连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密友，也说毛泽东征收土地立案必然会引起“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斗争”。

只有毛泽东深信：革命必须唤起民众，而在中国百分之九十的民众是农民，尽管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如果没有农民这个最广大、最积极的同盟军的参加，革命永远也不会取得胜利。中国的革命不同于欧洲，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太少，力量太弱，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控制着政权，掌握着军队，占领着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发动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

唯一正确的道路，而这在欧洲是没有先例的。

所以，在中国，对待农民问题的态度就是对待革命的态度，能否依靠和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思维确实是创造性的。

改变世界的一周 ——决策思维的艺术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美隔绝二十多年后毅然访华，并很快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这一事实震惊了世界。尼克松把它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对毛泽东来说，这“改变世界的一周”不是一支突如其来的幻想曲，而是逐步施展的策略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以前，他只着眼于中国的事情，只是到了延安，日本的侵略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他才第一次把世界事务作为他日程表中的一部分，他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描绘成全球危机的一部分，并预见到西方反对纳粹德国的事业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所存在的潜在价值。他雄辩地论证了全球反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性。开始谈论中国的震动对落后国家会产生的影响。这时，他开始象一位世界政治家那样讲话。但他与外国人没有过密的关系，他的外国朋友也比其他中共领导人少。1944年在延安接见“迪克斯”使团，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握手。这时的毛泽东对美国寄予希望，除了他已感觉到美国军队要踏上中国的土地与日本作战外，他还希望罗斯福停止给国民党提供美元和援助，否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争将会是长期的、艰苦的。为此他1944年在延安欢迎和接见了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经过会谈，毛泽东与赫尔利制定并签署了国共联合计划（亦称“五点方案”）。毛泽东还向罗斯福提出要去华盛顿与他会谈的要求，并写了亲笔信交给迪克斯使团驻延安办事处。信中表示他与周恩来已作好准备赴美，如果罗斯福总统不打算邀请他们的话，请对信件保密，以免触怒蒋介石，因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着不愉快的谈判。结果赫尔利扼杀了这一信件，信件一直没有到美国最高官员手里，相反却先到了重庆。赫尔利当了美国驻华大使，单方面撕毁了“五点方案”，还把那些认为毛泽东将掌握中国未来的美国官员一一赶了下去。为此，毛泽东写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可笑的是1945年8月，还是这位赫尔利乘飞机赴延去接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四十五天后，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了一纸协定，后来，毛泽东才了解到美国政界对中国事务所采取的态度。原来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宋美龄已经活动了几位关键的共和党人，结果他们一致同意支持国民党。以致造成一场历史的大笑话。毛泽东的第一次出国应该是在五十一岁时到美国，结果却是五十六岁时去了苏联，使中美两国二十多年断绝来往，使中国人民受尽了战争的折磨，可是1972年美国总统只好亲自来中国，签订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如果美国当政者多一点预见的话，又何致于出现这样的历史误会！

毛泽东在延安的办公室墙上挂有四幅像：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按西方字母排列）。这说明毛泽东一直想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直到1948年蒋介石由南京迁至广州时，毛泽东还邀请莱顿·司徒雷登大使会谈，结果司徒雷登慌了手脚，而华盛顿认为毛泽东势力太弱，不愿和他打交道，所以对毛泽东与司徒雷登的谈话不感兴趣。直到1949年毛泽东已无需去华盛顿求援，但仍然高姿态邀请美国官员会晤，而美国仍表示冷淡。这激怒了毛泽东，不久他就下令对驻在中国北方的美国领事馆人员实行强硬态度，不少被驱逐出境。他还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对美国进行了冷嘲热讽。其实，毛泽东在几年前早已警告美国，毛泽东对巴里特说：“如果你们这些美国人吃饱睡足了没事干，想指责人民，支持蒋介石的话，那是你们的事，我不想

干涉。”“但是请记住，中国是谁的中国？它肯定不是蒋介石的，它属于中国人民。当你们的支持也变得无济于事时，这一天就将到来。”所以，这之后他称蒋介石的政权是“美国的殖民政府”，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美国的愤怒的指责。

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毛泽东认为朝鲜是一块和中国利益相关的地方，同时也基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态度，考虑杜鲁门可能由此踏上进攻中国的台阶。所以，毛泽东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向美国政府严正指出：如果麦克阿瑟让战争靠近或越过中国边境的话，中国就要介入。结果，美国一如既往仍然坚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美国调用了部署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美国政府公开地把台湾和朝鲜联系在一起，麦克阿瑟还要求蒋介石的军队进入战争，并于1950年10月麦克阿瑟公然炸毁了鸭绿江上的一座大桥。至此，毛泽东毅然决然地把中国的二十五万军队投入朝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与美国直接发生了战争。其实，毛泽东对美国侵略意图的估计已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柯里尔》上的文章和地图所证实。地图上是北朝鲜和中国东北的一部分。箭头从北朝鲜指向中国的好几个城市，并标有飞行距离。另一张地图上发亮的箭头从台湾、朝鲜、日本和冲绳群岛指向中国。而这些地图都是毛泽东派兵朝鲜之前出笼的。

六十年代前半期，毛泽东对美国的国内外政策作过很多批评，他谴责美国对黑人的迫害、控制巴拿马运河，谴责华盛顿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着。1960年，由于多年来的矛盾和分歧，中苏关系破裂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中美两国政府也从各方面观察着对方。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微妙的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

1959年3月的一天早上，毛泽东在东湖边上会见了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这是自从在延安与斯特朗谈“纸老虎”以来，在武昌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当时毛泽东六十六岁。当他看到九十一岁的杜波依斯仍然身轻体健时，他说道：“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杜波依斯有点严肃地回答：“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毛泽东笑着说：“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冷冷他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毛泽东回答道：“这正是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当然他是指杜勒斯的反面教员作用。

1969年5月，陈毅等老师们在报告中建议：鉴于尼克松总统执政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立即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打开冰冻已久的中美关系。另外从法国首任驻华大使马纳克转达的尼克松的正式口信来看，美国真的想跟中国缓和了。当然其中一个目的是想从越南脱身。

为了促进中美关系，尼克松于1969年7月批准了放宽对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六类公民（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医生）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7月21日尼克松刚宣布了放宽限制的决定，7月23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对两名误入中国领海的美籍大学生宣布释放，并于7月24日通过罗湖桥到达香港。

1969年2月下旬，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法国。在与戴高乐的会见中，戴高乐曾说：“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

尼克松说：“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中国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

戴高乐十分赞赏：“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访法回国后，尼克松决定作一次环球旅行，以寻求通往北京的渠道。最后决定在这次旅行中，要以两条渠道探索中美新接触的道路：一条是找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另一条就是找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

尼克松在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对齐奥塞斯库说：“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他又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尼克松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对叶海亚·汗总统说：“尽管我政府中的其他人和许多美国人完全不这样看，我还是认为，要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

叶海亚·汗说：“我很欣赏您的见地。”

尼克松又说：“中美两国对骂了二十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叶海亚·汗摇摇头说：“中美两国积怨太深了！依我看，不是一两次对话就能解决的。当然，我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好友，当尽力而为。”

尼克松转身对叶海亚·汗说：“美国决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

尼克松批准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到中国的旅行限制后，中国立即释放了两名误入中国领海的游艇乘客。尼克松为此感到鼓舞。于是在结束环球旅行回到白宫后不久，便在8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什么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尼克松的话使他的内阁同僚们大吃一惊。

1969年11月间，美国政府决定撤走两艘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往台湾海峡巡逻的驱逐舰，并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告诉中国：撤走两艘驱逐舰的目的，是表明美国愿意同中国缓和，通过谈判解决两国关系问题，不表明美国对台湾不承担防御义务。12月6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通过巴基斯坦渠道转告美国领导人：中国决定释放另两名自2月16日因游艇误入广东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女士（这同7月份释放的两名美国游客无

关)。这是对美国停止两艘驱逐舰巡逻的答复。12月11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邀请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去中国大使馆作客。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中美接触中美国人第一次接到这种邀请。

1970年元月20日，中断了两年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又举行了。而且破天荒第一次在中国大使馆进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开始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在“中共大使馆”举行，几小时后又奉白宫的指示修正说，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首次使用这个正式名称。在这次第一百三十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发言中传递出一点新信息：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去同你们的官员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你们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来更全面地探讨我今天的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或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于此同时，基辛格在华盛顿也接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的发言稿。其中也传递给美方新的信息：

我们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这些会谈可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级进行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

1970年2月20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中国代办雷阳作了一次非常奥妙和委婉的发言，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受美国派一个使节去北京的建议。尼克松受到鼓舞，感到中美接近的前景良好。

后来美国军队采取进入柬埔寨的作战行动，中国政府授命新华社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即“五·二声明”），尼克松开始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但经基辛格一分析，他才放下心来。

1970年10月24日，尼克松在白宫宴请了三十一位前来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的国家首脑或政府领导人。10月25日，尼克松又单独会晤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要求他作为中间人提供帮助。10月26日，尼克松又单独热情接待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尼克松向齐奥塞斯库暗示，他本人认为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一个国内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并在晚宴的祝酒词中向北京发出了公开信号：“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同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然而，正如今天早些时候我对总统阁下说的，他所处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领导的政府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上罕见的。”一位美国总统在公开场合称北京政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意味着一项重大决策：用一定方式表示对大陆中共政权存在的承认。11月13日和12月中旬，叶海亚·汗总统和罗马尼亚副总理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分别把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信息传达给毛泽东。12月9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到白宫交给了基辛格一封信，为了保密，这封信既没署名，也没有抬头。信中说，“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

最热忱的欢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基辛格经尼克松批准，草拟了回信，并以同样方式转给中国政府。回信告诉毛泽东、周恩来，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970年12月18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接见老朋友斯诺。其中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中美会谈，十五年谈了一百三十六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当面谈。”

斯诺问：“主席愿见他么？”

毛泽东爽快他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斯诺说：“我看吵架难免，也不要紧。”

毛泽东伸出一个指头，对着斯诺说：“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1971年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待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发言人在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时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联系到2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这些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系列情况后，毛泽东毅然作出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毛泽东的决定一经公开，美国惊呆了，世界轰动了。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乒乓外交过去之后，4月21日，尼克松在白宫特别接见了刚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斯廷霍文。他向斯廷霍文保证，对于美国乒协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之事，他一定给予合作。

4月27日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来到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口信，口信说，中国人现在对于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尼克松同意中国的邀请，但不同意公开。他认为，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事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尼克松反复考虑，最后决定派基辛格秘密访华。

4月29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生活》杂志报道的毛泽东在接见斯诺时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在东南亚条约组织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说那是“随随便便地提出的”，那不是“当真的邀请”。他还说，中国对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相当偏激”。

尼克松当晚得知罗杰斯的谈话有如晴天霹雳，只好当天亲自举行了记者

招待会，作了一些纠正。他说：“我希望，事实上是预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

为了使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华获得成功，尼克松批准了基辛格草拟的给周恩来的信。信中说：“为了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尼克松总统建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的秘密会谈。基辛格博士准备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会谈，地点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飞行距离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

“我们建议，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停留的时间多长、通信联络以及类似的问题通过叶海亚·汗总统作为居间人进行讨论。为了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他渠道。同时，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不久，基辛格便接到了由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送来的周恩来的回信：

……在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基辛格如释重负。尼克松也禁不住眉开眼笑。

看着总统把信读完，基辛格笑着说：“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基辛格秘密访华的结果，中美双方同时在1971年7月15日发布公告。公告的内容是：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总统访华终于成行了。2月21日11时27分，尼克松总统乘坐的飞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

尼克松总统走下飞机，微笑着向迎接他的周恩来总理伸出手来，周恩来也伸出了手。两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说：

“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周恩来为尼克松一行举行了午宴。午宴刚结束，周恩来便来找基辛格，并直截了当地告诉基辛格：“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基辛格

没料到毛泽东会这样快接见尼克松，听到周恩来这样一说，便问：“我能否帮助手洛德去作记录？”

周恩来点头同意了，语气有点急：“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

历史性的会见开始了。毛泽东向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最高首脑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这一历史性镜头永载史册。在两人会晤后仅几个小时，中国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这种作法表明，毛泽东本人很快赞扬了尼克松的访问。

这也难怪，在美国总统访问北京之前，还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访问过东京或莫斯科；尼克松在中国八天的逗留期是美国总统访问外国时间最长的；美国总统在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领土上谈判是第一次。

对毛泽东来说，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他对美国的要求仅仅是美国不要去做某些事。他在四十年代后期（当时华盛顿在援助蒋介石）、在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在1953年（那时艾森豪威尔正在强迫中国在朝鲜停战）、在1954年和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以及在1966年（一些美军司令对通过进攻中国来打败越南的主意很感兴趣）一直担心美国对中国的袭击。

尼克松中国之行的八天确实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就中美关系说，互相都感受到的困扰不安的负担从双方肩上卸去了，并且扩大贸易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就中苏关系说，中国找到了对抗苏联威胁的可靠力量；就中国的国际关系说，中美建交导致了足够的多数国家给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投了赞成票，尼克松离开北京后九个月内，又有二十个国家与中国建交；日本赶忙拥抱北京，而与台湾断交；台湾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总之，整个世界格局和力量均势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几十年来，中美关系一直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具体说，从1944年夏他第一次接见美国官方使团起就已经开始了，不过那是以非执政党的身份进行的。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以前，中美双方处于对抗状态。五十年代后期，即从中苏关系破裂明朗化以后，毛泽东就已开始考虑中美改善关系的问题了。1959年与杜波依斯谈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就是一个信号。

毛泽东在促进中美建交的十几年中，他一直是“以规范未来的实验过程和预测其效果为中心内容”的决策性思维来考虑问题的。每前进一步，总是以美国的实际表现、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为依据的。如美国撤走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驱逐舰，中国接着释放两名美国人，美国出兵柬埔寨，中国就发表“五·二声明”。在推进双方关系的过程中，随时考虑到事情在时间和空间中所可能经历的发展变化，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使希望达到的目标和实际可能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差距缩小到最低限度。如开始我们同意美方派员访华，可以公开接待，但经美方说明，考虑到尼克松在国内的实际困难，以及考虑到实际效果，最后同意了先派基辛格秘密访华为总统访华作准备，而且直到双方发布公告，一切情况一直处于严格保密状态。所以，中美建交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决策思维的过程。

关于政权建设的系统思考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灭亡和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政权建设摆在面前，首先必须从理论和政治上阐明国家的性质、体制、对内对外政策等重大问题。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分别阐明了这些问题：

一、关于国家的性质。毛泽东指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要建立的国家，只能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二、关于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工人阶级的领导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有很大的重要性，要联合他们对付帝国主义，发展生产，巩固人民政权，但是它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

三、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两个方面的结合。人民在现阶段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反动派就是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人民民主专政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四、关于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建国前夕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订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文件。《共同纲领》除规定了政权的性质等重大问题外，还规定了新中国社会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下，合作社经济、手工业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第一届政协会议还选举了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国旗、国徽、国歌，确定北京为首都，决定新中国采用公元纪年，还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这一系列大政方针确立以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布了一系列重大任命。

同时确定了建国初期的两大任务：一是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政权；二是要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新的胜利。

军事上继续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任务，追歼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土匪和特务。到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西藏、台湾以外的所有国土，消灭了一百八十三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和九十八万土匪。

政权上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1951年10月西藏和平解放，实现了近百年来

全国空前未有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人民当家作了主人。

经济上建立了国营经济，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二千八百五十八个，平衡财政收支，稳定金融物价，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打击投机商人的不法活动，没收投机资本。使物价开始回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外交上采取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保障我国独立自主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恢复经济的国际环境。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1950年10月，仅一年的时间，我国就与世界上十七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在稍微站稳脚跟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北京及时地召开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毛泽东指出，要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必须实现三个条件。这就是：第一，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当时还有三亿多人口的地区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这个任务不完成，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是不可能获得根本好转的。第二，对现有工商业实行合理调整。只有完成这项调整，才能建立起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工商业体系，才能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发展生产，活跃市场，繁荣经济，增加税收，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第三，必须对国家机关所需的经费，实行大量节减。为此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八项工作：

- 一、有步骤地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统一平衡和物价的稳定；
- 三、必须谨慎地做好人民解放军的复员工作；
-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 五、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
- 六、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
- 七、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
- 八、坚决地执行党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

为了实现上述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毛泽东又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当前的总方针，即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这就必须克服党内一些同志的急躁情绪，必须调节各方面的关系，必须缓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毛泽东的这一果断决策及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保卫了

中朝两国的独立、主权和安全，维护了世界和平，同时推动了我国各项工作的开展；沉重打击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加强了我国的国际力量，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增强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确定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方针，以及广泛发动农民，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自己起来打倒地主阶级，取得土地的政策。这一改革，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镇压反革命。确定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主动者受奖”的政策和专门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针。确定了打击重点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这一改革任务的完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反”、“五反”。1951年12月，毛泽东决定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开展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这是为了克服一部分干部进城后滋长起来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习气，适应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需要而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党严重腐蚀的斗争。从1952年1月起，又开展了以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采取了放手发动群众，广泛进行检举揭发，利用矛盾，实行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贯彻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办相结合的方针。结果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同时也起到了清除旧社会的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纯洁了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951年10月至1952年底，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开展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以解决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态度问题。运动中，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广泛地组织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改造的学习和参加实际斗争的锻炼，因而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调动了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此外，还在党内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对党内严重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对任意违反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采取蛮横态度去完成工作任务；对破坏党和人民政府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至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整顿。并由此重新讨论修订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从而改善了党的领导，改变了党的作风，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党更好地完成所承担的任务创造了条件。

到1952年底，三年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已胜利完成。不仅医治了战争创伤，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的落后面貌，树立了战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典范，取得了伟大成就，达到了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的预定目标，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积累了重要而丰富的经验。

在这个基础上，1952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

期的总路线，到 1953 年下半年，正式形成和制定了这条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 1953 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

其基本内容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两翼。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私有制问题。只有解决了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也才能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迅速的发展，才能消灭我国历史上存在几千年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任务，为社会主义改造打下物质基础，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毛泽东又制定了 1953 年至 1957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百九十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稳步增长。

基本策略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力求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避免脱节；力求建设计划同资金的积累相适应，并适当地估计到技术力量；中央的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起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首先保证重点工程建设，同时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基地，积极地着手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并且把两者结合起来，逐步改变过去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把国家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改善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基本措施是：

- 一、大力进行新的工业企业建设；
- 二、充分发挥现有工矿企业的作用；
- 三、统一调配和大力培养建设干部；
- 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
- 五、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保证工业建设需要。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于 1956 年提前完成了。

1956 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三大改造的高潮，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一、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趁热打铁迅速地领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根据中国农业的特点和农民的习惯，采取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等由低级到高级的步骤和形式，逐步引导农民摆脱私有制走上公有制的道

路。运动中，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贯彻了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从而使农业合作化运动获得了成功。

二、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三种形式：生产小组、供销生产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以此形式把大量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实现由分散到集中、由低级到高级的社会主义改造。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以及随着手工业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技术逐步由手工生产转变为机械化生产，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走的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对资本主义企业采取购买政策，国家以定息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和对资产阶级的改造结合起来，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给予必要的工作安排，有较高的工资待遇，不剥夺选举权，对有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政治上的安排。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几千年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并规定了“八大”召开的目的是宗旨：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并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要犯长期性的路线错误。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会议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及时地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亿万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会议还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必须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在“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矛盾，提出了必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成为“八大”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和依据。

毛泽东认为，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全国开始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阶级斗争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但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是社会中大量存在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

鉴于以上情况，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严肃地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7页）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主要包括：

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旧社会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大量的普遍存在的矛盾。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因此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

三、必须正确地估计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的状况，规定解决敌我矛盾的正确方针。

四、阐明了我国在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少数民族、民主党派以及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了正确处理的方针。

五、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

这一理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要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

根据“八大”的精神，1957年进行了一次普遍的、深入的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开门整风运动。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0页）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9页）

4月27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我国目前已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转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变革中，因此党必须改造自己，才能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次整风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总结和自己的工作，检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和不从团结全国人民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以及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

《指示》还规定，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并且使它形成一个永久的制度。《指示》还提出必须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把整风与改进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

但是，由于整风中间插入了反右派斗争和发动大跃进运动，整风一直到1958年5月才大体结束，同时在内容上也有了很大变化（后来以反右倾保守、反浪费为主要内容），所以这次整风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目的。反右派斗争带来了严重后果：重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视为解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形式，并且推行到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使经济建设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轨道，严重地破坏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严重地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影响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

总之，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许多不良后果。

尽管中间插入了反右派斗争，但第一个五年计划仍然超额完成了任务，并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

- 一、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
- 二、必须正确地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 三、必须正确地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
- 四、在经济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不断地反对“左”倾冒进和右倾保守的倾向，不断地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坚决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反对主观武断；
- 五、学习外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很重要，但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决不能生搬硬套。

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基础，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指出，通过整风反右斗争，把大跃进的劲鼓起来了。根据当前形势，一方面积极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强调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一方面要开展大跃进运动，以实现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

1957年冬季，农村兴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热潮。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有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以及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公开提出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工业的产品产量方面，要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毛泽东的讲话，对世界各国震动很大，英国报界说，中国是东方的一条蛟龙。当然对中国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958年1月初，毛泽东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参加的杭州会议，着重讨论了当时要抓的各项工作。杭州会议后，又召开了由九省两市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高潮的形势下，为实现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必须改进党委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拟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

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迫切要求和强烈愿望。但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结论，重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提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表现了高度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和科研领域，全国呈现出欣欣向荣、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局面。但片面强调高速度、追求高指标也越来越厉害，于是浮夸风日益严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在8月17日至30日于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两个决议一经公布，全党全民的炼钢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超出预计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随之“共产风”也普遍地产生。在公社范围内发生了穷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无代价上调，银行把农村贷款也一律收回，即所谓“一平二调三收款”。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生产迅速下降。

毛泽东逐渐觉察到了这些问题，于是从1958年11月起至1959年7月初，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进行了若干纠正。

首先是对公社外部“共产风”的纠正。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召开了郑州会议，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划清了界限，澄清了党内的混乱思想，纠正了急于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错误，刹住了“共产风”。接着于11月21日至27日召开了武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必须老老实实，不要弄虚作假，要压缩空气，明年的钢产量定的太高，要压下来。接着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会议决议论述了人民公社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纠正了在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向和误解。

其次是对公社内部“共产风”的纠正。毛泽东指出，农村中所以发生瞒产私分，这只有从公社所有制以及采取的政策上去认识，误认为公社一成立，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等由公社分配了，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误认为按劳分配就是按需分配，误认为集体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因此在公社范围内发生了“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是根本原因。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这就从公社内部纠正了“共产风”。

总之，毛泽东在纠正“左”的错误中，先后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等思想、

这对纠正“左”的错误起了积极作用。

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正式讨论通过了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全党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1961年3月，中央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条例》对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规模、分配原则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规定。196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对《条例》作了重大修改，6月把修改的草案发给全国试行贯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进行了自我批评，对1958年以来的“左”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会议重新肯定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并对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在会上，毛泽东虽然强调阶级斗争问题，但他说，一定要把当前的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抓阶级斗争而干扰了这项工作。所以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的中心工作仍然是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同时有些地方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运动。这对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调动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

1963年冬，中央决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经济调整，强调把恢复和发展农业放在第一位，要按照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工业，突破尖端的原则，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但重点放在巩固、充实、提高方面。

1965年春，根据农村“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情况和暴露的问题，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问题》，即“二十三条”。强调要始终抓生产，要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并作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

这之后，毛泽东根据对国内外斗争形势的思考和判断，面对中国的现状，以他自己的逻辑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一生中，紧紧抓住政权建设不放，一直到临终，还担心政权能否巩固，会不会变颜色？甚至还有重上井冈山革命的设想。而他在政权建设中，总是凭借他那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与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的问题之间找到过渡的桥梁，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这就是所谓“求解思维”。

毛泽东思维的形象性特色

毛泽东具有鲜明的诗人气质，并具有极丰富的想象力，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毛泽东的形象思维来源于他超人的智慧和胆识，同时又是他智慧和胆识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他于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时候，他就与肖子升、蔡和森同是杨昌济先生的得意学生。最后一年，同学们在品德、胆识和文学口才方面把毛泽东作为学校的楷模。有的学生称他为“奇才”，还有的称他为“智囊”。二十年代早期，为了表达他对传统教育的强烈不满，他根据“军阀”创造了“学阀”一词。现在我们使用的“解放”一词，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般人认为解放就是从日本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毛泽东则另有一番见解，他认为解放是社会的解放，是从地主劣绅、苛捐杂税、高利贷和儒家思想对中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另外“人民”一词也因为毛泽东为拯救中国发起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的解释、运用而进入中国革命之中，并被广泛使用起来。这些都说明毛泽东的智慧、胆识和才能确实是超出一般人的。这些内在的因素正是他思维活跃、开阔、发达的重要原因。

1921年，他在安源教矿工识字时，使用的就是形象化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然后解释说，上边的一横线是“天”，下边的一横线是“地”，中间的一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足站在地上，头顶着天，是顶天立地的。他要工人不要相信宿命论，要相信自己。同年，他在给长沙的人力车夫上课时，仍然采用了这种方法。他先写一个“工”字，再在旁边写一个“人”，然后再写一个“天”。他绘形绘声地告诉人力车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字的下边构成一个“天”字。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就可以顶天。

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时，毛泽东以形象的构思设计出了自己起义部队的新旗，旗帜上是斧子、镰刀和五星。当然，他的独出心裁使当时的共产党中央大为恼火。到达井冈山后，他又提出了后来家喻户晓、人人皆用的经典式比喻，把军队比作“鱼”，把老百姓比作“水”，军队与人民是鱼与水的关系。以后的“军民鱼水情”，人民战争如鱼得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等习惯说法，皆由这一比喻生发而来。他还把井冈山根据地比喻为人的“屁股”，强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说：根据地之于红军就象屁股对人一样重要。如果一个人老是没有机会坐下来休息，他就会因疲劳而倒下。军队也是这样，决不能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采用流寇主义的办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大为削弱了。五万名共产党员只剩下七千人。秋收起义后的一个月里，毛泽东也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工农武装力量。这时，在革命队伍内部，悲观情绪日益严重，有的甚至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鲜明地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形象而生动地把“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比作“星星之火”，把革命的发展前途形容为“燎原之势”。他说：“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他接着形象地指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

快就会燃成烈火。……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问地是不远了。”信的最后，毛泽东在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解释时，用极富想象力的语言作了精辟的比喻：“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6、98—99、103页）

形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寓抽象的事物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使人看得见、摸得着、想得到，深入浅出，容易明白，它常常运用想象、联想、比喻等形式，并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美好的理想，启迪人的心扉，激发人的热情，产生一种冲动和力量。

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军事论著《论持久战》中，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格言就极富有想象力和形象性。用具体的“枪杆子”说明抽象的“军事武装”。他还以高瞻远瞩的形象思维预见未来：“人类的战争时代将经过我们的努力而告结束，因此毫无疑问，我们所从事的战争是最后的战争的一部分。”

他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比喻为“箭”和“靶”的关系。并由此从“无的放矢”生发出“有的放矢”来。他对那些只知背诵马列词句特别是苏共教条自以为满足的人，毫不留情地勾画为“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而他自己却从不迷信教条。他对马克思的某些结论并不盲从。他一面承认马克思指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论，同时，他又认为有例外。他从中国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发展，相信奴隶社会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越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阶段。对马克思所作的其他一些结论，毛泽东也是根据中国的革命实践有选择地接受。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曾把抗战的胜利比作树上的桃子。他对全国人民说：“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26—1027页）瞧！争夺抗日战争胜利成果这样一件严肃的政治斗争，他以形象思维的方法，把它描绘得活象一个生动的民间故事，而且故事的主要人物蒋介石的语言、动作、神态都刻画得维妙维肖、活灵活现。

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对改造的方式方法问题，毛泽东有一套成熟而妥善的形象构思。一次，毛泽东把刘少奇和周恩来召来，劈头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首先说：“那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这显然是莫斯科式的解决方法。毛泽东听后摆摆手说：“决不能使用暴力，……每件事都应是自觉自愿的。”

之后，周恩来接着说：“我首先让猫饿三天，然后，我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地全吞下去。”

毛泽东也不赞成周恩来的做法。他认为一个人不能够使用欺骗的手段——不能愚弄人民。

那么，毛泽东的策略是什么呢？他说：“这很容易，你可以把辣椒擦在

猫的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而感到兴奋不已。”毛泽东的办法，正是他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把他一贯的做法——既可以唤起人们的热情达到他的目标，又不会降低他的威信——具体化了。

把严肃的政治问题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加以表达，这确实是毛泽东思维艺术的一大特点。

以形象比喻讲道理以达到讽刺的目的，使人们在幽默诙谐中明白道理受到教育，也是毛泽东思维的艺术特点之一。

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对美国的政策，诸如对黑人的迫害、控制巴拿马运河、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等作过许多批评。他把美国这些政策说成是“就象一头尾巴拴在柱子上的牛，你说还会有什么好事情”。

1962年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提醒党的领导说话时不应吞吞吐吐，他用《西游记》的一个故事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他问与会者：“你们知道为什么和尚念经的时候要敲木鱼吗？”然后他解释说：原来从印度取来的真经被黑鱼怪吞掉了，所以只有敲它一下，它才肯吐出一字。“我们不应该跟黑鱼怪一样。”毛泽东的这种形象思维方法，是从1959年开始，佛教思想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谈话的想象之中的表现。他甚至借助佛经和圣经想问题，他还动员他的侄女王海容去学习它。

林彪曾别有用心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批评林彪时说：“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一句，就有六万句，他们就是不听，其实连一句也不顶。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的，不锈钢的，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呀！”就是这样东一拳，西一脚、侧击、包抄的战术、置敌于无队应付、被动挨打的境地。

评论人物，按说应当靠概念、判断、推理，即靠逻辑思维。可毛泽东同样可用形象思维，讲得深刻、通俗、易懂。

毛泽东的挚友李达曾说：“我很遗憾，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却说：“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这表明毛泽东对李达的深刻的了解，也对李达在理论界的贡献与地位，给予崇高的评价。形象生动，通俗风趣。

大自然赐给了毛泽东独特的思维模式。他非常相信净化和更新。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如果你要放屁，就放好了！那样你会感到舒服一些。”

此外，如“饭后大便并不意味着吃饭是浪费时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两条腿走路”等都是形象生动而内涵丰富的思想精华。

直到晚年，他对他死后的思考都是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他说：“不要总以为缺了就不行，没你在世界上，地球就不会转？党就不存在？你以为张屠夫死了，人家就要吃带毛的猪肉吗？不必担心什么人死。谁的死会真正成为一个巨大损失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不都死了吗？革命还要继续下去。”正如美国作家R·特里尔所说的：毛泽东自身的闹钟敲出的谐音与社会的闹钟敲出的不一致。这正说明了毛泽东的思维不同于一般人。

毛泽东思维的客观性特色

一切思维活动，都是客观事物的运动、发展引起的。

一切革命家的思想意识，他的理论以及依据这种理论所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客观实践在其头脑中的正确反映。毛泽东认为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们头脑里所固有的，而是从客观实践中来，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中来。所以，他一生都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并全力倡导全党都重视，进行调查研究，以胜利地进行革命和建设。

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荣山公社官山大队一位名叫赖茂基的农民，把珍藏了二十七年之久的一本油印小册子《调查工作》，作为革命文物贡献出来。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异常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这便是后来更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他还在1963年3月的广州中央会议上回忆了这篇文章的诞生经过，并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斗争才写出来的，他很喜欢这篇文章。还印发给大家阅读。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如此喜欢这篇文章？

原来这篇文章写于1930年，是针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错误的。在农村，教条主义者主张“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对土豪劣绅及其家属子女，一律斗争，一律打倒。在城市，他们主张对中小商人和工商业兼地主的工商资产实行没收政策，甚至有人主张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

为纠正这种错误，毛泽东亲自到寻乌调查，历时二十多天，弄清了当地情况，又召开五十多人的调查会，核实材料，集思广益，写成近十万字的《寻乌调查》，并在调查过程中，把实践中的心得体会进行哲学的概括。他认定：“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凡革命队伍中，无论官长还是士兵，都知道的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来自这篇文章。

无疑，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种思想来自革命实践，客观地反映了社会实际。它产生于对客观实际进行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先头。

这篇文章虽不是宏篇巨著，却是反对党内教条主义错误的一个历史性总结，是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共产党人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正确阐明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彻底揭露了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质和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相结合”思想的先导。

毛泽东继列宁创造性地开辟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之后，也创造性地开辟了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井冈山道路”，其实这也是经过调查研究，因而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科学成果。

毛泽东两上井冈山，两次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对井冈山有利的地理条件（方圆五百里、山高林密、五大隘口，有万夫莫开之势，攻退可取）、经济条件（盛产稻米和油茶、林木等，可提供给养）、政治条件（党群组织基

基础较好，农民运动发展好，有党员、群众在山上坚持斗争）进行了详细调查，才作出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重大决策。

历史证明，这完全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英明的。

还有，游击战术原则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也是来自对井冈山大王朱聋子的“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的宣传作了调查，改为“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也是经过“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指全歼赣敌杨池生、杨明轩部一个团，击溃其两个团）”的龙源口大捷之后，总结出来的。这些战术原则，在三次反“围剿”中，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得到丰富和发展，恰当的运用和成功。

这套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国外是没有先例的，是在中华民族这片沃土上产生的，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军事史上的创举，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它闪烁着毛泽东思维艺术的光芒。

毛泽东思维的挈领性特色

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世界是物质的，是运动的，这构成了世间一切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事物由对立统一而存在，由斗争变化而发展。所以，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也不论是什么领域，都存在着矛盾、斗争和发展。

但是，在错综复杂的诸多矛盾中，总有一个主要矛盾，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提纲挈领的决定作用。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次要矛盾就有可能迎刃而解，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尤其如此。提纲挈领是毛泽东思维艺术中最卓有成效的部分。他从实际出发，从调查研究入手，全面、深入、系统地了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实际状况，尤其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之间的矛盾斗争，以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分析、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然后作出科学判断，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路线方针，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存在着政府腐败、经济落后、国家贫弱等等矛盾，但基本矛盾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走狗军阀的矛盾。所以，我党采取了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从而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所有领域，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都存在激烈的矛盾，然而，这却是退居第二位的矛盾，主要矛盾是民族性的，是“超阶级”的，即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才促成极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了全民族的积极性，形成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抗战守土，人人有责的生动局面。

毛泽东及党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处理，是这种思维的典范的体现。

1936年冬，蒋介石坐镇西安，逼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反共，进攻延安，而张学良出于民族大义，哭谏不成，遂发生1936年12月12日的“兵谏”，活捉了蒋介石，逼蒋抗日。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如何处理？非同小可，为中外瞩目。杀蒋！在张、杨军中，在全国，在我党内持此主张者，大有人在，而且极为激烈。放蒋！在张、杨军中，在全国，在我党内，持此主张者也有人在，而且极为冷静。

毛泽东站在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高度，高瞻远瞩，洞察秋毫，全面、科学、深入地分析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千头万绪中，抓住主要矛盾：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的矛盾。（当然说到底，民族矛盾的实质，仍然是阶级矛盾。是中日人民与日本统治阶级的矛盾，但表现形式却是民族性的，这不同于一国内的矛盾。）

正是出于这种思维，有了重点，就有了政策。毛泽东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并亲自做全国人民和我党同志的工作。他认为，虽然蒋介石是独夫民贼，镇压革命，屠杀人民，出卖民族尤其欠共产党的血债，罄竹难书，罪恶累累，千刀当剐，也不解心头之恨。但却不能杀，因为杀蒋正中日本帝国主义“以华治华”的奸计，成为汉奸置蒋介石以死地，并挑起更大规模内战的借口。这便对不起中华民族，便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放蒋，虽使他逃避惩治于一时；但这既可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灭亡中国的阴谋，又可以逼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同意

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历史证明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是极富远见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为了全局，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不计一党、一个阶级的“私”仇的空前的民族义举，感天地，泣鬼神！

毛泽东的思考，放射着唯物辩证法的耀眼的光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阶级战争；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又转化为阶级战争；新中国诞生后，急风暴雨似的阶级对抗，在中国已经结束，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只是变换了斗争的形式，可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却居于第一位，因而引起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变化，都是源于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思维，使主观的指导，完全符合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实际。所以，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不论是搞阶级斗争，还是搞经济建设；不论是建设领域，还是意识形态领域，作为一种思维形式或工作方法论，都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永久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维的超前性特色

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战略家，思维活动极为活跃，为常人所不及。他立足中国现实，眼观世界风云。所以当人们为眼前的斗争而思索、而战斗的时候，他已经在探索、规划着未来了。他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又集中国人民的智慧，绘制出一幅幅未来的蓝图，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毛泽东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并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改造中国的实际。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等，不知读了多少遍。所以，当有些人背诵马列主义词句的时候，他已在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了。他的思考是，马列主义产生于德国、欧洲、俄国的土壤，虽然有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性，但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他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正因为对中国各阶级状况、矛盾、斗争和发展，有清晰的了解，所以才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当解放战争进行到 1947 年，蒋介石的军队在数量上还居多数，在地域人口上还占优势的时候，毛主席已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到来了。他把握历史时机，作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决策，举行全国大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打乱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部署，象一把利刃，插向蒋介石的心脏。并英明地预见三种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还告诫部队：从最坏处着想，往好处努力。由于刘伯承、邓小平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也由于他们的英明指挥，实现了三种前途的最好的一种，为以后战略大决战和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历史正是按毛泽东的预言前进的。

毛泽东指挥战争的艺术，更显出他的超前思维的无比英明。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得算胜，少算不胜。”（《孙子·计》）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胜算，是孙武无可比拟的。从战役的角度说，打第一仗，必想到第二仗、第三仗、第四仗如何打；从战略角度说，处于这一战略阶段的时候，就应想到下一个、下几个战略阶段的部署，并有一条想通了的、贯串各战略阶段的战略方针。从 1948 年 9 月到 1949 年 1 月，所进行的大决战，最好不过他说明毛泽东的超前思维的正确、科学、深刻、周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若定。首战辽沈，次战淮海，再战平津，战役打得有声有色，三个阶段珠联璧合，处处生辉。整个大决战的各战略阶段，每个战役、每次战斗，似都在他的运筹之中，连敌人都在他的指挥之下。

当历史时车轮，轰轰烈烈，转动到 1949 年 3 月的时候，解放战争的炮声还未停息，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毛泽东已在绘制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建设的具体图景了。他还英明地预见到：“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

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28 页）

1951 年 11 月到 1952 年 3 月的“三反”、“五反”运动，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成了现实。不少共产党人在糖弹攻击面前打了败仗，成了失败者。甚至有的革命功臣被资产阶级所俘虏，成了革命的罪人，受到历史的惩罚，革命英雄成了历史悲剧的主角。

所以，毛泽东在 1949 年就谆谆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28—1329 页）

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也只是第二步、第三步的起始。建国后，极少数人利用手中的职权，假公济私，贪污腐化，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这也说明毛泽东的预言是何等的伟大！

毛泽东思维的缜密性特色

毛泽东，不但能在各历史关头，作出正确的决策，而且对实现这一决策，也有着极缜密的思考，有一套相应的政策。使革命或战斗减少许多曲折和损失，使革命的航船，较少损失地驶抵彼岸。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了“二次革命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天真地认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基于这种理论，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拱手交给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好象当中国实现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就会把政权拱手让给无产阶级似的。这样就从思想上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使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与“二次革命论”相反的，是“一次革命论”。持这种论点者，除了阴谋取消马列主义存在于中国的必要、取消共产党、取消中国革命的恶意宣传家之外，革命政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似无恶意的人，也持此主张。他们宣称“举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样，在民主革命阶段，制造幻想，也非常有害，这导致实际的冒险主义。谁曾想到，时至今日，“二次革命论”的亡灵，又被当今的社会“精英”们招来，大搞其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倒车。真可悲，历史竟有这样的相似与重复！

毛泽东的思考则截然相反，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让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胜利，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是幻想，帝国主义先生们不会让中国富强起来，它们只希望中国成为由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掌权的市场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仓库。另外，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也根本没有能力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戊戌变法中的仁人志士，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都吃尽了苦头，有的献出生命，证明了此路不通，连孙中山到死也没走通这条路。

毛泽东以为，从1914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时，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的。而在这之后，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却是新民主主义的了。所以，这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其性质也是资产阶级的，但资产阶级却领导不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领导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再不停顿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这就不是陈独秀先让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然后无产阶级再革资本主义的命的所谓“二次革命论”，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两个阶段论”。

“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也极为有害，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就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革命是不断前进的，但同时又是分阶段的。中国革命必须而且只能分两步走，第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不同，任务不同，革命的对象、同盟军不同，混淆二者的界限，会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的必然的继续，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46页）把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的“一次革命论”从理论上制造混乱，造成幻想；在实际行动上，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它与“二次革命论”虽有差别，但危害却是同样的，所以为真正的

革命者所不取。

“二次革命论”葬送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大好形势，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一次革命论”同样也给革命造成严重的后果，都使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论”，使无产阶级渡过1927年的险关，胜利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拨正了中国革命航向，从此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历经二十二年，艰苦卓绝，夺取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又不失时机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已经为革命实践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是完全科学的，是既带有中国的特殊性，又带有世界的普遍性的真理。

解放战争的第三阶段，毛泽东从决策到各阶段的部署，都作了极其缜密的思考。

蒋介石反动派，由战略进攻转化为重点进攻，虽然军力、财政、地域、人口等方面仍占优势，但毛泽东已极为机敏地洞悉这已是强弩之末，因而预言蒋介石的末日到了。当时我军虽在相应的方面尚处劣势，但革命已到新的历史关头，形势大好。所以，他毅然决策，开始全国性大反攻。

反攻之始，毛泽东决策派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实行中央突破，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同时，让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以陈赓等率领的太岳兵团为右后一军，挺进豫西，三军摆成“品”字阵。彼此策应，互为犄角，机动灵活。同时诱使西北胡宗南主力去增援榆林、顾祝同主力到山东半岛的海滨，都置于无用之地。这就保证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把尖刀刺进了蒋介石的心脏，连蒋介石的随军参谋长都沮丧地惊呼，他最担心的局面出现了。

毛泽东的思维何等机敏，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何等的英明，毛泽东的始战部署何等的缜密，以这样形式揭开战略反攻的序幕，是何等精彩！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无不重视始战，并极为谨慎，但如此大的规模，如此巧妙、如此缜密的部署，却是无与伦比的。

待到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战略决战阶段，毛泽东的思考，则真的达到天衣无缝的地步了。他先把敌人能作战的一百七十万军队，实行战役分割，形成三个孤立的战场。然后他指挥首战辽沈，打空前规模的大歼灭战，同时却命令淮海战场不打规模超过两个整编师的大歼灭战；再战淮海，分阶段大规模地歼灭刘峙的六十万大军，同时却命令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对傅作义的几十万大军，或隔而不围，或围而不打；最后歼灭傅作义集团，先斩头去尾，消灭天津、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后兵临城下，逼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从而结束了这场空前的大决战。

若把这个战略大决战比作一出剧，则是，以千里跃进大别山成功揭开序幕，以和平解放北平为尾声，中间环环紧扣，紧锣密鼓，将帅兵配合，摇旗呐喊，冲锋陷阵，幕幕精彩，场场扣人心弦。从全局到局部，从战略到战术，从部属到实践，从始战到末战，从战役到战斗，从军事歼灭到政治攻势，从军力到民力，从前线到后方……一切积极因素，无不调动起来，敌人的大小矛盾，无不利用起来。前后呼应，珠联璧合，四面八方，左右逢源。千里战场，空前复杂，却都在运筹之中；万千战斗，瞬息万变，无不在预料之内。满篇珠光灿烂，几乎笔笔生花！其思维艺术真可谓达到极至。

毛泽东思维的决断性特色

决断是毛泽东思维艺术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也是他作为无产阶级的英明领袖和伟大统帅的气质的极为重要的标志之一。正是这种决断性，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在许多重大的斗争进行期间，才不失时机地作出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决策。如果不是这许多正确的决策，真不知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抗战八年，取得胜利，国内外中华儿女欢喜若狂，渴望和平、民主、团结、富强。蒋介石就是慑于这一民心，只是从峨眉山上下来抢桃子，却不敢立即挑起内战，但却玩弄了假和谈真内战的鬼把戏。

1945年8月14日至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后来，蒋介石又让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和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亲赴延安接毛泽东到重庆。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关头。所以，毛泽东决断，亲赴重庆和谈。这一中外历史上的壮举，震惊了世界，表现了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深刻了解和正确的思索；揭穿了美蒋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既要内战，又要嫁祸于人的罪恶奸计；教育了全国人民，使之认清了美蒋反动派的凶残和狰狞面目；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称颂，置美蒋反动派于狼狈不堪、措手不及的被动地位。以后蒋介石挑起内战，更使自己在中外声名狼藉。这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领袖所具备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气魄和英勇无畏的气概。

难怪连蒋管区的人民也称颂“亲爱的毛泽东——我们人民的领袖”，“了不起，真是一身系天下之安危！”

以打对打，以谈对谈，政治军事，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表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思维艺术。从而保证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的完全、彻底、痛快的胜利。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中外反动派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进行封锁，指使他们的残渣余孽，捣乱、破坏，欲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要巩固经过千百万人的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必须用刀枪，用铁和血的手段来对待这伙嗜血成性的家伙。毅然决策，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9月，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这样，无产阶级以极其权威的手段，巩固了人民的江山。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这种斗争绝不会停止。所以资产阶级的反抗也决不会停止，无产阶级的天下也决不会太平无事，尤其严重的是，这种斗争是国际性的。

社会安定、“天下太平”不久，资产阶级又手执糖衣炮弹，气势汹汹地打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发动起猖狂进攻，腐蚀拉拢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从他们打开缺口，在经济等领域大肆兴风作浪，给我们造成许多困难。

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兵来将挡，水来土围，毅然决策，从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举国上下，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大张旗鼓，声威夺人。进行了一次全党大清理，彻底揭露了一切大小贪污犯，粉碎了资产阶级的猖狂反扑。特别是毛泽东决然杀掉了张子善、刘青山，更使中外震

惊。功臣试法，也绝不宽恕，可谓典型一例。难怪有的民主人士，竖起大拇指称颂：共产党伟大，共产党一定能坐天下，无私，铁面无私！

最能表现毛泽东思维艺术的决断性的莫过于进行抗美援朝的决策了。

新中国诞生，满目疮痍，百废待举，中国人民正当清扫余孽，走上恢复发展经济的康庄大道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侵占我神圣领土台湾，并把战火由“三八线”烧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出于唇亡齿寒的思考，面对这个发足了战争财的，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面对由它纠集的所谓“联合国军”，面对国际资产阶级和整个帝国主义阵营，毛泽东绝无丝毫怯懦、半点犹疑，毅然决策，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的胜利，证明毛泽东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以后曾说过：世界上一切大的东西，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在朝鲜，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什么。从事物的本质，从斗争的全局，从战略的角度看问题，一切貌似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美国的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但是毛泽东的决策是认真考虑了国内、国际，我方、敌方，天时、地利诸方面实际条件的，并组织国内国际的力量，来认真对付的。就连美帝国主义狗急跳墙，再次扔原子弹的可能性也预想到了。毛泽东说：你一定要打，就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他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弱点，跟着你，最后打败你。正是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无私无畏的战斗精神，终于取得胜利，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长期稳定的世界和平环境，在中国和世界史册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为世界无产阶级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树立了光辉的范例！

毛泽东的这种决断艺术，还表现在他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上。林彪欲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篡权（设国家主席）未成，却阴谋败露，便铤而走险，欲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甚至穷凶极恶，要暗杀毛泽东。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巡视南方，沿途与各地负责人打招呼，点名批评林彪，这使林彪集团惊恐万状，丧心病狂，9月8日林彪下达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9月10日，毛泽东突然决定马上离开杭州，并不要林彪爪牙送行。到达上海，不下火车，接见当地负责人，谈笑风声，轻松自如，却偏偏不让杀手王维国上火车。当林彪集团欲制造第二个“黄姑屯事件”的时候，毛泽东乘坐的列车却已经离开上海，并且呼啸前进，风驰电掣，直抵北京。林彪猝不及防，阴谋败露，仓皇出逃，落得个折戟沉沙的可耻可悲的下场。

古今中外，一切国家的英明领袖们，重大时刻，作出决断，这是共同的特点。不过象毛泽东这样，历史关头，决不犹豫，当机立断，化险为夷，如此正确，如此之多，当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思维的挑战性特色

挑战性也可叫进取性。马克思曾把斗争看作人生的幸福，毛泽东生活的中国环境和时代特点，也造就了他不同于一般人的性格——不断地挑战。他认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年幼时，便有极强的斗争性；年青时更宣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而且勇于坚持，绝不屈服，直到胜利，即使到了晚年，他这种向一切敌人挑战，向一切困难挑战的进取性，也决不稍减。

年青时，他向封建余孽挑战，向军阀挑战，向帝国主义挑战，向旧中国挑战，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接受、宣传马列主义。

1927—1937年，他向蒋介石挑战，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展示他的政治、军事、组织、指挥才能。

1937—1945年，他向疯狂残忍的日本帝国主义挑战，并且打败了它。

1946—1949年，他向美蒋反动派挑战，领导了解放战争，并且把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创建了新中国。

1949年后，他向资产阶级挑战，并且粉碎了他们隐蔽然而极为险恶的进攻。

他向“一穷二白”挑战，他以为“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并领导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各个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1950年，他敢于向武装到牙齿，又打着联合国旗号的美帝国主义挑战，并且打败了它，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1969年，他又敢于向社会帝国主义挑战。苏联军队两次侵略我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我则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进行英勇的自卫反击，狠狠教训了他们，打掉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在国际交往中，毛泽东对一切人民的使者，友好人士，不论信仰什么，来自什么国度，极为友好。但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一旦遭到冒犯，他便铁面无情，不论是谁，他都坚决予以还击。1949年，毛泽东访苏，举行告别宴会，由于他的坚持，斯大林绝无先例地、唯一一次参加了这次宴会。就是斯大林，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工厂，也遭到拒绝。他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尊严，更使一切大大小小的敌人，也不敢小视中国。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他这种挑战性，也表现得特别突出，年轻时就有“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他为锻炼身体，磨炼意志，暴风雨天气，他却冲向户外。1956年已六十三岁高龄，他还三次畅游长江。1966年，毛泽东已逾古稀之年再次畅游长江，并谈体会说：世界上一切大的东西并不可怕，长江很大，只要掌握了它的规律，其实并不可怕。并联系引伸到在朝鲜打败美帝国主义，进而鼓励人们到大风大浪里，经风雨，见世面，磨炼意志，增长才干。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一天气候恶劣，风大浪急，后浪推前浪，象小山一样压来。毛泽东却执意去游泳，而且坚决不可动摇，据他的警卫人员回忆，当时，大家真是提心吊胆，无不为了他的安危担心，但他却镇定自若，非向这自然的伟力挑战不可。海浪排空而来，他却冲了上去，轰鸣之中，不见人影。大家惊呆之际，却看见他远远地坐在沙滩上，满脸泥沙。回去之后，

仍余兴未减，心潮澎湃，赋成《浪淘沙·北戴河》词一首：“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留下海的千古绝唱。毛泽东就是这种挑战精神，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并使中国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毛泽东思维的思辨性特色

列宁曾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毛泽东学习、继承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学说，并以他非凡的智慧、丰富的阅历、渊博的知识和超人的思维能力，作了天才的说明和发挥，写成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伟大著作，创造性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在《矛盾论》这部处处闪烁着马列主义及个人智慧光辉的著作里，他围绕辩证法的核心，以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全面、系统、深入、科学地论证了对立统一的学说，“对立”就是矛盾，它包括着矛盾的世界观基础，包括着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统一”就是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并包含着“对抗”在矛盾的存在、斗争和发展中的作用。

毛泽东正是以辩证统一的观点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在抗日战争中，就是立足于这一观点和立场，尖锐彻底地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

“亡国论”以汪精卫、周佛海为代表。汪精卫说：“和呢，是会吃亏的”，但吃亏之后，“可以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而且“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于是他们便扯起“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亡国论”的破旗，堂而皇之地投降日寇做亡国奴了。

还有一种谬论是“速胜论”，“速胜论”者寄希望于美英帝国主义援助的幻想，认为“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更臆测“我们再打一年半，国际援助就可以不求而至，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在一年半以后那个时期”。

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缺乏、没有民族自信心，有的只是脱离人民、反人民的思想立场所表现的两个极端。因为“速胜论”者乞求美英帝国主义不成，就会由失望、无望而投降于“亡国论”的。

蒋介石派的论调“和必大乱，战必败；战而后和，和而后安”，虽然听来委婉，但实质仍然是“战必败”的“亡国论”。

汪精卫是厚颜无耻地直线投降，蒋介石派则是半遮半掩地曲线投降，异曲而同工，货色都是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

毛泽东认为：“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不对的：中国不会亡，最后的胜利属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国也不会速胜，而是坚韧不拔的持久战。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有二：

一是中国与日本现实：中国大而弱，但进行的是进步的民族革命战争，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日本强而小，但进行的是落后的侵略战争，又经不起长期作战。这是持久战的物质基础，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是我们争取胜利的物质武器。

二是战火既已燃起，矛盾的主导方面便在中国，而且矛盾双方的强和弱，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转化的条件，便是立足于依靠全中国人民，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广泛的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这便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理论基础，即夺取抗战胜利的思想武器。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形成鲜明的对比和激烈的斗争，导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理论、路线、政策上的截然对立和不可调和。

抗日战争进程的三个阶段：敌之进攻和我之防御阶段；相持阶段；敌之防御和我之反攻阶段，并以最后敌人投降我们胜利而结束。这就再好不过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路线、方法论的无比正确。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既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胜利。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象这样的典型事例是很多的。

延安保卫战之始，不少同志出于对延安人民的感情，不愿撤离，甚至不想放弃一寸土地，要誓死保卫延安。毛泽东对同志们的说服便充满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他说：与敌人斗争寸土必争，要有个争法，不能不管力量对比，去硬拼。要知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争地盘，我要消灭他的有生力量，充实、壮大自己。只好他打他的，我打我的，机动灵活，处处主动。等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大倒其霉的时候，后悔已来不及了。

敌人占领延安，形成尖锐激烈的矛盾，敌强我弱，敌进我退，但主导方面已掌握在我们手中。仗在哪里打，怎么打，完全由不得敌人，战争主动权稳操我手。

敌人飞机、大炮、坦克车，而我小米加步枪，但敌人不知为谁而战，消极厌战，又加战术错误，处处被动。而我军为人民而战，战略战术明确，机动灵活，处处主动，把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人与物，人是活的，物是死的，所以，人的因素是主要的起着决定的作用。

敌人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占领延安开始，以损兵折将，卷铺盖滚蛋告终；我以主动撤离延安开始，却以愈战愈强，彻底胜利结束。其矛盾双方，强弱的转化，主要的条件，除了战争性质（敌之反动，我之革命）以外，便是我之作战方针正确，任务明确，敌之作故方针错误，任务不明确。一切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这便是我方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拿延安换了个全中国，是辩证法的胜利。

另外，毛泽东关于原子弹的毁灭性与纸老虎性的分析；关于一切帝国主义的表面凶残性和本质上虚弱腐朽性的论述；关于中国的一穷二白的消极性和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积极性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时期，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有时还转化为对抗性的激烈的斗争的论述；关于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的联系、影响的论述；关于对抗敌人的战争手段与和平演变战略的论述等等，无不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灿烂光辉。

毛泽东非常赞赏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仍然可分的观点，并引伸到宇宙的无限：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已被物理学界所证实。所以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曾提议说：“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统一。”

后 记

《毛泽东的艺术世界》丛书出版发行之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我们为能在宣传毛泽东、歌颂毛泽东方面做了一点贡献感到自慰。同时，我们也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对丛书的内容和装帧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为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又献给读者这本精装《毛泽东的艺术世界》，期望它不负众望，受到欢迎。尽管在再版前又作了修正，但仍难免有纰漏之处，恳请各界朋友不吝赐教。

本书的出版，始终得到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新闻出版局有关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山东大学出版社也为该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1991年11月

